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美国的恺撒大帝

麦克阿瑟（下）



[美] 威廉·曼彻斯特◎著
黄瑶◎译

William Manchester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美国的恺撒大帝：麦克阿瑟（下）

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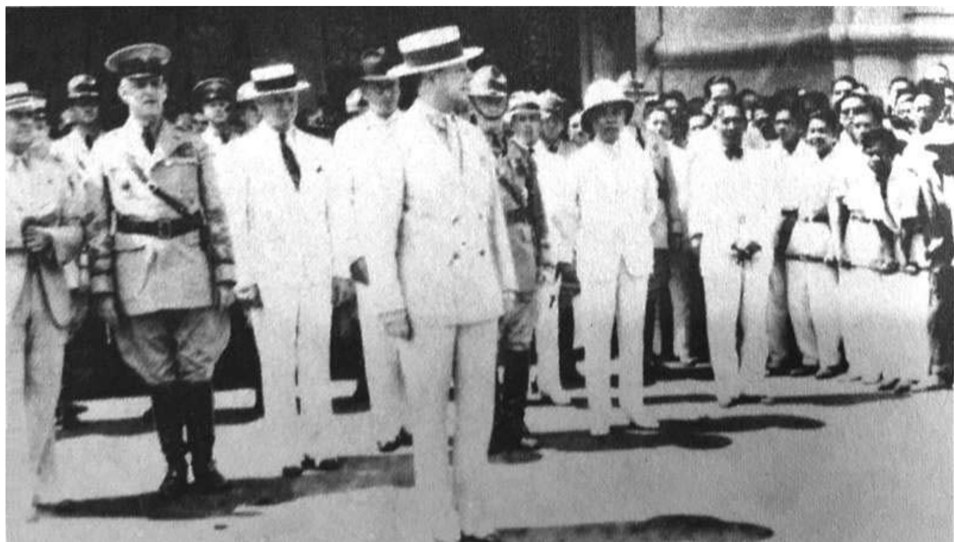
译者:黄瑶

ISBN:978750867979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麦克阿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战争部部长乔治·德恩。



1935年，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左三）到达菲律宾承担新的职务。

琼·费尔克洛思。





麦克阿瑟与第二任妻子琼·费尔克洛思，摄于两人1937年结婚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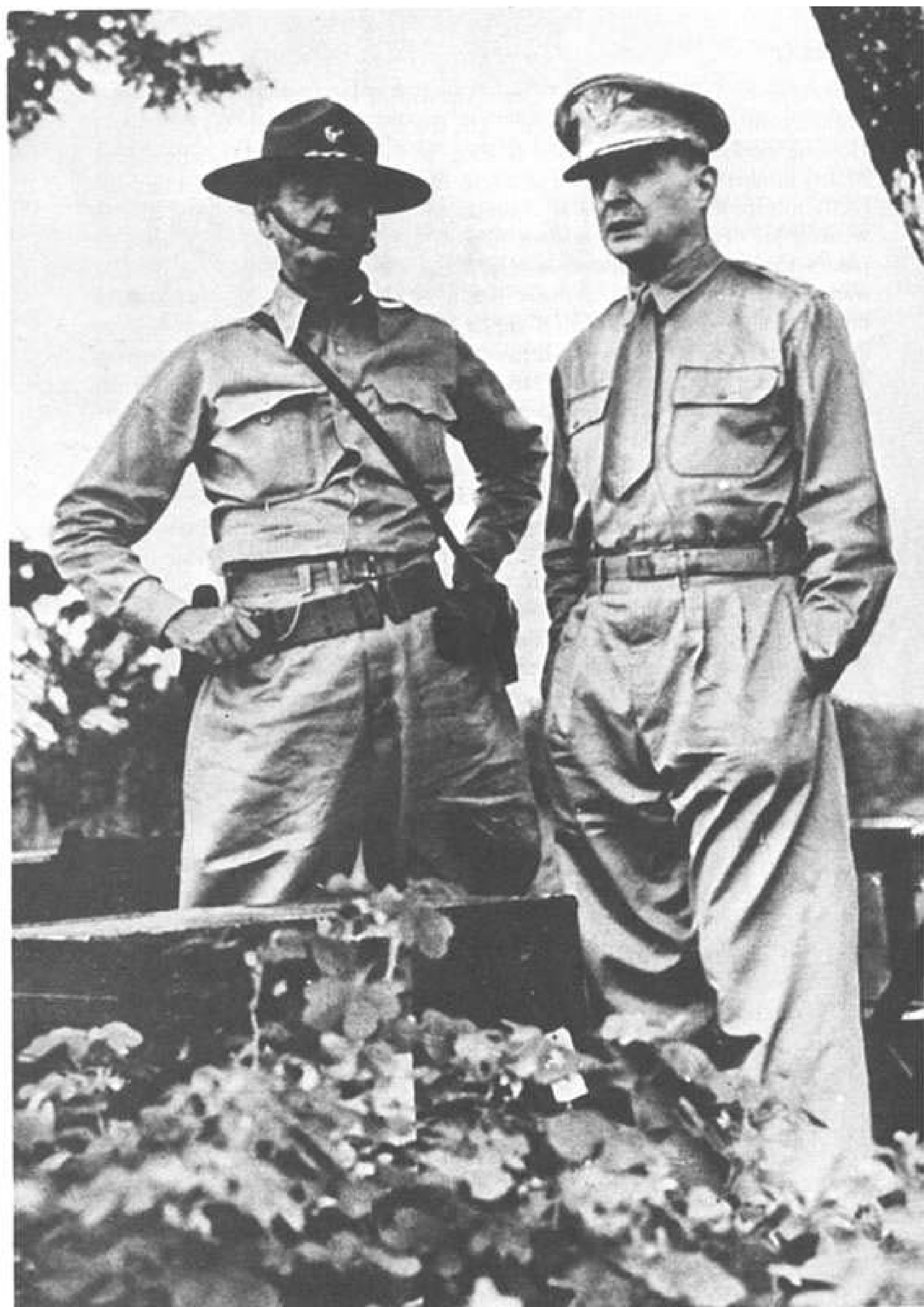
琼·费尔克洛思·麦克阿瑟，摄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



麦克阿瑟的独子阿瑟四世与他的毛绒玩具。

幼年的阿瑟·麦克阿瑟四世。





麦克阿瑟与乔纳森·M. 温赖特，摄于1941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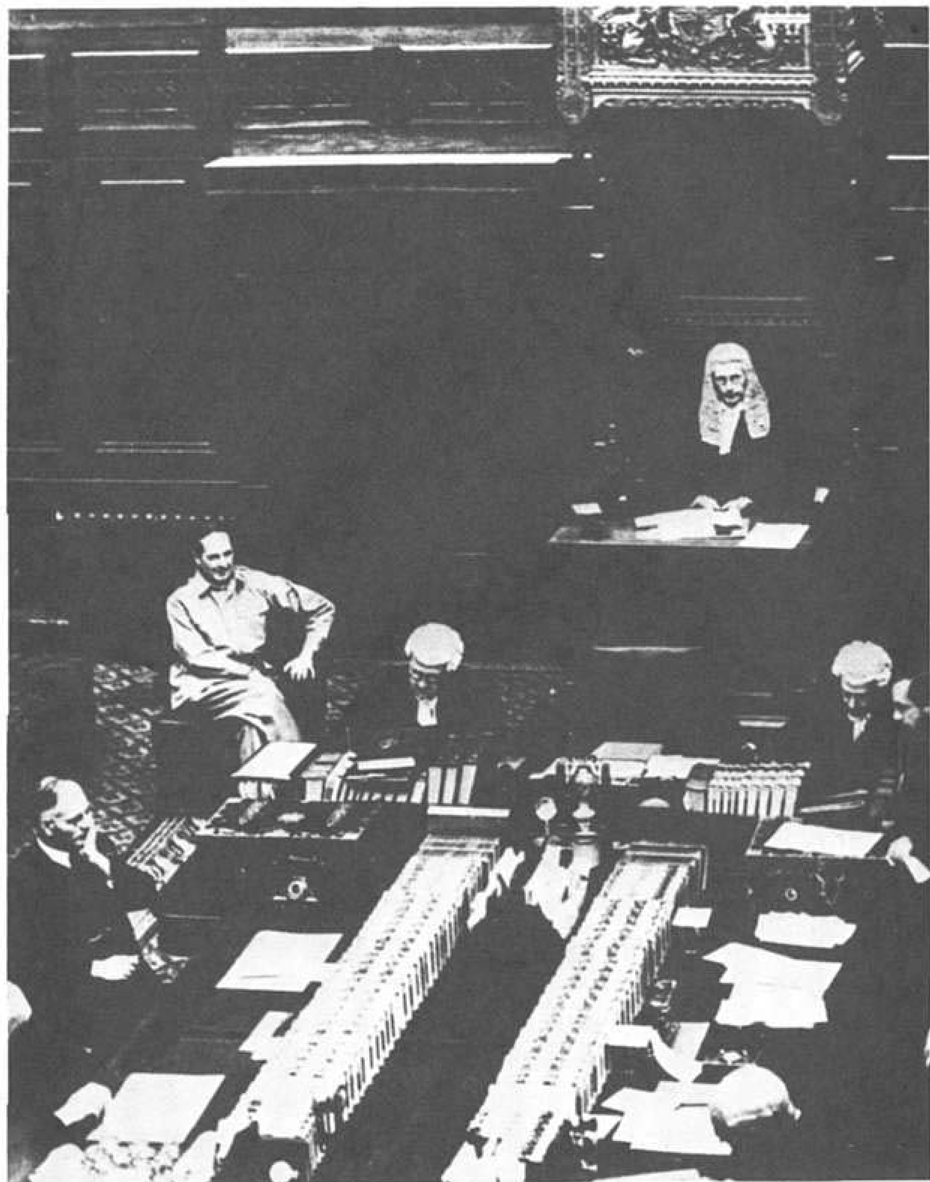
阿瑟四世在马林塔隧道外。



1942年3月，麦克阿瑟从科雷希多岛撤退后，到达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琼和阿瑟四世在墨尔本。



麦克阿瑟出席澳大利亚议会，摄于1942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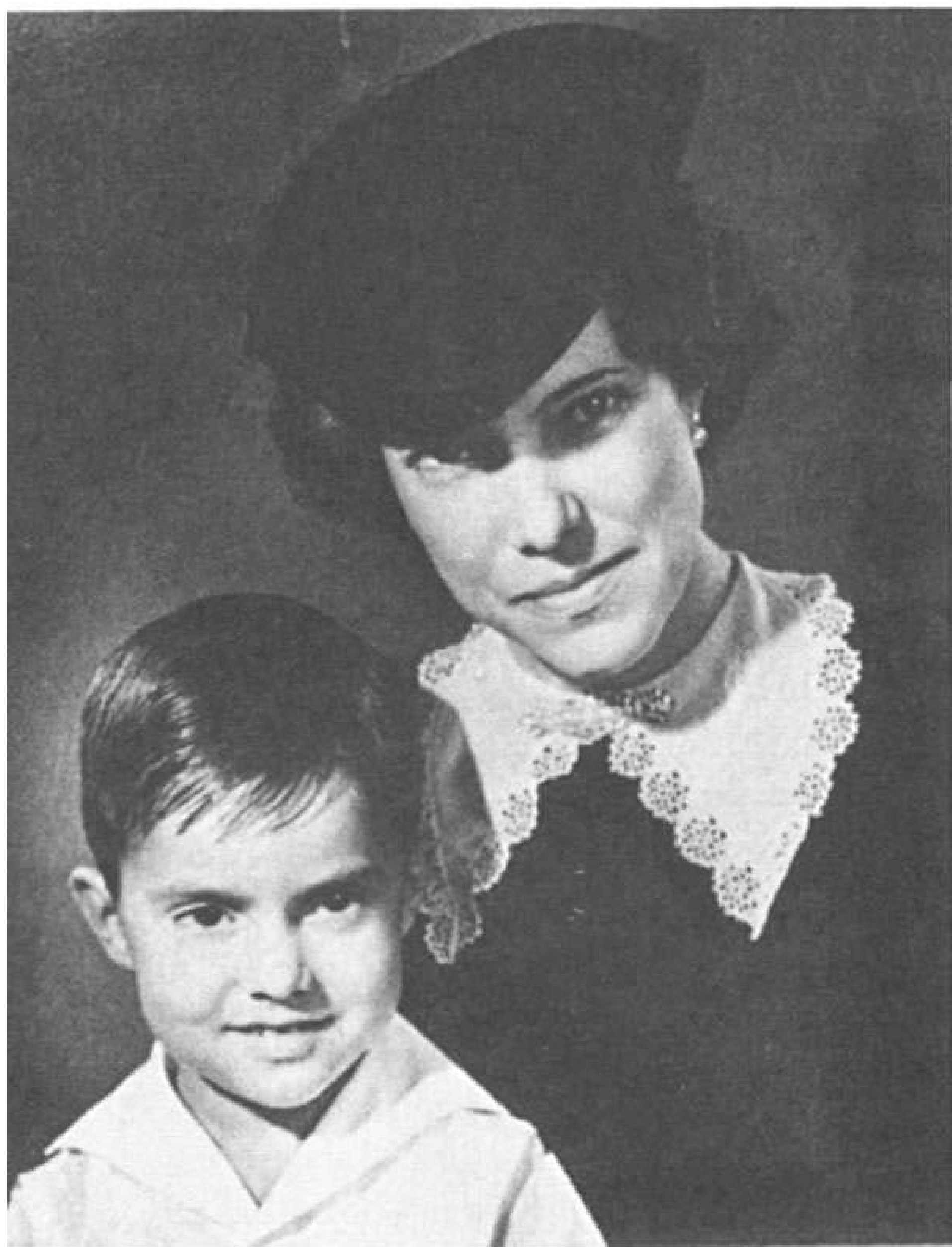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长理查德·K. 萨瑟兰在布里斯班，摄于1942年7月。



麦克阿瑟与澳大利亚部队在新几内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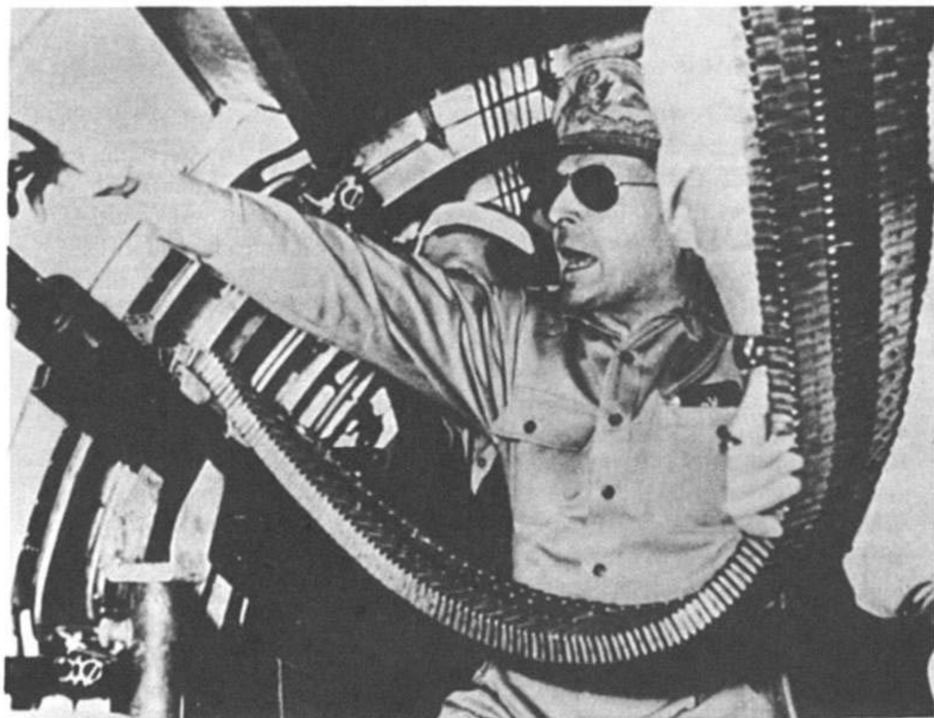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低头向妻子和儿子微笑。



琼和阿瑟四世。



阿瑟四世在澳大利亚理发。



麦克阿瑟监督伞兵部队空降，摄于1943年9月。



麦克阿瑟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摄于1944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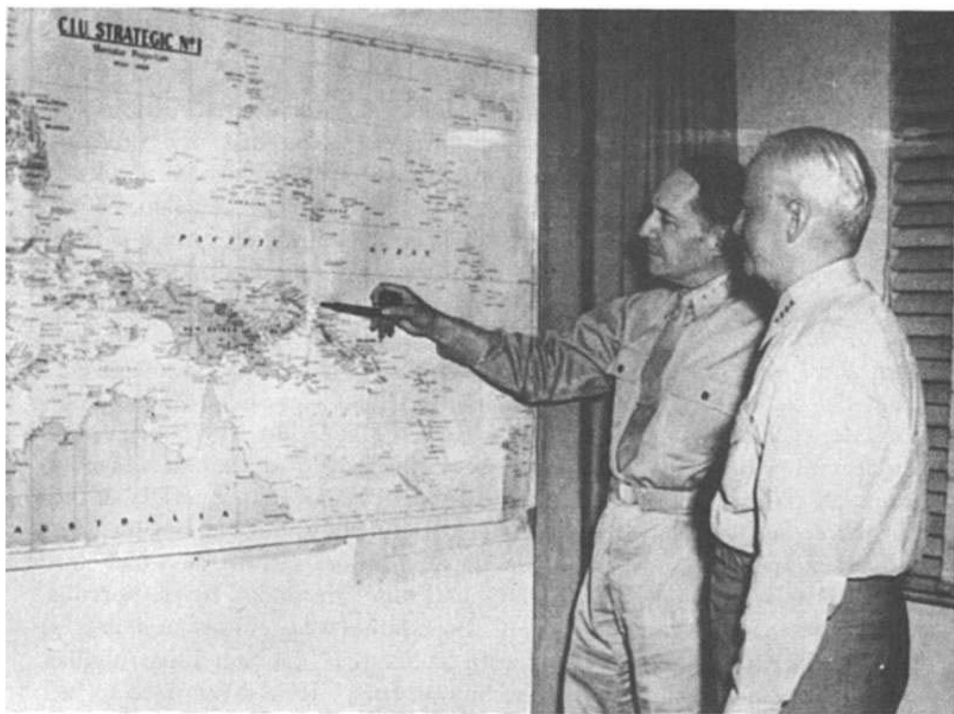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在洛斯内格罗斯岛上望着一具日本士兵尸体，摄于1944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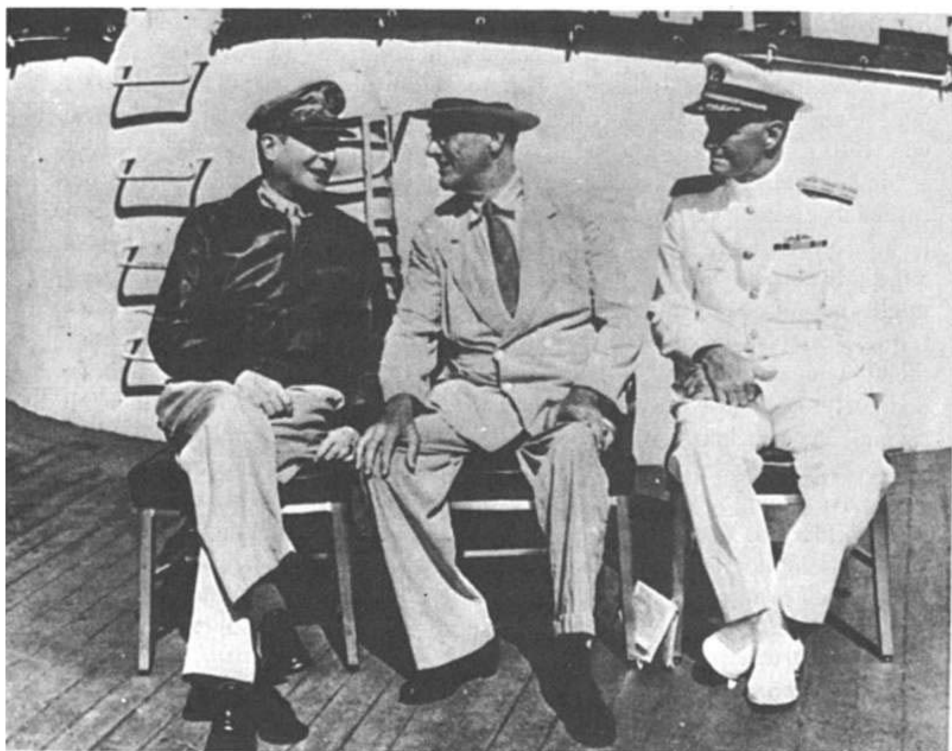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在荷兰迪亚，摄于1944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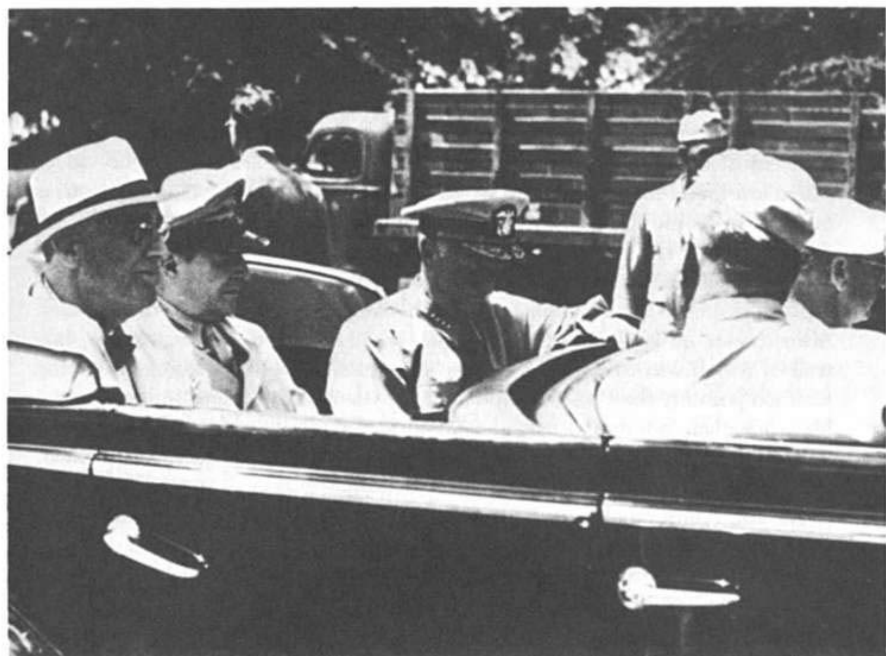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在荷兰迪亚备受争议的宅邸。



麦克阿瑟和海军上将切斯特·W. 尼米兹，摄于1944年3月。



麦克阿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尼米兹上将在夏威夷，摄于1944年7月。



罗斯福、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身处夏威夷车队中。



麦克阿瑟涉水登陆莱特岛，摄于1944年10月。



收复菲律宾期间的麦克阿瑟。



琼和阿瑟四世在布里斯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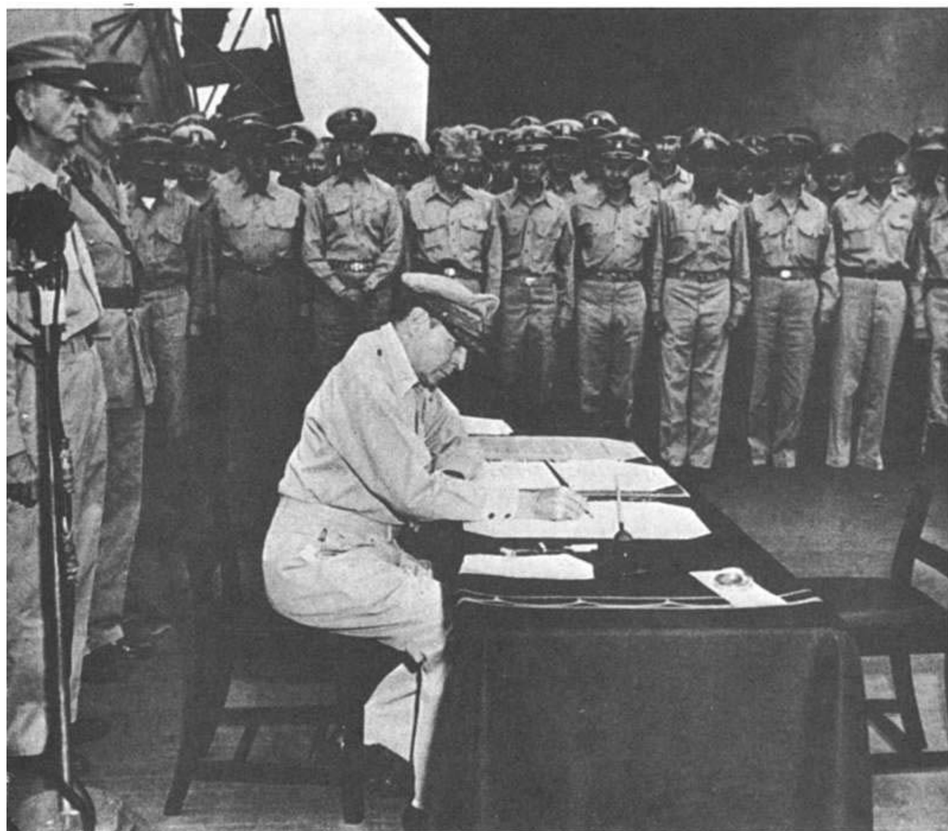
琼和阿瑟四世在布里斯班，摄于1944年圣诞节。



麦克阿瑟望着收复后的菲律宾。



麦克阿瑟登陆日本，摄于1945年8月30日。



麦克阿瑟于东京湾在日本投降文书上签字。



麦克阿瑟拥抱被释放的乔纳森·M. 温赖特。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在日本，摄于1946年5月。

日本人支持麦克阿瑟参选总统的愿望，摄于1948年。

另一处支持麦克阿瑟参选的指示牌。



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迎接哈里·S. 杜鲁门总统，摄于1950年10月。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交谈。



杜鲁门在威克岛上为麦克阿瑟再添一枚服役优异勋章。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乘车。



麦克阿瑟坐在自己的飞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号上向下凝视鸭绿江，摄于1950年11月。



麦克阿瑟在鸭绿江上空进行空中巡查。



麦克阿瑟和马修·B. 李奇微在朝鲜前线上巡视，摄于1951年1月。



麦克阿瑟到访朝鲜前线，摄于1951年2月。



麦克阿瑟在汉城，摄于1951年3月。



麦克阿瑟在杜鲁门总统解除他的职务后大步走向自己的飞机，摄于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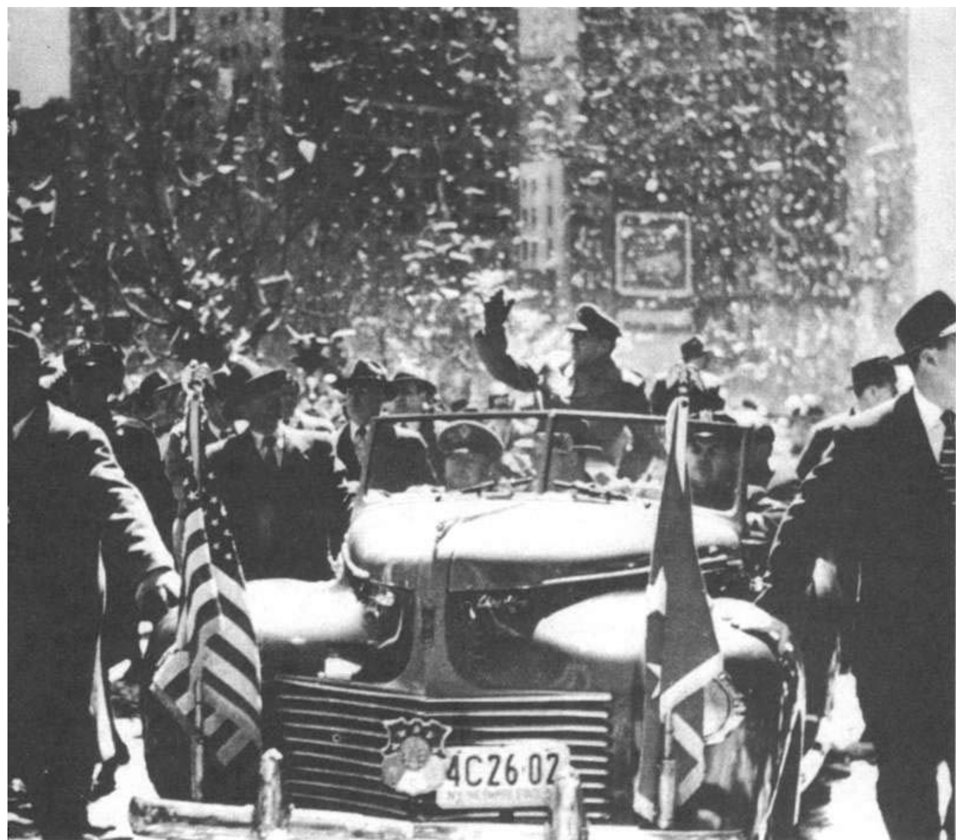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言，摄于1951年4月。



结束国会演说之后的麦克阿瑟、阿瑟四世和琼。



麦克阿瑟参加讨论自己被罢免问题的参议院听证会时拍摄的三张照片。



纽约为麦克阿瑟一家举行的抛彩带欢迎仪式。



麦克阿瑟在195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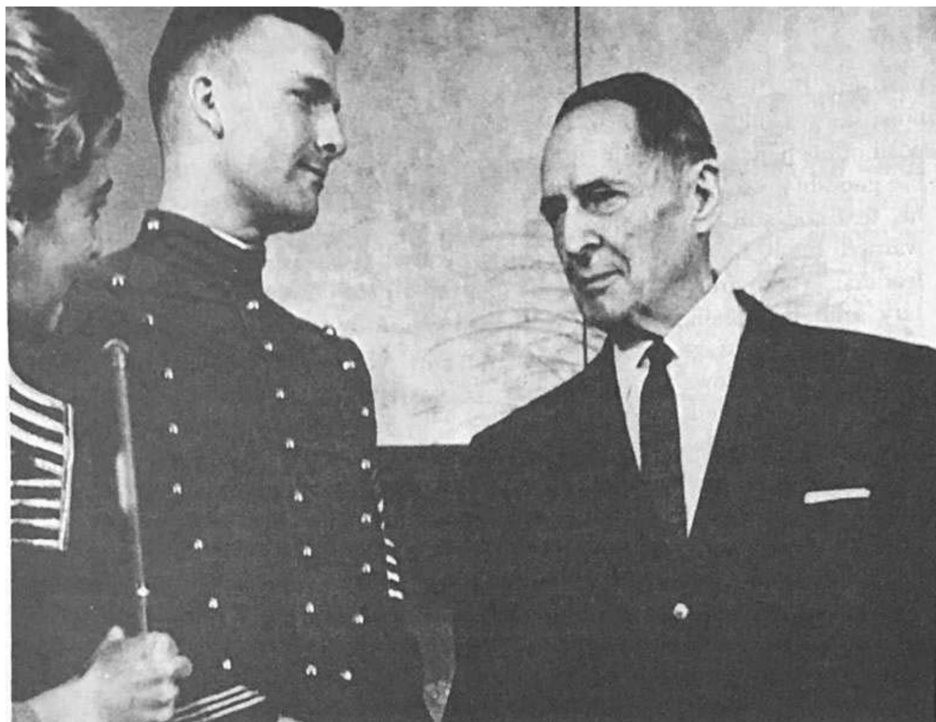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站在他为西点军校创作的诗句下面，摄于1957年。



麦克阿瑟踏上返回菲律宾的伤感之旅，回访马尼拉酒店，摄于1961年7月。



麦克阿瑟与约翰·F. 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摄于1961年。



麦克阿瑟与军校生科林·P. 凯利二世，摄于1963年1月。



林登·B. 约翰逊总统到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探望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在纽约出殡时的送葬队伍，摄于1964年4月。

第七章
身居高位
1944~1945



1944年秋，菲律宾居住着约1 816万菲律宾人，其中80%信奉天主教，另有40万日本士兵尊奉日本天皇，并一心想要在战场上光荣地为天皇牺牲。这两者彼此很少有什么交集。除了长期食物短缺和压制性政权的问题，没有敌军统治影响的生活已经在这条绵延几千英里的岛屿链上延续了近三年。渔民们依旧乘坐细长的手工独木舟出海，农民们依旧收获着糖料作物和稻谷——正如16世纪60年代以来西班牙人对这里的马来村庄实行殖民统治时一样。菲律宾妇女依旧趁着下午茶的时间没完没了地闲聊，她们的丈夫则坐在广场的长凳上充满男子气概地自吹自擂。像大船一样的科雷希多岛平静地漂在马尼拉湾灰石色的海水中。巴丹半岛上唯一预示着一丝生机的便是上空低垂着的云朵中不安的雷鸣。粗心的外来人可能会以为发生在这座岛屿上的激战已然结束，四下里只剩下一片蛰伏、怠惰而又冷漠的氛围。但将军的心里如明镜一般，深知热忱之情只需一星希望的火花便能被重新点燃。相比美国，他对菲律宾的认识反倒更加深入。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复杂个性的隐喻：引人注目、反复无常、英勇无畏、热情易怒、质朴无华。

尤其是质朴无华这一点。一句战前的妙语提到，群岛人民如同被禁锢在修道院中度过了三个世纪的时间，还有两代人是在好莱坞的影响下长大的，而城市之外，在装点着盈盈绿意和水田的贫民区里，当地人既不通西班牙语也不会英语，使用的是群岛8种原生态方言、80多种地方话，其中一些还掺杂着不少土语。在距离首都不远的山区里，勇猛的战士们打猎时依旧

会用到弓箭，猴群聚集在菩提树上低语，身形轻巧的菲律宾妇女头顶着草耙大步跨过水稻田。一片碎石之外，雨林、草甸高地、肥沃的峡谷和炎热的低地随处可见教堂的身影——一派如同《泰山》电影中的丛林景象：彩虹横亘在倾泻的瀑布激起的水雾中，蝴蝶花盛开在峡谷的峭壁上，台风不时席卷岸边植满棕榈树的海滩。这就是菲律宾的本质，在暴力的威胁下风景依旧美丽，在火山的喷涌下土地依旧绵延。这些全都没有改变，也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越来越多头戴圆顶钢盔、表情志得意满的日本士兵开始出现在城市里。不过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闪烁着银色光芒的帕西格河蜿蜒地穿过马尼拉，如今依然和麦克阿瑟一行人登上“唐埃斯特万”号嘎吱嘎吱地驶向布满机枪的科雷希多岛的那个绝望的平安夜一样平静。尽管顾客已经变了，可街角售卖水果和玉米的货摊上还闪烁着同样的煤油灯。空气中四处飘荡着同样的香气：干椰肉、杧果、辛辣的鸡肉和猪肉咖喱料理以及国花茉莉花的味道。架在高大车轮上的双轮小马车响着一样的锣声，狭窄曲折的小巷中也还是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拉丁乐曲声。将军曾经说，他总是认为菲律宾是个拉美国家。从许多角度来讲，这里自古以来就很像是一个从南美漂来的香蕉共和国。无论是宗教历史剧、公共仪式还是人们对于戏剧的热爱，以及马拉卡南宫里丰富的木版画、记叙英雄事迹的油画、厚地毯和巨型的洛可可式枝形吊灯，无不散发着浪漫的气息。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星期，宫殿里的枝形吊灯就被转移到了别处妥善保管，但曾经悬挂那些风情吊灯的高耸古旧天花板、老公务员毕恭毕敬恪守官僚主义复杂规制的态度（仿佛他们一部分人曾经效命过的西班牙殖民者并未离开似的）都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

在大部分被俘民众都无视新领主的同时，倒是存在着两个显眼的例外：游击队和通敌者。早在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沦陷之前，几派游击队员便开始在吕宋岛北部集结。截至1944年年底，超过18万菲律宾人都曾以某种方式参与过抵抗运动，其中1/6的抵抗力量隶属于路易斯·塔鲁克的抗日人民军——人称“虎克党”，军队中包括塔鲁克在内的许多人都是满怀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除了后来声名狼藉的虎克党，大部分地下组织的成员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于将军的信念。他们相信，他早晚会夺回群岛、重建菲律宾秩序，或至少让侵略者为偷走的每一头水牛付出代价。

战争初期，他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并不频繁。荷兰迪亚一役结束后，他们增强了与彼此的沟通，每个月互通的电报数一度接近4 000条。就连一只麻雀落在菲律宾都逃不过麦克阿瑟的耳目，从马拉卡南宫秘密行政会议的文字记录到马尼拉酒店的宾客名单，应有尽有。他会派潜水艇为游击队输送装备、技师、发报机、突击队，还会亲自与逃入自己

战线的游击队队员面谈。他们中的一部分领袖有的是战败后失散在菲律宾的美国人，有的是从比利比得、甲万那端、洛斯巴尼奥斯和圣托马斯大学集中营逃出来的美国人。不过，大部分游击队领袖还是菲律宾人，其成就不亚于法国抗德游击队队员。随着他们的胆量越来越大，技能也逐渐熟练起来；他们伪装成了码头工人、头顶红帽的摩洛族仆人或是背着活鸡和鱼干走村串户的商人。日本的秘密警察“宪兵”正在悬赏缉拿他们。一旦被擒，他们就会被扔进建于16世纪的马尼拉圣地亚哥堡地牢里，等候公开处斩。逃亡者向麦克阿瑟叙述了敌军的暴行。他发誓要血债血偿。菲律宾海岸瞭望员收到信号后，会用竹子做成的电报机把消息发往内陆。抵抗局势愈演愈烈。最终，3/4的省份都在力图摆脱敌人的控制。尽管这样的局面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日军仍旧把持着几大人口中心），但游击队队员们传递给南方的这些战略信息是无价的。他们提供情报的热情既表明了对美方的热忱，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两个男人的忠诚：麦克阿瑟和奎松。将军结束与罗斯福的夏威夷会议返回澳大利亚后的第二天，奎松便因肺结核在纽约州的萨拉纳克去世了。自此，麦克阿瑟便成了他们追随的唯一偶像。简单来说，在游击队队员们的心中，他就是美好战后世界的象征。无论美国大兵们如何嘲笑他，菲律宾士兵都不会对他不敬。卡洛斯·罗慕洛写道：“对我来说，他代表了美国。”

通敌者的情况稍显复杂，因为他们各自心怀鬼胎。有些人畏惧日军，有些人偏好东方而非西方统治者，有些人认为只有和侵略者合作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些人则是贪图个人利益的直白机会主义者。和游击队一样，他们早在麦克阿瑟还困居科雷希多岛时便已浮出水面。1942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本间雅晴任命奎松的前任秘书豪尔赫·巴尔加斯领导一批菲律宾政治家成立委员会，帮助他治理国家。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通过电报联络罗斯福，要求他中止群岛上的一切抵抗行动。这些人事后说，奎松曾经告诉过他们，麦克阿瑟承诺只要他们永远不指责美国或不对裕仁天皇宣誓效忠，便会允许他们与胜利者分享权力。将军否认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况且话中的含义也无关痛痒，因为他们终究还是做出了更加糟糕的选择。1943年9月，委员会被由何塞·劳雷尔领导的“菲律宾独立共和国”取代。作为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前任助理法官，何塞也是唯一一位拥有东京帝国大学荣誉学位的菲律宾人。第二年，拥护日本的劳雷尔政权对美国和英国宣战。大约5 000名菲律宾人报名加入了由日本人资助的右翼组织“菲律宾爱国者联盟”，日军还给他们发放了步枪，训练他们在美国人发起反攻时阻击冲击海滩的美军士兵。

联盟中的许多新成员都是上流社会成员的家庭用人。他们是在雇主的鼓励下应征加入该组织的。劳雷尔的傀儡政府对大部分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更别提“虎克党”之类支持土地改革的阵线组织了。令麦克阿瑟和奎松备感沮丧的是，这个政府的领导者全都是战前首都的寡头政治

精英——将军以前的朋友们和奎松的前同事们。从传统的角度来说，群岛政治一直都是贵族们的追求。在成功获得1941年共和国立法机构候选人身份的人中，有1/3当选了劳雷尔政府的众议员，3/4当选了参议员。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居外的地主、自立的富有运动员以及隶属于扶轮社、出入首都老西班牙高档赌场吃喝玩乐的有钱商人。他们居住在奢华的圣罗莎区高大的豪宅中，每家每户都拥有自己的泳池、供水系统、传统花园、全副武装的私人警察、高高的石墙甚至是护城河、用柚木和青铜制成的大门以及西班牙风格的窗栅。每天正午时分，他们还会打一局网球，周末则会打打马球。他们会带上顶着一头精致发型的美艳妻子参加各种高档聚会，任由她们花上几百比索购买只穿一两次就会被扔掉的礼服裙。身为贵族，他们总是养尊处优，此刻更是看不到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任何理由。日本人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在这里、这里和这里签上字，就不需要抛却自己拥有的一切。

麦克阿瑟火冒三丈，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等我们的军队登陆吕宋岛，”他宣布，“掘地三尺也要把每一个阻碍（美国）官员或士兵的行动、破坏自己祖国复兴事业的不忠菲律宾人给抓出来……他们的行为直接助长了敌人对抗美利坚合众国和菲律宾共和国的气焰。”华盛顿方面，罗斯福告诉记者“那些与敌人沆瀣一气的人必须被清除出当局，不得再被赋予影响力”，而内务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则要求起诉“胆小、怯懦、怀抱着机会主义心态下贱地和意图奴役人民的残忍敌人勾结的小人”。

当游击队队员们通过秘密电台听到这些坦率的陈词时，心中欣喜若狂，他们相信，反攻的美国人会惩罚傀儡政权的所有成员。然而他们推选出来的领袖奎松和奥斯梅尼亚并没有怀抱报复心理。他们同样属于马尼拉的精英社会，和巴尔加斯、劳雷尔等人一同长大，甚至与其他人是同窗和世交，有着血缘或姻亲的联系。在科雷希多岛上，罗慕洛回忆：“奎松因为我诋毁那些通敌的菲律宾人而痛斥了我一番。他说‘他们没有选择’。”在寄给麦克阿瑟的一封言辞激烈的书信中，这位菲律宾总统躺在病榻上写道，他的老朋友们既不是卖国贼也不是叛徒，只不过“实际上成了敌人的囚犯”。他说，他的前任司法部部长收到了一份“有条件的承诺”，只要“同意组织亲日的宣传活动，便会得到自由”。奎松据此申辩，其他人会同意通敌也不足为奇，他们都是“战争逆境的受害者，我相信他们别无选择”。继任成为流亡政府领袖的奥斯梅尼亚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他们在政府里留任和执政的动机，而不是他们通敌这个唯一的事实。”

这样的评论显然有些枯燥无味。事实上，奥斯梅尼亚就是这样一个乏味的人。他的个性（或者应该说是缺乏个性）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这一重要问题最终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反目。年轻时，他的沉默寡言为他赢得了“斯芬克斯”的绰号。在这个演说者的国度里，他让人昏昏欲睡；他给同

僚们留下的印象是“不装腔作势”“不过分自信”和“缺乏生气”——简而言之，正好与奎松相反。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当选也要归功于采取候选平衡政策的民族主义党，也就是那些如今对日本人卑躬屈膝的政治家。如果虎克党人能够得逞，财富能够得以重新分配，那么像奥斯梅尼亚这样的菲律宾上流社会人士就会被从公众生活中剔除。除此之外，麦克阿瑟也不喜欢他，因为他过于死板，对将军在20世纪30年代施行的菲律宾国防计划也颇有微词，还在战争爆发前夜投票反对军费开支。最糟糕的是，他还是罗斯福内阁中的乖戾之徒哈罗德·伊克斯的门徒。不过麦克阿瑟从未承认过伊克斯在菲律宾的权威。他事后轻蔑地写道：“伊克斯对待群岛问题就像对待他手下的国家公园一样。”这位内务部部长越是猛烈抨击那些通敌者，就越会引发将军重新审视他的姿态。后来，他写道：“伊克斯告诉我，有人向他通报了日据时期对美国效忠或不忠的人的名单。他将试图以叛国罪控告那些不忠的人。”麦克阿瑟回复，“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都算不上叛国罪”，因为他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男人“接受日本人组建的政府交予的责任”就被判有罪。

就在这时，考特尼·惠特尼加入了麦克阿瑟的总部。这位极端保守的马尼拉公司律师曾是“一战”飞行员，战争爆发时身在美国。重新披上军装的他被授予中校军衔，并首先被派驻在华盛顿。1943年春，萨瑟兰暗示麦克阿瑟，惠特尼可能是布里斯班的可用之才。将军派人把惠特尼请了过来，把菲律宾的民政事务交给了他。从游击队的角度来看，惠特尼的到来是个灾难性的选择。既没有外交策略又勇猛好斗的惠特尼喜欢用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所有菲律宾人——除了和他一样在群岛有着可观投资的人。职业军人无论如何都会倾向于保守派。等到麦克阿瑟准备好要在莱特岛登陆时，惠特尼已经将大部分人都策反成了反动主义者。应他的要求，将军将战略情报局阻拦在了西南太平洋战区之外（因为惠特尼怀疑他们会援助左翼游击队），还把罗伯特·舍伍德的自由主义宣传拒之门外。惠特尼并非是在对群岛的游击队队员们发号施令。这些都是他们的领袖自己做出的决定。但他能确保那些主张彻底消除菲律宾社会与经济改革的人都遭到挫败。日后，当美国在日本没有半点儿资本，而麦克阿瑟又有时间设计属于自己的民政方针时，将军的态度和主张就会出现180度的大转变。然而，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将军除了战争之外实在无暇顾及任何事情。除此之外，惠特尼也利用了将军的虚荣心。“惠特尼是个完美的马屁精。”另一位前任副官回忆道，“只要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将军就会照单全收。”

马尼拉方面，摇摆不定的政治万花筒吸引了那一代菲律宾人中最神奇、最高深莫测的人——曼努埃尔·罗哈斯·阿库纳全部的注意力。五十岁出头的罗哈斯身形瘦弱、性格阴沉，感情夸张，既是菲律宾建国过程中的关键元老级人物，又是菲律宾大学的董事，同时还是三家出版机构的所有者（其中一家是名为“马尼拉每日新闻”的小报）。不过，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

了公共生活。作为众议院议长和财政部部长，他于1941年11月当选候选参议员，成了菲律宾独立的有力支持者。在美国陆军的编制中，他还拥有准将的军衔。身为奎松的门徒，他一直备受奎松信任，奎松还期待他而非奥斯梅尼亚能够成为菲律宾下一任总统。奎松曾要求罗哈斯跟随他们一同流亡，却被准将拒绝了，而谁也不清楚他是否还会继续听候麦克阿瑟差遣。虽然将军事后承认罗哈斯曾为自己效命，但同时代的文献记录让人充满了疑惑。奎松在写到他时提道："罗哈斯回复我，他会完成我下达的一切命令，却发自心底地认为留在群岛才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似乎认为，就他的特殊情况而言，一个士兵离开自己的国家无异于擅离职守，尽管我和他都清楚我们只不过是在军事意义上失守了而已——因为继续寄希望于加强防守只能是徒劳，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所剩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但他还是坚持要留下。"

遵从奎松的吩咐，准将把埋藏在科雷希多岛水域附近的共和国黄金储备挖了出来。1942年3月5日，奎松签署了第3号紧急命令，其中提到若是自己和奥斯梅尼亚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途中丧命，则由准将接替总统一职。身处萨拉纳克的奎松在奄奄一息之际还曾多次向奥罗拉提起罗哈斯的名字，述说自己多么想念他。"但是，哦，"奎松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多么以他为傲呀！我几乎有些嫉妒他，因为他有机会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告诉日本人，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任何东西。如果罗哈斯遭人谋杀，那将会是菲律宾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最惨痛的损失。他是无法被替代的，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民族多久才能再出现另一个曼努埃尔·罗哈斯。"

罗哈斯并没有遭人谋杀，且无论他对日本人说了些什么，语气都算不上粗鲁。诚然，他被俘后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被囚禁在棉兰老岛布基农的一处战俘营中，接受了长达15个星期的审讯，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久，1942年8月18日，巴尔加斯告诉日本记者，自己和另一位通敌者贝尼尼奥·阿基诺说服本间释放了罗哈斯，因为他是个"有价值的人"。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意图将准将而非劳雷尔法官作为他们傀儡政府领袖的首选。罗哈斯称病拒绝了，说自己患上了冠心病。当时的文献记载对此也有些含混不清。游击队曾于1943年联络过他，表示愿意帮助他逃脱，但被他拒绝了——他要么是认为这个计划不太安全，要么就是认为这样做对敌方不太友好，事实已经很难探究清楚了。他开始出现在马拉卡南宫，签署文件。那年秋天，美国潜艇"长尾鲨号"搭载着奎松的军医埃米吉迪奥·克鲁兹上校在菲律宾登陆。他此行的任务是评估菲律宾地下党的力量。罗哈斯在勒班陀大街893号接见了他，并没有将他的行踪透露出去。尽管如此，罗哈斯还是不肯逃往美国。据克鲁兹医生报告："罗哈斯说他十分感谢奎松总统对他的高度重视，但拒绝即刻动身前往华盛顿，因为他还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他是唯一一位能够为地下党提供建议和劝慰他们不要显露出对日本人心怀深仇大恨的人。"

第二年，又有人找到了罗哈斯。趁他还没有回应之前，消息就被泄露给了日本人。所有参与这次密谋的人全都遭到了斩首，只有他幸免于难。这要么是因为他正是泄密的来源，要么就是有劳雷尔从中调停求情，或是他承诺要与日方合作。结果他接受了巴尔加斯和劳雷尔手下的几个位高权重的职位，成了未在合作内阁中挂职的部长。埃尔南多·J. 阿瓦亚在研究1942～1944年的菲律宾国情时总结道，罗哈斯成了“傀儡劳雷尔最亲近的顾问和同事”。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毫无疑问的是，他肩负的压力是巨大的，而那些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应该慢些对他品头论足。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无疑是在利用他的威望和公众影响力。早在1943年10月14日，他就辅助起草了傀儡政府的宪法，还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和其他签署者一起站在了日本摄像师的镜头前。尔后，作为经济规划部的部长和大米物资采购部门的领导，他又成了该政权的食品界“沙皇”。

在麦克阿瑟的军队朝着群岛进发时，关系这一政权命运的许多事情显然都和这个男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成为独立共和国的菲律宾出现了两位突出的总统候选人：奥斯梅尼亚和罗哈斯。然而一切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一位有权有势的通敌者能够获得免罪，那么加在其他人身上的罪名也就无法成立。面对这样的局面，许多愤怒的游击队队员（尤其是3 000名“虎克党”成员）肯定会返回自己建在雨林中并藏匿着大量武器的基地。软弱无能的奥斯梅尼亚连自己的口粮都要依赖美国军需官，就更别提在战争结束时为自己的人民做些什么实事了。一切都有赖于麦克阿瑟。尽管曼努埃尔·罗哈斯是他20年的老朋友，但将军除了惠特尼之外不愿和任何人商讨菲律宾的未来。鉴于惠特尼在菲律宾拥有大量投资，他本应不具备参与商讨上述事宜的资格。每当罗哈斯的名字出现在其他的对话中时，麦克阿瑟总是会转换话题。

在地图上，莱特岛像极了一颗根部朝下的臼齿，其南部是面积和爱尔兰相近的棉兰老岛，北部则是和英格兰面积不相上下的吕宋岛。其间星罗棋布的小岛使得中部群岛的主要锚地莱特湾只剩下了两个主要的入口：西南边的苏里高海峡和西北边的圣贝纳迪诺海峡。这片热带海域即将成为历史上最壮观的海战战场，因为此刻的日军已经陷入了孤注一掷的状态。他们深知，如果自己无法阻止麦克阿瑟夺回菲律宾群岛，就再也无法获取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而这样的结局无异于切断了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将领的命脉。

日军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大日本帝国在东京总部策划了一个名为“胜利行动”的计划，试图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将军在群岛上立足。战后，丰田副武大将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会丧失整支舰队，但我感觉我们不得不冒这个险……如果我们在菲律宾行动中战败，即便舰队得以逃脱，通往南部海域的大洋航线也会被完全切

断。就算是舰队想要返回日本海域，也无法获得燃料补给。若是舰队留在南部海域，也无法收到弹药和武器补给。以痛失菲律宾为代价挽救舰队是没有意义的。”东京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宫崎周一中将告诉战后审问者：“从政治和行动策略的角度来看，守住菲律宾是唯一必不可少的目标……失去菲律宾将大大影响日本国民的斗志。群岛是日军阻挡敌人前进的必要阵地。”

丰田、宫崎和日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陆军元帅寺内寿一伯爵猜测棉兰老岛将是麦克阿瑟的下一个目标，但还是加强了整个群岛的戍守力量。当时，全体日军的斗志是很难估量的。士兵们个个都是言听计从，相信他们的旭日旗仍旧占据着太平洋的天空，同盟国终将投降。虽然个别指挥官被麦克阿瑟在过去两年中战无不胜的战绩所挫败，但最高等级的军官们仍旧满怀希望，甚至可以说是情绪高涨。当他们听说拥有700艘舰船、绵延百英里有余的美国无敌舰队正冒着蒸汽朝着迪纳加特岛和霍蒙洪岛之间的苏里高海峡挺进时，他们满心洋溢着自信。驻守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的第35军团指挥官铃木宗作中将告诉自己的下属：“我们甚至不需要他们给我们派来的‘援兵’。”铃木说他唯一的担忧就在于美军领袖有可能只会试图让参与此次行动的部队投降：“我们必须要求麦克阿瑟的所有军队全部投降，包括新几内亚以及莱特岛等地的军队。”在东京，小矶国昭首相听信了本国陆海军将领的话，以为麦克阿瑟此刻的境遇比他当年在科雷希多岛时还要糟糕，于是通过广播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全国人民。他说，莱特岛战役将成为日军自1582年山崎之战以来的最大胜利。

然而这一行径给日本人自己招来了麻烦：日军指挥官也开始听信本国的宣传。随着他们对胜利的需求日益增长，他们重新确立了夸大美军损失、将自己的损失最小化的宣传策略。不可避免的是，对于利好消息的渴望逐渐下降：急切地想要讨好上司的中级军官们开始扭曲自己与敌军交战的过程。当麦克阿瑟的大型舰队在马努斯和荷兰迪亚集结时（光是舰船上的水手就有5万人），美军的任务小组正潜行于海上，派出大批海军飞机攻打日军基地。台湾岛是美国海军飞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日本海军中将福留繁试图在那里伏击美军。他手下的飞行员资历尚浅，但各个都矜夸自大。在他们的零式战斗机升空向美军发起挑战、冲进美军战斗机编队时，福留中将看到几团燃烧着的火光坠入海中。他拍着手得意地大笑起来，直到一位副官把坏消息传到他的耳边——原来坠入大海的是自己的战斗机。共有312架日军战机在此次战役中坠毁。福留的心沉了下去。据随后着陆的日军幸存飞行员报告，他们共击沉了11艘美军航母、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或轻型巡洋舰。福留中将立即发布了一封战报，把所有数据全都囊括在其中。裕仁天皇据此宣布那一天为公众假日，并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内举行了庆祝活动。实际上，美军根本就没有损失一艘舰艇。哈尔西通过电报通知尼米兹：第3舰队被击沉和受损的舰船已被打捞起来，

正高速从敌军阵前撤退。

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来源于刚刚走马上任的菲律宾防御总指挥官——传说中在开战时便战功赫赫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由于嫉妒他的声望，东条曾将他贬到不太重要的岗位上。不过随着东条的下台，小矶首相需要寻找一个能让国人信赖的军人进驻马尼拉。山下似乎正是这一岗位的合适人选，将他任命为麦克阿瑟的对手意味着两位天赋异禀、位高权重的将军正式处在了势不两立的位置上。然而，正如麦克阿瑟三年前的处境一样，这位日军指挥官也深深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他坚信福留那荒谬可笑的战报，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即将领导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灵活机敏的部队，相信自己的上司会允许他按照自己的希望来作战。除此之外，他还以为自己有的是时间。然而上述几点全都是虚妄之言。美国海军依旧势不可当，而驻菲日军却日益变得肥胖软弱；寺内元帅拒绝了山下在吕宋岛等候美军来犯的请求。就在山下到达马尼拉10天之后，大战便打响了。他的参谋长武藤章也曾遭东条排挤，被安置在一条不太活跃的战线上，此次直到第一波入侵的美军登陆时才迟迟从苏门答腊岛赶到。武藤的身上没有携带一件行李，身上的军装泥泞不堪；在从克拉克机场前往马尼拉市内的路上，他还不得不趴进污水沟里躲避美军战斗机的扫射。山下把最新的战况全都告诉了他。“很有趣。”武藤回答，身上的污水滴落在马拉卡南宫的地毯上，“可是莱特岛在哪里？”

当时的莱特岛由两支装备先进枪炮的美军舰队守护：哈尔西的第3舰队和汤姆·金凯德的第7舰队。金凯德是麦克阿瑟的部下，但哈尔西（他的舰队速度更快、装备也更强）则听命于身处火奴鲁鲁的尼米兹。指挥权的分散困扰着麦克阿瑟。他不止一次地催促联席参谋长们委派一位总司令，甚至表示如果是局势所需，他愿意做出让步。然而参谋长们并不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是对的。无论如何，将一位正在参与总统竞选的国民偶像排挤在一旁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别是在他隶属于在野党时。乔治·马歇尔是不会同意让一位海军上将担任最高指挥官的，因而这一充满缺陷的统领结构也只得被保留下来。眼下，它将引领同盟国的太平洋战局走向灾难的边缘。

1944年10月16日星期一，麦克阿瑟率领部下登上了“纳什维尔”号巡洋舰，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航行。他的斗志十分昂扬，他提醒自己的部下，仅仅一年之前，他们还被困在潮湿、肮脏、闷热的新几内亚沼泽中，距离最近的菲律宾人足有1 500英里远。如今，他和他的“3K党”（肯尼、克鲁格和金凯德）正在加足马力、全力以赴。他将20万名老兵分成了两支部队——克鲁格率领的第6军团和艾克尔伯格的第8军团，并完善了在他心中堪称最佳的一个战斗计划。战后，文森特·希安对此表示了赞同：“麦克阿瑟

在战争末期的几次行动……都十分大胆，比身处欧洲战场的巴顿将军的计划更加无畏、复杂，因为麦克阿瑟不仅调用了步兵，还发动空军和海军发起了一系列重击和猛扑的行动，采用迂回战术从侧翼包围了驻守在整个群岛上的日军。我相信，他从荷兰迪亚跃进至莱特岛的行动在战略概念和战术执行方面应该是整个'二战'中最出色的。"

麦克阿瑟趁庞大的护航队向西北方曲折行进时告诉"纳什维尔"号上的军官们，占据米沙鄢群岛将把他们置于"群岛霸主的位置"。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打造了一句精彩的混合隐喻："莱特岛既是我意欲用来把菲律宾中部的日军打到苦苦求饶的铁砧，又是我进一步进攻吕宋岛、对敌人发起最后一击的跳板。"他知道自己的声誉和属下们的生命一样岌岌可危。肯尼指出了计划中一个明显的缺陷——在夺取日军的飞机跑道之前，他们将不得不在超越战斗机航程的500英里范围内与敌人作战。肯尼回忆："将军停止在地板上踱步，脱口而出，'我告诉过你了，我今年秋天就要反攻回去，即便我只能划着独木舟过去，你也要驾驶你的那些B–17轰炸机来掩护我。'"

10月19日星期四的夜晚，在"纳什维尔"号的军官室里，麦克阿瑟和他的部下正在为明天的登陆行动做最后一刻的准备。他在父亲留下的大口径短筒手枪里装满了子弹，把它塞进了裤子后口袋里，以防自己被敌人生擒。他下令所有军官都必须戴上钢盔、按照惯例服下阿的平（米帕林）药片，防止感染疟疾。他照例没有执行自己的命令。尽管时机对于这一次的突击行动格外重要，他也没有戴上腕表。他很少戴表，因为周围总是有人能够告诉他时间。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致辞，打算在沙滩上宣读给陆军通信兵部队听，并借助广播通报所有菲律宾人。过后，某些世故的美国人会嘲笑他的这番致辞过于自恋、渎神、粗野、品位低下。事实上，他在致辞中提到"我"这个字眼的次数还不及艾森豪威尔在对欧的"诺曼底登陆日"演讲中提到的频繁。肯尼支持他的论调："这些话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而是说给菲律宾人听的。况且他们真的很喜欢其中的内容……结果立竿见影。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打来要求提供帮助或等候指令的电话……对于一个情绪化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情绪化的呼唤。"

将军本人对此也心存疑虑，于是在军官室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提出批评意见。埃格伯格医生针对"返回菲律宾的小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一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你不能那么说。"麦克阿瑟问道："有什么问题吗？"医生回答："这话招人讨厌，只是些陈词滥调。"埃格伯格回忆，将军"露出了一丝防备的表情，然后把那句话划掉了"。另有两位副官告诉他，这篇只有三个自然段的演讲中穿插了太多的基督教教义。麦克阿瑟愤怒地踩着甲板，然后停在他们面前，朝着他们的脸摇起了一根手指。他说："小伙子们，我想让你们知道，当我提到神祇，心里是带着最崇高的敬意的。"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不打算用这三段了。"

麦克阿瑟的心情很激动。1903年的同一天，身为少尉的他正要到这附近一个名为塔克洛班市的地方报到。如今，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拉开帷幕的前夜，他则在巡洋舰的舰桥上踱步。第一片映入他眼帘的陆地是苏禄岛。1521年3月16日，费迪南·麦哲伦发现群岛时第一眼看到的也是这座岛屿。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 我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到来之前赶到了莱特岛。脚下幽暗的海水和头顶深邃的夜空仿佛合谋好了要用一个隐形的斗篷把我们包裹在其中，好让我们静静待在那里等着黎明的到来……不时会有幽灵般的小船静静地从我们身边滑过，若隐若现地钻进夜色中，在我们看清它的轮廓之前便消失在了前方的阴暗处。我知道每一条船上都有一群紧张地挨着栏杆或在甲板上踱步的人。他们的目光都望向了黑暗之中，猜测着黎明到来之际那片夜色中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身处这样的时刻，所有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无论他是上将还是水手、将军还是列兵。几乎每条船上都能见到人们挤在会议室里围着地图的画面。步兵们紧张地检视着自己的步枪，船员们测试着船上的传动装置；有人在最后关头写着书信，而那些身负特殊任务的人则在试图重温他们的目标……当晚晚些时候，我回到自己的客舱里，重读了一遍那些（引用了《圣经》的）致辞……我总是能够从中得到启迪和希望。我祈祷仁慈的上帝能够在清早到来之际保佑这里的每一个人。

破晓时分，美国战舰朝着滩头发起了炮火攻击。将军屹立在舰桥上。隔着袅袅升起的薄雾和黄色的炮烟，很难看清沙滩上的情形；在内陆，白磷炸弹轰炸着山麓上枝繁叶茂的矮树丛。旭日的光芒很快照亮了海湾里平静的绿色海水。“然后，”麦克阿瑟写道，“就在太阳清晰地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塔克洛班市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和41年前我离开西点军校、前来执行第一个任务时相比，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圆满了。”

鉴于“登陆日（D–Day）”的名称早已在4个月以前被艾森豪威尔用在了诺曼底登陆行动中，这个星期五被称为“突击日（A–Day）”。麦克阿瑟望着希金斯登陆艇快速地穿过水域、朝着塔克洛班市脚下那片被标注为红色和白色的海滩冲了过去——其他满载美军士兵的小型船只正在杜拉格附近那片被标注为紫色和黄色的海滩上登陆。他抬头扫视了一遍天空，追随着敌机的踪迹。敌机的数量比他预料中的还要多。哈尔西收到了错误的信息，敌军的实力远不是上将以为的那样薄弱。帝国总部一直都在刻意隐瞒自己的实力，直到麦克阿瑟自己送上门来。更令人感到惊恐的是，肯尼在那一天还未结束时便发现，由于岛上的土壤不够稳固，雨季中的跑道是不能使用的——而开战时雨季恰好刚刚开始。因此，美军在即将到来的大部分交战过程中所能提供的空中支援仅限于舰载飞机。

在客舱里早早用过午餐之后，将军新换了一套卡其军装，戴着墨镜和那顶无法模仿的帽子再一次出现在了甲板上。他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看着俯冲的敌机在头顶上急速驶过；随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沙滩的方向，看着那里的沙岬、棕榈树、茂密的矮树丛和茅草顶的小房子随着炸弹的烟雾和高高腾起的黑烟变得模糊起来。金凯德给他发送了一个闪光信号。“欢迎来到我们的城市。”麦克阿瑟朝着萨瑟兰转过身来，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欢欣地说道，“正如里普利所说的那样，信不信由你，我们到了。”一位副官回忆道：“他就像个第一次参加派对的孩子一样兴奋。”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记述道，自己随着第三波突击部队上了岸。事实上，他直到开战4个小时之后才走下了通往驳船的梯子；他的部下和战地记者们跟随着他登上了驳船，途中又在运输船“约翰·兰德”号那里停留了一下，接上了奥斯梅尼亚和罗慕洛。罗慕洛仓促爬上驳船之后，将军尖叫着拥抱了他：“卡洛斯，我的孩子！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奥斯梅尼亚登上驳船的速度稍显缓慢，心情也没有那么雀跃。伊克斯曾经警告过他不要返回到麦克阿瑟的阴影中。菲美双重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困难重重。在军事管制的情况下，这样的局面令奥斯梅尼亚备感沮丧，也会导致他的人民揭竿而起。尽管他们选举出来的总统已过世，人们仍旧感觉奎松就是这个国家的代表。许多菲律宾人都将这个继任者视为篡权夺位的人。正如戴维·J. 斯坦伯格所总结的那样：“奥斯梅尼亚最大的困境在于他既不能与人民心目中缅怀的英雄奎松相媲美，也不能与被大家当作神来崇拜的活偶像麦克阿瑟相抗衡。”但奥斯梅尼亚已经做出了承诺，在不久之前到访沃姆斯普林斯时，罗斯福总统曾要求他跟随第一批军队出征，他这才不情愿地答应。

然而刚一登上驳船、驶向“红滩”，奥斯梅尼亚便把一切都抛在了脑后，心中燃起了和其他人一样高涨的期待之情。那些手里举着地图的人正集中精神研读着，一边为自己寻找方向，一边大声咆哮着说美军逆袭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群岛。不久，在距离海岸50码的地方，他们意外地搁浅了。麦克阿瑟本以为驳船会停靠在某个码头上，好让自己能够威风凛凛地登上海岸，身上没有一丝的污点和水渍。不过大部分的码头都已在海军的轰炸中被摧毁，而担任登陆指挥官的海军军官根本就来不及为他们指出几座幸存下来的码头在什么方向。和所有的登陆指挥官一样，将军像个船长一样拥有自主权。当他吼道“让他们走着上岸”时，他们别无选择。急不可耐、火冒三丈的将军等不及埃格伯格为他测试水深，使命令驳船放下跳板，在齐膝深的海水中迈开了步子。在水中走了40步之后，他踏上了海滩，弄坏了裤子上原本整齐的折痕。一位新闻摄影师拍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麦克阿瑟脸上被许多读者解读为决心坚毅的怒容，实际上是他在怒瞪着那位鲁莽的海军军官时露出的表情。不过，当麦克阿瑟看到刊印在报纸上的这张照片时，一下子就理解了其中的戏剧化价值。第二天，他又在第1骑兵师登陆“白滩”时故意在摄影师面前涉水上岸。到那时为止，已清除日军狙击手

的海滩十分安全，因而他是在骑兵们的注视下登陆的。隔天，当他们看到昨日拍摄的那张照片时，纷纷咒骂这是一张摆拍出来的冒牌货，让这则逸事为他的反英雄式传奇又添上了一笔。

第一天下午，“红滩”还藏匿着许多日本狙击手。他们将自己捆绑在树上或是所谓的“章鱼陷阱”——日本的散兵坑之中。将军戴着带有饰带镶缀的帽子，不时停下脚步、重新点燃自己的玉米烟斗，一度成了敌人枪口下显著的目标。一颗南部式子弹射了过来，他连躲都没有躲。就在将军四处闲逛，检视4艘受损的登陆艇并寻找第24师的战地指挥所时，肯尼听到他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这就是我梦里的画面。”肯尼倒是觉得这更像是一场噩梦，他能够听到敌军士兵的讥讽，操着太平洋步兵和海军士兵再熟悉不过的蹩脚英语：“投降吧！你们是无法抵抗的！”以及“你的机关枪今天感觉怎么样？”和“让罗斯福去吃大便吧！”肯尼还听到一个美国士兵在一颗椰子树的树干后面猛吸了一口气：“嘿，那是麦克阿瑟将军！”旁边的士兵连头都没有转过来，慢吞吞地答道：“哦，是吗？我猜他旁边还跟着埃莉诺·罗斯福吧？”显而易见，敌军士兵的评论应该比这更加难以想象。战后山下将军提到，尽管例证如山，他还是不相信麦克阿瑟真的在美军逆袭的第一天就随船上了岸。他说，这个消息若是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定会派遣一支自杀小分队到沙滩上去暗杀麦克阿瑟。即便是事后看到将军涉水前行的照片，山下也不愿相信，反倒认为这肯定是在澳大利亚摆拍出来的。

将军朝着罗慕洛转过身来，握着他的手使劲地摇着，再一次开口说道：“卡洛斯，我们回家了！”听到内陆传来的沉重炮火声，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大步走去，愉快地询问隶属于第24师的一支目瞪口呆的火力小组：“你们是怎么找到日本人的？”看到几具还温热的日本士兵尸体，他伸出一只湿漉漉的脚把他们踢到了一旁，仔细看了看他们身上的徽章。据罗慕洛回忆，他心满意足地说了一句：“第16师。他们就是在巴丹半岛上为非作歹的那一帮人。”[注]紧接着，看到被挂在最高的两棵椰子树上以避免海军轰炸的两面旗帜，他的脸上更是露出了享受的神情。其中一面旗帜是星条旗，另一面则是由“约翰·兰德”号上的一位缝帆员在前一夜赶制出来的菲律宾国旗。看着它们在散兵坑上方飘扬，麦克阿瑟开口对罗慕洛说：“国会赋予了你政治上的平等，却没有法律能够赋予你社会的公平。这是你从巴丹半岛上赢得的。”返回岸边，他坐在一段椰子树树干上，紧挨着4艘千疮百孔的希金斯登陆艇，背靠着海浪。一位紧张的中尉指了指附近的一个洞穴说道：“长官，那里有狙击手。”将军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仍旧继续紧盯着莱特岛原野的入口处。不久，狙击手被击毙了；奥斯梅尼亚也坐在了他身旁，两人分坐在树干的两端，就像教育家马克·霍普金斯和他传说中的学生一样彼此交换着意见。奥斯梅尼亚离开后，麦克阿瑟

草草地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

“这张便条——”他开始写道，“是我在塔克洛班市附近刚刚登陆的沙滩上写的。这将是从自由后的菲律宾写来的第一封信。我猜你可能会想把它纳入自己的收藏。我希望它能够被寄到你的手中。行动很顺利，一旦成功，将能从战略和战术上把敌人的军队一分为二。”从战略上来说，他解释道，夺回菲律宾将“切断敌人从日本本岛一直延伸到新加坡的防御战线”。从战术上来说，日军“在菲律宾的部队将被一分为二”，而“通过绕过菲律宾南部，将有可能为美军减少5万伤亡”。他预测，即刻承诺菲律宾独立“将把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声望推向历史最高点”。“在治国的新阶段”，将军敦促总统“亲自主持这一伟大的仪式”，这一步将“震惊世界，回馈美国足以受益千年的无尽声望与荣誉”。麦克阿瑟总结道：“请原谅我此刻潦草的字迹。我正身处战线，手头除了留言簿之外没有任何的工具。”

一封由总统写给将军的电文早已开始在“纳什维尔”号上进行破译：“你的国家感谢你，并祈祷你和你的士兵能在逆袭中获得成功。”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指挥全球的重任和再次参加竞选的种种宣传活动使得罗斯福无暇通过广播向菲律宾人民致辞，所以一提到解放，人们的脑海里即将浮现的第一个鲜活的画面就是将军在“纳什维尔”号上起草并准备宣读的这份两分钟的致辞。这并非是什么良辰吉日。移动通信卡车抛锚了。没有人确信这一切是否能够奏效。随着美国士兵们在内陆呈扇形散开，背景里充斥着步枪射击和海军大炮雷鸣般的响声。就在麦克阿瑟清了清嗓子、抓过麦克风时，一阵不祥的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仿佛是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一切。

“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将军说道。他的双手在颤抖，不得不暂停下来，好平复自己声音中的波澜。他继续说道：“承蒙全能上帝的恩赐，我们的部队再一次站上了菲律宾的国土——这片被我们两国士兵的鲜血染红的土地……我的身旁是你们的总统，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伟大的爱国者曼努埃尔·奎松的杰出继任者……因此，你们的政府正式重新建立在了菲律宾的国土上。属于你们的救赎时刻已经到来……向我集合吧。跟随着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上那些不屈不挠的灵魂。让向前推进的战线将你们囊括其中，站起来与敌人战斗吧。利用每一次有利的时机战斗！为了你们的故乡和家园，战斗！为了你们子女的未来，战斗！为了神圣的逝者，战斗！让每一颗心都坚强起来，用每一把武器武装自己。英明的上帝会为我们指明方向。以他的名义、跟随他朝着正义的胜利圣杯前进。”

紧接着，奥斯梅尼亚和罗慕洛对着手持麦克风也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一个小小的仪式过后，自从金凯德开始轰炸行动以来便被困在这里的一小拨菲律宾人发出了一阵欢呼声。一位老人跛着脚走到麦克阿瑟面前，露出了没有牙齿的笑容，开口说道：“下午好，陆军元帅阁下。很高兴见到你。这么多年过去了——好久，好久。”拥抱过这位老人之后，将军返回“纳什维

尔”号指挥其他海滩上的进攻行动，呼吁游击队当晚在莱特岛上全面起义，还通过密电指引他们到哪里等待空投的崭新枪支、弹药和医疗用品。

那一晚麦克阿瑟睡得很香甜，丝毫没有理会在东京电台广播中提到的日本空军怀疑他根本就没有登上那艘巡洋舰并扬言那艘船将无法离开菲律宾海域的事情——即便山下并不是这么想的。事实上，敌军的空袭力度正在增强。第二天早上8点30分至9点15分之间，从吕宋岛飞来的50架日本战斗机袭击了莱特湾内停泊的船只。艾克尔伯格在家书中写道：“知道麦克阿瑟乘坐的是哪一种船之后，日军的确通过自杀式袭击的方式撞向同型的船。”肯尼注意到：“停泊在莱特湾内的船只正好处于吕宋岛敌军机场的袭击范围之内。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天空中日夜可见日军的飞机……我越发觉得水手的生活不适合我，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中。我将很愿意把自己在‘纳什维尔’号上舒适的休息场所换成岸边棕榈树下的一个帐篷，哪怕随身只携带罐装口粮。”他对麦克阿瑟也是这么说的。将军咯咯地笑了起来。当肯尼追问他多快能够把自己的总部移上岸时，将军再度笑了起来。肯尼告诉他，自己是认真的。麦克阿瑟回答，只要房子一建好，他们就立刻上岸驻扎。肯尼写道：“我决定一上岸就亲自动手，加快工程的进度。”麦克阿瑟建议肯尼把注意力集中到尽快建成跑道的任务上来，他们需要空中掩护，因为在岸上的总部建成之前，他们只能通过驳船往来于陆海之间，每天视察一支不同的部队。他们第一次视察的对象就是杜拉格附近的第1骑兵师。

到达杜拉格之后，他们发现当地的局势一片混乱。第1骑兵师的骑兵们前一天趁着薄暮挖掘了一条防御阵地，掘壕固守，让迫击炮和机关枪形成交织的固定火力，以防敌人夜袭。日本人并没有出现，涌上防线的反而是一群又一群欢呼喜悦的菲律宾人。《纽约客》杂志的罗伯特·沙普兰看到一位满脸都是深深皱纹的菲律宾老妇人。只见她站在那里，敞开双臂，嘴角挂着狂喜的笑容，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一个紧紧攥着小包的8岁女孩告诉罗慕洛，她叫格洛丽·格丁卡，还说自己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麦克阿瑟，除了他之外谁也不能代替收下。罗慕洛把她带到了将军面前。将军打开包裹之后发现里面摆放着送给他的雪茄烟和送给琼的一个编织手包。早在几个星期以前，麦克阿瑟还满心嫉妒地读到比利时人民送了蒙哥马利元帅一柄镶着宝石的剑。此刻，他眼眶含泪地开口说道：“卡洛斯，我宁可接受这份礼物，也不稀罕蒙哥马利的宝剑。”

肯尼打算视察附近的一座日军老机场，而麦克阿瑟决定和他一同前往。肯尼事后回忆：“当我发现机场西端被日军当成了练靶场，只有另一端被我军占领时，我的热情冷却了下来。不过，麦克阿瑟将军却决定不管怎样都要过去一趟，所以我就跟去了。我们不得不在路上停了几次，一次是等待距离地面75码高的树干上的日本狙击手被击落才上路，另一次则是等了20

分钟才解决掉一辆朝着我们开来的日军坦克，绕过熊熊燃烧的机甲，我们继续朝机场方向驶去。”一到目的地，麦克阿瑟便在跑道上来回踱起步来，询问肯尼怎样才能将机场重新利用起来。敌人的子弹呼啸着穿过他们的身旁。肯尼事后回忆：“我告诉他我想要等情况更好些时再看，一次性视察完所有的设施。我还补充说，此刻从飞机上视察这个地方可能会感觉更好一些。麦克阿瑟笑着说，让我见识一下‘另外半个世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还真不错。”

回到海滩，他们听说自己的部队很快就能完全占领塔克洛班市了。将军迅速赶到了那里，并把自己的指挥所安置在了位于圣厄尔尼诺街和罗穆亚尔德斯街交会处的一座灰泥混凝土两层小楼里。这里原属于一位名叫沃尔特·普赖斯的美国商人，楼主目前正被关押在吕宋岛的圣托马斯监狱里，他的菲律宾妻子遭到了日本人的蹂躏，现在搬去了雨林之中。罗慕洛找到了她和她的孩子们，但“若是美军需要征用她们的房子，她们就先不搬回自己美丽的家”。

将军刚把自己的帽子挂好，东京广播电台便传出了这样的消息：“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部下以及肯尼将军已在市中心的普赖斯宅邸建立了自己的总部。我们的飞行员很快就会前去特别关照一下的。”肯尼已经开始怀念被敌人围困的“纳什维尔”号了，而其他部下也建议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将军并没有理会他们。这座楼是塔克洛班市最宽敞的建筑——曾被日本人用作军官俱乐部。他说，等到“帕特”·凯西的工程兵们把房屋修补一新，这里就将成为最完美的总部地点。他特别喜欢宽敞的走廊。当他在上面来回跨着大步、测试着地板时，突然停下来指了指庭院问道：“门廊边的那堆土是干什么用的？”一位部下解释道，那是一座精心布置的防空洞，位于地下20英尺处，里面铺设着地毯和沙发床，还通着电并安装了换气扇。将军回答：“找点儿东西把它填平。它把草坪的景致都毁掉了。”

鉴于麦克阿瑟已经在莱特岛安顿下来，而兵力超过20万的克鲁格第6集团军也跟着涌上了岸，日本海军也开始采取大规模的行动。通过截获将军登陆两天之前一名美军指挥官发出的未加密电报，敌军掌握了同盟国218艘战舰部署的关键信息。盘踞台湾的丰田大将制订出了一项绝妙的计划。他安排栗田健男中将率领其主力舰队（由7艘战列舰、13艘重型巡洋舰和3艘轻型巡洋舰率领）加速从新加坡向北进军。根据上级指示，栗田把舰队一分为二，由西村祥治中将率领较小的一支舰队经苏里高海峡进入莱特湾，而栗田亲自率领大部队乘风破浪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双方的火力将会合在麦克阿瑟的运兵船和金凯德过时的军舰上。万岁！

哈尔西第3舰队的支柱第34特遣队正包围着圣贝纳迪诺海峡。为了引开

他，另一支由4艘超龄航母和2艘改装航母组成的小型舰队从日本本岛赶了过来。这支舰队的指挥官小泽治三郎中将的任务就是引诱第34特遣队远离莱特湾。实际上，小泽的舰船并不适合扮演诱饵的角色，他只有不到100架飞机，且飞行员也缺乏经验。不过美方对此并不知情，面对丰田的宏伟计划，他们极易上钩。天赋异禀却冲动鲁莽的哈尔西并不喜欢自己的待命角色，而是更想在公海上与敌舰正面交锋，何况他也接受了随时反击的全权委托。早在他掩护海军陆战队登陆塞班岛时，雷蒙德·A. 斯普鲁恩斯中将就曾因为他们放弃了追逐附近的一支日军舰队严厉地批评了他。因此，暴躁的哈尔西被告知，在他被派去掩护麦克阿瑟的滩头时，若是有机会奋起消灭日本海军的“主力”，他就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1944年10月23日星期一夜里，两艘美军潜艇——“镖鲈”号和“鲦鱼”号——在婆罗洲近海发现了栗田的主力舰队。星期二一早，潜艇向3艘巡洋舰发射了鱼雷，击沉了日军的两艘舰船，并警告哈尔西和金凯德敌军已来袭。“纳什维尔”号准备加入这一战线。麦克阿瑟也打算随船前往。他告诉金凯德，他这一生“都只在书本上研读过海军战斗，在字里行间见识海战的精彩”，而且总是为自己的“想象”感到激动不已。金凯德在回复中表示根本不会考虑让将军前往。麦克阿瑟屈服了，但对即将展开的这场战役依旧兴趣不减。在他和部下看来，这场战役事关生死。一旦“大和”号和“武藏”号这样的舰船突破防线，船上的18寸舰炮就能轻易击沉所有的美国运兵船，炸毁并夺取各个滩头。战后将军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海战面前，他的入侵行动“岌岌可危”，而他在莱特岛上的地面指挥官克鲁格也宣称，敌军威力无比的舰炮“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毁船只和飞机，销毁同盟国在莱特岛上采取行动所需的至关重要的物资”。

和大部分战斗计划一样，日本人的计划也会随着战事灵活改变。栗田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被美军潜艇发现。负责引诱美军的指挥官小泽在知悉这一进展之后试图通过故意透露不加密的电报将哈尔西引向自己。但哈尔西并没有收到信息，而且侦察机也错过了小泽的舰队，因为它们全都飞去西边寻找栗田的先遣舰队去了。追踪到它们的身影之后，美国战机对着庞大的“武藏”号射击了36次，将这艘被日本人认为永远不可能沉没的、装有装甲甲板和水密分舱的武装舰船打得支离破碎、沉入了海底。此刻已经是星期二的下午了。栗田将自己的舰队调离了莱特湾，打算趁天黑之前行驶到美国海军飞机追击不到的地方再返回。哈尔西推断栗田已经撤退，现在可以不必再理会他。不过哈尔西注意到有些不对，因为还没有遇见一艘敌军航母。坚信附近还有敌军的他派出了几架侦察机，展开了更广泛的搜查。傍晚5点，他们终于发现了小泽的诱饵。哈尔西乘胜追击，敞开了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大门。

星期二晚，在一轮明月的照耀下，栗田的南方军队指挥官西村的舰队进入

了苏里高海峡狭窄的水域。美国海军的杰西·奥尔登多夫少将正把守着海峡。趁着敌军舰船一艘又一艘进入海峡之际，奥尔登多夫抢占T字头优势阵形——侧舷齐射击沉了敌军军舰。西村溺水而亡，他的部队也被彻底摧毁；黎明到来之前，海峡里除了船只的残骸和油污之外什么也没有剩下。然而，与此同时，美军的侦察轰炸机却来报，栗田的舰队夜里11点便开始朝着圣贝纳迪诺海峡反攻。如今，哈尔西正处在海峡北部160英里处，并且还在远离海峡。在他的印象中，许多其他的敌军舰船也随着“武藏”号一同沉入了海底，所以他并不认为这是一次自杀式的行动，决定继续追击。星期三早上日出时分，金凯德就夜战的成果给奥尔登多夫发去了贺电。

金凯德不仅相信西村是自己面临的唯一一个威胁，还以为哈尔西的战斗舰队仍旧把守着圣贝纳迪诺海峡，便没有在黎明时分再派遣侦察机前去侦察西北方向的情况。此时此刻，他这才恐慌地听说栗田竟然已经越过了防线，而日军除了沉没的“武藏”号之外几乎没有太大的损失。栗田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正把庞大的炮口对准金凯德舰队负责掩护麦克阿瑟所在滩头的6艘护航航母和一队驱逐舰。老奸巨猾的狐狸已经溜进了鸡群之中。

上午8点30分，金凯德通过电报通知哈尔西：“莱特湾需要战舰立即支援。”没有人回应。30分钟之后，他又重复了一次自己的呼救，这一次使用的是普通的电报。如今，远在350英里之外的哈尔西正对小泽展开穷追猛打，但美军的境遇在远离莱特岛海域之后就变得格外惨不忍睹。此时此刻，海战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个篇章出现了。栗田距离自己的目标只有不到30英里的距离了，而挡在他的枪口和金凯德的航母之间的只有一排驱逐舰和护卫舰，而后者只不过是用来执行反潜任务的小船，开船的大多是已婚的新征士兵。驱逐舰对栗田的战舰发起了反击。随后，那些英勇的小型护卫舰也朝着庞大的日军舰队飞驰而来，用小口径的机枪和鱼雷朝它们开火。面对锲而不舍的美军对手，栗田手下的这些庞然大物漫无目的地成群乱转了起来，有的还沉入了水里，冒起了股股浓烟。金凯德的航母把所有能飞的战机全都送到了空中，拥有自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庞大日军舰队的栗田却犹豫了。

这是关键性的一刻。星期三上午11点15分，金凯德通过电报通知哈尔西：“局势十分严峻。护航航母再一次遭遇敌军水面部队的威胁。急需你的协助。护航航母正撤回莱特湾。”身处夏威夷、越发焦急地关注着这场鏖战的尼米兹给哈尔西发去了一封言辞激烈的急件：“全世界想知道第34特遣队去哪儿了！”这封急件奏效了。哈尔西中断了和小泽的追逐战，派遣6艘最快的战舰和一支航母部队返回莱特岛。然而，他们在追逐诱饵的过程中已经驶出了太远，第二天一早才能到达莱特湾。依照以前的先例，除了一种情况之外，栗田必胜无疑。而这种例外让人十分困惑。栗田拦截到了几条命令美军舰载飞机着陆到莱特岛的消息，其目的本来是为了防止

航母被击中无处可逃，可这位日军中将却推断这是美军准备以陆地为基地对他的舰船发起分批进攻。紧接着他又截获并误读了金凯德发给哈尔西的两条电报，坚信哈尔西正在迅速靠近，很快就要冲破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大门。栗田掉转船头逃跑了，赶在晚上10点之前的几分钟穿过了海峡——丝毫没有意识到哈尔西的先遣舰队还有3个小时才能到达。

莱特湾之战就这样结束了。相比此前规模最大的海战（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250艘战舰），共有282艘战舰参与了此次战役。和两败俱伤的日德兰海战不同的是，莱特湾之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美军在损失了1艘轻型航母、2艘护航航母和3艘驱逐舰的情况下击毁了敌军的4艘航母、3艘战列舰、6艘重型巡洋舰、3艘轻型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除了神风特攻队首次在战役中登场之外，日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在战争中已经无法再成气候。美军军官完全有理由欢呼雀跃。事实上，他们除了指责哈尔西在战役中的表现之外，的确士气大振。星期四晚上，麦克阿瑟坐在整修一新的普赖斯宅邸的晚餐桌前，听着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参谋们出言不逊地评论着激进的哈尔西上将。据肯尼回忆，他们“严厉批评了哈尔西抛弃其余部队，追击北部日军的‘诱饵’舰队的行为”。将军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餐桌。“够了！”他咆哮道，“别去烦那头‘公牛’了！在我看来，他依旧是一位好战的上将。”肯尼表示：“如果换作我是麦克阿瑟，在发现最重要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有可能因为哈尔西的错误判断而面临威胁时，我得有多么宽广的心胸才能说出将军在那晚的乱局中说出的那句话呀。”但事情还有另一种解释。正如麦克阿瑟告诉埃格伯格的那样，在他看来，战争中最伟大的品质是忠诚。哈尔西是忠于他的，而现在就是他回报哈尔西的时候。

星期一下午，在双方的舰队互相摸索着驶向彼此时，麦克阿瑟在莱特岛圣佩德罗湾附近的高大的廊柱式联邦大厦里举行了一场小小的仪式，偿还了菲律宾人口中的“utang na loob”（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说就是“借据”）——他对于救赎的承诺。在那里，塔克洛班市被宣布成为夺回马尼拉之前的群岛首都，而奥斯梅尼亚也正式宣誓成为总统。他和将军对着麦克风简短地向群岛人民做了一番致辞。紧接着，萨瑟兰宣读了一份白宫恢复共和国公民政府的宣言。一位号手吹奏起了《致军旗》的乐曲，第1骑兵师的骑兵们在两根同样的旗杆上同时升起了美、菲两国的国旗。麦克阿瑟在一位参与莱特岛战役的游击队领袖的束腰外衣上挂上了一枚服役优异十字勋章。随后，美军一批批挤上了吉普车，把奥斯梅尼亚抛在了身后。这位新总统不仅缺少一辆座驾，此刻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当晚能在哪里留宿。他这才领会到了伊克斯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奥斯梅尼亚很受伤，却没有理由相信这番冷遇是有人故意为之的。麦克阿瑟及其部下全都专注在局势地图中快速移动的别针以及克鲁格率领的势不

可当的步兵团身上。肯尼发现自己很难全神贯注地参与这个历史性的仪式，满脑子都在想着“再次看到水泥码头、水泥或碎石路以及高楼大厦是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让人感觉仿佛战争的尾声近在眼前”。那天晚上，将军在乱糟糟的普赖斯宅邸里对他说：“乔治，我累得都吃不下饭了。”然而，他还是坚持研读部队报告，一直熬到了深夜。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肯尼就起身准备去视察哪一块夺回的土地适合建设机场。他让值班的军官转告将军，自己可能没时间与其道别了。那位军官回答：“哦，麦克阿瑟将军两小时之前就动身去前线了。”

攻占莱特岛的行动很快便加速了群岛各处激动的脉搏，远在中国东北地区依靠钢笔、自动铅笔甚至是腕表来交换信息的乔纳森·温赖特和其他战俘也在铁丝网后听闻了这个消息。后来，温赖特写道：“道格拉斯，信守他在科雷希多岛上对我许下的承诺……回来了……带着我们这些战败指挥官做梦都想不到的强大舰队和援兵回来了。”

麦克阿瑟在战略上实现了出其不意的目标。牧野四郎的第16师团正被缓缓推回莱特岛的2号高速公路，朝着一个被美军士兵称为断头岭的高地撤退。牧野很沮丧，他的上司铃木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从吕宋岛赶来的日军援兵正源源不断地赶到，每支运兵船舰队能搭载1.3万名士兵。铃木有信心在10天之内夺回塔克洛班市。回想起来，他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当时的麦克阿瑟似乎也只能缓慢地向前推进。和太平洋战区另外的两支步兵军队（海军陆战队、澳大利亚军）的指挥官不同，麦克阿瑟偏向于停驻在敌人的战略据点上，等待火炮瞄准敌人的防御工事。当美国报章对此表示烦恼时，罗慕洛问他：“我该怎么向媒体解释？”麦克阿瑟在这个菲律宾人面前摇了摇手指回答：“告诉他们，只要我愿意，两个星期之内就能拿下莱特岛，但我不会那样做！我要对身在美国的那些母亲和妻子们负责，不会这样对待他们家中的男人。我不会用牺牲去追求可以用战略达成的目标。”

麦克阿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天气，这也是山下能够轻易增援铃木的原因。在天气作祟下，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能够给将军带来的优势被消除了。他曾经称莱特岛为跳板，如今却发现这块跳板似乎已经被雨水浸透了。40天之内，岛上的降水量就达到了34英寸，整个岛屿变成了一片汪洋。稳定湿润的热带季风使得跑道升级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岛上的几座机场已经被美军夺取，但肯尼一座也用不上，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几片泥沼地而已。雪上加霜的是，战斗期间，莱特岛还遭遇了一次地震和三次台风。这是将军第一次在缺乏岸基飞机支援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情况糟糕到了极点。在群岛周围拥有坚固机场的日本空军会低飞着从山顶猛冲下来，让美军的雷达无所适从。每晚肯尼都会对天祈祷，而每天早上又定会失望。陆军工程兵沮丧地告诉他情况已经无关紧要了，鉴于岛上排水系统的状况，

即便是最好的钢铁跑道垫也会被冲走。幸运的是，哈尔西停在附近水域中的航母比计划中多停留了一整个月的时间，否则日军进入莱特岛上空几乎不会遭遇任何阻力。结果神风特攻队击中了4艘航母。最终，一条新的跑道被修建在土地相对牢固的塔纳万市，位于塔克洛班市以南9英里处。P-38战斗机开始在那里起降，可莱特岛永远也没有变成将军需要的空军基地。

尽管这算不上是肯尼的错，但他还是感觉很内疚。麦克阿瑟只好试图安抚他。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曾送给麦克阿瑟一本李将军的传记，上面题写道："致正在创造伟大历史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将军从书页上抬起目光，对肯尼说道："乔治，我读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巧合。'石墙'杰克逊死时的遗言是这样的，'告诉A. P. 希尔，把他的步兵调到前线来。'多年之后，李将军去世时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希尔，把你的步兵调到前线来。'"将军停顿了一下，点燃了自己的玉米烟斗，嘬了几口。"如果我今天、明天或是任何时候即将送命，你能从我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也会是，'乔治，把第5航空军调到前线来。'"还有一次，在《纽约时报》的A. H. 苏兹贝格和特纳·卡特利奇到访普赖斯宅邸时，麦克阿瑟也曾暗示过要调用某种飞机来挫败神风特攻队。肯尼回答，将军想必是猜到了他的心思，因为自己已经下达了表达同样意思的命令。卡特利奇写道："麦克阿瑟一挥手，转过头来看着A. H. 苏兹贝格，同时还把一只手放在了肯尼的头上。'好了，你看。'他满心欢喜地说道，'我是怎么跟你说起这些小伙子们的？'紧接着，麦克阿瑟又转向了像得到了老师嘉奖的小学生一般的肯尼，补充道，'乔治，你是我生命中的快乐。'他边说边把玉米烟斗放回嘴里，用力抻着下巴走出门，那动作连伦特或巴里莫尔都很难模仿。"

这两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对将军的盛情款待感到受宠若惊。"他的话语间充满了热诚与真挚。"卡特利奇回忆，"我觉得那不是一种表演，而是这个男人真性情的表现。"卡特利奇和拉里·莱尔巴斯住在一起（他们曾在华盛顿共事过），而苏兹贝格则和肯尼同住一屋。按照麦克阿瑟的指示，萨瑟兰给他们完整地汇报了夺取菲律宾其余领土的计划，内容细致得令他们有些惊恐：他们不仅身处战区，而且不难想象这里有可能会被日军夺回。麦克阿瑟安慰他们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敌人了。在长廊上，有一次，他还颇有见识地谈起了总统竞选、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的进展以及陆军橄榄球队的事情。橄榄球队如今的教练是他的学员门徒——精明能干的"红头发"布莱克（西点军校以23：7大胜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之后，他曾给布莱克发去这样一封电报：我们中止了战争，就为了庆祝最伟大的陆军橄榄球队最辉煌的胜利）。将军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每天都会阅读报纸，而他们也信以为真；他似乎知晓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卡特利奇认为"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与公众人物之间最奇妙的一次谈话"。和其他来访者一样，他们也注意到将军谈起战争时总是喜欢使用

个人专有名词，用“我的”步兵、“我的”炮兵、“我的”部下和“我的”战略来进行指代。“他说话的时候，”卡特利奇回忆，“既是一位军事专家，又是一位政治人物、一个支配命运的人。苏兹贝格和我事后达成了共识，我们还从未遇到过比他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没有见过比他对自己的自负更有自知之明、还能坚定地利用它来支持自己言行的人。”

晚上6点，《纽约时报》的两位记者来吃晚饭时觉察到了普赖斯宅邸里的另一种声音。它听上去是“那么悦耳熟练、自信满满”，以至于卡特利奇怀疑那是否为从美国传来的广播演讲。不久，莱尔巴斯怂恿他和苏兹贝格来到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兼卧室隔壁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原来穿透门缝的正是将军的声音。他们看到将军正声色俱厉地训斥金凯德。只见上将靠在床脚上，而麦克阿瑟则像个辩护律师正在引诱充满敌意的目击证人似的，一边咆哮着，一边在空中挥舞着手臂，还用手指指着对方的鼻子，不时停下来双手叉着腰，抻着下巴，一脸怀疑地瞪着金凯德。他们讨论的是尼米兹拒绝冒险让太平洋中央战区的舰队跨进至民都洛岛（那是麦克阿瑟计划中下一步要进军的菲律宾岛屿）的事情，除非将军能够提供针对神风特攻队的更好的陆基战机支援。麦克阿瑟问道：“他们留着那些船有什么用？”战舰和“我的坦克与士兵一样”，就是用来冒险的。他继续说道，美国海军“固守着过时的传统，仿佛失去舰船的军官就应该蒙羞似的”。他还浮夸地追问：“拥有这么多的装备却不对敌人发起冲击，那美国人民还能期望你们做些什么？”在此期间，金凯德一直默默地站着，双臂交叉在胸口。显然这样的爆发对他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将军突然停在了上将的面前，把两只手都放在了他的肩膀上，露齿笑着说道：“但是，汤米（金凯德），我还是一样地爱你。我们去吃晚饭吧，然后给他们发封电报。”第二天早上，浑然不知宾客偷听到了自己昨晚的话的将军再次滔滔不绝地说起海军“不愿与敌人交战”的问题。 注

拜访过普赖斯宅邸的所有人都感觉麦克阿瑟是在借日子过活。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杀害他以及碰巧和他在一起的人。罗慕洛简洁地写道：“死亡的气息飘荡在空中，无时无刻不在围绕着我们。”卡特利奇注意到，这座建筑“曾被反复炮轰过，里外都是机关枪子弹留下的弹孔。我的房间里就有一处大洞，是一个星期前被一颗20毫米口径的子弹炸开的”。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泛泛记录道，日军把他的总部当作“特殊的目标，却从没正中过靶心”。不过日军也曾接近过目标。他旁边的一座楼里曾有两位战地记者送命，而另外一边的楼里也牺牲过12名菲律宾人。一次，在猛烈的炮轰袭击之后，副官们朝着将军的房间跑了过来，嘴里还喊着：“他们伤到你了吗？”麦克阿瑟一边回答“这一次没有”，一边伸手指了指几英寸外的一个弹孔。艾克尔伯格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通过新闻听说，距离麦克阿瑟将军头顶一英尺的墙壁上被点50口径的子弹打穿了一个洞。”11月26日，身处塔克洛班市的艾克尔伯格注意到，在一次午餐会议过程中，零式

战斗机曾经三次低空呼啸过他们的头顶：“那种噪声实在是太可怕了，可老大却继续讲着话。”一次，在一架日军战机低空扫射飞过宅邸的房顶时，他还拒绝停止剃须，再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注]

在普赖斯宅邸中，麦克阿瑟庆祝过感恩节、五星上将军衔晋升仪式和圣诞节。其中感恩节期间的气氛有些悲伤。在返回布里斯班出差时，肯尼告诉琼，将军预订了一只火鸡。琼提出自己愿意贡献一些小红莓果酱，并希望能够和将军一起享用。可那是不可能的。麦克阿瑟在夺回马尼拉之前是无法与妻儿团聚的——最早也要等到冬末时节。

12月，在国会任命将军为陆军五星上将之后，塔克洛班的一位工匠将美国、菲律宾、荷兰和澳大利亚的钱币熔在一起（象征着麦克阿瑟统领的各国军队），铸造了两枚五星的环形装饰物。埃格伯格和莱尔巴斯将它们戴在了将军的身上。“然而，往日里获得晋升或奖章时的兴奋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麦克阿瑟事后写道，“也许是因为我太常听到受伤的人们发出的死亡哀鸣——或是因为岁月不留情。”的确，他在节日中总是逃脱不了抑郁的魔咒，就连自己军队的战况顺利时也不例外。对此，连绵的雨天、肯尼的困境以及无穷无尽的空袭也有一定影响。平安夜那天，一支美军合唱队聚集在走廊上唱起了赞美诗，但还没等他们唱完，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亮了一架敌机。这一次，防空射手准确出手，当即摧毁了敌机。第二天，麦克阿瑟给奥斯梅尼亚打了一个电话，而这个电话很可能更加深了他的郁闷——这两个人仍在和彼此闹别扭。不管怎么样，奥斯梅尼亚都是共和国的行政长官，而将军通常也是个有礼有节的人——直到他找到了制胜的方法。

麦克阿瑟对菲律宾政治的兴趣随着他和马尼拉之间距离的缩短而变得日益强烈。眼下罗慕洛是他最喜欢的菲律宾谈话高手，而记者笔下对一段对话的描述更是唤起了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忧伤：“麦克阿瑟和我坐在宅邸的门廊上……我们喝着橘子水。天下着雨——莱特岛战争中哪一天不是下着雨的呢？雨水落在门廊顶上的声音模糊了附近山中的炮火声。道路的尽头充斥着锤子的声音。士兵们正在重建信号军团总部以及几天前遭直接命中而被炸毁的军官食堂。我们的周围，在泥泞与潮湿之中，一座战争中的城市正在崛起。”

将军似乎是不会陷入悲伤之中的。事实上，因为责任，他很容易就能甩掉悲伤。普赖斯宅邸源源不断地接待着一些过客。他们之中包括第11空降师的两名地位卑微却胆大妄为的列兵，想来问清楚他们的部队为什么不能得到更多的宣传。将军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形势

图，解释说自己目前还不想让敌人知道空降师的到来。和卡特利奇以及苏兹贝格一样，其他人也都是颇具影响力和有可能说服五角大楼将运往欧洲战区的物资转运到太平洋战区来的军外人士。在领受自己的五星将衔之前，将军曾在一群战地记者面前发表过一番即席演讲，重述自己坚信“未来一千年的世界历史将在太平洋上写就”，还预言斯大林最终会加入对日战争，推翻1905年签署的日俄和平协定中的条款，独占不冻港旅顺，归还中国东北领土。麦克阿瑟喜欢扮演亲切的主人角色，也知道自己十分精于此道，况且能够摆脱指挥链上至高无上的孤单角色，和外人说说话，对他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解脱。

参谋们还在为了算计别人和将计就计的事情感到激动和烦躁——这样的情节似乎更适合出现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里。和大部分幸存者一样，埃格伯格医生和劳伦斯·E. “拉里”·邦克都把事情怪罪到了萨瑟兰身上。“他引起了美军的内讧。”邦克说。[注]可参谋长在完全不知情甚至没有得到铁腕总司令鼓励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让军官们彼此竞争的。离奇的是，他们竟然信以为真地认为麦克阿瑟对内乱的事情毫不知情。事情的原委在艾克尔伯格给妻子的家书中描述得格外清楚。他并非没有指责“萨拉”，在麦克阿瑟创建了克鲁格的第6集团军和艾克尔伯格的第8集团军之后，新的军队就很少被新闻电讯提及。据第8集团军的统帅总结，这是因为将军“总想展现一个可怜的小男孩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倾尽全力的画面，因此不想在战报中承认目前有两支军队在为自己效命”。可“萨拉”（或是艾克尔伯格给他取的代号“老大”）在艾克尔伯格的眼中却总是完美无瑕的，不仅和阴谋远远沾不上边儿，而且和“你的莱文沃思朋友（萨瑟兰）”“你的亲密战友（克鲁格）”“查尔斯阁下（威洛比）”和“乔治阁下（肯尼）”不是一类人。艾克尔伯格闷闷不乐地在信中告诉妻子，肯尼“蒙蔽了老大的双眼”，而萨瑟兰则是“至死都无法赢得我的信任的人”。如果麦克阿瑟忙得没空见自己时，艾克尔伯格都会被焦虑的情绪所侵蚀，猜想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事情，言行举止更像是个忧虑的小学生，而不是一位三星将军。很快，将军不仅接待了他，还令他欣喜地说出了自己不满意克鲁格“借口太多”，可能“不得不被解职”的话。艾克尔伯格写道：“麦克阿瑟说他希望我能够成为‘石墙’杰克逊或巴顿将军那样的人，带领数支小型登陆部队像日本人当初那样从南部进发。他的话充满了热忱，离开时还冲我喊着让我经常回来。”艾克尔伯格坚信将军正“试图胁迫”克鲁格（而不是自己），甚至不再幻想做他的亲密战友——在得到第四颗星章之后还会被赋予进攻吕宋岛的关键职责。

和罗斯福一样，麦克阿瑟也在利用自己在参谋中的地位。肯尼注意到：“在大型参谋会议或与个人单独谈话的过程中，麦克阿瑟总是能够娴熟地把讨论引向做出决断的时刻，还能让在场的每一位成员都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我就曾无数次听到参谋们提起‘老大采用了我的主意’，但其实

我早在几星期前就听闻麦克阿瑟决定要这么做……作为一位销售员，麦克阿瑟已经无人能及，很少有人能够与他比肩。”在其他会议中，将军会指出一个军事目标，然后邀请大家建言献策，说说该如何才能夺取它。在每一位军官作答之后，他都会提出几个泛泛的问题，然后说上一句“非常感谢，先生们”，转而自己埋头苦思起来。据驻守塔克洛班市的文森特·L. 鲍尔斯中士形容：“麦克阿瑟总是会出现在走廊上一个人来回踱步，嘴里吸着加长型的玉米烟斗，身后站着一位副官……若是防空警报响起，他便会敲掉烟斗上燃着的烟灰，站到门廊中央的扶手旁瞥向天空，看着瞄准敌机的红色追踪器和90毫米炮弹。空袭结束之后，他便又开始踱起步来。”和将军在一起的副官通常都是埃格伯格。据埃格伯格回忆：“将军会向我提问，然后又自己回答。一问一答之间，我清楚地看到了国际象棋和战争之间的联系。他会说，‘如果我们照着史蒂夫建议的这样做，他们（日军）也许会这样做，或者，如果他们聪明的话，也有可能会那样做。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们有三种方式可以回应他们。’紧接着，他会概述出其他的选项，然后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回应这六七种可能性。就这样持续自问自答一天或一个星期之后，他便会召集参谋会议，制定出一个在多数情况下都会让大部分人大惊失色却又似乎万无一失的战略。”

麦克阿瑟仿佛意识到了美国士兵对自己的敌意，对此感到十分困扰。这很有可能正是他会对那两个无畏的伞兵如此热情的原因。若是换成艾森豪威尔或巴顿，他们可能早就被轰走或是被逮捕了。将军从不会错失一个机会，总是不忘提醒自己的参谋，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一些比他们年轻的士兵正在牺牲。离开荷兰迪亚之前，总部的每一位军官都出了20美元，凑钱买了些酒水，可货物却在他们动身前往莱特岛之后才能到货，且没有将军的批准是不能转寄的。于是他们选择了迪克·马歇尔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一天晚上在食堂里用过餐之后，马歇尔清了清嗓子，解释了一下这个问题。麦克阿瑟问道：“那普通士兵怎么办？他们有没有买到些什么？”马歇尔解释道，他们手里有啤酒。将军想了一会儿答道：“如果啤酒对普通士兵来说已经足够好了，那么对军官来说也就够了。”

事情到此为止。没有人会幻想违背他的命令——没有人，除了萨瑟兰。为了确保没有误会，麦克阿瑟告诉自己的参谋长，离开荷兰迪亚之后，那个淫乱的澳大利亚女人必须返回布里斯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跨越赤道。一天，在塔克洛班市，凯西手下的工程副手杰克·斯韦德鲁普告诉埃格伯格，那个女人本人就在莱特岛上，萨瑟兰刚刚命令自己为她在距离海岸边10英里的地方修建一座小屋。他们和莱尔巴斯以及邦纳·费勒斯秘密商议了一下。大家都同意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麦克阿瑟，却迟迟无法决定该由谁来开口——他们要么是中等军衔的常规军，要么就是最近刚刚招惹过麦克阿瑟的人。埃格伯格拐弯抹角地向将军提起了这件事情。事情不了了之。麦克阿瑟提出了质询，其他军官则把事情压了下去，生怕总司令和总参谋

之间会爆发一场大战。萨瑟兰的情妇得到了自己的小屋，而萨瑟兰也经常过去修修补补。

之后的某一天，莱尔巴斯告诉埃格伯格，自己刚刚和她通完电话，她要求把某些有关政府装备的文章送到她家的门口。显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医生跨过圣厄尔尼诺大街，从参谋总部迈进了普赖斯宅邸，发现麦克阿瑟正坐在走廊上的一张摇椅上。埃格伯格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思索着提及这个话题的最好方法。他敷衍了事地问了问琼的近况，然后沉默地坐在那里，试图通过心电感应集中精力把小屋女主人的名字传递到将军的脑袋里。不一会儿，将军朝着他转过身来问道："医生，那个女人怎么了？"医生大声地说出了她的名字。麦克阿瑟说："就是她。"埃格伯格告诉他："她就住在距离海岸10英里的地方。拉里刚刚才和她通过话。"将军的下巴一下子就垂了下来，嘴角随即却露出了微笑的曲线。他喝道："把萨瑟兰找来！"

埃格伯格医生找来了萨瑟兰，让他和麦克阿瑟在二楼单独谈话。就在埃格伯格走下台阶时，忽闻将军用喉音说道："你这个该死的兔崽子！"紧接着便是一连串难听的脏话。在楼梯下站岗的哨兵用手捂着自己的耳朵，可街对面的军官们全都焦急地竖着耳朵，生怕漏听一个字。萨瑟兰被软禁了起来，而她的情妇则登上了最近的一班飞机，被撵回了澳大利亚。"太快了。"另一位军官回忆，"她有可能是被装在大炮里射出去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麦克阿瑟听说她正和自己的丈夫闹离婚。可能同盟国首都那些危言耸听的头条新闻听上去过于真实和肮脏。与此同时，厌倦了独自入睡的萨瑟兰显然也想要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吕宋岛行动开始之际，不祥的征兆开始出现在了艾克尔伯格给妻子写去的书信中："老大和'你的老朋友'萨瑟兰吵得不可开交。"总参谋长做了些"疯狂的举动"，艾克尔伯格怀疑他还能"坚持多久"，而且奇怪的是："你的这位莱文沃思朋友居然去看牙了。"据埃格伯格说，总参谋长突然宣布自己患上了牙痛的毛病，而距离最近的牙医诊所位于荷兰迪亚。一登上C–54运输机，他便告诉一位军官，如果那里的牙医服务不到位，他想要继续前往布里斯班。他不仅真的这么做了，还搬去和自己的情妇同居，由麦克阿瑟和迪克·马歇尔来处理他留下的文书工作。萨瑟兰回来之后，将军的态度冷淡了许多，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亲密的言语。将军转而越发地重用考特尼·惠特尼，允许这位新密友昂首阔步地出入自己的办公室，听自己的谈话、看自己处理日常杂事，这让惠特尼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人。将军天赋异禀、多才多艺，但在用人方面的判断力往往让人瞠目结舌。

随着每一次从前线派兵前往莱特岛作战，山下的疑心也越来越重。坐在自己位于马尼拉东部、帕西格河畔的办公桌前，他一次又一次地向陆军元帅

寺内发出请求，声辩防卫莱特岛的行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应该把兵力集中到吕宋岛来，抵御麦克阿瑟发起的必然攻击。不为所动的寺内命他“召集所有的力量，完全摧毁莱特岛上的敌人”。山下顺从地回复道：“我完全理解您的意图，将会力求完美。”但他的心并不在这里，特别是在哈尔西的舰载飞机于莱特岛的主要日军基地奥尔莫克附近袭击了一支日军护卫运输舰队之后。将近一个师的兵力（约1万名士兵）在这场战役中溺水而亡。山下清楚，雨终究会停，到那时再进一步为卫戍部队派遣援兵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11月15日，他基本上放弃了希望，通过电报通知铃木：“万一无法增派援兵，吕宋岛将成为菲律宾未来行动中主要的威胁。”

如今，山下已经决定不再牺牲经验丰富的老兵，放弃将麦克阿瑟推回莱特湾的这项注定要失败的尝试。但他可能也清楚一切为时已晚。铃木疯狂的要求已经耗尽了山下在吕宋岛上的精英部队。“突击日”当天，驻守在莱特岛上的日军是第16师和一些支援部队，总数约为1.5万人。如今，在寺内的坚持下，岛上的驻军又增加了3个师的兵力。超过6万名日军士兵被克鲁格的18万美军士兵困在了岛上。夺取塔克洛班和杜拉格之后，麦克阿瑟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便扩大了自己的侧翼，占领了阿布约（臼齿形岛屿的右根中部）以及位于臼齿齿冠上的卡里加拉湾；断头岭在感恩节那天也被收复了。美军沿着第二高速公路涌入奥尔莫克，攻下了臼齿的左根部。

那时的将军得益于一个奇异的悖论。肯尼在莱特岛上缺少跑道的事实实际上加速了美军攻下莱特岛的步伐。麦克阿瑟与海军之间的争执（也就是卡特利奇和苏兹贝格偷听到的那一段对话）最终以妥协终止。获得尼米兹支持的进攻民都洛岛的行动被推迟了10天。将军也曾想过丢下尼米兹孤军奋战，派遣没有护卫舰的运兵船进入民都洛岛附近的狭窄海域，但金凯德和肯尼说服了他，致使麦克阿瑟原本计划派去执行登陆任务的第77师“纽约之师”最终无所事事。因此，他提议安排这支部队在奥尔莫克以南3英里处的海边登陆。在征得金凯德的赞同之后，行动在珍珠港事件三周年纪念日当天拉开了帷幕。铃木并没有在那里竖起海滩障碍，因而手下的兵力很快便被分为两半。作为一位真正的武士，铃木率领手下的士兵摧枯拉朽般登上了1 200英尺高、覆盖着雨林的山岭，公然挑衅追击自己的美军士兵。圣诞节当天，山下通过电报通知他，寺内终于同意放弃莱特岛。尽管铃木可以自由地发起反击或破坏性攻击行动（在他于次年4月16日死去之前，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但他对自己司令部的命运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圣诞节过后的那一天，麦克阿瑟宣布莱特岛战役“目前除了次要的肃清残敌的工作之外已可被视为结束……山下将军也许遭受了日本军事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就麦克阿瑟在巴丹半岛上遭遇了美军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而言，这话并没有错。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我们都不能把有组织的抵抗

力量的失败归咎到战地指挥官的身上。麦克阿瑟的战报中还有另一个令人沮丧的方面。在新几内亚，他冒犯了执行清剿工作的美国步兵——艾克尔伯格的第8集团军。正是第8集团军解放了克鲁格的第6集团军，使得麦克阿瑟和克鲁格能够策划即将到来的对日反攻战。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艾克尔伯格的士兵们消灭了超过2.7万名敌军士兵。艾克尔伯格事后写道："这是一场在体力上艰苦卓绝、令人筋疲力尽的战斗，也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战斗。"

然而，对于敌人来说，莱特岛战役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日军失去了6.5万名精兵，包括日军舰队的中流砥柱以及除了神风特攻队以外的所有空军。尽管神风特攻队令人闻风丧胆，却很难影响战争的结果。日军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补给线（能为他们的存活提供重要原材料的航线）已经被切断了。战后，日本海军部部长米内光政告诉审讯者："我们在莱特岛战役中失利就相当于失去了菲律宾。"当时，裕仁天皇把小矶首相召进皇宫，严厉提醒他，他曾经向国家许诺莱特岛之战将成为"二战"中的"山崎之战"。天皇质问他现在打算怎么通报日本国民。小矶含糊地表示自己将在吕宋岛上重拾自己的誓言，却在离开皇宫时踌躇了，深知自己的离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坚持让尼米兹在民都洛岛问题上妥协的麦克阿瑟夺取了这座位于马尼拉西南200英里处的岛屿。这一举动是鲁莽的：民都洛岛距离莱特湾300英里，而敌军安置在菲律宾首都的强大空军更容易到达这里。五角大楼方面劝诫将军，这一行动"在范围上过于大胆，在执行上过于冒险"，但麦克阿瑟已经开始忽略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了，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就连他自己的参谋团队也是满腹疑虑。参与作战计划会议的艾克尔伯格注意到："金凯德反对得最为激烈。他指出，要想到达民都洛岛，他的舰队就必须穿过苏里高海峡和苏禄海，而身处那片区域会让他的舰船像飞靶一样暴露在敌军的陆基飞机攻击范围内。当然，金凯德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而第7舰队也和往常一样表现得十分出色。"麦克阿瑟的直觉告诉他，山下已经没有胃口再拉开与莱特岛之役相同的战线了，因此临近马尼拉战役山下一定会节约兵力。将军是对的，民都洛岛上的日军反抗力量只有不到100人。不出几个小时，美军便占领了4条废弃的机场跑道。

和莱特岛上的机场不同，这里的跑道既干燥又坚固。在新年到来之前，哈尔西的舰载飞机飞行员们打了多次精彩的空战，驱逐走了巡航作战的零式战斗机和三菱战斗机，而肯尼则欢欣鼓舞地宣布这座岛将成为他的新基地，准备新建两座机场，为将军下一场关键战役提供保护伞。威洛比后来写道，有了肯尼的庇护，麦克阿瑟可以"重拾自己的空中掩护跃进战略"。夺取民都洛岛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切断山下与日军在菲律宾南部的卫戍部

队之间的联系。正如麦克阿瑟写到的那样，对于他来说，这座岛是他“进攻吕宋岛之前通往林加延的最后一块垫脚石”。就他和他的敌人所知，这座岛屿本身也是无价的，因为一旦山下失守民都洛岛，挡在美日两国之间的就只有硫磺岛和冲绳岛这两座小岛堡垒了。

1945年1月3日星期三晚，鲍尔斯中士抬起头来望向了普赖斯宅邸的走廊，看到将军正沉默地来回踱着步。鲍尔斯注意到：“他今晚的举止和步伐和以往有些不同。他没有抽烟，头上那顶著名的巴丹帽也不见了。他就这样没戴帽子走动着，双手背在背后，脚步像是悉心丈量似的，看起来小心谨慎，格外缓慢。走廊上就只有他一个人……那个安静沉思的伟大身影正缓慢而又审慎地挪动着。”

正如麦克阿瑟事后写的那样，他正在自省日益临近的吕宋岛之役——“二战”中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高潮。星期四黎明，他就要踏上轻型巡洋舰“博伊西”号，前往林加延湾。他总共要指挥近千艘舰船，外加3 000艘登陆艇，其中不少都是刚刚从诺曼底转运过来的，还有28万名美军士兵——比艾森豪威尔征战北非、意大利以及南法时调用的美军兵力还要多，其规模比同盟国征战西西里岛时还要浩大。然而山下也率领27.5万名日军士兵静待着他的到来——可谓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役中遭遇过的最大规模的日军力量。早在圣诞节到来的三天之前，日本将军便开始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战役做起了准备。那天早上，山下将包括曼努埃尔·罗哈斯在内的何塞·劳雷尔傀儡政权转移到了更易防守的菲律宾夏都碧瑶，即位于马尼拉北部130英里处的山区之中。如今，在麦克阿瑟声势浩大的护航舰队朝他挺进的过程中，山下又把自己的总部也搬去了那里。这个坚忍、高大（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00磅）、圆头圆脑的日军指挥官（他每天都会刮干净自己的光头）公然展现着自己的自信，甚至有些沾沾自喜。他说：“丧失一两座岛屿算不了什么。菲律宾还有广阔的领土，足够我们随心所欲地打个痛快。我要在菲律宾群岛为大东亚共荣圈书写一段精彩的历史。”一位东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采访过他之后宣布：“注定要让30万美军将士送命的吕宋岛战役就要开始了。”

我们现在知道，山下私下里是很绝望的。尽管他在林加延海滩上拥有3.6万名士兵，却还是将他们撤了回来，声称在海岸线上抵抗美军的火力是没有意义的。而面对哈尔西在海上咆哮而来的局面，他所能达成的最好局面便是延长吕宋岛上的战况，困住麦克阿瑟，为正在本国岛屿上疯狂掘壕固守的大日本帝国争取一点儿时间。不过，采取守势的军队还是拥有某些战术上的优势的，何况山下准确地知道美军将在哪里发起进攻。将军可能更想超出日军的预料，但要到达能让美军坦克如履平地的广阔吕宋中央平原就只能通过林加延登陆。因此，麦克阿瑟将会在本间雅晴三年前用过的那

片海滩登陆。罗慕洛仍旧记得自己在听闻马尼拉某电台中传出“林加延湾发现80艘敌军运兵船”的消息时，曾被吓得“浑身发凉”。自从那时起，令人苦不堪言的时光已经过去了37个月。看着美军的无敌舰队冲向自己的故乡，他这样写道：“现在该轮到敌军颤抖了！”

不过，金凯德舰船上的那些人也在瑟瑟发抖。神风特攻队带来的恐惧正在迫近巅峰（40艘美军舰船已在途中被日军敢死队飞行员击沉或损坏），而敌军的潜艇也格外活跃。麦克阿瑟站立在后甲板上的一座炮台旁，带着浓厚的职业兴趣观察着这次的行动。他发现两艘靠近的鱼雷快艇正在朝着“博伊西”号射击，于是点了点头示意船长采取闪避动作，然后在潜艇浮现在巡洋舰左舷旁边时又点了点头示意美军驱逐舰对其发起攻击。不久，就在他返回自己脚下的船舱时，一架神风特攻队的飞机突然冲出云霄，直直地撞向了“博伊西”号。埃格伯格医生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架零式战斗机越飞越近。在还有3秒钟就要撞上他们时，飞行员改变方向撞向另一艘舰船，却被高射炮击中后爆炸，震得“博伊西”号的甲板颤抖了起来。医生跑下船舱，发现将军正伸展着四肢、闭着眼睛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埃格伯格认为他一定是在假寐，因为没有人能在这种环境下冷静下来，然而当他站在门口数着麦克阿瑟的呼吸次数时，却发现呼吸频率为每分钟16次，表明他的心率恰好是平稳的每分钟72次。医生迈进客舱，握住了自己的病人的一只手腕，吵醒了麦克阿瑟。当医生询问他这个时候怎么还睡得着时，将军回答：“哦，医生，我已经看遍了自己需要见识的所有战役，所以我想我可以打个盹儿了。”

然而，当舰队接近目的地时，麦克阿瑟很快又对甲板上的情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当无敌舰队与内陆之间的距离近得足以望见昔日熟悉的地标时，我一眼就看出远在地平线上那片闪烁着日光的地方就是马尼拉、科雷希多岛、马里韦莱斯和巴丹半岛。我无法从栏杆边移步。参谋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我孤独地品味着回忆。看到那些永远也无法被我家族的历史遗忘的画面，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悲伤、孤独和神圣的祭奠感。”即便太阳已然落山，他还是流连忘返。庞大的舰队驶过吕宋岛，朝着台湾岛的方向发起了佯攻。在那里，哈尔西的舰载战斗机已经对敌军的机场进行了一整天的狂轰滥炸。入夜后，舰队掉头返回了林加延湾。将军依旧在后甲板上踱着步，不时停下来瞥一瞥海港的灯光，仿佛是在希冀能够再看一眼那片土地，甚至是看一看那些身处碧瑶、紧张得彻夜难眠的对手们。

1月10日星期三，趁着黎明到来之前，美军顶着风把船停在了登陆海滩上。1 000多个船锚落入了海湾。这是一片平静的大海，海浪并不像所有人记忆中的那么汹涌。一场台风在最后一刻飞快地离开了。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对待这个吉兆的不同态度也说明了他们对将军迥异的看法。美国战地

记者异想天开地猜测起了将军是否会涉水上岸。可对菲律宾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可以开玩笑的事情。当时（甚至直至今时今日），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都相信轻拍着白色沙滩的温柔海浪是如有神助的结果。麦克阿瑟并不想让这些人醒悟，因为他深知神话在影响岛国人民思想方面所具备的力量。如果他们认为他有能力创造奇迹，将无疑为他的军火库增添了一种强大的武器——信任，一种可以被他用演技来抛光的武器。在克鲁格的4支先锋之师涉水上岸之后，总司令坐上自己的希金斯登陆艇登上了海岸。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正如我所习惯的那样，我挑选了一条很难开上岸的船，让自己不得不涉水前进。”实际上，据金凯德回忆：“一支海军工程营队用推土机搭建了一座小型码头，但当麦克阿瑟意识到舵手正准备驶向码头时，他开口拒绝了，说他不要在那里登陆。所以船只好绕过了码头……他跳进水中，涉水上岸。这就是麦克阿瑟在林加延湾弄湿了裤子的过程。”除此之外，站在海岸上观看的一群农民忘情地欢呼了起来，飞快地跑回内陆四处宣扬着将军第二次登陆的消息。当然，这正是他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自从乘坐巴尔克利的PT–41号鱼雷快艇逃离之后，麦克阿瑟终于发出了自己回归吕宋岛后的第一份战报：“解放菲律宾、掌控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决定性战役一触即发。麦克阿瑟将军亲自走上前线指挥战役，并和自己的突击部队一起登上了海岸。”这其实是一种误读。麦克阿瑟的确指挥着4个师的军队在日落之前顶着可以忽略不计的抵抗力量向内陆推进了8英里的距离，但尔后一直在“博伊西”号上睡到星期五才上岸，将自己的总部迁到了林加延湾以东12英里处的小镇圣巴巴拉的一座小学校舍里。和往常一样，他想要把自己塑造成穿着闪亮盔甲、亲自领兵上阵的骑士形象——或者，也许更接近事实的是，时年18岁便登上了传教士山陡坡的小阿瑟·麦克阿瑟的形象。

尽管麦克阿瑟返回巡洋舰休息的事情不免会让战地记者揶揄几句，但将军不久之后在吕宋岛上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再一次警醒了陪伴他的那些人。其中的第一个征兆发生在他搬到距离克鲁格的卡拉西奥指挥所30英里处的路易斯塔大庄园的10天之后。他决定踏上这趟旅程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聪明地预见到了自己的排场。他的吉普车在菲律宾人挂上鲜花装饰之后像极了凯旋的罗马两轮战车。民众争相和他握手，往他的脖子上套花环，还试图触摸他的军装。注不过，他的主要动机还是督促谨慎的克鲁格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艾克尔伯格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到，“总司令很耐心，不得不催促你的老朋友加快动作，可克鲁格却一点儿勇气也没有”。将军告诉艾克尔伯格，希望其能够“率领一支灵活机动的小型部队执行一次大胆的马尼拉探险任务”，使用一些“能让杰布·斯图尔特将军都热血沸腾”的战术。将军的言外之意是指这样的行动对克鲁格来说未免有些困难，无疑是在挑拨自己的两员战将互相竞争——正如拿破仑对待自己的元帅以及斯大

林后来鼓励朱可夫和科涅夫你追我赶地奔赴柏林时所做的那样。将军显然认为自己的高级战地指挥官有些疲沓甚至是羞怯。

他们执行作战行动的这片竞技场正是吕宋岛的中央平原，宽约40英里，纵深约110英里。平原从林加延湾开始向南延伸，两边耸立着崎岖不平的山脉。在马尼拉以北15英里处，平原在无路可行的沼泽处逐渐变窄，随后在接近城市外围的地方再次拓宽。尽管麦克阿瑟早就展示过巴丹半岛和位于马尼拉西南的科雷希多岛的防守潜力，但山下还是偏向于将日军的主体撤到东边的山区里。不知为何，麦克阿瑟十分清楚山下的意图，自信到认为无须防御自己的左翼。“进军马尼拉！”他对自己的战地指挥官说，“绕过日本人，越过日本人，挽救你的士兵，但还是要进军马尼拉！解放被关押在圣托马斯的拘留犯！占领马拉卡南宫和立法大楼！”但克鲁格仍深陷在25万日军有可能迫使他的侧翼前哨撤回总部，并切断他与林加延湾之间的联系的噩梦之中。“他担心日军会把他的部队分割成几块”，按照罗慕洛的话来说，“就像切馅饼一样”。克鲁格想要花上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巩固自己的战果，然后再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朝着首都推进。他猜测，首都也应该被日军严密把守着。

将军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说，这正是将祖国的一代花朵毁灭于“一战”战壕中的战术。此外，他还指出（用他的话来讲）：“我正奋战在这片土地上，50年前，我父亲就在这里取得过军事胜利；我本人于战争之初也在这里打响过战役。我清楚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皱褶、每一种地势。”他不明白别动队为什么不能沿着南下的平坦道路快速挺进，穿过水稻田和整洁的小城镇奔赴马尼拉。他相信美军在马尼拉同样不会遭遇太多的抵抗，因为他知道身处碧瑶的那些穿着带刺马靴的将军们心里清楚，首都在战略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麦克阿瑟和克鲁格针对这个问题争执了起来。四星上将克鲁格顽强地用带着德语口音的英语和拥有崇高的维多利亚式反讽语气的将军对质了起来。然而麦克阿瑟从不会擅用职权强迫命令他。萨瑟兰经常怂恿他把克鲁格“送回家去”（因为萨瑟兰想要亲自率领第6集团军），而其他人也不明白将军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将军知道自己这位单调乏味的下属能够平衡他自己的勃勃雄心。若是克鲁格1941年12月就能加入他的队伍，巴丹半岛多半就能为长期围困的局面储存足够的粮食。

尽管将军没有理会第6集团军的战术，却还是控制着整个战略。假若麦克阿瑟从此不再参与任何战役，那么重征吕宋岛就是他担任将职以来最受好评的一役。和曾经如此不信任他的将军相比，宽容的乔治·马歇尔对此简直几近狂热。鉴于民都洛岛行动迫使日本人对美军从南部进军的可能性有所顾忌，马歇尔在提交给战争部部长的正式报告中写道：“登陆行动拦截了每一支行动中的敌军主要作战部队。”紧接着，“山下无力应付麦克阿瑟迅

速移动”以及“他面对欺骗策略时的热切反应”共同“将日军置于绝境”。敌人“被迫指挥自己的军队逐个应战”。通过部署“大部分先头突击部队”保护滩头，麦克阿瑟“立即发动了穿越阿格诺河湾（那里大概应该是日军防御战线的加强据点）朝马尼拉进发的行动”，因此美军“在靠近克拉克机场之前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抵抗”。麦克阿瑟写道：“和在菲律宾别处指挥的战役一样，此处的敌军永远也无法缩短自己的战线和跟上战区日益缩小的步伐。他们无法按照传统的方式有序地撤退，做不到在保持最后防线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向内圈回撤……这是现代战争中独有的状况。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从来没有在谋略上胜出过……导致他们无力在战术上积极为祖国打响最后一仗。”

在克鲁格包围克拉克机场之际，在别处，山下正被美军总司令实施的一系列闪电突击战搞得头晕眼花。随着第6集团军向马尼拉挺进，麦克阿瑟安排了一个军团在巴丹半岛北部西岸的苏比克湾登陆。在没有牺牲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这支远征军夺取了价值无比的奥隆阿波海港。随后，麦克阿瑟又派遣了一个团登陆半岛最南端的马里韦莱斯。在美军的双重包围下，山下的巴丹卫戍部队变得孤立无助、虚弱无力，导致半岛在7日之内便落入了美军的手中。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还派遣一个空降师在首都以南40英里处、马尼拉湾另一侧的纳苏格布着陆。在美军一颗子弹未发的情况下，整座城市实际上已经投降了。

海湾内唯一剩下的据点便是科雷希多岛。1942年，日军为了对抗岛上海岸边负隅顽抗的海军陆战队，丧失了两倍的登陆兵力——约有几千人。如今，因为5 200名士气高涨、弹药充足的敌方守军的存在，科雷希多岛这座堡垒似乎更加坚不可摧。麦克阿瑟派遣了一支空降部队在小岛上层空降，同时又安排了一个营的步兵巧用时机从希金斯登陆艇上一跃而下，突袭驻守在下层岸边的敌军。在苦战10天、损失1 500名日军士兵的情况下，敌军指挥官带领剩余的部队躲进了马林塔隧道，通过引发大规模爆炸自杀了。美军在此役中损失了210名士兵，其中50人是在最终的爆炸中丧生的。这不禁引人猜想，若是征战意大利的美军指挥官是麦克阿瑟而非马克·克拉克，不知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这些都是这位伟大战略家的成就，而这些成就之所以非同一般，原因在于它们并非是将军在自己总部（如今位于马尼拉北部65英里处的打拉）的战况图上摆弄覆盖图层就能完成的，而是他每天早晨像个比自己年轻40岁的男人一样丢下自己的参谋，坐着带有五星的吉普车四处奔波的结果。“总司令想要亲自指挥。”艾克尔伯格写道，“他显然也是这么做的。”威洛比事后写道：“他时常出现在前线（有时是在开战前不久），那不折不扣的身体忍耐力和不计后果、勇于暴露自己的精神总是会让周围的人感到无比兴奋，就连他自己的军队也会格外努力，而这一点对他的敌人来说反倒成了

一种不幸。”在莱特岛上，他只离开过自己的指挥岗位一次，为的是和身处塔纳万的克鲁格商议对策。在这里，他可谓是无所不在，从挖掘散兵坑到装载机关枪弹链，无所不能。他会望着空降兵们从头顶的B–17轰炸机上跳下；在中央平原上他会爬上坦克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巡逻兵；在巴丹半岛上他会冒险奔赴美军战线以外5英里处，希望能够一睹科雷希多岛，还差点儿误遭肯尼手下的战斗机编队炮轰。他笔直地站在敌人的路障前。附近有敌人用南部步枪开火时，一位美国中尉对他说道：“我们会去追击那些家伙，但请你趴下来，长官。我们正遭到攻击。”麦克阿瑟一动不动地干脆回答：“我没有遭到攻击。那些子弹不是冲着我来的。”

1月下旬，麦克阿瑟正在检阅第161步兵团时突然遭到了敌军由坦克领头的反击。美军的战线一下子就垮掉了，是麦克阿瑟亲自把士兵们集合回来。史汀生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给将军颁发了他的第三枚服役优异十字勋章。还有一次，和埃格伯格一起寻找前往克拉克机场的路时，他迷路了。一个蜷伏在树桩后面的美军士兵告诉他们，前方有日军。麦克阿瑟继续一路领先迈着大步，而埃格伯格则不情愿地跟在后面。将军说他们应该寻找一束通信线，然后跟着它向前走就能找到最近的美军战地指挥所。他们在一片甘蔗丛中找到了一些通信线，顺着它的路径寻了下去，结果埃格伯格惊悚地发现那束线比美军所用的纤细不少——结果证实那果真是日军的通信线，因此他们正朝着敌人的总部迈进。医生上气不接下气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可将军要不就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要不就是压根儿不在意，还一脸厌恶地叫了一声：“医生！”走出障碍，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左手边架着的三把霍奇基斯机关枪，好在枪口并没有指向他们的方向。可正当他们瞪着武器发呆时，一个敌军士兵瞥到了他们的身影，用蹩脚的英语尖叫了一声：“嘿，先生！”麦克阿瑟喃喃自语道：“我们最好先退回去。”两人顺势钻回了甘蔗丛中。再次回到美军士兵中间，将军亲切地说道：“今天这事对我有好处。”

还有一次，麦克阿瑟的吉普车在马尼拉北部一座被炸断了的桥梁前停了下来。他本想步行跨越桥梁，却遭到了一位副官的劝阻。尽管如此，将军不久之后便进行了一次被他自己称为“个人侦察”的行动，像个侦察兵一样在敌军把守的城市里侦察了一番，还在视察完马拉卡南宫之后回来做了一次报告，说他相信美军“可以跨过河流，用一个排的力量肃清马尼拉南部”。话虽有些夸张，但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依旧留守首都的日军只会象征性地反抗一下。正如麦克阿瑟预测的那样，山下把自己的军队从城市里撤了出来，宣布“共和国的首都及其守法的公民不应遭受战争的蹂躏”。美军高级军官们纷纷接到了麦克阿瑟的总部发来的通知，说“一场香榭丽舍大道规模的盛大胜利游行”正在计划当中。

将军希望自己能于1月26日凯旋，进入这座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城市，顺

便庆祝自己的生日。不过他的参谋们却认为这一计划不太现实——与此同时，藏匿山中的山下将军的参谋们相信，要想让10万名美军通过两条主要高速公路涌进吕宋岛，肯定会短暂地耽搁一段时间。1月27日，艾克尔伯格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我军损失轻微的情况下，如果日军不再像之前那样负隅顽抗，对我们的总司令来说就是巨大的胜利。"2月3日星期六晚上6点，第1骑兵师的巡逻兵进入了市区范围，3天之后的星期二，麦克阿瑟在战报中宣布："我们的军队迅速将敌人从马尼拉清除了出去。我们的纵队会合后……进入了城市，包围了日本守军。他们的完全覆灭指日可待。"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科廷和史汀生都给打拉方面发来了贺电。星期三，莱希告诉总统，将军已经到达了首都外围，解放了美国战俘。星期四，艾克尔伯格写道："老大很有可能可以在接下来的三四天之内进入市区。"两天后，他写信告诉妻子："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意外地收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邀请，参加了正式进军马尼拉城的仪式。"2月1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从菲律宾发来的美军捷报：《胜利！Mabuhay！》——"Mabuhay"是他加禄语"万岁"的意思。《新闻周刊》也在同一天刊登了文章《太平洋战争的奖励，马尼拉如熟透的李子坠入麦克阿瑟手中》。

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美国民众不清楚事实——将军的审查官不允许记者们揭露这则胜利战报中的谎言，但首都其实是在一个月之后才被攻陷，且当时也没有举行什么香榭丽舍大道式的游行。"我理解艾克尔伯格在2月21日写到的'盛大游行被取消'是怎么回事。这样的陈述本身就保守得令人震惊。事实上，游行是根本不可能的。每条街道上都布满了碎石瓦砾，排水沟里还流淌着鲜血。"马尼拉惨遭破坏可谓是"二战"中最大的悲剧之一。在战争年间的所有同盟国城市中，只有华沙的状况比这里还要糟糕。马尼拉70%的设施、75%的工厂、80%的南方居住区以及整个商业区全都被夷为平地。近10万菲律宾人惨死在日军的手下。日军把病人绑在病床上，还放火烧毁了医院。男性的尸体会被阉割，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性在被杀害之前都会惨遭强奸，婴儿的眼球会被挖出，并像果冻一样被涂抹在墙上。脑力劳动者和白领阶层等中产阶级的遭遇最为惨烈。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战前寡头阶级的幸存者主要是和山下一起安然无恙地躲藏在碧瑶的劳雷尔傀儡政府成员。

麦克阿瑟将大屠杀的罪名归咎于日本将军，但日军的罪行其实不止于此。山下的勤务兵撤进山区之后，岩渊三次少将手下就只剩下约3万名日本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司大川内传七中将的指挥下，这位少将摧毁了所有海港设施和海军仓库——他要么是没有收到山下早先宣布首都不设防的消息，要么就是选择了把它当作耳旁风。一旦岩渊下定决心守卫马尼

拉，便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暴行。战火燃烧的时间越长，日军的指挥结构就越恶化，直到日本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军装上都浸透了菲律宾人的鲜血。

美军与日军短兵相接，一个个房间、一个个衣橱地挨个搜索。敌军的幸存者撤回了马尼拉的老城区王城之内，躲在了40英尺厚、25英尺高、在近4个世纪中屡次经历地震却仍屹立不倒的城墙后面。麦克阿瑟拒绝了肯尼提出的空袭王城的激进提议，他说他不允许在众多无辜平民仍被困城中时使用俯冲轰炸机，尤其是不能投掷凝固汽油弹。将军此举引发了荒谬的流言。“一年后，”肯尼写道，“有人告诉我，美国本土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大家心里都清楚，麦克阿瑟之所以宁愿牺牲我们的军队也不允许轰炸和破坏王城是因为他在那里拥有许多的房产……可麦克阿瑟在菲律宾从未拥有过一寸房产。”无论如何，将军批准了使用重型火炮，结果惨不忍睹到让人不禁怀疑他为什么阻止了肯尼——反正结局大同小异。最终，他的炮弹在高耸城墙的西北角轰开了一道缺口，可更加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

麦克阿瑟并未料到自己会在火光冲天、支离破碎的首都遭遇如此疯狂的防守，不免怒火中烧。夺取马尼拉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个执念。当严阵以待的敌军无视他反复招降的呼吁时，他变得更加焦虑狂躁了。按照他的战地指挥官们手头的战术来看，他所能做的可谓寥寥无几，于是他告诉部下自己想要见见战俘、拘留犯和菲律宾人。他先行探访了刚刚被解放的比利比得监狱和圣托马斯监狱。在圣托马斯监狱里，他被一大堆哀怨啜泣、衣着褴褛的瘦削男子围了起来。在比利比得监狱，许多犯人根本就不屑于立正站好。麦克阿瑟事后写道：“他们闷不作声，仿佛是在接受检查一般。我向下望去，看着那些留着大胡子、浑身脏兮兮的人……他们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肮脏衣裤，脚趾从仅有的破鞋子里露了出来，憔悴的脸上写满了苦难与折磨。这就是被我丢在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上剩下的士兵……当我缓慢地走过这些骨瘦如柴、备受折磨的人排成的纵队时，一种喃喃自语的声音伴随着我，仿佛是有人在对我耳语道，‘你回来了。’或是，‘你做到了。’……我只能回答，‘我来得有点儿晚了，但终究还是来了。’我又去视察了棚屋的外围，环顾着那些对里面的人来说已经不再重要的垃圾：他们吃过的罐头、喝过的脏旧水瓶。光是看到那些东西就让我觉得恶心。”

他对埃格伯格说：“医生，这让我很心烦。我想要向前推进，直到我们遇到火力阻击为止。我说的可不是狙击手的阻击。”（医生解释道：“他很看不起狙击手。”）在拉里·莱尔巴斯和菲律宾人安德烈斯·索里亚诺的陪同下，他们循着大型枪械的声音走了过去。在转角处，他们遇到了一辆安静的卡车，里面满是已然僵直的日军士兵的尸体——全都是火焰喷射器的受害者。紧接着，他们又经过了一支蹲在掩体后的美军步枪小分队。士兵们全都抬头望着他们，仿佛他们一个个都是疯子似的。在帕西格河畔，他们

路过了圣米格尔啤酒厂。索里亚诺的家族正好是啤酒厂的主人。躲藏在酒厂里的工人们向外张望时看到了他们的军装，喊叫着提醒他们这里是日军的区域，让他们最好赶快撤离。他们很快便认出了索里亚诺，于是邀请麦克阿瑟一行人进门（战争中的某些瞬间就像是迪伦马特剧中的画面），还为他们端上了几杯啤酒。将军把平底玻璃杯举到了嘴边，一饮而尽，说他还想再接近敌人一些。在王城的边缘处，他们在城墙下停下了脚步。头顶上的一名日军军官正用双筒望远镜俯视着他们。麦克阿瑟分开两条腿，用双手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屁股，回瞪着他，直到对方移开了目光。在继续沿着城墙前进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更加猛烈的阻击炮火。医生开始细数着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子弹数量，数到28时才停了下来。一位美军士兵从地下室里蹦了出来，警告他们前方有机关枪。机关枪开始连发时，麦克阿瑟转过身缓缓地走开了，每一步都迈得很刻意，似乎是在考虑自己是否要冒险。返回掩体中，埃格伯格再一次问起将军为什么要无谓地暴露自己。“这算不上太危险。”将军回答，“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神枪手，只不过是心怀恐惧的后卫部队而已。他们射击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就没有端着枪好好地瞄准。见鬼，医生，”将军边说边咯咯地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瞄准我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击中你。”埃格伯格转过头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驱车一小时回到位于马尼拉北部、由制糖厂改建而成的临时总部里，麦克阿瑟决定加入第37师的巡逻队，重返马尼拉酒店的顶楼套房。那里如今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据几个菲律宾餐馆杂工汇报，套房完好无损，有可能是被琼当作护身符留在那里的两只日本天皇的花瓶起了作用。将军被酒店里的机关枪炮火拦了下来。“突然间——”他后来写道，“顶楼套房燃起了熊熊大火。他们把它烧掉了。我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心里的滋味，只能看着我精美的军事图书馆、纪念品和毕生积攒的个人物品全都毁于一旦。”他带着一队手持冲锋枪的士兵爬上了楼梯。“每爬上一座楼梯平台都要经历一场战斗。”他写道，“顶楼套房里除了灰烬什么也没有留下。这里显然是后卫战斗的指挥所。我们把日军上校的尸体留在了还燃着余烬的门槛上，任由花瓶的碎片……散落在他的头和脚边——当作他寒酸的裹尸布。负责指挥这支巡逻队的年轻中尉，手里举着还在冒烟的枪，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对我喊道，‘干得好，总司令。’在我看来，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好的地方可言。我正品尝着目睹深爱的家变得满目疮痍时嘴里酸涩的味道。”

一位跟随麦克阿瑟的副官在爬上最后一段楼梯时释然地做了一次深呼吸。“楼梯越高，尸体就越温暖。”这位副官解释道，“我生怕他们当中谁可能只不过是受了伤，或是在装死。”跨过敌军上校的尸体，副官绕着仍在燃烧的大钢琴的余烬走了一圈，迈进了残破不堪的套房里。“书籍仍旧摆放在书架上。”他回忆，“你能够从书脊上看到书名，但只要你伸手去触碰，它们就会一下子变得支离破碎。后来，在虎克党人和老殖民地（越

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问题上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想起那个画面，仿佛战前的亚洲正在我们的眼前土崩瓦解。我想将军当时也应该有类似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他在马拉卡南宫的仪式上显得如此沮丧的一个原因。”

同酒店与“墙上屋”不同，马拉卡南宫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这还要多亏它远离中央区的地理位置。2月27日上午11点，在王城日军驱逐战仍在继续时，麦克阿瑟迈进了铺着红毯的宫殿大堂，正式将收复后的首都交还给了奥斯梅尼亚、罗慕洛、索里亚诺和其他在战争中幸存的忠诚菲律宾官员。他说：

> 自从我将军队和设施撤离这座美丽的城市起，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多——那是一段充满了苦涩、挣扎与牺牲的岁月。我之所以那么做，是为了遵循战争的规则，让这座不设防的开放城市连同它的教堂、纪念碑和文化中心能够躲过暴力的军事掠夺。但我们的敌人并不这么想。那些我想方设法去保护的东西都被深陷绝境的敌人无谓的绝望行动摧毁了——但这些恣意燃烧的灰烬也注定了他们在未来终将灭亡……此时此刻，总统先生，我代表美国政府庄严宣誓，以这里为首都，宪法赋予共和国的全部权利与责任将按照法律的规定得以恢复。至此，你的国家将再次以自由国家一员的荣誉身份追求自己的命运。尽管你的首都遭受了残酷的惩罚，却重获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成了东方的民主大本营。你不屈不挠的……

将军的声音颤抖了。他把脸埋在两手之间啜泣起来，然后很快举起衣袖擦了擦眼睛，断断续续地总结道：“带着谦逊和虔诚的感恩之心，我们感激上帝将决定性的胜利送入我们的怀中，我要求在场的所有人起身和我一起背诵一段主祷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别人看来，这似乎是属于我个人的胜利时刻和不朽宣言，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我整个身心所遭遇的灾难的高潮。看着我的士兵们为此送命，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死去了。”

3月2日清晨6点，将军的心情明快了起来，率领“巴丹党”和其他高级军官们登上4艘鱼雷快艇，返回了科雷希多岛。巴贝上将听到他轻快地对年轻的舵手说道：“那么，这是第373号快艇。我是乘坐第41号快艇离开的。”靠近北码头时，肯尼发现小岛“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随着重型炸弹在山顶上炸开了花，就连山上的景物都变了模样。”目睹了这番情景的麦克阿瑟开口说道：“先生们，科雷希多岛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堡垒固若金汤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上岸后，夺取该岛的军队指挥官乔治·M. 琼

斯上校潇洒地敬了一个礼说道：“长官，科雷希多岛堡有请。”将军把一枚服役优异十字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答道：“我看到老旗杆还屹立在那里。让你的部队把军旗升到顶端，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把它拽下来。”紧接着，将军又歌颂了一番岛上原先的守军：“长期的挣扎让同盟军积蓄了力量。如果没有这座岛屿的坚持，澳大利亚就会沦陷、产生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今日的胜利同样属于那些逝去的军队。”

返回被夺回的马尼拉，还有一些不那么崇高的责任在等待着麦克阿瑟。城内的美军中间爆发了一种性病传染病，埃格伯格建议将军考虑将首都设为禁区，严禁其他美军部队进入。麦克阿瑟沉思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道：“医生，你已经看到马尼拉和其中的那些废墟了，也意识到这里的人民是多么穷困潦倒了。你看到了街道上没有几家商铺在售卖东西，也看到了我们的士兵。没错，他们中有些人想要去眠花宿柳，但我敢说他们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要进入一个菲律宾家庭，感受一下再次回家是什么感觉。这些人是经历浴血奋战才从雨林赶到马尼拉的。如今你却让我禁止他们踏足这里……不，我是不会把马尼拉设为我军禁区的。除此之外，你手里也有一些能治那种病的良药，不是吗？”

美军士兵和平民们合力清理干净了道路上的碎石瓦砾。3月13日，鲍尔斯中士注意到：“城市里到处灯火通明。”不过，四面八方通往首都的道路全都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将军乘车外出，视察了拥堵情况最为严重的一条道路。一位军官问道：“你为什么不下令每日只留半天时间供平民使用这条路，好让我们的护卫队能够向前挺进呢？”麦克阿瑟又摇了摇头：“看看那些朝着我们涌来的人群吧。你能在他们的脸上看出焦虑的神情，有些人甚至还一脸慌乱。难道你感觉不到他们正在逃离某些可怕的东西吗？也许他们的房子被烧着了，因此他们只想远离那可怕的战争。再看看道路另一边的那些人。他们或是背着些什么，或是推着这些什么（两轮运货马车或是自行车），或是在拉着些什么，总之手里装得满满的。我敢打赌，你在每一个包裹里都能找到食物。那些人是出来采购食物的——或是给他们挨饿的亲人买吃的。在战争的恐惧沉重地打击我们、让情势变得更加不利之前，我是不会去干扰这些无辜民众的。”

被麦克阿瑟否决的第三个提议是讨伐虎克党人——那些驱逐地主、在吕宋岛中央建立农业委员会的人。他告诉自己的部下：

> 打拉标志着糖料经济与稻米国家之间的界限。打拉以北的人们种植稻米，其中大部分人都拥有一小片土地。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里有多少座学校？有多少人衣着整齐、面露幸福、看上去十分富裕？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可怜的人们全都满脸怨恨、衣着褴褛，连看上去都是脏兮兮的？打拉以北就相当于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拥有小地主、接受教

> 育的机会等与之相配的社会元素。而这里的土地大部分归属于马德里人、芝加哥人或其他身处遥远地方的人。如果有人在这里拥有一小片土地，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甘蔗拿到糖厂去加工。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在外业主所有权”。没有尊严，没有太多的学校——政府也不怎么参与。这正是让他们变得完全绝望的地方，也正是虎克党人应运而生、蓬勃发展的地方。他们告诉我，虎克党人主张社会主义，属于革命的一群人，但我无心去追逐他们。如果我在那些甘蔗地里劳作，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虎克党人。

在理论上，麦克阿瑟是高尚的，甚至是慈悲的。作为一个仁慈的独裁者，他同情农民，痛斥外居的地主，认可社会立法——当然是在这些法规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前提之下。然而，若是那些压迫者是他的朋友，他的立场就不太一样了。如今，他正面对着通敌卖国者的问题。他与奥斯梅尼亚之间的疏远以及无法“与其合作”的自我感觉进一步加深了局势的复杂性。毕竟奥斯梅尼亚是共和国的总统。然而，在塔克洛班时，将军总共只拜访过奥斯梅尼亚4次，而对方却拜访过将军13次。早在荷兰迪亚时，麦克阿瑟就曾告诉过一位反间谍活动的官员：“我要把应付通敌叛国者的事情从菲律宾政府手里抽出来，交给你来处理。”奥斯梅尼亚十分倚赖自己与罗斯福之间的关系，在看待那些任由日本政府摆布的菲律宾人时，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观点是一致的。罗斯福4月初离世的消息让奥斯梅尼亚感到十分震惊。飞抵华盛顿时，奥斯梅尼亚发现官员们个个都忙得顾不上见他，而新总统也只是模糊地带过了有关菲律宾的话题，并决定让麦克阿瑟去处理那里所有的问题。

与此同时，身处碧瑶的傀儡官员们对麦克阿瑟扫荡行动的胜利感到十分沮丧，于是绝望地求助于山下。3月19日，劳雷尔和其他三名官员经由台湾飞往了东京，其他人则被留下自谋生路。4月中旬，在第33师的美军士兵靠近夏都时，罗哈斯、三名傀儡政府的部长以及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审判长进入了美军的战线。麦克阿瑟听说后立即派出一架飞机前去迎接罗哈斯。在马尼拉，他拥抱了罗哈斯，并安排战时新闻处出版的报纸《自由菲律宾》派编辑撰写了一篇题为“罗哈斯加入解放阵营，四名内阁副手被捕”的报道。报道声称：“四名菲律宾通敌内阁成员已被抓捕。出于军事安全考量，他们将在战争期间被囚禁，之后转交菲律宾政府审判。”在描述与这些内阁成员同行的罗哈斯“出逃”的过程时，该报道所用的措辞可能会让哈里·胡迪尼和《古堡藏龙》里的人都分外眼红。看到一位参谋在读到罗哈斯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描写时扬起了眉毛，将军解释道，这是因为罗哈斯曾经帮助过游击队。但其他几个也曾向游击队伸出过援手，事实上，但凡是拥有深谋远虑的人都会采取这样保险的行为。拒绝别人劝阻的麦克阿瑟让这位朋友重新穿上了军装，还恢复了他准将的军衔。一位副官援引了麦克

阿瑟一个月前发表的《第20号将军令》中的话，提出“任何曾接受或执行过日军或所谓的‘菲律宾共和国’指派的任务的人都不能留在菲律宾军队中”，牧师和医生除外。罗哈斯显然既不是牧师也不是医生，所以麦克阿瑟把他归入了后备名单中，为自己开展反对奥斯梅尼亚的活动打下了基础——这也正是罗哈斯所期待的。罗哈斯家族运营的马尼拉《每日新闻》又开始出版了，每天都会报道将军为他免罪的故事，通常都在宣称罗哈斯的“权威显然已不亚于陆军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这一次的破例之后，麦克阿瑟撤销了对所有卖国贼的检举。一位由国会派驻马尼拉的官员向华盛顿方面汇报：“自由主义者、游击队队员和反通敌叛国者们对此耿耿于怀。”正如76岁的埃米利奥·阿奎纳多事后所说的那样：“罗哈斯成了那些面临叛国罪指控的人（其中不乏强大的政治领袖）心中的希望。”如今，被关押在监狱里的5 000余名涉嫌变节的内奸知道了他们在法庭里还有一位朋友。与此同时，奥斯梅尼亚的处境更糟了。麦克阿瑟控制着美国为群岛提供的价值几亿美元的扶贫攻坚计划，而国家在向和平阶段过渡过程中发生的所有问题却被菲律宾人全都怪罪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头上。重建工作中，坎坷是不可避免的。举个例子来说，将军鼓励奥斯梅尼业告诉菲律宾士兵，他们每个月都能收到50比索的补发工资，可五角大楼方面却把这笔钱削减到了8比索，以至于士兵们都感觉自己受到了总统的误导。

奥斯梅尼亚从那些远离日军的人中选拔组建了一支内阁队伍（他们全都是游击队领袖，没有政府工作经验），从而疏远了寡头阶级中的老朋友们。然而，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在缺乏公务员的情况下管理这个国家。他们中许多人的名誉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因而遭到了变节的指控。战前精英阶层的富有家庭意识到罗哈斯才是自己那些被控有罪的亲人返回政坛的救命稻草，纷纷不惜重金为他参加竞选筹集资金。虽说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曾参与过抗日，但更重要的还是对于阶级的忠诚。索里亚诺就是其中的一员，兄弟遭日军处决的华金·埃利萨尔德则是另一个。为罗哈斯正名之后，麦克阿瑟并没有就此罢手。为了表现出自己非凡的姿态，他前往巴拉望的一座监狱探望了一些老朋友——战前的菲律宾高官，如今却被控诉协助入侵者。麦克阿瑟向其中的好几个人保证，自己相信他们都是误会的受害者，且这些误会很快就能化解。的确，就像罗哈斯的复出一样，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1941年秋，共和国国会通过选举成立了，而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也随之爆发。虽然大多数的当选者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劳雷尔政府效命过，但若是没有他们的参与，国会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法定人数。奥斯梅尼亚想等遭到指控的人都接受审判之后再召开会议，否则，他表示，立法豁免权将使这一切成为笑柄。罗哈斯强烈反对延迟，他告诉奥斯梅尼亚，作为总

统，奥斯梅尼亚没有选择，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让他们就职，然后再由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同僚有没有罪。麦克阿瑟对此表示赞同，而奥斯梅尼亚也只好屈从。事实上，问题就此结束了。凭借劣迹斑斑的同僚们投出的选票，罗哈斯当选为参议院的领袖。坐在联席会议上，两个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表达了“菲律宾人民对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英勇之师为解放菲律宾所做努力的深切感激”。麦克阿瑟告诉他们：“在没有过度摩擦的情况下行事对你们来说是绝对有必要的。不能允许争风吃醋、自私自利和无谓的误会阻碍国家的进步，分裂国家的统一。”他们把麦克阿瑟的意思理解成了“既往不咎”——在很难想出其他办法将日本人赶出林加延河谷的情况下，立法者下令解除了囚禁他们亲友的军人监狱。春天结束之前，寡头政治大家庭的领袖们就能自由自在地监督自己在首都圣梅莎富人区里的高楼大厦展开重建工作了。

2月21日，战前马尼拉最活跃的女主人琼在布里斯班登上了一艘名为“哥伦比亚特快”的冷藏船，开始了为期14天的返菲之旅。跟随她一起登船的有她7岁的儿子、儿子的广东保姆以及邦纳·费勒斯——他是专程飞抵澳大利亚护送他们返回这座仍被他们称为“家”的城市的。所有人都感觉格外激动，琼更是如此。她已经有4个月没见到自己的丈夫了。没有他的生活是那样黯淡无光、了无生趣，总是让人感到心烦意乱。诚然，正如她一开始就指出过的那样，自己的日子比大多数士兵的妻子要强多了。12月23日，她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里还是老样子，除了布里斯班（就美军所知）已经几乎成了一座鬼城。伦农酒店早就没有任何老面孔出现了，大堂里如今满是平民，让人感觉似乎有些奇怪……我终日里忙着照顾阿瑟，安排他的日程。随着圣诞节的到来，我还有许多事情要为他做。我阅读了许多报纸，试图把剪报按顺序整理好，打包装箱。所以你看，尽管我的日子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却还是觉得缺了点儿什么似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将军分开。”

登船5个星期以前，她给将军写去了一封信：

亲爱的老板先生：

为了你的生日，我给你送去了我所有的爱，希望它能在你身边形成一层保护——我爱你超过你的所知——愿我们还能够平静地共度你的更多个生日。

上帝保佑你！

麦克阿瑟无论何时有空都会回复她的来信。2月16日进攻酒店之前，他告诉她：“酒店的建筑仍旧完好无损，只不过还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已经找回了我们所有的银器。它们都被转移到了马拉卡南宫附近的沃森大厦里，显然差点儿被运往日本……耐心点儿。爱你，麦克阿瑟。”顶层套房被烧掉之后，他们留在那里的财产也被付之一炬。“别为失去它们而太过忧虑。这对我们的军旅之家来说是个合适的结局。”这话只不过是小小的安慰，不过有关那些银器的消息都是骗人的，琼再也看不到她或她母亲留下的那些盘子了。将军在信中提到的是自己的银器。这还要归功于一位机智的菲律宾园丁在马尼拉某日军官员的家中找到了这些东西，才使它们失而复得。看到这个园丁在走廊上搬运刻着“阿瑟·麦克阿瑟”字样的匣子，那位日本官员鬼鬼祟祟地解释道，匣子里装着的是麦克阿瑟父亲的骨灰，亟待被送往东京举行葬礼仪式。后来，园丁偷偷看了看里面的东西，把匣子埋了起来，直到美军反攻时才再度挖出来。就在匣子失而复得几天之后，将军又遇到了一桩好事。美军在海滨的一个仓库中找到了另一个标记着“医疗用品——运往东京”的盒子，里面装着将军的茶具、枝状大烛台和银菜碗。加上他在酒店地下室里存放的一套《剑桥近代史》藏书以及从科雷希多岛上找回的帕卡德豪华轿车，这就是他剩下的所有私人财产了。但他的妻子什么也没有。

在“哥伦比亚特快”号上，琼借来了几床海军床单。3月6日星期二，就在这座城市被宣布进入安全状态的第二天，她在船只进入马尼拉海港时把床单抱在了怀里。鉴于所有码头都在岩渊将军的爆破小组手下惨遭破坏，将军是带着三名副官乘坐一艘希金斯登陆艇登上冷藏船的。此时距离这个小家庭分别已经过去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麦克阿瑟动情地久久紧拥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他们靠岸时，几百架美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刚好排着队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琼本能地畏缩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问肯尼：“看到我们的飞机是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上一次我在这里时，天上还全都是日本人的飞机呢。我们可没空好好地看着它们，都在奔跑着寻找掩体。但是乔治，你把科雷希多岛怎么了？我们经过那里时，我几乎都没有认出它来！它看上去仿佛被你削低了至少40英尺似的。”肯尼承认海中的这座小岛看上去的确是矮了不少，但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的士兵在夺回这座岛屿之前在上面投下了4 000吨炸药。

他们在熟悉的地标留下的废墟附近转了一圈——顶层套房、维多利亚大街1号、圣托马斯、陆海军俱乐部、麋鹿俱乐部、大学俱乐部、高级专员宅邸和军事广场。琼感到很震惊，觉得自己曾经深爱的城市看上去就像是一片宽阔的墓地。她不知道他们将在哪里生活。当天晚上，他们和奥斯梅尼亚一家共进了一顿晚餐。就在他们准备上床睡觉时，首都外某处的155毫

米长射程大炮正开始轰炸一处敌军所在地。失眠的琼起身在地板上走动起来，吵醒了丈夫。在他的安慰下，琼开口说道：“我不知道阿瑟正在做什么。”她走进儿子的房间，发现小阿瑟正坐在床沿上睁着眼睛、浑身发抖。他问母亲：“那些是不是我们的枪，妈妈？”得到母亲的保证之后，他才放松地躺了回去，一下子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的气氛就好多了。肯尼搬进了一座名为“卡萨布兰卡”的宅邸里。这座位于马拉卡南宫以东的宅邸属于马尼拉最富有的汽车经销商巴克拉克，距离河畔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宅子里配备了一个游泳池和一间桑拿浴室，周围还环绕着美丽的花园。在他向麦克阿瑟描述了宅邸的情况之后，将军消失了几个小时，回来后告诉他：“乔治，我对你做了件卑鄙的事情。我偷了你的房子。”肯尼表示他早就料到了，还说自己从未忘记过自己在莫尔兹比港总督府里的房间被他偷用的事情。很快，肯尼也消失了，返回后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新的家：“一个比你的房子更好的地方。”麦克阿瑟打起精神问道：“在哪儿？”肯尼回答：“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才不会重蹈覆辙呢。”将军说：“哦，得了吧，告诉我它在哪儿。稍微给我形容一下。”肯尼只愿意告诉他，那里的厨师曾是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的主厨。“哦，我真傻！”麦克阿瑟嫉妒地回答，“我为什么就不能再等一会儿，拿下那座房子呢？”不过“卡萨布兰卡”对于琼来说已经很完美了。曾在某天夜里首次探访那里的艾克尔伯格在白天的一次重访之后，写信给妻子赞叹道：“他们的房子甚至比我能想到的还要漂亮。”

在另一封信中，艾克尔伯格写道：“你的莱文沃思老朋友‘很担心萨拉’。他说他感觉‘萨拉’邀请家人前来团聚这件事是其职业生涯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这‘有可能会遭到专栏作家的恶意利用’。他说自己在质询‘萨拉’的时候被‘她’赶了出来。”鉴于萨瑟兰的不伦举动，他是最不适合和将军提起这个话题的。但事情总要有人开口。作为西南太平洋战区唯一一个能够携带亲眷的美军军官，这位战区指挥官必然会惹来士兵们的反感。麦克阿瑟一家也认识到自己有必要谨慎行事，除非类似路易斯·蒙巴顿勋爵这样的贵客到访，他们从不举办晚宴派对。住在沃森大厦里的战地记者们得知，琼的到来是为了“尽可能帮助照顾被拘留者，辅助城市的复兴和居民的康复”。

这话并不完全是谎言。琼最初拨打的一个电话的确是拨给圣托马斯军人监狱的。她事后回忆：“驶过大门时，我看到了那些人的状况和他们身上褴褛的衣衫，心中一下子对自己的衣着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于是我让司机停下，飞快地摘掉了自己的帽子和手套，但其他的我就无能为力了。”她在被拘留者的营地和医院里转了转，替一些自1942年年初就无法联系外界的人给家属写去了几封信，还温和地催促自己的丈夫代表失去家园、饥肠辘辘的菲律宾人进行干涉调停。不过，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丈夫

和儿子更为重要。当将军从总部返回家中时，她总是等在卡萨布兰卡宅邸的大门口，而且仍旧会和阿秋一起理直气壮地阻止将军宠溺阿瑟。

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麦克阿瑟还是家中那个最宽容的家长。哪怕这孩子有一瞬间的不开心，他的父亲就会面露不悦。父亲送给他一只小狗。一天，将军的车在驶上宅邸前的环形车道时撞死了那只小狗。男孩很伤心，可最受折磨的是麦克阿瑟。他给孩子买了一只新的宠物，还把通往车道的铁门锁了起来，并安排了站岗的哨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汽车进入。第一个测试这个规定是否有效的人是肯尼。哨兵面对他车子的前保险杠举起了步枪。“看看这里，”肯尼和蔼可亲地抗议了一句，“我肩膀上有四颗星呢。”可哨兵还是拒绝站到一边，以至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走到车道上，车子才得以放行。

阿瑟在布里斯班时一直都是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的。琼希望他能够入读马尼拉的公立学校，可所有的学校建筑都被夷为了平地。她的一位朋友（其丈夫曾在科雷希多岛上战斗过）向她推荐了一位战前曾在碧瑶某私立学校教书、后来遭日本人软禁的英国女教师。她的名字叫作菲莉丝·吉本斯。家人都唤她为“吉比”。订婚后的吉比将陪伴他们在战后的东京度过几年居留的时光，鼓励小阿瑟发展自己的音乐天赋，特别是他对巴卡拉克钢琴曲的爱好。不过，小男孩人生中的主导人物必然还是他的父亲。在家人到达之前，麦克阿瑟日夜都在吕宋岛上四处奔波。如今，把总部迁进马尼拉市政厅之后，他有了规律的上下班时间，于是总是早早下班，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候陪陪孩子，和他玩捉迷藏，教他进行密集队形操练，给他讲《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话》。

有助于我们认识麦克阿瑟复杂个性的一些最具启发性的片段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很久以前，阿瑟总是被其他远离子女的军官当作吉祥物或自己儿子的替代者。如今，他们对小阿瑟的认识也在日益加深，因为他很快就会开始发展自己独立的个性。为了猜测他的父亲是否有可能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也会在私下里谈论将军的性格特征，而其中有些人的观察尤其细致入微。比方说，他们猜测这孩子也许展现出他父亲身上的矛盾特质。麦克阿瑟是个可敬的人，却无法让人相信他能够信守诺言。他非常注意个人卫生——在马尼拉沦陷之际，还坚持要召唤一位战前相识的71岁菲律宾理发师来为他理发。可他那顶著名的帽子和身上的军装看上去却是破破烂烂的，因为他无法下决心丢掉自己的旧衣服，只好命勤务兵把它们拆开之后拼接在一起，而不是去买一套新的。

实际上，任何曾和将军相处过的人都会认同他拥有非凡的头脑。据约翰·冈瑟报道，3月10日，战时情报局的罗伯特·舍伍德在与将军相处了三个小时之后也变成了他的拥护者：“麦克阿瑟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将军已将日本政府何时会发起进攻的细节研究到了极致。他的设想是如此

精妙、明了、大胆，以至于舍伍德心中认定，无论军事圈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应该给将军一个机会充分落实其宏伟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在眼下看来难免有些荒唐）。”此外，麦克阿瑟还告诉舍伍德：“战胜日本将允许我们给亚洲的未来带来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用帝国主义的方式或单纯出于商业利益来施加这种影响力，就会失去自己的黄金机遇；但若是按照基本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作用与实力，那么美国与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就能延续到遥远的未来。”将军还与另一位来访的客人詹姆斯·V. 福里斯特尔讨论过即将到来的据日问题。福里斯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他相信，能够被美国用来反抗共产主义改革运动的两个伟大思想便是自由和基督教精神。”福里斯特尔认为，将军的“高等职业能力让步给了他的敏感和自负”。

冈瑟注意到：“麦克阿瑟的专横正随着他的参选进程与日俱增。”将军身边的大部分军官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骄纵他，想象不出他还有哪里可以改进。然而有些人对此却抱持着十分保守的态度。和他在许多方面都颇为相似的艾克尔伯格认为他是个“古怪的天才，身上的众多品质成就了他的伟大”。艾克尔伯格告诉妻子：“毫无疑问的是，他拥有不少能够引起女性好感的幽默之处……只要他有能力，就不愿让任何其他的‘男演员’走上舞台接受掌声。他顽固不化，而且有可能越老越糟糕……但重要的是老大一直都在获胜。就为了这个原因，不管他会长出犄角还是尾巴，我都愿意支持他。”艾克尔伯格总结道，他“真是个怪异的个体”。

鉴于麦克阿瑟非凡的影响力（就连他身边的年轻军官都会模仿他的行为举止，边踱步边说话），他的优点、短处和怪癖都在影响着整个参谋部。在胜利攻下荷兰迪亚、莱特岛和吕宋岛之后，其他指挥官的总部都洋溢着一种欢欣鼓舞的氛围，可麦克阿瑟却还在觊觎战线后的对手，正如他无法遏制在前线打胜仗的需要一样。他和副官们依旧感觉自己像是同盟国的难兄难弟，而活跃在其他同盟国首都的阴谋力量也还在继续破坏他们。舍伍德认为，当自己把布莱德雷手下的美军攻下战略重地雷马根大桥的消息告诉威洛比时，自己是在传达一个好消息。不料威洛比却简略地回答：“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在乎欧洲发生了些什么。”舍伍德向罗斯福汇报：“麦克阿瑟手下的人显然在工作中患有被迫害妄想症。只需听一听参谋官们的谈话，就会让人以为战争部、国务院（甚至连白宫也包括在内）都处在‘英帝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控制之下。”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舍伍德遗漏了将军一直十分怨恨海军部的事情。尽管海军为麦克阿瑟的登陆行动提供了支持，他还是残忍地拒绝了五角大楼的指令，不愿派遣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战舰前去协助尼米兹进攻冲绳，正如他反对派遣70艘货船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备那年春天击溃希特勒的那条“令人震惊的命令”之需一样。

雅尔塔会议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麦克阿瑟的棘手之处。在他攻打王城时，各国元首及其顾问在克里米亚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日后，雅尔塔会议将使罗斯福遭受最为严苛的批评，但在当时看来，他和丘吉尔从斯大林那里获得的让步超出了任何人抱有的期待。罗斯福秘而不宣地同意加入抗日联盟。作为回报，苏联将在远东获得中国东北、千岛群岛和朝鲜的某些特权，还要承认蒙古国自治。除了千岛群岛之外，没有什么是苏联人不能自由拿取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让总统和首相满足市场的一切需求。他们和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战区指挥官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不高兴。事实的确如此。2月，一位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发言人的军官告诉战地记者，苏联对日军发起的进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等到苏联军队承诺采取行动之后再进攻日本”，且“必须不惜付出一切努力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结束与将军的商讨之后，新任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实力保存下来对付日本本岛，征战东京平原”，而“这一点在日军受制于与苏军之间展开的激战之前是不能得到保证的”。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打算进攻日本”，就“必须劝说（苏联）派出60个师的兵力进驻中国东北”。的确，麦克阿瑟也用同样的措辞向五角大楼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呼吁。鉴于苏联在远东战争中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参谋长们建议罗斯福应允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大部分要求。

此情此景之下，这样的决定对于所有同盟国的领袖来说似乎都是合理的。距离测试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只有几个月了，但没有几个人相信这种武器能够成功。在战争爆发之际，陆军、海军的将领们就低估了日本人，而此刻却有些过于重视对手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敌人已经跪在了地上，因此他们并不需要苏联人的帮助。麦克阿瑟错了，而其他人也没能正确地审时度势。正如菲利普·拉福莱特敏锐地注意到的那样，将军和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10年之后，当成为保守的共和党人的偶像时，他评价雅尔塔协议是“异想天开”，指责“从没有人征询过我的观点和评价”，还说如果让他担任会议的顾问，他“多半会断然反对到了这个时候还劝苏联参战”。

麦克阿瑟在撒谎，而他的谎言也带来了讽刺性的转折。雅尔塔会议结束之后，如果说谁有权感觉自己受到了凌辱的话，就当属被麦克阿瑟欺骗了的联席参谋长们了。在克里米亚召开会议期间，他们告诉英方，他们没有计划收复菲律宾其他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乔治·马歇尔表示，他猜测“菲律宾游击队和最近活跃起来的菲律宾共和国军队”可以“照顾好自己国家国土上剩下的事情”，而“英、澳两国军队”将会“夺回‘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并没有和麦克阿瑟核实这些，因为此时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核实——作为他们的下属，将军理应服从他们的指挥。然而，将军却在没有通报自己意图

的情况下继续着自己的计划，利用4个月的时间在菲律宾中南部发动了12次重要的两栖登陆战。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写道：“麦克阿瑟是何时又是如何获得权威、利用美国军队解放一座又一座菲律宾岛屿的……仍是一个谜。在攻下吕宋岛之后，他没有接到任何具体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只不过允许麦克阿瑟在一定程度上随心所欲而已。”D. 克莱顿·詹姆斯评论道，这些不合规矩的交战“绝对是麦克阿瑟在战时对联席参谋长们最无畏的挑战。但双方都没有把他的行为看作是对他们的有意冒犯。难怪这位指挥官在不到6年之后会对华盛顿的上司们表现得如此傲慢无礼”。

面对既成事实，五角大楼方面像打马后炮一般对麦克阿瑟未经授权就攻占几座菲律宾岛屿（内格罗斯岛、吉马拉斯岛、塔威塔威岛、巴拉望岛、班乃岛和宿务岛）的做法追加了许可。鉴于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他们还全权委托他进攻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东部、保和岛和霍洛岛，婆罗洲东北海岸附近的打拉根岛，文莱和婆罗洲本土的巴厘巴板。我们很难理解这些行动有什么必要。正如罗伯特·罗斯·史密斯在《胜在菲律宾》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在美军反攻群岛的官方历史记载中，之前提到的这些岛屿没有一座“在夺回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的行动中具有战略意义”。后来，麦克阿瑟声称自己此举是为了把印度群岛的石油资源从日本人手中硬夺过来，可敌军在莱特湾一役结束后已经没有能力向北方运输石油了。在肯尼的轰炸机沉重打击了巴厘巴板的炼油厂之后，那里一年之内都不可能重建起任何的炼油设施。将军真正的动机是出于个人、政治和人道主义的目的。他想要成为解放整个菲律宾的救星，认为让印度尼西亚为恢复和平做好准备是十分重要的（他还提议攻下爪哇和婆罗洲，但联席参谋长们在那里划定了最后的界限），因为落败的日本人很可能会把满腔怒火野蛮地撒在当地人，尤其是菲律宾人的身上。最后的这个原因貌似还比较合理。当然，日本人也曾展示过自己有能力实施这种暴行。然而决定权并非掌握在将军的手中。由于无法指责他，他的上司们就必须为这些事情分担责任。虽说他的自负和他们的怯懦推迟了一场决斗，却让美军付出了可怕的牺牲。最终将军将不得不服从命令，而骄纵和激情也将让他付出高昂的代价。

话虽如此，必须补充一句的是，这些行动中的每一战都是一项战略杰作，不仅执行得相当出色，而且伤亡率极低。正如将军在到达马尼拉之前承诺艾克尔伯格的那样，他对其手下第8军团的部署与罗伯特·E. 李对J. E. B. 斯图尔特军队的调动颇为相似，派遣轻型军队进行大范围的彻底扫荡，在日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动奇袭，利用地形切断敌军与供给基地之间的联系，把他们困在死巷之中。他通常会在日军未曾设防的无名海滩登陆，把他们赶进山里，让预先收到警告的游击队在那里伏击敌人。除了在这里浴血奋战的美军士兵的家属之外，这些丰功伟业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

注意，因为全国都在关注第三帝国的陷落，而将军夺回的这些地方（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相比新几内亚又不是那么广为人知。他的战报里零星点缀着例如阿古桑河谷、保和岛和苏禄群岛之类的名字，还提及了例如马卡哈拉湾、武端湾、萨兰加尼湾和达沃湾之类的锚地，并引用了类似普林塞萨港、桑阿桑阿、巴科洛德、帕朗、卡巴坎、迪戈斯和依蒙帕鲁涛等地名。然而任何一位战争研究者都会钦佩他大师般的功绩。由于围绕在自己身上的荣誉实在是太多了，他还破天荒地和自己的战地指挥官分享了一次。艾克尔伯格兴高采烈地在信中告诉妻子："走进去和老大交谈时，我感觉自己这一生从未收到过如此多的赞誉。"在批评"你的老朋友"是个"一切都要照章行事的保守陆军将军……和内战时联邦军的米德将军是同一种类型的人，总是惹得格兰特将军很生气"时，麦克阿瑟表示："如果我是第8军团的指挥官——拥有同样的速度、闯劲儿和才华，我也会选择这样部署这支军队的。"

另一位军官曾听到将军对艾克尔伯格这样说道："鲍勃，我想你在这里做的是对的。继续侦察，和敌军保持接触，但也要尽一切可能避免大规模的交战。我们不想再无谓地损失任何兵力了，尤其是在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时。"事实上，敌军眼下的伤亡情况要比他惨重得多。在攻下吕宋岛后的菲律宾大小战役中，他总共损失了820名士兵，而日军方面则损失了2.1万人。7月5日，他宣布："菲律宾群岛如今已经完全解放……行动期间，日军动用的23个师的兵力实际上已被我军全盘歼灭，而我军其实只有17个师。具有兵力优势的地面部队却在长期战争中被处于兵力劣势的对手全歼，实属罕见。"

面临日军退回日本列岛的局面，受命全权征战婆罗洲的澳大利亚步兵团指挥官对在赤道以南展开更多的丛林战并不是很感兴趣。澳大利亚人还从未发起过两栖战，因此对这一次的两栖战价值也是满腹狐疑。堪培拉方面建议放弃这一行动，可麦克阿瑟却严格遵循符合自己心意的指挥系统，于5月10日一板一眼地回复道："婆罗洲战役……是由负责太平洋战区战略的参谋长们在联席会议上下达的命令……撤销这一行动不仅将全盘扰乱当前的计划，还会影响联席参谋长们的战略计划。"信中根本就没有提及他曾经公然挑衅联席参谋长、发动必然会挑起婆罗洲战争的各大战役的事情，仿佛他的收获存在任何意义似的。澳大利亚人对此可能也并不知情，于是不情愿地同意了。他们于5月初占领了打拉根，并计划于6月和7月先后在文莱湾和巴厘巴板登陆。鉴于澳大利亚军队对此役的必要性仍旧心存疑问，将军不得不亲自站上前线，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猛烈的炮火面前，向士兵们展示他无惧于自己要求他们做的事情。

总之，将军在马尼拉坐立不安。自从他的家人到来之后，他除了在4月曾动身前往位于首都东北20英里处的马里基纳河谷观摩克鲁格率兵大战3万

负隅反抗的日军之外，哪里也没有去过。他说他想要去南方寻找“一种战斗的感觉”。6月3日，他带着几名参谋登上了“博伊西”号，前往第8集团军的战场，踏上被艾克尔伯格称为“壮游”的旅程，并最终参与了文莱湾的登陆战。他将离开12天，其中一部分旅程还引起了大家的怀旧之情。埃格伯格表示：“显然，他心里的压力很大。”据医生回忆，大家在经过科雷希多岛时情绪都有些激动。按照将军的指示，舵手追溯了PT–41号鱼雷快艇当年前往棉兰老岛时的逃亡路线。将军到访了怡朗、班乃岛——40年前，他离开西点军校后曾在那里服役。在德尔蒙特，将军提议去看一看自己1942年3月飞往澳大利亚前挨过4个悲惨日夜的乡村俱乐部。艾克尔伯格写道：“经过长时间的搜寻，我们找到了俱乐部的所在地——但那里只剩下了一片荒芜。炸弹摧毁了俱乐部的建筑，只有长满青苔的喷泉还在提醒着人们，那里曾是棉兰老岛北部一处富有而又奢华的宅邸。在这一点上，相比人类的短期记忆，自然是永远不留痕迹的。”

将军每晚都会坐在巡洋舰的军官室里嘬着玉米烟斗、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他告诉自己的副官，乔治·马歇尔希望他能够支持全面军训的实施以及整合黑人与白人军队的事宜。他哪一条也不会赞同，因为两者是“自相矛盾的”。他很欢迎那些正从欧洲赶来支援自己的军队，却并不想接纳他们的将军——特别是在阿登战役惨败之后。他已经开始计划攻占日本。除非天皇投降，否则日军是不会退出的：“那些小矮个儿们都是些卑鄙的对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投降。”他期待着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认为只要斯大林能够出兵牵制住100万日军的注意力，自己的空军就能够松一口气，从而挽救上千人的生命。他之所以一直诟病尼米兹和他的战地指挥官们，就是因为他们对部下的牺牲总是麻木不仁。他说：“尼米兹等人组织冲绳战役的方法（导致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共12 520人丧生、36 631人受伤）是可怕的。中央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们为了驱逐岛上的日军，牺牲了上万名美军士兵的生命。登陆之后的三四天之内，美军就占领了自己所需的整片区域，也就是他们需要建设飞机基地的地方。他们本应该安排军队进入防御阵地，坐等敌人找上门来，将其一举歼灭。这样不仅能使事情变得容易许多，还能挽回不少人的生命。”

在这趟旅途以及后来前往巴厘巴板的途中，麦克阿瑟上岸对盟军的军队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突击视察。“上帝呀！”一位澳大利亚士兵抬起头来看到他时喊道，“是该死的救世主！”看到一群挣扎着想要把8块大炮零件搬过一条小溪的步兵，他走过去用过时却又不失威严的语气说了一句：“事情进展得如何，绅士们？”巴贝注意到，“大家突然安静了下来，随即迸发出了一种敌意”。显然步兵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绅士，还觉得他的寒暄有些伪善。然而，菲律宾人无论何时见到他都会欢欣鼓舞。凭借他那顶著名的帽子和熨烫得十分整齐的卡其军装，任何人都能一眼认出他来。而他也十分享受他们对自己的喜爱和关注。从霍洛岛的摩洛族苏丹的手中接过一把

拥有百年历史的短刃弯刀时，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小阿瑟收到了一件神奇的礼物似的。不过，他的规矩在棉兰老岛上遭到了冒犯。克拉伦斯·A. 马丁准将为了迎接他，派出了一支军乐队和一支由三个连队组成的仪仗队，还搭建了一座可供将军在美国国歌响起时站上去的平台。麦克阿瑟拒绝回应准将的敬礼，甚至都不肯迈出自己的吉普车。他干脆利落地说道："战场上的荣誉和军队的规制是背道而驰的。我不喜欢这样，马丁。"

以将军这个年纪的男子来讲，他的身体耐力仍旧十分出众。"相信我，"艾克尔伯格钦佩地写道，"老头儿能够撑得住。"在一次艰辛的旅途中，麦克阿瑟笔直地站在加足马力穿梭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鱼雷快艇上，让他的一位部下怀疑"海军的小伙子们"是不是"在虐待这个老家伙"。不屑于乘坐飞机加速旅程，他冒着肆虐的暴风雨坐了8个小时的吉普车翻越了一座绵延120英里的山脉。推土机不得不先后两次出动，把吉普车从泥坑里拖拽出来。一位副官回忆："那是一趟颠簸得连头骨都差点儿被撞碎的旅程……可麦克阿瑟将军一次都没有说过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适。反倒是我的牙齿像响板一样颤抖着，骶骨疼得难受。"在一座小岛上，他和13名军官一起挤在了另一辆吉普车里，行驶了两英里的距离。（"自此我从未怀疑过美国的吉普车是'二战'中功能最多的设备。"另一位副官事后说道。）将军在危机四伏的沼泽里艰难地走了半英里的距离，就为了了解手下的士兵不得不应付什么样的地形情况。重新登上"博伊西"号，一位军官写道："情况十分艰难，我害怕（麦克阿瑟）会扭断自己的脖子。他花了10分钟的时间才爬上梯子……（他）吓坏了。"即便事实的确如此，麦克阿瑟也并没有表现出来。实际上，肯尼感觉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在文莱湾和巴厘巴板，将军还坚持要和突击登陆梯队一起出征。

这也是他最后几次在"二战"战场上与死神擦肩而过，回想起来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登陆文莱湾之后，麦克阿瑟沿着一条和海滩平行的路向内陆走了大约0.25英里的距离，两旁一直都充斥着狙击步枪声和机关枪声。据肯尼回忆，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的那段日子"。两位澳大利亚高级军官询问肯尼他们要去哪里，他耸了耸肩膀答道："我不知道。我们都跟着将军。跟你说句真心话，我也不想知道。"一辆坦克隆隆驶过。位于前方50码的一座小山丘上，一个步枪兵正在和一个机枪手交火。麦克阿瑟走过去观察发生了什么，发现两具日本士兵的尸体正倒在一条沟渠里。"他们看上去属于一流的军队。"将军告诉其他人，"有可能是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敢死队。"肯尼回忆："我们全都点着头，假装冷淡地表示赞同。"一位澳大利亚陆军摄影师出现了，希望能够拍一张将军和日本士兵尸体的照片，却被将军拒绝了。摄影师摆好姿势准备给两具尸体拍照。就在闪光灯亮起的同时，他倒了下去。敌军狙击手的一枚子弹穿过了他的肩膀。

军长莱斯利·莫尔黑德爵士快步走上前来，说他们已经到达前线了。麦克阿瑟表示了抗议："但我看到一些澳大利亚士兵至少还在前方100码的位置。"莱斯利爵士回答："那只不过是一支前锋巡逻队。此刻他们正在遭受猛烈的火力攻击。你不能再跨越这个点了，前面危机重重。敌人就在前方。"麦克阿瑟吩咐道："我们继续前进。"莱斯利爵士向旁边迈了一步，告诉其中一位美国副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总司令愿意在巡逻队伍中打头阵的。"将军朝着日军迈开了步伐，好在肯尼决定挺身介入。他告诉麦克阿瑟，他们发现了敌军的前哨阵地。"如果他想要征求我的意见，我希望他能够允许步兵去完成登陆之后需要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肯尼继续说道，"博伊西"号的船长还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让大家在晚餐桌边等待自己未免显得有些失礼，毕竟他们只不过是船上的客人。为了增加自己论据的分量，他还提醒将军，巡洋舰的舰长承诺当晚要为他们提供巧克力冰激凌。"好吧，乔治。"麦克阿瑟说着笑了笑，转身朝着船的方向走去，"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错过冰激凌的。"不过，他内心对于冒险的渴望依旧没有平复，第二天，他们又在文莱湾的另一边实施了登陆。听到附近一座机场的方向传来了枪声，用肯尼的话来说，他们"朝着更多的麻烦出发了"。到达跑道边缘时，将军说了一句"我们过去吧"，不料一位澳大利亚上校跨过灌木丛、挡在了路中间，直言不讳地告诉总司令，他和他的随从会使士兵们分心，因此是不受欢迎的。肯尼写道："他丝毫也不畏惧麦克阿瑟的五星上将身份，而且让我格外欣喜的是，他拒绝让我们向前再迈一步。"

肯尼是西南太平洋战区中少有的几位敢于站出来反对将军的军官之一，可他三个星期之后便转战去了其他地区，任由麦克阿瑟参与了巴厘巴板的最后一场两栖登陆战。第一批澳大利亚士兵登陆海滩之后，巴贝在旗舰上示意麦克阿瑟："海滩正遭受迫击炮猛攻，出于安全问题考虑，总司令的登陆艇将延迟出发。"麦克阿瑟通过信号回复他："立刻派一艘登陆艇过来。"巴贝回忆道："我用一艘登陆艇接上了他和几位参谋、一些战地记者以及一支摄影团队。"上岸后，将军直冲着前线走去，爬上一座页岩小丘，来到了距离日军战线不到200码的地方。他从一位澳大利亚准将手中借了一张地图，展开之后研究了起来。面对固执地站在自己身旁的美军总司令，这位澳大利亚军人的自尊心让他自己实在是不好意思寻找掩护，于是和麦克阿瑟一起聚精会神地看起了地图。一位副官回忆："子弹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空气中尘土飞扬……就连我们头顶上的树叶都被子弹给打穿了。"

"不久，"据巴贝描述，"一位澳大利亚少校跑过来警示大家寻找掩体，因为附近的山顶上架着一排机关枪。还没等他说完，机关枪的子弹就齐刷刷地飞了过来。我们所有人都猛地俯下身来，只有麦克阿瑟没有移动，仍旧站在那里查看地图，丝毫没有受到干扰……我羞愧地说，陆地战是没有海军

的用武之地的，而我应该是第一个卧倒的人。‘不是的，’国际新闻社的战地记者李·范阿塔答道，‘你卧倒之前我就已经趴下了。’”仍旧被枪炮围绕之中的麦克阿瑟冷静地折起了地图，把它还给了那位同样纹丝未动的澳大利亚军官，指了指大约1/4英里之外的一座山，开口说道：“我们到那里去看看吧。顺便说一句，准将，我觉得你最好在有人受伤之前派一队巡逻兵去解决机关枪的问题。”

7月16日，听说了这件事情，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蹲下，将军，蹲下！”。信中写道：“你不必让你的士兵相信你是个勇敢的人，也不必让我们这些纳税人和战争债券购买者感到信服……你应该下决心尽可能挽救更多士兵的生命，同时彻底歼灭敌人……为什么要冒不必要的风险让自己提早退出历史的舞台呢？”返回马尼拉之后，将军读完这封信便把它丢到了一边。这篇社论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却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少有部下知道将军和大多数人一样冒着极大的风险。很多年过去后，肯尼评论道：“我有时还是会听到‘防空洞里的道格’的声音。也许它意在强调这个男人身上完全相反的性格特征——就像是称一个高大的人为‘小矮个儿’一样。”

大日本帝国的民众仍旧相信他们的军队正在朝着胜利迈进。村镇中还在继续修建烈士纪念碑，仿佛国家的敌人早已投降。裕仁天皇强大的战舰已然葬身海底，而在吕宋岛上幸存下来的士兵们则躲进了山区之中。然而，据儿玉誉士夫观察，日本人民已然相信“日军舰队是坚不可摧的”，并期待“山下的军团能够扭转菲律宾的战局”。诚然，美国海军陆战队3月在硫磺岛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令日本民众十分沮丧。以硫磺岛和塞班岛为基地，美军的B–29轰炸机开始用燃烧弹轰炸一座又一座日本城市。紧接着，尼米兹的战舰又开始在日本海附近巡航，提前宣布他们的目标，近距离炮轰滨海城市。不久，1945年4月1日，美军夺取了冲绳县，相比攻占硫磺岛而言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震动；如果以每小时30海里的速度赶路，美军一个晚上就能从硫磺岛到达九州。然而日本平民还保持着心中的幻想，相信日本本土是不可能遭到入侵的，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本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从神的薙刀上滴落下来的海水形成的。天皇的政府告诉自己的臣民，冲绳和莱特岛、吕宋岛不一样，将是一场关原之战，也就是决定性的一役。读者们肯定会记得，武士毫不惧怕“敌人扒自己的皮、吃自己的肉”——他们之所以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登陆，就是为了让神风特攻队炸沉美军的救援战舰，并将他们隔离在岛上。当然，他们为了冲绳之战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从规模、范围和凶残程度上来看，”汉森·鲍德温写道，“日军丧失110 549名士兵的冲绳岛苦战让不列颠之战都相形见绌。”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美军在6月21日取得的胜利意味着登陆日本本土已经指日可待了。

直到3月4日，由谁来出任美军领袖的事情仍旧悬而未决。艾克尔伯格在与麦克阿瑟开会之后在信中告诉妻子："那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不过有人告诉麦克阿瑟，问题会在几天之后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得到解决。"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什么消息也没有。3月20日，奄奄一息的罗斯福在华盛顿接见了肯尼。他勉强挤出了一个虚弱的微笑，开口说道："你可以告诉道格拉斯，我希望他很快就能承担起菲律宾北部的大量工作。"返回马尼拉，肯尼告诉将军："顺便说一句，我听到一个传言，说你将会在我们进攻日本时指挥战斗。"麦克阿瑟飞快地回答："我不相信。我收到的消息称尼米兹将领导这一次的行动，而我则要留下来整顿菲律宾，然后向南朝着'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发。不管怎么说，这个传言你是从哪里听说的？"肯尼回答："一个名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男人。"肯尼事后回忆："麦克阿瑟试图维持原先的表情，但已经没有用了。他和我一样高兴……我对尼米兹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我觉得麦克阿瑟才是更有资格胜任这项工作的人。"

4月3日，五角大楼方面接到了罗斯福的进军命令，宣布重组太平洋战区的指挥系统。过去的地理分界线"西南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被废弃。尼米兹被赋予整个海上军队的指挥权，而麦克阿瑟则成了所有陆上军队的总司令。此举的目的在于敦促尼米兹、麦克阿瑟和B–29轰炸机的将领柯蒂斯·李梅能够通力合作。事情本应到此为止，但罗斯福刚被安葬在海德公园里，竞争的场面就再次上演了——这一次显然是麦克阿瑟将军挑起来的。"4月中旬，"福里斯特尔注意到，"在关岛举行了一场几乎为国际外交水平的正式会议，与会双方分别来自马尼拉和火奴鲁鲁。其中麦克阿瑟的代表团试图掌握太平洋上的所有陆军和空军指挥权，把海军降级为海上支援的次要角色。"

和往常一样，军种之间的较量引发了每一个人身上最令人厌烦的特质。阿诺德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尼米兹不同意让肯尼轰炸舰船或在海岸边10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还坚持海军必须拥有日本内海的第一优先权"。福里斯特尔也在日记中写道，麦克阿瑟感觉"尼米兹是自己的朋友和好伙伴……却怀疑这一点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麦克阿瑟神秘地告诉艾克尔伯格，"海军的目标是控制战后所有海外战略要地，留下陆军来守卫美国本土"。他还说海军想要在没有陆军帮助的情况下打败日本（尽管那是不可能的），并相信就连陆军《步兵杂志》的编辑们也背叛了他，"留出了相当一部分版面为海军做宣传"。简而言之，所有人都在与麦克阿瑟作对。"华盛顿方面将针对麦克阿瑟延续一条真实而又颇具毁灭性的第二战线。"斯派克·亨特写道。但倔强的尼米兹用沉默的方式拒绝被人恐吓。福里斯特尔注意到，"尼米兹最终授权自己的代表严肃表态……上将……是不会向将军屈服的"。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的将军们也严阵以待，静候敌军来犯，并没有放弃保护祖国的希望。他们告诉彼此，尽管失守了几座战略性的岛屿，他们征服的大部分战利品（包括中国腹地在内）还牢牢地握在手中，而他们麾下的大部分陆军也没有被击垮。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很难相信任何敌人敢于试图登陆日本本土。他们自吹自擂，认为同盟国的军队将会面临历史上最猛烈的抵抗。超过1万架神风特攻队飞机已经准备好迎接“决号作战”。海滩后方，无数个相连的地下洞穴已经被食物和上千吨的弹药填满。执行国家地面防御任务的是235万名正规军、25万人的卫戍部队和3 200万的平民民兵——总数为3 460万人，比美国、英国和纳粹德国军队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所有年龄在15～60岁的男性及17～45岁的女性都被征召入伍。他们的武器包括古老的青铜大炮、前装滑膛枪、竹子长矛以及弓箭。就连小孩子也被训练着在腰间系上炸弹，滚到坦克履带的下面，用自己的身体引发爆炸。他们也因此被称作“谢尔曼坦克地毯”。

这就是让五角大楼方面恐惧和憎恨的敌人——一个充满了甘愿切腹、一上战场便决心尽力多杀几个入侵者的狂徒的国度。不过，日本也有它的另一面，而麦克阿瑟正是少数几个能够认识到这一面的确存在的美国人之一。他不断催促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方面留意对方的和解姿态。肯尼注意到：“将军预测突破将来自东京方面，而不是日本军队……1945年3月，我在华盛顿曾重申过麦克阿瑟的意见，但和我交流过的所有战争部和空军方面的人都不赞同这一说法。大家一致认为，日本可能还会抵抗两年的时间。”不管怎样，将军是对的。一个主和派的阵营正在日本首都形成，其领袖正是裕仁天皇本人。天皇总结道，1945年的春天，和平谈判才是结束自己国家痛苦的唯一途径。从5月初开始，一个由6名日本外交官组成的委员会开始寻求与同盟国调停的方法。其中有些人，例如掌玺大臣木户幸一，早在一年前就知道战争已经失败了。其他人则是在听取了日本实业家代表团长达11个小时的游说后才改变心意的。据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浅野良三回忆，他们告诉日军高级官员：“我们的产品断货了，战略物资只够再生产几天的时间。许多工厂都被炸成了平地，工人们也都逃往了山区。最糟糕的是，我们已经没有原材料了。”

5月底，日本驻莫斯科公使（当时的苏联在太平洋问题上还处于中立）提出了休战协议。哈里·霍普金斯在莫斯科给杜鲁门发去电报，称“日本已经在劫难逃，日本人也已心知肚明”，且“日本某些群体已经派出使者进行和平试探”。如果罗斯福还活着，凭借他细腻的政治敏感度，可能会察觉到这其中的可能性。可刚刚上任的杜鲁门缺乏外交灵活性，又受到了例如迪安·艾奇逊、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和霍普金斯等相信和解无谓的人的影响，除非裕仁天皇退位，否则战争就是徒劳的。结果，他们于当年7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或面对“果断而彻底的毁灭”。麦克阿瑟对此颇感震惊。他知道日本人是绝不会废弃自己的天皇的，而没

有天皇，向和平有序过渡的可能性也会化为乌有——除非天皇下令，否则他的臣民是永远不会在同盟国军队占领日本期间投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投降的日子终于到来时，日方居然还提出了条件，要求延续天皇的统治。如果华盛顿方面当时就遵循将军的建议，也许就没有必要对广岛和长崎使用核武器了。

在一种难以平息的情绪影响下，华盛顿方面起草了“决号作战”（攻打大日本帝国的行动代号）的后续版本，并在马尼拉对其进行了修改。这些计划全都以最坏的情况为前提：苏联方面不会向他们提供援助，B–29轰炸机的突袭和海上封锁也都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曼哈顿计划（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直到7月底才知晓这个计划的存在）更是无法生产出实用的核裂变装置。然而，德军在5月7日投降的事情给大多数资深的同盟国步兵吃了一颗定心丸。[注]三个师的兵力正从欧洲战区赶往菲律宾。6月，已有140万美国陆军准备集结在群岛地区，另有100万士兵将于12月到达。尽管美国第1集团军指挥官考特尼·霍奇斯已经到达了马尼拉，麦克阿瑟还是更加偏爱自己的战地指挥官们。“决号作战”将以“奥林匹克行动”为开端，计划由克鲁格于1945年11月1日率领76.67万同盟国军队对九州发起正面突袭。用将军的话来说，其目的在于夺取“掩护主攻本州岛的机场”。第二阶段被称为“小王冠行动”，将于1946年3月1日实施，意在登陆本州岛。他本人有可能会让艾克尔伯格作为参谋长来领导这一行动。

对于未来的鏖战，麦克阿瑟没有心存任何的幻想（他告诉史汀生，“决号作战”将“使美军付出上百万伤亡的代价”），但他有信心在进攻东京之前调动从欧洲运来的坦克在宽广的关东平原上彻底击败守军。而他能否像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将军们（更别提艾森豪威尔本人了）那样熟练运用这些坦克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伯特·安德鲁斯采访时，他说欧洲战区的指挥官们犯下了“聪明人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北非行动完全是在做无用功”，而“欧洲战区的策略就是愚蠢地反复击打敌人最强的据点”。如果他能在1942年分出“仅仅一部分军队”奔赴北非，“3个月之内就能夺回菲律宾，因为当时的日军还没有做好准备”。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将军越来越确信和平指日可待。就在轰炸广岛两个星期以前，他还曾告诉肯尼自己相信敌人“至少在9月1日甚至之前”就会投降。8月5日，星期日，来自华盛顿的信使前来通知将军，一颗原子弹将会在第二天被投掷在东京以南的一片工业区里。星期一，在第一颗原子弹造成大屠杀惨剧的新闻传来之前，他在马尼拉市政厅召开了一次非正式新闻发布会。据马尼拉《每日公报》的詹姆斯·J. 哈尔斯玛出席发布会时所做的笔记显示，将军预测“战争可能结束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还表示他十

分“欢迎”苏军参与对日战争。星期三，苏联违背原先的与日条约，进军中国东北。星期四，第二颗原子弹摧毁了长崎。当天下午，麦克阿瑟发表了一则宣言：“我很高兴苏军对日宣战。这一局势将有可能形成对敌军的钳制，一招制敌。在欧洲，苏军位于东部前线，同盟国军队位于西部前线，如今局势发生了对调，但结果都将是一样的。”

三天之后，杜鲁门总统暂缓了使用B–29轰炸机空袭日本的计划；又过了三天，8月15日星期三，裕仁天皇于东京时间下午4点下达了终止一切敌对行动的命令，告诫日本人民必须“耐其难耐、忍其难忍”。杜鲁门在克莱门特·艾德礼、斯大林和蒋介石的认可下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艾克尔伯格在家书中写道：“那些捣蛋鬼们会到马尼拉来……其次，麦克阿瑟将在巴丹半岛附近的一艘战舰上会见日本人，与同盟国的某些代表一起签署和平条约。”在一个真情流露的喜庆瞬间，将军告诉艾克尔伯格：“他们还没有得到我的战利品，鲍勃！”

如此惊人的一系列事件必然会引起双方的骚动。麦克阿瑟的最后一条命令（在“密苏里”号战舰投降仪式之前，日方在亚洲其他地方投降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导致共产主义者夺回了中国部分地区和爪哇岛。紧接着，V. M. 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鉴于红军这几日参与了太平洋战争，麦克阿瑟应该接受一位苏军元帅作为全面合作伙伴，主持投降仪式，并在今后与其共同治理东京。哈里曼表示：“除了美国人之外，很难想象最高统帅一职应该由其他人来担当。”他把这一无礼的建议转达给了华盛顿方面。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决意在战胜日本之后赋予将军完整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我们在太平洋问题上是不会受苏军战术干扰的。”

和预料中的一样，战败后的日本首都局势一片混乱。作为一位神圣无比的人物，裕仁天皇甚至从未让民众听到过自己的声音。可如今他的话却被录进了皇家宣传广播中，向民众宣布天皇已经投降。某些高级官员用弯刀切腹自杀了，而年轻一些的鲁莽之辈则互相安慰，认为天皇的这段诏令录音肯定是伪造的，试图将它摧毁。他们冲进了天皇的皇宫，其中32人因此丧命。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作为武士，宁愿死在自己国人的手中也不愿意带着羞愧和耻辱投降。在位于横滨以西15英里处的厚木空军基地里，指挥官告诉自己的飞行员，投降就是不忠。“和我一起去摧毁敌人！”他尖叫着，部下们也齐声回应：“万岁！”

日本人过激的反应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令人困惑，但考虑到他们被灌输了4年的宣传内容，事情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他们相信美国人都是些毛发浓密的野蛮人，对待日本人就像是岩渊将军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对待马尼拉的菲律宾人一样。和所有战争中战败的士兵相似，他们都在担心自己的母亲、姐妹、妻子和女儿。东京广播催促女子们尽可能逃往山区，即便

不行，也不要在天黑之后冒险出门，离开家时还要把手表等贵重物品留在家里。她们被告诫必须穿着松垮的衣服，尽量不要让自己看起来过分性感，也不能对着美军士兵做出吸烟或微笑之类的挑逗性动作。中岛行机株式会社、关东京吾株式会社以及其他工厂里的女性雇员都领到了氰化物胶囊，在被强奸者压到地上时便会一口吞下。

麦克阿瑟对日本女人的确很感兴趣，却是出自完全不同的背景原因。他告诉邦纳·费勒斯，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要赋予女性投票权。“日本的男人们是不会喜欢这件事情的。”费勒斯说。的确，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此举比性骚扰还要恶劣。将军回答：“我不在乎。我想让军队名誉扫地。女人们不喜欢战争。”这正是他性情中神秘莫测的一部分——尽管他可以对美军上将们吝啬小气，对华盛顿方面的上司们粗野失礼，但他是个富于想象力、宽宏大度的征服者。他说他打算“利用日本政府的手段来实施占领”。他坐在一座半圆拱形活动房屋门口、嘬着烟斗告诉一位副官，女性选举权只不过是他计划在战后日本实施的七点计划之中的一点。其余的几点还包括解除日本士兵的武装，让他们解甲归田以及撤销军事工业，举行自由选举，鼓励建立工会，开放所有的学校，除了摒弃军事教育和增加公民教育课程之外不施行教育把关制度。

麦克阿瑟已经全都想好了——这是一件好事。面对自己人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光，他已经没有时间自我反省了。他要接见例如英格兰的蒙巴顿和苏联的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等同盟国人物，还要给杜鲁门发送电报（“我对您赋予我的信任深表感谢，谢谢您如此慷慨地将最高统帅一职交由我来担当”），甚至还要对着出现在他两层办公室窗下为他欢呼的美军士兵进行演讲——这证明他们至少暂时遗忘了对他的怨恨。他挣扎着控制自己的情绪，缓缓开口说道：“我发自心底地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就此结束。如果事情真能如我所愿，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你们的努力。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依旧在偷偷猜测日本人是否正在布置一个圈套，毕竟珍珠港的背信弃义之举实在是令人心有余悸。当东京广播对顽固的日本军官可能违背裕仁天皇命令、破坏投降的行为表达出了可以理解的焦虑之情时，却没有得到胜利者们太多的同情。将军简略地通知让日方派遣一支16人的代表团来讨论即将临近的投降仪式，并指示他们使用暗号“巴丹”。日方在回复中提出更愿意使用字母“JNP”作为暗号。将军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明确指示，暗号必须是“巴丹”。紧接着，一幕滑稽歌剧的小插曲就上演了。日本方面无人愿意在这个代表团中任职。每一次召集这支16个人的队伍时，总会有人临阵脱逃。最终，他们于8月19日星期日乘坐两架三菱轰炸机（也就是同盟军口中的“贝蒂轰炸机”）出发了。按照麦克阿瑟的进一步指示，这两架轰炸机被涂成了白色，上面还画上了绿色的十字图

样。12架美军飞机升空拦截，日军飞行员闪着灯打出了“巴丹”的暗号，并收到了对方的回复：“我们是巴丹的监督人。跟我们来。”在美军飞机的护送下，他们降落在了冲绳海岸附近一座名为伊江的小岛上，并在那里转乘C–54运输机飞往南方750英里以外的马尼拉。

作为精明的“东方通”，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亲自接见这16个日本人。他已然把自己视为裕仁天皇的继任者，并深知这些日本人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因此他始终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由查尔斯·威洛比来接见他们。来自日本外务省的冈崎胜男在尼科尔斯机场踏上舷梯时听到了无数台相机按下快门的声音，仿佛是“机关枪正朝着奇怪的动物开火”。事实上，这样的场面最适宜拍照：一边是身材矮小的日本人，一边是魁梧高大、从外表到想法都很像德军赫尔曼·戈林的威洛比。威洛比及时地催促日本人坐上了车子，因为愤怒的菲律宾人已经开始向他们投掷石块了。在前往马尼拉的途中，威洛比询问一位名叫河边虎四郎的日本将军，他想要通过哪种语言进行交流。“德语。”对方答道。鉴于德语正好是威洛比的母语，他们很快便滔滔不绝地惬意地聊起天来。在距离马尼拉饭店废墟所在的街道不远的两层建筑罗萨里奥公寓里，萨瑟兰和将军的其他参谋正在等待着他们。谈判出现了两个尴尬的瞬间。美军想要在4天之内在厚木机场上降落。畏缩的日本人向他们透露，作为神风特攻队的训练场，厚木机场正是抵御停火的叛乱温床。萨瑟兰宽限了5天的时间让他们控制住局势，却不打算更换别的机场。紧接着，日本人拿出了一份投降文件的草稿，日文版本的开头赫然写着“我，裕仁，日本天皇”——其中的代词使用的是“我”而不是“朕”。他们诚惶诚恐，因为天皇总是称自己为“朕”——即皇家用语中“我”的意思。麦克阿瑟的主翻译官悉尼·玛施波尔上校就此做了改动。当他事后向将军解释这件事情时，将军用一只手臂搂过他的肩膀说道：“玛施波尔，你处理得没错。我无论如何都不想贬低他在他的人民眼中的地位。”

日本（轴心国中唯一一个国土尚未被敌军踏足的大国）于8月28日星期二黎明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麦克阿瑟的参谋之一查尔斯·坦奇上校率兵迈上了厚木机场被炸得伤痕累累的跑道。一瞬间，一群咆哮着的敌人朝着他冲了过来。正当他准备伸手掏出武器时，对方踩下了刹车，鞠着躬、微笑着为他递上了一杯橙汁。遭到他的拒绝之后，一个日本军官把那杯橙汁一饮而尽，示意里面没有毒。坦奇通过电报通知马尼拉：“（我军）没有遭遇敌对行动。”可他还是十分紧张。除了将军之外，麦克阿瑟战区内的每一位军官都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身处马尼拉市政厅的将军安慰身边的人：“天皇已经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肯尼觉得自己在这一论断中发现了一个瑕疵。他说：“圣人是不应该输掉战争的。”麦克阿瑟没有作答。事后他将坦奇那支由150人组成的小型空降分遣队称为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赌注”，不过眼下他却保持着神秘的安静气氛。事实上，他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其他人就更不得而知了，包括日本人在内。

儿玉誉士夫回忆：“听到投降的消息，有些人吓得目瞪口呆，已经毫无知觉，其他人则愤而起身，压抑着心中的愤怒。但身为一个日本人，谁能忤逆天皇含着泪讲出的每一个字呢？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肃穆之中，每一个人的心都在流泪，向投降的命令屈服。”这话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就连儿玉誉士夫都承认，有“少数人”是拒绝遵从天皇的命令的。尽管他们人数不多，却既喧闹又危险。一队又一队的年轻人头戴白色绑带，称自己为“尊皇攘夷义军（派）”，在东京及其姐妹城市横滨四处奔走，一次三遍地高呼着“日本天皇万岁！”的口号，寻求光荣的牺牲。他们占领了代代木阅兵场和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爱宕山，包围了铃木贯太郎首相的家，还放火点燃了两位元老级政治家的宅邸。其中一组人包围了皇宫，试图抢夺守卫警察的武器，在撤退之前谋杀皇家卫队的主将。日本广播协会设在川口的广播电台被人占领，邮局、电站和报社也遭受到了零星的进攻。据日本文献记载，他们中的一组人距离坦奇上校停放的C–47运输机只有一箭之地。

但那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插曲。“实际上，敌人的态度令人很是好奇。”《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记者白修德报道，“他们表现得好像我们是他们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一样。日本人向我们敬礼，我们也会回敬他们。厚木机场里挤满了同盟国通讯社的记者和摄影师。日本外交官与媒体人和美国记者们握着手，还有几个翻译来回奔跑着、微笑着，努力展示着自己的善意。”美国军官们仍旧很紧张，他们知道22个日本军团（30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就在几小时的脚程范围之内。这是麦克阿瑟自莫尔兹比港保卫战以来的第一次小规模行动，结果完全建立在美军对曾经欺骗过自己的一群人的信任之上。然而日本人的情绪依旧是虚与委蛇，甚至有些欢欣鼓舞。他们欢呼着看工程师们从神风特攻队的飞机上卸下一排又一排短粗的银色螺旋桨，又在美国士兵将星条旗升起在一座破损厂房前时再次雀跃起来。一个美国人评论道，跑道上的上千道黑色的裂缝让他想起了用碎布缝成的被单，可日本人连看到这个场景也要欢呼。敬礼握手的仪式一直延续到了夜里，现场诡异的光源来自机场北端一艘仍在炽烈燃烧的焦黑色废船——它也许是B–29轰炸机发起最后一轮袭击时被击中的。除了日本人嘶哑的欢呼声和被刺鼻的烟味呛到的人发出的咳嗽声之外，深夜里的厚木机场上很少听得到其他声音。一位军官回忆道：“一场残暴的战争竟然结束得如此安静，简直是不可思议。”

先将军一步出发的艾克尔伯格乘坐的飞机于星期四早上4点半从马尼拉起飞。当这架名为“埃玛小姐”的飞机在本州上空下降时，迟缓的薄雾正好蒸腾着飘走了，阳光闪烁在他脚下的稻田上空，照亮了坦奇的士兵在崎岖不

平的厚木机场跑道两侧立桩标出的红色标志物。滑行在跑道上，“埃玛小姐”的飞行员嘟囔着：“除了神风特攻队，没人敢在这种跑道上降落。”麦克阿瑟曾告诉战地指挥官，他想要于当天下午2点入住横滨的新格兰酒店。艾克尔伯格在酒店附近设置了一道边防，安排了500名身穿墨绿色军装、经验老到的伞兵驻守在那里。可他越是听说那群年轻暴徒的暴行，就越是感觉忧心忡忡。他给马尼拉发去了电报，敦促将军延迟两天到达。麦克阿瑟的参谋们一致附和这一请求，可将军却像往常一样忽视了他们的否决。事后将军写道：“他们声辩让最高统帅和一群参谋率领一支小型先遣队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赤手空拳地降落在以一敌千的逆境中是有勇无谋的做法。可多年的海外服役经历让我深刻地了解了东方人——也许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我是远东的朋友。”这话显然是不足为信的。过去的4年时间让日本人明白了他绝对不可能是他们的朋友。也许他至少还有两个额外的动机。这将是他在战时最后一次展现自己临危不惧的机会。显而易见，眼下他若想赶在美国海军之前进入横滨，就必须尽快行动。哈尔西星期一便开始朝着横滨西南方的相模湾挺进，掠过风平浪静的大海，经过崎岖不平、蜿蜒曲折的镰仓黑沙海岸线，战舰上粗大的炮口直指关东平原，也就是将军预测自己会在战斗中损失10万兵力的地方。当天早上6点，第4海军陆战队朝岸边一拥而上，并用大钉堵住了海港大炮点火孔。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笑着告诉艾克尔伯格：“第一波登陆的全都是试图赶在麦克阿瑟之前上岸的海军上将。”

派遣荷枪实弹的大批海军陆战队在战舰炮火的掩护下执行阶段性任务是一回事，让一位手无寸铁的五星上将从天而降，落在7 000万个两星期前还誓要取他首级的人之间就是另一回事了。温斯顿·丘吉尔事后表示：“在战时的各种奇闻中，我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亲临厚木机场是其中最英勇的一件事。”约翰·冈瑟写道：“不管是毕生研究日本的教授，还是深知日本人性格细节的军事专家都认为麦克阿瑟此举实为冒险，令人震惊。”在马尼拉时，萨瑟兰就提出了抗议：“我的上帝啊，将军，即便是被当作真正的神来崇拜的天皇也会遭人刺杀，你会被他们当作什么样的目标呀？”麦克阿瑟回答，他相信有人试图刺杀裕仁天皇的新闻是伪造的（他是对的，尽管他们当时无从得知）。当他那架鼻子上饰有“巴丹”字样的C–54运输机在冲绳短暂降落停留时，他注意到肯尼等军官的腋下枪套上全都绑着手枪。他开口说道：“把它们摘下来。如果他们打算杀了我们，随身武器是没有用的。这样只会向他们展示你们心怀恐惧。若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你们打败，这就是证据。”

麦克阿瑟踏上了飞往本州的5个小时旅程，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走廊里踱步，恣意地对惠特尼发号施令，还用烟斗戳着空气以示强调。不一会儿，他坐了下来，仰头睡着了。飞机越过镰仓那座建于13世纪、高55英尺的铜佛像以及对称的富士山白色山顶，平静地翱翔在被云朵笼罩的基地上空。

惠特尼对另一位军官耳语道："去把老头儿叫醒。"看到那位军官有些畏首畏尾的样子，惠特尼只得轻轻拍了拍将军的一只手臂，在他惊醒时指了指外面的神山。"哦，美丽而又古老的富士山！"麦克阿瑟说道，"多么奇妙呀！考特（考特尼），你有没有什么梦想曾经成真过？"说罢他再一次闭上双眼打起盹儿来。惠特尼事后写道，他当时想起了正在厚木机场等待他们的接待人群，"我屏住了呼吸，并感觉全世界都在和我一起憋气"。

这话说得没错。艾克尔伯格也感到有些喘不上气。下午2点05分，他满心焦虑地站在地面上看着飞机用他所形容的"颇有弹性的降落方式"在跑道上滑行起来。他后来提到："将军拒绝等到这片区域安全之后再抵达的决定让我很担忧。最高统帅的安全是我的责任，而我知道我们的空降部队无法赶到……为他提供足够的保护。"更糟糕的是，他还听到有人传言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已经做好执行自杀行动前的临终祈祷，此刻正在附近。日本警方试图逮捕他们，却遭到了他们的抵抗，双方都遭受了一定的伤亡，但其中有些人仍滞留在机场附近——他当时并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咬了咬嘴唇，看着斜梯朝C–54运输机的方向移去。200多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也跟着一拥而上。舱门打开时，一支伞兵乐队演奏起了气势恢宏的进行曲。麦克阿瑟向下走了两步，嘬了两口玉米烟斗，然后摆出了一个颇具戏剧化的姿势供摄影师们拍照，烟斗和帽子都得意扬扬地倾斜着。

走下斜梯，麦克阿瑟潇洒地回了艾克尔伯格一个军礼，握了握他的手，开口说道："好了，鲍勃，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真的很漫长，不过就像人们在电影里所说的那样，这就是回报。"（后来，艾克尔伯格写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不太确信他指的回报是什么。"）兴高采烈的将军漫步到乐队领队的身边，对他说了一句："非常感谢你们。我想让你告诉这支乐队，这也许是我听到过的最甜美的音乐了。"看到不远处正站着一群士兵，他走过去和他们搭起话来。一位军士伸手够了够自己的步枪，想要展示自己的武器，结果却错抓了一支竹竿出来。麦克阿瑟停在他的面前小声说了一句："孩子，我想你参错军了。"那位军士猛吸了一口气："是的，长官。"将军迈开了步子，咯咯地笑了起来。

更多的喜剧接踵而至。为了赶赴15英里以外的新格兰酒店入住，交通工具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早已预料到这一问题的马尼拉方面指示东京政府为将军一行人提供50辆配备司机的汽车。但李梅的轰炸机并没有给横滨留下多少可用的汽车，只有一辆看似古董车的美国林肯轿车保存尚好。于是麦克阿瑟便和艾克尔伯格坐进了这辆车里。而其他的美国人就只能坐上由日本人搜集来的老旧的烧炭轿车和卡车组成的可笑车队。负责开道的是一辆让某位美国军官想起了图纳维尔小火车的亮红色消防车。伴随着阀组轰然启动的声音和煤炭的嗞嗞声，他们启程了。消防车的警笛声十分嘹亮（事实

上，警笛根本就关不掉），而发动机却总是罢工。于是，这支荒唐的车队就只能伴着发动机一会儿停转、一会儿蹒跚的节奏在烈日下行进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没有人开口抱怨，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都被日本人转移到了另一个惊喜上：3万多名日本步兵正列队站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只见他们身扛刺刀、稍息着立在那里，彼此之间间隔几英尺的距离，背冲着车队。这是投降的象征，同时也意味着发自心底的尊敬——直到当时为止，军队只在天皇面前才会转过身去。“除此之外，”正如肯尼后来发现的那样，“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防止某些顽固不化的日本人开枪射杀我们。”尽管如此，看到如此多的敌军士兵，大部分的美国人心里还是不免有些胆寒。争端依旧有可能会发生，甚至应该说是极有可能发生。艾克尔伯格感觉毛骨悚然……“我曾听说日本人十分遵纪守法，但我也深知只需一个心怀不轨、手举步枪的狂热分子就能把和平占领变成一场讨伐之征。”惠特尼记得：“（自己）一直都在机警地盯着那些脸上带着可怕表情的士兵们。我不会因为这阵仗就打消自己的疑虑，因为我忍不住猜想……他们的心里是否存在某些根深蒂固、神秘莫测、秘不可宣的动机。”只有麦克阿瑟严肃地靠在椅背上欣赏着眼前的景象。

就在他们靠近城市的外围时，周围的景致变得不那么美好了。B–29轰炸机曾给这里带来了可怕的浩劫。在惠特尼看来，这里似乎就是“一座幽灵城，商店的橱窗全被木板钉了起来，百叶窗也低垂着”。艾克尔伯格后来也写道：“眼前的破败与荒芜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日本所有大城市的面貌，也向我们预示着占领时期即将遇到的经济困难。只有奈良、京都和日光这样的宗教城市完全逃脱了我军轰炸机的炮火。据我所知，虽然横滨规模最大的几座建筑幸存了下来，但光是1945年5月29日的一次燃烧弹袭击就摧毁了这座城市80%的建筑。”车队驶过时，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全都衣衫褴褛。麦克阿瑟发现他们正站在支离破碎的砖石瓦砾上凝视着他，眼前不时闪过他们憔悴痛苦的脸庞。他开始猜测自己的目的地，感觉酒店能够逃过一劫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

它的确还屹立在那里。一位身着上浆翻领衬衫、燕尾服和条纹长裤的年迈日本人正等候在酒店的入口处。他在麦克阿瑟迈出林肯轿车时深深鞠了一躬，说自己名叫野村洋三。将军问他：“你在这里担任酒店经理多少年了？”野村急忙纠正他：“我不是经理。我是这里的主人。”据野村日后回忆，他当时也感觉自己的回答有些可笑，于是继续说道：“欢迎光临。我希望能够为您献上我的敬意。在您下榻期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希望您会喜欢我给您展示的房间。”紧接着，在更多个鞠躬过后，他带领麦克阿瑟来到了315房间。这里连接内庭，是酒店里最好的套房。将军吩咐所有人都退下，独自躺了下来，希望能继续打会儿盹。可这是不可能的。走

廊里，上百位低级军官正四处走动着寻找自己的房间。麦克阿瑟起身按响了服务铃。三位女佣像慌张的蝴蝶一样赶了过来，身后还跟着野村。野村再一次朝他鞠了一躬，询问将军是否希望在私人餐厅里用餐。不，将军回答，他要在主餐厅里和自己的参谋们一起用餐。

一盘盘牛排被端上了桌。惠特尼担心麦克阿瑟会遭人下毒，于是建议先找个日本人来品尝一口。麦克阿瑟笑着摇了摇头，这是一块好肉，他可不想与任何人分享。将军的姿态并没有被人忽视。酒店员工们早就猜到惠特尼会起疑心，因此也料到他会叫人试吃将军的食物。野村再次出现在了桌旁，为将军此举象征着“巨大的信任”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他说，他和员工们“感到难以置信的荣幸”。麦克阿瑟显然十分喜欢这段简短的演讲，只可惜他的部下们无法理解其中的缘由。虽然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将军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国家，因此决意要让据日时期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除此之外，回想起自己在1918年停战协议后在德国服役的经历，他明白食物在惨遭蹂躏的战败国里是一种格外昂贵的物资，因此购买这些牛排的过程绝非是小事一桩。也就是说，所有的日本人肯定都还在忍受着饥饿。他的这一推断在第二天早餐时得到了证实——第11空降师的指挥官可怜巴巴地向他汇报，他手下的士兵们搜寻了一整夜，只找到一枚可供最高统帅早餐时享用的鸡蛋。麦克阿瑟当即下达了一条在整个亚洲侵略军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命令：占领军队不允许取用当地的食物，只能消耗自己的口粮。一小时之后，他取消了艾克尔伯格颁布的城市戒严令和宵禁令，表示自己在日本实施革新的第一步将是展示占领国的宽容和怜悯。

当天晚上，麦克阿瑟第二次在酒店的晚餐桌旁坐下时，一位副官报告说门外来了一位客人：乔纳森·M. 温赖特中将。4天以前，这个刚刚被苏军从中国东北的战俘营中解救出来、曾被将军于1942年留在科雷希多岛上指挥坐镇的男人坐上了一列木凳火车，在奉天（沈阳）转乘C–47运输机途经重庆回到了马尼拉。悉尼·赫夫陪同他找了一位理发师和一位菲律宾裁缝。然而，他看上去还是消瘦得有些可怕。用麦克阿瑟的话来说：“我站起身来朝着大堂走去，还没走到跟前，大门就被推开了。温赖特就在那里，看上去面容憔悴，衰老了不少……他走起路来很困难，手里还拄着一根拐杖。他的双眼深陷了下去，两颊顶着两个洞，满头银发，皮肤看上去像是老旧的鞋皮。当我把他拥入怀中时，他勇敢地努力笑了笑，试图开口说些什么，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三年了，他一直以为自己在放弃科雷希多岛之后会遭人嫌弃，相信自己永远也不会再获得主动指挥权了。他的话让我感觉很震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吉姆（乔纳森的小名）？’我说道，‘只要你愿意，你的老部下依旧归你统领。’”

温赖特开口叫了一声：“将军……”随即声音就哽咽了，眼泪也夺眶而出。

日后，就连他也无法说清到底什么才是最令他感动的：是恢复他的自尊和自信，还是听到有人喊出他最亲密昵称时的那种感觉——要知道，很少有人会这么叫他，而麦克阿瑟自从在科雷希多岛上与他那场绝望的道别后也再没有喊过这个名字。将军同样十分动容。第二天早上，他告诉自己的副官，自己事后也是寝食难安。这一次的餐厅重逢有什么事情一直在困扰着他，可他又说不清、道不明。不一会儿，他终于想明白了：是那根带有弯曲手柄的棕色胡桃木手杖。那是他在马尼拉开战前送给温赖特的，希望他能够学着自己的样子好好利用这根轻便手杖，把它当作指挥官的舞台道具。然而它却在这个备受折磨、多年来一直背负着耻辱的男人没有任何依靠时（甚至连自尊都已失去），撑起了他瘦削的身体。

两天后的星期日一早，一艘驱逐舰带着温赖特驶向了停泊在东京湾、排水量4.5万吨的灰白色“密苏里”号战舰上。他说：“这条船是我在战争中见到过最令人吃惊的武器。我无法想象任何东西的体型竟能如此庞大，上面还装满了大炮。”攀登右舷上的梯子时，温赖特听到头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好呀，瘦子（乔纳森的绰号）！”原来是他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未曾再见的哈尔西。那时的他还是一名陆军中校，哈尔西则是一名海军中校。如今已升任海军上将的哈尔西俯身伸出手来，把他拽上了后甲板，并将他领到了即将到来的投降仪式中他所站的位置上。温赖特和曾经拱手让出新加坡的珀西瓦尔将站上贵宾席，跟随在麦克阿瑟左右一步之距的地方。在他们的身后，同盟国的将军和上将们会排成“U”字形队列：带着红色领章的英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身穿红色边条裤的苏联人；身穿绿褐色制服的中国人；头戴奇怪帽子的荷兰人；还有一排又一排身穿卡其军装的美国人。U形队伍的顶端摆放着一个麦克风和一张铺设着粗呢台面的老旧餐桌，桌子两边各摆放着几张椅子。日本人将站在桌子另一边，面对着将军。为战地记者和摄影师们准备的脚手架已经搭好；头顶上的每一层炮塔和甲板上都站满了身着雪白军装的水兵，其中很多人都举着柯达相机，抻着脖子想要一睹麦克阿瑟的真容。将军已经提早登上了战舰，如今正在甲板下方的上将船舱里踱着大步。头顶上，将军和尼米兹各自的五星旗帜正在迎风飘扬，更高处则悬挂着1941年12月7日华盛顿国会大厦上飘扬的那面美国国旗。

日后，不管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对于当天所发生的一幕幕都会有着相同的记忆——除了天气和日期。8点刚过，艾克尔伯格便在海军中校哈罗德·史塔生的护送下伴随着哨声登上了甲板，感觉后甲板“在阳光的照射下热得仿佛脚下正燃着一个炉灶”，而负责为天皇起草当日大事记官报的日本外交官加濑俊一（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和哈佛大学，在外务大臣重光葵手下任秘书官）却记得那是“9月初冷得出奇的一天”。对于西方人来说，那

天是1945年9月2日，而日本人却记载那是“昭和20年9月的第二天，神武天皇登基2605年”。其实这也并无大碍，因为那一天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正如艾克尔伯格所说的那样：“我有种可怕的感觉，仿佛我们正在步行穿越历史的篇章。”

自然而然，同盟国的人们都处在一种欢欣鼓舞的情绪之中。曾在1942年那场绝望的爪哇战役中死里逃生的荷兰人C. E. L. 赫尔弗里赫正在和曾率领两栖部队运送海军陆战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里奇蒙德·凯利·特纳开着玩笑；艾克尔伯格愉快地和肯尼、史迪威以及空军将领卡尔·“图伊”·斯帕茨聊着天。对于“密苏里”号的炮手指挥官霍雷斯·伯德中校来说，在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登上甲板之前让这些高级军官们安静下来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任务。绝望的他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直到他恼怒地把双手围在嘴边喊了一句“全体注意！”才让人群安静下来，可大家的脸上仍旧止不住笑意。伯德通知大家，驱逐舰“兰斯当”号正载着11人的日本代表团朝他们驶来。特迪·怀特注意到，同盟国军官们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史迪威像一只发现了敌人的狗一样汗毛直竖。斯帕茨蔑视的表情让他脸上的皱纹一下子深了不少。肯尼的唇边露出了嘲讽的表情。”

日本人的心理反应几乎是无以言表的。凌晨5点，他们就被召集在了新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被烧毁了一半的官邸中。日本代表团的领袖是曾在上海遭遇恐怖袭击爆炸而致残的重光葵。他拄着一条木腿一瘸一拐，顶着高顶礼帽，戴着领巾状领带，还身穿常礼服。军官代表是天皇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他的胸口挂满了绶带，还佩戴着一条金色的穗带。”怀特这样写道，“他的眼神既空洞又茫然。”梅津起初是拒绝参加投降仪式的，裕仁天皇亲自出面才说服了他。不过，即便是天皇也无法说服丰田大将参加。丰田大将命令手下的一位作战军官富冈定俊代替他出席。“你输掉了战争。”丰田对他说，“所以得由你去。”富冈服从了他的命令，但发誓要在回来之后切腹自杀。

离开横滨之前，日本代表团成员们摘掉了身上的佩剑和破损的车子前盖上挂着的国旗。“我们就此卷起了旗帜、解开了佩剑。”加濑接下来写道，“没有旗帜的外交官和没有佩剑的士兵——就这样伴随着阴沉和寂静启程来到了码头。”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日本驱逐舰“初樱”号。舰上的3门5英寸口径大炮全都低垂着，仿佛是在对谁鞠躬。不久，他们登上码头，看到了闪闪发光、恢宏无比的同盟国无敌舰队。“一排又一排的灰色战舰。”一个日本人事后写道，“……壮观地排着队停靠在那里。这是同盟国海军的盛大游行，由最近才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战舰组成，如惊雷般停靠在那里，好似平静的海鸟翱翔在被它们征服的海域上。”

上午8点55分，日本代表团登上了“密苏里”号。重光是第一个登上舷梯的，身体重重地倚在自己的拐杖上。他费力地爬上了楼梯，伯德中校走下

来伸出了一只手，外务大臣重光先是僵着脸挥开了他的手，然后又很快接了过来。一位美国记者写道，站在一旁等待的同盟国指挥官们全都“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位外务大臣的窘境。伯德把日本人带到了他们的位置上，安排他们排成四行。加濑感觉：“自己像是在当众遭受折磨。100万双眼睛如同100万支带着倒钩、燃着火焰的箭一样射向了我们。我感觉他们犀利的眼神已经穿透了我的身体，让我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我从未意识到眼神也能如此伤人。我们等待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好似正在等待可怕校长的忏悔男孩一样。我试图维持失败的尊严，却很难做到。每一分钟都好像一年那么漫长。”实际上，只过了4分钟，随行的神父就开始做起了祈祷，舰载扩音装置随后响起了《星条旗永不落》的乐曲声。紧接着，麦克阿瑟出现了，步伐矫健地走在尼米兹和旗舰舰长哈尔西中间。两位上将离队站到U形队伍中间之后，将军径直迈到了麦克风前。麦克阿瑟事后写道：“没有人指示我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只能依靠自己，在上帝和自身良心的指引下站上后甲板。”和其他军官不同，他的胸口没有别上任何的勋章。一位美军水兵耳语道：“快看麦克阿瑟。难道他没有得过任何的勋章吗？”站在他身旁的水兵小声答道：“如果他把那些勋章都戴上的话，可能连整个肩膀都别不下呢。”

麦克阿瑟像座雕塑一样站着军姿。仅在伸手掏出讲稿、在自己面前展开时微微有些颤抖。他开口说道：“各主要交战国的代表们，我们聚集在这里缔结一项庄严的协议，让和平得以恢复。”他继续说道，在这里谈论“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或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情绪”相聚都是不合时宜的。“相反，胜败双方都应该为有益于我们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的更加崇高的尊严而喝彩。”这是他“热忱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建立在信仰和理解之上，维护人类尊严、致力于他最珍视的愿望——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他在结束时说道：“作为同盟国的最高统帅，我坚决地宣布，我将按照我所代表的各国传统履行我的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处置方法确保投降条款完整、果断、忠实地执行。”

听到如此流畅、响亮的声音，永井八津次少将对麦克阿瑟如年轻人般的精力感到十分惊奇，还将他和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梅津做了一番对比。他不知道这样的差别是否与战争的结果有关。富冈惊讶于将军竟然没有对他们怀恨在心。可身材矮小的加濑却眉飞色舞。他心想：“多么激动人心的口才啊！多么崇高的演讲啊！这是一个胜利者对拜倒在地的敌人宣读的判书。只要他选择，尽可从我们身上割下一磅肉。只要他愿意，尽可对我们施以羞辱性的处罚。然而他却恳求自由、宽容和正义。对于本以为会遭受最糟糕的羞辱的我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惊喜。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茫然不知所措，犹如五雷轰顶。对于在战争中幸存的英雄和死去的殉道者而言，这段演讲就相当于一只不朽的花环。”加濑觉得“麦克阿瑟的话仿佛插

上了翅膀四处翱翔”，而“狭窄的后甲板如今也变成了和平的祭坛”。桌子上摆着两份投降文书，用皮面装订的那一份是同盟国的，另一份用帆布装订的则属于日本。相机快门咔嚓作响时，签字仪式开始了。在将军点头示意之下，重光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去，坐了下来，笨拙地放下手杖、摘下手套和帽子。哈尔西以为他在拖延时间，一心只想走上前去扇他一巴掌，大喊一句：“签字，该死，签字！”但麦克阿瑟意识到对方只不过是有些眼花缭乱，于是用鸣枪一样的声音说道：“萨瑟兰！给他展示一下在哪里签字！”接下来，梅津不屑于坐那把椅子，笨拙地俯身向前，潦草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日本人签完字后，轮到胜利者们了。一个日本人看着同盟国的9位强国代表朝着绿色粗呢台面走来，心中忍不住想：“日本这样一个穷困的国家怎么如此鲁莽，竟敢向这么多强强联手的国家发动战争。实际上，日本简直就是在和整个世界对抗。”

这次历史性的签约过程也并非事事如意。一位醉酒的同盟国代表（不是美国人）就对日本人露出了凶狠的表情。加拿大的使者在签字时还写错了行。某一时刻，《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卡尔·迈登斯冲出来给巍然屹立、表情肃穆的麦克阿瑟拍一张特写照片。（就在他被人轰开时，将军朝他挤了挤眼睛。）这些都只不过是些小插曲而已。在总长18分钟的仪式渐进尾声时，麦克阿瑟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5支钢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把第一支钢笔递给了温赖特，第二支给了珀西瓦尔。第三支和第四支将被分别送往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最后一只平价的红管钢笔是他留给琼的。他用它写下了签名中的“阿瑟”字样。她将把它珍藏起来，留给他们的儿子。上午9点25分，将军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宣布：“议程到此结束。”望着日本人被带离现场，他用一只手搂住了哈尔西的双肩，开口说道：“比尔，那些该死的飞机呢？”仿佛有人收到了信号似的，一大群飞机（包括B–29轰炸机和海军战斗机）从南边飞来，在天空中呼啸而过。肯尼写道，它们排成“长长的一队，神奇地转了个弯，消失在了笼罩着神圣富士山的迷雾之中”。

那一瞬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不过麦克阿瑟还打算在和平的开端讲上几句话。他花了几乎一整晚的时间用潦草的字迹反复修改讲稿的内容。此刻，他站回麦克风前面，开始对美国人民进行广播。身在马尼拉聆听这段广播的琼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那颤抖的声音：“今天，枪声平息了下来。一场巨大的悲剧已经结束。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天空中不会再落下死亡之雨——大海将只是贸易的场所。各地的人们都能挺直了腰板在阳光下行走。整个世界都安详地沉浸在和平之中。神圣的使命已经完成。人民啊，在向你们汇报这些时，我是在代表成千上万无声的嘴唇对你们说话，那些永远静止在雨林、海滩和指引着我们回程的太平洋深海之中的嘴唇。”他说：“人类在诞生之初就在追寻和平，但军事同盟、权力制衡和‘国际联盟’却先后失败，只留下了一条途经战争熔炉的小径。如今，这将是我

们拥有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就设计出更伟大、更公正的体系，导致人类彻底毁灭的大决战就会向我们逼近。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神学的，涉及过去两千年来我们在科学、艺术、文学以及一切物质和文化发展方面几乎无可匹敌的进步，并包括与之同步的精神复兴和人类品德改进问题。如果我们要使肉体得救，就必须拯救自己的精神。”

麦克阿瑟指出：“近一个世纪以前，马修·佩里曾在这里登陆，给日本带来了一个启蒙和进步的时代，掀起了隔离友谊、交易和世界贸易的薄纱。可叹的是，那时的西方科技却被人用作了压迫和奴役人类的手段。言论自由、行动自由甚至是思想自由都被诉诸迷信和武力，从而遭到了摒弃。”他说：“我们致力于把日本人民从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救出来。我相信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指导，日本民族的力量就能在纵向而不是横向上得到延伸。只要将民族的智慧转扭到建设性的轨道上来，这个国家就能从目前凄惨的境遇中自行站起来，找回尊严的地位。一个解放了的崭新世界即将展现在太平洋地区的前方。今天，自由正处于攻势，而民主正在前进。今天，在亚洲，在欧洲，摆脱了束缚和恐惧的人们正在品尝自由那充满甜蜜的释然滋味。”他总结道：“因此，我的同胞们，现在我要向你们汇报，凭借美国海陆军人冷静、审慎和坚定的战斗精神，你们的儿女很好地、忠实地为你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精神力量将我们带向了胜利。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请照顾好他们。”

三十多年过去之后，肯尼依旧把这段话视为将军“最伟大的演讲”。《时代周刊》的记者谢利·迈登斯从横滨发回电报：“总结麦克阿瑟对待和平和日本人的态度最好的形容词就是‘超脱世俗’。他的思考既穿越了世纪，又高于民族。”但后甲板上还有几位军官缺乏他这样的视野，他们享受日本人的屈辱，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感觉和一切终止时的释然当作自己的情感经历。将军离开之后，艾克尔伯格加入了一群上将之中，在军官室里享用咖啡和甜甜圈。聊天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行话，他们在讨论现代三维战争（海战、陆战和空战）对未来的启示。不过大多数人的心情都很雀跃。早在战争刚刚打响时，哈尔西就曾吹嘘自己要在战后骑着裕仁天皇的白马走在东京的主街上。此刻，艾克尔伯格在信中告诉埃玛小姐：“哈尔西的客舱里摆放着我见过的最精美的马鞍，是俄克拉何马州某个小镇献给他的。它有着牛仔马鞍的形状，上面镶嵌着大量的纯银饰品。他说这个马鞍价值2000美元……尼米兹在投降文书上签字时，哈尔西怒视着日本人的样子让我看了很高兴。”一位海军军官疑惑地问道，不知道麦克阿瑟会不会想要借用这个马鞍、骑一骑天皇的座驾。艾克尔伯格摇了摇头。在他的印象中，将军的心里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

裕仁天皇是个很普通的男子，身材矮小、神情恍惚，44岁时膝下已经有了

6个孩子。他是19年前从父亲那里继承皇位的，自此一直都在努力成为一代明君。他的外表看上去丝毫没有皇帝的威严。若是他站在纽约或伦敦的街头，说不定都不会有人愿意多看他一眼。他十分害羞、弯腰驼背，身形轮廓颇有些卓别林的样子，还长着一个脆弱后缩的下巴。他的肌肉协调能力很差，以至于总是给人一种眼看就快要跌倒的感觉。他的胡子很凌乱，脸上长满了痣，厚厚的眼镜片让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是被动物标本剥制师放上去的一样。在家时，他总是穿着破烂的衣服和磨损的鞋子。他需要刮胡子，还经常忘记系紧自己的裤子。年轻时，他曾游历欧洲，接触到了爵士乐、威士忌以及高尔夫——上述这些至今都深受他的喜爱。不过，他唯一广为人知的爱好是海洋生物学。他出版过好几本充满了学术性却有些单调乏味的海洋生物书籍，最喜欢一整个下午都消失在自己朴实的家庭实验室里，只与显微镜和幻灯片为伴。相比人类，他可能更喜欢鱼类。

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裕仁大皇也是这个样子的。然而，他在自己国民眼中的形象却与此大相径庭。或者应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因为他罕见地出现在公众场合中时大家都会移开自己的目光。这些人甚至还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的眼神和他相遇（哪怕只有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也会被闪瞎。他们相信他是神武天皇的第124位直系后裔，而神武天皇早在基督之前就已统治他们的祖先长达7个世纪。担负起这个神圣角色的裕仁天皇偏偏将自己的统治朝代命名为“昭和”，意为“光明的和平”。不过，在战争期间，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名字是多么讽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不会想对天皇的话发表任何的评论，即便他们能够理解天皇——而天皇的意图总是高深莫测。他的大臣们发现，和他对话十分困难，因为他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经常是模棱两可，有时还会背诵文不对题的十七音诗。按照规矩，他会沉默地坐在挂着金色锦缎、位于高台顶端的宝座上，背后立着6扇传统镀金屏风——他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了让大臣们的决议变成官方的决定而已。不过他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表现得十分犀利。他用两句话就批准了投降的事情：“我再也无法忍受看着自己无辜的国民遭受苦难了。结束这场战争是恢复世界和平、将这个国家从可怕的困境负担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

B–29轰炸机上的投弹手们接到命令，放过裕仁大皇那座拥有曲瓦房顶的寺院宝塔风格灰墙皇家宅邸。不过，几次空袭的炸弹碎片还是越过了皇宫的护城河，把皇太子和皇太后的住所全都烧成了灰烬。如今，裕仁和他的皇后良子只好带着孩子们住在坐落于皇家花园中的皇家图书馆里，距离皇宫大约半英里的距离。一段长长的台阶能够通往一座地下防空设施。天皇就是在那里接见自己的顾问的。通过广播听完“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投降仪式，他等待着加濑向他汇报具体的情况。天皇的决定无法左右麦克阿瑟的新统治，但裕仁的公开认可倒是能避免被占领国与占领者双方过分心痛。

重光和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其他内阁成员都确信天皇不会批准与美国完全合作。在这一点上，天皇也已经做出了暗示。投降仪式之后的那个早晨，在接见大臣的过程中，天皇拿出了一份东京《每日新闻》的剪报。文章的作者铃木贯太郎男爵曾是当时的首相（投降后辞职，辅助履行和平过渡时期的职责）。铃木在文章中写到，他“对于自己要做什么拥有十足的自信”，那就是“信任敌军的指挥官。‘武士道’不是日本人的专利，而是一种通用的准则”。铃木说，尽管他不认识同盟国的最高统帅，但他对于“军人的精神拥有坚定的信念”。日本已经战败了，一旦认输，唯一“能够展现男子汉气概的做法”就是“把一切都留给胜利者”。天皇也这样用隐晦的字句和同情的姿态表达了自己的赞同。

此刻天皇正在阅读加濑的报告。这是一份非比寻常的文件。显然，麦克阿瑟扭转了加濑的看法。在描写将军时，这位矮小的外交官是这样措辞的：“他是个杰出的男人，宽宏大量的灵魂光芒四射地拥抱着地球。”他继续写道：“我们真的很幸运，能让一个拥有如此才干和个性的男人担任最高统帅和塑造日本的宿命。绝望而压抑的黑暗岁月中，一缕光明被麦克阿瑟将军本人引了进来……‘密苏里’号上的重要一天将成为历史上最光明的日子，而麦克阿瑟将军就是荒芜中闪亮的方尖碑，标志着人类朝向经久不衰的和平永恒行进的努力。”报告的内容远不止这些，但全部都是这个套路。麦克阿瑟本人可能也很难对这篇报告做任何的改动。

加濑还强调了三点，全都是特地用日语书写的。包括德国在内的另外几个大国都不曾在胜利时表现得如此自大，又在失败时表现得如此卑微。外交官谦逊地猜测：“如果换成我们获胜，又是否会用同样的宽容大度来对待失败的对手呢？显然，事情的发展将截然不同。”在第二点中，他坦率而又几近自虐地写道：“最终，我们并不是在战场上被先进的武器打败的，而是在精神的比赛中被更加崇高的信念打败的。真正的问题在于道德——超越了所有代数演算的力量。”最后一点切中要害。加濑写道，他坐在美军战舰上时发现钢板上画着许多个微型日章旗——即日本国旗，指代的是被“密苏里”号击沉的日本舰船、潜艇和飞机的数量。“我试图去数一数，却感觉如鲠在喉，眼泪一下子涌上了眼眶。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样的画面。那些没有被写下的故事以及勇敢地欣然蔑视死亡的年轻男子……他们就像樱花一样，象征着我们的民族性，在短暂盛开的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却又很快便会坠落。”

据皇室成员们回忆，天皇在这一段上流连了许久，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点着头嘟囔了一句：“啊，是呀，是这样的。”他找来自己的外务大臣，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作为太阳女神（即天照大神）的子孙，历届日本天皇还从没有拜访过任何一个人。可等到麦克阿瑟在东京安置下来，裕仁天皇打算通过一个曲折隐晦的方法告诉将军，自己想要正式拜会他。重

光很高兴，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毕竟在被同盟国占领的这段艰难岁月里，没有比这更有利的姿态了。这位外务大臣像“初樱”号驱逐舰上那些低垂的大炮一样鞠了一躬、退了出去，在天皇的视野里消失了。

---

1. 第16师的确驻守在巴丹半岛上，但不大可能是“死亡行军”背后的始作俑者。

2. 两人搭档的警察审讯组通常会采用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策略：一人恐吓着提出一个问题，另一人则表示体贴和同情。麦克阿瑟一个人便能扮演这两个角色。在某个场合中，在对金凯德一阵狂吼之后，他用一只手臂揽住上将，轻声说道：“你什么事都得插手，对不对？”上将感动地回答：“当然。”将军就这样赢得了他的信任。

3. 埃格伯格医生也曾问起麦克阿瑟为何要冒这种不必要的风险。将军的回答和他在科雷希多岛上对奎松所说的差不多：“如果我这么做了，上校们便会效仿。如果上校们尚且如此，那么上尉们就更不会坚守岗位了。以此类推。”埃格伯格仍不满足，还在苦思冥想将军的动机。作者就此询问过耶鲁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和药理学的教授罗伯特·拜克博士。面对这种鲁莽轻率的行为，他只回答了一个词：“自杀性。”

4. 美军的分支代号如下：G–1，管理；G–2，情报；G–3，作战；G–4，军需。

5.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这让我感到非常尴尬。”至于他是否真的感觉尴尬就有待商榷了。

6. 柏林方面的投降协定也加强了东京方面的求和意愿。事实上，东京方面拒绝在纳粹之前退出。

第八章
最后一岗
1945~1950



1945年的日本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它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或者甚至是在中国文化中的）“皇宫”。当然，皇家还是拥有一片宏伟壮观的领地的。这里宽阔宁静，环城的护城河中覆盖着茂密的藻类植物。然而站在外面观望，映入眼帘的却只有古老的石质四角箱灯以及一棵棵美国梧桐、竹子、柏树、日本柳杉和高耸的盆栽巨松。被日本人培育了两百年的盆栽矮株常青树展示着日本人在微雕艺术方面的天赋，其造型细致模拟了高大的多节树木，就连如同患有经年关节炎般扭曲歪斜的树枝都模仿得淋漓尽致。透过巧妙种植的树木，游客们就算费尽心力也瞥不见任何的东西，因而只好不抱幻想。领地里既没有舒展双翅的石雕，也没有高耸入云的山墙，更没有雉堞状的高塔或尖顶。王室成员居住的房屋是一系列用木头和浆纸搭建的花园住宅，充满典雅的东方简约风格，其间还点缀着“障子”（一种纸质的滑动门），上面印着裕仁天皇的皇室徽章“十六瓣菊”。

那年9月，居住在裕仁领地上的皇亲国戚中，一位长着罗圈腿、嗜酒如命、奢侈享乐的皇叔因斩首过被俘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士兵而有可能面临战争罪的起诉。实际上，他的处境十分安全，因为麦克阿瑟已经得出结论：将他绳之以法会导致裕仁的退位，从而引发混乱、无序和游击战。刚刚走马上任的同盟国最高统帅就是这样的明智。那些批评盟国驻日最高统帅的人总是嘲讽他声称自己能够洞悉亚洲人的思想。后来他也曾亲口说过：“即便在这些人中间生活了50年，我也还是不能理解他们。”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几个西方人能够比他更接近亚洲人。他研究过日本的民俗、

政治和经济，更重要的是，他还深思过裕仁的子民是怎样生活、工作和思考的，从而觉察到了他们惊人的能量和无限的潜力。他深知，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日本很小，但按照埃德温·O. 赖肖尔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其实“比意大利大得多，和英国相比更是大了一半”，且“人口几乎比西欧四大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任何一个都多出一倍”。将军认为，和英格兰类似，是岛国的风貌和变幻的天气塑造了这个在纬度上相当于从蒙特利尔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的国家。他不相信九成的日本人都会读书写字，因为他知道那些满口黄色暴牙、身穿宽松裤装的古怪老师只会教学生们死记硬背复杂的日语汉字，也就是那些从中国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字符。实际上，不光是学生，就连老师们自己都不见得理解这些字符背后的意思。所有涉及地理、历史、武术、“伦理”甚至是数学的教科书都成了宣扬迷信的工具。坦率地说，日本人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也许可以用社会学术语来解释。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描述了三种基本的社会性格。“他人导向型”的人会按照同侪的期待来模仿他们的行为。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美国郊区人就属于“他人导向型”。“内在导向型”的人会用自学到的自我期待方法来指引自己。麦克阿瑟就属于这一类人。第三种性格类型被称作“传统导向型”，自中世纪以来就在西方世界里销声匿迹。“传统导向型”的人很少把自己看作一个个体，他们的行为是由过去传承下来的民俗礼仪决定的。将军知道，这恰好描述了日本人的性格，而这一点从他们对天皇忠心耿耿的事实中便可见一斑。无论是现代科技的出现还是战争的失利都没能泯灭他们对这位神圣人物的尊敬。走过横亘于裕仁领地护城河上的二重桥时，虔诚的日本人依旧会朝着地面深深鞠躬。直到B–29轰炸机到来之前，有轨电车售票员在樱田门前停车卸客时也还是会下车跪拜一番，然后才上车继续前行。战后，虽然他们经过这里时只会在缓慢行进时低一下头，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不少日本人会在4月29日天皇生日当天（天长节）自发涌向樱田门，向统治者致敬。他们这些人是在神风特攻队的启发下出现的——并称自己为上天之息。

官员们并不想把这样的惨剧汇报给天皇，只是搬走了尸体，然后检查确认热情的民众没有任何的恶行。对于日本人来说，对最高统治者敬而远之一向十分重要。就连曾经以全能君主的名义统治国家的封建领主幕府将军也被简要地形容为“竹帘背后的男人”。麦克阿瑟对这一细节心知肚明，还打算让自己也悄悄隐藏在竹帘背后。护城河象征着凡人与圣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这条鸿沟上的景色可谓分外宜人。白色的天鹅掠过河面，身下映着的洁白倒影旁游弋着肥硕的鲤鱼。在麦克阿瑟到来之前，偷钓、偷猎不仅是一种大不敬，更是一项死罪。曾有三个外国人因放线偷捕为皇家垂钓准备的鱼而被斩首。正如深陷牢狱中的温赖特苦思冥想总结出的那样，在神权政治岁月中统治日本的是“原始的黑暗时代哲学”。最高统

治者拥有亨利八世一般的绝对统治力，其权势如同护城河畔的宫殿石墙一样坚不可摧。

在许多方面，这些城墙既是东京最壮观的特色，也拥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早在1542年，首批发现日本的欧洲人（葡萄牙人）便在这里落脚，并在随后的十年中引进了让日本人叹为观止的基督教和火药。他们认为，如果这就是这些新来的人所能做到的极致，那么大日本帝国没有他们反而能过得更好。传教士和皈依他们的信徒遭到了驱逐，日本人被禁止出境，唯恐他们会感染上基督教的“病毒”。然而，火药却留存了下来，幕府将军认为它将有利于对付新来的入侵者。与此同时，据点周围建起了高大的土墙，用以抵挡即将到来的欧洲炮弹。皇宫是几处幸存下来的建筑之一。它的体积庞大——一块块大小各异的灰色巨石不可思议地堆砌在一起，光滑的曲线似乎轻而易举地向上延伸着。

16世纪时，这些城墙曾是坚不可摧的。可到了1853年，当佩里的舰船停泊在东京附近（即当时的江户），要求大日本帝国打开国门、开放贸易时，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向不可抗力屈服的幕府将军签署了一项协议，结束了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状态。起初，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变革总是很晚才能到达日本的海岸。直到19世纪末，日本农民才明白火车头并不是恶龙。然而，工业社会的诅咒很快降临在了这片国土上：童工、污染、工厂事故、快速传播的传染病以及与其他大国的疯狂竞争——包括加入国际军备竞赛。尽管拥有准确的直觉，日本人却总是会选择错误的榜样。他们从法国的施耐德–克勒索冶炼厂买来武器，可走上战场之后才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因为该厂的武器远次于克虏伯、维克斯和阿姆斯特朗的产品。除此之外，日本外交官还喜欢仿效英国的外交方式，总是试图挑衅他人。19世纪80年代，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的顾问更是邀请了德国人帮助他们创建了立法机构。

在随后订立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下，日本国会只提供民主政治的额外实惠，实际上比德意志帝国国会还要独裁专制。中产阶级并不存在。妇女在形式上位列低等公民。实权归属于军国主义者以及后来的11大产业家族——三菱、三井、住友、安田等——他们控制着75%的国家贸易、原材料和交通。被地租束缚在田地里的农民只不过是佃农，却要供养10万名在外的地主。1884年被宣布为“国教”的日本神道教根本就不是一门宗教，而是日后将出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某种宣扬民族性和武德、贬低其他种族的本土民间信仰。在国家的支持下，日本兴建了11万座神社。除此之外，每家每户（就连最偏远稻田旁的简陋茅舍）也都供奉着小型的神龛。一家人每天都要在某几个时间点聚集在这里，朝着天皇皇宫的方向跪拜。人们没有公民自由、公民权利和人身保护法，只有服从命令的绝对义务。没有人知道真相。人与人之间对话的目的完全是出于礼貌，而不是为

了传递信息。法律禁止一切违背礼制的行为。日本宪兵队监禁了上千名怀揣"危险想法"或疑似心怀不轨的人。麦克阿瑟写道，"和任何现代国家相比"，这里倒是"更接近斯巴达"，也与欧洲极权主义有几分相似。

一个日本人遗憾地写道："西方的一些玫瑰移栽到日本之后就失去了它们的芳香。"然而，除却进口化妆品、水泥公路和煞费苦心、矫揉造作的门面，大日本帝国仍旧是最具东方特色的国家之一。这里一半的人口（700万户家庭中总数超过3 500万的居民）辛勤耕作在569.8万座农庄里，头戴宽檐草帽、身穿粗糙的蓑衣，看上去就像是封建时期版画中的人物正在耕耘和他们一样古老、陈旧而又褶皱的土地。为了庆祝丰收，祭司会敲响沿用了几个世纪的庙宇响钟为节日拉开帷幕。治安由封建制度下的"邻保组织"来维持。展现勇武之气的武士阶级因为不时就有人切腹自杀而日渐薄弱。为了庆祝一项颇具魅力的中世纪风俗，报纸会在新年特刊上刊印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模仿诗人松尾芭蕉写就的三十一音短歌和十七音俳句。就连裕仁创作的诗句也会被刊登在报纸上，只不过作为民众心中的圣人，他是不会获得任何奖项的。木偶艺术、古代宫廷音乐雅乐和国家运动相扑摔跤蓬勃发展起来，而日本歌舞伎也在战争中发挥了其耀眼的专长。

和平年代间（在B–29轰炸机到来之前以及麦克阿瑟开展都市重建行动之后）东京一直都是世界上最绚丽多姿的城市之一。站上300米高的东京塔，就可以将这个令人陶醉、惶恐、愤怒而又愉快的民族尽收眼底。如果说日本人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展现出了最好的自己，那么他反过来也给了日本人一个展现美好自我的机会。透过那片似乎永远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潮湿曼妙的薄雾向下看，东京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人会想，也许就连当地人也被这座缺乏路标的首都搞得晕头转向，或是外面发生了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才会引来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可事实并非如此，东京永远都是这副模样，热闹非凡、拥挤不堪。乡下的景象也与这里相差无几。日本长期以来就面临人口过剩的问题，只有15%的国土适于耕种，可就连这一部分土地也不是特别肥沃。在空间十分珍贵的国情下，也难怪日本会成为迷你收音机和迷你电视机的故乡。他们要么必须出口足够的货物以换取进口食品，要么就得将过剩的人口安置到其他地方去。这也是该国为什么要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4年后又对美国发起攻势的原因。注

站在东京塔上，有些人的第二印象就是耳边令人难以置信的刺耳声音。这些从脚下传来的声音中包括了流浪乐手的日本吉他发出的幽怨音符、竹笛吹奏的如同冒泡喷泉般的欢乐曲调，还有六孔竖笛三重奏的旋律以及音色与竖琴相近的日本古筝声音。这些音调与内燃机的声音、银座（17世纪初在位的幕府将军印制钱币的地方）街道上购物人群唠叨的话语声融合在一起，让人不由想起了身着校服、兴高采烈的小女孩们如小鸟般喋喋不休的

声音。

紧接着就会有人注意到随处可见的漆器和塑料器皿。电话是亮红色的。手举有象征意义的连枷的神职人员头戴黑色喷漆帽，身着雪白长袍和金色斗篷，脚蹬草鞋；皇冠骑士们头戴红漆冠帽；日本漆不仅点亮了点缀着花朵的马笼头、高大的木头马鞍和马背上色彩斑斓的马镫，也使得过往的成群艺伎脚上穿着的日本木屐显得格外显眼。就连顶着繁重蜂窝状发饰的已婚姐妹们雪白天真、小巧精致、如瓷器般的脸蛋看上去也像是上了漆一般，或者甚至是用胶粘上去的似的。

大部分上了年纪的妇女都会穿着和服，但她们的女儿已经越来越少穿着这种服饰了。这就是多样性的一部分，也是白天的东京给人们最后的印象。这里的年轻女子会穿着迪奥时装、蓝色牛仔裤、迷你裙甚至是紧身短裤。而男子身上的服饰就更是多种多样了。和银座相比，纽约第五大道、伦敦斯特兰德大街、巴黎圣奥诺雷大街、柏林库达姆大街和罗马威尼托街都会显得单调乏味。绅士们有的身穿宽大上衣、剑道裤裙的日本旧式礼服，有的身穿双面针织衫和粗斜纹棉布服。一队身着黄绿相间制服的男子出现在这座城市新建的一座钢筋水泥建筑旁的小巷中，似乎没有人知道行走着的这些人是谁，但他们还是从拥挤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群中挤了过去。另一队人也从对面的方向走了过来，满脸兴奋的年轻人肩上扛着摇晃的轿子，上面悬挂的写有虔诚祈祷的饰带也跟着左摇右摆起来。这一次，我们还是不能分辨出这些人是哪门哪派。他们也许是神道教信徒，尽管已经失去了国家的资助，这种宗教依旧没有绝迹。他们消失之后，一队弓箭手紧随其后，箭袋里插着的弓箭如同孔雀身上展开的亮翎一样。弓箭手的身后，一辆马车上装满了大堆的梅花、鸢尾花、紫藤花……

狂欢的队伍会一直延续到深夜。不久，一个微妙的变化发生了。日落后的大日本帝国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这里的月亮不知为何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能见到的更大、更圆。纸质灯笼、糊纸墙背后闪烁的柔和灯光都暗示着错综复杂的秘密。黑暗让人想起，如果说西方国家是由法治政府来统治的，那么日本人就是由情感来支配的。据曾经写过好几本日本研究专著的侯雅信观察，这个民族一旦“仇恨到了极致，便会沉溺于各种令人难以启齿的恶行”，可“当怒火熄灭”，就又会成为“世界上最彬彬有礼的人”。日本人也为自己的这种国民性格深深着迷，还有一整套形容自身多种情绪的词汇。比方说“沐浴”代表与自然界各种具有创造性和美妙的事物亲密交流的一种心境。“办法—没有”指的是放弃。“物衰”表示意识到世界的无常、感悟到人终有一死。“残虐性”是一种残暴而又野蛮的精神。对生活萎靡不振被称为“厌世”。掠夺马尼拉的日本士兵就被“残虐性”迷住了心窍。而“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之后，这个仰面倒在麦克阿瑟脚下的国家则陷入了种族历史上最“厌世”的一段时期。赖肖尔评论道，战争伊始时，日本领导

人“期待能够借助日本人的意志力优势获胜，其人民也倾尽自身的所有意志力，直到精神都已枯竭。除了这里的城市，就连人民的心都被燃烧殆尽了”。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日本曾被称为“亚洲工厂”。如今，这里却成了亚洲的废料堆。裕仁的帝国疆土减少了81%，从773 781平方英里缩小到了146 690平方英里。大都市也都无法居住。电话实属罕见，火车就更是稀罕之物，国内几乎没有一座电站。温度计上的指针很快就会下落——天就要冷了，日本蟋蟀（相当于西方的螽斯）即将唱响“缝袖子，缝裙子，冬来到”的曲调。投降之后，这些昆虫的叫声每晚都会更加响亮一些。可煤炭产量却只有和平时期水平的1/8。纺织业是这个国家战前经济的支柱。进入备战状态后，国家80%的纺织机械都被转化为其他用途，如今则被支离破碎地堆在遭遇轰炸的建筑废墟里。日本的商船队早已锈蚀在东方的几个海洋的海床上。广岛和长崎沦为了乱石岗，而包括首都在内的其他主要城市实际上也成了恐怖的荒地。随处都能看到扭曲的房顶框架、拇指般的公共浴室烟囱和低矮的庇护所，偶尔还能看到如今已经被烧得焦黑的沉重铁卷帘——那是昔日武士大本营的遗迹。

除了少有的几座防火防震的建筑之外，其他大部分楼房都只剩下了残垣断壁。人们只能在波形铁条搭建的临时棚屋中维持生计，除此之外无处可去。超过200万户房屋都被李梅的轰炸编队摧毁，另有50万户则是被日本人自行摧毁、充当了防火线。很快，近700万驻扎在中国、朝鲜、“法属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和皇军驻守的其他前哨基地的日本士兵将被遣散和遣返。一旦他们回国（随行的还有像儿玉誉士夫这样曾经统治过被征服人口的日本平民），日本列岛将至少需要400万处新住宅。除此之外，这些人还需要食物。衣不蔽体的妇女们把自己最后的和服都拿了出来，却只能换到一小捧种子；全家人的衣服就只剩下一件单薄的浴衣。因洗劫上海而被当作战犯等待审判的儿玉在狱中写道：“为了有米可食，日本必须依赖和美国军队当局合作。”麦克阿瑟建设起了军队炊事处，通过电报通知华盛顿自己急需350万吨食物。五角大楼方面对此含糊其词，国务院则要求他提供更多的细节；他需要填写一大堆的表格，咨询各种官员，打通官僚渠道。将军用坚定的语气又发送了一封电报：“要么给我面包，要么就给我子弹。”

帝国的大部分杰出领袖都死去了。共有超过127万日本人在过去的4年激战中丧命，其中67万平民死于轰炸。麦克阿瑟写道：“有史以来，从没有哪个国家和它的子民曾遭到过如此彻底的毁灭。”肯尼认为他们患上了“炮弹休克”。约翰·冈瑟写道，“苦涩的剧痛和战败的羞耻”让这里的人们“茫然无措、蹒跚踉跄、目瞪口呆”。正式投降的6天之前，麦克阿瑟乘车进入了首都。除了天皇闪亮的豪华车队之外，城里几乎看不见任何一辆汽车。将军

发现自己正盯着一片如月球表面般体无完肤的住宅区，而被他凝视的男男女女全都歇斯底里地傻笑着逃开了：“距离美国大使馆22英里远的横滨新格兰酒店是我占领日本时的家，但路上满目疮痍，还遍布着烧焦的碎石。”

当日本人还不习惯看到占领者时，就遭到了再一次打击。裕仁天皇未与将军商榷便下达了一封诏书：“我们站在人民这一边，希望能够一直与他们分享喜乐与哀伤的时刻。我们与人民之间的纽带永远都依赖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喜爱，而不仅仅是传说与神话，更不是建立在天皇是神圣的以及日本人优于其他民族因而注定要统治世界的错误观念上。”也就是说，他们一直都在为谎言而战。美国的战时宣传所说的是对的。他们的统治者不是东方的奥丁，也不是托尔，而是一个男人。他不是什么神明，所以他们的123代祖先全都遭到了欺骗。肯尼回忆，天皇的诏书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的神圣之处……字里行间满是漠然”。麦克阿瑟注意到，他们的整个世界都变得支离破碎：“这不仅瓦解了他们的军事实力——也击垮了他们的信仰，粉碎了他们所相信、盼望以及赖以生存的一切，只留下一片道德、思想和肉体上的空白。”如今，他们的过去没有了任何的意义。他们必须挥别所有的一切，把未来寄托于任何流入这片空白的东西，由新的雕塑家来重塑归置在那里的纷杂情感。

杜鲁门总统未与身旁的参谋商榷，就任命了麦克阿瑟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事后他也会后悔这一决定，但在太平洋战区的美国老兵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将军无疑是个热门人选。如果民意调查可信的话，这位新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已经成为1945年盛夏美国人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之一，仅次于艾森豪威尔。他本人显然也很享受自己作为日本总督的角色，称其为“战神赋予老战士的最后一份礼物”。刚一上任，他就给了大家一个下马威。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曾经起草过一个严惩德国人的计划，并为日本人准备了一个类似的惩罚性计划。摩根索本以为这位曾经被困科雷希多岛的军官会支持自己的计划，却惶恐地听到将军开口说道：“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能从我的贡献中找到一些值得参考的地方，我希望他提起的不是一位征战沙场的指挥官（即便得胜的是美国军队），而是一个在枪炮停歇后把安慰、希望与基督教道德信仰带到屈服的敌人的国土上、并把此举当作自己神圣使命的人。”

这些话在当时听来格外奇特，甚至有些匪夷所思。毕竟很少有胜利者会有这种感受。当哈尔西信守承诺、骑着马走过破败的东京街头时（他骑的虽不是天皇的坐骑，但也是一匹俊美的白马），人们开始欢呼雀跃。9月4日，41名美国记者受邀参加第84次日本国会特别会议（裕仁天皇亲自与会发言，催促“重建所有的战场”），其中37位听说自己必须在大门处接受武

器检查之后拒绝出席。与他们不同，麦克阿瑟从一开始便下定决心要做一位调解员。就在东久迩首相于天皇讲话结束后上台解释有条件投降的决定时，艾克尔伯格的第8集团军也跟随第4海军陆战队登上了海岸。他手下的士兵们本以为自己会受命解除仍旧蹲守在关东平原上的25万敌军的武装，不料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下达的第一条命令却是让敌军的指挥官自愿缴械投降。

麦克阿瑟向自己困惑的参谋们解释道，这是一个面子问题。如果他们现在就让日本军队蒙羞，以后就会更难对付他们。他心里还有一个实际的理由。日本的密室里还藏着上百万把镶嵌着宝石的武士刀，对占领军来说存在着潜在的威胁。他预测，一旦人们听说投降是自愿的，兴许就会把武士刀交给美军。事情的进展果真如此，目前，一艘载有7吨闪亮纪念品的船只正朝旧金山驶去。紧接着，将军又否决了召见裕仁天皇的建议。他说，西方人的急不可耐比不过东方人的坚持忍耐，只要天皇对他感到好奇，便很快就会来见他。第二天，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撤销了哈尔西的一条命令，惹恼了美国海军。哈尔西上将禁止日本渔民穿越东京湾，怀疑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在第3舰队的战舰下面安置水雷。麦克阿瑟痛斥此举实属无理取闹，并指出捕鱼对这些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饥肠辘辘的民众也需要他们捕捞来的食物。在没有出现事变的情况下，他在东方人民心中的形象更加光辉了。

驻守东京期间，和过去一样，将军和同胞之间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他的夸夸其谈。这样的行为也许能取悦他父亲那个年代的人，却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人听来有些空洞无物。当记者们济济一堂，前来参加遭过重创的位于赤坂的美国大使馆的重张仪式时，由昔日的第7骑兵团组成的仪仗队排着整齐的队列，吹响了军号。将军朝着艾克尔伯格转过身来吟诵道：“把我们的国旗舒展开来，让它满载荣耀地飘扬在东京的日光下，象征着受压迫的人们心中的希望和胜利属于正义的预兆。”此话不免招致美国知识分子的揶揄，但他们应该更加仔细观看他的表演。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在描写战后的日本时指出：“（这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需要是信仰、神秘感和道德沦陷之后的复兴。麦克阿瑟强大而又具有奉献精神的形象填补了这种需要，而这有可能是其他美国将军无法企及的。”

起初，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麦克阿瑟作为地方总督的所为能够超越他在战场上的成就。他本人曾经说过：“这和打仗时截然不同，却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其实历史上早有先例，而且大多令人失望。大部分试图插手政府管理的杰出指挥官（惠灵顿、基奇纳、贝当）都泯灭了自己的光彩。麦克阿瑟将拿破仑视为“史上最伟大的战士”，却这样评论他：“拿破仑在战场上是个天才，能够想出别人想不到的组合。但在政治事务方面，他过于听信自己的顾问。他有不少绝妙的主意，却在听信了身边人的话之后对它

们失去了信心。他累了。驱使他继续前进的动力也枯竭了。”

将军还维系着自己的动力。34年来，他没有因为疾病失去过一天。他的医生发现他的迅速反应能力和50岁的人相差无几。占领日本之后不久，他患上了脓毒性咽喉炎，他谢绝了医生的照顾，依靠他自1918年被毒气侵害之后断断续续服用的一种疗效令人担忧的成药恢复了健康。他依旧活力四射、生龙活虎，甚至有些桀骜不驯。美联社东京办事处的总编拉塞尔·布赖恩斯写道：“尽管他此时比身处新几内亚时纤瘦不少，最高统帅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松弛闲散，也没有因为占领时期众多未曾公开的成就而放松自己。凭借同样的活力、同样难耐的执着以及同样的自信，他继续向前驰骋着。”（让将军感到为难的是）《时代周刊》中提到“他斑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遮盖着一块秃斑”。C. L. 苏兹贝格认为：“将军的身体素质异于常人……有人告诉我他会染发。即便如此，他还是一个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男人，浑身上下充溢着年轻的活力。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加高大……在吃喝方面十分节俭，虽然从不锻炼，但穿上军装后身材凹凸有致。”

美国驻东京大使、高级外交官威廉·J. 西博尔德认为，如果麦克阿瑟是个“不够果断的统帅……占领日本的行动有可能完全惨败”。由于在战争过程中广泛搜集到了不少简报，将军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眼下几乎不需要华盛顿方面给出建议。与德国占领区雷厉风行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不同，麦克阿瑟把自己的任务视为一项高尚的历史使命。有别于拿破仑，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对下属的呼吁置若罔闻。到了日本之后，他越来越不愿听从他们的建议：“有时候，我所有的参谋都会站成一排反对我。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毕竟我比他们的经验更加丰富，而且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对的。”他的直觉指引他做通天皇的思想工作，将“我们最好的资源和他们最好的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他在“一战”之后前往被占领的德国短暂造访的经历也让他更加坚信，禁止士兵们与战败国的民众进行社会交往不是什么好政策。“士兵就是士兵。”他说道。不管怎么说，他相信美军士兵更在乎的是陪伴而不是性，尽管他对后者也不持反对意见。一次乘车穿行在首都时，他看到一个美军士兵在门口搂抱着一个日本女孩。士兵和女孩的动作都较合格。“看看吧。”将军对法比昂·鲍尔斯少校说，“他们一直试图让我阻止这些士兵招蜂引蝶。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的父亲曾经告诉过我，除非我确定自己的命令一定能够得以执行，否则就不要开口。比如，为了中国的茶叶，我是不会下达‘不深交’政策的。”就算将军手下的一些军官不如他宽容，他也不会故意侵犯这个拜倒在他脚下的国家。惠特尼在回忆录中就曾骄傲地描写过自己对待日本政治家白洲次郎的方法。他写道：“白洲因为让我和其他几位军官久等的事情道歉，我笑着答道，‘没关系，白洲先生。我们很享受你们这里的（核爆）光辐射。’那一刻，仿佛是事先算计好了似的，一架巨大的B–29轰炸机从我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白洲先生的反应简

直是无以言表，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格外尊重日本人情感的麦克阿瑟是不会如此幸灾乐祸的。在他看来（甚至应该说是在日本人看来），他能够自由地为日本指明方向是件十分幸运的事情。从理论上来说，他是在华盛顿的支配下执行管理工作的。战争部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国务卿詹姆斯·F. 伯恩斯坚称将军在占领政策方面没有发言权，而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声称这一政策应该由国会、战争部和海军部来制定。不过艾奇逊曾经承认，由于“麦克阿瑟在最后关头提出反对”，埃夫里尔·哈里曼没能向斯大林提交提案。由此看来，将军似乎并非处于服从的地位。事实上，西博尔德大使的报告必须通过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批准才能被提交给身处美国国务院（雾谷）的上司；得不到最高统帅的批准，大使甚至都不能应邀前去拜访居住在叶山御用邸的天皇和皇后。也就是说，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才是实际上的专制君主。然而他的目标绝对没有君主政体的特点。他每天都要花费100万美元，为的就是把一个新的概念、新的词汇引入日本的语言中：民主。对他来说，保持独裁者的姿态（这也是那些批评他的人所期待的），让日本社会恢复战前的秩序自然会省力不少，但他采取了一个主张改革的方针，而这可能会花掉克莱这样的将官所有的佣金。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参谋们通常都会摒弃内心深处的保守信念，盲目地跟随他。因此，曾有人不小心听到惠特尼（属于典型塔夫脱式共和党人）告诉一位日本政治家：“能够拯救你们国家唯一的方法就是机敏地摇身一变，转向左翼。”

外交官们喜欢挑剔法律正当性的做法曾经激怒过将军，在未来的对韩问题上也不例外，但在初到东京的4个月中，将军却只从中获益匪浅。他的总督权力源自7月27日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牒的12天后，苏联人才加入太平洋战争。因此，和所有其他的已交战同盟相比，他们的资历最浅。感到被人怠慢的苏联人愤怒不已，拒绝参加同盟国理事会8月底为将军组织的提议会。那年秋天，由于分歧而变得四分五裂的理事会无法发挥任何的作用，来为他开创先例。此外，麦克阿瑟还拒绝了建立不同占领区的提议。12月27日，当理事会终于在东京会合并商议日本的未来时，苏联人想起斯大林在4个月之前只批准任命一位美国指挥官驻守东京。如今他们想要改变这一条要求，提议成立四国理事会监督麦克阿瑟的工作。华盛顿方面，杜鲁门政府的某些成员也想要和苏联人、英国人瓜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权力。然而，将军却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一位美国记者，说事情若是果真如此，自己会“在辞职之后告老还乡”。华盛顿方面就此退却了，而他也几乎完全忽略了最终成立的四国理事会。用西博尔德的话来说：“从那以后，他成功运用后卫行动抵御了一切削减自治主权的行动。”

从理论上来说，他要对华盛顿方面的四个人负责：总统、战争部部长（后

来的国防部部长）、陆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严格依据法律，他还应该听命于上司，不再干涉日本经济生活的复兴、减轻平民的苦难或者将他们的生活恢复到中等的水平上来。然而，尽管上有伯恩斯和艾奇逊，他依旧是唯一一个受命不用事先咨询国会意见就能发表政策声明的美国驻外军官。总统告诉他："你可以在适于履行自己使命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并非停留在契约基础上，而是基于无条件投降……我们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发扬个人特色，将军自然选择了尽可能广泛地解读自己的使命，而需要指出的是，杜鲁门当时对这位新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在政治事务上挥斥方遒的做法十分满意。除了苏联人，所有人都同意他的做法；凭借个性的力量和西博尔德大使口中的"麦克阿瑟的魔法"，将军把占领日本的行动转变成了一出独角戏。大使这样总结道："美国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个人能够独自手握如此强大而又绝对的权力。"

这样的情形在美国的历史上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在亚洲却并不罕见；1598~1868年德川幕府统治期间，分别驻扎在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和印度的荷兰人、法国人以及英国人（如克莱武和沃伦·黑斯廷斯之类）都曾担任过仁慈的独裁者。但他们都不曾像麦克阿瑟占领日本时那样独断专权——此外，尽管将军的大部分同胞并不知情，他的势力也延伸到了菲律宾和马里亚纳群岛：那里生活着总数超过一亿的人口。他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殖民最高统治者，除了少数几个本地人之外几乎无人可及。日后他写道："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工程师、制造主管和老师，甚至是差强人意的神学家。"如果有人认为这话暗示着他把自己的任务视为是一种负担，那就错了。他很享受这份职责，还说自己打算把大日本帝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试验室，研究如何解放极权军事主义统治下的人民并开放其政府"。简而言之，作为独裁者，他有意在自己征服的国土上实施自由。日本国会同意神道教应被民主代替。正在初学英语的日本人会走到美军士兵的面前用蹩脚的发音问道："你好，乔。民主应该很好，对不对？再见。"当时的他们不太可能理解什么是民主，战后的第一个冬季，这个词只不过预示着巧克力棒、流行音乐、自动唱机、香烟、肥皂剧和B–29汉堡。然而，它对艾克尔伯格手下的士兵们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就连麦克阿瑟也把这个概念和棒球、乔治·M. 科汉、鞭炮（炸弹）、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可靠的管道设备、约翰·菲利普·苏泽以及世纪之交的美国怀旧记忆混淆在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悖论依旧存在：若非将军如此无所不能，这个"试验"很有可能失败。

他当然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架空裕仁天皇、解散日本国会、取缔政党或是取消任何人的公职。当他决意开除所有曾隶属于军国主义和右翼团体的议会议员时，币原喜重郎首相的整个内阁都站出来抗议，并威胁要辞职，让首相去组建一个新的政府。从外务大臣口中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冷冷地答道："如果内阁明天集体辞职，只会让日

本人民认为他们无法执行我的命令。”内阁大臣们撤回了自己的辞职要求，麦克阿瑟的命令也得到了贯彻。

日本报纸被要求全文刊载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公报。不过他们遵循他的心意刊发的报道却随时都有可能被撤回。美国记者们虽不必受制于审查制度，但若是谁离开日本，将军就可能禁止他返回。类似的事情就曾发生在发文冒犯过麦克阿瑟的一位《新闻周刊》记者身上。美国商人未经最高统帅批准不得进入日本，且访日期间会被全程监控，若是未经准许甚至不得在酒店登记入住。美元在被换成军队代币或日元之前是不值钱的，一美元可以兑换360日元——汇率由将军制定。外国使节的国书必须递交给他，而非裕仁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从不会给他们回电话，且随时都可以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西博尔德代表美国国会建议他向几位驻东京代表团主席简报朝鲜半岛发展问题。麦克阿瑟表示，鉴于自己不负责朝鲜半岛事务，他认为此举没有任何意义。他还补充道：“还有，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应该由我来做简报？杜鲁门总统、英国国王或其他国家领袖都不会做这种事情。”

日本的变革之风似乎总是从南方吹来的。国家最南端的港口鹿儿岛上第一簇樱花盛开时，一年一度的赏花季开始了，并由此延伸到九州，穿越丰后海峡到达四国岛，横越内海到达本州岛。自石器时代便迁至列岛的大和民族先人也是循着同样的路线在这里安家的。1945年秋，650万日军从天皇痛失的帝国返回了日本。作为赋予持异见者自由计划中的一部分，麦克阿瑟从宪兵队监狱中释放了1.6万名共产主义者。这些人即将去迎接心灰意冷的老兵们。显而易见，一场政治上百花齐放的盛会即将拉开帷幕，但将军的自由计划在改革问题上已经占得了先机。有些日本人甚至利用他名字的发音发明了一个双关语，称他为“Makassar”，因为这个词的日本汉字读起来是“左–红”。随着他做出的决定越来越多，这个名字似乎也越来越恰当。此外，自从斯大林打破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日本诸多问题上的承诺，决定扣留驻守中国东北关东军的37.6万名士兵，将其作为西伯利亚人的奴隶苦工之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数也出现了骤降。

相反，和他们一样在国内辛苦工作的同胞的付出却能得到不受约束的保证。将军一有机会便会提醒他们，命运要靠自己来塑造。“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并不关心如何才能继续压制日本，而是在乎如何才能让它重新站起来。”他说罢还补充道，“我们不应该替他们完成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他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必须为这个遭受毁灭性失败的勇士国度……找回安全、尊严和自尊心。”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是不会干涉他们的文化或和平的风俗制度的。他们将在本国领袖的带领下重建国家，尽可能不受美国人的干预。他希望他们能把自己当作保护者，而不是侵略者。

这样一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旁观者，看着战败的日本人修理自己支离破碎的机械，在临时帐篷里搭建小型流水作业线以及重建房屋、工厂和船坞。麦克阿瑟很赞赏日本人忍受失败时的那份“自尊”。“日本人拥有耶稣登山训众的精神。”他说，“没有人能够把这一点从他们身上夺走。”其他人试图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词语“能屈能伸”来解释这些被征服的人的生活态度。但事实远不止于此。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写道：“对日本人来说……适应一套严格的新规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带来自我满足和安慰。”战争年间，美国军官曾经注意到，日本战俘在经历了一个羞耻的阶段后就会变得格外积极和配合；服侍完一家的主人之后，他们在一夜之间就能投奔另一个主人。这是一种政治受虐的形式，而麦克阿瑟正是能够补足这一点的人。“二战”结束后，在被侵略者踩在脚下的12国中，似乎只有日本十分享受这种体验，而它之所以能够维系下来也正是凭借那些曾让它成为一个可怕敌人的品质。他们杰出的纪律性延续了下来。拉塞尔·布赖恩斯写道，尽管材料短缺，他们依旧能够“凭借不灭的耐心和宿命论在遭遇轰炸很久以前就曾被自然灾害焚毁、冲垮和震塌过无数次的家园旧址上”建造新的房屋。焦虑不安的美军等待着犯下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吕宋岛婴儿残杀案等无以言表暴行的强奸犯、凶手和始作俑者露出他们的真面目。12月，最后一批从拉包尔返回的日本步兵交出了自己的有阪步枪。麦克阿瑟也把克鲁格的第6集团军送回了家，并缩减了艾克尔伯格第8集团军的规模。从整体上来看，仅有15.2万美军和3.8万英军驻扎在日本。如今，盟军士兵已经可以安全地从这个国家的一端启程前往另一端了。

若是换作其他被占领国的人民，说不定早就被胜利者在初霜时就快速占领所有供暖大楼的行为而触怒了（德国人肯定会火冒三丈），但过于谦卑的日本人显然是被本国报纸中描写日军在中国、缅甸、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暴行的内容所震惊了，以至于根本就无颜抗议。如今他们厌恶东条，尽管这份轻蔑也许并非源自他在战争年代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无视天皇的诏书、试图切腹自杀。身处巢鸭监狱的儿玉写道：“向同盟国赎罪是日本的国家责任。”在一份发往华盛顿的报告中，麦克阿瑟指出“日本的战争负罪感正在日益加深”。这话无疑是发自内心的。学者们相信，大日本帝国和分崩离析、罪孽更加深重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日本人已经改头换面。这很难让人相信，却充满了东方人的特点。新型日本人在读到昔日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和面对如今在东京、马尼拉审判过程中展示的各项罪证时，内心充满了厌恶感，因而摇身一变换了一副新面貌。

对他们来说，更令他们感到欣喜的无疑是美军的言行所带来的惊喜。投降后的那几个星期，新型日本人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些思想顽固的日本人，害怕这些人兴许会实施一些可能引发盟军报复的暴行。危机过后，他们认为战犯审判的结束也许会激起占领军的报复。可类似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令他们倍感意外的是，美军士兵总是发自内心地善待他们，不仅将生病的日

本人匆匆送往医院、把走失的孩子送回他们父母的身边，还在有轨电车上给年长的女性让座——以往的日本人只会对自己的亲属做出这样的举动。“日本人会不会鄙视我们表现得如此软弱？”约翰·冈瑟随机询问了许多日本人。一轮民意调查之后，他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不。他们认为我们很精明。”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他们本以为自己会遭到惩罚：饥饿、折磨、洗劫、掠夺。他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曾强迫中国人在家里摆上微缩的旭日旗，因而以为自己至少会被要求挥舞星条旗。可他们很快就发现，美国士兵不仅宽容大方，而且十分招人喜爱。他们听说麦克阿瑟还曾下令，不许美国人掌掴日本人，否则将被判五年监禁。一个日本男子告诉冈瑟：“我们那时候便知道，自己真的输掉了这场战争。”

皇城方面宣布，毕业于布林马尔学院的伊丽莎白·格雷·瓦伊宁将成为15岁王位继承人明仁王储的家庭教师。此时，明仁未来的子民们也开始仔细考入如何才能将美国人的影响融入自己的生活中。200万日本人皈依了基督教。国会请愿让美国批准日本成为自己的第49个州。一本名为《康涅狄格州政府概况》的研究型译本成了热销书籍。1946年圣帕特里克节当天，6位日本辩护律师佩戴着绿色的翻领缎带装饰出现在了首都的战犯审判法庭上，而东京的《朝日新闻》报也开始刊载配有日文字幕的奇克·扬四格漫画作品《金发女郎》。昔日的红灯区吉原地区开设了一所教授美国俚语的学校。京都郊区开设了一家英文名意思为“最后机遇”的汽车加油站。银座的货摊上出现了玩具吉普车的身影，艺妓们低声吟唱起了英语流行歌曲《你是我的阳光》，音乐家们学会了弹奏布吉伍吉舞的曲调，电影迷们为了观看吉恩·奥特里的《大峡谷的呼唤》甘愿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这大多都是肤浅、艳俗和暂时性的。麦克阿瑟的目标之一是将“对武士阶级……的崇拜”转变为“仇恨和蔑视”，但在他离开日本之前，不少流行文学作品仍旧在歌颂日本的战时英雄。同样的情况在德国和美国都曾发生过。不过此事意义重大，因为在他们的亲美心理中，他们也会接受大众欢迎的政府提出的能够在流行文化中幸存下来的制度。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既是日本最受欢迎的男人，也是日本人在战争年间唯一听说过的盟军指挥官，并且他通过“密苏里”号投降仪式华丽登场，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那些让美国人倍感烦恼的特质（他的戏剧性天分，他对士兵绝对忠诚和无条件服从的坚持）都吸引着日本人。他如朱庇特神一般建立起了一个果断坚决、绝对权威的形象；如果一个日本男人被有主见的妻子主导，他的邻居们会说：“太糟糕了，她真是个麦克阿瑟。”东京《时事新报》提出警告，国家英雄崇拜会“神化麦克阿瑟将军”。事实的确如此。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援引一个日本人的话来说，在裕仁放下身段之后：“我们把麦克阿瑟视为了第二个耶稣基督。”一些美国东方学者害怕他的独裁统治也许会日渐削弱自治的基础，可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却相信将军“专横的超然态度和傲慢的优雅举止”树立了占领军的威信。

在为自己的首都总部选址时，他选择了少有的几座在轰炸中幸存下来的建筑之一（一座6层的保险公司大楼），用麦克阿瑟的话来说，它位于“东京市中心，就在环绕着天皇皇宫的护城河对岸”。同样重要的是，它还俯瞰着天皇卫队师的传统阅兵场皇城广场，也就是“东京玫瑰”在战时向全世界保证将军将会被公开绞死的地方。日本人并没有忘记这一地点的象征性意义。这座建筑一夜之间便成了“第一大楼”。裕仁的新统治风格让他在自己的子民面前变成了英国或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君主。他们不仅能在花展、贸易展销会和棒球赛的开幕式上看到他的身影，还能在报刊上看到他的照片，一睹他在人行道上亲吻婴儿、将裤脚卷到膝盖踏着浪花、头上活泼地顶着男士软呢帽在公园中散步、为自己的实验室采集苔藓和地衣或坐在石头长凳上书写匪夷所思的诗句时的样子。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他的出现并没有闪瞎他们的双眼，并意识到还有另一位可敬的男人正在引导他们的命运。

日语中也有“普通民众”这个说法，而普通民众对于将军的好奇似乎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人群每日都会聚集在第一大楼前看着他进出。《新闻周刊》报道：“出版社印发的62页小册子《麦克阿瑟将军》几乎是供不应求。”传言说，将军拥有皇家血统，祖先是日本人，膝下还有一个女儿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日本女性在给他写去的信中央求他为她们绵延子嗣，好让她们能够怀上伟人的孩子。这还只是他从日本人那里收到的一部分来信，每个月他们都会给他寄来超过1 000封书信。其中2/3是用英语书写的，其他则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妓女们想要成立联合会，因为“我们是职业女性”。一位佛教高僧认为自己才应该代替裕仁居住在皇宫里，因为“我曾在554年前被剥夺了王权”。日本警察想要穿上美军士兵的军靴，慢性疾病的患者想要得到治疗，母亲们恳求获得一些如何训练小孩使用马桶的建议。虽然大部分呼吁都是通过邮局传递过来的，但也有不少人是托人亲手送信的，信使有时是从边远县市前来东京的农民。从首相工作的外务省提交上来的正式文书都会经人压缩，把精简之后的版本呈放在将军的办公桌上。所有留下自己地址的记者都能收到一份回复。

“你会有一种感觉，”C. L. 苏兹贝格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在谈起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讳时几乎就要鞠躬了。”一个女人在离开他的总部时就曾拜倒在地上，他搀扶她站起身来，为她掸了掸土，还温和地责备了她几句。还有一件事后来也让他享誉全国。在将军正准备踏进第一大楼的电梯时，发现一个日本小孩已经站在了电梯里，此刻正鞠着躬准备退出去。麦克阿瑟示意他留下。不久，他收到了一封信，里面的内容翻译后的意思是：“我是个卑微的日本木匠，上个星期在您的坚持下与您同乘过一部电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直都在回味这慷慨的一幕。我意识到没有哪位日本将军能做得像您一样。”有人将报纸上刊登的这则故事编写成了一部独幕剧，还有一位东京的艺术家据此绘制了一幅记述英雄事迹的帆布画。这幅画几经

复制，被许多日本人挂在了家中，如同照片《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美国国旗》（挂在美国家家户户）一样。麦克阿瑟本人很有可能在背后参与了宣传活动，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削弱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在日本人的眼中，麦克阿瑟身上最引人注目的两种品质便是朴素和他的个人勇气。和中世纪的日本武士一样，最高统帅总是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的使命：每个星期工作7天，包括圣诞节和他自己的生日。他从未休过假，也从未欣赏过这个国家美丽的风光。从抗日战争胜利日到朝鲜战争爆发的5年间，他只离开过东京两次，去马尼拉和汉城（首尔）参加宣布独立的仪式，而且当天晚上就返回了东京。他拒绝了价值100万美元的回忆录创作要求，因为他想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日本的战后恢复工作中，并把它当作是自己事业的巅峰。他从未使用过日本铁路局为他配备的私人有轨电车。除非乘车去羽田机场迎接显要人物（国会议员、艾森豪威尔、作为杜鲁门的特派代表试图调停中国内战却失望而归的马歇尔）人们每天只会看到他那辆闪亮的1941款黑色凯迪拉克轿车往返于美国大使馆和他的总部之间。这辆轿车是他从马尼拉的糖业大亨奥迪斯·爱德华兹军士长那里买来的，如今由一位军队士官驾驶，挡泥板上挂着国旗，前后悬挂的宝蓝色车牌上显示的是数字“1”和五颗银星。

在两名头戴白色钢盔、脚跨摩托车的宪兵开道下，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车通常会在上午10点半离开大使馆。他会在下午早些时候返回大使馆吃午餐，午睡后回到第一大楼继续工作到夜幕笼罩整个东京。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动向，当日本警察敬着礼亮绿灯为他放行时，其他方向的车辆都会停下来。鉴于他总是遵循同样的日程，他也成了刺客轻而易举就能得手的目标。然而，当焦虑的副官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却只是转换了一个话题。在澳大利亚时，他曾在一大堆手举冲锋枪的保镖护卫下出行，可如今，即便东京便衣刑警发现共产主义恐怖分子正试图准备刺杀他，他仍旧拒绝携带保镖。参谋们私下里决定派遣几个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乘坐吉普车跟在他的后面。然而，由于不想惹他发火，他们告诫吉普车只能跟随在距离豪华轿车一个街区的位置，因而实际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有试图向他提起安保事宜的军官都会被他挥手轰走。最终，参谋提议让一位军官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他这才不情愿地表示同意。

担此重任的鲍尔斯少校认为他们至少能够很快走完这段一英里长的路程。凯迪拉克轿车缓慢地行进着。这样的速度似乎很适合一开始就已忽视少校的最高统帅。据鲍尔斯回忆：“将军靠在褪色的柔软衬垫上，要么在读报，要么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休息，像个刚刚顺利做完冥想的僧侣一样。他雪白的双手如蜡一般光滑，上面只有些许岁月留下的棕色斑点。他的指甲精心修剪过，像是被日本漆抛光过似的。他把两只手放在大腿上，脸上带着平和的表情。比起他的正脸，我更加熟悉他的侧影——看上去是

那样的坚毅。他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我也从未在他的脸上看到过任何划伤的痕迹。他的皮肤很憔悴，甚至有些透明。硕大的骨架让他过大的下巴显得微微向外倾斜着。无论是表情还是步态，手势还是谈吐，他的身上都散发着拥有良好教养的气息……他是个英俊的男人，像精细的矿石、夺目的岩块、硕大的乱石。”鲍尔斯认为他“充满了威严”。

和参谋部的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将军极易受将到刺客和狙击手的攻击。把护卫工作交给他的上校告诉他：“他这样的目标移动起来比游乐场里的鸭子船还要迟缓。”另一位上校补充道：“而且鸭子船还关掉了电源。”当时，恐怖分子的威胁是巨大的。宪兵队一位前中尉领导一伙暴徒就计划在他们经过时朝车子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意。他预测他们会遭到逮捕——后来事实的确如此，可当时没人敢保证这一点。在所有人都焦虑不安时，只有他看上去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在车子缓慢向前行进的过程中，他甚至自顾自地哼起了小曲。随车往返几趟之后，鲍尔斯转过身来说道：“长官，我有几件小事。是关于司机驾驶速度的问题。”将军从《星条旗报》上抬起头来，问道：“怎么了？”少校回答：“他开得太慢了。”将军开口说：“随他去吧。”少校答道：“长官，我能否问几个有关安保方面的问题？”将军说：“你问吧。”少校说：“将军觉得随身带上几件武器怎么样？”将军问道：“我吗？”少校回答：“不。我说的是我。”鲍尔斯回忆：“将军停止了阅读，眼神紧盯着我，像以前从没有见过我似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答道：“随你便。只要别惹什么麻烦就行。”最高统帅告诉其他人：“在东方，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才能成为主人。我信任日本人民能够保护我。”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据某位旁观者回忆，当他到达第一大楼时，身穿笔挺制服、头戴镜面般头盔的宪兵们操着“套着夹具的步枪”，上演了一段“如闪电雷鸣般的阅兵演出：转身、踏步、看齐、向四个方向敬礼，犹如正在祷告的西藏喇嘛”，而“麦克阿瑟则低着头，一脸漠然、庄严肃穆地朝着警卫、平民以及总是聚集在周围却时常遭人轰赶的围观者们敬了一个礼”。人行道上喷涂的白线标记出了将军的行走路线。鲍尔斯看着他走在两条线中间，感觉自己的呼吸似乎轻快了许多，很高兴身上的责任减轻了不少。他时常猜想坐在车上时将军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偶尔也会在途中试图和他发起一段对话。一次，他鲁莽地开口询问将军对艾森豪威尔的欧洲战役有何看法。麦克阿瑟回答：“他让自己的将军在战场上为自己浴血奋战。他们为他做好了掩护，可他却在和国王、王后喝茶。这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拿手好戏。”他的这位前任副官的名字还曾出现过一次。那时，《星条旗报》的头条刊登了加拿大人用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山的事情。麦克阿瑟有些闷闷不乐。他说他知道那个地方。紧接着他又开心起来，开口说道：“你知道吗，考虑到加拿大的地势，那只能算是一座很小的山峰。”

麦克阿瑟对日本郊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开往大使馆的那段绿树成荫的旅程。粉红墙壁的大仓集古馆、一片棒球沙地、满铁公寓、金融大厦的水泥建筑、被燃烧弹摧毁的海军部废墟、皇宫的樱田门和护城河。除非沙场上正在进行棒球比赛（此时他总会一脸渴望地瞥向窗外），他平日里所能见到的日本人只有鞠着躬的警察、第一大楼外虔诚的围观人群和精挑细选出来的官员，很少见到如同自己曾在战场上指挥过的那种规模的庞大军队。他知道该如何调遣自己的参谋，如何反复诘问访客，如何在浏览官方文件的过程中搜集信息。早上7点半起床后，他会在早饭后阅读《纽约时报》和通讯稿的副本，频繁地向正在等待自己到来的参谋发送指令。在第一大楼里，他从未使用过电话，也没有秘书或助理来为他工作。他想要和男人们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必须是男人，他憎恨接待女人，而且几乎从不会和女人见面。西博尔德写道，他通常会“自言自语”，把其他人“当作隔音板”。

这座大楼有个古怪之处，那就是消防通道全都是密封管道，或者应该说是滑运道，且为日本人量身定做的尺寸并不适合高大的美国人。（琼也许能够钻得进去，可她从没有来过这里。）大部分房间都足够宽敞，却总是拥挤不堪；治理一个国家需要太多的人力。尽管麦克阿瑟依仗的人主要是自澳大利亚时期便跟随他的军官，但他还需要2 200名公务员。不久，这位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就不得不建造半圆形的活动房屋，并占据紧邻的林业部等其他建筑了。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麦克阿瑟的休息处位于第一大楼的顶层，却并不是特别的吸引人。他把宽敞的角落办公室分配给了自己的首席副官，却给自己选了曾被用作储藏间、内部空间较小的这个房间。墙壁上铺设着胡桃木的镶板，地板则是紫灰色的。起初这里并没有安装空调。和身居西南太平洋战区时一样，这里除了将军之外，所有人都大汗淋漓。书架上立着一座黑玛瑙钟表。一张伤痕累累的长沙发椅两端各摆着一张破旧的皮椅。据鲍尔斯回忆，“访客们坐在那里时就像是在拍哈德孙河谷（西点军校）的全家福一样”。烟斗架上支着17支烟斗，其中5支是玉米烟斗。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转椅面对着一张铺着粗呢台面的红木书桌，上面摆放着一把开信刀、几支铅笔以及几个收发篮。每天工作结束时，这里都整洁得如同西点军校的带锁储物柜。他严格规定，今日事必须今日毕。

最高统帅拒绝重新接纳自命不凡的《新闻周刊》记者入境引起了一片骚动，他高调地告诉新闻杂志的驻外编辑：“我喜欢批评指责。”当然，这话并不属实。他的墙上挂着的两幅格言画框就证明了他对批评的憎恶。其中一句出自罗马将军卢修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每一个领域里，正确地说，每一张桌子旁，都有率领军队进攻马其顿的人……这对指挥者来说是

莫大的阻碍……我不认为指挥官决不能听取意见……因此，如果任何人认为自己有资格为我领导的战争提出建议，并能证明这些建议是有利于公众的，……我愿为他提供一艘船、一匹马、一顶帐篷，就连他的旅费我也会承担。但如果他认为这太过麻烦，宁愿让一座城市沉睡也不愿经历战争的辛劳，就不要让他在陆地上担任领航员（领导者）的职务。”另外一句名言出自林肯：“如果我打算试图理解（更别提回应）所有针对我的攻击，这些‘店铺’最好还是关门大吉、改做别的生意好了。我会尽我所知做到最好，也打算一直坚持到最后。”

麦克阿瑟告诉一位记者：“我的主要‘顾问’如今差不多剩下两个人——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一位创建了美国，另一位则挽救了它。反观他们的人生，你几乎能够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相反，克拉克·李认为对他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罗斯福家族的两位成员。可据他在东京时的随从人员回忆，他经常引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句子。诚然，他的政府管理之道仍停留在过去。在讲求实际的政客时代，将军会在基本原则上寻求立足点。弗雷泽·亨特在写到他时提到：“事情自动变成了道德问题，他做决定时依靠的仅仅是简单的对错之分……古老的真理仍旧是麦克阿瑟做重大抉择的基础。”他在亚洲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开蔑视，即克拉克·李所说的“他的身上完全没有任何种族偏见的痕迹”。注

注重细节的将军没有为自己指派副手，总是坚持亲自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就连某位到访的美国人是否应该下榻帝国饭店、否则应该住在哪里都要由他来定夺。20世纪的大部分政治家都会雇用讲稿撰写人，可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却认为这属于欺骗——他也不相信任何人能够比得上他的口才。他会花上数个小时的时间为新年、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及后来的新日本宪法颁布活动起草讲稿，并对自己的创作过程深感自豪。尽管他很少允许任何人为他代劳，却十分倚赖部下为自己搜集信息。他经常在晚上7点召集大家到第一大楼来，还时常因为午夜广播中某条引起他兴趣的新闻而拿起电话。他严格要求自己，有时候甚至直到自己再也看不清钟表上的数字，才肯休息。他还总是刺激自己的参谋。一位政府顾问告诉他，他这样会让他们操劳至死的。将军火冒三丈：“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在工作岗位上死而后已更好的归宿呢？”

他只允许自己在三件事情上分心：阅读、观看私人电影以及秋天星期一早上的橄榄球比赛。时光荏苒，他和西点军校之间的感情纽带也越来越紧密。他从第一大楼给西点学子们寄去书信，回顾自己作为新生宣誓入学的那一天，并补充道：“自己作为西点人的骄傲和激动之情从未泯灭。步入暮年之后，虽然在‘平原’上宣誓入学的那一刻已然过去了许久，但我仍旧可以说——‘那是我最大的荣誉’。”他对西点军校的深厚感情最真切的表现就在于他对橄榄球的热爱。看过美国报刊的运动版有关全美大学橄榄球队

的赛况报道之后，他对每个星期六比赛结果的预测都惊人的准确，只有一次例外：他总是选择陆军获胜。黑骑士队落败之后，他感觉球队可以从自己的建议中获益，因而与教练布莱克展开了一段活跃的书信往来。布莱克会给他寄来长长的数据表，因而麦克阿瑟则能一口气说出每一位球员的身高、体重、年级和位置。一次，他开口询问一位刚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学生，某位前锋为什么没有参加与海军的对抗球赛——这位不幸的新任陆军少尉甚至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球员的缺席。某个星期日，在讨论复杂的占领政策时，他嘴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席话惊呆了在场的军官：“昨天我看到陆军队开始利用替补后卫了。这是个不错的战术。”布莱克珍藏着一摞从第一大楼寄来的奇形怪状的书信，其中涉及麦克阿瑟的不少见解：“新式替补系统的引入开辟了橄榄球战术处理方面的众多方法……让比赛更符合实战战术的发展。”此外：“同时失去对阵开球的球员和跑垒指挥员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显然都是出色的人才。然而，这也遵循了战争的技巧，因为你总是会在战争进行到最激烈阶段时失去自己最优秀的士兵。”

除了有陆军比赛的那些秋日早晨，将军到达办公室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拆阅来信。两捆整齐的信件正等待着他来阅读，一捆是当晚寄来的，需要他及时给予关注，另一捆则是写给他本人的。除非来信是用日语写就的，否则在送到他的桌前时都是未曾拆阅过的；和往常一样，这些信封都会被撕开一部分，好让他轻而易举地就能撕开信封。他按响了蜂鸣器，叫来惠特尼或拉里·邦克，把一些报告和邮件递给他，并告诉他该如何处置这些东西。其他的书信则会被他保留下来。鉴于他十分讨厌口述回信，他会用速记的方法在横线本上写下回复，然后把它们交给打字员。在他留下的文献中，不少亲笔文件都幸存了下来，无论是其完好程度还是数量都十分惊人。比方说，他生日时就会收到约300封祝寿的电报，而每一个发来祝福的人都会收到他的亲自回复。

将军很少召开参谋会议。有必要开会时，他也一定会在开场时说上一句“先生们，请坐”，然后逐个称呼在场官员的姓氏来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当面称呼他为“长官”或“将军”，背后则叫他“麦克”“老麦克”“老头”“指挥官”或者令人费解的“兔子”。任何想要与他单独会面的人都需要和在对外办公室工作的邦克提前预约。惠特尼是个例外。他的办公室附近有一道后门，可以直通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将军不仅允许他使用这道后门，还像往日里一样允许他偷听自己与重要访客之间的会谈。邦克认为此举激怒了众参谋，但他的想法也反映出心怀妒忌的参谋们都想要争取将军的注意这一事实。鲍尔斯回忆，他们会使用“靠近王座”来形容参谋间的争宠行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最高统帅纵容甚至是鼓励小团体之间互相争宠。

日本政客中，只有首相、大法官以及国会两院的领袖能够随时见到将军。美国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任何阶层的美国访客几乎都是受欢迎的——政

客、商人、律师、编辑、华盛顿官员、教授、外交官、游历四方的陆海军将领、出色的记者或者是麦克阿瑟想要打动的任何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与将军见面的经历让人倍感振奋，或者至少令人满心喜悦。他会派一位参谋事先准备好有关来访者工作领域和兴趣爱好的备忘录，好让来访者惊讶于最高统帅广博的知识面。除了这些备忘录，他的记忆力也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在和自己昔日的邻居交谈时，麦克阿瑟会回想起自己40年未见的那座房子。虽说他自从1937年返回美国度蜜月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但他对时下美国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惊讶。美国民权同盟的罗杰·鲍德温在离开时告诉邦克："哎呀，他对民权的了解竟然比我还要多！"詹姆斯·M. 加文也被他精通欧洲空降作战的事情惊得目瞪口呆。在听取了麦克阿瑟对劳资谈判历史的演讲之后，一位工会领袖说道："天哪，他竟然会说工会的行话。"约翰·J. 麦克罗伊概括道："多么杰出的男人啊！"

那些本以为自己只能和他聊上5分钟的人发现自己竟然会停留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喜欢让对方以为这次的会面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会专注地凝视着来访者的脸庞，伸出一只纤细而又布满细纹的手，示意对方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坐在椅子上填满并点燃烟斗，好像他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似的。如果对方也拿出了一个烟斗，麦克阿瑟便会叹上一口气说道："啊，原来你也是我的同道中人！"他精通政治大师们的伎俩，知道该如何与人尽快建立密切的关系。从密尔沃基、纽约或马尼拉前去探访将军的人回家后都以为将军退休后打算回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养老。欧洲人会从将军的口中听到有关他们祖国的溢美之词，而牧师和爱国者则会分别听到有关教会和爱国情操的赞美。

他喜欢把弯起的一条腿放在椅子的扶手上，缓缓地开始自己的演讲，不时停下来重新点燃烟斗，并晃一晃火柴盒以示强调。不一会儿，他又会站起身来踱步，挥动着手臂、打着手势，或是用食指戳着空气强调自己的论点。一位记者写道："他知道许多双关短语和直率成语，词汇量大得惊人。"他的声音一会儿是低沉的喉音，一会儿又会变得高亢尖利、充满戏剧性。只需几句话，他就能从庄严肃穆的话题跳转到令人捧腹大笑的俏皮话上来。在用手指捋捋稀疏的头发、并用几根火柴重新点燃自己的烟斗之后，他的声音时而愤怒地颤抖，时而发出响亮地哼鸣。演讲随之渐进高潮，而主题就是"美国在亚洲的角色"。日本是自由的"堡垒"和"未来的跳板"。美国的前线就在这片"生活着世界上一半多人口的地方"，而美国人还没有"开始意识到这里巨大的潜力"。

他很少需要绞尽脑汁想办法措辞。正如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恩所写的那样，他能够彻底压过大部分人，而他们事后却都不曾意识到"这是一次单方面的对话"，即"不是你在和麦克阿瑟说话，而是他在对你说话"。然而，这样的过程并不只是自负的体现。在他和国会议员的谈话中，将军

种下了日后能够结出“美日和平协议”果实的种子。据布赖恩斯回忆，曾有“两位同盟国的外交部部长在拜会他之后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在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很少有人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尽管有些人心中多少会有所保留。冈瑟思索着让一位人生中显然从未有过消极时刻的人来担任最高统帅是否是明智的。“当然，”他指出，“伟大的利己主义者几乎都是乐天派。”冈瑟接着写道：“（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麦克阿瑟的品质无疑是伟大的，以至于人们在探索历史时会惊讶地发现他竟然也可以变得狭隘、轻信、令人好奇的幼稚。离开他真正熟悉的路径，他踏上了未知的土地。”冈瑟发现，“在马上要来的两个麻烦的领域（政治和新闻）里”，将军几乎是一无所知。苏兹贝格在报道中写道，将军此后必须要说的话是“由诚挚、得体、充满希望的哲理做成的古怪鸡尾酒，里面掺杂着大量的长期思考和一堆堆极其不现实的废话”。

来访者很少有机会向他提问。即便有人心存幻想趁他停下来喘气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也从没有得到过答案。他们想要知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未来会怎样。作为一个军人，他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包括荣誉勋章在内的所有嘉奖，赢得了美国历史上其他指挥官无法匹敌的荣誉，也拥有了堪比恺撒和拿破仑的无限政治权力。只有白宫难倒了他。处于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人仍旧视他为重要候选人，但如果他觊觎这个“大奖”，就应该从1945年9月开始在投票者面前表现自我。对他此举感到困惑不解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他曾于1945年9月17日和10月19日两次邀请麦克阿瑟回家“接受满怀感恩的国家给予他的赞扬”。“我觉得他值得被赋予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样的荣誉。此外，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他只需要短暂逗留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但将军拒绝了我。”麦克阿瑟在第一次回复这份邀请时写道：“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自然是非常期待回到我阔别八年的家乡。然而眼下这里的问题仍旧十分棘手、困难重重，因此在情势稳定之前离开是不太明智的。我相信，再过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就能安心地离开了。”10月21日，他又针对杜鲁门的第二份邀请书写了一份回复：“不可小视的是，即将到来的冬天将使这里陷入绝望的境地。我感觉若是将这一份责任分配给别人，不免有辱我的使命与义务。”

杜鲁门面对这样的解释并不满意，乔治·马歇尔也一样。他们是对的。他留在东京的真正原因远没有这么理性，而是有些醉人，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他告诉自己的一位部下——这也许是他在自己傲慢的职业生涯中说过的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句话了：“哪怕我只回国几个星期的时间，整个太平洋都会传言美国抛弃了亚洲。”

在大日本帝国得以改革之前，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战败军官必须在军事法

庭接受审判。针对本间雅晴和山下奉文受到的裁决，日本人的态度与其说是毫无怨言，不如说是讳莫如深。不过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诚然，有关他们战时暴行的证据是无可争辩的。本间和山下麾下的每一个士兵行为都如禽兽一般。然而他们并不是在听从指挥官的命令发泄心中的怒火。在这一点上，日本和德国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国家领袖和整个政府机构都是参与折磨与大屠杀的共犯。不仅如此，正如麦克阿瑟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心里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他们是西方文化的叛徒”。在另一方面，日本人遵循的是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的大屠杀先例。

占领行动刚刚开始的那几个月，共有1 128名日本人（上至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广田弘毅，下至战俘警卫和“东京玫瑰”）被监禁在东京的巢鸭监狱。《波茨坦公告》提出：“所有战犯都将受到严肃的审判，包括那些曾经虐待过我方被俘人员的人。”一个由11名法官组成的法庭在澳大利亚人威廉·韦布爵士的主持下受命“审判和惩罚……那些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等罪名的战犯”。在位于首都市郊的日本陆军部里，法庭速记员从1 198名目击者口中记录下了48 412页证词。最终，174人被判死刑，尔后这一名单又被削减为7人，其中依然有东条和广田。虽然麦克阿瑟有权为他们的罪责减刑，但他拒绝这么做。事后，他用沙哑低沉的声音告诉西博尔德：“比尔（威廉·西博尔德的昵称），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将军禁止摄影师出席行刑过程，但通知每个同盟国派遣一位代表。这7名战犯在走上绞刑架时还不知悔改地喊道：“万岁！”

大部分被告（共有21万余名战时的小公务员）仅仅遭到了“整肃”，即根据《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第550号令》的规定不得重新出任公职。这一规定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开除和拒绝接纳所有曾利用某种职权在推动军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过影响力的人”。麦克阿瑟写道：“（我）对日本人民在审判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感到喜出望外。他们似乎被这一过程的公平性和审判者没有对战犯怀恨在心的事实所打动了。就连获罪后的战犯和他们的家人也特意写信给我和法官们，对我们的公正公平表示感谢。日本审判的结果中没有掺杂一丝明显的恶意。”日本司法大臣铃木义男向自己的同胞们指出：“德国的监狱中挤满了获罪的纳粹分子。他们不仅被判承担卑贱的工作，还被剥夺了财产，而在我们国家……那些让国家陷入战争的人只不过被驱逐出了政府机关，对此我们必须明确地牢记于心，因为这一切都得益于麦克阿瑟将军宽容的占领政策。”

这只不过是事情的其中一面——更加黑暗的另一面被铃木巧妙地忽略了：麦克阿瑟的主要对手本间和山下被带到了未经最高统帅批准的私设法庭受审，而推动定罪过程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最高统帅本人。该军事法庭设在马尼拉高级专员华丽宅第的接待大厅里，就在因为他们残忍蹂躏自己国家首都依旧怒火中烧的菲律宾人眼皮底下。审判员并非由律师们出任，而是由

身处东京的五星上将麾下的常规军军官组成。对于将军想要他们做的事情，军官们不会存在任何错觉。他已经起草好了罪名，还屡次敦促他们赶快行动。可想而知，证据规则也是他建立的。无论是道听途说来的推论，还是经由两三个人得来的传言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证据，就更不用说一些带有极端偏见的素材了。心血来潮的审裁官跳过了交互盘问的过程，或者应该说是完全省略了整个环节。当被告辩护律师试图探讨支配审判过程的最高统帅指令时，他们遭到了呵斥，被禁止在法庭上提及麦克阿瑟的名字。

山下的裁决书确定之后，《新闻周刊》评论道："也许在报道审判过程的每一位记者看来，特别军事法庭在（战犯）走进审判室的第一天就已经做好了集体决议。"听取了所有证词的12名记者互相征求了彼此的意见，发现没有一个人同情那些被告。某些被当作证据的观点也许还是从审判员出示的伪造纪录片中演绎出来的。影片中，一个美军士兵俯身从一具日军士兵尸体的口袋里缓缓抽出了一张纸条，用旁白的语气吟诵道："东京方面命令。我们已经接到密令摧毁马尼拉。"片中并没有解释一个美国士兵是如何读懂日语的。一番尖酸刻薄的轻描淡写之后，一位辩护律师说这段粗制滥造的影片"无益于美国司法一贯公平公正地筛选事实这一基础"。另一位律师也表示，"任何热爱自己国家的美国人在读到有关检举工作方面的记录时都会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的羞耻感"。

正如H. L. 门肯所说的那样，麦克阿瑟把本间塑造成了一个罪行罄竹难书的罪人，痛击了"这个在巴丹半岛上与自己公平斗争的男人"。无论是日本侵略吕宋岛的行径，还是美国夺回菲律宾的战役，都没有公平可言——战争永远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然而，并没有真凭实据能够将本间与1942年的"死亡行军"联系在一起。他顶多就是个无用的指挥官，无法控制属下士兵的暴行。他和山下都被当场宣判有罪，应负"指挥官责任"，但若果真如此，他们的天皇也难逃罪责。韦布的确认为日本统治者应该为"被告的所作所为负责"。他推断："战争需要裕仁的权威。如果他不想开战，就应该保留自己的权威。这并不是对他的毁谤，而是所有统治者在行使自己的职责时应该承担的风险。"紧接着，暂且不提自己的论断，威廉爵士表示自己并不想把天皇送上绞刑架，赞同赋予他豁免权是为了"同盟国的最大利益"。这一点几乎无须争辩，却很难让人理解若是裕仁能够得以赦免，他的将军为什么不得不被判死刑。伦敦《每日快报》驻马尼拉记者通过电报给祖国发去报道："此次审判旨在证明军事指挥官应该为麾下部队的一切行为负责。与此同时，根据英国的法律，他至少应该拥有（发言申辩的）权利……可山下的美国辩护律师都没有听到过发言申辩。"

麦克阿瑟似乎认为山下在两位指挥官中罪行更加深重。他说，对本间进行最终宣判是件"令人反感的任务"。他在第一大楼里接见了本间太太，允许

她恳求自己宽大处理她的丈夫——“这是我人生中极端最痛苦煎熬的时刻之一”。尽管他拒绝了她的请求，却还是下令通过枪决的方式处决她的丈夫，而不是采取让他更感耻辱的绞刑。相反，他似乎很享受山下的结局，还下令在吊死他之前“扒掉他的军装、勋章和其他象征他军人身份的配件”。然而，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却暗示“根据战争法的规定，本间的罪行比山下将军的更直接、更分明”，而山下案卷宗和审判记录中共有423条、4 000多页的证据证明这显然是一起误判。麦克阿瑟至死仍坚称判决结果“毋庸置疑”，没有“减罪细节”，且美国批评者喜欢的无非是“在过程中恣意专断、不讲求实事求是”或者“严格刻板的死刑”。这些细节都没能逃过仔细的审查。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起诉这两人的正当理由。

在庭前审讯山下的过程中，一队美国精神病学家曾在报告中指出：“这位将军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年迈日本军官，而不是什么令人生畏的‘马来之虎’。在整个面谈过程中，他表现得十分警觉、恭谦，不仅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非常配合。尽管有悖于自身的意愿或判断，大家还是倾向于相信他的回答是真诚的。”进行面谈的医生为什么要得出有悖于自身意愿与判断的结论尚不清楚，但在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医生）眼中，山下是个杰出的男人，显然是两位受困马尼拉的主要被告人中更有趣的那一位。既有魄力又有才华的他曾是日本最出色的策略家。开战后的第十个星期，尽管面对三倍于自己的英军，他还是重创了这些马来半岛的守卫者；丘吉尔曾在下议院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承认“区区3万日军就让拥有10万兵力的新加坡投降了”。在那之后，由于他的受欢迎程度险些比肩东条——且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他还反对东京方面的军国主义集团，同时相信其战争政策终将失败，他被调去了一些不太活跃的战线。直到1944年，他才因麦克阿瑟的军队直逼莱特岛据点返回了舞台。他对驻菲日军下达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小心对待菲律宾人，与他们合作求同。”

然而，麦克阿瑟却指控他于1944年9月在菲律宾实施了一系列暴行，尽管山下当时正驻守在几千英里以外的中国东北。最高统帅声称他的主要罪行是“冷酷无情、漫无目的地……洗劫了马尼拉古城里的基督教人群以及无数的历史圣地、文化与文明遗迹”。实际上，据山下自己做证，他之所以宣布菲律宾首都为不设防城市是出于三个原因：他无法为上百万居民提供食物；城中的建筑极其易燃；城市周边的平地不利于从战略上进行防守。因此，他让自己的军队撤离马尼拉，在150英里以外的碧瑶建立了新的总部。1945年2月3日，美军进驻了马尼拉北郊。9天之后，山下才得知日本水手和海军陆战队（他从未训练、检阅或是见过的部队）仍旧留守在首都。他立即通过电报联络他们的指挥官岩渊将军，命令他“遵循我们的原计划”立即从城市里撤军。日军的通信设施实在太过于简陋，以至于山下将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听闻他们的暴行。他在接受审判时表明：“我可以斩钉截铁地断定，他们违背了我的意愿，忤逆了我的所有命令。不仅如

此……我一点儿也不清楚他们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地方。”

美国法官们并不相信他。麦克阿瑟也一样。杜鲁门总统拒绝介入。《纽约时报》否认美方“是在匆忙间轻率而又随意地”下达死刑判决的。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赞成、2票反对维持了原判。不过，弗兰克·墨菲和威利·B. 拉特利奇在法庭上却进行了激烈且颇具说服性的论述。拉特利奇指责审判过程“不符合英美普通法系和宪法的传统”。墨菲写道：“从长远来看，为了对付战败的敌军指挥官而用正式的法律程序掩盖复仇和报应的情绪比引发这种情绪的暴行更加伤人。”两位法官将马尼拉审判称为“合法化的死刑”。墨菲总结道：“今天，曾在战场上纵横捭阖的敌军领袖山下和本间被无视正当法律程序的人夺去了生命。”温赖特要求给予山下“公平的对待”以及“《日内瓦公约》所赋予他的权利”。默洛·J. 普西注意到军事法庭“令人忧虑”且“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维护公民自由的责任已经由法庭转移到了军队的手中：“面对军事法庭至今为止的表现，很难证明我们在没有损害宪法所规定的自由的情况下挨过了战争。”在为山下辩护的A. 弗兰克·雷埃尔看来，山下“真正的罪行是处在了输掉的那一边”。

一旦麦克阿瑟决定把两位敌手将军置将于死地，下一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干脆利落地下令后转向其他事务。可这并不是他的处理办法。对他来说，战争总是略带亚瑟传奇的浪漫色彩，萦绕着圆桌旁的神奇光晕。他相信日本神道教、武士道和武士准则是战争在东方的演绎。因此，在他眼中，这两位日本指挥官不仅背叛了大日本帝国和马尼拉那些遭到侵犯的菲律宾人，而且背叛了麦克阿瑟自己的职业。正因为如此，他才起草了言过其实的冗长陈词，谴责即将被他夺去生命的两个男人。他说本间亵渎了“延续了千秋万代、约束着所有高贵军人的骑士精神中最基础的原则，那就是如何对待战败的对手”。在细致阐述山下的裁决时，他写道：“公众的视野中极少出现如此残酷蛮横的犯罪记录……一个士兵，无论是敌是友，都应承担起保护弱者和赤手空拳的人的责任。这就是他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当他辜负了这一神圣的信任时，不只是玷污了整个系统，还威胁到了国际社会的每一个组成环节……这位被证实战功赫赫的军官被委以兼具权威与责任的最高指挥权，却有愧于这一不可改变的标准，有愧于军队、国家、敌人和人类，更是彻底有愧于麾下士兵的信任。正如审判所揭示的那样，由此导致的罪行，……是文明的污点，构成了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羞愧与耻辱的记忆。”

1946年2月23日凌晨3点，山下脚下的行刑台已经在马尼拉以南35英里处的小镇洛斯巴尼奥斯布置完毕。他的临终遗言是：“我要祈求天皇的长寿和永远幸福！”8天之后，一队执行死刑的行刑队在同一个院子里枪毙了本间。两人临死前都很冷静坚忍，身上还穿着另一个国家的军装，日后可能会被奉为殉道者。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麦克阿瑟占领他们祖国的行动获得

了巨大的成功，这两位将军很快就会被忘却。因此，最高统帅对他们发表最终谴责时也分外的仁慈。他只字未提自己没有留下来观看行刑其实是与这两个人有关，而是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了自己性格中的光明与阴暗面。

正如台风带来的洪水在船身的龙骨下震荡，搅动着螺旋桨，迫使舵手为了防止船身横向受风而违背了航海技能的所有原则——国人的愤怒也会阻碍人文机制。社会动荡时期，头昏脑涨的民众往往会展现出自己毫无理性、令人匪夷所思的骇人一面。社会重心的法则暂时失效，人们的举止开始变得疯狂，言行如怪物一般，在恐惧面前狂笑，在智者面前啜泣。这种迷幻情绪的表象之一就是流行音乐。荒谬的歌曲之所以能够得以流行也许是因为其中清醒的歌词嘲笑着这个慌乱的世界。约翰·里德曾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听到有人在俄国哼唱这种小调；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在魏玛柏林也曾听到过类似的曲调；一支英国乐队在约克镇弹奏着《颠倒的世界》；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苦苦挣扎的美国人唱起了《音乐一次次响起》《三条小鱼》《哈特·苏特歌》和《马尔基·多特兹》。

战后的日本也是如此。“密苏里”号投降协议签订后不久，“东京玫瑰”就被“东京摩西”代替了。后者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其广播通过武装部队网络传播到了列岛的各个地方。与此同时，一位美国记者还编写了一首歌词怪异的小诗，似乎在日本人中拥有惊人的传诵度。“东京摩西”在电波中和着《伦敦桥要倒了》的调子低声哼唱了起来：

Moshi, moshi, anonay?

Anonay? Anonay?

Moshi, moshi! Anonay?

Ah, so deska!

粗略翻译过来，它的意思是：“你好，你好，你在吗？你在吗，你在吗？你好，你好，你在吗？啊，是这样的啊！”麦克阿瑟的军队喜欢这首诗，它似乎总结出了他们在这个陌生国度中感受到的亲切困惑感。日本人也满腔热情地接纳了它。战后的第一个冬季，这首小调的声音无处不在，无论是占领军还是当地人，在听到它的第一个音符后都会附和着唱起来。它之所以能在日本人中广为传唱，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美军对它的喜爱，而日本人也想借此表现自己的热情好客。另一个原因则是小调中重复的问题正好表达了裕仁不知所措的子民们不知该何去何从、更不理解自己从小就学会

去珍惜的体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尤其是皇家体系。

如果说神道教的星座中有一颗固定的星星的话，它一定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天庭的皇帝”。身处国家核心的他是不可动摇、遥不可及的神圣存在，只有神道教的神明才能够拜会他。即便是在投降之后，顽固的武士们仍旧向裕仁麻木的子民预言他很快便会东山再起，或甚至在广播中呐喊“尊崇天皇！驱逐异族！”的口号。很快，他们在重拾1945年9月28日的报纸时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们身材矮小的统治者站在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身旁。他前去拜会了将军，一手拿着高大的礼帽。一些日本人认为这张照片是伪造的，还有人相信裕仁是在刺刀的威胁下走进美国大使馆，度过危机四伏的几个小时的。然而这次的会面其实是将军的主意。正如麦克阿瑟所预测的那样，裕仁在好奇心或对自己国家改头换面的感激之情的驱使下行动了起来。据拉里·邦克回忆，他是第一个从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吉田茂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前一天早上曾跨过护城河的吉田乘坐电梯来到6层，通知将军的参谋，他的统治者希望能够和最高统帅谈话。麦克阿瑟回复道，自己不想踏足皇宫，他的位置不允许他这么做。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使裕仁前来公共场所第一大楼拜会自己的侵略者将会是一种无谓的苦刑。因此，他计划在大使馆接见他，并允许天皇带上一位翻译。他们将拍摄一张照片，然后进行半个小时的会谈。

将军匆匆赶回了家，直奔客厅。他的身上穿着朴素的土黄色军服，既没有佩带勋章也没有佩戴袖章，领子还敞开着。那天的天气很温暖，因此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更换衣服。不久前，第一大楼里的岗哨刚刚打电话来报告，一队由老式黑色戴姆勒轿车组成的车队出现在了樱田门的门口。上午10点，车队跨过了护城河，驶过被摧毁的海军部、沙地和大仓集古馆，卷着滚滚尘土停在了大使馆门口的车道上。站在大使馆门廊旁的邦勒·费勒斯是第一个看到天皇的人。除了丝质的大礼帽，裕仁还穿了一件老式的燕尾服和直条呢裤。面对着他坐在折叠式座椅上的是他的翻译官和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侯爵（一个身材矮小结实、年逾五十的男子）。他的作息时间总是精确无误，以至于皇宫里的其他人都称他为“计时器木户”。地位较低的其他官员（宫廷大臣、礼仪官、国库保管员和各式各样的皇室用人）都随行坐在其他的车子里。

裕仁和木户走向门口。费勒斯敬了一个礼，另一位军官则彬彬有礼地邀请侯爵站到一边去。天皇此刻应该感觉很糟糕。通常，他的身边都会有掌玺大臣或另一位贵族从旁解释“天皇感觉……”或“天皇在慎重考虑之后决定……”或“天皇希望……”。木户疯狂地挣扎着想要陪同自己的君主走进大楼，但那是不可能的，面带微笑、恭谦有礼的美国上校们千方百计地阻挡着他的脚步。裕仁带着紧随其后的翻译官颤抖着向前走去。在接待大厅的入口处，他突然遇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嘴里低声叫了一声“陛下”，然后亲

切地握住了他的手。在翻译的帮助下，将军回忆起自己曾在日俄战争接近尾声时得到过天皇父亲的召见。他示意天皇在壁炉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事后，麦克阿瑟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提到：“对方感激地接过了我为他递上的一支美国香烟。我注意到，在我为他点烟时，他的双手是颤抖着的。我试图尽力让他感觉自在一些，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正因耻辱的怒火而倍感恐惧。”

将军后来告诉一位客人，“我是抱着更加坚定地利用天皇的想法来到这里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裕仁是“一个真诚的男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许他也对其他的贵族表示过自己的同情：“我生来就是个民主主义者，被培养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要告诉你，看到一个曾经如此位高权重的人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我的心里感到很痛苦。”麦克阿瑟的确曾经承认过，他的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害怕天皇“会为自己被指控为战犯的事情进行辩护”。不顾苏联人和英国人的强烈反对，最高统帅已经将他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中剔除了出去，但裕仁对此并不知情。因此，即便他不得体地为自己征求宽大处理，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却开口说道：“麦克阿瑟将军，我来见你是为了让你所代表的国家来审判我的。我愿为自己的臣民在战争中做出的所有政治与军事决定及其所作所为独自承担责任。”麦克阿瑟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寸骨髓都动容了。他是天子。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日本第一绅士。”中规中矩地客套寒暄了38分钟之后，他们起身对彼此鞠了一躬。当天皇迈着步子原路返回失意受挫、满头大汗的木户身边时，将军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如流水般的笑声。那是他的妻子。琼正和埃格伯格医生躲在红色的双联褶皱背后偷看。

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这位客人给自己的东道主留下的印象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从他发表在东京报纸上的一首诗中，他的臣民们第一次对他在战后的心情有了模糊的概念：

松树是勇敢的。

大雪压头，

却仍旧常青。

人也应一样。

诗作中的大雪就是占领他国家的同盟军，人指的是日本人，他这是在告诉他们，不要调和或改变自己的国民性格。在许多方面，他们并没有改变，但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势必会带来观念上的转变，尤其是对统治君主本人。

首次拜访结束后，天皇每年都会探望最高统帅两次，并与他建立了父子般的关系。这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起初人们还会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打破先例的每一个决定提出疑问：“天皇会怎么说？”但在发现裕仁全盘接纳了这些决定之后，他们也就不再多问了。麦克阿瑟写道：“他在日本进行精神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政治家相信将军应该为此负责。在麦克阿瑟执行总督职责的大部分岁月中担任首相的吉田总结道，最高统帅尊待天皇的做法（下令“所有君主应有的荣誉全都属于他”并坚持不对他进行审判和处决），“比其他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利于他在占领期间获得历史性的成功”。

不过，这也让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政策变得自相矛盾。埃格伯格医生注意到，在成为总督之前，无论是地位还是成就都如日中天的麦克阿瑟在进驻第一大楼时，的确还不太懂得应对媒体。这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错。他对待记者的方式和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待自己的混血情妇伊莎贝尔·库珀的方法相差无几：他们应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供他利用，而在他于其他地方忙碌时保持沉默和温驯。记者们在报道中提到其他亚洲国家仍在恐惧日本的强大，认为将军的政策过于软弱，并对将军没有惩戒天皇的行为表示失望。将军对他们感到愤怒，还严格地审查了他们的稿件。一次，将军还曾批评他们是“一群没受过教育、专门采访警方新闻的记者”。诚然，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不如他所批评的那样。约翰·冈瑟写道：“我在东京待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便深信有关麦克阿瑟的报道将是史上最糟糕新闻报道。”人们惊奇地发现了记者们在报道有关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故事时几乎全都会忽略一些方面。除却大型日报，我们从一位杂志编辑那里得知，最高统帅在发现“美国的租借装甲（主要是坦克）被用来对付中南半岛人民……那些我们承诺要靠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解放的小个子人民”时，气得满脸通红。当时，经罗伯特·舍伍德审核过的新闻报道中很少透露麦克阿瑟的心情，因为“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与亚洲人民的友谊”，就必须用“宽容大度”的措辞来表达美国人的影响力和实力。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某位记者与麦克阿瑟会面后的记录来看：“将军如今认为媒体应该把停止为海、陆军将军们树立英雄形象作为自己工作的第一步。同样，全世界的媒体也应该从根本上停止美化战争。他感觉这两点与影响公众舆论接纳战争方面有很大的关系。”麦克阿瑟认为，“去除海陆军将军们的英雄形象和贬抑战争是媒体眼下可以抓住的课题”。

摆在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面前的难题是，他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难以改变的活跃公众形象。他的偏执妄想辅助说明了这一点。华盛顿方面的强大势力反对让美国投身远东，认为此举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全部努力，何况此事也值得争论。可当将军控诉他们的政策有失偏颇时，他们忽略了他的呼

声。他太常谎报军情了。他势不可当的自尊心就是另外一个佐证。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安写道："全世界有上百万人都认为他是个任性的独裁者。"正如狡猾的官员詹姆斯·伯恩斯于1946年所说的那样："尽管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他还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仿佛他爱慕虚荣的品质不是他作为最高统帅所必需的似的。西博尔德大使表示，除了他和他手下的美国外交官，没有人注意到将军对待美国驻外官员是多么的"谦逊有礼、乐于合作"。然而，当他威胁要"炸开国务院"时，记者们却把他的话搬上了报纸的头条。

在这一点上，他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此举为他招来了一个和他一样才华横溢却又报复心极强的男人的敌意：迪安·艾奇逊。1945年9月17日，哈里·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放出话来，说占领军的兵力可以削减到20万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我最先是从媒体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这无疑是一条新闻（他早先的估计是50万人，后来降至40万人），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感到自己被他深深地冒犯了。在华盛顿方面第二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艾奇逊刻薄地表示："我很惊讶居然有人能够预知日本所需的军队兵力……占领军是政策的工具而不是政策的决定因素。"代理国务卿的这番话错了。他援引的是理论，他应该知道的是，东京方面的现实与此是截然不同的。艾奇逊的评论在当时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他担任副国务卿的任命还有待确认。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斯·惠里对此投出了反对票，指责这位被任命者"玷污"了一位伟大军队英雄的"名声"。没有人支持这个内布拉斯加人；就连罗伯特·A. 塔夫脱也认可了总统的选择；选票结果为69票赞成，1票反对。不过惠里很快就不会感觉势单力薄了。正如艾奇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预见未来，也许就能意识到这次小规模的争论正是一场大战的开始。"

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批评者中包括了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这一事实似乎不足为奇，尽管他们反对他的立场如今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和想要拥有"比美国人更强硬的政策……一个苛刻，甚至是惩罚性政策"的澳大利亚人一样，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麦克阿瑟作为一个征服者实在是过于宽容。I. F. 斯通认为，维持日本政府结构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无须多想就能明白，如果我们仅限于通过一个维持旧制的政府来执行自己的职能，几乎是无望打破日本统治阶级（贵族、富豪、官僚和军队）手握的权力的。"《新共和》杂志为指派将军担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一事感到后悔，因为它认为他会"满足……日本发动战争背后的保守社会与经济因素，并且很乐意支持另一场战争"。《国家》杂志则援引了哈尔西的话，说他很想一脚"踹向"那些在投降协议上签字的"日本代表团成员的脸"。杂志评论道："（此话）既缺乏优雅又有失礼貌，却一语中的、令人满足——莫名其妙地让人感觉安心。"

麦克阿瑟保留天皇、决定让日军自行缴械、拒绝禁止日美亲善行为以及威胁要惩罚殴打日本人的美军士兵的行为让菲律宾人、法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以及英国人产生了误解。英国政府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因为麦克阿瑟不仅宣布他希望日本能够重建自己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还拒绝将它排除在英镑适用地区之外。从另一个角度发起进攻的乔治·凯南表达了自己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解散日本宪兵和国家武装军队的“惊奇与担忧”。他后来写道：“日本的中央警察机构已经被摧毁了。在占领局势下，它没有对抗共产主义渗透和依然朝气蓬勃地展现自身威力的政治压力的有效手段。如果占领军或美军撤兵，它也没有可以依赖和大幅增加的兵力。面对这一情形，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当时的占领政策从本质上粗略看来，似乎就是为了追求让日本社会无力抵抗共产主义政治压力、让共产主义者接手铺平道路而设计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用处。”

在日本国外，共产党人内部也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和《真理报》的尤里·朱可夫共进了一顿午餐之后，C. L. 苏兹贝格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朱可夫认为最高统帅“在为日本做一件好事”，可纽约《工人日报》的头条却写着《麦克阿瑟串联法西斯分子》。当时支持亨利·华莱士的美国左翼进步分子把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视为自己的天敌。华莱士的追随者憎恨的正好是这种受过良好教育、对政治感兴趣的五星上将，其参谋长还认为美国需要一位保守的独裁者。然而美国的右翼人士也绝不相信他属于自己的阵营。麦克阿瑟曾经是他们的英雄，未来也是一样，可那些拜会过他的人回来时总是满心困扰。他们知道五角大楼方面希望美国的驻日基地能够永存下去，不管日本人是否愿意，而他们对此也表示认可。可是最高统帅却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此举无异于实施“殖民化”。除此之外，他对商人的态度（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均一视同仁）也为他们敲响了警钟。

正如某位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麦克阿瑟想要的是“毫无污点的占领”，他严格限制外国商人从日本获利。这就是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面对共产党人说他肆意剥削的指控时做出的回应。此外，他还与旧日里的封建寡头“财阀”因苛捐杂税的问题断绝了关系。以上两点都令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他们的发言人分外不悦。《财富》杂志攻击称这属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主义”。愤怒的将军给杂志的编辑发去了长达6 000字的辩驳，但加州参议员威廉·F. 诺兰要求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经济政策进行一次国会调查。紧接着，《新闻周刊》登载了一篇有关詹姆斯·李·考夫曼的故事。这位对日本颇感兴趣的美国人谴责了麦克阿瑟解放生产力、清洗军国主义者、解散日本工业联合会的做法。他控诉道，这些举动让美国纳税人背负上了“不必要的沉重负担”，耽搁了重建，还“草率地”把经济“分割成了几个部分”。就连西博尔德也怀疑抨击财阀的行为是“惩罚性和破坏性的，只能是徒劳”。《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R. 麦考密克上校飞往东京，抗议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将军回答他：“这不是社会主

义。但真正的社会主义总比垄断的社会主义要好。”在此之前，麦考密克一直都十分支持麦克阿瑟的总统梦。然而此次飞回美国后，上校却转入了塔夫脱的阵营。

这应该能够激起美国记者的好奇心，让他们动笔书写在第一大楼里制定出来的政策了。任何惹怒了麦考密克的保守主义者都值得大家自己审视一番。可他们仍旧固执己见地不肯同情将军，而他也仍在以错的方式与他们产生摩擦。尽管将军对待他们的方式很漠然，却还是极其留心他们对自己写下的一字一句，而且内心很容易受伤。西博尔德评论道，他与“个别新闻记者的公开争吵变得越来越出名……他受到媒体攻击时的反应让人不忍直视”。他在日本的公关主任弗拉伊内·贝克不耐烦地告诉记者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将从公关办公室的新闻稿中得知有关占领军的消息。”贝克还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编辑和出版商，公然侮辱他们、抱怨某几篇报道。比方说，他曾经指控其中的7个人“遵循的是共产主义者的规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E. 默罗在收到贝克针对该公司驻东京记者威廉·科斯特洛的抱怨之后写了一封回信，让贝克放弃了这个方法：“你的来信大大提升了我们对科斯特洛工作的信心。”

这些都是令人不悦的多余之举。大部分密切关注日本发展的人都知道占领行动进行得格外顺利。《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日本是盟军政府的一个亮点。麦克阿瑟将军的行政机构是政府的楷模，是远东和平的福音。他肃清了武士之神的独裁统治，建立起了由人类皇帝统治、建立在人民意愿和自由选举基础之上的民主政府。”结束赴日访问后返回美国的菲利普·C. 杰瑟普大使告诉媒体，这次访问让他对“日本人民自战争结束以来取得的非凡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麦克阿瑟将军为此做出了卓越且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罗杰·鲍德温在将军“伟大的军旅生涯中”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品质”——“对民主自由的深刻承诺、对人民平等的本能反应、对战败的日本人敏感心理的尊重和作为一位改革者的热忱……然而当人们评判他的历史角色时，是不会否认他强大的人格魅力给所有人留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的：他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深深投入、他的正义感、他的高标准和他坚定的理想。”埃德温·O. 赖肖尔写道：“麦克阿瑟将军是战后世界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日本的成就也许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当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另外一些占领军领袖们是无法做出与之相称的贡献的……他在历史伟人名单上拥有双重稳定的地位。”

赖肖尔补充道：“和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倒是更加欣赏他的某些品质。”他的话是颇具洞察力的。日本人仍旧相信英雄，麦克阿瑟的同胞们则对英雄逐渐失去了信任。让他深陷困境的另一个根源是他对东京记者团的忽视。为了替自己自行暴露在敌军炮火之下的行为进行辩护，他反复提到：‘如果你看不见他们，是无法和他们作战的。’除非他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些记

者，否则是很难赢得他们的信任的。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事实令人痛心，因为很少有人在采访他之后能够得意扬扬地离开第一大楼。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安写道：‘他可以是一个十分温暖又颇有人性的人……以至于来访者不禁会怀疑自己是从哪里获得麦克阿瑟是个冷漠的人这种印象的……第一次前去拜访他的人在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整个人都如同被催眠了一般，嘴里嘟囔着类似‘天才’‘杰出’‘伟大’之类的词语……一些对他态度强硬的批评人士在走出他的办公室时心里都会产生彻底的转变。他在对话中展现出来的光辉会让人真的以为自己正站在一位伟人面前。”

在他失势之后，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温和地嘲讽了那些崇拜他的人。他们评论道：“尽管他总是拥有众多的爱慕者，麦克阿瑟教派起源于战后的东京第一大楼。主教每天都会在那里主持礼拜，力图让来访者皈依自己的教派。”毫无疑问，他的参谋团队中有人对他过分谄媚。据鲍尔斯回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曾经收到过他的飞行员安东尼·F. 斯托里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这位正在马尼拉休假的空军中校开头写道：“亲爱的将军，我写的这张卡片是要送给一个能和上帝交谈、散步的人的。”对爱德华·M. 阿尔蒙德来说，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是“还健在的最伟大的人”。而乔治·E. 斯特拉特迈耶更认为他是“史上最伟大的人”。另一位军官告诉冈瑟：“他太庞大、太难以捉摸，我真的不理解他……没人能够理解他。”

这些职业军官的未来都要依赖麦克阿瑟对他们的看法，因而他们的判断绝对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们的观点却得到了其他人的肯定。赖肖尔认为将军拥有“深刻的使命感”。西博尔德认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消除了日本军权的威胁，引导日本人走上了民主政府的道路、躲开了共产主义者的势力范围。他总结道：“上述三个主要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麦克阿瑟将军首创精神的结果。”C. L. 苏兹贝格在巴黎与艾尔弗雷德·M. 格伦瑟共进晚餐后写道：“格伦瑟承认，自己在去年夏天前往东京时对麦克阿瑟是怀有成见的，但他离开东京时，麦克阿瑟的魅力和人格已经说服了他。‘他用了多长时间让你转变了心意？’阿尔（艾尔弗雷德）问我。‘大约30秒钟吧。’‘哦。’阿尔冷笑道，‘他在我身上大概花了30分钟。’”亨利·卢斯前往第一大楼拜会之后，《生活》杂志评论道：“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英国的全盛时期——这几个世纪里光辉而又悲剧的戏剧意义都是他头脑和精神里永恒的提词器。”他所获得的所有褒奖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他被视为是一位和蔼可亲、德高望重的人物，其智慧指引着他麾下将士的命运，保护他们不受敌意的侵袭。菲利普·拉福莱特写道：“他身上的某种特质总会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日本人忘不了自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以来便一直主导自己国家政治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政界元老”。作为在明治维新（推翻专制封建

主义的运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政界元老们成了君主的顾问，通过命令和审慎的暗示实际掌控着国家。与此类似，麦克阿瑟也通过天皇、内阁和国会管理着日本，从而维持了政府的连续性。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日本人统治日本的制度并未终止。即便是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协议的那一刻，日本人民也仍旧处在自己国家的政治家和行政部门管理之下。

麦克阿瑟还拥有欧洲同盟国所缺乏的另一个强大优势。苏联挫败占领行动的企图一直都在四处碰壁。用赖肖尔的话来说，位于华盛顿的盟国远东委员会“身居高位，却是个华而不实、徒劳无用的摆设”，而位于东京的同盟管理议会起初还是“激烈争论”的竞技场，后来又“陷入了假死的状态中”。议会在与第一大楼位于同一条街上的明治保险大楼二层的一个镶板会议室中成立，被赋予了模糊不清的“顾问”角色。麦克阿瑟只参加过该议会较早召开的一次会议。“既然议会的作用是……咨询，”他直截了当地说，“它就不能把盟国驻日最高统帅的独有行政权所担负的沉重管理责任拆分开来。”从那以后，他就对该议会放任自流了，由西博尔德代替他来出席会议。大部分会议的时间超不过一分钟，那些耗时较长的会议处理的都是与被苏联扣押的日本战俘有关的情感问题，而结局都是苏联代表库兹马·N.杰烈维扬科中将昂首阔步地走出会议室，身上如鹅卵石般硕大的肩章愤怒地摆动着。麦克阿瑟对付杰烈维扬科的方法是经常给他写信，指出他的观点使得自己获益匪浅，而自己对此心怀感激。

在大部分美国人（甚至包括许多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手下的军官）的印象中，最高统帅的使命是要将民主政治引入日本，可他实际上接到的命令是“同盟国不负责把意愿得不到自由表达的任何日本人民支持的政府形式强加于日本”。但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1945年10月初，在遣散了日本军队之后，他发布了一条公民自由指令，取消了所有限制政治、民事和宗教自由的规定。宪兵制度被废除，其拷问室也被摧毁。所有政治犯都被释放。报纸（包括共产主义的《赤旗报》在内，直到大罢工的前景威胁到了整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喜欢的内容，当然是在不批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前提下。也许麦克阿瑟从未想过他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无论如何，很少有媒体提出抗议。他们的专栏里充满了之前一直向读者隐瞒的信息，而将军也朝着责任选举迈出了第一步：拥有消息灵通的选民。

同一周，东久迩宫稔彦王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作为裕仁的叔叔，他不想主持破坏皇权的事务）由反战的73岁政治家币原喜重郎男爵接任。币原跨过护城河，按照自己的想法礼节性地去拜访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递给他一张列表，上面列举了他希望“尽快被同化”的改革项目。它们是：妇女选举权、“鼓励工会发展”、宽限和允许学校教授“政府是服务机构而非人民的主人的制度”、不允许官员进行“秘密调查和滥用职权”、终结垄断、更加广泛地分配收益和实行产品与贸易的公有制。将军表示，他估计这些步骤需要

彻底的宪政改革，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够快点儿行动起来。

币原眨了眨眼睛离开了，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改写《大日本帝国宪法》。委员会清楚，麦克阿瑟的愿望就是命令。内阁成员兼委员会主席松本烝治博士前去拜访了将军当时的首席政治顾问小乔治·艾奇逊，向他询问委员会该做些什么。艾奇逊让他们撰写几条修正案，削弱皇权、废除军队。其实这些措施全都是麦克阿瑟当时早就想好了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将军叫来惠特尼，开口说道："委员会没有找到头绪，所以还未采取行动。你去介入一下，帮帮他们。"惠特尼发现委员会陷入了僵局。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彻底变化，保守主义者对此却丝毫不肯接受。鉴于松本本人就比较保守，保守派得以独行其是。1946年1月，一份草案被送到了最高统帅的手上。将军事后写道："最终，这不过是对旧《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重述。天皇的权力丝毫未被删除。他只不过是从'神圣不可侵犯的'变成了'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新的宪法草案不仅没有加入权利法案，还撤销了几条已经存在的权利……换句话说，在经历了3个月的努力之后，宪法依旧是老样子——可能还大不如前。"

麦克阿瑟的处境十分微妙。将军没有解散从东条政权延续下来的冥顽不灵的国会（其中就包括松本这样的顽固分子），而是在4月10日安排了一场普选，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非官方的公民投票来试探选民是否赞同修订宪法。如果把松本的草案交由民众考虑，他们投票赞同或反对的就正好是明治宪章的副本。公投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他听说代表盟国愿望并一直希望实施更加严格占领政策的远东委员会，已经对宪政改革和让日本作为强国重新崛起的事情表达了不满。如果日本人民认可他所希望的草案，他就能向委员会展示一切已经成了既成事实。这是一个公关问题，尽管并不是表面上的；没有国家宪章的法律支持，他就无法着手让4月份选举出来的国会通过他的立法计划。他决定，得到他想要的宪章版本的唯一方法就是亲自动笔。碰巧他对民主宪法很感兴趣，还曾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大量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宪法内容。他从拍纸簿上撕下了一大张黄色的纸，落笔写道："宪法四点……"

2月中旬之前，他便写出了他想要的内容。他骄傲地写道："这无疑是历史上最自由的宪法，借鉴了许多国家宪法的精华。"一位日本学者在抨击霸道的将军欲将新宪法强加于日本的同时也总结道，这是一部很好的宪法："尽管某些麦克阿瑟式的浮夸措辞令人厌烦、不具备日本特点，组织架构也过于松散和冗长，但其中的条款却符合真正议会民主制的最高标准。"许多日本人都对"公务员"的概念感到不太愉快（习惯上，日本的官员只对皇室负责），有些人还认为杰斐逊的"追求幸福"是不道德的。尽管如此，它的结构是合理的。天皇被弱化成了一种象征，甚至不具有投票权。国会被赋予了立法权，封建贵族制度被废弃，大众自由得到了保障，投票

年龄从25岁降至20岁，劳资谈判得到了保障，两性间建立了“实质平等”。

政府的形态融合了英美两国的特点。国会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也得以确立。首相由两院制立法机关的上议院选出，任期四年；如果在某个议题上遭到了挫败，他既可以要求下议院选择一位继任者，也可以要求进行新的选举。最突出的是被称为“不发动战争”条款的宪法第九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潜能。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罗伯特·E. 沃德在1956年12月出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中总结道，麦克阿瑟亲自“下令将禁止参战的内容加入了如今的日本宪法”。将军敏锐地察觉到有人指控他将新宪法硬塞进了日本人的喉咙里，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日本可能需要抵御来自苏联或中国的威胁，后来写道，这是币原喜重郎的主意，他只不过是表示了赞同而已。他说：“多年以来，我一直相信战争这种解决争端的过时方式应该被废止……原子弹的完善让我对战争的厌恶达到了极致。”赖肖尔仅仅写道，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和日本人“愉快地同意了”这一条款。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后续发生的事情来看，基于“不发动战争”条款，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将第33任总统（杜鲁门）视为了鹰派人物，而最高统帅则成了鸽派人物。《基督教世纪》在1946年4月17日出版的刊物中评论道：“杜鲁门先生仍旧活在一个过去的时代中，认为只要战争来临，国家就必须取得胜利。麦克阿瑟将军则清楚，战争到来时，谁都不可能成为赢家。”

日本人家喻户晓的最后一个版本被称为“麦克阿瑟宪法”。将军认为新宪法是“旧明治宪法的修正案”，因为他“认为利用这一策略能够确保延续性，而延续性对日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3月6日，他宣布最终草案获得了他的“完全批准”。内阁和东条曾经亲手挑选出来的国会成员们也不情愿地表示了赞同。有些人对此感到大为震惊，一想到裕仁可能会认为他们做得有些过火便浑身颤抖。可当币原喜重郎和外务大臣吉田茂到访皇宫、胆怯地把宪章摊在天皇面前时，天皇却告诉他们，他支持里面的所有条款，包括废除他的权威的内容。宪法被发表在了所有的日本报纸上，并邀请民众提出建议。麦克阿瑟写道：“我从未见过哪份类似的文件曾受到过如此多的关注，还引起了公开辩论，包括我们自己的宪法。”这样的说法有些荒谬。媒体对新宪法的批评被压制了下去，官方广播还被强烈要求发表支持新宪法的言论。一个被包裹在神道教行为准则中的民族是不大可能拒绝他们自己的领袖和新任的“竹子屏风后的男人”批准的文书的。的确没有人提出异议。4月，公开表示愿意服从新宪法的候选人赢得了超过半数以上的选票。

5个星期之后，迟钝的远东委员会警告麦克阿瑟，他们不赞同他这么快就解放战败的日本，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日本人民已经开了口，而盟军驻日

最高统帅也已经向他们表示了祝贺。鉴于新宪章中的大部分条款都来源于各国政府自己的宪法，推翻最高领袖如今就相当于否认同盟国的战争目标。所以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地看着裕仁宣布当天为国家节日，庆祝这一文件得以通过。在一场举行于皇家领地入口处的仪式上，天皇在倾盆大雨中自行举着雨伞，宣布宪法为这片国土上的法律，号召从前的子民们捍卫和行使自己新的权利。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妇女们纷纷穿上自己最好的和服前去参加当地的庆典，男人们举着温热的清酒为彼此祝酒，而那些备受将军蔑视、“没受过教育且只会报道警方新闻”的记者们也写下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话，记录入夜后庙宇里仍旧不绝于耳的锣声和热闹的鼓声。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猜到麦克阿瑟的宪法竟能顺利地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三十多年之后，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考察，它仍旧能够持续下去。在它的规范下，日本将成为伟大的工业强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位列傲居榜首的美国之后。但是将军心里略知一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宪法可能是占领日本期间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因为它把日本人民闻所未闻的自由与基本权利带给了他们。”他补充道：“我确信，如果占领行动仅仅依靠远东委员会的审议意见，这一目标是永远都不可能达成的——何况苏联还有否决权！”

如果想要全面地审视麦克阿瑟，那么他作为总督所取得的胜利和战后这些年在修订宪法之后所实施的举措就应该被视为他个性表达的中心。在他的一生中，仰慕者只会看到他的胜利，批评者只会看到他的失败。而两者都没有领会到的是，他的个性特征既成就了他的胜利，也导致了他的失败。他的傲慢自大，他对上司的公然挑衅，他对政治过程的幻想，他对踌躇不决的蔑视——这些都将是他最终毁灭的原因。可它们一路上也为他收获了不少历史性的果实，无疑还造就了伟大的民主日本。

即便是在第一次选举之前，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仍旧在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日本。正如他的父亲近半个世纪以前在菲律宾所做的那样，麦克阿瑟很快建立起了人身保护法。打着所谓的爱国旗号、威胁军国主义对手的流氓成了罪犯。军阀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本应由东京方面指派的全国46个辖区地方长官如今也由地方选举产生。一队队技术人员被派去修理火车和电话。公共卫生和农业项目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拉塞尔·布赖恩斯写道，这些都是在第一大楼的小房间里“由两组打着手语的人”完成的，且“双方丝毫不清楚对方是怎么想的”。“起初，同盟国和政府之间还能招来一些能干的翻译。占领军中只有小部分人是日本事务方面的专家，而可以被视为全能专家的人中又无人拥有颇具影响力的地位。”布赖恩斯说，麦克阿瑟本人在和“无形的假想敌做斗争”，却显然决定“占领及其所有的后果”都将“成为他自愿承担的命运，是他杰出事业的巅峰大事”。

刚刚占领日本的那几个月是将军情绪最为变化多端的一段日子。他可以无礼地对待杰列维扬科，和蔼地接待到访的美国商人代表团，用日本人极其谦逊的方式会见币原，而这一切可能仅发生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负责的事情覆盖面极其广泛，占领日本后的第一年1月，他给华盛顿方面发去了10万字的述职报告。除了其他事务之外，他关心的还有粮食产量、外交政策、城市交通问题、校园课本、公务员、囚犯权利、杂志数量呈10倍增长以及3档东京广播新节目（《街上的男子》《女性时光》和《人民的声音》）首次开播的事情。同一个月，他向日本人民发表了致辞："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新的曙光也随之降临在日本上空。未来不再由少数人决定……废除全国奴役制不仅意味着人民的解放，也有利于……个人肩负起主动思考和行动的义务。日本民众如今拥有了统治的力量，必须要自食其力。"

他叮嘱他们要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参与投票。四分之三的人听从了他的号召，其中包括1 400万名妇女，而那些没有参与的人也许正因复杂的投票方式感到困惑不解；2 781名候选人代表257个党派参选国会的466个席位。议员们在投票地点附近四处巡视，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持秩序，但也有可能是担心上千名从苏联集中营遣返回来的归国者中会出现被洗脑的麻烦制造者。一些从中国东北撤回的老兵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层组织，但很少有人给他们投票。最后一次选举计票时，日本的政治色彩显然已经转变。东条的旧部中只有6人夺回了自己的席位。新国会包括49名农民、13名医生、32名教师和22名作家。"最棒的是，"麦克阿瑟说道，"里面还包括了38位女性。"这样的局面可能与某种困惑有关。在许多女性的印象中，她们是不能给男性投票的。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妓女竟然获得了超过25万张选票。麦克阿瑟给每一位当选的女议员都发去了贺电，包括那个妓女。他随即研究了选举数据，想要寻找其中的模式。选民们从33个党派和83位无党派人士中选出了383位候选人。最大的赢家自由党获得了140个席位，进步党93个席位，社会民主党92个席位。只有5位共产党人士在选举中胜出，整体色彩比较保守。吉田茂组织起了首届内阁，自此，日本内阁政府在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敦促下通过了700条法律。

相比麦克阿瑟日后在美国商人晚宴上墨守成规地赞扬自由企业的演讲，宪法中的大部分内容（其中不少是在第一大楼的6楼起草出来的）更加可靠地反映了他的政治哲学。和经常被拿来与之相比较的《法国民法典》相似，它代表了一种创造理性法律的果断尝试。这种法律的内容来源于波拿巴所说的"升华的常识"以及道德合理性，并非约定俗成或君权神授，而是与理性的要求相符。和拿破仑统治之下的法国一样，战后的日本也废除了世袭贵族和阶级特权。当年的那位法国指挥官（即拿破仑）废止了罗马天主教的控制，而美国指挥官（麦克阿瑟）则抛弃了神道教。在巴黎公布法典的目的是"实现从过去到现在的平稳过渡"。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管理下的

东京也一样。在上述两个案例中，从民权和产权到房屋贷款和离婚，一切最终都被写进了法规条例中。

离婚是新国会处理的第一项大事。听说某个士兵从婆罗洲带回了一个当地女人和两个孩子，而他的妻子却追求法律索赔的故事之后，勃然大怒的麦克阿瑟把消除性别歧视当成了自己面前的首要问题。他对女性解放事业的大力支持让许多人都感到迷惑不解（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大男子主义者，那么肯定非他莫属），可他对于此事的感触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毕竟他也是一位母亲的儿子。在他对待战争的矛盾态度中，反战的那一面总是会从在战争中遭受最多苦难的人中寻找盟友。他对社会公正的热情追捧可能是其中的另一个动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阿德莱·史蒂文森一样，将军也是一个认同“位高权重”理论的贵族。他妒忌特权人士，对待那些和他地位相当却总是和他竞争的人也十分无情。但他认为军衔在赋予某人特权的同时也将重任放在了他的肩膀上。这位战场指挥官当着部下的面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这位将军禁止军官在士兵只有啤酒的情况下喝威士忌。这位绅士不会认为女性的地位低于自己——这样做显然是缺乏绅士风度的。不仅如此，他还告诉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这样做是亵渎神明的。和男人们一样，女人们也有灵魂，因此应该得到平等的待遇。

在日本，男女之间从没有平等过。纳妾、家庭包办婚姻、奴役妻子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女性不得拥有财产，因而也就没有经济、法律或政治上的一切权利。小学六年级以后，如果条件允许，女孩们只能进入专门的学校。公立学校的课程要按照性别区分开来——女孩们所学的课程和课文都更加简单，而且大学是不接收女性的。通奸对丈夫来说是合法的，对妻子来说却是有罪的。新国会在开始阶段就必须直面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问题。根据麦克阿瑟宪法的规定，立法者只有一种选择：要么规定有通奸行为的男女双方都有罪，要么就判他们都无罪。在经历了令人极其苦恼的辩论之后，立法者们邀请选民们给自己写信。过去，选民还从未给国会写过信，他们只能阅读国会下发的法令，然后颤抖着遵循。如今，在新精神的鼓励下，书信如雪片般蜂拥而至。代表们在读完这些书信之后取消了通奸的罪名。

包办婚姻和纳妾的习俗保留了下来。有关结婚与离婚的法规得到了改写。高中变成了男女合校，另有26所女性大学开门招生。各县市中，当选政府官员的女性人数与日俱增：县议会中有23位女性议员，市议会74位，镇议会707位。被盟军占领后的第三年，一项传统被建立了起来，每一届国家内阁中必须包含一位女性次长。在麦克阿瑟离开日本之前，曾有两届国会委员会都是由女性主持的。女权主义领袖加藤勘十夫人成了第一大楼小办公室里的常客。很快，1.4万名女性成了村镇社会工作者，而2 000名身着

制服的女警也在东京走上了工作岗位，在整个亚洲引起了轩然大波。穿着短裤的女孩开始在操场上与男孩们同场竞技；麦克阿瑟每天都会坐着自己的凯迪拉克轿车心满意足地看着她们在沙坑里用力击球、追逐高飞球。

和男性警察一样，女警们也要服从麦克阿瑟的公共安全部下达的指令。她们的老师以曾任纽约公安局局长的刘易斯·J·瓦伦丁和曾任密歇根州际警察局局长的奥斯卡·奥兰德为首。瓦伦丁和奥兰德强调，要尊重这个国家新的公民自由，运用策略控制不守规矩的民众。在500万日本工人（包括150万女工）加入了2.5万个新工会之后，劳动市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动荡。他们在第一大楼内的指导者是美国劳工官员詹姆斯·J. 基伦和曾任历史教师的西奥多·科恩。20世纪20年代后的短暂爆发之后，集体劳资谈判在日本遭到了抑制——东条按照纳粹劳工阵线的模式把所有工人都纳入了一个国有工会，而基伦和科恩必须采取一系列棘手的措施，面对年长工人们仍旧听命于财阀，而年轻退伍军人却习惯服从军令之间的进退两难。

早期为了生计的罢工采取的都是可爱的日本模式——就像是歌舞队在表演时只用上平日里一半的力气，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变得更加放肆。基伦告诉麦克阿瑟，他相信工会是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方法，但他也补充道："日本工人也许必须通过经历艰难的罢工、动荡和一段时间的错误领导才能够有所心得。等工人们被自己的共产主义领袖愚弄够了，就会把他们赶走了。"听到这一合理的自由主义理论，将军点头表示赞同。然而，街头实际发生的暴力事件就是另一回事了。随着共产党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将军也变得急躁起来。这并不是将军和他们最后一次误判彼此。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劳动节，上千名共产党人在首都各处作威作福。不久，以食物短缺为由，他们聚集在天皇的皇宫外，手举红旗，试图跨过护城河。儿玉誉士夫写道："他们的尖叫声穿过装有铁条的窗户传到了我在巢鸭监狱的牢房里。"儿玉认为自己看到了问题的根源。麦克阿瑟在法律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存在，还默许他们出版属于自己的报纸。儿玉写道："当然，承认活动自由与支持这些活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大部分日本人都把赋予共产党人的自由错误地理解为普遍的支持。严重的误解导致无数日本人在没有严格审查共产主义之前便选择了支持共产党，从而受到了他们战术的宣传。"

越来越大胆进取的共产党人获得了好几个工会的控制权。第二年1月，他们还提出威胁，除非吉田辞职且将工资水平提高3倍，否则就发起大罢工。罢工计划于2月1日午夜开始。最高统帅通常都会通过言简意赅的书信向首相传达自己的意图、提出哲学问题或是用虚无缥缈的暗示表达自己想要采取的行动。然而，一场大罢工是不能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来处理的，而是需要直截了当、果断从容的行动。即使第一大楼里的某些官员已经忘却了麦克阿瑟是个多么坚定的人，此刻他用自己的行动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他最后才采取行动，而7个小时后，25万工人准备从电厂、公共事业单位、学校、铁路离开岗位，而另外150万人即将在黎明时分发起同情罢工。他发表了一篇声明：“一场中断交通和通信的大罢工将阻止食物的运输……停滞产业运作，而这样的瘫痪势必导致可怕的结果，让每一个日本家庭遭殃。因此，我已经通知为实施大罢工而结盟的工会领袖们，我是不会允许他们在目前日本正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使用如此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武器的，并相应命令他们不许助长此类行动。”根据他的命令，吉田宣布立即引入禁止公职人员罢工的法案。共产主义报刊《赤旗报》遭到了审查。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也减少了。日本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访问更是遭遇了严格的限制。此法生效了，罢工行为从此销声匿迹。麦克阿瑟事后告诉C. L. 苏兹贝格，共产党人失败了，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儿玉对此也表示赞同。“2月1日罢工的失败证明共产党的活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写道，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优势”。

如果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无法针对财阀迅速采取行动的话，他们还会面临更大的威胁。麦克阿瑟之所以萌发了鼓励工会发展的念头，是因为他决心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平衡作用力。一位因为第一大楼的经济政策而倍感不悦的美国商人要求将军告诉他这些政策和《波茨坦公告》（也就是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依赖的基础）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将军虚伪地回复道，《波茨坦公告》命令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摧毁军国主义的根源。鉴于轰炸珍珠港的飞机是在工厂里制造的，他不得不强迫工厂主听从他的命令。而他之所以认为日本社会保障立法是合理的，理由也与此相似（用他的话来说，他提议保障“全体国民从生到死的幸福”）。他辩论道，心怀不满的雇员会充实思想激进的人群的队伍。社会保障能够消除他们的不满，从而达到反战的目的。如果杜鲁门和艾奇逊仔细思考一下这位东京总督为每一次的政治行动寻找军事理由时所用的技巧，就能为自己、麦克阿瑟和美国人民省去不少麻烦。

除了钦佩西班牙长枪党党员的威洛比，麦克阿瑟第一大楼总部里的气氛总是让冈瑟想起20世纪30年代初期处于共和体制下的西班牙——那时候，西班牙共和国还没有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威胁，也没有遭到佛朗哥的反革命运动破坏。他写道，就连两者实行的计划都是一样的：“试图终结封建主义、严厉削减古代特权、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妇女、极端推进劳工立法、普及大众教育、在乡镇设立流动汽车图书馆、废除贵族制度、广泛扩大社会服务、实行计划生育、保障公共健康、对富人施行阶梯征税、让原军队名誉扫地，以及抓住机会对几乎每个领域进行改革，改革，改革。”

遗憾的是，美国杂志《国家》和《新共和》以及针对麦克阿瑟的其他自由主义批评者没能密切关注他的进展。就连I·F·斯通都几乎无法改进将军打击

反动实业家的方法。他勒令资助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银行停业，冻结了它们的资产，下令将所有的战争所得返还政府。紧接着，他又开始粉碎强大的垄断企业。控股公司、子公司和连锁家族管理制企业被解散。大公司被分解为独立的公司，大部分由它们战前的管理者继续经营。除了个别例外，大部分管理者的薪水被限制在了每年36 000日元（2 400美元），顶薪每年65 000日元（4 333美元）。他要求十一大家族的成员把手中的工业证券换成禁止转让的政府债券，而政府债券的价值因为重税和结存冻结10年而降低，使得管理人员有时间巩固自己的地位，抵制前任雇主试图出钱买通他们的努力。除了庞大的财阀信托机构之外，83家其他公司均被解散，其中32家遭到了完全清算。

起初，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计划拆除1 100家工业厂房，并把它们作为赔偿计划迁去同盟国家。德国鲁尔区的烟囱大王“Schlotbarone”公司就是这样被处理掉的。可将军却认为这个主意愚蠢至极，从而放弃了它。抗日胜利纪念日那天，日本正面临生存这个赤裸裸的问题。麦克阿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相信平衡预算，但这一点在1945年是根本办不到的。他日后写道，他“从未见过比日本政府在战争结束时陷入的局面更加错综复杂的金融危机”。加诸穷人身上的税款全部被拿去充公，以至于农民们最后奋起反抗，收税员根本就不敢出现在某些村落里。工业生产是战前数字的16%。麦克阿瑟从美国请来了税务专家，并向华盛顿方面申请了经济援助。他拿到了不少（20亿美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德国的美国管辖区人口只有日本的1/5，却拿到了人均三倍于东京的援助款。欧洲媒体以及一部分美国媒体书写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报道，描述联邦德国的工业恢复情况——德国人自己称这一局面为“经济奇迹”。事实上，获得了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奇迹的日本却被媒体忽略了。可想而知，麦克阿瑟感觉自己被人迫害了。

同样可想而知的是，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他的监督下，威廉·马夸特准将在第一大楼快要散架的小型附属建筑中开辟了一片经济科学区，其中共有20多个分区。军事政府团队监督大米的征收、煤炭的生产和渔业产业。遭到炸毁的商铺得到了重建，机械装备得到了重新装配，交通和通信网络也得以恢复，对外贸易重新活络起来。将军邀请来自底特律的美国银行家协会前任主席约瑟夫·M. 道奇到第一大楼来担任顾问，以便制订出周全而又讲求实际的预算计划，并达到稳定和节约的效果。通过改进管理、借鉴美国人的技术建议、快速增加劳动力、提高储蓄比例，日本的商业贸易有了惊人的发展。三年之内，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数量就减少了一半。五年之内，日本的国民收入已经超过战前水平，总值20亿美元的国债几乎和战后的纽约市水平相当。这既让美国保守派人士倍感欣慰，也保住了吉田的温和派地位，还大大削减了共产主义者在城市里的实力。

共产主义的影响从未在乡村里出现过，因为麦克阿瑟的土地改革计划（也许是他在日本最伟大的成就）消除了让农民心生不满的主要来源。他本人将其称之为“卓越的成功”，还补充道：“自从格拉古兄弟在罗马帝国时期努力施行土地改革以来，我认为没有人曾在这件事情上取得过如此成功的成就。”注 实际上，他比即将在隔海相望另一边掌权的毛泽东先一步解决了土地改革的问题。赖肖尔由衷地相信将军的目标是“远超那些中国人”的。他在给作者的信中写道：“日本土地改革完成后，90%或以上的土地都落入了耕田者的手中，而中国农民却在大型的集体农庄里劳作，很少或根本没有可能拥有土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阿瑟在上百万人的记忆中应该是一个试图在战场上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的人。实际上，他应付农业动乱局面的方法极端得连信任大型合作农场的美国人都惊叹不已。出生于俄国的专家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曾于1945年受雇于麦克阿瑟，负责起草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土地改革法案，却在麦卡锡时代被众多右翼组织列入黑名单，后遭艾森豪威尔的农业部部长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开除，还被对方称为“安全风险”。然而拉德金斯基不过是在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

最高统帅走马上任之初，日本随处可见一块块稻田朝着列岛的山脊处倾斜。对于在田间劳作的农民们来说，脚下的稻田耕种起来格外急迫费力，却很少为他们带来回报。“直到战争末期，”麦克阿瑟写道，“一个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奴隶制系统实际上依旧存在。日本的大部分农民要么是彻底的农奴，要么就背负着要被地主从每年的收成中抽取高额分成的契约。”权力掌握在16万身在外地的地主形成的农村寡头手中，平均每人拥有36座农场。这就是最纯粹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而将军决心消灭它。占领日本的第4个月，他吩咐老国会通过了必要的法律。由于担心遭到政治肃清，议员们对他的要求一贯是未经审查便予以批准，可重大的土地改革意味着彻底重建日本的乡村社会。鉴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本身就属于寡头组织，这些人犹豫了。他们通过的法律免除了日本70%的佃租地，却并未解开束缚农民的枷锁。

近一年之后，战后的第一届国会才拿出了麦克阿瑟和拉德金斯基想要的东西。但等待是值得的。将军在提到此事时说：“我相信这些措施……必然终将撕碎在日本农村贫瘠的土地上盘剥上百万日本农民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最终通过的计划应该被农村土地改革最开明的拥护者所接受。”新法案通过实际上是征收地主财产的方法解放了日本的农民。在外地主手中的所有土地都必须强制出售给政府。由于没有顾及通货膨胀，这些土地的转售价格低得有些荒谬——每英亩土地的价格相当于黑市中一条香烟的价值。紧接着，佃户们受邀以同样的价格购买这些土地。款项可以分30年偿还，利率为3.2%。新主人被要求亲自耕种自己的土地，土地面积从富饶的本州岛的3公顷到贫瘠的北海道的12公顷不等。总体来看，共有500万英亩土地被易主，而当这些交易全部完成时，麦克阿瑟宣布全国89%农田的

所属权都掌握在了耕种人的手中。

不出所料，农业产量变得越来越丰盛。但每天的出生率也在逐步增长。有效避孕措施的缺乏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此外，还受到了麦克阿瑟的公共卫生措施的推动。疾病率逐渐走低，长寿人口越来越多。日本一直都是一个格外讲究卫生的民族，但尚未掌握现代卫生学。面对不时便会席卷列岛的致命流行病，他们只能认命。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并不这么认为。首先，他在第一大楼里设立了一个公共卫生部门，委派军医克劳福德·萨姆斯担任负责人，不久又在吉田的政府中设立了卫生与服务部。萨姆斯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卫生运动，随后又推广了大范围的免疫与疫苗计划。最终，霍乱被彻底消除，因患肺结核和白喉致死的病例分别减少了88%和86%，伤寒致死率更是降低了90%。萨姆斯预测，占领日本的前两年，仅防控传染病就能挽救210万日本人的生命——比战争年代中战死的日军人数还要多，并超过战时死于轰炸（包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日本平民总数的3倍。男性寿命延长了8年，而女性寿命则延长了14年。按照萨姆斯的话来说，这种现象“在医学史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是无法相比的”。因此，日本也成了因科学导致人口问题恶化的国家之一。不过，对于那些因此而存活下来的人来说，这却是个令人愉快的问题。日后，这个问题将受到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和人工流产的控制。

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日本的学校会教授学生饮食规则，并给学生提供营养均衡的饭菜。但这仅仅代表了将军教育努力的一部分。他清楚，如果日本改革的脚步想要持续到占领期结束之后，就必须关注下一代。过去，军阀式的教育深入每一间教室。全国没有一所学校拥有校长，就更别说教师家长联合会了。一切都掌控在东京的一个负责制订课程计划和审核所有教科书内容的教育部门手中。麦克阿瑟邀请乔治·D. 斯托达德博士（后来担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率领27位一流的美国教育家前来参观这些学校，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委派海军陆战队军官唐纳德·纽金特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还亲自起草了新的教育法案。公众的反应为证明日本正在觉醒提供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议员们收到了600万封来信，以催促他们支持这一法案，另有200万封同样内容的书信是寄给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

国会通过开放教育的法案之后，纽金特和他的日本顾问们核准了删除军国主义宣传内容的教科书。麦克阿瑟将学术自由确立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政策之一：“遭到解雇、停职，或因持有自由主义或反军国主义观点或采取行动而被迫辞职的教师和教育官员们将即刻重新获得任职资格。以种族、国籍、信条、政治观点或社会地位歧视任何学生与教师的行为都将被禁止。学生、教师和教育官员们将被鼓励自由探讨包含政治、民生和宗教自由在内的话题。”战前的学制内只剩下死记硬背复杂日文汉字字符的课

程。麦克阿瑟严肃考虑要将它们替换成英语化的罗马字，后来担心这样的文化震荡带来的影响未免有些太大。事实上，日本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变化感到十分惊慌失措。研究显示，第一个明显的转变表现为成年日本男女在结婚前越来越少征求家庭的同意。如今他们感觉自己有权自由地做出决定。不久，就在抗日胜利纪念日8年之后，西奥多·盖泽尔（“苏斯博士”）到访日本，在100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针对小学生的态度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鼓励孩子们提交一幅画作，通过画作展现自己长大后想要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收到了画着医生、议员、教师、护士、电车司机甚至是摔跤选手的画作，却只有一个人画了一位军官，他想要成为麦克阿瑟。

纽金特的民间情报教育局也在密切注意着日本媒体。期待最高统帅的媒体政策能够做到全面开放未免有些不切实际，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占领军稳住脚跟的前几个月里，某东京日报通过发表有关盟军战时暴行的假新闻测试了他的忍耐能力。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敏捷地予以回击，为记者们颁布了一套法规：“任何有可能直接或间接扰乱公共安宁的内容都不应出版……不得对盟国占领军进行破坏性批判或发表可能引发对这些军队的不信任或反感的言论。”此举在当时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抑制传媒自由的问题就在于，一旦有人划出了一条界线，紧接着就会有人迈步逾越它。纽金特手下负责审核工作的官员总是十分偏执，行动迟缓，往往不够称职。就连无害的报道往往也要被扣押几天以上，还会遭到大量删减；若是日本记者究其原因，对方只会草率地回答无可奉告。监管终有一日会放松下来，但到了那个时候，编辑们就要亲自担负起审核的责任，不能发表令人心中存疑的文章。尽管冒犯君主已经不再是一项罪名，报纸还是会谨慎地避免发表会影响天皇和王室声誉的报道。简而言之，人人都在小心地避免争议。美国记者们察觉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日本记者们正紧紧地盯着麦克阿瑟对待媒体的方法，因为将军相信权威应该得到毫无节制的尊敬。

广播就是另一回事了。将军并不是很重视口语；他认为电波只不过是种娱乐的媒介。战前的日本广播既没有什么信息，也不够丰富多彩。60%的节目都以无聊的政府演讲为主体，紧随其后的则是长达10分钟的沉默。麦克阿瑟按照英国广播公司的模式创立了日本广播公司。日本五大主要无线电台的拥有者需要缴纳听众税，且不允许播放广告。超过半数的节目播放的都是美日两国的肥皂剧和流行音乐，但新闻播报员却总是警觉机敏，不偏不倚。有关内阁更迭的报道在内阁向国会发表宣言后的3分钟之内就被播送了出去，随后还配有简要的内阁成员介绍。公众事务在《请提供信息》《20个问题》和《国家广播论坛》中得以讨论。起初，针对行人的街头调查反应惨淡。惊呆的日本人往往会告诉主持人自己对时事没有任何的看法，即便有话可说也不愿向主持人透露，因为他们的话听起来将不免有些粗俗。后来，他们发现美国人对此的反应截然相反。民意调查（另一种创新）记录了一大转变。如今，男男女女在街上接受采访时都会为自己对任

何事情都没有看法为耻。《20个问题》节目组每天都会收到上千封听众来信，信中表达的都是他们对受访者观点的评论以及提出的建议。有些人想要知道美国是否也有类似的节目。美国的同类节目的确不少，但没有哪个能够与这些日本广播节目一样成功——比方说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自由恋爱对抗包办婚姻的圆桌讨论节目就吸引了上百万听众，其中一些没有收音机的听众还会聚集在公园中的公共喇叭旁收听节目。

在塑造日本精英观点方面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的现场戏剧表演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舞台监督们总是能够很快地适应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需求。走马上任之后的第5个月，麦克阿瑟发现战时“仅仅被用作军事宣传手段”的舞台如今“被赋予了自由主义的主题，可以上演新式的教育剧”。消失得最明显的是赞扬神道教美德的戏剧——尽管这里和别处一样，该让战败的日本人相信什么、用什么信仰来支撑自己成了将军面临的大问题。答案模棱两可，因为麦克阿瑟本人连他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认清。

他相信上帝。他说过：“我们带来的传教士越多越好，这样就能将更多的占领军送回家乡去了。”在他的推荐下，日本引进了1 000万本《圣经》。而他则把“史上迄今为人所知的最伟大的精神改革”归功于自己。然而，重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说的是“民主观念”。他总是十分热衷于此，可“民主观念”几乎算不上是一种宗教。诚然，他之所以厌恶神道教是因为它的平淡无奇；他并没有提起他的虚假偶像，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道：“尽管我是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并且完全墨守它的教义，但我总是真诚地钦佩东方信仰潜在的许多基本原则。基督教和它们之间的区别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迥异。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理解了其中一种信仰很有可能有助于加深对另一种信仰的了解。”

没有哪位严肃的神学家可以认同这一观点。这是扶轮社主义，是诺曼·文森特·皮尔主义，一个理解力与麦克阿瑟相当的人本应在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水平上进行推论。如果他加入了某个宗教团体，对虔诚的断言本可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然而他却在战场上歌颂着自己不朽的仪式，如今又在第一大楼里四处传道。

日本人感到十分困惑。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新任统治者，却分不清他的信条。因此他们接受了美国颇具创造力的大众文化，视其为替代品，把牛仔裤当作教士袍，把流行歌曲当作赞美诗，把万能的日元当作他们的偶像。前去探访日本古庙的美国商人发现，只要支付一小笔费用，就能够让神庙中的修女们伴着柔和的长笛声跳上一曲，嘴里还没完没了地默念着为祈祷通用汽车公司、联合果品公司或胡佛吸尘器公司事业有成而写就的祷告词。这可没有遵从任何信仰教条的意志。他在祈祷时也能表现自己的雄辩口才。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第二个周年纪念日，当和平的钟声在炸弹爆炸的那个地方响起时，他恳求“把对那灾难性的一天的愤怒之情转化为对

各族人民的警示”。核武器“对人类的动机、逻辑和目的发起了挑战”。他表示：“这就是广岛的教训。上帝不允许我们忽视这一点。”麦克阿瑟承认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甚至可以在他的面前谦逊地低头。但他从未真正向他屈服过。也许这就是许多人认为他只会在镜子面前下跪的原因吧。

作为解放了日本妇女的男人的妻子，琼每个星期日都要带着儿子前去参加主教仪式。这是她自主参加的唯一一项活动。偶尔，她也会独自出现在公开的派对上，或是孤身出行，为丝绸产业的复兴剪彩庆祝，但这些全都是应他的需求。即便如此，在和两位参谋前往郊区进行为期五天的短期旅行时，她还是在第三天结束时决定缩短行程，因为她表示：“离开将军五天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她告诉一位女性记者：“我的整个人生都与将军和我们的儿子有关。我会竭尽全力照顾好他们。”听到别人赞扬麦克阿瑟，她会用力地点头，开口答道：“你说得太对了。我赞同任何赞赏我的将军的人。”对琼来说，婚姻是要受神圣的指挥系统约束的。她的丈夫身负重任。丈夫来做决定，她负责遵循，为其他所有人做出榜样，打消自己心里有可能存在的任何疑虑。

日本投降之后的那几天，她一直都在担心和阿瑟一起飞抵厚木机场的事情。麦克阿瑟就在舷梯旁等待着她。“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她在他拥抱自己的同时低声问道。他笑着回答：“一点儿也不危险。”当然，他是对的，尽管她事后回忆，自己刚到日本的那个星期就是无法放松下来。起初他们留宿在新格兰酒店里，后来搬去了太阳石油公司旗下一处位于断崖上的宅邸中。在这座可以俯瞰首都的房子里，他们和埃格伯格医生、一位翻译和将军的军事秘书住在一起。最终，最高统帅将妻儿带到了大使馆，告诉她们这里将成为他们的新家。他还高兴地在大使馆里找到了一幅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他立正站好，挺直身子敬了一个西点军校式的军礼，干脆利落地说道：“将军，好久不见，但我们终于做到了。”他当即为美国革命女儿会草草写下了一段随笔，把这个插曲告诉了她们。（“我感动得无以言表。”他告诉女儿会的成员们。紧接着，他却详尽地描述起了这件事到底是如何使他感到动容的。）

另一方面，琼却感到几乎有些绝望。画像似乎是唯一一样保存尚且完好的物件。15年前，为了给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耗资百万美元修建而成的人称“胡佛式劳而无功的大工程”的美国大使馆曾是一座高大威武、拥有雪白墙壁的抗震建筑，一半是摩尔风格，另一半则是仿殖民风格。这里有熟铁修筑的大门，并坐拥一个庭院、一座倒影池、一个游泳池、一座领事馆，紧邻着主楼（麦克阿瑟称之为“大房子”）的地方还矗立着两座参谋公寓楼。这里曾是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但第一个前来视察的官员艾克尔伯格却警告他们，一枚炸弹“炸穿了这里的屋顶”，“地板上的积水足够修建一

座浅水池”，所有的家具也都被“毁坏了”，似乎无法修补。每一个房间都脏兮兮的，被炸弹碎片炸得布满了弹孔。琼估算了一下，以正常的方式替换窗帘至少要花费5 000美元，而更换地毯的费用就更令人咋舌了。门外，法式花园里的树木和灌木丛全都被伐光了；就连灰色的岩石都被炸得粉碎。将军兴高采烈地吩咐道：“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修好它。”可她还是感觉不知所措，这里看上去是那样的沉闷、肮脏、荒芜。她的儿子感受到了她的情绪，拽了拽她的手问道：“我们一定得住在这里吗？”他的父亲伸出一只手臂搂住了他。“打起精神，阿瑟。”他说道，“你母亲会照顾好我们的。”他告诉琼：“我们就简单地布置一下这里吧。没有时间非要讲究什么富丽堂皇了。”

然而琼还是决心恢复这里往日的辉煌。她感觉自己没有选择。她心想，如果你要生活在一座纪念馆里，就必须活出不朽。她开始用日本和服色彩斑斓的宽腰带填补空空如也的壁龛。窗帘全都是她利用色彩明艳的当地布料随性制作的，而地毯则是日本工匠铺设的。床上用品是从夏威夷订购的。角落和裂缝处摆放着镶嵌着珠宝的烟盒、漆柄扇和手工银制品。墙上悬挂着画作和精美的画屏。将军喜欢的那张红柳摇椅被人从布里斯班运到了这里。壁炉前摆放着一张圆桌。阿瑟的陈设柜上摆放着他的玩具、木雕套组、一支和他父亲的烟斗相似的银色烟斗、他收集的迷你象牙人偶以及一套小动物瓷器。名叫“六合先生”和“喜代先生”的日本人被雇作用人，身上穿着印有美国国玺的巧克力棕色和服。一天，这家人的菲律宾男仆在报纸上的照片中认出了洗劫麦克阿瑟家马尼拉顶层套房的日本军官。他和赫夫乘坐吉普车来到巢鸭监狱审问了这个男子，并找回了100本藏书。圣诞节到来之际，大使馆看起来已经有了几分家的样子。不久，前来执行实情调查任务的参议员霍默·弗格森来了。怀疑纳税人的税款遭到了浪费，他狡猾地问道：“这座华丽的宫殿是谁的呀？”西博尔德解释了一下这座建筑的历史。“哦。”参议员嗤之以鼻，“可它在我看来还是挺豪华的。”听了这话，琼不知自己是该感到愤愤不平还是引以为豪。

悉尼·赫夫和他的澳大利亚新婚妻子凯拉被安顿在了其中一间公寓里，鲍尔斯、邦克以及其他的副官则住在其余的房间里。琼建立起了家庭账户，操持起了家中的银行业务。和君王的妻子一样，她在爱国纪念日上也要检阅游行队伍、代表自己的丈夫担任女童子军和红十字会的领袖，还得不时为棒球比赛开球。在家时，她会在玫瑰花的环绕下坐在客厅里接见高管，用巨大的银壶倒咖啡，切下一片片厚厚的蛋糕。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她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可做的事情。实际上她的生活异常繁忙。她每天都必须监督6顿饭的烹饪过程，其中3顿是为将军和她自己准备的，还有3顿则是为阿瑟准备的。她花了很多时间在银行和军队福利社里排队。其他人在认出她精干的身影和头顶上那顶从大使馆阁楼里翻出来的小毡帽时都会挥手示意她到队伍前面去，但她总是坚持要排在队伍中。她不会为自己预定任何的

东西。一次，当她发现自己忘了带身份证时，还特意回家取了一趟。“麦克阿瑟夫人，”军队福利社的人告诉她，“你几乎是日本唯一一位不会要求享受任何特殊待遇的将军夫人。”

每天晚上，她为了给阿瑟洗澡都要经历一番挣扎，但在大部分日子里，她都会找时间和阿秋下下跳棋。对于目不识丁的阿秋来说，跳棋是她为数不多的几项娱乐活动之一。不过，琼总是把自己对将军的责任排在第一位。由于他憎恨打电话，她担负起了替他拨打大部分早间电话的任务。她还会为他做好报纸和杂志的剪报。他从不带钱，副官替他付款之后，琼就要负责偿还他们。她会在他的午睡时间结束时叫醒他，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晚选择一部晚饭后在客厅里播放的电影。每天晚上，她都会打着哈欠熬夜等待将军在100英尺长的走廊上自言自语地踱步，有时甚至熬到凌晨1点。她每晚执行的最后一个惯例是去查看阿瑟，然后为自己的丈夫盖好被子。

她从未适应过自己的名人地位。一次购物时，她偶然碰上了正等在大楼门外的人群。门口通往街道的走廊大敞着；显然某为重要人物就要出现了。出于好奇，她也加入了等待的人群中。什么也没有发生。由于她身材娇小，甚至比大部分日本人还要矮，所以被推搡到了前面。看到麦克阿瑟手下的一位军官，她开口询问他们在等待谁。对方也不知道，但表示自己会去询问清楚。不久他走回来对她耳语道：“大家在等待麦克阿瑟的妻子出来呢。”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从楼后走进大楼，然后站在了楼前朝着围观群众鞠躬，而那些迷惑不解的人也朝着她鞠躬回礼。

听说美国陆军对想要复员退伍的士兵实行的是分数制度（驻外几个月、参战几场、获得过几枚勋章等都有对应的分数）阿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的分数够不够回家？”这个小男孩从菲莉丝·吉本斯那里学得了满口英国口音（将军对此感到十分担忧），但是有人告诉他，他的分数还不够。“我们靠得太近、经历过太多事情，谁也不能单独离开。”琼告诉诺拉·沃恩，“我不能把阿瑟送回去。我不能丢下将军自己走掉。要走的话，我们必须一起走。三个人一起走。”麦克阿瑟曾告诉过妻子，他认为自己在日本的改革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接着，他说道，他也期望自己能够告诉她：“是时候向上走了，琼妮。”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也可以正常地长大”。

这逐渐成了他的下属和家中佣人的一种信念。阿瑟和任何一个在皮奥里亚或迪比克长大的孩子一样。“他真是个不错的孩子。”吉比会说，“他非常听话。”他和家庭宠物一起玩耍，崇拜约翰·韦恩，是个热心的童子军，会读《乔·帕鲁卡》，爱喝可乐、爱吃军队福利社的B–29汉堡。他的母亲和阿秋会带他去博物馆、公园和动物园。麦克阿瑟某天过生日时，阿瑟把一对自己雕刻的书挡送给父亲作为礼物；还有一年送了一个手工的烟斗架；第三年则送了一只来自京都的小巧日本陶土烟斗。不过他告诉将军：“如果

烟斗对你来说太小，我可以把它把放进我的收藏。”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明白了他的暗示，把烟斗放在了阿瑟的陈列柜上。麦克阿瑟试图保护儿子，不让他过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只允许摄影师在自己带他出席公共仪式场合时靠近他。第一大楼里的军官们也很少看见他。他们相信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儿子只不过是另一个出生在军营里的孩子，过着和父亲在19世纪80年代时在边防站中一样与世隔绝的生活。“阿瑟·麦克阿瑟，”肯尼说，“只不过是另一个正常、健康、可爱的美国男孩。”

他的确很健康（虽说有些娇气），而且十分引人注目，喜欢母亲多过父亲。但说他正常未免有些荒唐。这是不可能的。他的人生曾在极端的紧张刺激和庇护下的平静中来回摇摆。第一次在东京过生日时，他和12位头发斑白的上校与将军玩起了抢椅子的游戏——挂着勋章的指挥官们踢着彼此的小腿，挣扎着争抢座位，当然，还要确保这位8岁的老“军士”能够赢得比赛。同样，他还经常在弹塑料片和槌球游戏中打败成年人。“嗨，冠军！”，这种比赛后，他的父亲在回家的路上会这样尖叫道。阿瑟需要的是失败，惨败，输给和他相同年龄的孩子。可外交界很少有年纪这么小的男孩子。一次，他的母亲欢欣鼓舞地听说一位新的公使带来了自己的小儿子。可到了晚上，她就变得灰心丧气的了。“不幸的是，”她告诉麦克阿瑟，“阿瑟不会说阿富汗语，不管你怎么称呼这种语言。”最终，埃格伯格返乡之后，接任的医生C. C. 卡纳达中校随任的儿子和阿瑟的年纪相当。在卡纳达家的孩子之后，又来了三个小朋友。很快，阿瑟每个周末都会接待一两个客人来家中过夜。但他还是会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和仆人们玩警察与强盗的游戏，或是坐着红蓝白三色小船、举着写有“巴丹”字样的船桨在倒影池里划水。场面着实有些可悲。

他的母亲和吉比都对他十分严格。女家庭教师吉比坚持要他提高自己糟糕的拼写能力，还对他的音乐天赋加以训练。在她的帮助下，他创作了两首钢琴曲。看完电影《黑狱亡魂》之后（理论上，他们只允许他留下来观看星期六播放的电影，但他总是会悄悄溜回来），他得到了一把齐特琴，并立即弹出了电影的主题曲。这是一项小小的成就，值得得到适当的认可。将军告诉自己的参谋，他生育了一个天才。当男孩用水彩画出了第一大楼的办公室时，麦克阿瑟还骄傲地把这幅画展示给了媒体，称画得“比伦勃朗还要好”。

真正和阿瑟在各方面都旗鼓相当的同辈是皇太子明仁。他们曾被引见给彼此，并一起拍了一张合影，使得阿瑟成了那些年麦克阿瑟家族中唯一一位曾和裕仁之外的皇室成员见过面的人。（琼就从来没有被介绍给天皇、皇后或他们的儿子。）和明仁一样，几乎所有人都过分地顺从阿瑟。托尼·斯托里（安东尼）会带他去机场，把他放在将军飞机的驾驶座舱里，让他操控那些控制钮。日本警察会向他敬礼。他骑马玩耍时，座驾是皇家的纯种

马。他的网球教练是戴维斯杯的日本冠军。在东条的审判会上，他被安排在前排的座椅上，头上还戴着耳机。麦克阿瑟在升任永久五星上将的那一天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媒体摄影师进门后又被人挥手赶到了一边，只为了让刚刚拿到新相机的阿瑟能够拍下第一张照片。

据西博尔德回忆，将军是一位“慈爱却有些宠溺孩子的父亲”。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儿子在滑冰时摔断了手臂。不过是单纯的骨折，也没有引起任何的并发症，可据他的副官回忆，这位父亲“就像疯了一样”。医院里一片混乱。麦克阿瑟到病床边探望了儿子三次，每一次几位骨科专家都要随行。即便一张X光片就已经足够，他还是要求医院拍摄了几十张片子，并下令再也不许阿瑟滑冰。“一位军官的第一要务就是保持身体健康。”他告诉鲍尔斯。将军显然是回忆起了自己接受美国陆军学院体检时经历的重重困难，希望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当然，他心里从未怀疑过儿子最终会考入陆军学院。他在给学员军团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上帝能让我活到亲眼看着小阿瑟在‘平原’上宣誓成为西点军校新生的那一天。”

阿瑟是麦克阿瑟在和琼回房休息前最后看望的人，也是每天早晨第一个前去问候他的人。早上7点，男孩会冲进将军的卧室里，挥舞着小拳头击打他。与此同时，一个日本仆人会打开一扇门，朝着满脸期待地排着队蹲在“大房子”楼下的4只狗发出“嘘”的信号声——布莱基是一只可卡犬；宇己是一只白色的秋田犬；布朗尼是一只日本柴犬；科诺则是赫夫家的西班牙猎犬。4只宠物会欢快地竞相跑进卧室，与最高统帅和儿子互相追逐。麦克阿瑟欢快地喊叫着，阿瑟也跟着尖叫，小狗们更是一边吠叫一边疯狂地摇着尾巴。

另一位仆人会将4个装有鸡蛋和牛奶的食盆放在紧靠着早餐桌的餐厅地板上。小狗们把自己的食盆舔干净之后便会聚集在将军的餐桌旁，钻进他那件胸口绣着黑色字母“A”的陈旧西点军校灰色浴袍里。他会一边喂它们些食物碎屑，一边享用自己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水果、麦片、鸡蛋、面包和不加奶油但加了很多糖的咖啡。琼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啜着咖啡、聊着天。阿瑟一脸崇拜地望着父亲，而小狗们则耐心等待着早晨的另一项仪式：麦克阿瑟刮胡子。他会和阿瑟一起哼着二重唱、来回挥舞着刮胡刀。接下来便是将军的健美体操时间。他从不打高尔夫球，也从不钓鱼、打猎、骑车和慢跑，甚至没有使用过大使馆的游泳池，但这些编排好的体操却能让他充满活力。小狗们知道哪个动作是最后一节体操，会在他做完之后一拥而上，用鼻子紧挨着他。宇己是阿瑟最喜欢的宠物——他喜欢给“它”穿上奇异的服装，在它的头上绑上帽子——但他的父亲更喜欢布莱基。在他更衣时，其他3只宠物都离开了，只有布莱基能够留下来看着他。一天早上，琼走进来时发现它正坐在一张软垫座椅上。“哦，将

军！”她不赞成地说道，“你看看，布莱基把椅子都弄坏了。我是不会让狗坐我的椅子的。”麦克阿瑟坚定地回答：“琼妮，那是我的椅子，布莱基想什么时候坐上去都可以。”

早晨8点，全家人会聚集在一起祷告。将军就是以此来代替出席教堂正式仪式的。吉比会拿一本公祷书阅读祈祷文，然后由麦克阿瑟从《圣经》中选取一小段来阅读。8点半，吉比会不懈地敲着一只大个的学校铜铃，直到阿瑟和她一起开始一天中的第一课。与此同时，将军也会开始浏览急件，告诉琼自己想让她拨打哪几个电话，只有需要做出当下立判时，亲自接过听筒、含混不清地说上几句。一个星期里总有那么两三次，他会在动身前往办公室之前吩咐妻子准备迎接前来参加午餐宴会的客人。他不喜欢招待别人（因为这通常意味着他无法午休），但正如他告诉鲍尔斯的那样：“这不是我所能控制的。既然战争已经结束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会带着自己的人找上门来。我不想大惊小怪。但我不能让他们满怀希望地登门，离开时却说我不愿意见他们。”

客人们会在接近两点钟的时候到达。琼、赫夫，有时还有鲍尔斯，会在宽敞的客厅里接待他们。午餐时，琼往往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女性，有时还是唯一一位军外人士；鉴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规定军官的地位优于外交官，许多国家驻东京的代表都是海、陆军将军。那些期待鸡尾酒的人都会感到失望。如果他们暗示自己有些口渴，琼便会转向鲍尔斯，含糊地开口问道：“我想我们还有些雪莉酒，对不对，少校？”只需在人群中快速地周旋一圈，她就能敏锐地推断出对方为什么会在这里，以及他心里想要什么。半小时的等待之后，凯迪拉克轿车会颤动着停在车道上。“将军来了！”她会屏气说道，然后在他走进房间时大声喊出：“哎呀，是将军！嗨，将军！”毫不理会别人，将军会飞快地跨着大步走过去亲吻妻子，然后再转向其他人。对所有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之后，他会转身走向餐厅，招手示意贵宾们坐在自己的身边，用低沉地声音说道：“你们肯定饿了。我知道（至少）我饿了。”

他根本就不饿。他的午餐和晚餐内容一模一样，十分俭朴：汤、沙拉和咖啡。但他珍视自己的时间，想吃完午饭就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他总是会被客人们走到桌旁时争先恐后抢占座位的举动给逗乐。西博尔德回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宅邸是占领时期唯一不拘于礼节的场所。按照麦克阿瑟的话来说，“麦克阿瑟礼节”意味着他和琼会坐在餐桌的两头，主宾坐在他的右手边，其余的人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这样通常会导致高级军官坐在中间，而精力更加充沛的年轻军官则能够坐到最高统帅的身边。其实这并不碍事，琼能够领会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目光，敏捷地提起某人想要和他谈及某事之类的话题。这个时候，将军就会中断自己的话，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向大家解释道：“每一位丈夫都会告诉你，妻子才是家里真正掌权的

人。”这样一来，所有人就都有机会和主人说话了。

喝咖啡时，将军会用自己悦耳的方式主导对话，分析世界局势，预测未来发展，然后和琼一同站起身来。通常他都会安排琼出门送客，自己则从另一扇门悄悄离开。此举会冒犯许多人，让他们以为将军觉得自己才是宴会里最重要的人。很少有人察觉到这位高傲脱俗的人物在私密的社交场合中会害羞得难受，总是被可怜巴巴地困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无聊对话、宴饮和交际应酬中。他更喜欢安静地和妻子一起享用午餐，听着桌子上的便携式收音机播放的3点新闻，然后躺下来安睡一个小时。在发表自己对日本的见解时，他总是能让听众听得如痴如醉，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擅长的那种反唇相讥（所有伟大的政治家都必须掌握的一门艺术），却是麦克阿瑟无法企及的。他对吃得好的定义就是吃得快。迈进家门之后，他能在20分钟之内就吃完琼摆在桌上的晚餐，然后走进餐厅旁的茶水间。那里的墙壁上有一个洞，前面竖着巨大的电影屏幕。坐在室内的摇椅上，他会按照惯例静心点上一支雪茄，开心地吞云吐雾。

播放电影的过程中，琼会坐在他的左手边，而赫夫则会坐在他的右手边。现场还会摆放50张折叠座椅，因为所有的参谋、仆人甚至是大使馆的保安都受到了长期邀请，可以随时参与观影。尽管许多士兵还在嘲笑他高傲的样子，他的声望在那些每天都能看到他的人中间可是很高的。“大房子”的哨兵还曾凑钱给他买了一个烟灰缸（就摆在他的摇椅旁边），还有一件花呢外套，以便他在凉爽的夜晚趁着开演前的灯光暗下来之前把它套上。据他常驻东京的这些年的电影放映师诺曼·汤普森回忆，将军观看新闻影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奇观。如果播放的是海陆军的比赛，他会声嘶力竭地为“黑骑士队”欢呼，即便他几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最终比分。约瑟夫·斯大林出现在屏幕上时，他会起身坐到摇椅的边缘，全神贯注地盯着斯大林的每一个手势。自然灾害的场景往往会引发他喃喃自语地念叨起智胜自然环境的战略，如何切断后路，把自然困境一一击垮。

他喜欢轻喜剧、音乐剧和西部片，其实还有所有的动作电影，尤其是当阿瑟坐下来和他一起看时。每个星期日，当没有电影可看时，他都会伸展着四肢躺在“大房子”里一间小图书馆的长沙发椅上，嘴里抽着如倾斜的潜望镜一样的烟斗。他这一生曾经最喜欢读书，尤其是在上床睡觉之前。如今他却更喜欢和琼说说话，听听留声机唱片。宾·克罗斯比是他最喜欢的抒情歌手。一天晚上，她放上了克罗斯比最新的热歌唱片《此时此刻》，问他能否听出这是什么歌曲。“我当然能听出来了。”他说，“这是一首古老的毛利歌曲。”他会哼着歌走上楼梯，向罗斯福一样，脑袋一沾上枕头就能立刻睡着。他曾经告诉一位朋友，这就是他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三个原因之一。另外两个原因分别是“节制”（他驻日期间除了参与某些场合之外从不会多喝一杯酒），以及他的“午睡”。

一位记者询问卡纳达医生，将军是不是一个好的病人。“我不知道。”医生回答，“他从不生病。”马丁·萨默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写道，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科利尔》杂志的乔治·克里尔写道：“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17年，那时的他还是个年轻的少校，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能量、能力和野心。31年之后在东京再次见到他，我惊讶地发现时间似乎并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身形依旧笔直，眼神也同样闪亮，五官如鹰一般。这证明他的私人医生……告诉我的话是真的……就连一些比他年轻的参谋部成员的耐力都比不上他。”他的外表实在是太年轻，以至于有人传言说他抹了腮红。他本人也打趣地对西博尔德说：“比尔，我感觉就像是一辆一匹马拉着的两轮轻便马车。我是1909届以前的陆军学院毕业生中唯一一个还在服役的人。”

一位受命为他创作肖像画的艺术家向一位熟人吐露：“当然了，麦克阿瑟永远不知道该把自己的手放在哪里。我根本就无法描绘它们，因为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移动。这也是他为什么总是背着手站着或设法把它们藏起来的原因。”这份不得安宁的能量反而加重了他心中的烦闷，因为他在离开家以后总是克制自己享受一切快乐，在日本获得成功的一年之后继续推动新一年的进步。依旧机警、清心寡欲的将军逐渐从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变成了他所创造的改革成果的守护者。和他那件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的临近而变得越来越脏的军用防水短上衣，以及他那顶著名的浸透着油污的帽子一样（他最终不情愿地允许赫夫用一件旧军装上的一部分重新给帽子封了个顶），将军已经变成了日本的制度。显然，日本人希望他能够留下；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也想要留下来。按照他的指示，15辆卡车里被塞满了文件，就为了供他创作自己的回忆录。可他从未打开过这些文件。雷明顿·兰德向他发出了邀请，“如果他何时”退休了，可以担任他们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随口答应了这个提议，他表示，这个问题的“如果”和“何时”都是一个大问题。东方学者们开始相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注定要在东京终老，在一群被他征服的日本人中间死去。似乎只有两种力量能够改变未来。第一种可能性看上去比较渺茫，即在亚洲挑起新的战争。第二种便是他心头从未泯灭过的成为美国总统的野心。

1946年夏，乔治·肯尼大声地预言道，在纽约为凯旋的美国将军们举办的盛大归国游行上，光是这座城市即将倾倒在麦克阿瑟身上的彩色纸条的数量估计就要以吨来计算。将军笑着摇了摇头。他说他不打算返回曼哈顿。他告诉肯尼：“等我告老还乡时，我打算在密尔沃基安顿下来，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找个家具商店停下来，买下店里最大的红色摇椅。我要把它放在门廊上，旁边再放上一大堆大石头，然后坐在椅子上摇晃。”肯尼问道：“那些大石头是做什么用的？”将军的笑容更灿烂了。他回答：“用来丢

那些来找我探讨政治的人啊。”

他这话未免有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推测哈里·杜鲁门会在1948年的选举中败北，而共和党的候选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将会成为总统。1944年时，他还一直故作镇静。如今他却把羞怯放在了一边。身穿军装、距离白宫5 000英里远的他当时还无法公开竞选，但早在1947年秋，他便告诉从美国来的客人们，他正聚精会神地期待即将到来的竞选。10月6日，福里斯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艾森豪威尔已经从东京启程回国，准备告诉总统他必须“面对麦克阿瑟将于春天返回美国、为自己开展造势运动的前景”，而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则从第一大楼发来消息，“警告总统，艾森豪威尔将成为总统候选人”！

第二个月，一位名叫约瑟夫·乔特的洛杉矶律师给将军写来了一封信，催促他参选。麦克阿瑟并没有拒绝。他回复道：“需求并不在于将更强大的力量集中在国家的手中，而在于按照宪法训令将更多的力量留给人民——多些领导，少些操控。”乔特认为这听起来像是共和党的参选口号。事实的确如此。在支持麦克阿瑟参选的16州代表会议上，他宣读了这封回信。与会人士都投票赞成把将军的名字列入4月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候选人初选会提名名单。《纽约时报》评论道：“他的候选资格无疑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广泛的支持。”麦考密克上校仍在为将军把日本社会化的做法感到惊骇，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却盛赞他是位世界政治家：“我们必须选派麦克阿瑟将军参选总统……超越任何对手和任何党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是如今的风云人物。”

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并不是候选人，也拒绝参选……没能更加积极地拒绝介入其中是我的重大错误。”事实上，他的确是候选人之一，而且十分迫切地想要介入其中。用悉尼·L. 迈耶的话来说：“一位无人可以匹敌的军事战略家，一位身材高大的现代化改革者，麦克阿瑟如今在寻求确立自己作为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如此荒唐的事情即将导致一场灾难。”通往灾难的道路开始于1948年2月。局势变得明朗起来，共和党候选人将在10个或12个州中间决出，大部分都在中西部地区，而将军所在的州势力最为强大。此时此刻，如果他打算行动起来的话，现在就必须动手了。3月9日，他按响了蜂鸣器，传呼惠特尼进来，递给他一份用铅笔草草写就在一个黄色拍纸簿上的声明：“我得知许多我的威斯康星同胞都在麦迪逊为请愿书签了字，推选我代表这一选区参与4月6日的候选人初选会。面对这番公共运动，没有人不会被深深地打动。恕我谦逊地说上一句，如果我因为某些障碍以及接受美国人民有可能赋予我的公务所带来的责任而退缩的话，将是对我所有的好公民理念的背叛。”

东京的报纸刊登了一整版的号外，而日本店主们也在自家的橱窗上挂上了“我们日本人希望麦克阿瑟担任总统”的标语，还有一些日本人则在西服

的翻领上别上了麦克阿瑟的徽章。“日本社论作者们对此事的意见也许准确反映了大部分读者的心声。”《纽约客》杂志评论道：“为麦克阿瑟宣言中交杂着赞许与悔恨而欢呼。”不出所料，东京的《每日新闻》宣布：“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能够当选总统，我们当然会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拥有一位完全理解我们的美国总统。这一好处将能抵消我们失去一位伟大将军的损失。”日本首屈一指的经济报纸《日本经济新闻》预测，如果麦克阿瑟离开日本，将会在日本人民中引发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但随后又表示对他“信心满满”，还代替人民对他所做的一切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评价“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对日本人民的感情也许和他对自己同胞的感情没有什么区别”。鉴于将军“不是日本人所应垄断的一个个体，而是在全世界都拥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该报在结论中呼吁自己的读者应该乐于和美国人民一起分享他。《东京民报》报道，“塔夫脱和范登堡正迅速淡出人们的视野”，而第一大楼方面也表示“8 000万日本人民没有投票的权利实在是一桩憾事”。

但塔夫脱和范登堡（以及托马斯·E. 杜威）并没有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且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确定自己希望麦克阿瑟总统入主宾州大道1600号。“毫无疑问，”《时代周刊》指出，“第一个星期里，喝倒彩的声音比支持他的声音更加有力。”一项共和党民意调查显示，杜威在共和党人中的实力是麦克阿瑟的三倍。而史塔生、塔夫脱和范登堡的支持率也优于将军。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Z·福斯特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发起的进攻帮了不少的忙。另一方面，赫斯特的认同却毁掉了他的机会。《洛杉矶检查报》居心叵测地预言“麦克阿瑟归国时会在圣西米恩涉水上岸”。而霍华德报系的《匹兹堡新闻报》评论道：“看样子麦克阿瑟将军似乎陷入了陷阱……竞选中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情……但不会有人遇到比成为‘赫斯特的候选人’还极端的障碍。麦克阿瑟的第一任妻子（如今已经嫁了第四任丈夫）告诉记者：‘如果他是一匹黑马，他一定是在最后一群里。’”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论道：“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伊州的人气正在上涨。”不过阿瑟·克罗克越来越感觉到（就连他的一部分支持者也这么认为），如果将军真的想要成为一位活跃的候选人，就应该辞去自己的职位，返回美国。由于五角大楼方面禁止现役军官参与政治，将军的处境也变得越发棘手，而他对待记者们的方式更是为他雪上加霜。美国12座大城市均出现了反对麦克阿瑟的退伍军人社团。这一新闻让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许《星条旗报》或东京的武装军队广播提起此事，解释这一话题“具有争议性”。华盛顿方面也听说了此事，严厉斥责了他。他这才尴尬地撤销了禁令。

颇为讽刺的是，许多过去的孤立主义运动成员（他的天然拥护者、保守派人士）因为他代表美国跻身国际舞台而唾弃他。作为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主

席，他的老朋友，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罗伯特·E. 伍德在这里本可以帮上他的忙，但伍德害怕损害将军与稳健、自由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着沉默。不过，这位主席倒是从威斯康星州的朋友那里为他征求到了一些支持。这是一次关键的初选，而威斯康星又正是麦克阿瑟的家乡。针对他最显著的进攻来自参议员约瑟夫·R. 麦卡锡，一位史塔生的支持者。菲利普·拉福莱特占用自己的广播时间在州内为将军拉票，而默默无闻的麦卡锡却开始展示出自己作为一名贫民斗士的独特天赋。他指责麦克阿瑟捏造不实之罪、迫使比利·米切尔锒铛入狱，还挖出了他离婚的往事，到处暗示别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指控他是斯大林的候选人。

《纽约时报》于3月29日发表预测文章，标题为“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胜券在握”。他们错了。将军只赢得了8票，而史塔生却赢得了19票。第二天早上，当西博尔德赶到第一大楼的6层参加会议时，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当时的参谋长保罗·J. 米勒警示地举起了一只手。“将军的情绪十分低落，非常失望。”米勒说。但将军并没有退出。两天之后，他致电内布拉斯加州麦克阿瑟总统竞选机构的主席，说自己肯定还要继续参选。他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初选中获得了第五名，但事情到此为止了——他要求撤掉自己的名字。参议员肯尼斯·惠里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希望他能够于5月回国，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面前做证，论证自己能够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从而提高自己的人气。麦克阿瑟拒绝了，说此举有失身份。他是对的。

也许他做不成一位好总统。他的内向、自负和对“次优科学”的蔑视会削弱他的管理。除此之外，他对下属的选择（军官们3月份就纷纷争论起谁将获得哪一个内阁职位）也不太可靠。然而，他不值得共和党人在6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如此故意和无礼地对待他。从赫斯特的报纸上剪下来的上百万篇支持他的报道片段被寄往了费城代表们的手中。《费城问询报》找来了一批报童，以每人5美元的薪酬雇用他们在为麦克阿瑟举行的示威游行过程中分发支持麦克阿瑟参选的传单。因为曾经的牢狱之灾而仍旧身体孱弱的乔纳森·温赖特则在酒店房间内等待发表提名演讲。大会负责人将演讲和游行延迟至凌晨3点40分。那时候，所有的报童都回家了，而温赖特面对的只有空无一人的礼堂。麦克阿瑟在第一次投票表决中获得了11票，第二次7票。在第三次投票表决过程中，代表们一致选择了杜威。第二天，惠特尼告诉一位朋友，自己“从没有见到将军看上去如此失望过”。我们很难分清到底哪一点更让他心痛，是他糟糕的表现还是温赖特受到的屈辱。

麦克阿瑟的马尼拉门徒曼努埃尔·罗哈斯则要幸运得多。在竞选中险胜奥斯梅尼亚之后，罗哈斯成为菲律宾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并且不出所料地赦免了他那些遭受战时叛国罪指控的同僚们。内外勾结成了竞选的主要问

题。奥斯梅尼亚曾要求共和国国会建立人民法庭，并审判嫌犯，但罗哈斯辩称重新逮捕1945年被释放的人将使他们陷入双重危机。通过在议会中实施一系列精明的策略，他迫使奥斯梅尼亚准予保释，确保自己仍旧掌控着立法机构中的大部分权力，直到他坐上总统之位，统一赦免这些人。

麦克阿瑟在罗哈斯竞选期间几次助人为乐，允许他利用他们之间的友谊，默许他与菲律宾国民党分裂，拒绝把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司法人员和反情报文件借给通敌叛国者的检察官。哈罗德·伊克斯还威胁奥斯梅尼亚，如果不为那些有罪之人定罪、判刑，便停发提供给受灾岛屿的救济金。奥斯梅尼亚此举让群岛人民感到十分反感。许多人认为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美国人的傀儡。其他人则认为他被虎克党人愚弄了，虎克党如今正扬言要报复菲律宾既有社会体制，除非新政府引入彻底的改革计划。担心未来再遭杀戮的菲律宾中产阶级人士忍住了对这些战时叛贼的厌恶之情，团结一致地支持承诺实施法律与秩序、尊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罗哈斯。

选票刚刚统计完毕，新总统罗哈斯便决定飞往美国。他要求保罗·麦克纳特和他同机返回菲律宾，再次出任最高专员。飞机到达厚木机场加油时，麦克阿瑟前去迎接了他们。将军告诉媒体："罗哈斯不是通敌叛国之人。我私下里与他相识已有25年。他的观点从始至终一直都是反日的。最近推选罗哈斯为总统的选举反映菲律宾人民对某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在国外针对叛国罪名所持的不负责任的指控是拒绝的。"关于伊克斯就谈这么多。不久，麦克纳特告诉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罗哈斯在战争年间一直听命于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已经为他的军事履历做了担保。"《纽约时报》把此举称为"麦克阿瑟将军和已经过世的奎松总统给罗哈斯出具的'完美健康证明书'"。

奥斯梅尼亚的虔诚信徒戴维·伯恩斯坦怨恨地写道："洗白成功了……法国人处决了赖伐尔，而菲律宾人却选举罗哈斯做了总统。"这样的类比是不准确也不公平的，但伯恩斯坦拥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去争论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了菲律宾政治的未来走势"。1946年7月4日早晨，伴随着警笛声和教堂钟声在马尼拉上空响起，美国国旗最后一次在杜威大道上降了下来。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国内政策已经由将军认可的领袖决定。那一天，他是众人的偶像，但为他欢呼的人群若是知道未来即将发生什么，可能就不会这么热情了。在为新总统担保的同时，他也赦免了整个上流社会政治家中的寡头阶级；罗哈斯于两年后过世时，继任者埃尔皮迪奥·基里诺也是一位寡头，而国民党的新任领袖则是战时日本傀儡政府的何塞·劳雷尔。实际上，麦克阿瑟之所以支持马尼拉的精英阶级（在麦克纳特和杜鲁门的完全认可下），就是为了制衡菲律宾的马克思主义者。此举的结果与他在日本的光辉履历截然相反。

虎克党人发起的七年起义最终在美军的帮助下被镇压了下去。他们一度到

达了马尼拉的郊外，政府官员从首都前往克拉克机场都需要武装护卫队。据由华盛顿银行家丹尼尔·W. 贝尔率领的美国传教团汇报，反抗军仍旧怨声不断，指责罗哈斯–基里诺政府的渎职、缺乏规划和无能是在浪费资源。贝尔发现菲律宾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经济状况似乎更好一些，然而“在普罗大众的生活水明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同时，商人的利益和大地主的收入就已经大幅提高”。

除非考虑到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背景，否则美国支持这些压迫者的行为实在是没有意义。马尼拉独立日当天，麦克阿瑟拍着罗慕洛的后背说道：“卡洛斯，美国今天在这里埋葬了帝国主义！”其实美国在这一点上什么也没做。就在星条旗从菲律宾的旗杆上滑落的同时，美国正着手实施新一波的扩张主义；据马尼拉和华盛顿方面的协议规定，菲律宾将向美国提供99年的群岛军事基地租用权，作为牵制或包围共产主义的全球新计划中的一部分。五角大楼方面之所以希望麦克阿瑟能够与他们合作，是为了塑造这一链条上的亚洲环节。当然，他是不需要别人来劝说他的，他对强大的苏联的厌恶之情并不亚于对杜鲁门的反感（相比之下，他更讨厌杜鲁门）。日后，将军和总统还会就政策应该在第一大楼还是白宫内制定以及台湾机场的价值问题上各执一词，但两人的目标是如出一辙的。

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间，麦克阿瑟仍旧是从19世纪的角度来看待苏联，认为对于苏联人更具启发意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而是假借让工人阶级团结一致为幌子的斯拉夫帝国主义。他喜欢谈论“俄国人喜欢鼓起肌肉，贪图权力”或“帝国主义者—蒙古人种—泛斯拉夫主义威胁”。他告诉苏兹贝格，苏联人在参与抗日战争的几天内便解决了难倒沙皇一个世纪的难题：完全控制朝鲜的大部分地区。他据此推论：“我认为，对于苏联人此刻会发起侵略战争的推测是愚蠢的。它在无须耗费一颗子弹的战争中过得很好，因而按理来说可能会希望延续目前成功的系统。”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指出，尽管斯大林在远东拥有75万兵力，其军队却只有一条铁路补给线，且没有两栖作战的能力，在贝加尔湖移动也缺乏基地。他声辩：“苏联是个有耐心的国度。它是以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为单位来思考问题的。它不属于西方，而是属于东方。它是白色的，国土一部分位于欧洲；苏联人拥有我们的社交本能，可在内心深处却有着鞑靼人的性格，像成吉思汗一样。东方人的特质就是有耐心。”

和其他大部分西方战略家一样，将军之所以会判断失误主要是因为他没有预测到附属国战争。如果战争是由替代人（朝鲜人、中国人和越南人）来打响的，那么苏联的军事后勤就无关痛痒。在其他方面，麦克阿瑟理解共产主义者，并能用他们理解的语言与他们沟通。东京是冷战中的飓风眼，而杰烈维扬科或其他苏联领导人会不时地指责最高统帅的“反民主措施”预示着“日本的老法西斯主义秩序会卷土重来”。这正是这位恺撒式人物的盘

中肉。他把这些非难之词称为“老掉牙的指控”，“被掸掉尘土用作了障眼法”；“一派胡言”代表的是“我不能不谴责的对伪善的麻木不仁”以及对“群众监督的探照灯”的蛮横回避。苏联方面来的一封对他颇有微词的信在寄往第一大楼之前被泄露给了媒体。将军声称此举属于“挑衅的无礼举动”。针对另一封信，他给出了这样的回应：“我已收到你的来信，仔细斟酌了其中的内容并徒劳地搜寻着其价值和可信性。我真的很少读到这样掺杂着对事实的误述、误传和搪塞的文本。”他对信中内容的“露骨”“丑恶”“极端”“蓄意”和“过分”扭曲感到震惊，还用颓废的比喻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在大家的印象中，双方都很享受这样的交流过程。它们释放出了强大的电流，刺激着参与者，却又伤害不到任何人。

当然，这些书信的内容大部分都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政策无关，而最高统帅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在和部下以及访客们谈起日本的共产主义话题时，他是实事求是的，甚至有些轻描淡写。他知道斯大林曾经说过：“对抗日本，我们是所向无敌的。”他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却不曾考虑到苏联人有可能可以达成克里姆林宫方面这个不可能的梦想。他是这样告诉苏兹贝格的：“我不认为（日本）民众中有1%或是2%的人能被称为共产主义者。”他还告诉英国记者G. 沃德·普赖斯，他不知道这些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方面到底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认为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苏联人心存恐惧和憎恨。所有来自苏联的事物都会遭到嫌恶。共产主义来源于哪里的事实使得它不可能被引入日本。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日本共产主义者会引起任何的内乱，不过必须意识到的是，外部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这就是困难所在。日本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它的民众必然会与别处（尤其是远东地区）发生的事件相互影响。一旦它的国力开始恢复，一旦饥饿者得以果腹、无家可归者有屋可住，千变万化的海外地缘政治万花筒就会变成它的首相、内阁、国会和最高统帅每天都要估算的一个因素。麦克阿瑟优先考虑的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他全神贯注地想要消除日本的侵略能力。等到他完成了国家的重建，他权衡了一下日本在国际大家庭中的角色，特别是在“自由世界”这一支系中的地位。如今他已经不再那么担心保护日本的邻国不受日本侵犯了，而是要防止它受到别国侵犯。和菲律宾相比，日本更是一个无价的军事基地。如果麦克阿瑟连这一点都看不到，就算不上是一位出色的将军。

但他还看到了另一点。在菲律宾，引导他的一直都是传统势力的影响——菲律宾人、他的父亲、他自己以及为99年租借铺平道路的战前协议。如果说日本是一张白纸，那么他在第一大楼里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将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有一点是根本性的：日本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东京方面必须获准以平等的身份与华盛顿方面进行协商。这里的困难在于日本面对敌军进

攻时的脆弱性。到了1947年，实施尚不满一年的麦克阿瑟宪法中不发动战争的条款显然就已经过时了。此时此刻，麦克阿瑟预料到，若想应付颠覆活动和公众骚乱，就需要一支国家安全力量——即陆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最初的兵力为7.5万人，尔后会增长到10万人，其军官则是从过去的皇军老兵中招募而来的。但这支军队的力量实在是过于薄弱，难以抵挡亚洲大陆的全方位入侵。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美国军队、舰船和战机的支持。

五角大楼方面接受这一责任，以一支占领军就能保卫日本国防为由反对在初期签订日美和平协议。麦克阿瑟认为这一决定实属荒谬。西博尔德写道，他相信“美军可以通过和日本政府达成自愿协议而留在日本”。联席参谋长们没有让步，所以将军只好诉诸一个危险的策略——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操纵媒体。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曾两次拒绝受邀前往东京记者俱乐部参加午餐会。1947年3月17日中午，他不请自来，找了张椅子坐下，说他准备发表一段郑重声明。面对出其不意的状况，有些记者甚至没有携带纸张和铅笔。在其他人慌慌张张地摸索着纸笔时，麦克阿瑟提出自己把占领军的任务分为了三个阶段：遣散日军、政治改革和经济复苏。第一项任务已经完成，第二项也正渐近尾声。至于第三项，他宣布，继续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干预只会带来“经济上的压制”。紧接着，他说出了问题的核心：“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当有人问道何时商定条约时，他回答：“我认为越快越好。”事后，威廉·科斯特洛在《新共和》杂志上写道：“听到有人问及他最喜欢的歌名，麦克阿瑟由衷地笑了起来，毫不犹豫地说道：‘你可以说我最喜欢的歌是《家，甜蜜的家》。’”

西博尔德回忆：“将军在评论和平协议时，表达极为清晰、有备而来……令人震惊……我怀疑，直到那时，还从没有哪个记者在试图了解飞速发展的占领军最新进展时，花时间钻研过和平协议的事宜。不过，麦克阿瑟的暗示成功了，将这一话题牢牢地植入了此后铺天盖地的有关和平的推测性报道中。我毫不怀疑这正是他的主要目的。”面对华盛顿媒体寻求评论的呼声，杜鲁门政府无法视而不见，尽管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西博尔德记得：“和平协议的初稿是建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是对亚洲最大的威胁这一当时最盛行的概念基础之上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必须无限期地受到同盟国的控制……总之，这是一个可能延续‘二战’后不满情绪的苛刻方法。在我看来，这一草案是不切实际的，反倒会弄巧成拙，让和平路径变成报复性行为。这是《凡尔赛和约》的重现，表明我们在过去27年的经验中没有学到些什么。当然，草案并没有向民众公布，却清晰地展现了当时在华盛顿以及大多数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首都中盛行的一种心理。”

联席参谋长们投票决定继续对日本实施无限期占领。就麦克阿瑟本人来说，他倒是很乐意放任自己的提议在国际舆论的大杂烩中发酵。不过他并没有改变心意。在杜鲁门出乎意料地战胜杜威之后，将军开始与一些和他在国际政治上有着相同观点的政治人物通信。其中有些人赫赫有名——例如同样支持尽快与日本和谈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其他人名气则不那么大。在与曾经于威斯康星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支持过他的右翼共和党人通信时，他就直率得格外令人担忧。比方说，他曾经提出过“国务院里到底有多少个希斯”这样的问题，还为美国缺乏健全的外交政策而感到惋惜。威廉·诺兰和新泽西州参议员H. 亚历山大·史密斯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信中得知，将军认为台湾对美国国防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引发沃尔特·李普曼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军人）没有权利利用媒体和政治家作为口舌来引发、煽动公众挑战和诋毁他们政府的政策。”（“难道一位将军就不能和参议员说话了吗？即便是在私下里？”共和党《星期六晚邮报》的社论通过标题问道。）更加不祥的是，麦克阿瑟还和如今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乔·马丁保持着联系。这些往来书信对最高统帅来说就更不幸了。马丁曾在战前领导过反对通过立法在关岛和威克岛上修筑防御工事的提案（他表示，武装这两个岛屿可能会激怒日军），而且他还投票反对过为美国人提供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给日本人的那些计划，包括进行劳资谈判和享受公共住房的权利，以及为老年人医疗补助提供社保基础。但马丁不信任杜鲁门政府，光是这一点对麦克阿瑟来说显然就已经足够了。事后，他也将成为将军的一大祸根。

鉴于日本人已经不再是他的敌人，将军在华盛顿方面寻找敌手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增长。有些人是他的老对手，例如坚忍的乔治·马歇尔；有些人，例如风度翩翩的艾奇逊，则是他的新对手。大部分时间里，平淡无奇的艾森豪威尔的名字总是位列他之前。随着艾森豪威尔的名望在大洋彼岸与日俱增，身处第一大楼里的他逐渐处于弱势。后来，最高统帅曾公正地写道：“我总是十分同情他，类似于年长的哥哥疼爱自己弟弟的那种感情。”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该隐与亚伯。如果说任何超越麦克阿瑟的人都糟糕透顶的话，那么超越者竟是麦克阿瑟曾经的部下这个事实就更是令人无法忍受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认为退伍分数制十分荒谬（他觉得士兵们应该跟随自己的部队回国），并把这一点怪罪到了艾森豪威尔身上。作为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曾经到访过日本，在第一大楼受到的接待是不温不火。麦克阿瑟在事后提到他时表示：“他走出来告诉士兵们，他会把他们送回家中的母亲身边。他们给了他三声欢呼和一声高呼。‘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军队就这样被摧毁了。”

在兵力减少、士气低落的情况下，将军不知道自己若是遭遇紧逼，还能否把入侵者扔回大海。更糟糕的是，他还得训练一个又一个参谋长。在萨瑟兰因“健康”原因归国之后，他换了不下5任参谋长。将军越发地倚赖惠特

尼。当时，第一大楼里所有的人似乎都认为惠特尼给将军带来的影响十分糟糕，其中麦克纳特和迪克·马歇尔开口把这个问题告诉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给两人的回复如出一辙："我知道。不用你们告诉我，我也知道他是个兔崽子。但是，上帝啊，他是我的兔崽子。"这话既尖刻又不足为信。他当然可以找到一个同样效忠于他的更好的军官。惠特尼只不过会鼓励他与诺兰和马丁通信，还会悄悄给他讲述有关华盛顿其他和希斯一样的叛徒的流言、为罗哈斯说好话、称虎克党人为共产党人而已。最重要的是，他还会为将军对华盛顿官员（尤其是艾奇逊和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的敌意添油加醋。

约翰逊是杜鲁门的门徒，一个笨手笨脚、装模作样、具有民主党特点的乔·马丁。艾奇逊认为他染上了"某种大脑疾病"。1949年，约翰逊成了美日协议的最大障碍。他和奥马尔·N. 布莱德雷飞往东京，声辩这样的一个协议将会是"不成熟的"。和麦克阿瑟抱持着同样观点的艾奇逊心满意足地评论道："这位圣贤给自己的军队同僚们带来了小小的安慰。"将军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忽略拖后腿的同盟们，和日本签订契约，支持它申请加入联合国。他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日本人已经诚心诚意地履行了投降协议规定的义务，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有权重建和平。"资本主义强国应该保证日本的国界不受损失，并尊重它回避战争的权利。他继续说道，做不到这一点将是"对现代文明的无耻玷污"。美国"不该……不敢不屈不挠地前进……我们应该着手立即召开一次和平会议。"性格使然，他告诉西博尔德，他"不会拒绝受邀担任会议的主席"。

尽管约翰逊和布莱德雷不服气，20世纪40年代末，华盛顿的舆论观点正朝着他们的对立面发展。那时，麦克阿瑟正沉浸在协议中（他告诉J. P. 麦克沃伊，人们对此已经"期待了很长、很长时间"），满心幻想着未来的人们会对他作何评价："一千年以后的历史学家们也许只会用一行字来形容最后一场战争，那就是：'于是整个世界就被战火席卷了。'但我相信，史书上将会有一页，也许是一个章节，介绍自由与民主是如何被美国带到远东的——我们国家最伟大，也许也是最崇高的一项成就。"他对自己作为总督的成就引以为豪，对那些双眼仍旧关注着欧洲、无法与他分享骄傲的人嗤之以鼻。然而，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职业身份。他也许是一位殖民地总督，但无疑是一位军官。这也是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在美国针对亚洲大陆纷乱发展的辩论中有资格发言的原因。诚然，他对和日本迅速达成和解的最有效论证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处心积虑地迎合美国的私利。他劝告华盛顿方面，美国需要在远东寻找一个亲美的强国，因为它即将失去自己的老同盟中国。

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中国的瓦解就像是罗马的衰亡（或是大英帝国的衰

落），并不是一天、一个月或甚至一年所造成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力量缓慢地分崩离析，一个村一个村，一个省一个省，正如转移中的恶性肿瘤无论如何缓解都无法避免最终的结果一样。每一个中国通都会带着同样的诊断结果走开。这是一个拖延的晚期病例。然而，依照亚洲人衡量时间的标准来看，结局来得十分突然。1949年4月4日，就在北约同盟在艾奇逊赞许的眼神下于新国务院大楼中签署成立之际，朱德率领共产党领导的百万雄师聚集在了长江北岸，虎视眈眈地面对着仍旧忠于蒋介石的南方前哨部队。4月24日，朱德麾下的精兵横渡长江，却只遭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蒋介石抽调30万最可靠的士兵，在上海周边形成了一支拱卫部队。5月第一周，朱德重创上海大门，蒋介石逃往台湾，还带上了尽可能多的国民党人。如今大陆对他来说已然失守。一些顽固分子留了下来：6月26日，国民党炮艇开始封锁大陆港口；9月21日，毛泽东宣布中国成为主权国家；12月8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成立新政府。在中国如今有了两个对立的政权。孙中山的民主中国50年愿景衰亡了，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蒋介石能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东方关键阵地的期待也随之付诸东流。

美国民众的反应很迟缓。自从1931年9月起，中国的军队就在两面旗帜下战斗。而美国报纸自从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开始也在定期报道毛泽东的进攻战。但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导致非机械化的军队运动行动迟缓，且中国的地理对美国的一般读者来说又十分陌生，所以他们很快就对这些遥远的战役失去了兴趣。他们辩称，如果那里的战斗进展十分重要，政府会告诉他们的。事实的确如此，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艾奇逊决定将整个故事都展现在民众的眼前。1949年8月5日，国会发表了一份1 054页的白皮书，宣布中止对国民党的支援，阐明了导致这一悲剧结果的一连串事件。三位美国将军（史迪威、帕特里克·J. 赫尔利和乔治·马歇尔）曾徒劳地劝说蒋介石削弱国民党军阀的力量、消灭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和失败主义思想。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来，美国已向蒋介石提供了20亿美元——和日本收到的救济金相差无几。实际上，这些资金全都被白白地浪费掉了。供给国民党的武器75%都被毛泽东截获。在白皮书的引言中，艾奇逊坦言蒋介石的政权是无能的、腐败的、对人民的需求不够敏感。他补充道：“令人遗憾却又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结果已经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掌控。我们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所做的或者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一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们也曾经试图施加影响，却无能为力。”

在那些见多识广的人看来，这样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可美国民众却困惑不已。有关国民党不称职的论调是一种转变，它所知道的中国（赛珍珠的《大地》中那些欢欣鼓舞的农民）是可靠的、热情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亲美的。在整个“二战”期间，同盟国四大人物一直都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斯大林日后的“变节”尽管可悲，却在意料之中。而蒋介

石军队的瓦解却令人震惊。艾奇逊的遏制战略似乎瞬间崩溃。他自己的白皮书都承认毛泽东的政权也许可以“协助苏俄帝国主义”。美国外交官在欧洲的一切成就（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似乎都暂时被亚洲的灾难冲淡了。

遭受严重挫折的国家都会寻找替罪羔羊。“我们被出卖了！”1870年、1914年、1940年，落后的法国人这样喊道。处于世纪中叶的美国人面对此番冲动也不能免俗。诚然，他们对这种情绪尤其敏感，因为他们认为赢得一场伟大的战争就意味着能够拥有平静的未来。不久，斯大林狼吞虎咽地抓住了上百万移民到美国的人的故土——东欧。紧接着，共产党的谍网被人揭露。如今，中国又离开了他们的阵营。从此，亚洲大陆上翻天覆地的大事成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热门的美国政治议题。保守共和党人的怒气放大了这一议题的影响力，曾经在1944年和1948年初选中支持麦克阿瑟的人如今成了将军随时了解华盛顿政治走向的渠道。

艾奇逊称他们为“原始人”。的确，他们的行为十分粗野（其实是恬不知耻），而将军的妄想症则为他们提供了养分。不过他们的沮丧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罗斯福曾一次又一次地在竞选中彻底击败他们。而被他们戏称为政治病秧子的杜鲁门又用只能被形容为不幸的1948年战术提出公平施政，使得罗斯福新政雪上加霜。后来，当杜鲁门的美国形象成熟起来时，他的连任竞选被视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民间故事。直到20世纪70年代，就连尼克松和福特这样的共和党领袖也公开对此表示欣赏。可此举在当时却并不是那么绝妙。杜鲁门曾经说过，“共和党人”试图“用贪婪的钉子把美国消费者钉在墙上”。他还曾称他们为“贪图特权的人”，形容杜威是“法西斯主义者”，还把他拿来和希特勒做比较，指责杜威的政党“把干草叉插进了农民的后背”。在11月的大选中落败之后，心怀不满的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决心利用随手找到的任何武器来抨击杜鲁门的政府。而亚洲局势的发展正中他们下怀。越来越多的人从国会山的共和党领袖口中得知，政府是故意“失去”中国的——蒋介石的落败应该被归咎于华盛顿方面的叛徒们巧妙地与海外共产党人合作、帮助毛泽东。这全都是阴谋和表达不满的陈词滥调，且全都是从阿尔杰·希斯陪同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开始的。罗伯特·A. 塔夫脱曾说过：“在我国历史上，苏联政府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国务院中抓住一切机会宣传中国共产主义道路的亲共团体。”塔夫脱是位绅士。威廉·E. 詹纳称乔治·马歇尔是“叛徒的掩护者”和一个“活生生的谎言”，指责他“加入了叛徒和共产主义和事佬们的罪恶群体之中，在杜鲁门先生和艾奇逊先生的长期影响下出卖美国的利益”。乔·马丁宣称艾奇逊是推动毛泽东接管中国的“和事佬”，并补充提到自己认为杜鲁门援助新兴国家的计划正是摧毁蒋介石的阴谋的延续。乔·麦卡锡谴责政府是“讨人厌的假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可怜的号叫声”会让“那些说服中国采用无神论奴隶制的共产主义者和怪人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些话日后听起来都不错，但在

当时却是强力的政治毒药。民意测验显示，只有29%的美国人不认同麦卡锡的观点。就连当时任民主党国会议员的约翰·F. 肯尼迪在阅读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来信后，也批评国务院听信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等顾问，并浪费了美国的战时所得。肯尼迪总结道："这是中国的悲惨故事。我们曾经努力维护它的自由。我们的年轻人、外交官和总统挽救下来的一切都被一点点浪费掉了。"

远离这场风暴却又为之神魂颠倒的麦克阿瑟保持着沉默。他相信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成绩是经得起推敲的。1945年2月，他预言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大陆其他地方还有朝鲜都将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他当时提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还仅仅是他从军事角度做出的评价。"密苏里"号投降仪式的过程中，艾伯特·C. 魏德迈将军曾经要他派出7个师的力量加强蒋介石的地位。魏德迈事后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做证："麦克阿瑟拒绝把它们提供给我。"但这对一个即将占领仍旧武装到了牙齿的日本（这需要他集中手头一切兵力）的指挥官来说，不过是正常的审慎之举。那年夏天，美国两党大部分人都很欢迎苏联同盟来到美国大陆。7月25日，后来被艾奇逊称为"最野蛮的一个原始人"的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表示："在上百万个美国家庭中，母亲、父亲和爱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报道苏联意图的新闻……无数美国人的生活都与苏联的决定利害攸关……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国务院中那些规规矩矩的人，服从这些更关心外交细节而非维护美国人利益与生命的人的领导呢？当我们告诉苏联人，我们希望他们贡献一分力量来挑起远东重担时，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是在干预苏联的事务……如果'她'和我们一起拼命，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忘却苏联在远东的贡献；如果'她'保持袖手观望的态度，我们也不会这么容易原谅'她'推卸责任的所作所为。"

麦克阿瑟从没有这么做过。威利发表演讲4个月后，将军告诉阿兰布鲁克勋爵，尽管他对痛失中国北部的事情仍旧是听天由命，但他感觉苏联进一步入侵亚洲的行动将会遭遇顽强抵抗。从那以后，他对大陆愈演愈烈的形势的汇报全都成了严谨的典范——尽管艾奇逊对此嗤之以鼻，这些报告甚至有些神乎其神。不过他也算不上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据一位副官回忆："他的感觉掺杂着失望与沮丧，因为他的权威对日本国外的事态发展缺乏控制……在他无助旁观蒋介石政权一步步被推翻的过程中，懊恼转变成了病态的愤怒。"早在国民党背水一战以前，他就曾预言过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上海的最终结局。1949年，克莱尔·L. 陈纳德直言不讳地告诉那些愿意听从他的人，"美国正输掉太平洋战争"，并预料到"一圈红色势力的基地……正从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西贡"。一段时间以来，麦克阿瑟也在告诉华盛顿方面同样的话。他对指责国民党统治不足为戒的自由主义言论尤为不满。卡尔·L. 兰金访问东京时，将军是这样和他提起蒋介石的："即便他有犄角、有尾巴，只要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我们就应该帮助他，而不

是让事情复杂化。国务院应该在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斗争中辅助他——我们可以以后再改造他。”明尼苏达州的周以德日后想起将军曾经告诉过他：“在我们和亚洲的关系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把美国至高无上的利益与亚洲的内部净化问题混为一谈而使自己蒙受损失。”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评论道，这是“对复杂局势一针见血的陈述”。

1948年12月20日，《生活》杂志发表了题为“麦克阿瑟说中国形势危及美国”的头条文章。文章使得认为红色势力攻占大陆不会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联席参谋长们感到十分苦恼，日后还会被引用为将军绕过当局直接诉诸公论的例证。但在这种情况下将军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当年早些时候，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曾经询问过他对毛泽东获胜的看法。他回复道：“低估中国的需求或其重要性全都是骗人的。”两个月之后，参议院委员会要求他回国为远东事务做证。他拒绝了，但第一大楼和国会大厦之间的电报往来却变得更加密切了。只要主动权还在国会手中，且他的回复不偏不倚，他的行为就无可指责。国会议员们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必须对他们的正式要求做出回应。

麦克阿瑟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政策是自取灭亡，对于国民党的战败难辞其咎。他说，一旦蒋介石被征服，日本也许会变成当今的巴丹。话虽荒谬，但他请求援助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他说，让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并非是难以想象的，不过他认为在远东加强美军的姿态是明智的。他要求美国为他提供更多的舰船、大量的飞机以及6个师的步兵，并认为蒋介石应该继续接收自己想要的所有军事装备和技术顾问。1944年时，他曾不认同台湾岛是进攻日本的关键这一观点。然而，如今随着日本的威胁已然消除，战略重点也发生了改变。他推荐华盛顿方面借由表明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来昭告亚洲所有人民：“我们的坚定目标是保卫太平洋。”尽管他拿不准美国是否需要出兵阻止毛泽东跨越台湾海峡，但他认为自己至少需要准备前往那里的交通工具。

这一点极其敏感。共和党领袖想要一份针对台湾的美方保证，以及一份宣称美国永远不承认任何北京政权的政府宣言。第二个要求还能够稍作等待，第一个要求则分外急迫，在五角大楼、雾谷和白宫方面都私下里引起了争论。1949年12月末，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解决这一问题。委员会的思想倾向是主和的。某些与会人士甚至希望，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应该抛弃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所有据点，撤回夏威夷。参谋长们提交了麦克阿瑟的评估鉴定，却得知委员会拒绝了其中的要求，甚至不愿向台湾派遣一支军事代表团。艾奇逊也认为麦克阿瑟的要求应当被驳回，声辩美军兵力不足，无法在对其他地区履行义务的同时保卫台湾。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也加入了他们的阵线：“美国这一次既不想获得特权或优待，也不想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且没有意图利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介入当前的局

势。美国政府不会遵循可能导致自己卷入中国内部矛盾的路线。同样，美国政府也不会向在台湾的势力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

在随后发生的骚动中，麦克阿瑟继续保持着缄默。他私下里告诉自己的部下，他认为美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但至少他目前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公开的争吵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是毁灭性的，而揭露艾奇逊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对的：同盟国于1945年获得伟大胜利之后不出5年，美国的武装部队的实力比对手推测的还要脆弱。“在远东，”罗伯特·D·海纳尔写道，“多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作为总督的英明领导，美国的地位看起来很强大。”在名义上接替艾克尔伯格担任第8军团指挥官的沃尔顿·H. 沃克率领着一个团的特种部队和四个师的军队：第7师、第24师、第25师和第1骑兵师。事实上，他的部队人手不足、疲软无力；据其中一位指挥官威廉·F. 迪安后来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拥有“日本女友、足量啤酒和擦鞋仆人”的日子。总而言之，可供沃克投入战场的士兵只有8万名，手中为数不多的飞机也即将废退，而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海军仅由一艘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组成。这些舰船都不适用，因为没有人想到有人竟会需要它们。麦克阿瑟本人在1949年初夏从韩国撤军之后表示，这个国家“不是运用美军部队的适当地方”，因为“在亚洲大陆驻扎美国地面部队”会牵扯到“固有的危险因素”。“如果把部队留在那里，”他说，“他们有可能会被困住。”

对于军事史学家们来说，充当事后诸葛亮不仅不费力气，还是件极具诱惑力的事情。直布罗陀、葛底斯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意义在得手或失手时便显而易见，而任何朝鲜战争的老兵在面对一张太平洋地图时，眼神都会立即飞快地瞥向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对他来说，国家领袖们在第一枪打响之前没有注意到那里（朝鲜）简直是不可思议，不过，他自己甚至也很有可能在1950年6月最后一周之前对这里闻所未闻。这里变得有报道价值的那一天，《时代周刊》发文写道：“一位达拉斯市民打电话询问当地报纸。总之，朝鲜在哪里？那里的人是印度人还是日本人？那里的时间是几点钟？”上百万人都拥有同样的困惑。诚然，他们很少有人知道这片土地的悲惨历史——这里早在公元前108年便可悲地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

美国领导人早就意识到了半岛存在的问题，可他们和他们的盟友都不太清楚该如何处置它。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四大人物保证要在适当的时候确保它的独立，不论这一天何时到来。雅尔塔会议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提议为该国成立四国理事会。然而，经过综合讨论之后，这件事又被他们放下了。《波茨坦公告》中模糊地承诺“将执行”引领它走上自治的步骤，但联席参谋长们却驳回了苏联方面针对朝鲜境内敌军的联合两栖作战方案，解释称他们需要为即将进军日本的行动集合所有可用的登陆舰。斯大林对日

宣战的第二天，他的步兵便开始在朝鲜北部登陆。“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一周以后，美军也加入了苏联人解除日本武装的队伍。已然占领汉城和仁川的红军退回了三八线以北，留下麦克阿瑟的部下在半岛人口更加稠密的另一半区域里受理日本军队投降事宜。据刘易斯·哈斯金斯回忆：“几位一星将军匆匆赶到五角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分割朝鲜。应该从哪里下手呢？’一位曾有远东服役经历的上校对自己的上司们抗议道：‘你们不能那么做。朝鲜是一个社会经济整体。没有方法可以把它分开。’将军们一意孤行，可上校还是表示此举不可行。他们的答案是：‘我们得把朝鲜一分为二，而且要在今天下午4点之前就做出决定。’”迪安·艾奇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刚刚从中国战区返回五角大楼的年轻军官迪安·腊斯克在三八线沿线找到了一条行政分界线。”

双方都没有长期计划，也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大约是出于意外，苏联和美国指挥官在这条宽约55码的分界线两边摆好了作战的架势——苏联人在分界线以北，美国人在分界线以南。据守北边的共产党在平壤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任命在红军中担任营长的金日成为最高领导人。美国并不承认金日成的政府。三八线以南，李承晚宣布大韩民国的首都为汉城。而苏联人也不承认他的政府。两人都是专制君主，在他们之间的选择并不多。联合国采取了一项决议，呼吁双方在某联合国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普选，但鉴于苏联不允许特派员进入三八线以北，双方持续陷入僵局。这让所有人都很不满意，不过除了朝鲜人以外，大家都觉得这很无聊。和德国相似，半岛似乎注定要在分裂的政治人格中存活下去，对立双方争论不断，有时还会随意交火。西博尔德回忆：“我们认为紧张局势无限期延长以及小范围的游击队行动将成为朝鲜司空见惯之事。”1950年3月，联合国宣布军事观察员将报告边境上的事件。所有人都以为边境将迎接很多位军事观察员，每天通过通讯社或《纽约时报》发表一两段报道。双方将猛烈抨击彼此，并提出过分的要求、增加一倍的边防军兵力。很快，警惕的平静就会回归。流血事件将会少有发生，军队之间也不会发生冲突。半岛永远都不会变成大型的世界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麦克阿瑟的地方指挥官约翰·R·霍奇到达了汉城，并做出了这样不可原谅的评价：“朝鲜人和日本是相同品种的猫。”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和五角大楼方面都没有谴责他。美国人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如果这一态度真的存在的话）几乎是心怀蔑视的，1947年9月25日，艾森豪威尔、莱希、尼米兹和卡尔·斯帕茨向总统报告：“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把当前的军队和基地留在朝鲜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就连把太平洋视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湖泊”的将军也排斥朝鲜。1948年4月，在参谋长们的建议下，杜鲁门宣布这个分裂国家双方的军事行动将不会成为美国宣战的原因。

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于1948年8月15日飞抵汉城，出席李承晚就任大韩民国总统的正式就职仪式。拉里·邦克记得那是一个晴天，最高统帅佩戴着一条用美丽鲜花织成的花环，用显著的愉快语气读着《汉城日报》的社论《欢迎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发表了主要讲话，称这个国家的分裂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他私下里告诉李承晚：“我会像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加利福尼亚一样保卫韩国。”可这只不过是麦克阿瑟在夸大其词。保护这个新国家或任其堕落的决定不是他能够说了算的。除此之外，他即将放弃对半岛的所有职责。1949年新年当天，莫斯科方面宣布所有苏联军队都已撤出朝鲜半岛。2月，将军告诉陆军部部长肯尼斯·罗亚尔，他赞成美国立即从半岛全面撤军。6月，最后一批美军士兵离开了釜山。第一大楼中有关朝韩方面的文件被封存了起来。和他无权干预法兰西共和国的事务一样，麦克阿瑟对大韩民国也无须再负责任。美国国务院，而非五角大楼，将在半岛上行使美国利益的控制权。麦克阿瑟后来在某一参议院委员会前做证时提到：“即使在美军士兵撤离之前，我的职业也只不过是像在家里那样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在战争爆发之前，无论是政策制定、政府管理或是指挥责任，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注

5月，在载有美军士兵的交通工具离他远去时，李承晚表示：“美军士兵是走是留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重要的是美国对韩国安全问题的政策。”然而，杜鲁门政府已经决定由联合国来担心这片被分裂国土的重新统一问题。国务卿艾奇逊的前任乔治·马歇尔（艾奇逊是在1949年年初接任他的职务的）认为，一旦半岛南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处于华盛顿的控制之下，美国就不该再加强李承晚的军队。他真正的担忧在于李承晚会突然袭击半岛北部。当时，和金日成挥师南下相比，这一趋势被认为更有可能发生。因此，汉城的防御部队仅限于8个师、总计6.5万名大韩民国步兵。“由于李承晚一直十分好战，”西博尔德写道，“美国拒绝向他提供坦克、中型或重型火炮，以及军用飞机。”朝鲜拥有不少攻击性武器，但美国方面没有人给予他们过多的关注。1949年10月，李承晚的国防部部长申性模向西博尔德坦言，“大韩民国若想与朝鲜成为实力相当的对手”依旧任重而道远。然而带领一支顾问团队进驻汉城，并总是骄傲地谈起“我的陆军”“我的势力”的美国准将威廉·L. 罗伯茨却扬言那一天如若真的到来，他们可以“控制住共产党人”。西博尔德在提到罗伯茨时说道：“我很难想象比他更能吹嘘韩国军队有多勇猛的支持者了。”

华盛顿方面，申性模和罗伯茨的报告在归档之后都被人遗忘了。美国两党对半岛局势都漠不关心。值得稍稍关注一下的是，议会共和党人反对所有给汉城方面拨款的提案。他们破坏了杜鲁门要求为韩国提供6 000万美元经济援助的计划。1950年1月19日，应他们的要求，众议院以193对192票否决了提供500名美军军官监督韩国部队配备的提案。当天晚上，艾奇逊写信给自己的女儿玛丽：“我们在议院里就朝韩问题遭到了挫败。在我看

来，这似乎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太顺从，也太怠惰。”

没有人对这一法案挑剔国务卿艾奇逊的错误，但他在同一个月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做的即席评论所遭受的谴责却是无可厚非的。他说，美国的防线“从阿留申群岛一直延伸向日本，然后通往琉球群岛（主要是冲绳县）。琉球群岛是我们重要的国防阵地，而我们也将继续坚守下去……防御带从琉球群岛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群岛。”他继续说道：“就美国国防而言（这里他显然考虑到了台湾岛和韩国地区），必须明确的是，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袭击。如果类似的袭击发生……首先可以信赖的人就是遭受袭击的人们。”他模棱两可地总结道，如果最终他们是不屈不挠的战士，就拥有诉诸联合国宪章的权利。直到临终前，艾奇逊仍旧强烈否认此举是在通过将韩国排斥在防御带之外来纵容韩国的进攻行为。然而，当他宣布美国的阻力线位于朝鲜半岛以南之后告诉新闻俱乐部，美国正在等待中国局势“尘埃落定”之时，共产党人只能得出结论（他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美国丢下了李承晚，让他自谋生路。共产党人对此感到十分惊愕。莫斯科方面知道美国人正在未征求斯大林意见的情况下起草一份日本和平协议。自从抗日战争胜利以来，苏联人就一直希望华盛顿方面能够放手让他们自行处理朝鲜半岛事务。在乔治·凯南看来：“当他们发现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时，他们得出了结论：‘如果这就是我们与日本和解所能得到的一切的话，我们最好在美方放任日本人卷土重来之前尽快对朝鲜半岛下手。’”

艾奇逊似乎并没有谎报美国外交政策。事实上，他说的没错。他和总统、国防部部长、联席参谋长们以及国会领导人是同心协力的。1950年5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康纳利详细阐述道，苏联夺取韩国如同探囊取物，而鉴于朝鲜半岛并不是“特别重要”，美国可能不会出面干涉。早在一年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曾提到过同样的主旨。1949年3月1日，他在东京曾告诉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我们针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阵地曾经是以美国大陆西海岸为基础的。太平洋被看作是敌人有可能采取的途径。如今……我们的防线纵贯亚洲大陆边缘的列岛，从菲律宾开始一直延伸到阿留申群岛，包括其主要设防地区冲绳，然后折回并穿过日本岛和阿留申群岛，通往阿拉斯加。”在随后的采访中，将军又对亚利桑那州《每日星报》的G. 沃德·普赖斯和威廉·R. 马修斯说了大致相同的话。和艾奇逊一样，他也忽略了台湾岛和朝鲜半岛。

重要之处在于，和艾奇逊、康纳利所忽略和错过的不同，将军在蒋介石飞往台湾之后并没有做出同样的论断。他明白，被中国的局势唤醒的美国人是不会容忍岛链上另一个岛遭到共产主义入侵而牺牲的。麦卡锡家族、惠里家族、塔夫脱家族和威利家族都赢得了公众的舆论。像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这样的民主党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们直到临终前都认为将更多的

国家或地区让渡给共产主义者相当于政治上的自杀。带着恐惧逃离共和党批评的哈里·杜鲁门在1950年4月25日急不可耐地想要证明阿尔杰·希斯不是典型的民主党人，命令国家安全委员批准了“NSC–68号”政策文件。此外，这一历史性的文件还指明，自此以后，美国20%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将被投入军事设施，且美国将抵制世界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遭受的任何共产主义威胁。

在总统签上“批准”字样之后，“NSC–68号”文件成了机密文件，据迪安·艾奇逊19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就连他也不能引述其中的内容。实际上，这份文件本来就永远不该被保密。如果它在被采纳的当天能被公布，朝鲜战争就很有可能避免。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斯大林和金日成认为攻占韩国已经指日可待。如果极权政府是非不分在道德上是真的无可非议，那么杜鲁门政府及其发言人就铸成了大错。尽管麦克阿瑟不见得有先见之明，但即便和华盛顿之间隔了半个地球，他也能比白宫、五角大楼或国务院更明白地认清自己同胞的心情。遗憾的是，他被排斥在了他们的议会之外。事实上，他第一次模糊地察觉到“NSC–68号”文件的存在是通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一番演讲。作为国务院驻远东的特别代表，杜勒斯在起草日本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抽时间去视察了三八线，并在汉城发表了演说。1950年6月17日（当天深夜，他告诉韩国国民大会，美国人民依旧“忠诚于人类自由事业以及全世界那些衷心支持美国的人”。一条新的阵线被划分了出来。不幸的是，其语言不够精确，以至于莫斯科、北京和平壤方面以为这位发言人的政党在美国丧失了权力，从而忽略了这一警告。

然而，麦克阿瑟却重新活跃了起来。5月18日，C. L. 苏兹贝格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当我就亚洲遏制政策征求将军的意见时，他笑着说他很吃惊我提及了一个美国政策。”将军本人事后表示，自己正准备下结论说政府对远东不是很感兴趣。他催促迪安·艾奇逊前来访问，可艾奇逊却以工作压力大、无法从华盛顿脱身为由作为回复。注麦克阿瑟后来写道，迄今为止，他假设“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与朝鲜半岛的军事防御”。如今，艾奇逊的私人公使杜勒斯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最高统帅注意到，杜勒斯显然“彻底颠覆了国务院之前发布的政策”。

麦克阿瑟的仰慕者们后来坚称，将军曾以自己的军官比汉城那群“不值得信任”的人更可靠以及他怀疑朝鲜即将发起进攻为由，要求重新分配美国在汉城的驻军。此事没有相关记录，也不太可能；他直到1950年5月还在说：“我不认为一场热战即将到来。”他对为自己简述朝鲜海峡对岸进展的西博尔德胸有成竹，忽视了越来越多有关朝鲜人民军即将发起进攻的证据。1950年3月10日，中央情报局预测“朝鲜人民军将于1950年6月发起进攻”。负责半岛全面情报网的威洛比在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间提交了1195份文件，其中提到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军人自蒋介石战败以来已经大量

涌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且兵力远远优于李承晚韩国部队的大批人民军突击部队正朝着三八线挺进。3月的第二个星期，威洛比的G–2情报部队得出了和中央情报局同样的结论，预言战争将在春末或夏初爆发。

除此之外，此刻的麦克阿瑟和身处战前的马尼拉时一样，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积极乐观的气息。开战前5周，他就战争史的问题用自己特有的演讲方法给苏兹贝格上了一课。他在开头提到："你必须记住，初期的战争是一种角斗士比赛。你可以在以弱胜强的基础上入手。"他继续说道，专业部队会代替个人选手，尔后为了捍卫胜利，和平协议的概念就会出现。"但是，"他说，"随着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战争日益变成了包括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整体概念，破坏也变得格外的可怕，战争不再是调停争端的媒介。公众舆论……是反对战争的。因此，我不认为战争即将打响，因为世界各国人民既不渴望战争，也不愿意纵容战争。敌对双方都是如此。这就是我认为战争并非迫在眉睫的根本原因。"苏兹贝格认为，这场表演虽然精彩绝伦，不过大错特错。

1950年6月24日，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迪安·艾奇逊正在自己位于马里兰州的黑尔伍德农场上栽培花木。几个悄无声息的人影在附近的树林中移动着。随着麦卡锡的出现，这位国务卿收到了大量的恐吓信，以至于他不得不需要保镖全天保护自己。在莫宁赛德高地，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沉浸在赞恩·格雷的小说《特立独行的女王》之中。堪萨斯城时间下午2点，哈里·杜鲁门的飞机"独立"号正进入滑行模式，总统正要前往密苏里度假。太平洋上，奥马尔·布莱德雷和路易斯·约翰逊正从远东飞回家乡。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另一边的东京，手表的指针正指向6月25日星期日的凌晨5点。在赤坂，胡佛式荒谬而又浩大建筑中所有的人都睡着了。第一缕晨光早在34分钟之前就照亮了东方的天空，西南边开始隐约可见富士山上神圣的白雪。可距离日出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狗儿们也还没有开始躁动。哨兵们对麦克阿瑟的可卡犬布莱基开了个玩笑。他们说，使馆外不需要士兵，因为就连最轻微的噪声也会让可卡犬站起身来狂吠。可即便是布莱基也没有听到700英里以外的西边传来的越发强烈、令人震惊的噪声。在那里，朝鲜人民军的1 000门122毫米口径榴弹炮爆发出了一片火光，撕开了三八线上方的夜空。朝鲜军官们手腕上的手表秒针正指向凌晨4点——全世界的祈祷钟声再一次被战争的炮火声所淹没。

---

1. "二战"中的两个惨败国竟然达成了它们的主要经济目标，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德国在西欧占据了主要位置。日本人则在欧洲殖民国家撤离后实际领导起了东亚。

2. 据鲍尔斯回忆，麦克阿瑟有一次曾称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罗森菲尔德”，并曾指代杜鲁门是“白宫里的犹太人”，声称杜鲁门的名字和轮廓都很像犹太人。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将军就和早年间的埃莉诺·罗斯福、阿德莱·史蒂文森一样，犯下了良性反犹太主义的罪过。不过，仍旧健在的其他军官却矢口否认鲍尔斯的话，不承认将军曾经做出过如此带有偏见的论断。

3. 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63～前133年）和他的兄弟盖厄斯（公元前153～前121年）通过限制市民能够占有的土地数量和进一步细分土地挽救了独立小农阶级。

4. 哈罗德·伊克斯指责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在朝鲜不知所措……多亏麦克阿瑟将军，韩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保卫自己”。后来，杜鲁门也做出了同样的暗示。他们错了。将军也许会在别处犯错，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无可非议的。

5. 艾奇逊在职期间前往欧洲进行了11次访问。

第九章
日落的枪声
1950~1951



朝鲜半岛如同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东亚这片区域之上。大小与大不列颠岛相仿，1950年，朝鲜半岛上聚居着约2 0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人住在南端。半岛有时会被称为“隐士王国”，大部分来访者都很乐意不去管它。西博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6次穿越半岛。当时，他认为这里是“一个充满了悲哀人民的国度——人们饱受压抑、缺乏幸福感、穷困、缄默且闷闷不乐”。这一印象在他的心里从未变过。某句朝鲜谚语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山外有山。”实际上，这里的山脉似乎漫无止境、色彩昏暗，上面遍植矮栎树和发育不良的冷杉树。山谷中，溪流蜿蜒缓慢流过稻田和有城墙的城市，屹立在台阶上的宝塔伸向灰褐色的天空。风景是没有颜色的，四下里几乎见不到花朵的踪影。山坡上遍布着上千处树林密布的小谷地和河谷，许多都深得足以隐藏一个营的部队，是开展游击的理想地形。

无论如何，人民军的第一场闪电战是一次常规的进攻。在大校李学九的战术指挥下，负责调整榴弹炮弹着点的炮兵侦察兵仔细研究了炸弹的爆炸效果，并校准了火炮的射程。很快，李大校突然放下高举的手臂、示意进攻，排成楔形队列的低矮的苏联T–34坦克左摇右晃地压过了三八线。头顶上，雅克和斯托莫维克战斗机朝着几分钟路程外的汉城飞去。和中国人一样，朝鲜人仍旧使用军号作为冲锋号。随着第一声号响，人民军的步兵们冲过边境，向着第一批目标冲去。来不及顾及天气（夏季风才刚刚到来，瓢泼大雨正从天而降），人民军将军金庸健在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将9万名人民军送进了韩国的土地。帆船和小船也已经载着人民军的两栖

部队在大韩民国的战线以南登陆。正如麦克阿瑟事后所说的那样，朝鲜“像条眼镜蛇一样发起了进攻”。

李承晚的人民在喧嚣中醒来，慌忙穿上衣服。不出几个小时，他们就奔走在了路上，匆忙逃离从未距离他们如此之近的前线。其中某些人这一生都将沦为难民。他们的大韩民国在坦克面前无能为力，惊慌失措、屈服退让，一下子在公众舆论面前颜面扫地。春川地区阵线在短暂抵抗片刻之后便崩溃了。撤退行动变成了一场暴动。有人忽然来报，T–34坦克已经接近首都北部郊区。李承晚准备将自己的政府转移到南方90英里处的大田。在这场大火突然降临在他头上的同时，消息也传到了华盛顿。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J. 穆乔给国务院发去电报：“今晨，朝鲜从几个地方对大韩民国发起了进攻……从发起进攻的性质和方式来看，这似乎是一次全力以赴针对大韩民国的攻势。”紧接着，合众社驻汉城记者开始发回零零散散的简讯，形容不断后退的大韩民国阵线全线都在遭受沉重的打击。被电话铃声从花园里召唤过来的迪安·艾奇逊惊恐地举着听筒，当即决定建议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召集一次安理会紧急会议。艾奇逊拨通了已在密苏里州的“独立”号飞机上的电话，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总统先生，我有个非常严肃的消息。朝鲜进攻了韩国。”

第二天一早便飞回华盛顿的杜鲁门下令立即召开会议，召集外交和军事顾问到白宫斜对面的宾州大道1651号布莱尔国宾馆，和大家围坐在了一张巨型的红木餐桌旁。待会议召开时，穆乔又发来了更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其中一条提到，一支强大的人民军坦克纵队正朝着汉城和金浦机场驶去，显然畅通无阻。艾奇逊结合局势总结道：“大韩民国的武器明显不堪一击。”从好的方面来说，联合国安理会刚刚以9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谴责人民军的侵略行为是“对和平的破坏”，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也正在起草一份附加的更为有效的决议，号召成员国“对大韩民国予以必要协助，击退武装进攻、重建国际和平和地区安全”。注 杜鲁门已经决定，主要援助应该由美国武装部队提供。在之前的国家政策出现如此惊人的逆转之后，美国政府行动了起来，打算保卫在战略价值上曾被视为微不足道的朝鲜半岛。这里的局势对美国的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而且，就全世界所知，这一区域在华盛顿方面丝毫没有价值可言。事后，麦克阿瑟写道：“我不禁为这一重大决定的出台方式感到惊奇。在没有提交负责宣战的国会进行审议，也没有咨询所涉及的任何战地指挥官的情况下，行政部门的成员们……就同意了加入朝鲜战争。”他补充道：“这一决定内在的所有风险（包括中苏参战的可能性），既牵扯当下，也涉及未来。”

尽管这一阶段并没有人征询身居东京的指挥官的意见，但他却是布莱尔国

宾馆红木桌旁无形的存在，而他的名字也被反复提起了无数遍。杜鲁门总统在和这群被他称为“战时内阁”的人详细讨论之后做出了三项决定。麦克阿瑟将受命疏散身处朝鲜的2 000名美国人，而负责执行掩护行动的战斗机需要回避三八线以北的领空。与此同时，他还要给大韩民国送去可从日本、冲绳调来的所有弹药和可调用的军事设备。最后，将军的战区将扩大，将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囊括其中，并将授命指挥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进行巡查——用艾奇逊的话来说，“将战斗封锁在朝鲜半岛范围之内”。当时，人们以为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会采取一致行动。杜鲁门担心苏联会进攻中东或柏林，而华盛顿方面则由衷地害怕和平壤同仇敌忾的中国政府会出兵台湾。美国此时此刻最不想要看到的就是中国恢复内战。

布莱尔国宾馆中没有任何人对将军的授权提出异议，即便有人可能心存疑虑。面对共和党指责他们无力抵御共产党的威胁，举棋不定的民主党政府领导人决心竭力采取最强硬的路线来对抗人民军。他们迫不及待地需要一场胜利来驳斥麦卡锡和他的共和党煽动者们——他们的主要动机既不是出于战略考虑，也不是时下的流行语所说的那样“试图征服全世界上百万人的心灵和思想”。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无论他有什么缺点，最擅长的就是打胜仗。会议结束时，有些人因为一丝满足和玩世不恭的幽默而变得干劲儿十足。如果毛泽东在一年前追击蒋介石到台湾，美国应该会束手旁观。从那以后，国内政治局势让美国官方对蒋介石可能面临的命运变得麻木不仁。因此，台湾就成了一处化脓的伤口，一个给白宫带来无限尴尬的根源。如今，他们打算让共和党保守派最喜欢的将军为所欲为。

鉴于敌人发起进攻的日子是星期天，东京与汉城之间的电话线路是关闭的，所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参谋官们都没有被粗暴地吵醒。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宜人早晨，当伊迪丝·西博尔德在到达后随口提起自己从广播中听闻开战了的消息时，赫夫一家正和其他人懒洋洋地躺在大使馆的游泳池旁享受阳光。赫夫详细地询问了她，然后急匆匆地跑去告诉麦克阿瑟，可将军早已有所耳闻——事实上，他早在几个小时以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在第一缕日光照亮灰蒙蒙的天空时，一位值勤官从第一大楼打来了电话：“将军，我们刚刚从汉城收到一封急件，里面提到朝鲜于今晨4点出动重兵跨越了三八线。”麦克阿瑟想起了近9年前的马尼拉：“心头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噩梦般的感觉……同样可怕的作战呼号再一次在我的耳边响起。不可能的，我告诉我自己。不会再来一次吧！我肯定还在睡梦之中。不会再来一次的。可我随即便听到了我优秀的参谋长内德（爱德华）·阿尔蒙德清脆而又平静的声音：‘有什么吩咐吗，将军？’”

将军说，他不想听闻任何紧迫的发展，只想一个人反省一下自己。他穿上拖鞋，套上破旧的浴袍，开始在卧室里来回踱起了大步。就在这时，琼从

自己的房间里走了进来。“我听到你在踱步。”她说，“你还好吗？”将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吓得她脸色惨白。不一会儿，布莱基跳了进来，试图用哄骗的呋叫声转移主人的注意力，发现不起作用之后便偷偷地溜走了。紧接着阿瑟出现了，轻快地跑来和父亲进行晨间的嬉戏。琼拦住了阿瑟，告诉他今天不能玩闹。麦克阿瑟用一只手臂搂住了儿子的双肩，停顿了一下，然后把双手插回浴袍的口袋中，重新迈开了大步。

在新的战争刚刚打响的那几个小时里，他的心绪总是奇怪地起伏不定。面对新的挑战，他变得兴高采烈。最近才在东京停留过的乔治·马歇尔认为最高统帅比上一次相见时“苍老了许多”，可如今拉里·邦克却发现他“精神焕发……就像一匹重新披上马具、拉动救火车的马”。另外一位副官认为将军“年轻了10岁”，而西博尔德则评论道：“尽管将军年事已高，但看上去还是那么的急不可耐。”然而，与此同时，他似乎正试图劝说自己，眼下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当天中午，一位正打算登机回美国的记者问及他朝鲜半岛局势的重要性，并解释说倘若冲突有可能扩大，他将会留在日本。麦克阿瑟告诉他，这只不过是“越境事件”，劝他“不必为了这种琐事担忧”。他对杜勒斯也采取了同样的说辞。将军预言，大韩民国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只需几艘坦克登陆舰就能把任何想要离开的美国人疏散出来。就这么简单。杜勒斯半信半疑，当天晚些时候，他再次打来电话，却失望地发现麦克阿瑟依旧是信心满满。将军说，他听说自己即将受命负责朝鲜半岛事务，不过认为自己的职责将是管理方面的。无论如何，他看不到任何警惕的理由。可一贯属于强硬派的杜勒斯还是心存疑惑，于是便给艾奇逊发去了一封电报：“（我）认为，如果韩国人看起来无法抵御或击退进攻，就应该调动美国军队——即便此举会冒险引发苏联人的敌对行动。袖手旁观地看着朝鲜半岛无端被武装进攻颠覆将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电报中并没有提及发动小规模战争能够阻止多大规模的一场战争。这并不需要成为一场大战，自从慕尼黑以来，这一议题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外交官们的信条。日后，在有关越南的争论中，这还将成为多米诺理论中的一部分。

星期一早晨（即华盛顿时间星期日晚上）发给麦克阿瑟的第一条有关朝鲜半岛的命令，通过远程电话会议传送了过来。这种沟通模式由两位打字员和两个电视屏幕来完成，也就是说，从五角大楼的键盘上敲出来的信息会出现在麦克阿瑟的电视机上。美军驻亚洲的所有作战指挥部如今全都正式归他管辖。他的新称谓（除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是远东总司令。他接到命令，调派大韩民国附近的战舰和战机前去“支援韩国”。在奥斯汀对联合国盟友们加大施压力度的同时，他可以期待更加广泛的权力。美国的一只脚已然踏入了战场。到目前为止，从大田发回来的所有报告都让迅速击退入侵者的希望成为泡影。当他载着杜勒斯前往羽田机场、准备送这位公使登上回国的飞机时，他和杜勒斯都感到十分沮丧。此刻的麦克阿瑟心中的

消极情绪和他当初兴高采烈时一样到达了顶点，还模棱两可地说要毁掉整个朝鲜半岛。他刚刚给杜鲁门发去电报：“韩国军队无力抵御朝鲜果断的进攻。其影响因素不只是敌军拥有坦克和战斗机。以韩国的伤亡人数作为战争衡量指标来看，他们没有展现出足够的抵御能力或战斗欲望。我们推测，全军覆没的局面指日可待。”总统在回信中再一次警告他不要向三八线以北地区派遣飞机或舰船。

麦克阿瑟由衷地赞成政府的干预决定——他说，和朝鲜发兵相比，这一点更让他感觉意外。他的心里也有许多保留，其中一部分推测还会让布莱尔国宾馆的决策者们大惊失色。将军认为他们“对太平洋，尤其是朝鲜半岛，知之甚少”，因而肯定会铸成大错，因为“当外交官们试图进行军事判断时，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总统的战时内阁决心要限制这场战争，可新上任的远东总司令却相信托马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信条——他相信，如果战争是政府可以诉诸的最后手段，那么冲突在参战的其中一方被征服之前是不可能平息的。此外，尽管他蔑视平民的军事观点，却不认为士兵们应该逃避军外人士所做的决定；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杜勒斯，自己已经做好了“应付政策问题的十足准备”。这不只是他在自以为是，因为他在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日本也曾做出过这样的决定。很少有世界领导人（更别提将军）能在统治国家方面拥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如果说华盛顿方面只想让他在刚刚爆发的危机中运用自己的军事才华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偏偏期待他能够控制自己就不太合理了。

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让事情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共和党也许不想让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他依旧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几位军事领袖之一。共和党人把这一点看作是政府放松“欧洲第一”政策的征兆。他们认为，将军不会随便相信亚洲的动乱局势是由贫穷和遭西方殖民主义抛弃而引起的。他们对此的看法是错误的，却在另一点上是正确的：他们推测，将军不会相信中国方面会因美国放弃台湾地区、讨好毛泽东而脱离莫斯科——用他们的话来说，将军不会通过“出卖”蒋介石来“安抚”中国大陆。总之，美国两党都认同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是太平洋上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在远东问题上的观点在同胞们心中也很有分量，从而给应对朝鲜战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实际上，由于不愿触怒将军，杜鲁门的所有顾问（包括联席参谋长甚至是总统本人）都甘愿冒险在士兵们出生入死时被人指责玩弄权术，同时在针对他的许多关键指示上都显得胆小怯懦、暧昧不明。这是不可原谅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应该明白，如果他有权随意解读模糊不清的指令，便定会选择对他而非他们有利的解释。他身边最亲近的涉外官员评论道：“凭借他的历史感、经验、资历、名声和性情，他在自己的判断或决定遭到质疑时是不太容易妥协的……他总是乐于根据自己的理解揣测当局的意图，或者迅速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先斩后奏。”

每次和他展开政治较量，总统都会遭遇某些奇怪的不利因素。这其中也有总统自己的错。在决心达到所谓的“经济预算”的同时，他草率地将五角大楼的预算大幅削减到了132亿美元。正如《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他在“切掉骨头和肌腱的同时也切掉了脂肪”。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成了此事最大的替罪羊。在朝鲜半岛事件揭露了五角大楼的腐化堕落之后，杜鲁门开除了约翰逊，指认乔治·马歇尔接替他的职位——虽说此举对国家来说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在麦克阿瑟眼中却没有任何起色。但是，尽管总统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竖起了“责无旁贷”的标识，他却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且，光靠耀武扬威地展示已经不复存在的军事实力和试图恐吓对手，是无法使情况有所好转的。朝鲜半岛危机刚刚爆发的那段混乱的日子里，他冲动地宣布美国不仅要保卫李承晚和蒋介石的政权，还要支持菲律宾对虎克党人展开攻势以及法国人对越南的胡志明开展大规模进攻。这是在报复性地实施“NSC–68号”，同时也是荒谬的。他缺乏力量去支撑它，而外国领导人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正如麦克阿瑟指出的那样，朝鲜战争爆发5年之前，美国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如今却很难将初出茅庐的人民军推回三八线以北。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表示，美国的势力已经在“积极而又有魄力地朝着一切远大目标迈进的领导机制的彻底失败”中一点点被浪费掉了。

将军相信，和总统相比，自己才是传统美国理想主义更具说服力的倡导者。他也许是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马歇尔计划、柏林空运（杜鲁门外交政策的闪亮纪念碑），都是相对复杂的理念。他的选民们对此表示认可，却未在很大程度上被打动。他们相信民主主义（“美国之路”）是世界问题的唯一解答。一个欧洲国家越民主，他们就越欣赏它。但欧洲人是富裕的。正如他们所见，真正的考验在于亚洲。从某种神秘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把“二战”的胜利结束视为美国理想的胜利。而日本改革和新菲律宾共和国的成功则被作为证据引用。对比来看，这也是中国的剧变让他们感到震惊的一个原因。

麦克阿瑟相信战后的竞争在于基督教民主主义和“集权的共产主义”之间。大部分美国人都认同他的观点（正如沃特尔·李普曼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很难在非基督教观念统治的环境中感觉安全），尽管将军和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在麦卡锡主义的流行得到证实之后，相比渴望权力的中国和苏联，他们更讨厌马克思主义狂热分子，尤其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守自己的19世纪信条，麦克阿瑟相信更大的敌人是苏联的冒险主义。如果莫斯科的统治者仍旧是沙皇，而北京的统治者仍旧是满族人，将军对他们也许只会采取敌对的态度。正如他在东京时反复阐明的那样，他是有能力采取极端的解决方案的——只要不用“极端”来形容这些方案。他过去总是在口头上支持保守派过时的准则，却在实践中忽视他们，毕竟想要和虎克党以及胡志明的越南独立同盟作对的人是杜鲁门。但了解双方动

机的人其实是麦克阿瑟。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本应成为联合国军队的第一司令。多亏沃伦·奥斯汀（以及苏联代表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的事实），联合国的影响力全都被寄托在了韩国的身上。13个国家做出承诺，只要美国投入自己的地面力量，他们就愿意出兵。三八线被冲破之后，杜鲁门在自己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对一位记者表示了赞同。这位记者提问："将此次行动称为联合国框架下的军事干预是否准确？"这个短语在美国还不是十分流行；美国很少有人能接受用它来指代"战争"，或是感觉自己可以效忠于世界组织。而有能力做到这些的人中又有许多人对司令的选择充满了怀疑。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写道："70岁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要求"不仅要做一位伟大的战士，还要做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不仅要指挥战斗，还要在战斗过程中令五角大楼、国务院和联合国满意"。赖斯顿指出："和艾森豪威尔不同，麦克阿瑟凭借自己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天赋和对自身判断的固执自信，本身就是最高主权。外交手腕和对他人的意见与敏感性的广泛关注是这一新任务必需的政治品质，而这些正好是人们曾经指责麦克阿瑟将军身上所缺乏的东西。"

7月14日，在第一大楼楼顶上举行的一个小小的仪式中，后来将成为陆军参谋长的J·劳顿·柯林斯向最高统帅赠送了一面联合国的蓝白旗。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响亮地答道："我带着最深沉的感情接受这面旗帜……"他的演讲剩下的部分容易让人遗忘。作为身处世纪之交的军官，受制于他曾于1899年在西点军校"平原"上说出的誓言，他无法将自己的忠诚从星条旗转移到这面从成功湖村远道而来的旗帜上。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没能阻止他利用自己的双份忠诚。在白宫方面看来，远东总司令的指挥系统从陆军参谋长开始，一直延伸到联席参谋长和总统，也就是联合国的代表。将军可不这么认为。正如西博尔德指出的那样："我回想起，麦克阿瑟的公务人员地位曾在好几种情况下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考虑到后续发生的事件，将军到底是单纯以美国军官身份出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和联合国军司令还是以国际专员身份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学术的意义。从华盛顿方面的最盛行观点来看，麦克阿瑟是一位美国军官，受制于这一职位的所有要求……将军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提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一职属于国际专员。麦克阿瑟说，他只能在这是一个商定好的同盟国职位的情况下，接受问责。当我在这一点上重申华盛顿方面的态度时，将军说这并不正确。"

日后，这还将引发许多问题。不过，除了试图巧妙地操纵自己的双重头衔之外，远东总司令再也没有提起过楼顶的这场仪式，甚至把相关内容从自己的回忆录中删掉了。也许他认为此举有几分不和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的确如此。朝鲜半岛上的局势充满了奥威尔风格。美国曾经的盟

友苏联支持着被奴役的朝鲜，而它的冲突对象韩国身后则站着联合国——它自身加入的组织。与此同时，苏联还要求参与和美苏双方曾经共同的敌人日本之间进行的协约谈判——日本将借此迎来和平，成为反对平壤势力以及美国（苏联如今的主要敌手）的基地。总而言之，伟大联盟被微不足道的朝鲜打败的结局似乎指日可待。

开战后的第一个星期，杜鲁门便命麦克阿瑟的军需处为大韩民国提供武器，紧接着又指挥他在三八线上为李承晚的军队提供空中和海上支援。这些措施都不起效。第5天，被麦克阿瑟送上前线的约翰·丘奇准将回报，局势似乎无药可救。总统批准战机飞往三八线以北地区，但限制投弹手们只能向军事目标投弹。然而，战机从日本机场出发后的飞行时间过长，无法有效地执行任务。因此白宫方面授权调动一支美军先遣队（第507防空炮兵营）前往朝鲜半岛。他们领命在其他美军士兵和水手们夺取釜山附近的机场和码头时保卫朝鲜半岛东南端的水原机场。一个致命的后果正在成型。一旦要指派飞机作战，就必须拥有跑道。跑道需要地面人员，而这些人员又需要美国步兵的保护。同样的模式日后也将出现在越南。

星期三，即开战后的第4天，麦克阿瑟决定是时候亲自前去前线考察一番了。黄昏时分，他召集4位美国记者在第一大楼的办公室里集合，并告诉他们，自己不知道美国空军、海军和后勤支援是否足以挽救大韩民国："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了解这些信息。如今也只有这一种方法。我决定亲自去朝鲜半岛看一看。""巴丹"号将于次日，6月29日，起程载他飞往前线。这架飞机未经武装，而他也不知道他们要在哪里降落；距离汉城最近的跑道金浦机场已经被占领，而位于首都以南20英里处的水原机场又被认为不够安全。他的参谋想说服他勉强接受在距离日本最近的港口釜山降落，却遭到了他的拒绝；那里距离前线太过遥远——足有200英里的距离。记者们受邀陪同前往水原，但将军希望他们知道，他无法确保战斗机能够提供掩护。"如果你们没有到机场来，"他说道，"我就会知道你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在场的4个人全都承诺会去机场与他会和。他笑了笑。"我不怀疑你们的勇气。"他说，"我只想给你们一个做出判断的机会。"

星期四破晓时分，有风、有雾还有雨。细雨抽打着"巴丹"号的螺旋桨，片刻悬在空中，然后猛地砸向水泥跑道。"老头儿随时都有可能到达。"一名中尉朝着记者们喊道，但首先出现的将军却不是总司令，而是肯尼的继任者乔治·E. 斯特拉特迈耶，麦克阿瑟的空军司令。据"巴丹"号的飞行员托尼·斯托里回忆，斯特拉特迈耶告诉他，他们无法起飞，升限为零。不一会儿，麦克阿瑟得意扬扬地迈着大步走了过来，步态轻盈，手里拿着双筒望远镜，身上穿着一件褪色得几乎泛白的土黄色军服，头戴一顶软帽。尽管

能见度很差，他却还是架着一副墨镜。他很快否决了斯特拉特迈耶的话。面对空军司令的强烈抗议，将军问道：“可你自己也会愿意去的，不是吗？”斯特拉特迈耶回答：“是的。但我不算什么。你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总司令转向了斯托里，开口说道：“我们走。”

升空后，他点燃了自己的大号玉米烟斗。“我在东京的时候不抽这玩意。”他告诉其中一位记者，“他们觉得我是个农民。”这位记者注意到他的手指在颤抖，但猜测那应该是年龄而非恐惧所致，毕竟他已经是71岁高龄的人了。他起身把双手插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开始在机舱里踱步。“他总是这样。”一位参谋告诉记者，“若是按他这么走下去，还没等我们着陆，他就已经走完大半的路程了。”斯特拉特迈耶为飞机安排了掩护：4架野马（P–51）战斗机正在他们的头顶上如同警觉的猎犬般排成一排、机翼比着机翼向前飞行。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就在“巴丹”号于水原上空进入滑行模式时，一架雅克战斗机飞快地靠近，朝他们俯冲过来。一位副官大喊着：“求救！”所有人都俯下了身子，只有麦克阿瑟奔向了一扇窗户，看到一架野马战斗机离队拦截住了朝鲜的战斗机。“我们出其不意地拦截了它。”将军热切地说。可斯托里当即采取了灵敏的闪避动作，让他失去了近距离观战的机会。

他们在坑洼不平的跑道上颠簸着着陆了。蓬头垢面、心烦意乱的李承晚上前迎接了将军。约翰·穆乔领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所校舍中。这里正是美国顾问驻韩国的临时总部。丘奇准将站在一张挂图旁向他们展示了日益恶化的局势。还没等他把教鞭放回架子上，麦克阿瑟就拍着膝盖、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到前线去看一看。”一行人坐上了一辆黑色的道奇牌汽车，身后跟着一列吉普车队，朝北边的汉江驶去。汉江之于汉城的意义就像是波托马克河之于华盛顿。

默尔·米勒在《实话实说》一本书中援引艾奇逊的话提到，那一天，“麦克阿瑟将军飞过了战场上空”。实际上，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花了8个小时的时间在大韩民国危机四伏的战线上巡视。18支人民军部队正向南方杀去，而将军和随行人员身边也是一片混乱。据在场的4位记者之一的拉塞尔·布赖恩斯回忆，他们“驾车经过了乱了阵脚的韩国败兵和大群不知所措的可怜难民身边，就为了亲眼看一看前线……整段路程中，护卫队不时便会冒险遭遇敌人的空战，却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炸弹的轰鸣声既响亮又清晰。朝鲜人光是适当利用重型火炮就足以严重威胁到一行人的安全”。

威洛比写道：“（和身处雷根斯堡的拿破仑一样，麦克阿瑟）站上了路边的一处小高地，身边聚集着一群群喘着粗气撤退下来的纵队士兵，随处可见载有呻吟着的伤者的救护车。天空被死亡的导弹震得抖动了起来，到处飘荡着恶臭、充斥着痛苦。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一片狼藉。”另一位副官回忆起：“将军棱角分明的侧面轮廓在汉城四处飘荡的黑烟衬托下形成了一

幅剪影。他扫视着四周的土地，双手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长柄烟斗随着他凝视这场可怕灾难现场而晃动的目光向上翘着。”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自己写道：“汉城已经落入了距离我们仅有一英里的敌军之手。我能够看到滚滚的黑烟在这座14世纪建成的城市留下的废墟中升起……真是惨烈的一幕。”

汉江的南岸到处都是皮开肉绽的尸体。这些美国人刚刚错过了惨烈的一幕。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人民军的枪声如雷鸣般在城市的北岸咆哮，一大群惊慌失措、惊声尖叫的人群堵住了河上的桥梁，他们寻找着通往自由的出路。大韩民国最高指挥部下令摧毁这些桥梁，以此作为抵御人民军的最后防线。2点15分……这些桥梁同时被淹没在了爆破的冲击波之中，活活烧死了上百名仍挣扎着想要过桥的难民。大韩民国的大部分军队连同他们的设备和交通工具都在汉城，被困在了汉江的北岸。”此时此刻，只有一条铁路可供随时通过。麦克阿瑟通过自己的双筒望远镜简要地研究了一下。“炸掉它。”他说道。当时，他还没有权威下达命令。紧接着，撤退的车队鱼贯而入，钻进了狭窄的土路中，朝着斯托里和等在那里的“巴丹”号驶去。穆乔给身在东京的西博尔德打去电话：“这位老兄很有胆量，非常了不起。”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了不起；很久以后，将军才会告诉大家，就在他在那座小山上停留的20分钟里，他构思出了一个从朝鲜身后进攻的伟大两栖登陆计划——代号暂定为“蓝心”。

从朝鲜战场上的第一场战役返回之后，他坐在“巴丹”号的座椅上抽着玉米烟斗，鼻子上架着眼镜，在黄色的便笺本上草草写着自己对韩国机遇的评估。他写道，大韩民国显然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在日本，他只有4个美军步兵师（每个师的兵力都只有额定的2/3）和一个团。他知道，如今承诺把美军送上战场就意味着“‘照现在的样子’加入战争，没有时间召开征兵大会、大肆宣传或做好准备”。这将会是一个“进驻——然后开枪”的过程，会“把大部分的重担都放在美军的身上”。他悄悄告诉一位副官，他知道自己的占领军“尚未准备好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参战”，因为日本轻松的工作已经“损害了他们的战斗力”。然而他并不想为此承担责任，反倒是责备五角大楼方面的“矫揉造作和不切实际对优秀士兵的养成产生了不利影响”。他告诉鲍尔斯少校，“一个士兵的首要职责是保持身体健康”，可他却放纵自己的士兵养膘。错的都是别人，因为麦克阿瑟是不会犯错的，反倒是其他人都在蓄意谋害他，为他的任务徒增困难。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战场上的将军，他的专业性是不容置疑的。在对华盛顿方面发表客观言论时，他表示：“唯一能够保证守住当前战线，并为日后收复阵地留出余地的方法是将美国战斗部队引入朝鲜战场。在缺乏有效地面部队的前提下继续利用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是无法压倒一切的。一旦得到授权，我打算立即转移美国团级战斗队前去加强我们讨论过的重要地

区，为可能从日本抽调人手、组建两个师的力量发起早期反击做好准备。除非预做安排和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地区充分利用海、陆、空三军团队，否则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在生命、钱财和威望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甚至注定会导致失败。”

他意识到，这样的推荐是出于政治角度，而非军事角度。从战略上来说，他仍旧相信朝鲜半岛正好处于美国的太平洋防御阵地之外，但他相信，只要拥有兵力和武器，他能够拯救李承晚的政权。不幸的是，这里存在着一个圈套、一种严重误解的萌芽。杜鲁门、艾奇逊和联席参谋长们追求的是消极的目标：将入侵者驱逐出境。他们预见这场战争和腓特烈大帝参与过的战争类似，都是为了有限的目标而奋斗。可麦克阿瑟却假设自己的目标是打败敌人。多年之后，他这样写道：“美国人的传统一直都是这样，一旦我们的军队投入战争，就要动员全国所有的力量和手段，全身心地投入可能为我们带来胜利的战略方针之中。这一传统就要被破除了，而我并不是在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

东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将军在返回第一大楼的办公室之后立即通过电视电传机把自己的报告发往了五角大楼。大洋另一边的值勤官叫醒了正在联席参谋长们住处接待室的简易小床上熟睡的参谋长柯林斯。柯林斯回复，这件事对于参谋长们来说意义重大，必须等到早上再呈给杜鲁门。麦克阿瑟拒绝了。时间是敌人的盟友。朝鲜人很快就会加速冲向釜山。他需要立即得到回复。凌晨4点半，柯林斯不情愿地拨通了陆军部部长弗兰克·佩斯的电话，而佩斯则在凌晨5点钟致电了白宫。佩斯惊奇地得知，习惯早起的总统已经刮好了胡子、穿好了衣服、吃完了早餐，此刻正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桌旁准备做出决定。

自从罗斯福的做法刺激日本人攻打了珍珠港之后，国会中主张发动战争的权势已经日渐衰退。正如约翰·W. 斯帕尼尔赞许的那样，杜鲁门相信“自己有权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而把美军送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各方记者也支持他的想法；理查德·H. 罗维尔后来在《纽约客》上写道：“美国总统有权在任何他判断与国防有关的地方采取他认为有必要的行动，不管是与台湾地区还是其他地方的国防有关。”所以，美国总统感觉自己没有义务咨询参议员和众议员。不过，他倒是告诉佩斯，他想要给几名参谋打电话。前一天晚上，通过精明的政治行动，蒋介石响应了联合国提出的决议，自愿派遣3.3万名“装备齐全”的国民党士兵，“在大韩民国可能需要击退武装进攻的时候为其提供帮助”。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我告诉艾奇逊，我的第一反应是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我想……看到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参与朝鲜半岛行动。”已经醒来并且正在研读穆乔报告的艾奇逊对总统的提议表示十分惊讶。在《参与创造世界》一书中，他解释道：“我以这些部队更有利于保卫台湾岛而非朝鲜半岛为由表示了反

对。”除此之外，他还预言国民党为大韩民国提供援兵的举动会将毛泽东也卷入半岛的冲突之中。总统对此不是很确定——他写道：“我依旧倾向于接受蒋的提议。”但联席参谋长们在通过电话投票表决之后告诉他，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士兵未经考验、缺乏训练、能力不足。[注]因此，杜鲁门同意在自己的指挥下授予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调遣地面部队的所有权力，批准了佩斯的要求。佩斯将决议转告给了柯林斯，而柯林斯又转告了麦克阿瑟。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白宫宣布总统已经“授权美国空军针对朝鲜的指定军事目标采取军事行动”，并已“对整个朝鲜半岛海岸进行海上封锁”。不久，白宫方面简洁地宣布：“麦克阿瑟将军已被授权调遣某些地面部队。”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内，第一批美军步兵团就已从本州飞往了釜山。

日后，将军将对敌人把中国东北作为“特权避难所”表示强烈抗议，但他忽视了日本列岛其实也是他的基地。他可以抽调日本列岛上的任意一支美军作战部队，只要不会让自己在那里的基地陷入危险境地——这是对他顺利完成5年总督任期的赞美。东京掌管外交事务的河野一郎告诉西博尔德：“尽管全国广泛存在反战情绪，但99%的日本民众都支持朝鲜半岛行动。”他们不仅对此表示认同，日本还成了半岛上联合国军队的重要供应国。日本的搬运工自愿横越海峡，到例如元山、兴南和仁川这样的前线港口卸货。此举自然激怒了苏联人。时任东京同盟管理议会苏联成员的A. P. 基斯连科少将起草了一份长长的法案，其中的细节证明日本人配合了联合国的努力。然而，据西博尔德回忆：“尽管他显然期待在日本制造强烈的不良反应，引起人们呼吁绝对不许参战，却没有得到日本媒体或公众的任何支持。”如果他们相信基斯连科的论证具有说服力，从而选择束手旁观，麦克阿瑟可能会被赶出半岛。结果他侥幸逃脱了。麦克阿瑟回忆，敌军“跨过了汉江，而韩国的抵抗也越来越不顺利”。第一批从日本赶来的美军对当时的战事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美国人本以为，一旦美军第24和第25师到达朝鲜半岛，战争便会出现新的局面。他们心想，即便朝鲜人不会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至少也会失去动力。事实上，美军部队和他们在大韩民国的新同盟一样开始崩溃了。麦克阿瑟希望这两支美国军队能够挫败敌军的梦想就此破灭。状态不佳的美军寡不敌众——每1个美军士兵都要对抗差不多20个敌人，而且第一批赶到的分遣队中大部分人都是缺乏经验的新兵，只有20%的人目睹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唯一的反坦克武器便是老式的火箭炮，无望有效抵御强大的苏联T–34坦克。包括第24师指挥官在内，许多人在掉队走散之后的头几天内就投降了，随后才知道朝鲜人民军只俘虏了几个人。更多的时候，人民军会把被抓的人双手绑在背后，用刺刀刺死他们。很快，“潜逃瘟疫”降临在了美军身上——大家都渴望回到日本舒适的军营之中。失败主义的情绪逐渐蔓延到了高层指挥官中间。记

者们无情地把这样的局面描述为即将到来的“美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麦克阿瑟要求联席参谋长们再派5个师的兵力，却遭到他们的反对，麦克阿瑟为此大为光火。参谋长们解释道，他们要调派美军支持北约抵抗苏联可能发起的攻势。他愤怒地说，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初，欧洲的确发生了战事。而现在，他相信，军队正被送往一片苏联指挥官仅仅采取了防御姿态的大陆，而聚居人口更多的太平洋地区却人手短缺。“这是有关‘优先顺序’的老毛病”，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远东再一次位列清单的底部。”虽说大家争论的内容似曾相识，但这一次的争执却给他和参谋长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长远意义。如果华盛顿方面不顾朝鲜战争日益增长的需求，并决心加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朝鲜方面的成就必将是有限的，而这一前景是将军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都无法接受的。就眼前的意义而言，战事也同样不明朗，但麦克阿瑟在这一点上找到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引进了一种被他称为“兄弟制”的体系，为每一个美军士兵分派一个与他并肩作战的大韩民国士兵。此举当即为他的第8军团增添了3万兵力。很快，他又开始着手进行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通过熟练的调兵遣将智胜强大的敌人。

在这一点上，就连他最具洞察力的批评者都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斯帕尼尔写道，尽管自我肯定和自信“是麦克阿瑟身上某些更应受谴责的品质的缘由……它们也是1950年7～8月那段黑暗岁月中鼓舞和有益于自由世界的美德”。罗维尔和施莱辛格也总结道，“他出色地完成了他必须完成的事情”。将军本人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计划：“用空间换时间”——换来让更多从日本调来的军队登陆的时间；换来运输重型武器、坦克和补给品的时间。他的战略既出色又另类。正如他第二年春天在国会山上声明的那样，他希望：

> 通过嚣张地展示实力来欺骗敌人，让他们相信我拥有更广泛的可支配资源。我设法将两个步兵团中的一部分派遣出去，在他们被击溃之前命他们奋起反抗——这样的反抗也许会为我们带来最重要的几场胜利。敌人无疑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用如此小规模的部队做出这样的努力，从而放弃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迅速奔赴釜山的计划——他们本来不需要一个星期便能到达那里，停下脚步、部署火炮……这样一来，我们就争取到了10天的时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第1骑兵师就已经在东海岸登陆了，并移动过去形成了一条战线……从那时起，我从未丝毫怀疑过我们据守滩头的能力。7月19日，我记得自己在第一份战报中写道，我预测我们不会被赶回海里。

五角大楼方面对此却不是那么的笃定，美国民众也是如此。乌山、耀德

郡、东安区、青潭大桥、洛东突出部——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连同描绘釜山防御带的地图出现在了美国报刊的头版头条上，其中的防御带范围每天都在缩小。7月，人民军凶狠的攻击几乎将第24师撕成了碎片；紧接着，人民军纵队开始猛攻驻守在美军主要供应基地和通信枢纽大邱的第25师。“当时的情形令人沮丧、难以预测。”麦克阿瑟说，“但实际情况并没有新闻记者们描述得那么糟糕。”那些报道无疑是愚昧的。记者们不知道将军在如此艰难的阶段是否会“力殚财竭”。远东总司令的部队指挥官沃尔顿·“约翰尼”·沃克的话听上去同样孤注一掷。“面对敌人的压力，我们不能进一步退让。”他号召自己的士兵，“从现在开始，坚守到最后一人倒下。”

不久，7月底8月初，长期的撤退局面结束了。第27军团的步兵和韩国兄弟们站稳了脚跟，将“人民军大潮”抵挡在了大邱的城墙之外。事实证明麦克阿瑟是正确的。《纽约时报》以社论形式评论道，前线新闻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在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坐镇指挥能让人感到满足和安心。命中注定，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能比他更有资格赢得人民的无限信赖。他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富于创造力的领袖；他拥有无尽的耐心，在敌人的压力面前还能做到心平气和；他既大胆又决绝……如今，美国人每家每户都坚信，如果哪个人能够顺利完成杜鲁门和联合国安理会交予他的任务……那一定就是身处东京、很久以前便证明自己有能力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效命的那位好士兵。”

麦克阿瑟在汇报中提到，他相信：“敌人突破汉江之后，凭借势不可当的兵力和强大的武器，他们的计划和巨大的机遇取决于他们侵占和击溃韩国抵抗势力的速度。然而，在被从日本赶来的第8军团以惊人的速度阻拦下来之后，他们已经失去了发动猛攻的机会。”8月下旬，朝鲜的9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力图压制守军。可将军的美国坦克和重型大炮如今已经登陆，而人民军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又面临着补给线遭斯特拉特迈耶的轰炸机无情猛攻的局面，从而失去了一部分活力。夏末之际，麦克阿瑟的部队固守着145英里的弧形战线，而对方战壕战线也在稳步增强中。

在这条窄得一辆吉普车就能轻易跨越的弧形战线内，联合国士兵的武器弹药量和釜山周围的铁丝网面积每个星期都在扩大。第1骑兵师从日本奔赴战场之后，第2步兵师也从美国到达了前线，紧接着又从香港赶来了2 000名英国士兵（他们是4万名英联邦士兵中第一批到达的）。法国、土耳其、荷兰和菲律宾士兵也纷至沓来——联合国军的先头部队囊括了联合国其他13个成员。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给美国发去电报：“釜山市郊15英里的范围内变成了大型的军火库和补给站。45吨重、装有90毫米口径主炮的潘兴坦克正和155毫米大型榴弹炮正大批量被送达。这里有充足的石油、汽油和汽车，还有为冬季作战准备的帐篷、加热器、睡袋和冬衣。”

这是一场平局。记者们不知道局势如何才能改变。美军士兵们倾向于听天由命。他们唱着："道，金，李，他们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个天赋异禀的战略家，因此是不会甘心被无限期封锁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的。然而，原计划于7月22日实施的"蓝心行动"却因所有士兵当月都必须前往朝鲜半岛东南端而被取消了。不过他很快就会拥有足够的人手了。在总统的带领下，美国彻底被唤醒了。入选的国民警卫队部队被召集了起来。新兵征募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征兵限额也有所提高，使得60万名新兵尽快穿上了军装。诚然，许多补充兵员既不热情也不情愿。没有人倡导他们同心协力，来自芝加哥的下士史蒂芬·赛格无疑说出了防御带内成千上万名士兵的心声。他告诉一位记者："我会为我的国家而战，但我要是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拯救这片地狱之地就见鬼了。"然而，美国本土很少有人有组织地抗议这场战争，示威游行就更是少见了。新加入的步兵都是曾经参加过"二战"的士兵的弟弟。爱国精神依旧强烈，美军前些时候遭人民军痛击的事实也刺痛了这个国家的自尊心。

从釜山港口附近延伸开来、占地面积4 000平方英里、炙热难耐、满是尘土的滩头上，激战仍在继续（9月的前两个星期，战事尤为血腥），可在海战和空战方面堪称炉火纯青的将军却安慰华盛顿方面，他现在拥有"一处安全的基地"。伤亡人数已经降至补充兵员的总数以下。他的9.2万步兵兵力已超越了敌军的7万兵力，且每一天，他都会收到越来越多的军备物资。早在7月底时，他相信"逐步加入行动的时期"已经结束，"争取用空间换时间"的计划也已成功，他感觉自己已经足以信心满满地把战场托付给沃克，于是便飞往台湾前去会见蒋介石。

麦克阿瑟依照华盛顿方面的决定，拒绝了蒋介石派遣3支国民党军队的提议。史迪威警告过他，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组成"主要以公务员为首，靠数量和美国的援助以及一批决心誓死保卫旧中国的领导人来维持"。如果将军需要毫无经验的劳动力，热情的韩国志愿者们就已经足够了。总司令总结道，将3.3万名士兵从台湾运送过来本身就是后勤方面的噩梦，所以他劝告五角大楼方面，"中国国民党分遣队将成为缠在我们身边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他又无法忽视这位委员长，因为他是中国通们众所周知的人物。杜鲁门曾把保卫蒋介石所在岛屿的任务托付给他（"你要击退针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所有进攻"），而用麦克阿瑟的话来说，他感觉自己"有必要到访台湾，以便判断它的军事防御能力"。除此之外，华盛顿方面也希望他能够前往。在回复国民党于6月29日提交的备忘录时，美国通知台北方面，在将军腾出时间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商谈之前，出兵事宜是无法得出最终结论的。7月的最后10天里，联席参谋长们反复提醒麦克阿瑟，他们为台湾局势感到担忧。其中的两位参谋长柯林斯和霍伊特·范登堡

还飞往东京，向将军解释了总统对国民党有可能对大陆发起突袭的担忧。不值得羡慕的是，将军不得不尽可能巧妙地向蒋介石解释清楚，第七舰队将拦截任何突袭部队，并将他们送回家去。

他的出行日期已经定下来了：7月31日。事态紧接着变得模糊起来。五角大楼方面通知第一大楼，国务院正在探讨有关台湾的“某些政策事务”；参谋们暗示麦克阿瑟，在等待讨论结果之际，他也许可以“先行派遣一位高级军官随访问团前往台湾，自己随后到达”。不过，这条消息的结论是这样的：“鉴于责任是你自己承担的，请放心地去吧。”显然，这份报告的副本并没有被送到国务院手中。艾奇逊事后才知道麦克阿瑟和蒋介石的会面是将军的主意。他写道：“直觉会告诉我们日后将被经验证明的事情——让麦克阿瑟将军承担解释工作是件可怕的事情。除此之外，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想到了利用战区指挥官的更好方法，所以从东京派遣了一位国务院官员前往台湾执行解释任务。”但故事不可能是这样的。这位高级的驻东京美国外交官就是西博尔德，可他并没有收到类似的指令。相反，两架C–54运输机载着包括威洛比、阿尔蒙德、斯特拉特迈耶和惠特尼在内的16名军官起飞了。麦克阿瑟告诉西博尔德，他不会和他们同行。西博尔德把此话转告给了时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腊斯克例行公事地提交了报告。“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任何的角色。”西博尔德回忆。他很满意将军的解释：既然谈论的只是军事事务，他想要避免任何有关政治暗示的提议。然而，不满杜鲁门承诺保卫台湾岛的艾奇逊却把此话当成了将国务院代表排除在访问团之外的托词。他对麦克阿瑟的怀疑正如对方对他的疑心一样，有时候也属于偏执狂。

糟糕的天气导致C–54运输机在台北上空盘旋了一个半小时。按照参谋们的话来说，在终于跳下舷梯之后，将军给了蒋介石一个“头号人物之间的”握手——他伸出右手与蒋介石的右手相握，左手则托住右手肘。“你好吗，委员长？”他低声说道，“您能来接我真好。”委员长并不理解这些话，但翻译无所不在。美国参谋官们和国民党中对应的人投入了忙碌的一天，研究地图、调查海滩障碍物，而他们的司令则与蒋介石展开了会谈。这一天结束时，麦克阿瑟表示他对台湾的防御计划有所“感受”，也了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情报网。在一顿正式的晚宴上，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蒋夫人“不仅在将军到达时亲自迎接了他们，还能叫出每一位来宾的名字”。惠特尼回忆道：“她从未见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仅仅在官方简报中听说过我们的名字，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返回第一大楼之后，最高统帅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声明说：“（自己）访问台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简要勘测该岛在面对可能的袭击时的防御潜力。政策已经阐明，包括澎湖列岛在内，这座岛屿不在目前遭受军事入侵的形势范围之内。”远东总司令与国民党之间“各个层面”的会谈“从各个方面来说

都是诚恳而热情的。在我们讨论的众多问题中，国民党政府还果断而又宽容地提议派遣兵力加入驻朝鲜半岛的联合国军队。”双方都赞同，鉴于“此举在目前的情形下有可能严重威胁台湾的防御”，因此是“不明智的”。将军总结道：“我十分荣幸与上一场战争的老战友见面……他抵抗共产主义统治的不屈决心引发了我诚挚的敬意。他的结论与美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即太平洋上的所有人民都应该获得自由——而非遭人奴役。”

正如麦克阿瑟的声明中所提到的那样，此事被抑制了下来。另一方面，委员长随后发表的官报却有些无赖。委员长吹嘘道，他们之间的谈话不只与台湾的联合防御有关，还涉及了“中美军事合作”。此举显然是在试图挑起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驻东京总司令之间的矛盾。声明中一半以上的内容都在表达他对麦克阿瑟的敬仰，称赞他“在共同对抗亚洲集权主义时的坚决领导力和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深刻理解”。如今，他宣布，“攻占”大陆已经“指日可待”。

蒋介石的话成了美国的头条新闻。麦克阿瑟故作惊讶，但他早就知道报纸一贯寻找的就是论战。一旦意识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微妙关系，它们便会抓住每一个短语不放，非要从中读出错综复杂的意味不可。他和委员长本应什么都不说。相反，正如杜鲁门指出的那样：“这一次的访问引起了世界媒体的推测。蒋介石的副官们放出消息，说远东总司令对于即将采取怎样的行动这一问题与他们的委员长达成了完全共识。弦外之音便是（不少美国报纸也做出了同样的评论），麦克阿瑟不同意我中立台湾的政策，而是偏向于更加激进的思路。”特朗布尔·希金斯注意到：“委员长有关将军理解共产主义的直率评论让别人以为华盛顿方面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不那么到位。对蒋介石来说，如此报复杜鲁门政府长期以来对自己漠不关心的复仇行动一定很美妙。”合众社援引国务院发言人的话，指出对方在回答某问题时表示国务院并不知道麦克阿瑟为何没有带上自己的政治顾问。许多美国评论家，包括一些对麦克阿瑟极为尊重的人，都感到十分失望。戴维·劳伦斯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采访时说道：“有些人怀疑，一位过于直率、独立、果断的将军并不是最好的外交人才。”诚然，他身边有不少人就不是这块料。《时代周刊》援引第一大楼中某“可靠信源”提供的信息，说麦克阿瑟相信：“首先，如果美国做不到无论共产主义在亚洲什么地方萌发都会与之抗争到底，朝鲜战争便是一场徒劳。其次，这意味着美国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香港的英国人以及中南半岛、“暹罗”（泰国）和缅甸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最后，任何不够坚定决绝的行动都会招致共产主义在亚洲遍地开花。”

鉴于安理会已于4月采用了“NSC–68号”政策文件，蒋介石期望它能够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可华盛顿政府却并不打算把这一过去的政治主张用在腐

朽的台北政权上。艾奇逊是个易怒的人。他写道，当他“在8月1日的报纸上读到麦克阿瑟将军到达台湾，亲切地亲吻了蒋夫人的手，还和她的丈夫进行了会谈”时，他目瞪口呆。国务卿破口大骂着发了一封信息给可怜的西博尔德，要求他提交一份有关麦克阿瑟会谈的完整报告。西博尔德说他试图拿到一份，但将军先是“露出了倦容，承诺稍后给我讲述这趟旅程”，然后又“表明自己不打算告诉我细节”，解释称他一直谨慎地将讨论限制在“技术性质的军事对话”范畴之内，所以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与国务院无关。西博尔德提出了抗议；他指出，军事协议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麦克阿瑟不耐烦地回答：“比尔，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台湾政策早在6月28日就按照杜鲁门总统的命令生效了，派遣第七舰队防止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发起任何冲突。”他说，他已经将自己与委员长的会议纪要完完整整地发给了国防部。但艾奇逊并没有就此满足。他想要借由他在东京的大使书写一份将军亲口陈述的报告。但他并没有得偿所愿。双方陷入了僵局。闷闷不乐的西博尔德察觉到“美国驻东京当局与华盛顿政府之间的嫌隙正日渐扩大，如不加以调整，只会导致灾难”。

麦克阿瑟显然与西博尔德英雄所见略同。他私下里告诉西博尔德，他肩负的保护台湾任务因为国务院对待蒋介石的“不友好”态度而变得纷繁复杂（若是委员长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推心置腹，保卫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然而，他却罕见地公开发表了安抚性声明。他表示，他此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到访台北的举动会被解读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恶意的”。他仍旧不明白这一结论是如何被推断出来的。如果他做错了，他感到很抱歉。8月5日，他告诉媒体：“为了不损害世界的利益，长期政策在被颁布之后若需顺利被执行是需要耐心的，而偶尔运用这种程度的耐心对我来说是格外困难的。但我还是约束自己、尽我所能。大致上来讲，我对事情的进展感到十分满意。”迄今为止，大家对麦克阿瑟都抱持着同情的心理。这一行动并不是他的主意，可他却一直表现得小心翼翼，就连他的声明（如果他必须发布一则声明的话），也是那样的审慎周到。他的难处在于，那时的蒋介石就相当于美国外交中的疾病传播者。任何与他接触的人都岌岌可危。

艾奇逊坚持要谴责将军，于是国防部部长约翰逊提醒将军，他必须继续阻拦国民党针对中国海岸发起的任何突袭，还言辞犀利地补充道：“除了作为总司令的总统之外，没有人有权下令或授权预防措施防止军事力量在大陆上集结。”麦克阿瑟回复说，他“理解”并将“一丝不苟地”遵循这一指令。但为了加倍确认、避免进一步的尴尬，杜鲁门将自己的无任所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送去了东京，用总统的话来说，此举是为了“方便将军能够得到华盛顿整治计划的第一手描述”。

在空军将军劳里斯·诺斯塔德和陆军副参谋长马修·B. 李奇微的陪同下，哈里曼于8月6日上午9点15分在羽田机场见到了麦克阿瑟。哈里曼后来向杜鲁门汇报：“在乘车前往大使馆招待所的途中，将军热情洋溢地描述起了自我上次来访日本以来这里取得的令人满意的政治发展。他说了很多有关日本的事情，他对工作的热情，在工作中对日本人的满意之处，以及他对工作尊严的尊重。出于好意，他还把目前的境况与自己在美国时过得更加奢华却没有太多工作要做的日子做了对比。”尽管美国人可能会忘记这一点，但最高统帅仍旧肩负着日本统治者的全部重担。哈里曼清楚，心平气和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才是将军最享受的角色，而非远东总司令。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总统的这位大使飞去釜山匆匆视察了联合国军的战线，并与将军进行了超过8个小时的会谈——这些对话有时是两人单独进行的，有些则是在诺斯塔德和李奇微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一天过后，一位副官向记者吐露，这两个人“意见几乎是一致的”。不过，没有人得知相关细节，连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官报对此都只字未提。“实际上，”西博尔德指出，“我们完全不清楚哈里曼此行的根本目的……尽管此事绝对是和我们利害攸关的。我们只能和别人一样猜测，总统力图加强他的严格政策，不允许将台湾作为对大陆发起军事行动的基地。”

这就是问题的主旨。麦克阿瑟承诺迅速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在入冬之前发起攻势，因为延迟会增加中国介入的概率。他预测，如果毛泽东想要夺取台湾，他必将亲自坐镇指挥，“彻底击败对方，使这一役成为世界上的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然而，大部分时间都被花在了讨论台北和华盛顿之间不可靠的关系上。将军认为蒋介石绝不会反攻大陆。不过他开玩笑地暗示，“通过让蒋登陆来摆脱他也许是个好主意”。他表示自己的问题是战略性的。承担起保卫台湾的角色之后，他的活动能力被国民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削弱了。“粗暴而轻率地对待蒋介石将无法使我们的地位得到改善。”他说，“我希望总统能够行动起来，缓解国务院与委员长之间的压力。”这样的诉求是合情合理的，可他紧接着又滥用外交特权补充道，自己“永远”不会承认北京政权，因为那样会增强毛泽东的威望。他说，毁灭对方的威望应该是美国的目标。

哈里曼解释道：“总统希望我转告你，你不能允许蒋介石向中国大陆开战，否则将会把我们拽入一场世界大战之中。”他说，纵容重整旗鼓的国民党对大陆展开全方位的进攻不是美国的联合国盟友们支持美国进驻半岛、抵御朝鲜入侵的意图。麦克阿瑟回答：“作为一名士兵，我将遵守总统下达给我的一切命令。”然而，他却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派遣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上巡逻有利亦有弊。此举为蒋介石提供了掩护，但也“保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他的情报，美军的行动已经让中国南方的两个解放军集团军放下了防御姿态。日后他还会提出警告，提醒华盛顿方面。

哈里曼回忆，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听到，将军在前往羽田机场送客时“大声”地喊道：“您此行唯一的错误就是停留的时间太过短暂。”大使在回程的飞机上为杜鲁门书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麦克阿瑟到访台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相信最高统帅是忠于“宪法权威”的。在此基础之上，他认为“我们的政府应把政治和私情放在一边，应该按照崇高的层面来对待麦克阿瑟将军这样有价值的国家人才”。不过，哈里曼继续写道：

> 出于某些很难解释的原因，我不认为双方在应该如何对待台湾和委员长的问题上达成了完全共识。他承认总统的地位，也愿意据此采取行动，却并非完全心服口服。他的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任何与共产主义为敌的人，尽管他无法辩白委员长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为何能够有效应对中国共产党。我向他指出，美国与蒋介石……在台湾的未来——换句话说，在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势力的手中这一问题的态度方面……存在的基本利益冲突在于，蒋介石的雄心壮志仅仅在于将台湾作为自己反攻大陆的垫脚石……我详细解释了蒋介石为什么会对我们不利，以及联合国分裂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我还指出在友好国家中维持联合国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并说明了在处理大陆和台湾问题中的任何失策可能会造成的纠纷。

总的来说，杜鲁门感到很安慰。不考虑台湾问题，他与安理会如今和将军都相信“我们应该支持任何与共产主义为敌的人”。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既然他的远东司令显然愿意服从政府的命令，他与麦克阿瑟之间就台湾问题的看法就是一致的。总统事后写道，他“以为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了”。然而事与愿违，他会明白，就连警告将军都是有危险的。哈里曼离开三天之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发布了一条新的宣言，严厉指责那些将他的台湾之旅理解为政治举动的人。他表示，这次访问“在公众面前被那些过去一直在太平洋地区宣传失败主义和绥靖主义的人蓄意丑化了”。鉴于“失败主义”和“绥靖主义”恰好是共和党批评家用来形容政府在亚洲的行动方案的词汇，麦克阿瑟似乎又回到了战场上。西博尔德就这一新的事件表示“深感苦恼”。他说：“这些公开声明通过展示我们领导力的分歧和国家意志的薄弱点给敌人提供了帮助和安慰。”他事后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军管理着击溃了日本的胜利同盟，如今，“同盟本身却成了麦克阿瑟不断与外界发生冲突的第二战线”。

此事发生在星期四。星期一那天，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给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去了新的指示，再一次以“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要求不得仓促发起全面战争或为别人发起全面战争提供借口”为由禁止国民党越过台湾海峡出击。将军犀利地回复道，自己完全理解总统“保护共产主义大陆”的决心。这是无礼的。如果华盛顿打算对他采取强硬政策，现在正是时候。

然而杜鲁门反倒通过改变自己对台湾的立场来鼓励他。麦克阿瑟曾经推荐派遣军事代表团前往。总统如今批准了这一请求，命麦克阿瑟的参谋对蒋介石的陆军有何需求展开调查，沿中国海岸进行飞行侦察，并“加强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上述举动其实都是政治而非军事行动：策略的设计都是为了缓解共和党和“院外援华集团”给白宫方面带来的压力。但将军是无法知道这些的。正如克拉克·李所说的那样，他“正为美国抛弃蒋介石的政策发生了明显逆转而洋洋自得”。同一个星期，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领袖克莱德·A. 刘易斯邀请将军发送一条信息，供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协会年度露营活动中宣读。惠特尼告诉我们：“麦克阿瑟认为这是向公众展示自己坚定站在总统这一边的好机会。”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保持沉默的好机会才对。美国针对他所在战区的政策可谓变幻莫测，就连最靠近椭圆形办公室的人都很难跟上变化的脚步。尽管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将军心急如焚地想要在政策中看到自己想看的内容，却无权把它解释给退伍军人或任何人听。可麦克阿瑟依旧在埋头前进。他写信给刘易斯，“考虑到有关台湾与我们在太平洋的战略潜力之间的关系存在错误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应该明智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没什么能比‘保卫台湾就会离间我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陈词滥调更不可靠的了。说出这番言论的人不了解东方。他们不明白东方人的心理是尊敬和追随进取、果断而又充满活力的领袖——胆怯或踌躇的领导人很快会遭到唾弃。他们完全低估了东方人的心态。在过去的5年内，没有什么比美国决心保护好自己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地位壁垒更让远东受到鼓舞的了。”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台湾岛——麦克阿瑟形容它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他说：“台湾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落入对美国不友善的大国手中”，将会在美国的太平洋战略部署中央“形成突出部”。他还指出：“从历史观点上说，台湾一直都是扩张的强国的跳板。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在‘二战’开战时利用它作为集结待命地区和多支侵略运兵舰队的支援基地，使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继续说道，对那些“支持奴役、反对自由，支持无神论、反对上帝的人贪婪的思想”予以还击是必不可少的。在总结中，他提到总统毫不退让地抵制朝鲜入侵的决心“在整个亚洲点燃了一盏本来就快要熄灭的希望之灯，为远东地区争取自由的道路标明了焦点和转折点，一举扫清了让许多人在困惑和诱骗之下脱离实际的所有伪善与谬见”。

据惠特尼回忆（没有人曾否定过他的话），将军这封不同寻常的书信的副本于8月18日被递交给了陆军部。此时，距离这封信被拿去当着海外退伍军人协会代表们的面诵读出来还有10天的时间。在陆军部里，这份副本会遭到冷遇（要么被存档，要么就无人理会），直到为了例行公事，出于好意分发给报道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新闻的记者们。在共和党人看来，第一位注意到这封信的华盛顿高官是政府中首要的伪君子和诡辩家。一位美联社

的记者于8月25日星期五晚给迪安·艾奇逊打了一个电话，并在电话中为他念了信中的内容。国务卿在咨询了所有同僚的意见之后写道，他们全都“为信中内容的厚颜无耻以及麦克阿瑟的言辞给国内外带来的危害作用感到义愤填膺”，并“同意这样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到那时，白宫新闻发布室已将这份声明的副本送去了总统办公室。杜鲁门把其中的内容理解为：“基于台湾的立场提倡军事侵略政策。信中的主旨谴责的恰好是他最近才向我承诺愿意支持的那些政策。我的心中毫无疑问，整个世界都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它，而这应该就是他本来的意图。”

距离退伍军人大会开幕还有3天的时间，但想要禁止将军发表这篇声明已经为时已晚。当周，《生活》杂志已把这篇声明当作社论进行了发表，此刻正在印刷之中；刊登了声明全文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正在邮递的过程中。在英国，《观察家报》、曼彻斯特《卫报》、伦敦《泰晤士报》都准备声讨它。正如韦恩·莫尔斯后来指出的那样，如果这篇声明已经被将军亲自发表，它的影响可能还不会这么大。在总统看来，事情发生的时机也糟糕透顶，他才刚刚提议联合国对台湾局势展开调查，希望能够减少远东地区的冲突。总统感觉“麦克阿瑟将军表达的信息（可能会被世界各国理解为美国的政策标书），与此互相矛盾”。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一天前，海军部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刚刚在波士顿发表了一篇演说，公开主张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而路易斯·约翰逊也向记者们坦诚，他支持马修斯的看法。看上去，杜鲁门仿佛对自己的政府失去了控制。

总统写道：“（我）严肃思考过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陆军远东总司令职务，由布莱德雷将军来代替他。我可以让麦克阿瑟继续指挥日本占领军，把朝鲜半岛和台湾事务从他的手中抽走。不过在一番仔细权衡之后，我决定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因为此举不免有降职之嫌，而我个人也不想伤害麦克阿瑟将军。我关心的只是要让世界知道他的声明不是官方政策。”至少还有两件事情需要他去关心。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也知道抑制麦克阿瑟的权威会在美国引起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而他不可能在不开除马修斯和约翰逊这两位朋友和优秀民主党人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应该针对将军做些什么。于是，星期六一早，他召集艾奇逊、约翰逊、哈里曼、几位联席参谋长、财政部部长约翰·W. 斯奈德和约翰逊的副手史蒂夫·厄尔利前来参加军事会议。

用艾奇逊的话来说，总统“紧闭着惨白的双唇”，省掉了日常的问候，直接要求他们投票表决，并挨个询问他们是否事先知道将军写信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事情。没有人知情，杜鲁门事后写道，这件事情“令所有人都感到惊奇和震惊”。他说他希望麦克阿瑟公开收回自己的话，紧接着，仍旧带着愠怒，他高视阔步地走出了会场。他的指示看似简明，却在离开之后让剩下的所有人都无所适从。谁都不清楚下一步是什么，又该如何达成一

致。对于联席参谋长们来说，麦克阿瑟是个可怕的人物。厄尔利显得很不安，他认为让麦克阿瑟公开收回自己的信违背了他言论自由的权利，于是提议让总统和将军进行远程会谈。总是需要吃力不讨好地和麦克阿瑟打交道的国防部部长约翰逊建议允许退伍军人们听到这封信的内容，事后再宣布它“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并非是政府的官方政策”。国务卿对此持反对意见，挖苦讽刺地指出此事在他看来是有关“谁才是总统”的问题。仍旧很不高兴的约翰逊坚称：“我们有胆量发送一条信息，说总统命令他收回自己的话吗？”艾奇逊回答，既然这是杜鲁门的命令，他们就别无选择。当天下午，约翰逊不情愿地给第一大楼发去电报：“美国总统命令你收回自己发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报文，因为文中某些涉及台湾问题的特写与美国政策以及美国在联合国中的立场存在冲突。”

麦克阿瑟立即遵循了这一命令，但他说，他“彻底惊呆了”。他要来一份报文的副本，重新审查一边后写道，他“找不到任何没有全力支持总统的内容”。他回复约翰逊：“我的报文是我精心准备的，是完全支持总统的政策主张的。其中的评论也是为了支持总统的公告故意为之的。我不明白这篇文章怎么会被解读成别的意思。”他受到了伤害，满心愤怒，并且觉得自己的话也不无道理。他确实动辄无礼粗暴、惹人恼火，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唯一的罪过就是只看到了杜鲁门台湾宣言的表面价值。总统在联合国遵循的是一条道路，而在搪塞国会山上那些批评他的人时采取的又是另一套路子。麦克阿瑟相信政府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国防系统中的一环、决心不让它落入敌对势力的手中，他无意间在世界政坛上让总统出了丑。他开口说些什么都是不对的——不合时宜的台湾之旅应该教会了他这一点。但在白宫想要告诉美国人民些什么方面，他理解的是对的。

这一激烈冲突刺激了他的妄想症。“直到今天，”他晚年时写道，“我还是不知道谁在试图把我的声明误解成正好相反的意思，也不清楚这个人或这些人是如何轻易欺骗总统的。”替罪羊是必不可少的，好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乏恶人——在他推理的时候，他的灵性导师惠特尼给予了他不少的鼓励。惠特尼告诉他，推测这封写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信“无辜”地与“国务院迫于英国的压力并放弃台湾当局而设计的计划”产生冲突是“符合逻辑的”，而且此事“清楚地阐明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邪恶的勾当”。据沃尔特·米利斯观察：“战争期间，一位当真相信政府当局在竭力反对自己的战区指挥官无疑会遭到强迫辞职。”可麦克阿瑟却处理好了这一新的芥蒂，警惕地观察华盛顿方面是否还会发起更多的进攻，并发誓要一下子拔出自己的宝剑，闪瞎和挫败自己的敌人。

将军的办公桌上挂着一个画框，里面裱着这样一句话：“青春不是一段年华，而是一种心境。”不管大家怎么说，他本人依旧精神矍铄。来访的人

都很难相信他已经有71岁高龄了。1950年10月，乔治·肯尼发现：“他还是那样的高大、笔直、优雅，看上去是个风采依旧的男人。他的脚步坚定，眼神清澈、警惕，脸庞和双手都没有一丝的皱纹。他的打扮还是一丝不苟……头发稀疏地贴在头顶上，却没有一根白发。”肯尼听到有人传言说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也会染发，看着他在浴室里洗头，肯尼说道：“将军，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染发膏。我的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了。”麦克阿瑟笑着走出了浴室，用毛巾大力地搓了搓自己的头发，然后举着未被染色的毛巾答道：“它很好，甚至都不会弄脏毛巾。但我不会告诉你它是什么的。”

如果他需要染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动手去做，因为他还像以前那样自负。和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总统一样，他很少允许别人拍摄他戴着眼镜的样子。不过，私下待在使馆里时，他却很少摘掉眼镜。在那里，他才能做自己。身处四壁之中，唯一能够提醒他朝鲜海峡对岸正发生可怕战事的东西便是在战场上拍摄的无声影片。据诺曼·汤普森回忆，每天下午都会有人匆忙把拍摄好的影片送回东京，在播放晚间故事片之前播放给大家看。不过，在播放完毕后的对话中，他却避免谈及片中的内容，大部分时间更愿意聊些家庭话题：比方说，他侄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漂泊的外交生涯，或是他12岁的儿子的第一支舞。穿着当时在美国青少年中颇为时尚的厚底鞋，阿瑟陪伴自己的第二代日裔美国舞伴乔伊斯·山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手下雇员的女儿）前去参加了舞会。和这种场合中的大部分男孩一样，他害羞极了。将军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全部细节。在听完儿子的讲述之后，他还针对如何用计谋胜过对手、博得最漂亮的女孩的芳心为他提出了几条建议。

从前线视察归来、降落羽田机场时，麦克阿瑟的第一句话总是：“琼在哪里？”而她也总会等候在机场跑道旁，蹦着跳着想要看他一眼。可以说，她想让家成为他专属的避风港。在家时，她会把对他在战争中的行为颇有微词的报纸和杂志藏起来，尽管她知道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其他人会从美国寄剪报给他）。她心神不宁地看护他的样子更像是一位母亲，而不是一位妻子。睡前，她坚持要他先钻进被子里，自己再去打开窗户。“可是，琼，我也可以打开窗户。”他会这样抗议。她无视他的反对，会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返回自己的卧室，但不是去睡觉；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她会偷偷地探头进去，确保他已经睡着了。尽管将军时常抱怨，但他对来自她的关注却随着半岛冲突的加剧而变得越来越需要。夜里，将军似乎能够感觉到她是否就在附近。一次，从朝鲜半岛返回之后，他患上了感冒，所以她很早便把他扶上了床；看到他入睡之后，她踮着脚尖走下楼去给阿瑟念书。10分钟之后，他们听到了将军穿着拖鞋慢吞吞走下楼的声音。只见他穿着旧睡袍走了进来，羞怯地笑着对他们说：“大家都去哪儿了？楼上有些孤独。”

不过，早上的他又会成为五星上将，敏捷地四处踱步，在妻子打字的时候掷地有声地说着备忘录。他会把其他的思路草草地写在信封的背面或者是任何一张随手找来的纸片上，然后把它们揉成团、揣在口袋里，待返回第一大楼时再抄写下来。通过改写和编辑打字稿，他发布了自己迂回绕开敌人的伟大计划。“蓝心行动”被重新提起，并改名为“铬铁行动”。将军告诉哈里曼，朝鲜人是他面对过的“既能干又坚忍”的敌人，但他们同时也是软弱的，因为他们之中的精英全都集中到了半岛的东南端，全力以赴地攻打“约翰尼”·沃克的第8军团防御带。如今他打算充分利用这一弱点。早些时候，他向五角大楼方面汇报，试图让联合国军队在釜山前线获得突破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显得优柔寡断，让人想起“一战”时的包围战，会让联合国军队在人民军的矛头前陷入困境，还不如进军对方暴露的两侧和后部。因此，他于7月23日通过电报报告联席参谋长们：“计划于9月中旬实施的行动将由两个兵团从敌人战线的身后进行两栖登陆……可供替代的选择是仅能带来拖延、昂贵战役的正面进攻。”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现在我终于准备好要实现我计划中最伟大的一击了。我充满可能性的汉江计划开始成为现实——深入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包围对方在汉城南方的所有军队。”

伟大的迂回战术和战争的历史一样悠久，但只有拥有军事天才的指挥官才能成功地实施这种战术。汉尼拔就曾在布匿战争中熟练地调动自己的骑兵，反复使用迂回战术；拿破仑也曾写到，自己曾于1813年对抗特雷维索时为减轻敌军对阿迪杰河的压力使用过这种方法：“……这是我做事情的风格和方法。”这也是罗伯特·E. 李的作战风格，他利用杰克逊在钱瑟勒斯维尔发动的战役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麦克阿瑟也早就开始使用这一方式指挥作战了。他曾在新几内亚—菲律宾主线上展示过自己的这一技能，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荷兰迪亚战役。不过，朝鲜半岛上的胜利一击还是取决于速度；苏联人正急匆匆地给他们的人民军运送水雷。很快，韩国的港口里就将布满这些炸弹。将军对自己快速调兵遣将的能力毫不怀疑。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他“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视野和行动敏捷是伟大指挥官的品质”。海军上将阿瑟·D. 斯特鲁布尔回忆，“麦克阿瑟最伟大的特质之一便是着手之后迅速出击”——但想要说服五角大楼方面跟上他的脚步却更加困难。

在杜鲁门的第二届任期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奥马尔·布莱德雷。麦克阿瑟相信这位主席会因为自己曾于1945年计划进攻九州时拒绝过身为资深指挥官的布莱德雷而憎恨自己。看起来这位主席应该不大可能忍受这样的怨恨，纵然他对在朝鲜战场上发动由海到陆的包抄战略不以为然。1949年，他在某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做证时说道：“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发起另一场大规模的两栖行动。老实说，适时投放的原子弹几乎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还不是布莱德雷最具先见之明的时刻，也不是联席参谋长

们不情愿批准麦克阿瑟宏伟计划的唯一基础。陆军兵力极度短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华盛顿方面决心加强欧洲卫戍部队。柯林斯告诉身处第一大楼的远东总司令：“将军，你必须依靠日本和朝鲜半岛可供调遣的兵力赢得这场战争。”据阿瑟·W. 雷德福回忆，麦克阿瑟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乔（柯林斯），你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想法了。”将军用一封又一封信息炮轰五角大楼方面，向他们解释发起两栖攻势的原因：此举将把人民军卷入一场带有两条战线的战争，让他们的士兵挨饿，切断他们的通信，夺取一个大型海港，并通过夺回汉城在心理上给敌人重重一击。他相信参谋长们会向他屈服，因为他知道，正如1797年圣文森特角（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一役前约翰·杰维斯面临的处境一样，“一场胜利对于此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果真，7月25日，参谋长们退让了，同意为他提供海军陆战队来带路。小罗伯特·D. 海纳尔写道：“麦克阿瑟的计划如今有了优势。”

几乎没过多久，华盛顿方面就陷入了令人极度痛苦的犹豫状态之中。将军模棱两可地不肯说明自己打算让部队在哪里上岸的行为着实让人抓狂。如今参谋长们开始怀疑他有理由隐瞒其中的原因。事实的确如此。他选择了半岛上最没有登陆可能性的港口：位于釜山以北150英里处的黄海边、距离首尔最近的登陆区域仁川。仁川和泽西城的大小相差无几，和利物浦一样丑陋，又和贝尔法斯特一样沉闷。这里的锚地十分隐蔽，海水常年无冰，但是，（正如海纳尔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是仁川作为一个两栖军事攻击目标的全部了”。当麦克阿瑟向行动的执行官、海军少将詹姆斯·H. 多伊尔透露这一计划时，多伊尔目瞪口呆。他知道仁川没有海滩，只有码头和防波堤。进攻部队不得不在城市的中心登陆，而靠近城市的海域又很容易被布雷；那里有可能已经满是雷区。水流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8海里。上百个弯曲处之中，一艘沉没或损坏的船就能堵住防浪堤和挡水板交织的小小海湾。舰船从海中奋力前进、在飞鱼海峡的岩石和暗礁中穿行，发现目标被一个低矮、坚固的障碍物掩盖着。那里就是登陆码头之前必须占领的突出部月尾岛。

最糟糕的是，这片区域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浪潮。实际上，这里潮汐潮差达32英尺仅次于芬迪湾。除了高潮期，港口的水位下降之后会露出宽旷、潮湿的灰泥平原，导致船只完全无法移动。1950年，海浪高度能够适应两栖船和登陆舰的日子便只有9月15日、27日以及10月11日。9月15日是最理想的——麦克阿瑟从未考虑过其他的日期。但高浪首先于黎明时分便达到了顶峰，而笨重的运兵船来不及提前穿越狭窄的通路。第二次涨潮在日落后半小时来临，对于日间进攻来说又太迟。为了这一次的攻势，将军挑选了7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陆军，并将这支名为美国第10军的部队交由他的参谋长——坏脾气的内德·阿尔蒙德指挥。在第一次涨潮后的两个小时之内，他们需要将尽可能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送上海岸；12小时之后，第二波高潮才能运送增援部队上岸。多伊的枪炮官事后提到：“我们起草了一

份清单，列举出了所有自然地理方面的不利条件——这些障碍仁川一样都不少。”多伊尔的通信官说：“做一张两栖登陆行动的‘禁忌’清单，你就能准确描述出仁川行动的境况了。”

麦克阿瑟没有理会他们。他指出，1894年和1904年时，日本人就曾在仁川登陆并夺取了整个朝鲜半岛，把敌人赶到了鸭绿江对岸。注 愤怒的海军军官们指出，那是因为19世纪的舰船吃水深度更浅。将军平静地回答，他确信问题会得到解决的。他们满腹狐疑，而海军陆战队队员、斯特拉特迈耶的飞行员和麦克阿瑟自己的参谋也不相信他的话。包括沃克在内（他的第8军团将在成功打击敌人后部之后得到自由），东京的每一位海、陆军军官都试图说服他放弃这个念头。与此同时，时间也变得越发紧迫。一部分海军陆战队已经从圣迭戈起航，然而用一位军官的话来说，五角大楼方面“还并不知道这次行动的名称”。8月20日星期日，彻底警醒的联席参谋长们如今知道了远东总司令的目标，于是派遣两位成员柯林斯和福里斯特·P. 谢尔曼，（按照柯林斯的话来说）前去日本“查明计划到底是什么”。星期三下午5点半，麦克阿瑟前去迎接了他们的飞机，并在第一大楼里召集了一次战略会议，探究解决这一问题。

这两位参谋长从一开始就明显是来劝阻将军的。将仁川登陆战形容为“不可能的事”的柯林斯推荐了100英里以南的群山海港作为替换选项，那里既没有仁川的不利条件，也更靠近釜山的滩头。海军陆战队的小莱缪尔·C. 谢泼德热心地对这一提议表示赞同。谢尔曼（麦克阿瑟知道自己必须说服这个男人）什么话也没说，脸上的表情十分冷酷；据谢泼德的日志显示，一天前，谢尔曼上将曾言辞激烈地表示自己“反对这一建议规划”。一小部分海军军官也在发言中指出，将军的目标违背了他们的两栖作战圣经《USF–6》中所有的7条标准。远东总司令的军官们各个阴沉忧郁、默不作声。最终，在9位批评者完成了80分钟的演讲之后，麦克阿瑟站起身来。他事后写道：“我等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感觉房间里的紧张情绪正在逐渐高涨起来。阿尔蒙德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身体。如果说这世上有某种沉默是有意义的话，此时此刻就是了。我几乎能够听到父亲许多年前曾对我说过的话：‘道格，军事会议会滋生怯懦和失败主义的思想。’”

多伊尔说：“如果麦克阿瑟是个演员，他必会遮盖演员约翰·巴里摩尔的光辉。”在接下来的30分钟“演出”中，将军告诉他们，“你们刚刚就行动不可能实施的问题所做的论述”让他坚定了自己对这个计划的信念，“因为敌军指挥官也会推测不会有人心急到做出这种尝试”。他说，出其不意“是战争胜利最直观重要的元素”。一瞬间，将军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在小学时全都学过的一课：“1759年，因为认为武装部队不可能攀上魁北克城墙以南险峻的河岸，蒙特卡姆侯爵将自己强大的守军全都集中在了城市北边更加薄

弱的河岸边。然而，詹姆斯·沃尔夫将军却率领一支小分队逆圣劳伦斯河而上，爬上了陡峭的河岸。在亚伯拉罕平原上，沃尔夫几乎完全是依靠出其不意赢得这场令人震惊的胜利的。由此，他夺取了魁北克，实际上终结了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和蒙特卡姆一样，朝鲜人也会将仁川视为不可能登陆的地点。而和沃尔夫一样，我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他说，两栖登陆“是我们拥有的最强大工具”。要想适当运用它，“我们必须狠狠地深入出击”。仁川的障碍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是无法克服的”。他说：“我对海军胸有成竹，事实上，我对海军的信赖似乎比海军的自信心还要充足。”看着谢尔曼，他说道：“海军过去从未让我失望，这一次也不会让我失望。”至于在群山发起登陆行动，他认为将会是无效的。“这将是一次无效的包抄行动，因为它根本就无法围阻敌人。”所以说，一次“仓促的包抄”是徒劳无功的。“就算不采取侧面进攻行动都比这样做要好。唯一的结果就是帮助沃克的部队……坦率地讲，就是派遣更多的部队去支援沃克‘坚持下去’，而坚持下去是不够好的……敌人只会退回自己的补给线和通信线。作为仁川‘唯一的替代选项’，群山将延续我们在釜山的残酷牺牲，看不到慰藉的希望。”他充满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你们乐意让我们的军队留在血腥的防御带中如同牛群一样任人宰割吗？你们愿意为这种悲剧承担责任吗？我肯定是不愿意的。”

他说，通过先后突袭仁川和汉城，他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封锁整个半岛南部……夺取汉城之后，我将使敌人的补给系统完全瘫痪——不管是进是出。此举随后将麻痹沃克的敌人的战斗力量。没有军火和食物，他们很快就会变得无助而紊乱，轻而易举就能被我们补给充足的小型军队击败。”他指了指挂墙地图上的仁川，说道：“先生们，这就是我们的铁砧，而约翰尼·沃克可以从南部粉碎它。如果我的登陆计划出现了错误，我会亲自前往，立即撤离我们的部队。”被煽动的多伊尔开口说道：“不，将军，我们不知道怎么撤退。一旦我们开始登陆，就会一直勇往直前。”麦克阿瑟打动了他们。当另外一个人指出敌人的炮火可能会封锁海峡时，仍旧十分倔强的谢尔曼嗤之以鼻地回答：“我是不会犹豫在那里乘船（撤退）的。”将军厉声说道：“说起话来就和莽撞的法拉格特一样！”他压低了嗓门总结道：“我几乎能够听到命运的秒针在滴答作响。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仁川会成功的。这将挽救10万人的生命。”

过了一分多钟的时间，他的听众们才在椅子上挪动起来。不一会儿，谢尔曼说道：“谢谢你。这是伟大事业中的伟大声音。”上将告诉谢泼德，他认为将军的话“引人入胜”，并告诉另一位军官：“我要支持仁川行动。我认为它是可靠的。”可随着远东总司令的魅力逐渐消失，他们又有了新的考虑。第二天，谢尔曼不安地说：“我希望我能拥有这个男人的积极乐观。”柯林斯希望继续把群山当作替代选项，而某将官则相信他“被麦克阿

瑟施了催眠术”，沮丧地称仁川只有“五千分之一的机会”。尽管如此，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也就是4天之后，参谋长们通过电报通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在复查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上将带回的消息后，我们同意准备并执行两栖部队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迂回行动，如果敌人的防御被证明是无效的，行动可以在仁川或更有利的仁川以南海岸进行……我们理解，为了更好地利用情势的发展，替代计划也在制订当中。”

尽管有些昏暗，这依旧是一个绿灯。显然参谋长们也在注意自己的侧翼。9月7日，也就是登陆战发动前8天，麦克阿瑟收到了他们发来的官方报告。他事后写道：“这些报告让我的骨髓都凉了。”他从报告中得知：“他们十分关切地注意着朝鲜半岛最近的情势发展。‘根据可供第8军团调配的所有后备力量。’他们继续写道，‘我们希望你能就计划行动的灵活性和胜算做出预估。’”麦克阿瑟用铅笔草草写了一封回信：“我的心里毫不怀疑行动的灵活性，并认为行动的胜算很大。”布莱德雷与杜鲁门完成会谈之后，参谋长们再次聚集到了一起，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封含义模糊的电报：“我们批准你的计划。总统对此也已知晓。”麦克阿瑟冷冰冰地告诉自己的参谋，这和其他消息一样，意味着五角大楼方面正在“提前准备托词，以防行动遇到麻烦”。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的是，仁川的胜利将让他显得所向披靡，而让参谋长们显得软弱无力——用李奇微的话来说，那时他就可以说：“为了让部队在水上行走，总得有人做好准备去试一试。”

在战争的历史上，总会出现某些杰出的精英部队，在压倒性的胜算面前展示自己的勇武：温泉关战役中的希腊人与波斯人、色诺芬的万人军，阿让库尔战役的弓箭手、西班牙的方阵、卡马龙之战中的法国外籍军团、1914年的“老不齿”英国远征军以及敦刻尔克的警卫旅。还有仁川的第1海军陆战队。这支由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格洛斯特角、贝里琉和冲绳浴血奋战的老兵们组成的部队是一股优势力量，经踌躇不决的联席参谋长们批准、于9月15日被麦克阿瑟送上了海岸。处于巅峰状态之中，这些接受过两栖作战完整训练的士兵如今找到了唯一一位能够真正理解两栖战的指挥官。他们代表了美国最大胆的部队，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又是这个国家的资深军官。他的一个下属表示，他的地位“仅次于上帝”。海纳尔写道：“要想找到一位能与麦克阿瑟并驾齐驱的军官（包括资历、技艺、独裁统治、自负和个人风格），我们能想到的就只有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参加过美墨战争）了。”

斯科特将军提到自己与波尔克政府之间激烈的关系时说：“我并不想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身后是燃着烈火的华盛顿，面前则是熊熊燃烧的墨西哥。”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部队交融在一起，让战争部的情报员们鞭长莫及。与此相似，麦克阿瑟也决定利用战术亲自出征。为了躲开

此刻正位于硫磺岛和九州岛之间的齐吉亚台风所带来的风险，将军提前3天离开了东京，随身携带的布袋里装着琼为他准备的备用烟斗、香烟和雪茄、两套换洗衣服、盥洗用品、刮胡刀、刮胡刀皮带以及他的幸运浴袍。他带着参谋乘坐他的新座驾“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号离开了羽田机场，身后跟随着搭乘“巴丹”号的一行记者。在九州福冈机场降落之后，他们在日本崎岖的土路上驱车86英里赶往佐世保；他乘坐的是雪佛兰牌的轿车，而记者们则乘坐蓝色的多用途吉普车。在那里，他登上了“麦金莱山”号指挥舰。

出海后的第一晚，他们就遭遇了齐吉亚台风的袭击。左右摇晃、上下颠簸的舰船费力地朝西驶去，然后在破晓时分转向朝北。恶心作呕的麦克阿瑟挣扎着走到甲板顶端，望着脚下黄海中含有大量泥沙的深黄色海水。台风渐行渐远。他为了娱乐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讲了讲自己对一些名人的印象，引得身穿白色制服的食堂服务员纷纷凑过来偷听。他认为哈里曼将成为下一任国务卿。路易斯·约翰逊的辞职和乔治·马歇尔的接任“似乎让所有人都感到很开心”。杜鲁门憎恨台湾岛上的委员长，因而永远也不会为他提供实在的帮助。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一位军官暗示艾森豪威尔缺乏领导力时，麦克阿瑟竟然开口为他说话。在谢泼德日后的回忆中，将军的独白是“最具启发性的对话”，可一心只想着即将在远方打响苦战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奥利弗·P. 史密斯却觉得“他言语中的自大有点儿让人感觉厌倦”。

9月13日星期三，4艘盟军巡洋舰进入了仁川海港。美军驱逐舰朝着岸上的炮位发起了攻击。紧接着，4艘航母上搭载的战机开始炮轰防御堡垒。很快，第二天夜里，规模庞大的联合国舰队（7个国家派出的261艘船只）越过了飞鱼海峡。麦克阿瑟在登陆前一晚很早就上床休息了，希望能小睡一会儿。然而他失眠了。一位海军哨兵叫醒了惠特尼，告诉他将军想要见他。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在小小的船舱中踱着步，两手深深地插在浴袍的口袋里，开口说了一句“坐吧，考特尼”，然后继续在甲板上一边踏步一边自言自语起来。他说，他知道自己在赌博，也知道他们也许正驶向一场灾难。紧接着，他回顾了一下自己的选择。显然，他们必须为釜山解围。但他不知道此时能否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不。”他得出结论，“这是个合理的决定。我们必须接受它的风险与危害。”他拍了拍副官的肩膀，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爬回自己的床铺，摊开了一本圣经。走出门外，惠特尼听到船上的钟敲了5声——凌晨2点半了。

凌晨5点08分，“麦金莱山”号下锚。凌晨5点40分，8英寸大炮开始朝月尾岛开火。多伊尔按照惯例发出了信号：“登陆部队登陆。”那时，两架朝鲜米格–15战斗机朝着前面的巡洋舰猛冲过来。将它们双双击落之后，惠特尼匆忙跑到船舱下面提醒将军情况危急。好不容易睡着了的麦克阿瑟打着

哈欠翻了个身。“如果他们再进攻这艘船，”他说，“你再把我叫醒，考特尼。”不过，随着头顶上越来越喧闹，他还是起身吃了早饭，加入了站在船首观战的军官之中。“正如林加延海湾一样。”他和着战舰的齐鸣声伸手拿起自己的双筒望远镜，寻找可以稍坐的地方。谢泼德写道：“他的参谋围在他的身旁。他坐在海军上将的椅子上，头上戴着装饰着锈迹斑斑的穗带的老巴丹帽，身上穿着一件皮夹克。在他继续观察海军炮火时，摄影师们全都在忙着为他拍照——而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仰慕者。”月尾岛很快落入了第5海军陆战队的手中，美国仅有17人受伤。听说伤亡情况并不严重，麦克阿瑟喜笑颜开地说道：“每天因为交通事故丧命的人都比这个要多。”他告诉多伊尔：“告诉舰队成员，今天早上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最闪耀的时刻。”紧接着，他邀请全体船员和他一起喝咖啡。他满面红光，也许还有些沾沾自喜地起草了一份发给联席参谋长们的急件：“登陆第一阶段在损失轻微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他依然感觉他证明了自己都是对的，情绪也进一步高涨起来。就在这时，登陆部队那里传来消息，说他们在岛上发现了大型防御工事新铺设的地基。如果他们等到下一次涨潮时再发动攻势，面对的可能就是一座堡垒了。

海潮正在退去。麦克阿瑟踏上驳船，命令舵手送他上岸，但时间已经太晚了，海水已经开始退潮，暴露出阻隔在他和海滩之间的泥沼地。距离他不到1 000码的敌军枪口开始朝他闪烁。据一位正在一旁看着他的驱逐舰指挥官回忆，他蔑视地“用拿破仑式的姿势”笔直地站了起来。谢泼德说：“将军，你靠得太近了。有人会想要扫射你的。”麦克阿瑟阴郁地点了点头，一脸渴望地瞥了瞥他和陆地之间的距离，嘴唇无声地做了一个口型说道“我很抱歉”，然后才示意舵手掉头。重新返回“麦金莱”号之后，他对史密斯说：“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尽快夺取金浦。”占领机场的行动还要等到黄昏时分主要登陆行动完成之后才能进行，而后者将是此次行动中最棘手的一部分。水手们必须在黄昏前将8艘坦克登陆舰拖上狭窄的红海滩，像在停车场里停车一样将它们并排停好，然后趁着海军陆战队队员冲过2英里的石头堤道，爬上9英尺高的防波堤，沿着滩头占据开来，用一整晚的时间来卸船。日出时，他们跟在笨重的坦克后面朝着内陆以扇形分散开来。麦克阿瑟在船的前部舱壁铺开地图跟进战事的发展。直到星期日，他和他的随行人员才登上海岸，在史密斯的欢迎下攻占了仁川。在那里，沉浸在自己最伟大的一场胜利中，总司令终于摆脱了困扰了他一整个星期的可怕压力。那种被他称为“早就熟悉了的恶心感”（从他还是西点军校应考生的时候便已出现，并在他到白宫与罗斯福对峙之后重演过的干呕感觉），再一次涌上他的喉咙。他找了个借口走开了，摇摇晃晃地迈了几步，俯身吐了出来。

不一会儿，他又找回了那个蔑视战场危险的自己。他指着已死去敌军士兵的尸体告诉一位军医：“这个‘病人’永远都不会需要你去忙活了，医生。这

具尸体在老眼昏花的我看来倒是挺舒心的。”说着，他爬上了一辆吉普车，一路上碰到了不少被海军陆战队攻击机炸翻的人民军装甲坦克残骸。“鉴于这些坦克都产自苏联，”他咯咯地笑着说道，“它们的下场正是我想要的。”令谢泼德和史密斯沮丧的是，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说道，如果将军想要看一看刚刚被摧毁的人民军坦克，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些。轻武器开火的声音恰好从那个方向传来，而海军陆战队最不想要的就是让最高统帅在自己的战区里丧命。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一位焦虑不安的海军陆战队中尉试图阻拦他，开口说道：“将军，你不能来这里！”“为什么不能？”麦克阿瑟问道。对方回答：“我们刚刚才在山顶上摧毁了6辆坦克。”麦克阿瑟赞许地点了点头。“这就对了。”他边说边爬上山顶，轻蔑地俯视着朝着他的方向开枪的朝鲜狙击手。令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倍感安慰的是，他很快就走下了山坡，嘴里还评论着“下坡对我的老腿来说更容易一些”。他猛地扭过头去望着敌军的步枪手，满怀信心地说自己是对的，这些朝鲜人都是二等士兵，最好的人民军士兵都在釜山前线和沃克作战。

星期日晚上，他又喜气洋洋地给联席参谋长们发去急件：金浦机场已经攻陷。伤亡报告还在不断传来，但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且赢得十分漂亮。最后一声枪响之后，麦克阿瑟在仁川仅仅付出了536死、2 550伤、65人失踪的代价，便打败了3万～4万人民军守军。哈尔西称其为“历史上最巧妙、最无畏的战略方针”。海纳尔写道：“在仁川，麦克阿瑟是大胆的、明智的、自信的、坚定的。那些怀疑他判断力的人（那些想要打安全牌的微不足道的人）就是他的反例。”虽然将军本人形容它是能够伴随军事战略研究长存的“不朽经典”，在描述自己的预言能力时却有些一反常态。他说，如果中国参战的话，它不会被列入“世界决战精选”。

一个不祥的音符迷失在了所有的欢呼和祝贺声中。陪同部队出征的陆军军官之一詹姆斯·M. 加文是“二战”欧洲战区的空降师英雄，代表的是五角大楼方面的武器系统评估组。他在金浦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事情。他回忆：“我惊奇地在机场周围发现了一片精心布置的停机坪和一圈护坡。这些设施是那样的完好，比我在‘二战’欧洲战区里见到的机场还要好。显然，有人在计划中投入了一些复杂的心思，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期待这个机场能够供现代空军使用。如果不是朝鲜人民军在浪费自己的时间（看起来不太可能）就是有一流的空军准备介入这场战争了。”

第二个星期返回东京之后，加文把自己的分析报告摊在了威洛比的面前，指出“这种情报在欧洲战争中都会得到认真对待”，并暗示“中国似乎很有可能介入”。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否认了这个想法。他自信地回答：“如果中国人打算介入，早在我们于仁川登陆时就下手了。”加文表示，他们也许被麦克阿瑟敏捷的用兵速度震慑住了，还没有来得及前来营救朝鲜人。“但

如果他们计划介入。”他争辩，“金浦机场的准备工作肯定就是他们动向的预兆。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就会插手。”威洛比仍旧不以为然。他安慰加文，中国人是永远不会跨过鸭绿江进军朝鲜半岛的。他有他自己的情报来源。他知道。

中国方面起初十分震惊，以至于无法理解联合国指挥官迂回战术的含义，但莫斯科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应。9月23日星期六，《真理报》指责“麦克阿瑟将军把从天涯海角搜集而来的最声名狼藉的罪犯都送上了仁川海岸……美国恶棍们正开枪射击所有被俘虏的汉城居民”。身处韩国首都的《真理报》记者将这座城市与“斯大林格勒”相比较，落笔写道，街道上被货车、装满泥土的米袋和家具堵得水泄不通，随处可见碉堡和坦克的尖头。每一处住宅都武装得像堡垒一样，每一块石头后面都可能喷出炮火。一个士兵倒下时，他的枪会被一个工人、商人或办公室职员捡起来继续开火。

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根本就无力抵抗第10军。星期二，汉城沦陷了。与此同时，沃克的第8军团已经突破了釜山的桥头堡，正迅速冲向大邱—金泉—大田—水原一线。96个小时之内，人民军的一半兵力（5万名士兵）都被困在了麦克阿瑟部队的两面夹击之中。士气低落的人民军幸存者抛下自己的装备，逃往了三八线。在经历了近3个月的失败和围困之后，麦克阿瑟在15天内收复了所有敌人控制下的韩国地区。他的军队盘踞在三八线上，牵制着他们。无论如何，他毫不怀疑自己若是能够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定能击溃金日成其余的部队。西博尔德用一句日本谚语来提醒他——“胜券在握之时更要提高警惕”。但将军朝着汉城北部的山区挥了挥手，满怀信心地回答：“他们很快就会蒸发得无影无踪的。”

反攻大韩民国首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政治性和心理意义的事件，而麦克阿瑟打算郑重其事地利用它。早在5年前，他就曾在马拉卡南宫里正式重建过菲律宾的民事条例。如今，他通知五角大楼方面，他打算在汉城国民大会的拱顶会议室里重新上演这一幕。国务院方面立即提出了异议。比起蒋介石，他们更不喜欢李承晚，而且正打算托管朝鲜半岛。华盛顿方面警告将军，重建大韩民国政府“必须得到上级机关的批准”。麦克阿瑟严厉地回复道：“我不理解你们的意思。”他提醒他们，“现任的大韩民国政府从没有停止运转”，并重申了自己打算将“宪法地位”还给这个政府。出于他的内心信仰，此举对他来说十分重要。身处汉城，和对待马尼拉、台北一样，他偏袒东方的上层社会，但坚信亚洲人必须由亚洲人来统治。他曾在马拉卡南宫留下过眼泪：当斯特鲁布尔邀请他登上停靠在仁川的“密苏里”号后甲板、重访他将日本改造成真正民主国家的起点时，国际新闻社的霍华德·汉德尔曼看到他的眼眶湿润了。麦克阿瑟朝着上将斯特鲁布尔伸出双臂，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你给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飞回家接上琼，他于当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来到了金浦机场，登上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号，而李承晚则紧随其后坐上了“巴丹”号。将军偕同妻子和75岁高龄的大韩民国总统坐上了一辆挂着五星车牌的雪佛兰汽车，身后还跟着另外四辆同样牌子的汽车以及40辆吉普车。到达郊区时，麦克阿瑟的心情十分愉快。乘车穿过汉江上一座新搭建的浮桥，他笑着朝李承晚说道：“这就是我来时经过的地方。”他欢快地向尘土飞扬的道路旁边摇晃着大韩民国纸旗的韩国小孩招手，可当车队进入一片狼藉的城市里时，他清醒了。道路两旁倒着烧得焦黑的石造建筑，随处可见遭过洗劫的商店、被大火焚毁的住宅和学校，就连早就被烧得没了窗户的政府大楼瓦砾里也仍旧燃着火星。就在他们沿着麻浦大街和新村大街行进时，车子在曲折前进中躲避着灰烬和碎石堆，逗得将军笑了起来。正午时分，他和李承晚手挽着手走进了会议厅。一位副官注意到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随行军官每个人都携带了随身武器，于是开玩笑地说道：“自从上一次立法会议以来，这地方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多手枪呢。”麦克阿瑟白了他一眼，吓得他闭上了嘴。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一个献祭的时刻。像“石墙”杰克逊获胜后那样——也像他自己在马尼拉时那样，他站在讲台上宣布，他们将通过背诵主祷词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介入的感谢之情。

拉里·邦克加入了进来，却并没有把心思用在祈祷上。他想起了自己在两年前那个晴朗的星期日随麦克阿瑟飞来这里参加李承晚就职仪式的画面。如今，邦克几乎认不出这个房间了。深紫红色的天鹅绒窗帘还挂在那里，可剩下的就是一片废墟了。建筑的一边侧墙仍在燃烧；辛辣的烟雾从门缝里飘了进来。门外，沉重的火炮声仍在隆隆作响，肆虐的狂风震动着会议厅上方沉重的玻璃镶板上松垮的大窗格。几片玻璃砸了下来，摔得粉碎。大部分军官都匆忙将自己泥饼一样的软帽换成了钢盔，可将军却什么也没有戴地做完了祈祷。他的脸颊上流淌着泪水，却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告诉李承晚：“承蒙仁慈的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军队正在人类伟大希望和灵感启发的旗帜下奋战。联合国解放了韩国这座古老的首都城市……”如今，他说，他将“把民事责任留给他”。李承晚脱离了事先准备好的两段溢美之词，开口对麦克阿瑟说道：“我们敬仰你，如同深爱民族的救世主一样深爱你。我该如何向你表达我本人和韩国人民内心永恒的感激呢？”听完这样一段对话，多伊尔说：“如果周围有任何一位牧师在场，他们全都得再回学校去进修。”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英国记者雷金纳德·汤普森被深深地打动了，以15分钱一个词的价格把将军的整个发言稿（包括主祷词在内）全都发回了国内。

再次登上“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号，最高统帅点燃了一根雕刻精美的气派长柄烟斗，故意迈着长长的步子在走廊里走动起来。他知道，他的下一步至关重要，尽管这并非是他所能做决定的事情。离开李承晚时他说道：“总统先生，我和我的军官们现在将重新承担起军事职责。”不过，定义这些

职责并不是远东总司令的工作。事后，上百万美国人都会以为正是他忽略了白宫发出的在三八线前停攻的命令才挑起中国发起了军事干预。这并不是事情的全貌。6月下旬，联合国的目标曾是把人民军推回三八线——按杜鲁门的话来说，“恢复那里的平静，重塑边境”。但随后的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意却提倡“朝鲜半岛的完全独立和统一”。统一似乎意味着将半岛南北合并在一个政府的管理之下。对此深信不疑的艾奇逊声辩道，我们不能期待部队“行进到勘测员的界线上就停下来”；他说，三八线是“没有政治有效性的”。将军更加谨慎。他知道，1904年时，俄国政府就曾以一个日本人越过三八线为由宣战。他想要在向北逼近之前获得明确的命令。

直到攻下汉城之前，他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所得到的指示一直不够明确。包括华盛顿方面在内，联合国所有国家的首都都在针对将朝鲜附属化的行为是否明智进行争论。乔治·凯南建议艾奇逊：“在整个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反苏联政权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需的，也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国务卿艾奇逊并不认同他的看法。其他人则在来回动摇。9月11日，在琼为即将动身前往仁川的将军打包行李时，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使其成了一份绝无仅有的入侵文件。麦克阿瑟受命“发动必要的军事行动，要么迫使朝鲜人民军退回三八线后，要么就摧毁他们的军队”。如果北京或莫斯科方面“没有介入的迹象或威胁”，他接下来还要“把行动延伸到三八线以北，制订计划占领朝鲜”。该文件指派麦克阿瑟彻底了解出席克里姆林宫和中国方面军事会议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如果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承担风险，美国和联合国方面可是做好了准备。这个选择并非出自士兵的决定，而是来自军外人士。

温斯顿·丘吉尔说：“我喜欢让在海陆空战场上作战的指挥官们感觉到，在他们和各种形式的公开批评之间，屹立不倒的政府就像是一道牢固的防水墙……除非将军们感觉身后有着坚定的政府，否则是绝不会冒险的。”丘吉尔最有名的指挥官蒙哥马利说，将军们“永远也得不到足够的指令”。双方的观点都是正确的。1950年的最后几个月，在美军沿着朝鲜战争发展的轨迹向北反攻的过程中，上述两点都应该被牢记。只要麦克阿瑟获胜，华盛顿就愿意支持他，可永远也没有人告诉他具体该怎么做。路易斯·约翰逊事后在某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做证时提到，当他于9月中旬辞去国防部部长一职时，“并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指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及如何结束这一切”。紧接着就是仁川登陆战。麦克阿瑟将军的全胜似乎支持了他的论点，延迟响应能克制敌人的进攻。登陆当天，联席参谋长们告诉他“可能需要计划对朝鲜实施占领”，却在行动之前让他等待总统的进一步指令。接下来，9月27日，他收到指令，“在三八线以北发起军事行动”，意在“摧毁朝鲜武装部队”。他只需要受到两点制约：禁止派遣战机飞越中苏领土，且只允许大韩民国部队靠近鸭绿江。他在48个小时之内做出了回复，按照惯例接受了这些限制，并提议派遣第8军团夺取平壤，由第10军

在元山东岸港口登陆，并在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后达到将两者“连接”起来的效果。白宫对此表示赞同，可就在做出承诺之后，华盛顿方面又对自己的鲁莽感到有些不安。麦克阿瑟也有所保留，他想要的是更加强有力的授权。汉城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新任国防部部长乔治·马歇尔在一封“密电”中应允了他：“我们希望你在战术和战略上毫无障碍地进军三八线以北。”将军回复道：“直到敌军屈服，我才会视整个朝鲜半岛为我们的军事行动开放。”

马歇尔表示了赞同，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情况并非如此。10月2日，马歇尔收到麦克阿瑟针对即将发起的进攻发给第8军团的一份指示，并给他发来了电报：“我们希望你在不进一步解释或广而告之的情况下进行你的行动，让行动来证明一切。我们的政府希望在任务完成之前避免在三八线上制造争端。”据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副官回忆，这封电报让麦克阿瑟“挑起了眉毛”。这是在明明白白地宣布美国打算把既成事实摆在自己的盟友面前。同一个星期，杜鲁门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对该问题的回复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几天前，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曾经说过，向北进军是联合国安理会的“独立与统一”决议所首选的。一位记者就此提问杜鲁门的看法。总统模棱两可地回答：“这项决议的内容十分广泛。”他想起，自己在另一个场合中曾经说过，联合国必须认可三八线以北的任何行动。他一边回答一边重申联合国必须批准类似的任何战斗计划。但国务院对此并不认可。《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注意到：“（此举）暗示着联合国正在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一回复似乎与国务院发言人的观点产生了冲突，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谜团。”

这对将军来说可不是什么谜团，他从马歇尔那里接到的命令是具体的。10月2日，他告诉西博尔德，大韩民国的军队前一夜已经进入了朝鲜。美国记者们将有关这一行动的消息发回了国内——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国内对这样的消息都会持欢迎的态度。然而，许多人的反应却是令人好奇的犹豫。《泰晤士报》的社论表明，就大韩民国而言，三八线的问题就此“解决了”，可对于联合国其他部队而言，此事并没有“处理清楚”。社论继续写道，如果中国人打算介入，无疑是愚蠢的。各方都“衷心地”希望他们不要介入。《泰晤士报》暗示，如果跨过三八线的人主要限于“韩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局势将是“有利的”。

10月7日（5天后），联合国解决了问题。苏联已经返回了安理会，驱使麦克阿瑟的措施会在那里遭到阻碍。因此，联合国大会以47票赞同、5票反对认可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一份提案，宣布联合国的目标是在整个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民主政府”。到那时，大韩民国已经迅速推进至朝鲜的东海岸，正朝元山靠近。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唯一作用就是为一场似乎已经成功了一半的战役提供追溯性的认可。鉴于麦克阿瑟仍走在胜利的

道路上，当时并没有人批评他。很久以后，杜鲁门坚称，若不是将军曾在威克岛的会面中向他保证中国人不会参战，他是绝不会同意进军三八线以北的。然而就在双方会面时做出那一份不太算数的保证两周之后，杜鲁门政府就亲自下达了“终结命令”。没有人找麦克阿瑟商谈此事，他只不过是遵循为总统代言的联席参谋长和国防部部长下达的命令而已。尽管总统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过保证，却还是在未曾征询美国盟国的情况下采取了行动。沃尔特·米利斯评论道：“朝鲜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决定可能已经出炉。但这一决定是以最坏的方式、出于令人困惑的原因、在情报不足、对风险的理解又不够的基础上做出的。”

风险与日俱增。如今已被充分调动起来的中国人看到麦克阿瑟的军队正咆哮着朝他们奔来，顾不上联合国计划实现朝鲜统一的声明，认为自己生死攸关。事后回想起来，他们的反应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诚然，早在8月20日，也就是仁川行动发起前的一个月，毛泽东的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就曾通过电报告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国人民十分关心朝鲜问题的解决。”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鸭绿江北岸的高射炮曾向在朝鲜境内飞行的轰炸机两次开火，一次在水丰水库附近，一次在新义州附近。9月1日，满心忧虑的杜鲁门表示，他希望“中国人民不会被误导或被强迫加入对抗联合国与美国人民的战争之中”。然而，用艾奇逊的话来说，除了乔治·凯南，大部分美国汉学家都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不大可能的”。国务院劝诫总统，仅仅把人民军推回三八线以内而不对它实施歼灭是不够的，因为这将允许敌军重新武装、卷土重来。除此之外，外交官们还把这场半岛战争视为加强联合国道德权威的绝佳机遇。相信这是一个值得承担的风险，杜鲁门下令麦克阿瑟率兵向北推进，只是再一次提醒他要避免“对中国领土内的目标发起军事行动”。

9月30日星期六，汉城仪式结束后的那一天，周恩来通过广播发出警告，中国方面不会“消极忍耐”跨越三八线的行径，而毛泽东的军队也不会“坐视不管”麦克阿瑟的军队席卷朝鲜。第二天，将军（根据艾奇逊的建议）要求敌方人民军投降：“你方军队和战争潜力将会不可避免地提早全面崩溃……我……号召你方和你方麾下的军队（无论位于朝鲜半岛的哪个地方）立即放下武器。”星期三晚上，西博尔德被华盛顿方面发来的一则紧急电报从床上“拖”了起来。周恩来召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K. M. 潘尼迦，神秘地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队指挥官跨越三八线，中国“会派遣军队到朝鲜半岛边界保卫朝鲜”。但是，“如果只有韩国军队”向北压进，他们将不会采取这一步。此话通过新德里方面被转往了华盛顿。在那个狭隘的年代里，美国政府对印度的中立主义满腹狐疑，曾评论潘尼迦过去“经常参与中国游戏”的杜鲁门总结道，周恩来这一信息也许是在“通过威胁介入朝鲜

半岛事务来大胆尝试勒索联合国”。于是，他把此话当作是虚张声势，并未予以理睬。

5天之后，接到联合国大会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指示，麦克阿瑟再一次呼吁金日成投降：“除非你立即做出反应……否则我将马上采取必要措施执行联合国的决议。”金日成没有按兵不动，倒是周恩来在当天的广播中做出了回应。他说：“联合国的决议是不合法的，美国士兵正在威胁中国人民的安全，而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当天下午，毛泽东的军队开始跨越鸭绿江，准备发起反击。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士兵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集结，还在继续向前进攻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金日成军队。周恩来发表第二段广播的隔天早上，第一批大韩民国军团进入了元山，第10军将从水路登陆前去支援他们，而第8军团也进军了平壤。麦克阿瑟通过电报通知联席参谋长们，尽管他目前没有看到“苏联或中国军队进军朝鲜”的迹象，但还是提议仅调动三八线以北的大韩民国军队进攻平壤和元山以北50英里处，以及鸭绿江河口东南60多英里处的定州、宁远和兴南。迄今为止，他一直都在遵守联席参谋长们发来的每一条指令。米利斯评论道：“他绝不会僭越华盛顿方面起草的命令，也绝不会赞同联合国方面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将军通过诉诸‘军事必要性’和迫使政府不情愿地踏上成败未定的政治冒险这一看法是没有依据的。”

10月中旬，麦克阿瑟接近了只允许调遣大韩民国士兵的那条战线。那里竖着一些只有学过朝鲜语的人才能读懂的标语，警示前方危机四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相信中国方面是当真的，汇报说中国军队正在边境集结。林赛·帕罗特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大韩民国正“朝着为朝鲜和‘奉天’（沈阳）、大连供应电力的鸭绿江大型水丰水库跃进——这里对中国和苏联工业来说都颇为重要”，并补充道战斗“集中在朝鲜西岸，距离鸭绿江国境线约60英里。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几个世纪中，这一区域一直都属于朝鲜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传统路线”。周恩来通过每一条可能的途径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而斯大林的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也不例外。莫洛托夫被煽动起来了，10月9日，在一场从未得到过解释的出击中，两架联合国F–80“流星”战斗机袭击了苏联境内62英里处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苏联空军基地。

3天之后，乔治·马歇尔通过电报告知将军，杜鲁门打算于10月15日在太平洋某处与他会面。这位国防部部长说：“杜鲁门偏向于瓦胡岛，但如果朝鲜半岛局势使得你无法腾出时间踏上长途旅行，我相信总统会很乐意与你在威克岛上见面。”麦克阿瑟并不情愿离开自己的指挥岗位。第10军的元山行动开战在即。鉴于苏联的水雷可能已经被布在了海港的河口处，他想要亲自监督登陆行动。约翰·冈瑟写道：“除了一日又一日的战事进展，一

切人和事似乎都是旁枝末节，就连美国总统也不例外。”夏威夷似乎太过遥远，所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回复道：“我很乐意于15日早晨在威克岛上与总统会面。”

哈里·杜鲁门是个直率的男人，但他竟然为了与麦克阿瑟会谈两个小时甘愿飞跃地球2/3的距离，其动机扑朔迷离，至今无人能解。联合国的事业正面临危机，可惜总统和他的最高统帅当时都没能看清局势。总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想要和将军私下里谈一谈。”这样的理由还不够充分。白宫、五角大楼和第一大楼战后复杂的通信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当面对话成了老掉牙的途径——除非是为了在新闻发布会上制造戏剧化的高潮。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参谋们相信，威克岛会面的目的显而易见。正如他们中的一员所说的那样，将军正迈向“诡秘的政治埋伏”。听说总统一行人中还包括白宫记者，可将军却不能从东京携带媒体人前往，他们更加笃定了自己的想法。杜鲁门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正在骤降，而此时距离国会选举的日子还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最高统帅属下的军官们暗示他，和1944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杜鲁门此举是想借将军的胜利反射出来的光辉取暖。

麦克阿瑟刻意驳斥了这样的解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这样的推论对杜鲁门先生是不公平的。我认为他是不会受这种事情的鼓舞的，因而会面的唯一目的是创造有利于国家的良好意愿和有益结果。”但这是五星上将伪善的说法。他私下里也同意参谋们的观点——他告诉西博尔德，他把此行视为“政治公费旅游”。鉴于后续发生的事件，他的判断可能是对的。媒体也这么认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此举为“善意的政治行动”。就连杜鲁门最能干的捍卫者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也指出，这一次的会面“从各个方面看来都是一件怪事”。如果总统并非在为民意调查寻求名次的提升，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事件感到十分沮丧。除却中国，苏联被视为是朝鲜最亲近的同盟。而相比毛泽东，美国政府更加畏惧斯大林。而这一解释的阻碍在于，据大家所说，威克岛上并没有人提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事情。

10月14日星期六早上7点，麦克阿瑟在穆乔、邦克、惠特尼和雷福德上将的陪同下从羽田机场起飞。总统一行人在密苏里短暂停留之后，也乘坐DC–3客机踏上了长达24个小时的旅途；其中最关键的成员包括布莱德雷、陆军部部长佩斯、哈里曼、腊斯克、菲利普·杰瑟普、查尔斯·S. 墨菲和新闻秘书查尔斯·V. 罗斯。两位内阁成员的缺席十分引人注目：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马歇尔可能认为自己应该在麦克阿瑟离开第一大楼时坚守在五角大楼里，可艾奇逊却没有任何不在场的理由。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总统把这一行程告诉我并邀请我和他一同前往时，我敬谢不敏。

我说，尽管麦克阿瑟将军拥有外国最高统治者的许多特性，且和那些人一样难以对付，但把他当作外国君主的行为却似乎不太明智……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反感。我不想参与其中，也不认为这样做能有什么好处。”

《时代周刊》也认为“当时的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就像是不同国家的统治者带着全副武装的随行人员，望着彼此的眼睛寻求中立立场”。总统甚至还带了礼物。一位最近才从东京调回华盛顿的年轻陆军军官告诉白宫方面，琼·麦克阿瑟喜欢布卢姆的糖果，却无法在日本买到；墨菲买了五盒一磅的糖果，而哈里曼在檀香山停留期间又买了五盒，以确保将军的夫人能吃个够。参谋或平民中鲜为人知的是，虽然这些当事人并不会误解对方随口说出的话，风险却是真实而又沉重的。在《剑锋》一书中，夏尔·戴高乐是这样形容这种会面方式的：“一场戏剧即将在政客和军人之间拉开帷幕……他们的对话编排得是那样的紧密，以至于两人的对白除了引用对方的话之外没有任何的关联和意义。如果其中一个人错过了自己的提词，双方都会大难临头。”

比杜鲁门提早几个小时到达的麦克阿瑟睡了一觉、洗了个澡、刮了胡子、穿戴整齐并用好了早餐。清早6点，他在“独立号”降落前的30分钟便到达机场，准备迎接总统。注 将军举手投足间尽显主人风范，磨损的帽子随意地翘着，卡其衬衫的脖领处也敞开着。杜鲁门事后告诉莫尔·米勒，最高统帅身穿便服的样子冒犯了他：“如果他是我团队里的中尉，穿成这个样子到处乱晃，我会在他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就迅速逮捕他。”尽管如此，他在回忆录里却只是简要地提了一句：“他的衬衫没有系好纽扣，帽子显然已经用了许多年了。”记者们注意到，将军并没有向自己的总统敬礼，而是给了他一个“大人物之间的握手”，一边笑着伸出手来一边热情地说道：“总统先生！”杜鲁门也笑着问他：“你好吗，将军？我很高兴你来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将军。”麦克阿瑟回答：“我希望下一次不会隔这么久，总统先生。”杜鲁门强有力地点了点头。据一位旁观者回忆，总统似乎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建立一种协议”。

当双方的副手在威克岛民用航空基地低矮的煤渣砖建筑会议室中做准备时，两位主要人物坐上了一辆破旧的1948年雪佛兰轿车（他们是从前座上爬进去的，因为后座的门被卡住了），奔赴某泛美工长为了此次的场合专门让出来的一间活动房屋。总统在一把柳条椅上坐了下来，将军则坐在了一把藤条的长靠椅上。两人单独相处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鉴于没有人在场做笔记，也没有人能够偷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们无从判断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在第二年的参议院听证会过程中，麦克阿瑟说道：“我不认为自己有权透露我们讨论的内容。”他告诉自己的参谋，他和总统（难以置信地）就菲律宾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进行了“十分无关紧要的对话”。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得更加精确一些。据他回忆，将军就自己给美国海

外退伍军人协会回信的事情表示了歉意。总统告诉他，事情已经过去了。紧接着，用杜鲁门的话来说，麦克阿瑟表示自己在上一次的选举中纵容共和党人来“侮辱我”，但他不会允许他们再这样下去了。总统将政府意欲加强北约的计划告诉了他。将军向总统保证，他1月份时就能把第2师从朝鲜战场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改赴欧洲。

坐在落满灰尘的破车中赶赴主会场时，总统认为：“这位总司令似乎在为自己有机会和我对谈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发现他是个令人兴奋、引人关注的人。我们的对话十分友好——我说的话可能比我期待得还要多。”在煤渣砖小屋里，两个男人并肩坐在了一张加长的桌子旁。麦克阿瑟的参谋坐在杜鲁门的右手边，总统的参谋们则坐在麦克阿瑟的左手边。楼里有人正在偷听，而她出现的原因一直都无人可以说明。这个人就是韦尔尼切·安德森，杰瑟普的秘书。事后，白宫方面会告知记者，安德森小姐“发现自己坐在了”一间狭小的接待室里，房门不小心半掩着。几个月之后，她告诉记者，自己没有把门关上，而是“不假思索”地动笔写了起来。“没有人指示我这么做。”她说，“我过去的时候甚至没有带上一个正常的笔记本。手里碰巧有一个横线拍纸簿，于是在上面做起了笔记。这好像就是我该做的事情。”实际上，会议室遭人窃听了。当政府后来把她的笔记分发给媒体时，麦克阿瑟感到自己被深深地冒犯了。艾奇逊并没有理会他的抗议，把他的话当作是他“众所周知的小题大做”。腊斯克至今仍坚称她做笔记的举动“完全是正确的”，其他的说法都是“十分不公平的”。不知为何，此话并不可信。当美国总统和他最杰出的将军坐在一起时，是没有侥幸目击者的。鉴于邦克拿起铅笔时曾遭罗斯以双方都不得做笔记为由喝止，她的角色就变得更不可原谅了。“回想起来，”加文·朗在评论这个隐蔽的速记员时说道，“这似乎是最低层次的阴谋诡计。”

新鲜的菠萝摆放在每一位与会者面前。在大家享用美味时，总统领导大家展开了讨论。会议似乎没有议程，话题都是随机选择的。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试图解决蒋介石的困局。杜鲁门不知道李承晚的人民在战后重建时需要多少援助，也不清楚朝鲜人民军的战俘态度如何（麦克阿瑟说，他们很高兴自己被俘虏了），更不知道日本和平协议一事进展如何。将军说，协议草案已经经他再三雕琢，直到它“像钻石般”闪亮。在座的所有人都认为占领朝鲜的目标在感恩节之前就有可能实现。将军说他希望在年底之前把第8军团送回日本。用麦克阿瑟的话来说：“会议临近尾声时，（苏联人或）中国人介入的可能性被人随口提了起来。”将军提到，他推断苏联军队在堪察加半岛南部的实力比较薄弱，红军不可能在冬季来临之前沿图们江集结。从理论上来说，苏联飞机是有可能支援中国步兵的，但据安德森小姐的笔记记载（也就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信息来源），他说“中国负责地面攻势、苏联负责空中攻势的模式是不会奏效的”。当然，他补充道，中国也有可能在没有战术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介入。杜鲁门向他询问这种情况

的概率有多大。据安德森小姐记录，将军答道：“很小。如果他们在开战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月就介入，将对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已经不再恐惧……不再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了。”提及毛泽东在中国东北的部队，手稿内容援引他的话写道：“只有五六万人会被送到鸭绿江对岸去。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半岛有了自己的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打到平壤来，将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杀戮。”

墨菲回忆：“他是我见过最具说服力的家伙。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事后杜鲁门会指责麦克阿瑟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误导了他。此话不错，威洛比的分析是有缺陷的。但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信息也不准确——相比战地指挥官，这些信息提供者更有责任去斟酌权衡不受约束的外国势力。总而言之，总统应该向他们而非麦克阿瑟寻求政治问题方面的指引。美国人一直不肯让中国抓住朝鲜半岛这把短刀的刀柄。他们从未想到过（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中国人是不会允许一支外国军队夺取半岛的。他们应该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但推测中国方面意图所需的才能与胜利夺取仁川所需的截然不同。这是一项浩大而又复杂的工程，且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国和未在北京设立大使馆而变得难上加难。杜鲁门把一个正确的问题提给了一个错误的人。比方说，相比威克岛上的麦克阿瑟，身处新德里的尼赫鲁就能为他提供更好的答案。

威克岛的主要问题在于，召开此次会议的观念是荒谬的。两个筋疲力尽、年事已高的男人在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中某座偏僻的岛屿上进行了短暂的会面。双方的状态都不太好，因而无力处理重大事件。将军远离第一大楼3个时区，而总统距离白宫则有7个时区。他们此前素未谋面。不难理解，身心俱疲的状态令两人的社交直觉变得有些迟钝。也许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形下，他们沟通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杜鲁门天性直言不讳，麦克阿瑟则敏感委婉。想起联席参谋长们面对自己提出的“烙铁计划”时展现出来的那种胆怯，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可能并不想让总统对战争产生更多的怀疑。面对预测中国意图的提问，他显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他时刻都做好了表达自身观点的准备，即便自己缺乏足够的信息。而且他一旦公开表态，就会倔强地拒绝承认自己错了。最终，美国总统和联合国指挥官都打算时而退缩、时而碰撞地在核武器发明后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有限战争的炼狱中蹒跚而行。比方说，麦克阿瑟就从没有想过总统在回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攻时会与应对朝鲜人民军入侵时的态度如此迥异。第一大楼的一位副官提到：“向华盛顿方面提问就好像是在询问我们是否要用弓箭与敌人抗争。如果有人在那个阶段暗示麦克阿瑟，我们可能遭遇中国军队的全力进攻，只能被动抵抗却无法主动出击，他是不会相信如此荒谬的想法的。”

在威克岛令人头晕眼花的两个小时里，双方不仅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连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没有意识到。推开面前的菠萝果盘，所有人都起身伸

着懒腰。韦尔尼切·安德森走了进来。（“这位美丽的女士是从哪里来的？”吓了一跳的麦克阿瑟殷勤有礼地问道。没有人理会他。）将军和布莱德雷展开了技术讨论，穆乔也和华盛顿方面的军外顾问开始了讨论。总统则开始踱起步来。到目前为止，麦克阿瑟已经开始看表了。总统一行人打算从容地享受一顿午餐会，但如果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将离开的时间推迟到下午，返回日本的航班就要在夜里飞行了。满怀失望的杜鲁门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在麦克阿瑟的衬衫上别上了他的第5枚服役优异勋章，称赞将军的“远见、判断、不屈意志和毫不动摇的信仰鼓舞人心，树立了军事史上少有人能够比肩的榜样，防御时勇敢不屈，进攻时大胆果敢”。6个月之后，有人曾想起这些话并借以询问他是否后悔开除将军。杜鲁门回答：“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有在两年前尽早开除他。”

紧接着，双方在安德森小姐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份平淡无奇、毫无内涵的公告。杜鲁门告诉记者们：“自我担任总统以来，还从未参与过如此令人满意的会议。”麦克阿瑟则回避了媒体的提问，表示“所有评论都必须由总统的发言人来提供”。罗斯扬着头对此话表示了轻蔑。这并不是他的头衔。冈瑟评论道，最高统帅此话不太可能“表达了轻视的意味，只不过是他的表达方法过于老套的例子而已”。但这一切显然让他感觉很不舒服。安东尼·莱维罗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写道，杜鲁门似乎“对结果相当满意，就像是一位保险销售员签下了一个重要的客户，可后者却似乎对保险责任范围满腹狐疑”。在总统祝福他“平安抵达”之后，将军的情绪也依旧没有好转。总统带着随从离开时，将军连交通工具都没有。斯托里试图呼唤一辆经过的吉普车，却没有成功。最终，他挥舞着旗子拦下了一辆民航的卡车，载着最高统帅一路颠簸着离开了。

在经历了33个小时、4 000英里的飞行之后，返回东京的麦克阿瑟投入了计划对朝鲜半岛发起致命一击的工作中。他告诉西博尔德，会议和期待中的一样，但在穆乔说他和总统表现得“十分出色”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如果没有后续事件，事情可能就此画上了句号。可后续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公众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会议结束两天之后，杜鲁门在旧金山剧院表示：“（我）感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指明（针对我与麦克阿瑟将军的谈话），我们在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执行方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告诉记者们：“麦克阿瑟将军和我全面梳理了有关台湾的话题，因此没有必要再提及此事。我和将军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第一大楼方面，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发言人说道：“将军这一方对台湾战略价值方面的看法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三个星期之后，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从白宫方面得到报告，麦克阿瑟曾在威克岛上向总统保证，中国人是不可能干预朝鲜半岛事务的。《自由人》杂志的编辑通过电报询问将军对此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麦克阿瑟回复：“你在来信中引用的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于13日发表的声明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麦克阿瑟，发于日本东京。”

由威克岛会议引发的恶作剧拥有无限的可能性。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活动房屋进行的对话没有任何的记录，而安德森小姐针对第二次会谈的速记笔记又令人生疑。两人都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总统需要将军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他支持，所以宣布自己已经在岛上得到了对方的承诺。麦克阿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当联席参谋长们通过电报告诉他，他已经僭越了他所接到的指令时，他则回答杜鲁门在与他的对话中更改了这些指令。艾奇逊是对的。这一次会面是个可怕的主意。许多人都将因此而丧命。

最终，偏执狂们耗尽了自己的可信度，而麦克阿瑟也早就丧失了自己的公信力。因此，1950年秋，当他宣称自己的“战略行动”被人泄露给了敌人时，联席参谋长们毫不畏惧。“情报被泄露了出去。”他事后写道，“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沃克持续向我抱怨，敌人通过华盛顿方面的消息来源提前知晓了他的行动。”然而，面对以前就经常向他们发出警告的将军，五角大楼却不以为意。《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在声称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话“牵强附会”时，无疑表达了新闻媒体和政府共同的心声。

然而，这一次，他的怀疑也许是对的。那年秋天，英国驻日本的一等秘书名叫H. A. R. “金”·菲尔比，二等秘书名叫盖伊·伯吉斯，而伦敦的英国外交部美国司负责人则是唐纳德·麦克莱恩。由于联邦大部队正在朝鲜半岛作战，五角大楼和第一大楼之间所有需要传递给艾德礼政府的消息副本都要由位于马萨诸塞大道的外交部和白厅的美国司经手。菲尔比和伯吉斯都是盟军内部董事会的成员，而菲尔比还是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络官。令人震惊的是，这三个人全都是敌人的特工。1951年5月25日，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接到菲尔比的警示，听说军情五处、外交部安全处和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正准备合围他们，因此准备叛逃到苏联。在继续坚守了12年多的时间之后，菲尔比本人最终于1963年1月27日经贝鲁特逃往苏联。

针对这一寡廉鲜耻的三人团伙，《纽约客》的丽贝卡·韦斯特写道：“他们在职期间知悉的每一个秘密无疑都被传递给了苏联方面。”1956年2月17日，陆军部部长威尔伯·M. 布鲁克在检验完国防部文件之后汇报（那时菲尔比还没有叛逃），“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手中的秘密对共产主义阴谋来说是无价之宝”。据未遭麦卡锡主义侵蚀的军官詹姆斯·M. 加文回忆，在他于1950年关键的最后几个月服役的过程中，敌军曾几度表现出已经预知联合国部队的调度情况，令人心生恐惧。他说：“我毫不怀疑中国人无论怎样都能自信而又巧妙地挺进朝鲜。事实上，我相信他们有能力这么做，因为消息灵通的他们不仅清楚沃克的动向，还知晓他行动的限度。那个时候，这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他继续表示，他十分确信：“麦克阿瑟的所有计划都是经英国外交部之手传递到敌人手中的。”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

提到，战后“中国将军在中国出版的一本官方小册子中写道：‘若不是我确定华盛顿方面会限制麦克阿瑟将军针对我的补给和联络线采取适当的报复措施，我是绝不会发动进攻、用我的士兵和军事名誉去冒险的。’”海军中将A. E. 贾雷尔注意到，这位中国将军在这本小册子中揭露了他“通过英国外交官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得知这一决定的事实。假设麦克阿瑟和贾雷尔索要了这本小册子的精确翻译本（本书的作者及哈佛大学、布朗大学的亚洲学者都没能追溯到它的原本），中国当然有可能只是试图在英美之间播下新的不和谐的种子。但鉴于我们已经知道了菲尔比的阴谋和朝鲜半岛那年秋天的事件模式，可以公平地说，中国将军的话可能正好证实了众人的怀疑。这无疑能对解释威克岛会议之后的战争走势起到很大的作用。注

1950年11月1日，威克岛会议结束17天后，关键的日子来到了。这个星期三，麦克莱恩被指派为白厅美国司主任。作为外交部某司的负责人，他的名字登上了华盛顿发往伦敦的所有机密材料的分发名单榜首。加上早已就位、正在监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进展的菲尔比和伯吉斯，这个三人组织不仅可以把联合国指挥官的动向告知敌军，并且如加文所提到的那样，还能把他所不能做的事情也悉数泄露出去。比方说，杜鲁门返回华盛顿不久后通过的一份中央情报局备忘录就建议麦克阿瑟不要对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采取行动，坐视对方占领水丰电站等鸭绿江沿岸的设施。菲尔比和伯吉斯在这一重大决定做出后几个小时便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一早，这份文件的副本就被递交到了麦克莱恩的面前。最多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莫斯科方面便会得知这些文本，并有可能随即将它直接转发至中国方面和人民志愿军的总部。据此推断，人民志愿军能够预测麦克阿瑟的行动并做好挫败他的准备也就没什么好稀奇的了。直到联合国的颓势面临严重的衰退、将军随机应变的速度快得令华盛顿方面和菲尔比等人应接不暇，他才得以针锋相对地与敌人对阵。

菲尔比和伯吉斯已经把大使馆的公文传递给了苏联人，而正在接受精神病医师治疗的麦克莱恩在将军结束与总统的会谈时还没有接手伦敦的美国司。不过他相信将军迅速制定行动，率领联合国军占领朝鲜。在他短暂离开的那个星期日，苏联的高射炮击落了一架在鸭绿江上巡逻的美国F–80战斗机。星期一，有人发现某中国军团跨越了鸭绿江，朝着长津湖和赴战水坝挺进。麦克阿瑟不顾这些汇报，下令联合国军大举向前。他计划实施一次大规模的两翼包围行动，将人民军的剩余势力围困在鸭绿江岸边，由第10军从右翼的元山发动一系列复杂的两栖行动，而由第8军团从左翼的平壤附近发动进攻，最后由大韩民国军队坚守中央。

大韩民国的军队是其中的薄弱环节。他们不仅兵力不足，还受纵贯朝鲜的山脊影响无法与两翼的军队保持联系——山脊间遍布通往绝境的悬崖和山

谷。尽管如此，将军还是格外的自信。星期五，平壤陷入了硬战之中。在某空降团于平壤北部30英里处降落时，第8军团切断了逃跑的朝鲜人的疏散路径。联合国军指挥官在自己最喜欢的战地记者们的陪同下乘坐飞机进行了空中视察——“我当然有所偏袒了。”他告诉没有受邀的记者，“这是我的特权。”在金日成失守的首都降落时，他装腔作势地喊了一句：“这里没有什么名人来迎接我吗？金家人呢？”

他告诉记者们，这场战争实质上已经结束。然而他却向沃克坦言自己把补给线拉得太长了。沃克和他有着同样的担心，但人民军的抵抗力量实在是过于薄弱，因此麦克阿瑟四处派遣先锋部队，前去西北部的清川江和东北部的长津水力发电厂刺探军情。他告知五角大楼方面，他不需要更多的援军了，开往釜山的船只可以被转往日本或夏威夷，其他运输工具可以准备搭载第2师前往欧洲。此时此刻，他开始变得无忧无虑起来。他知道，一个月后即将到来的冬天将封冻鸭绿江，把鸭绿江变成中国步兵的高速公路，于是决定取消有关非大韩民国军队不得冒险深入半岛“狭长地带”（这一地带位于平壤北部，宽度不到100英里）的限制，从而进军朝鲜与中苏交界的东北省份。10月24日星期二，夺取平壤4天之后，他命第10军和第8军团“全速前进，充分利用他们的武装力量”。

这似乎是在蔑视联席参谋长们于9月27日下发的命令。艾奇逊事后写道：“如果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长们建议联合国军撤回平壤—元山战线、继续采取防守姿势，且如果总统毫无疑问地支持他们，一场灾难也许就能避免。但这就意味着与麦克阿瑟为敌。”五角大楼方面不愿冒险与他作对。被仁川一役的胜利吓倒的参谋长们唯唯诺诺地给他发去电报，表示他们明白远东总司令“对于自己的行动无疑拥有合理的理由”，但鉴于该行动是他们“计划中的焦点”，他们还是需要一个解释。麦克阿瑟在回复中表示，自己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且9月27日的命令并不是“最终指令”，因为马歇尔两天后就修改了其中的内容，说他希望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在“战术和战略上毫无障碍地进军三八线以北”。与此同时，“军事必要性”也迫使他无论如何只能无视这一命令，因为大韩民国的军队缺乏“实力和领导力”。如果参谋长们还有进一步的问题，他建议他们去询问白宫方面。表示，整个话题都被涵盖在了“他与总统在威克岛上的会议中”。

哈里·杜鲁门对此却是闻所未闻。星期四，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无力地表示，根据自己的“理解”，只有韩国人才能够靠近鸭绿江。得知这一点，将军通过媒体对他表示了否定，提出“联合国军队的使命是扫荡朝鲜半岛”。五角大楼方面建议总统无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挑战，因为这是美国军事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点（这一传统自1864年林肯对战格兰特时便已形成），一旦战地指挥官接受了一项使命，“别人就不得干涉他执行任务的思路”。面对这一点以及麦克阿瑟无上的军事特权，杜鲁门只得听从别人

的劝告，闭上了嘴巴。他所做的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一份声明认同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战略，宣布他不会允许朝鲜人求助于鸭绿江对岸的“攻击性军事基地”。事后，麦克阿瑟在不同的背景下也曾使用过这个词，但最先把它提出来的是美国总统。

深感忧虑的艾奇逊尽一切努力通过联合国和自己的声明向中国方面做出了保证。某联合国临时委员会承诺它将“全力支持”中国边境，安理会引进的一项六国决议也承诺为“中朝在边境区域内的利益”提供全方位的保护，而美国国务院还宣布美方“在中国东北没有不可告人的计划”。最终，杜鲁门宣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心怀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意图，就美国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够明确地指出，鉴于世界和平事业的风险以及我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长久友谊，我们会采取一切光明正大的措施来防止远东敌对局势的扩张。”詹姆斯·赖斯顿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一切为时已晚：“某些消息灵通的人相信这份声明若是在联合国军占领朝鲜首都时发布也许还能够阻止……（中国的）介入，尤其是在美国提出允许联合国和平委员会接管中朝边境上中方一边的缓冲区时。”反之，中国方面却听到了另外一些更加不祥的声音——李承晚说：“战争不能止于鸭绿江。”而加州参议员威廉·F. 诺兰也提出：“为什么不能在鸭绿江以北10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中立区？”中国方面表示，与此相冲突的声明“是甜言蜜语和威胁恐吓的混合体”，是为了软化针对挺进中国边境、最终跨越边境行为的舆论。

毛泽东的发言人坚称，中方只派出了“志愿军”进军朝鲜半岛，辩称此举遵循了法国将军拉斐特志愿援助美国独立战争、美英志愿军于20世纪30年代参与西班牙内战的光荣传统。麦克阿瑟起初以为这些新手会是“拥有中国血统的朝鲜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样的人在军队里并不鲜见。早在10月26日，汉森·鲍德温就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朝鲜边境上集结了约25万中国士兵，其中20万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朝鲜半岛。鲍德温写道：“鉴于毛泽东相信东北将是敌军时间表上的下一个目标，中国加强自己的边境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鲍德温和联合国一方都没有想到的是，大批的军队正悄无声息地包围正在朝北挺进的联合国军队。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军队的出现。即便他们的踪迹出现在了侦察结果中，似乎也没有引起麦克阿瑟对于危险的警觉。有人会想，这是为什么呢？在仁川，他曾告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霍华德·汉德尔曼：“我相信，美国对中国发起陆地入侵将成为一场最糟糕的悲剧。没有人曾经征服过中国。它实在是太大了。”也许他将朝鲜半岛与亚洲大陆区分了开来，或者他有可能相信中央情报局的评估结果，认为中国军队会维持守势，保卫鸭绿江畔的电厂。

10月的最后几天，鸭绿江边的一支韩国部队几乎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中

国部队消灭得一干二净。紧接着，大韩民国第1师在边境以南40英里处“与奋力抵抗的敌军陷入激战之中”的消息也被汇报了上来。有人认出了毛泽东第40军的部队，紧接着，第10军在右翼战线偏僻的南端城市咸兴抓到了中国战俘。麦克阿瑟于10月29日对此发表了评论，但形容局势“并非令人担忧”。3天之后，第10军的一支海军陆战队、大韩民国军队某师和身处左翼战线清川江畔的第1骑兵师某部队与中国的步枪兵和机枪手展开了激战。在给联合国军队带来惨重伤亡之后，中国军队突然停火，消失在了山中。麦克阿瑟承认，他至少“暂时”需要面对一个新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38军和第40军中的5支部队（也就是曾经驻守在沿海地区、防范国民党从台湾发动突袭的部队，如今被第7舰队的介入解放了出来），正朝他们发动零散的攻势。中美两国军队“如今产生了冲突”。事实上，据《纽约时报》报道，“伴随着冲锋号，中国军队骑着马或徒步发起了进攻，如今在元山将美军和韩国军队分割开来”，而在东北边境上侦察的飞行员们则看到他们正在边境“大举前进”。

麦克阿瑟11月初的公报内容显示，这位指挥官的情绪总是在积极和消极之间来回转换。11月1日，他表示，“坦白地说”，自己并不清楚“中国部队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投入了朝鲜战争”，或者，如果他们参战了，“又是否代表着中国政府”。在他的印象中，他们“心里只有几个有限的目标”。第二天，在详细审查完报告之后，他说他的分析“将中方介入的问题从学术的领域转移到了严峻而又迫近的威胁范畴内”。两天之后，他得出了结论，中国军队的数量足以构成“彻底摧毁我的军队的威胁”。可刚刚预测完自己即将大难临头，他马上又退却了。他告诉华盛顿方面，尽管他“无法……评估中国介入的事实”，却有“很多合理的理由”证明对方并没有出手干预。对于中国人的出现，他提出了三点可能的解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为人民军提供后勤支持，他们“或多或少”只不过是志愿军，或者他们只不过是去为鸭绿江以南提供缓冲的。他说：“我反对草率地得出不成熟的结论，相信最终的评定应该等到我方搜集到更加完整的事实之后再说。”但这样的事实每个小时都在累积。第二天，他呼吁世界舆论对中国方面进行谴责，而在接下来的那一天又发表了奇怪的胜利宣言。他表示，夺取平壤对于击败金日成的军队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中方“未曾宣战便派遣境外军队跨越鸭绿江、进入朝鲜，发动了有史以来最目无法纪的国际入侵行动”。据此判断，“一个可能的陷阱”已经被“悄悄布置起来了”。幸运的是，联合国运用“洞察力和技巧”和通过“熟练的调兵遣将”觉察到了陷阱的存在。

未曾意识到真正的陷阱还未涌现（甚至尚未被发现），将军告诉参谋长们，他正重新展开攻势、“准确地估量……敌军的实力”。这是多此一举

的。他的士兵在出动之前就遭遇了敌人新的进攻。据飞行员汇报，鸭绿江6座桥梁上车水马龙，毛泽东的部队从中国东北向南涌入，不断加入已经身处朝鲜半岛的中国军队。11月6日星期一，麦克阿瑟命令斯特拉特迈耶（他曾经告诉过西博尔德，他自信他的轰炸机能够“炸平”中国），调动90架B–29轰炸机发动进攻，炸毁位于朝鲜半岛西北的新义州市内各座大桥。飞行员们整装待发之际，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将该命令的副本发往了华盛顿，然后便上床休息去了。

凌晨2点，他被联席参谋长们发来的紧急命令吵醒了，首长们指示他“在收到进一步通知之前推迟对中国边境5英里内所有目标的轰炸计划”。这是将军与参谋长们之间第一次真正产生裂痕。认为莫斯科和北京正通力合作的布莱德雷怀疑美国之所以被卷入亚洲的这场消耗战中，是为了让苏联能够腾出一只手伸向其他地方。其他几位参谋长对此也表示了赞同，但麦克阿瑟却不这么认为。坐在床头柜旁，他草草地写下了一段言辞犀利的回复。他写道：

> 大批的人力和物力正从中国东北跨越鸭绿江大桥涌入这里。这一行动不仅会使我军陷入危机，还会预示着我军最终的覆灭……唯一能够阻止敌军获得援兵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空中破坏力量，摧毁这些桥梁以及北部地区为敌军的前进提供支援的所有设施。行动每推迟一个小时，美军和其他联合国军队都将付出沉痛的血的代价……我会延缓进攻、执行你们的指示……（但是）我无法过分强调你们强加在我身上的限制会给我的肉体和精神带来灾难性后果。我相信这件事会很快引起总统的注意，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命令可能会导致极大的不幸。在他本人对局势有直接理解之前，我是不会接受这份责任的。

参谋长们目瞪口呆。起初，麦克阿瑟认为他们是“不可能”判断中国人的意图的。如今，中国士兵又正大举“涌过”鸭绿江。除此之外，麦克阿瑟还威胁要越过他们直接和总统对话。布莱德雷通过电话把这条信息读给了杜鲁门。按理说，这位脾气暴躁的总统本应对将军发难，不料他却温和地说，既然麦克阿瑟的感受“如此强烈”，就应该被给予“放行信号”。因此，参谋长们给东京方面发去电报撤销了5英里的限制，授权他轰炸新义州以及河道中央一半的桥梁，并补充道：“上述指令不包括轰炸鸭绿江上任何水坝或电站的授权。”麦克阿瑟并不满足：飞行员是无法做到只攻击半座桥梁的，也没有办法在不侵犯中国东北领空的情况下摧毁桥梁。“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斯特拉特迈耶告诉他，“而且华盛顿方面也肯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早上，将军重新展开了他和五角大楼之间的长距离争执。越来越多

的敌机从中国东北的跑道上起飞，对联合国军队阵营发起进攻，然后毫发无损地飞回。他要求获批按照历史悠久的国际法规“紧急越境追击权”飞行3分钟、追击肇事后逃逸的战机。注 这一次，华盛顿的态度友善多了。马歇尔批准了他的请求，艾奇逊也没有提出异议，总统更是不予反对。紧接着，迪安·腊斯克指出美国在采取步骤影响中国东北之前应该致力于同派兵参与联合国军的同盟国进行商议。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13个同盟国全部提出了反对。他们预测，如果美国战机飞越中国，苏联战机定会发起反击。由于他们的反应过于激烈，事情不得不被搁置了下来。

麦克阿瑟火冒三丈。他称：“不得轰炸桥梁的命令是我国历史上强加在战地指挥官身上最不可原谅、考虑欠周的决定。”如今，不得“紧急追击”的禁令又使得中国东北和苏联西伯利亚成了“保护区”。这还不是全部。他事后写道：“鸭绿江畔水力发电站的轰炸权随后也遭到了否认。禁止轰炸范围被扩大到了朝鲜境内任何一处有能力为中国东北和苏联西伯利亚供电的电厂……我感觉自己的武器正一步步被人从手中夺走。”

在东京、华盛顿和成功湖之间的关系到达关键阶段时，神秘莫测的中国军队突然转入了地下，消失在了山中。斯特拉特迈耶的飞行员在空中畅行无阻。第7舰队的小分队平静地停泊在兴南附近的日本海海域，保卫卸货的货船。将军的两翼巩固了自己在边境以南50英里内的地位，而第8军团和第10军也加强了清川江和长津湖水库的防御。最高统帅麾下共有10万精兵正为新的突袭整装待发。

最大的谜团在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中国军队竟然不知所踪。他们要么撤出了战场，要么就正在重新集结。麦克阿瑟出于本能地采取了更加乐观的视角，而这并不是他的个人看法。日后，在回顾第一大楼和五角大楼之间的往来电报时，他的情报部门将遭到全世界媒体的嘲笑。不过其中一部分电报也证明威洛比是无辜的。他的事实从本质上来说是正确的。他注意到，仁川登陆行动将4万余名人民军游击队留在了联合国战线后面，因而指出他们有可能与中国来的“外国军队”会师。在参谋简报会上，他辨别出了中国军队的主力，评估了他们的战力，还针对他们的战斗序列做出了准确的分析。他对中国战俘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了11月26日，直到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轰塌了联合国军最高统帅头顶上的房顶为止。威洛比的错误在于他没有预料到这次攻势的力度和方向。中央情报局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向杜鲁门汇报时指出麦克阿瑟的路线上存在着“多达20万人的中国军队”。然而，直到11月24日，情报局还在向总统保证，“没有证据证明中国计划在朝鲜半岛发起主要进攻行动”。

如果说杜鲁门的间谍有疏忽之嫌，对方的情报部门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麦克阿瑟的战斗计划如今已经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如

果将军对此心知肚明，可能会暂缓采取行动，但除此之外可能没有什么能够阻拦得住他。尽管丧失了权力却还热衷于观察世界时事的温斯顿·丘吉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麦克阿瑟能够在朝鲜半岛的“脖颈”或“腰部”位置停止进军。最高统帅拒绝了这项提议。他已决心孤注一掷，调动包括后备部队在内的整支军队大举跃进。“亚洲人喜欢胜者、鄙视输家。”他曾这样说道，“他们敬重有闯劲儿的领袖。”汉学家在这一点上也许不会赞同他的看法，尤其是考虑到即将发生的一切，但他大举跃进的军事观点此时此刻似乎更加可信。横亘在朝鲜半岛“腰部”位置的多山地形尤为崎岖，因而在那里驻军将限制军队的调度、补给及两翼的协调作战能力。除此之外，他认为时间就是他的敌人。“我有三条可行的路线，”他事后写道，“前进、保持静止或撤军。”在他看来，撤军就意味着承认战败，即无法像他征服日本一样完成“扫荡朝鲜、统一和解放朝鲜半岛”的任务。他认为，保持静止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挑剔他的看法。在没有马其诺防线之类的替换选项时，伟大的进攻指挥官都习惯于用极少的兵力获得更大的成就。一次，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元帅自豪地把一份计划摆在了拿破仑的面前，提议将法国军队准确地从边境的一端布阵到另一端。拿破仑无情地答复他：“你是在试图封锁走私吗？”和拿破仑在大部分军事行动中所面临的情况相似，身处朝鲜半岛的麦克阿瑟也缺乏采取纵深防守所必需的兵力。如果中国军队打算对他发起进攻，每过去一天，鸭绿江大桥上就会涌入更多的军队。他告诉自己的参谋，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冒着“极大的风险”，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中国人占尽优势之前发动进攻。因此，他中断了进军的命令，告诉西博尔德，“万一这次的攻势遭遇失败”，他“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除了轰炸中国东北的关键地点之外别无选择”。

11月23日，当麦克阿瑟的所有士兵都在享用感恩节晚餐时，联合国军队已经遍布朝鲜。右翼的第10军主力已经在鸭绿江畔做好了准备，而美军第7师自星期一以来也已在可以俯瞰鸭绿江的惠山山坡上掘壕固守。两个星期的小心试探和大面积空中侦察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中国军队。于是，将军决定派遣第10军和第8军团按照毛奇将军的经典策略前进——将部队拆分开来，在敌人的运动轴线两侧行动。鉴于敌我双方还不了解彼此，他将从战术上狠狠地撕碎敌人，敞开大口将半岛内部的丘陵地带吞噬干净。此举风险极大，但他无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正如柯林斯事后所证实的那样，联席参谋长们早些时候“不仅没有提出审核的问题，还批准了（联合国军的）这项决定”，因为“在战争的那一阶段，除了朝鲜人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敌人……而这是一项完全合理的提议”。

参谋长们那个星期的表现还不够坚决，踌躇了9天才批准军队采取大规模进攻，显示出了团体在对抗强势个人（一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拥有划时代资历的军官）时所有的弱点。布莱德雷和柯林斯尽管颇有微词，还是当场对将军表示了赞同。实际上，五角大楼方面也不曾反对麦克阿瑟的战

略，而参谋长们最多也就是提提建议，任由将军接受或拒绝。

在最后时刻被提出来的一条建议中写道："联合国的其他成员越发担忧，如果联合国军……夺取朝鲜半岛，包括中国东北以及苏联边境旁的所有朝鲜领土，有可能会引发普遍冲突。"五角大楼方面建议他在边境上停止进攻，沿"俯瞰鸭绿江河谷入口的地带"放慢脚步。这些军队将"主要由大韩民国士兵组成"，其他部队则"集合起来待命"。麦克阿瑟并不喜欢这个提议。他回复道，高耸在江边的山丘不适合掘壕固守。他打算"巩固鸭绿江沿线阵地"，然后"尽量"使用美军士兵替换大韩民国士兵。柯林斯事后证实："对于麦克阿瑟将军认为军队无法在鸭绿江畔高地停止进攻的回复，我至今无法苟同。"他解释道，他们可以通过在这些高地上安放火炮来控制鸭绿江。尽管柯林斯是麦克阿瑟的顶头上司，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还是没有把注意力关注在撤回美军部队这件事情上。

为了阻拦将军，联席参谋长们最后一次无力地尝试着要求他针对第8军团和第10军之间存在缺口的问题"提供信息"。从军队规制的角度来说，此举是在明白地暗示这位战地指挥官："你正在采取不必要的行动。"在这个案例中，联席参谋长们的做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曾于两周前迅速消失的中国步兵正潜伏在麦克阿瑟军队两翼之间巍峨的峡谷之中。但他并没有理会参谋长们的要求，反倒是飞抵了第8军团位于清川江的总部，发动自己的"大规模密集包围攻势"——这是他在11月24日发表的官报中的原话，同时提到这将对敌人形成"钳制之势"。他说："一旦成功，此举将在事实上结束战争。"

包裹着显眼的格纹围巾，他冒着严酷的大雪与军官们交谈，看着第8军团的美军士兵们朝着横亘在他们与中国之间的那片充满了不祥征兆的静谧绝壁迈进。他预测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剩下的就只有"肃清工作"了。在几位战地记者能够听得到的范围内，他对少将约翰·B. 库尔特说："如果行动成功，我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之前把小伙子们送回家去。"事后他牵强地解释道，自己的这番评论是为了鼓励士兵，提醒布莱德雷，军队很快就能被送往欧洲赴任，同时打消中国方面的疑心，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跨越鸭绿江的野心。但他想必也知道自己的属下会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他的话，尤其是他如今又在第24师的丘奇准将面前重申此话："我已向家乡的妻子和母亲们做出承诺，第24师的小伙子们会在圣诞节前返回国内。别让我变成一个骗子。拿下鸭绿江，我就放你们回去。"新闻记者们相信这将成为此战的最后一役，针对应该称之为"终战攻势"还是"圣诞返家攻势"产生了分歧。有人干脆选择把两个标题合二为一。

当天下午乘机返回东京之前，麦克阿瑟一时兴起，决定沿着鸭绿江飞上一

圈。他的参谋提出了反对，但这架未经武装的飞机还是进入了鸭绿江北岸的中苏防空高射炮的射程之内。在他的特别要求下，飞机载着他飞越了新义州，发现了70多架米格战斗机。执拗的将军坐在飞机上朝着它们挥了挥手。他相信，自己胆敢踏上这趟旅程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据邦克回忆，一位军官央求斯托里载他们飞越另一条河，坚称麦克阿瑟不会知道其中的区别，却没有成功。飞行员回答，他不能“对老大撒谎”。其他的所有恳求也全部失败了。惠特尼建议他们至少套上降落伞。将军笑着回答：“先生们，你们想穿就穿吧，我是不会离开飞机的。”

他们既没有遭遇高射炮的阻击，也没有碰到敌机的拦截。事实上，他们除了一片凄凉的、结了冰的空旷地形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麦克阿瑟写道：“当我们到达鸭绿江江口时，我吩咐斯托里向东转弯，沿着江水在5 000英尺的高度飞行。在这个高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观测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边境的整个国际无人区。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无边无际的贫瘠郊野、参差不齐的山峦、张着大嘴的裂缝和鸭绿江深色的江水……即便是有大型军队或庞大的补给火车穿越边境，其踪迹也会被鸭绿江流域断断续续的暴风雪所掩埋。”

事情的确如此。暴风雪和敌人出色的组织蒙蔽了麦克阿瑟的双眼，也欺骗了全世界。S. L. A. 马歇尔将中国军队称为：“无影幽灵，它的主要秘密（其实力、位置和主动权）都保持得十分完美，因而形成了双重武装。”威洛比的报告低估了敌军的规模，因为中国军队在跨越鸭绿江大桥之后一直都在避免与麦克阿瑟的军队发生遭遇战。马歇尔注意到：“我们既没有发觉他们的行踪，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集结。敌人的纵队只在夜里行进，日间休息时严守伪装纪律，到达选择地点，隐藏在村庄屋檐下，以免被人发现。高空观测并没有发现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平民难民也无人提及此事。因此，发现敌军的剩余机会就把握在了巡逻的战斗纵队手中。但我们依旧一无所获。”据马歇尔回忆，将军也未能发现敌军，因为他“缺乏足够的兵力去探查和潜行于边境地区敌军有可能隐藏的每一个角落”。鉴于“一支缺乏重型设备的原始装备部队在丘陵地带中所需的藏身之地比猎狐用的小屋还要小”，再多的兵力也是不够用的。

起初，麦克阿瑟的搜索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一篇官报宣称，他的士兵在“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向前推进了15英里。第二天，他汇报说，“联合国军的巨螯正按照预定计划移动……空中侦察……几乎没有发现敌对军事行动的迹象”。些许的麻烦出现了：“左翼进攻遭遇了顽固的……抵抗。”然而：“右翼仍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我们的损失极其轻微。后勤方面也为支持进攻行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军队和指挥官们的士气都反映了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和早日完成使命的承诺。”

11月26日星期日，他在汇报中提到，同盟军的强大攻势还在继续朝着中国

边境“越靠越近”，没有遭遇丝毫的抵抗。紧接着，星期一时，一则刺耳的消息传了过来：“敌军发起了强力反击……拖延了联合国军昨日的大规模进攻。”第一大楼告诫记者们不得未经证实就传播悲观情绪。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随着军官们的脸越拉越长，从沃克的第8军团和阿尔蒙德的第10军发来的急件堆成了小山。显而易见，事态有些不太对劲儿。威洛比直到当天深夜才将零碎的信息拼凑完毕，但早在那之前，问题的实质就已经十分清楚了。在绵延300英里的前线上，多如牛毛、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吼叫着从之前被将军形容为险峻得无法为军队提供掩护的“崎岖山脊”处冲了出来。麦克阿瑟给华盛顿和成功湖方面发去电报：“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他说，中国人一心想要“彻底摧毁”他的军队。布莱德雷在电话中通知杜鲁门：“麦克阿瑟将军发来了一则可怕的消息。”杜鲁门告诉自己的属下：“麦克阿瑟说他进退维谷，不得不转为守势。这已经不再是几个所谓的志愿兵的问题了。中国人动真格的了。”

身处亚洲外围的人是无法明白此话所蕴含的意义的，因为他们从未对中国这样人口资源几乎无穷无尽的国家发起过战争。沃克和阿尔蒙德已经被卷入了对抗30万中国士兵的战役中，而敌军的人数最终将呈4倍增长。某些美军部队甚至面临着以一敌十的困境。残酷的猛攻在他们的前线、侧翼和身后爆发。中国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炸弹席卷了美军士兵寻求庇护时途经的冰封小路和急转弯道。这还只是开端。毛泽东曾经写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旦联合国军的攻势弱了下去，中国士兵便会紧随其后。

他们的第一个进攻目标选在了麦克阿瑟战线最薄弱的位置，即第8军团与大韩民国第2军之间的结合处泰川。一支中国袭击纵队实际上彻底摧毁了这里阵脚大乱的大韩民国部队。志愿军的浪潮拓宽了沃克和第10军之间的隔阂，迫使前来支援韩国人的丘奇第24师退回了清川江对岸。到了11月29日星期三，《纽约时报》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铁骑已经“挑起了东部的美国第8军团与第10军之间的不和，并可能已与身处曾经的首都平壤东北的强大朝鲜军队会合”。与此同时，东边100多英里处，已经到达俯瞰长津湖水库的山区的第1海军陆战师在电报中称他们正面对一支新的中国之师。夜幕降临时，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已被包围，无法与兴南港的基地取得联系。

当被问及检验一位将军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时，威灵顿答道：“知道何时撤退，以及怎样撤退。”麦克阿瑟等了太长时间，并且按照艾奇逊的话来说，几乎挖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洞”。在敌人第一次突围之后，他在接下来的4天内仍旧继续催促自己的战地指挥官进军，迟迟不愿下达撤退的命令，直到他的居中部队遭到了破坏，被拆散的部队内侧又被敌人包围，右翼遭到孤立，左翼朝海边撤退。到那时为止，中国军队的数量显然已经足

以包围沃克和阿尔蒙德，同时还有足够的兵力南下夺回汉城。第一大楼内的灯光一直亮到了天明。将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和航空照片，搜索着可以拯救自己攻势的方法。最终，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他发布命令推迟了第8军团的一系列行动，并指挥第10军的士兵（包括第7师和第3师以及海军陆战队）打开一条出路，撤往海岸，投奔第7舰队。中国方面在广播中宣称将军一方正在“疯狂逃窜”。事实上，他的右翼军队撤离得干净利落。美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们组成了一列纵队，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中国军队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一直向东曲折行进，在零下的低温中沿着冰封的冻土小径前行。在某一时刻，他们似乎完全迷路了，面前只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很快，美军飞行员赶到了，用大型运输机运来了一座巨大的吊桥，将其安放在了峡谷上方。当幸存者们赶到兴南时，麦克阿瑟已经在那里等着向他们道贺了，他们很快登上了张着大嘴的登陆舰，奔赴釜山。

美国的同盟们为联合国军运势发生了令人震惊的逆转感到焦躁不安。美国总统也很是为之烦闷。在那可怖的第一个星期里，将军反复在报告中提到“局势稳定”这个词。杜鲁门尖刻地评论道，这是“一个公关人员在表达自己不清楚情势到底如何时的说法”。心烦意乱的总统在11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他们可能会对敌军动用原子弹，并似乎是在暗示决定取决于麦克阿瑟。此言一出，克莱门特·艾德礼急匆匆地从伦敦赶来。罗斯发布了一则“澄清”声明：“任何武器的使用都是由武器的持有者来决定的。”而且“只有总统”才能授权投放原子弹。这一声明让美国的同盟国们放下心来，但局势依旧糟糕透顶。听从艾奇逊的建议，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联席参谋长们通过电报通知麦克阿瑟：“我们把保护你的军队当作如今的第一要务。我们赞成在滩头上集结军队。”

在第10军成功撤退之前，东京和华盛顿方面曾经考虑过要将联合国军队全面撤出朝鲜半岛。11月30日，麦克阿瑟得出结论，在新的敌人面前维持战线是“十分不切实际的”。12月3日，他给联席参谋长们发去了一条措辞坚定的消息，汇报称除了海军陆战队之外，他的整个军队“精神已然倦怠，身体也已被击垮”，而大韩民国的军队又没有任何价值。相反，中国已经在战斗中投入了26个师的兵力，还有20万的后备力量。他说，敌军的士兵“精神抖擞、井然有序、训练有素、装配齐全，显然正处在巅峰状态中”。在等待回复的过程中，他告诉西博尔德，“将驻日美军全部或部分撤离（总数为4万人）也许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段令人绝望的日子里，杜鲁门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产生了巨大的转变。麦克阿瑟的使命不再是统一半岛。面对金日成拥有毛泽东作为同盟的局面，战事出现了转变。希望能够保住自身在华商业利益的英国人想要退出，而杜鲁门政府面对共和党日益激烈的批评也不打算采取温和的态

度。联席参谋长们一致同意把将军的军队全部撤回日本。然而，就在柯林斯飞抵东京与麦克阿瑟商讨细节时，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却说自己在发送电报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不再认为将第8军团和第10军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统一两军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实现，两支军队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如今，他们已经明白了中国军队的战斗技巧。平壤即将落入中国军队之手，而汉城的暂时失守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那之后，将军可以在三八线以南组建一条坚固的海对海防线。正如艾奇逊所说的那样：“撤军的事情平息了下来。”

美英两国报纸的读者以为联合国军被灰溜溜地击垮了。事实的确如此。但有关两军伤亡情况令人惊愕的报道却并非完全属实。实际上，麦克阿瑟的朝鲜半岛撤军是他最成功的军事行动之一。在首当其冲惨遭中国军队重创的美军之中，只有第2师受到了严重的挫败，但其25%的伤亡比例和美军在突出部战役中丧失60%兵力的案例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撤退行动进展得井然有序；1945年的硫磺岛战役所付出的代价是此役的2倍，而冲绳一役的伤亡总数（65 631人）更是将军第8军团和第10军的5倍（12 975人）。事实上，自麦克阿瑟登陆朝鲜半岛九个半月以来，他的全部损失仅是“二战”中欧洲战区同期的1/5。而中国军队为从他们手中夺取阵地所付出的代价则更令人震惊。

不幸的是，将军并没有下决心就此为止。拿破仑曾经说过：“我一生太常遭人误解，以至于我都不会为之感到惭愧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之所以不会感到惭愧是因为他拒绝承认丧失300平方英里来之不易的领土是一场灾难，拒绝承认他的“终战攻势”或“圣诞返家攻势”是不明智的。“据我所见，”他说，“我基本上没有出现战略或战术上的失误；在我看来……即便我事先预料到中国军队将发起进攻，联合国军的部署也无法得到改善。”注如今他声称，他北上的攻势根本就不具备攻击性，而是“一次军事侦察”——仿佛一位指挥官会调动自己的整支军队前去巡逻似的。敌人“希望能够在春天到来之前悄无声息地组建一支大规模的军队，一举击垮我军。如果我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就只能坐等灭顶之灾最终降临了。”

他从未如此优雅地回应过挑刺自己的人。如今，这种人的数量正在呈十倍地增长。可联合国远征军惩戒挑衅者的行动却是以糟糕的结局收场的。对联席参谋长们来说，朝鲜半岛一向只不过是外围战区，他们担忧的主要还是苏联对欧洲的威胁。事后，布莱德雷在总结朝鲜战争时将它称为“一场时间、地点和敌人都不正确的错误战争”。美国的同盟国们对此反应更加强烈。只要有过失的一方是朝鲜，他们就乐意付出最小的代价去惩戒它，换来公平。但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一同站在战场上、对抗一支他们不曾准备面对的庞大军队就是另一回事了。如今，他们准备兑换自己的筹码了，趁着尽可能少丢脸的时候离开朝鲜半岛。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军

队的溃败却让他们丢尽了脸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需要一个替罪羊。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的将军似乎就是个合适的人选。

在世界各国批判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声音中重复着某些特定的主题。有人指责他的军队不负责任，有人认为他没有布置好强大的防御阵地，有人指出在中国军队进军朝鲜之后仍旧发动进攻是对命运的愚蠢尝试。艾德礼、尼赫鲁和加拿大的皮尔逊暗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已经变成了美国决心摧毁中国的强大作战工具。英国最刺耳的反美主义声音《新政治家与国家》指责最高统帅“违背了所有常识，激怒了最热爱和平的国家”。左翼的英国工党人对此表示赞同，其中一人还表示：“如果中国人退回早先尚未被激怒的状态（显然为时已晚），他们是准备好了要坐下来和谈的。麦克阿瑟将军不但没有派人前去与他们谈判，还选择在暴风雪最大的时刻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和中国人相比，麦克阿瑟更应该为他们的苦难承担责任的呼声让某些美国学者也产生了共鸣，其中就偏偏包括了后来成为林登·约翰逊总统在越战问题上的主要鹰派成员之一麦乔治·邦迪。邦迪当时写道，美国和联合国政策都没有要求占领整个朝鲜，“而麦克阿瑟也知道……决定在他自己的手中，这是一种挑衅”。将军的同胞之中，很少有人意欲为他冠上“暴力教唆者”的头衔，但许多人（包括保守派在内）都认为他令自己失望了。亨利·卢斯的《时代周刊》声称他应该为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溃败，同时也是“美国遭受过的最惨痛的失败”负责。小加德纳·考尔斯的《展望》杂志说：“他大大错误地估计了敌军的意图、兵力和实力，而和我们如今处在同一立场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忠于一个会做出欠妥决定……导致迅速到来的灾难陡然恶化和加剧的领袖。”《纽约先驱论坛报》责备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由于“混淆了事实与情报而犯下大错”，从而导致了“美国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溃败”。该报驻朝鲜半岛记者霍默·比加特写道，将军对联合国军队“毫无根据的调度是没有意义的，从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戴维·布鲁斯认为麦克阿瑟的错误在于没有在“朝鲜半岛的固定战线和中立区域内”战斗，而奇普·波伦还告诉C·L·苏兹贝格：“最高统帅在为最近的这场朝鲜半岛侵略战推波助澜的过程中铸成了大错。如果，就像他现在所称的那样，他此举是为了强迫中国人在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之前就走上战场，那么他派遣单枪匹马的军队朝东北部进军的行为就是愚蠢的。他当场出丑……（无视）敌人总是会按照自己展现出来的能力行事这一基本军事设想；从我们刚刚在朝鲜半岛被敌人打得鼻青脸肿这一事实来看……他们的能力还绰绰有余。”

哈罗德·伊克斯说：“麦克阿瑟的话说得太多。”将军一直以来最讨厌的这个人说的是对的。他有很多可以为自己辩护的话，但既然别人也在喋喋不

休，他就应该把辩论留给他们。有些人提出的论点远不及他说的有力。军事分析家指出，李将军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拆分自己的军队。詹姆斯·赖斯顿告诉自己的读者，杜鲁门和将军一样坚信中国人不会介入。而斯图尔特和约瑟夫·艾尔索普则写道，政府不敢对麦克阿瑟加以限制，因为共和党指控他们对待中国方面的政策过于"软弱"。其他专栏作家认为，指责麦克阿瑟的感恩节攻势刺激了中国军队发起反击是荒谬的，调动25万兵力进行干预需要数周的时间来策划。有关敌军只不过是在保卫金日成的水力发电设施的说法也在调查中不攻自破。比方说，长津湖水库在美军到达的整整一个月前就被拆除了。而且预见中国是否会发起如此规模宏大的全方位干预战几乎超出了东京方面情报部门的能力范畴。正如威洛比在《星条旗报》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他的情报有误，我们很难将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时间和地点一拥而上的结果怪罪到联合国军战地指挥官的身上。如此重要的决定已经超出了当地军事情报监视的范畴，一切全都取决于'铁幕'和'北平方面'（原文如此）的秘密委员会。"

但生性敏感、受到了深深伤害的将军除了把辩驳留给别人之外，也只能承认他已经沦为了自己战无不胜的传奇的受害者，并展现出了德赖登的智慧："即使是胜利者也有无法达成的胜利。"然而他却猛烈抨击"战争报道的祸患"，谴责"前线记者不负责任，受到了国内那些毫无爱国心的人的帮助和教唆"。将军表示，他们应该把自己的报道限制在对他执行"战术撤退"时所采取的"高傲姿态"进行评论。紧接着，他开始给友好的记者们发送自己对事实的叙述版本。11月28日，他给一档名为《三星号外》的新闻广播节目的雷·亨利发去了一封自私的海底电报；两天之后，他为《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写去了回信；第三天，他接受了戴维·劳伦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编辑们冗长的采访，还给合众社的社长休·贝利寄去了一封长信。与此同时，他还在与伦敦《每日邮报》的沃德·普赖斯、国际新闻社的总编巴里·法里斯以及从东京记者团里挑选出来的几位成员对话和通信。

他说，他的军队士气遭到了"误导性的匿名流言"的暗中破坏。他告诉贝利，一心只关心自己大陆安全问题的欧洲领导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克罗克曾经向他求证，问他是否收到过要求他止步三八线的建议。将军回复道："无论如何，你所提到的匿名流言都是无效的……我没有从（任何）权威人士那里收到过执行任务的部队应该在三八线、平壤或任何远离国际疆界的战线处止步的暗示。"他向法里斯抱怨自己在"近代为曲解真相而展开的最可耻的一次宣传攻势"中沦为了受害者。"任何人以为我作为联合国军指挥官不过是在执行上级决议的想法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声明威克岛会议批准了英方提出的让联合国军止步于远离国际疆界的提议纯属无稽之谈。"在回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问题时，他指责华盛顿方面让敌人的战机在中国东北有了藏身之处，并称此举给自己带来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障碍"。

白宫的主人也是被他深深吸引的听众之一。杜鲁门刻薄地告诉自己的顾问，麦克阿瑟“说得很明白，他和他的参谋都不该遭到责备”。总统是对的，但同样属实的是，政府也不愿承担自己的那一部分罪责。没有人曾建议将军在三八线前停攻。据大家所说，威克岛上也无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这是身处首都的政府发言人告诉记者们的（不是为了归因判断，而是为了发表公布），赖斯顿就是其中的一员。和他们不同，将军愿意让别人引用自己的讲话，但这就是困难所在，他的指控让政府感到十分难堪。杜鲁门说，在麦克阿瑟“不再因为他的伤亡情况不及艾森豪威尔指挥的阿登战役那样惨重而遭受责备”的同时，他的口无遮拦可能导致“许多海外人士认为我们的政府会改变自己的政策”。紧接着杜鲁门又说道：“所有的少尉都最了解自己的人马应该做些什么。在上司无法站在少尉的角度看问题时，他就认为上司们瞎了。但麦克阿瑟将军（他是对的），会把任何一个在媒体采访过程中表达异议的少尉送上军事法庭。”

总统并没有提议把将军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但他的确正在考虑“就地”为他解职。他事后写道，自己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一位将军“不可能一周七天都打胜仗”，也是因为：“（我）不希望让这次的解职看上去与进攻失败有关系。我从没有想过要在别人不走运的时候落井下石，现在也不打算这么做。我更不想谴责将军，但我必须告诉他，他所做的这种公开声明是有违规制的。”杜鲁门说自己“不会允许这样的混乱状况继续下去”。因此，为了让麦克阿瑟闭嘴，他命令艾奇逊和乔治·马歇尔于12月6日发布了两条命令，要求任何演讲、通讯稿或其他声明在发表之前都必须经由国务院或国防部批准，以“确保公之于众的信息内容准确且完全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第二条命令还明确，“驻外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和外交代表……在发表公开声明时都应格外谨慎……不得发表除其所在部门的例行声明外的一切内容……避免就军事或外交政策问题与报纸、杂志或美国其他宣传媒体进行直接交流”。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中，杜鲁门赞扬了麦克阿瑟“杰出的领导能力”，否认自己压抑了对方自由发表有关战争言论的权利，但所有人都知道将军就是这些新规的目标。在麦克阿瑟与五角大楼的一番对话中，新规第一次得到了验证。将军告知国防部，自己想要回信纠正《纽约先驱论坛报》批评威洛比的社论中出现的事实错误。陆军部拒绝了他的申请，解释道：“我们应该避免卷入与媒体的争论之中。社论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你的反驳可能遭人断章取义，从而损害你自己的意图。因此，我们有必要否决你的主张。”不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战地记者在一篇异想天开的报道中提到联合国某军从战场上狼狈逃窜之后被宣布不适合战斗，还说缺乏弹药的中国士兵不得不在死尸身上翻找武器。面对“装备很差却又势不可当、骑着骡马和骆驼的中国士兵”，麦克阿瑟的“机械化军队正乘坐吉普车和卡车逃遁”。将军准备了一份书面反驳，希望“能够重塑对朝鲜战争全貌

的看法，打消美国人民心中的疑虑”。这份文件也被发往华盛顿方面送批，却被陆军部拒绝，理由是此举与“总统的意图”不符。

罗伯特·A. 塔夫脱告诉参议院，总统的意图是钳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言论。他是对的。在塔夫脱政党的猛烈炮轰下，白宫方面试图避免在东京建立第二战线。诚然，在起初的几个月中，总统与第一大楼中的决定性人物之间的紧绷状态只能通过美国当年的政策背景来理解。11月7日，也就是将军申请进行紧急越境追击的那一天，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参议院中的10个席位，并失去了众议院席位数的2/3。选举的主要问题在于外交政策。看到伤亡名单、战场僵局和同盟国政府意图安抚中国的渴望，幻想破灭的选民使得共和党加强了势力，而对公众情绪有所察觉的共和党人也团结在了将军的身边。

国会山上，两党就是否应该向欧洲派驻更多美军和政府又是否可以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派兵的问题展开了所谓的“大辩论”。在赫伯特·胡佛的支持下，塔夫脱辩称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0%都投入军事预算当中、加之联席参谋长们“对在欧洲发起一场地面战争的极大强调”有可能摧毁美国经济。迎合孤立主义者不信任与他国结盟的心理，塔夫脱和胡佛提出了叫法五花八门的“美国堡垒”原则，也被称为“大陆主义”。这一原则并不如听上去那样与世隔绝。按照胡佛的话来说，他们建议守卫大西洋和太平洋，“将一边的战线设在英国，另一边则设在日本群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沿线”。鉴于美国已经投身于朝鲜，塔夫脱对半岛还有些举棋不定。他说，美军要么该撤回日本，要么就该发动全面战争、取得胜利。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有限军事行动概念是塔夫脱和其他共和党领袖永远无法接受的。因为麦克阿瑟对他们表示了赞同，所以总统封锁了他的言论，希望能够减少让政府采取反对派政策的压力。考虑到将军的性情和坚定信念，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政府迟早要面对颇受欢迎的将军凌驾于他们之上对同胞们发出呼吁的可怕景象，从而引发一场尖酸刻薄、令人筋疲力尽的更大规模辩论。

在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阿提卡悲剧中，英雄是魁梧正直、拥有强大意志力的人物，是外表风度翩翩、内心热情似火的矛盾体，能够意识到邪恶、绝望、苦难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顾希腊戏剧合唱队的忠告评论，选择危险做法的英雄会勇敢地徒劳对抗命运，忍受残暴以及最终的失败。从这些戏剧中可以看出，英雄最终的毁灭是其性格上的致命弱点遭纷乱的世事深化后的结果。

这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经历的写照。勇敢、杰出、伟大，他是骑跨在朝鲜半岛的巨人，直到自己被骄傲自大招致的报应所制服。他只不过是无法忍受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被人置于死地。在他看来，这将是对自己使命的背

叛，是在承认麦克阿瑟的不完美。政治一直都是他的夏娃，充满诱惑又危机四伏，令人向往又是不祥之物。如今，他认为自己的政敌（任何阻挡他去路的人都是他的敌人）正在阻挠他的最后一场圣战。相信华盛顿方面不仅拒绝给予可供他完成工作的工具，还将他贬至他所说的“优柔寡断的真空地带”，他鄙视联席参谋长们丧失获胜意志的心态，打算依靠把中国人抵挡在海湾之外挨过那个冬天。他试图劝说上司站在他的角度看待问题。

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东京和华盛顿方面夜以继日地不断召开电话会议，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但政府领导人是不会抛却自己的目标、转而接受他的目标的。坦白地说，美国没有足够的年轻人，而美国的同盟们也缺乏足够的热情供他们在战胜中国的同时加强北约的防御。6个月前，联合国在谴责人民军时反应还十分迅速，可如今，世界舆论自身却发生了逆转。跟随麦克阿瑟道路的风险实在是令人生畏：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可能会硝烟再起，北京的苏联同盟也许会介入其中，还有原子弹所带来的大屠杀。因此，摆在将军面前的是模糊不清的未来。联席参谋长们会告诉他，他既不能取胜也不能退出；他们下令他只能坚守阵地，并模棱两可地解释道，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应该层层设防保护自己。也就是说，在“朝鲜半岛的某些位置”发起成功反抗是“非常可取的”，但亚洲（其他地方）“并不是发动主要战争的地方”。

特朗布尔·希金斯评论道，不可避免的是，“和将军频频获胜的那段短暂时期相比，战败的麦克阿瑟并不甘心接受美国政府的政策”。仁川之战的光辉如昙花一现。杜鲁门也面临两线作战；将军要面对的是中国人，而总统要面对的是共和党人。阿尔杰·希斯入狱后，共和党要求曾在议会会议中表示自己不会背弃希斯的迪安·艾奇逊辞职。杜鲁门写道：“麦克阿瑟将军为那些对艾奇逊怀恨在心的人提供了论据，让他们可以据此集结力量发起进攻。换句话来说，他们之所以想要打垮艾奇逊，是因为他支持我的政策。”总统认为：“正如在过往战争中所表现的一样，麦克阿瑟展示出了杰出的领导力。但是作为一个士兵，我希望他能够接受政府决心做出的政治决定。”由于将军坚定的信念阻碍了这一点，东京–华盛顿轴心动摇了。白宫和第一大楼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多，民调则显示民众已经对政府失去了好感。乔治·盖洛普发现杜鲁门已经落后于塔夫脱。莱维罗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他的“威望值碰巧就是一条下降的曲线”。莱维罗补充道：“然而，他必不可少的自信无疑并没有改变。”简而言之，总统不打算向将军屈服。

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了围攻。他写道：“抨击他的话变得尖酸刻薄……大部分批评来自参议院中有时被称为‘中国优先集团’的成员。这些人不断重申完全没有依据的指责，认为艾奇逊才是中国取胜的原因，而他如今又要剥夺麦克阿瑟将军获胜的机会。”政府领袖对将军易怒急躁、有时甚至

充满恶意的看法反映了他们的受困心态。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A. 洛维特抱怨麦克阿瑟正在准备“流传后世的文书”——为无法在战争中获胜寻找托词。艾奇逊则进一步写道，将军“近乎恐慌”“惊恐万分”。艾奇逊说：“稳定朝鲜战争的努力几乎包含了朝鲜半岛、联合国和东京三条战线同时做出的努力。而最棘手的就是最后一条战线。”

总的来说，历史学家是同情政府的。沃特尔·米利斯总结道，将军“在政策和战略都根据他的喜好做出转变之前是不会行动起来的”；约翰·W. 斯帕尼尔推论“他似乎是在说，他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条件与政府合作”。虽然此话不假，但五角大楼方面下达给他的指令却同样令人闷闷不乐。克拉克·李注意到：“一种无力的状态支配着华盛顿，连续几个星期，麦克阿瑟一直都在遵循自己最初接到的、如今已经没有意义的命令进行战斗，而政府从那以后采取的唯一积极的行动就是试图让麦克阿瑟保持沉默。”对加文·朗来说：“华盛顿的领导人们似乎有些茫然不知所措。麦克阿瑟已经违背了一项命令——只派遣大韩民国军队前往前线省份。他接下来又会做什么呢？”

实际上，这项命令并不清晰。当将军提出马歇尔对它进行过改动时（“在战术和战略上毫无阻碍地……三八线以北”），五角大楼就此罢休。事实上，美国最高指挥部似乎十分惧怕将军。艾奇逊告诉我们，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为麦克阿瑟进行了辩护，说战争不能在缺乏委员会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此话当真，联席参谋长们就应该被解散。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战区指挥官，而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的唯一解释就是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名声令他们感到畏惧。R. F. 韦格雷在《美国陆军史》一书中写道：“麦克阿瑟始终可以不受干扰地自行决策。联席参谋长们尊重他的经验、军衔、名誉、对远东的情感投入（尽管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这种投入）以及他作为一个被共和党领袖栽培和敬重的人所拥有的无限却又有可能带来危险的政治力量。”韦格雷继续写道：“他们实在是不情愿在军事判断的问题上干涉麦克阿瑟，于是催促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去与总统交涉，好让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合并他的军队。”但艾奇逊（和马歇尔）行事同样谨慎。据马修·李奇微形容，在一次五角大楼会议上，他提议坦率地建议将军服从命令，随后却引发了国务卿、国防部部长和联席参谋长们“令人胆寒的沉默”。离开会场，李奇微告诉自己的密友霍伊特·范登堡，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清楚地告诉麦克阿瑟应该做些什么。范登堡答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他是不会听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李奇微说：“你们可以解除任何不听指挥的指挥官的职务，难道不是吗？”他记得范登堡带着“迷惑而又惊奇的表情”走开了。

1950年12月23日，当沃克在冰封的朝鲜公路上乘吉普车遭遇车祸身亡，马修·李奇微便成了日趋严重的争议中的关键人物。放弃柯林斯的副手一

职，李奇微乘机前去接任联合国地面部队（即第8军团与刚刚合并进来的第10军）指挥官一职。麦克阿瑟疲倦地说："第8军团是你的了，马特（马修的昵称）。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马特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证明最高统帅不是战斗中必不可少的人物。沃克身亡4天之前，麦克阿瑟曾通过电报告知华盛顿方面，要想让他的军队稳住前线，就需要再派4个师的新鲜力量过来。李奇微说，他相信自己能够用手头的36.5万兵力应付48.4万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结果，在如今围绕三八线进行的阵地战正面交锋过程中，直截了当的李奇微和需要更大的战场来实现自己战略奇迹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至少可以称得上是不相上下。在第一大楼尚未伸出援手之际，联合国军战线上的局势就出现了好转。李奇微派出了谨慎的侦察巡逻兵，还安排了强大的武装先锋部队前去支援。菲利普写道："敌人安心地充分利用厚厚的积雪和朝鲜冬季里势不可当的低温全面掘壕固守。几个星期以来，两条战线像互相碰撞的海潮一样徒劳地向彼此涌来，这里夺取几英里，那里失守几亩地。但逐渐的，几乎是一英里接着一英里，李奇微的军队向前挪动着，绝不肯放弃自己昨天赢得的战果。"

与此同时，在他的新任战地指挥官与敌人对阵时，麦克阿瑟还在继续对抗华盛顿。那几个月间，东京和五角大楼方面的往来电报揭示了令人痛苦的模式的形成。将军请批轰炸某特殊目标——中国东北的一处道路交叉点，或是朝苏边境附近的一处朝鲜补给仓库。面对联席参谋长们的拒绝，他要求对方进行说明。他们解释道，美方不希望进一步扩大战事。此话引发了麦克阿瑟一系列愤怒的争辩。他说，远离敌人的基地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正在组建一支拥有百万兵力的突击部队，而中国方面更是"全身心地明确"投入了朝鲜战争。如今，美国无论做些什么都已无法进一步激化局势。他说："在一场未曾宣布的战争中，这支小小的军队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双方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继续这样作战意味着一场"野蛮的杀戮"，且毛泽东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将"在军事上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们"。除非允许他对中国宣战，否则他是无法拯救自己的军队的。害怕苏联人介入是缺乏正当理由的，在西伯利亚遭到入侵之前，苏联是不会参战的。于是他继续没完没了地重申自己的观点。参谋长们从不会用过多的言语解释自己准备让志愿军占有战场（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会在书面上给自己留后路的人），但他们在回复中已经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年末，按照威洛比的话来说，中国人"发起了最后一次惊厥而又血腥的努力，意欲让他（麦克阿瑟）在战场上丢脸"。三八线沿线的温度下降并保持在了零度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人民军每晚都会发起进攻。联合国军战线开始弯曲、崩溃。新年前夕，就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声响起时，一场大规模的猛攻翻腾着穿过厚厚的积雪朝着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守军们涌来。1月4日，汉城第二次失守。敌军再一次实现了重大突破，隔开了位于半岛中央原州市的美军分遣队，切断了整条联合国军前线。华盛顿方面，

艾奇逊因为“沉闷的失败所产生的恶臭以及远大希望与广泛目标的破灭”而病倒了。

此时此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情绪很难揣测。威洛比写道，将军“自己做出过清醒的评价……准确预测到中国军队……会缓慢地退化”。麦克阿瑟自己也宣称：“在欧洲和美国大部分媒体都歇斯底里地叫嚣着联合国军‘将被推回大海’时，我却从没有考虑过自己会在朝鲜半岛上战败。”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提出了警告，“除非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否则还是有理由预见这样持续消耗下去终将导致（他的军队）全军覆没”。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将军认为：“如果我们不打算扩大战事，唯一的剩余选项就是逐渐收缩我们在朝鲜半岛的阵地，直至退回釜山滩头……尽管这将给亚洲人的士气带来糟糕的影响。”也许麦克阿瑟希望利用共和党可怖的指控（在失去中国之后，杜鲁门和艾奇逊如今正失去朝鲜半岛）来威胁政府，赢得其对更加激进的政策的支持。然而政府是不会在这种压力下屈服的。事情的根源在于联合国各成员一致呼吁武力统一半岛的决心被悄无声息地抛弃了。如果李奇微能够挺住，联合国准备勉强接受战前的状况：两个国家，相互不信任彼此——而这个结局是麦克阿瑟所不能接受的。

但从没有人明确地让他接受这个结局。“我所需要的，除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他事后写道，“还有应对新局势的清晰政策定义。”当他就此提出问题时，他们不出所料地做出了这样的回复：“从联合国其他成员手中获得可供派往朝鲜半岛的大量援兵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面对越发严峻的全面战争威胁，我们不应该将手中剩余的地面部队投入到对抗朝鲜半岛的中国军队这件事情上。不过，就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说，在不招致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的某些阵地上成功抵抗中国–朝鲜的攻势、打压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声望还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灵感，这话不知为何不如《大西洋宪章》令人动容。回复既没有给予麦克阿瑟任何实质的目标，也没有为他提供指导和崇高宗旨，只是模棱两可地暗示他去玷污中国政府的公众形象，做出一些不需要付出太多血的代价的努力。既然战争的运势已经不再有利于他，未能对他在仁川的胜利加以利用的美国外交官们也感到同样的无助。随着误解和怀疑的鸿沟在将军和他们之间日渐扩大，据他的一位副官回忆，将军感觉“‘二战’中目中无人、只顾挖苦讽刺别人的大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离开了，替代他的是一群似乎对拖延时间而不是杀出一条活路更感兴趣的小个子人物”。

华盛顿与东京之间持续对话的决定性时期开始于1950年年末的节日期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和财政部部长约翰·W. 斯奈德在布莱尔国宾馆召开了一次会议。三天之后，根据他们的指

示，五角大楼方面询问麦克阿瑟，如果联合国军阵地陷入绝境，他建议采取什么行动。1950年12月30日星期六晚上，他回复道，坐以待毙地等待陷入无望的困境是没有用的。他表示，如果美国或联合国选择“承认被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战争状态”，他说，他们应该现在就授权他：“①封锁……中国海岸；②通过舰船炮火和空中轰炸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工业生产能力；③如果我们决定继续为半岛而战，就要确保从台湾国民党卫戍部队手中获得适当的增援；④放松限制，允许台湾卫戍部队发起牵制行动，有可能的话引导中国大陆薄弱地区发起反入侵行动。”他表示，这些手段将“狠狠削弱从而抵销中国发动战争的能力”，且不仅能够确保朝鲜战争的胜利，还能“让亚洲免于被吞食的局面”。他还表示，可供替代这一提议的选择就是失败，即“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运用战术计划成功地缩小釜山滩头以南的防线，以便完成撤离”。

华盛顿方面收到这则信息之后陷入了惊慌失措的状态中。除了这些步骤有可能导致世界冲突之外，许多中国通还怀疑它们是否能起作用。鉴于麦克阿瑟曾经亲口称国民党军队“无能”，他此次提出接受蒋介石派兵着实令人感到惊奇。“二战”中实施战略轰炸的经历预示着该计划的实施必然造成大量中国平民丧生，从而激怒国际舆论。此外，实施海上封锁是无法破坏中国方面来自苏联的陆路主要补给线的。不仅如此，正如国务院指出的那样，“考虑到英国通过香港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范围”，封锁“中国沿岸还需要与英国进行谈判”。

杜鲁门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紧急会议，权衡将军的计划，并起草了一封回函。离开病榻前来参加会议的艾奇逊想要告诉麦克阿瑟，他应该专注于“给敌人带来最大程度的损失”这个问题；总统认为自己应该提醒他，他的首要任务是“军队的安全”和“他保卫日本的基本使命”。如果守护朝鲜半岛桥头（釜山）需要付出的代价过高，他就必须撤回日本。1月9日，在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的批准下，联席参谋长们给将军发去了电报，提到他的建议“已经并正在得到仔细的考量”，但“政策改变或加强我们在朝鲜半岛投入的其他努力的可能性并不大”。除了需要获得伦敦方面的批准之外，有关封锁的建议“必须等到我们在朝鲜半岛的阵地趋于稳固或撤出朝鲜半岛”时才有可能被采纳。轰炸中国城市的提议“只有在中国进攻朝鲜半岛以外的美国军队”时才会得到支持。“考虑到国民党军队不大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及他们有可能可以在别处发挥更大的用处”，调动国民党军队的提议也遭到了拒绝。因此，他应该在半岛上支撑下去，避免“人手和物资的严重损失”。如果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不知所措，他应该“从朝鲜半岛撤回日本”。

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一位副官把这封回函称为“诱杀陷阱”——即对方试图把灾难的责任推到他身上。用将军自己的话来说：“直接把申请打了回

来。”相信自己没有得到明确答案，他提出：“按照目前的组成来看，我的军队实力显然不足以在守卫朝鲜半岛阵地的同时保护日本不受外来入侵。”他表示，如果他的军队继续受困于来回摇摆的僵局之中，他就无法保证日本的安全；他应该得到增援或被准许离开半岛。他继续说道：“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现有的军队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可以守住朝鲜半岛上的滩头战线的，但这是无法在没有任何损失的前提下完成的。而这些损失会是否会被视为‘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取决于提出这个术语的人话中的内涵了……这个问题真正归结于美国是否打算撤出朝鲜半岛，并且涉及了极其重要的国际性决定，完全超出了一位战区指挥官的能力范畴。”他是在暗示有关这件事的决定不应该取决于“敌人行动的决断，而这一决定性因素实际上正是对你们信息的合理解释”。紧接着，在联席参谋长们身上插了一刀的他又拧转了刀把：“在强加于朝鲜半岛军队身上的离奇限制和条件下……其军事阵地是难以防守的，但如果在全军覆没之前暂时不顾上述政治考量，它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需要你方做出澄清。”

艾奇逊认为：“如果麦克阿瑟真的准备为自己寻找托词，这就是他准备的书面材料，以便事情出错时为自己脱罪，同时在最大限度上对华盛顿施压，迫使它改变主意、采用他的建议扩大对华战争。”这是其中的一种解读。作为受困于议会批评声的国务卿，他会站在这个角度看待此事也是无可厚非的。不带有如此浓重的党派性的解读不会拖累任何政党，或是会对大家一视同仁。他们知道自己正身处不可能的情形之中，所以所有人都试着要摆脱困境。政府相信麦克阿瑟会冒着与苏联宣战的风险来挽救自己的军事声誉。考虑到对中苏关系的了解，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很小，但眼下谨慎行事似乎才是明智的。另一方面，将军却在看着自己的士兵白白送命。如果要为他们的牺牲赋予任何的意义，就需要重新考量联合国的政治目的。麦克阿瑟的批评者们指出，在这一方面下定义并不是他的工作。他们是对的。但总得有人行动起来。要不是他的军外上司们在他的刺激下所进行的尝试遭遇了碰壁，他也不会去尝试。

华盛顿方面对麦克阿瑟的“澄清”请求给予的反馈是对政府迫切想要配合他的一份颂词。首先，联席参谋长们给他下发了一条命令，重复了之前的指令——正如布莱德雷事后所证明的那样，“换句话说”，就是告诉他“留在朝鲜半岛”。紧接着，他们决定给他寄上一份备忘录的副本，即参谋长们交由国防部部长马歇尔和其他政策制定者们考量的全新“十六点撤退计划”。这份未曾在参谋研究会议上公布过的绝密文件创建于11月（日后它将成为麻烦的根源），提出了联合国如果被迫彻底从半岛撤军需要采取的行动。然后，应艾奇逊、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的要求，杜鲁门总统给麦克阿瑟写去了一封长长的私人信件，就朝鲜半岛问题确定了“我们的国家与国际基本目标”。总统的语气是彬彬有礼、几近恭顺的，他安慰将军，朝鲜局势得到了他“极大的关注”，还列举出了抵抗入侵的10个目标，盛赞将军“出色

的领导力”和“杰出的表现”。他说：“我们的行动应该是能使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团结在一起的……在我们的国力尚未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在涉及敌对行径的问题上审慎行事。会将日本或西欧牵扯到大规模的敌对行动中的步骤，哪怕有充分的理由或有助于朝鲜战争，都是有害的。”他说他想要加强联合国、美国的同盟以及抵抗任何地方的侵略行动。艾奇逊将这份措辞圆滑的文件视为：“总统发挥想象力给自己的战区指挥官书写的亲切、周到的书信……除此之外，没有哪种信息更能激起一位指挥官衷心了。”另一方面，克拉克·李认为这是“虚与委蛇的典型例子……模棱两可、暧昧不明”。事实上，这封信里隐藏着广泛的概括性，字里行间都表达出了总统对事态发展的原则了若指掌。

负责传递命令的柯林斯和霍伊特·范登堡将备忘录、杜鲁门的信和最高统帅可能存在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全都带到了东京。阅读完总统的书信，麦克阿瑟说了一句：“我们会尽力的。”实际上，他似乎尽力误解了对方传达给自己的所有信息。他认为杜鲁门是在指示他奋战到底，直至征服敌人。尽管柯林斯大声地为他朗读了参谋长们的备忘录（确保麦克阿瑟及其参谋不会曲解它），将军还是选择了从顺应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它。如果联合国军被赶出了大陆，可供将军权衡的16条可行性行动步骤包括封锁并对中国海岸进行空中侦察，和调遣蒋介石的部队。参谋长们“试探性地”同意把这些选项拿到计划于1月17日召开的下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并且没有征求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的意见。结果这三个人都对这些选项表示反对，但麦克阿瑟却离奇地认为它们如今已经成了美国的政策。他欢欣鼓舞地告诉自己的参谋，参谋长们“终于克服了对中国发起反击会引起世界大战的幻想”。这简直是大错特错。不出所料的是，他永远都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第二年春天，他在国会山上做证时表示：“提交国防部审议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后的建议。”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问道：“你有没有得到指令，不得执行这一建议？”麦克阿瑟答道：“没有，先生。”拉塞尔说：“所以说，如果这是联席参谋长们的建议，它要么就是遭到了国防部部长的反对，要么就是被美国总统否决了？”将军回答：“我是这么推测的，先生。”在国会山上，此话很快就被政府的批评者们用来指责迪安·艾奇逊破坏了五角大楼批准的赢得战争的计划。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野蛮的政治方式。

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未仔细考量过这份充满争议的备忘录，因为柯林斯和范登堡在1月17日之前就提交了他们的报告。如果麦克阿瑟在他们停留期间还是糊里糊涂的，那他们可是洞若观火，返回华盛顿时更是深受启发。5天时间里，他们大多是在朝鲜半岛上度过的。将军向他们保证，即便他被驱逐出半岛，也还是会在一系列离岸岛屿上继续作战——他将它们称为“沿海岛屿链”。在前线视察了一圈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发生这种结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军的士气高涨，实际上，李奇微认为自己的阵地

固若金汤。这一发现标志着麦克阿瑟在联席参谋长们心中的优势地位已经开始终结。此后，他不再是战略计划中的力量。直到那时，五角大楼方面一直都以为他之所以会预言可怕的悲剧即将降临是因为他的建议遭到了忽视。他们总结道，如果他在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出错，那就说明他比他们想象中的还不可靠。米利斯写道："无须多言的是，随着柯林斯到达远东，麦克阿瑟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终结了。也许这就是他令别人相形见绌的职业生涯的真正结尾。有人说，柯林斯……在东京降落时一直以为撤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到达朝鲜半岛前线时就该意识到，有关美军身陷险境的说法显然只是夸大其词……麦克阿瑟为所有的可能性都做好了准备，除了一点——成功的可能性。"从此以后，五角大楼方面将视他为一个暴躁执拗的老头，在东京噘着嘴，鄙视那些如今得到了联席参谋长们支持、无视他预言此役注定失败的警示的政客们。将军对反麦克阿瑟阴谋的预言似乎最终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

然而……

李奇微继续充实着自己的防御。他投入后备军堵住了原州的峡谷，开发空军优势，熟练地从两翼调遣军队，等待着敌人新年前夕的进攻热潮逐渐退去，准备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重组一次反击。两位参谋长从羽田机场起飞回国后的第8天，他用两个军团力量将前线猛然向北推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直到把敌人推回三八线以内才停下"。夺回汉城之后，杜鲁门写道："战争的浪潮开始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涌来。"就连麦克阿瑟也承认"没有人会把我们赶进海里"，引得艾奇逊欣喜地评价道："说来也奇怪！"巴黎方面，C·L·苏兹贝格写道："将军似乎犯了三次错误：误解了有关中国军队的情报；不必要地拆分了自己的军队；预言我们撑不下去。"

然而……

麦克阿瑟劝说李奇微给柯林斯写信，强烈催促他批准国民党补充兵员从台湾起航，加入第8军团。这一提议遭到了直截了当的拒绝。第一大楼里，将军闷闷不乐地告诉西博尔德，除非他被允许大胆进攻敌人，否则帮助李承晚统一朝鲜半岛的梦想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绝望之中，他意识到自己在华盛顿的声望已经一落千丈，不过于2月11日通过电报把自己最大胆的计划发回了国内。首先，他将"运用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清洗敌后的整个朝鲜山区"。紧接着："如果我仍旧没有获准进攻大举跨越鸭绿江的敌军援兵，或动手摧毁江上的桥梁，我将通过在敌军主要补给线沿线放置放射性垃圾（核电生产的副产品）来切断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之间的联系。"最后："我将在朝鲜两边的海岸北端同时发动两栖和空降登陆行动，收紧巨型陷阱。中国军队很快就会饿死或投降。没有食物和弹药，他们会变得十分无助。情势将与仁川之战类似。"他一边回味那个光辉的时刻一边总结道："但规模更加庞大。"联席参谋长们草率地回复道，这些都不值得考

虑。2月13日，他再一次徒劳地提出抗议说："敌人保护自身军事潜力、防止我们反攻中国领土的空前军事优势削弱了我。"艾奇逊简洁地评论道："据范登堡和柯林斯两位将军汇报，情况并非如此。麦克阿瑟进攻中国领土的意图再一次遭到了当局的拒绝。"显然，政府已经把将军视为是一位不可靠的指挥官了。

然而，然而……

然而这一切全都是错觉——他们相信解决方案已经被找到，认为麦克阿瑟已经被驳倒，幻想联合国无论如何已经取得了胜利。在李奇微的反击进行到尾声时，两支蜷伏着盯着彼此的军队在南北两边占领的阵地和战争爆发时差不多是一样的。如果将军的解决方法是无法被人接受的，那么李奇微的也不应该例外。第8军团的这位新战地指挥官躲开了麦克阿瑟轻率预测的溃败，从而为将军的批评者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将军的致命弱点。不过，在前线上，麦克阿瑟的这位继承人除了夺下了几英里被炸弹轰炸过的贫瘠土地和汉城的废墟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还不及皮洛士在阿斯库路姆、贝当在凡尔登或黑格在帕斯尚尔所获得的胜利。

在朝鲜半岛上的硝烟散去之前，预计将会有500万人（包括54 246名美军士兵）无谓地丧命。麦克阿瑟没有找到打破僵局的出路，但他至少明确了问题的本质。他辩称发动战争就是为了取得胜利，"犹豫不决的"僵局是没有意义的。他为此招致众人的嘲笑，可后续事件却表明他比那些嘲笑他的人更理解他同胞的本质。韦格雷写道："1952年的总统选举证实，美国人对有限战争的疑虑会导致发起战争的政府面临政治上的毁灭。"

罗维尔和施莱辛格指责杜鲁门"未能令人心服口服地向美国人民阐明他们为什么深陷困境……告诉他们必须学会与危机共存"。他们永远也学不会。15年之后，另一代政客又让这个国家卷入了与亚洲共产主义的另一场战争中——在这场冲突中，麦克阿瑟的建议也会被一脚踢开。人民再一次受到了折磨，心神不宁，难以控制。早先的全民公投抗议被证明是徒劳的。他们走上街头，把国家推向了暴动的边缘。

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家领袖（总统和两党）都隐瞒了自己的疑惑。但他们也同样感到了挫败。和麦克阿瑟一样，杜鲁门也以自己的方式遭到了抵制。1951年春天彻底垮台时，他们都为自己压抑的敌意找到了目标。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找到了彼此。

---

1. 该决议于6月27日星期二晚上10点45分通过，投票结果为7票赞同、1

票反对，其中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苏联仍旧缺席，还在因为联合国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不参加安理会的会议。

2.　　年过七旬的总统告诉默尔·米勒，他从没有认真考虑过要使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他们能派得上什么用场呢？他们根本就不行，从来都不行。”除了其他的信息来源，以上陈述来自艾奇逊的回忆录以及总统于1956年发表的回忆录。

3.　　他没有补充的是，在这两个案例中，日本人的胜利局面很快就被国际外交干涉打破了。

4.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档有关威克岛会议的电视特别节目都把将军对待杜鲁门的态度描绘为无礼。这些节目的内容来源于莫尔·米勒对前总统和他的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的采访。格雷厄姆说：“麦克阿瑟试图故意推迟自己的降落时间，好让我们先他一步到达。当即恍然大悟的哈里告诉麦克阿瑟：‘你们先降落吧。我们还有不少油呢。我们会等你的。’”杜鲁门本人告诉米勒：“我知道他试图想方设法地纠结到底谁的飞机该先降落。我是不会让他躲过去的。”

　　这些话全都似是而非。本书的描写基于档案的记载，包括托尼·斯托里的飞行记录以及邦克、佩斯、穆乔、哈里曼、腊斯克、墨菲以及《时代周刊》的罗伯特·舍伍德的回忆。杜鲁门离开白宫后不久书写的回忆录中仅仅写道：“麦克阿瑟将军在我走下飞机时正等在斜梯脚下。”（陪同杜鲁门的）腊斯克告诉本书作者：“杜鲁门总统在接受莫尔·米勒的采访时所做的描述仅代表一位老人错误的记忆，而莫尔·米勒也是故意这样描述的。”（跟随麦克阿瑟的）穆乔补充道，暗示麦克阿瑟粗鲁无礼的话“纯属虚构”。

5.　　戴维·康韦尔（约翰·勒卡雷）在给作者的信中写道：“没有人知道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实际上泄露了什么。这难道不奇怪吗？也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泄露这些秘密的。他们有没有用到照相机？他们泄露了多少？多久泄密一次？又是如何把消息传递出去的？难以解释，令人苦恼，引人入胜。”迪安·腊斯克相信，敌人是通过阅读美国报纸、跟紧成功湖方面的进展来大致了解联合国政策的。但他在给作者的信中还提到了菲尔比所在的组织：“可以假设：我国政府对朝鲜半岛的所知所得英国大使馆也是一清二楚的；大使馆内与这三人官衔相当的官员都能掌握英国大使馆所知的信息。”

　　在被要求做出评论时，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是这样回复作者的：“不幸的是，本使馆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都无权讨论您提出的这些问题。”作者也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联系到了如今身处莫斯科的菲尔比，邀请他证实或否

认麦克阿瑟的指控。在一封落款日期为1978年4月7日的信中，他回复道，自己“没有转述过有关朝鲜战争的任何重要信息”给苏联，并怀疑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紧接着补充道：“遗憾的是，这个答案没能回答大家心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人泄密呢？我不知道。即便我知道，也不可能告诉你。乍看起来，仅把我们三个人看作是泄密的可能来源是荒谬的。”基于这段模棱两可的陈述就妄下结论地说菲尔比等人对此事不负有任何责任是荒谬的。菲尔比承认“问题悬而未决”。即便如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暗示此事与他脱不了干系。

其他观点参阅阿兰·S. 怀廷的《中国跨过鸭绿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纽约，1960年）和詹姆斯·麦戈文的《奔赴鸭绿江》（*To the Yalu*）（纽约，1972年）。

6. “紧急越境追击”基于古老的刑事司法原则，既正追击罪犯的警官可以跨越自己的司法管辖区。

7. 惠特尼比他更进一步。惠特尼声称，此次大规模进攻是“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行动之一”。

第十章
召回
1951



在总统与将军的论战中，最常被提起的就是“军事思想”。这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在麦克阿瑟的身上遍寻不着。拥有军事思想的人往往都是直率迟钝之辈，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喜欢空想。将军认为战争可以并且应该被废除。然而，只要战争持续存在，他就会从浪漫、神秘和宗教的角度去看待它——如同一个摩尼教教徒在基督教和伪基督之间挣扎。塞缪尔·P. 亨廷顿写道：“职业军人存在于一个灰色的世界中。麦克阿瑟的宇宙非黑即白，充满了喧嚣和碰撞的色彩……相比尚武精神，麦克阿瑟更喜欢好战精神。”

简而言之，他有着武士的思维。这就是他和更偏军事管理者角色的乔治·马歇尔之间的根本区别。1918年，当麦克阿瑟凭借自己的勇敢事迹获得9枚勋章时，马歇尔因为“获取信息”和为“培养与鼓舞”步兵做出贡献而获得了一枚银星奖章。两者相比，潘兴（他喜欢马歇尔，厌恶麦克阿瑟）认为：“马歇尔是一位伟大的参谋长……麦克阿瑟了解自己的军队……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士——一个战士”。1931年，麦克阿瑟告诉某国会委员会，“任何交战国的目标都是马到成功、大获全胜”。20年后，站在另一个委员会面前做证时，他对“用兵就该对其加以限制”的想法表示了排斥。因此，他更接近德国将军鲁登道夫而不是普鲁士将领克劳塞维茨；他认为战争不是政治的延伸，而是一种覆灭，可以说，使政府陷入了破产管理的状态。他辩称，枯竭的和平年代政策应该被暂时替换为将所有权力（“政治、经济和军事”）全都集中到以最终的胜利为唯一使命的职业军人手

中。和外交官一样，战士有权也有责任操控平民百姓。比方说，如果一位指挥官发现有必要撤退，他就必须保全颜面。这一点在亚洲尤为真实。逃离科雷希多岛时，他发誓要回来；撤出朝鲜时，他坚持要求上司批准自己将它夺回。他并不怀疑政府抛弃韩国的战前政策，可他一旦被送进战场，就会奋战到底，并且必须被允许获胜。他说，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意全心全意地做出这样的军事承诺，就根本不该参战。

他心中狂热的反共热情正是他和杜鲁门之间争论的核心。从这场争论所引起的反应来看，有人可能会以为军内和军外人士在战争政策方面起冲突是世界史上的新问题。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战争史上比比皆是。1951年以前，曾经卷入过类似交锋的美国著名军事领袖就包括温菲尔德·斯科特、乔治·B. 麦克莱伦、阿瑟·麦克阿瑟和比利·米切尔。“我无法告诉你，我对这些卑鄙的政治家是多么的厌恶。”麦克莱伦曾于1861年10月写道。第二年5月3日，他再次落笔写道：“我感觉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我。我感觉我在政府中没有一个朋友。每一天，我都有可能接到卸任放权的命令。如果他们能够彻底不来打扰我，我肯定能够成功，但他们会这样做吗？”他们（或者应该说是林肯总统）是不会这样做的。林肯事后与尤利西斯·S. 格兰特建立了一段更加令人满意的关系。他吩咐格兰特：“你不可以做决定、与任何人讨论及商榷或提出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总统自己会去把握，不会把它们提交到军事会议上。”格兰特写道：“只要我还保有自己目前的地位，就不会认为我有权批评上级指定的政策或下达的命令，或发表我自己的观点，除了面向华盛顿当局。”

按照惯例，分侍二主的美国军官都会辞去自己的军官之职。比利·米切尔说：“我实在是太过于厌倦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以至于我认为自己能在退伍后做得更多。”在对待军内外人士之间的争执问题上，麦克阿瑟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时常提起他不认为高级军官在不赞同自己的上司时应该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他又于1932年做证时提到，战时的战略决定应该“由国家元首按照国会表达的意愿来做出”，并补充道任何将这一权力转交给陆、海军将军的行为“不是在放权，而是在弃权”。当然，1951年时，事态还不是那么的明朗。国会并没有在朝鲜半岛宣战。然而，战争进行到第9个月时，国会成员显然已经开始严肃地重新考虑杜鲁门没有咨询他们便派兵的决定了。

1951年年初，也许麦克阿瑟应该遵循米切尔的先例，自愿放权，穿上便服、周游全国，把他的奋斗目标带给人民。但正如1940年的戴高乐那样，他认为陈述自己情况的最好办法还是继续保留这身军装。麦克阿瑟与戴高乐之间的对比令人着迷——两者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都视自己为国家命运的象征。11年之后，这个法国人对自己反抗命令的行为给出的辩解又在美国再度出现了：“品格高尚的人……在与自己的上司相处时……会发

现自己身处困境之中。确信自己的判断力、知悉自己的实力，他不愿让步去取悦……不仅如此：成大事之人必然时常忽略谬误准则的管理。因此，法国将领利奥泰于1914年不顾上级的命令保住了摩洛哥；日德兰海战之后，费希尔勋爵悻悻地对杰利科的调度发表了评论：'他拥有纳尔逊全部的品质，除了一点：他没有学会违抗命令。'"

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时，戴高乐曾是麦克阿瑟在欧洲的主要拥护者。这个法国人说，北美大陆的批评家们对这个为他们而战的男人过于苛刻。他形容这位美国将军是"一位大胆得令那些从他身上获益的人都害怕的外国军事领袖"，并暗示他们应该"向这位伟大军人的传奇经历致以他应得的敬意"。然而，正如C. L. 苏兹贝格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同盟国都厌恶麦克阿瑟。"艾奇逊写道："让我们的同盟国失去信心的正是麦克阿瑟代价高昂的失败和他打算冒着被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风险扩大战争的公开宣言，还有政府对是否要坚持控制他的犹豫。"将军对欧洲外交界看待自己的观点从不抱任何幻想，但他相信美国的北约搭档对美国的需要多过美国对它们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用悉尼·L. 迈耶的话来说，如果麦克阿瑟为了统一朝鲜半岛而炮轰中国，它们是"基本不可能与美国断交的"。

戴高乐说："以军令为生的军队性情中人总是会为政客们有那么多沉溺的借口而感到吃惊。战争可怕的单纯与政府手腕所需的不正当方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话差不多就能概括那年冬天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混乱局面，但美国军队内外的领袖却要受一条绝对准则的束缚，那就是他们对忠诚的誓言。考虑到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对这条誓言的不同解读，两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冲突。总统日后写道："如果我允许他以这种方式公然藐视政治权威，那么我自己就违反了维护与守护宪法的誓言。"将军后来告诉某参议院委员会："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迄今为止未知的危险概念，我们武装部队的成员应该把首要的忠贞和忠诚归功于那些临时行使政府行政部门权威的人，而不是他们宣誓保卫的国家和宪法。"

他的批评者们对这一推理路线没有什么耐心，猜测他这是在擅自决定自己应该和不应该遵守哪些命令。他本人坚持主张自己没有违反任何命令——"穿着军装的人中没有比我更顺从的士兵了"。这是荒谬的。承认自己难以控制的行为、澄清自己的理由才是更加明智的做法。如果纽伦堡（审判）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任何教训的话，应该就是"上级命令"的原则（下属必须服从所有的命令，不管它们是多么离谱）是可耻的。真正的问题在于麦克阿瑟的动机。他拥有好几个动机，每一个都有正当理由，或者至少是可以被论证的，包括引来了白宫方面极端愤怒的动机：他的政治信仰。曾于1951年年初被短暂召回华盛顿的西博尔德发现，国会强烈支持轰炸中国补给线和调遣蒋介石军队前往朝鲜半岛。毫无疑问，国会中的政府批评家们（塔夫脱派、惠里派和诺兰派）代表了上百万美国人强烈支持的政治观

点。直到1941年，孤立主义者仍旧不信任他们的欧洲同盟，并进一步认为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国内计划是对美国传统的背叛：自力更生、清偿能力、强大的立法机关以及政府尽可能少对公民私生活进行干涉。这些国会保守派人士将自己视为神圣习俗的捍卫者，且由于军队往往是根植于过往民间信仰的国家机构，麦克阿瑟必然能够与他们找到共同的目标。

毫无疑问，将军在国会山上的捍卫者们鼓励他，相信自己是不容置疑的。就算没有他们，他可能也会这样相信。毕竟联席参谋长们在“二战”期间准予他的活动范围比其他任何战区指挥官都要多。他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再一次听从了他的意见，在他忽视他们的指令、派遣美军士兵直奔鸭绿江时保持顺从。他知道他拥有有力的支持，而且不止是在国会山上；各处的征兵局已然提出威胁，除非在战争中给予将军自行处理的权力，否则他们就拒绝召集更多的人手。陈纳德公开提出中国“对封锁方法尤其无助”，而两位美国上将也同意他的看法。将军相信遏制政策在亚洲不起作用的想法也得到了沃尔特·李普曼的赞同。李普曼曾经写道，此举在远东是“战略怪物”。东京方面，麦克阿瑟的参谋也对他在政治上的不败地位深信不疑。赫夫告诉西博尔德，他希望将军可以被召回华盛顿，“为的是理清那里某些人糊里糊涂的思想”。西博尔德问道：“你觉得老头能忍受在国内推动自己的提议时成为众矢之的吗？”赫夫点了点头，说他确信将军“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容应对这些问题”。西博尔德回忆，赫夫“由衷地相信将军克服任何挑战的能力”。赫夫并不孤独。西博尔德评论道：“在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总部里，很少有人倾向于相信麦克阿瑟会遭到惩罚，更别提因为自己的行动而遭到解职了。相反，很多人都认为或者是希望华盛顿方面能够转而接受麦克阿瑟的观点。”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军官。他们无疑被卷入了美国军事史上最令人沮丧的一场战役之中。当麦克阿瑟为针对他的行动设下的限制发起抗议、要求给予自己获胜的机会时，他也讲出了麾下大部分军官的心声。

因此，艾奇逊写道，麦克阿瑟“把自己的决心和运气都强加在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失败上”。和历史上许多其他的地方总督一样，他曾差一点儿奋起反抗自己的上司、对他的命令进行自行研究，正如乔治·马歇尔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的那样，“像一位破译羊皮卷的学者”一样“根据自己固有的理论”去解读它们。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即便他知道自己会遭到解职，也还是会遵循同样的路线。面对麾下的战地指挥官每周都会上报1 300人伤亡的局面，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试图改变美国的政策。据约翰·奥斯本回忆，他告诉前来大使馆参加午餐会的一位客人，作为“一个71岁的老头”，面对遭人解职的风险，他“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因此，3月的某一天，他决定通过公开挑战总统来刺激对方、以牙还牙。

对将军充满“贵族气派”的举止颇为仰慕的英国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勋爵事后表示：“我认为，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做出的最终决定是基于太平洋前景的。就其本身而论，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有人指责他在没有事先征得政治认同的情况下就采取行动，但他一直无法获得他追求的政治政策和指导。依我看，在无法取得政治指引时，没有做好准备亲自承担责任的将军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此时此刻，这位将军已经做好了准备承担众多的责任。3月7日，从前线视察归来的他召集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预言除非他的军队能够获得“大量援兵”，否则“战线最终将会陷入一个理论僵局”。鉴于敌军“完全蔑视人类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局面将引发“野蛮的屠杀”。为了扭转这一结局，他催促“国际最高层面”做出决定——采取他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无法采取的措施。

华盛顿方面忽视了他违背总统命令的行为。于是，8天之后，麦克阿瑟联络到了合众社的休·贝利，谴责让第8军团驻足是不足以“完成统一朝鲜半岛的使命的”。艾奇逊火冒三丈，因为将军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到指令，统一已经不再是“他的使命”了。可白宫方面却再一次保持了沉默。杜鲁门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让麦克阿瑟留在远东，于是决心在没有遭遇公然挑衅之前按兵不动。将军这一边却得出结论：“杜鲁门的不安情绪已经濒临爆发点；不仅是他的不安情绪，还有对于一个战时国家总统更具威胁性的——他的控制力。”因此，一周之后，用艾奇逊的话来说，麦克阿瑟“实施了破坏政府行动的重大行为”。

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方面都认为现在正是向中国和朝鲜提出休战的好时机。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起草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并于3月20日将其提交给美国的每一位联合国盟友手中，以求批准。声明中详述了现状的恢复，回避了任何与威胁或反唇相讥有关的暗示，并提到侵略韩国的势头已经得到了遏制，所有的努力都应该被用于“防止战争行动的蔓延、避免延续生命的痛苦与牺牲”。为此，联合国“准备订立协议，结束并避免战争的再度爆发；此番协议将为朝鲜半岛的和解打开更加广泛的道路，包括让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联席参谋长们将这份文件的副本寄往第一大楼，解释道：“政府计划随即宣布，随着韩国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我们感觉自己在三八线以北的主力部队向前推进之前还要为和谈付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我们需要时间来确定外交反应，为有可能展开的新会谈提供机会。”

麦克阿瑟回复道，凭借他目前的兵力，发动新的进攻无论如何都是“完全不实际的”，他只不过希望自己的指挥权不会再受到“进一步的军事限制”。不久（4天之后），他采取了不寻常的一步，发布了一份被他称为“军事评估”的文件。这实际上是给敌军的一份最后通牒，语气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他宣称，中国显然“缺乏发动现代战争的工业能力”，其军队“地面火力

也显得装备低等”。他继续说道：“这些军事弱点自从中国进入朝鲜半岛、参与这场不宣而战的斗争以来便暴露无遗。即便联合国军的行动如今遭到了抑制，中国仍显示出其完全无力通过武装部队完成征服朝鲜半岛的目标。因此，敌军到目前为止肯定痛苦地意识到，联合国决定放弃牵制战争的慷慨努力很快将注定让中国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所以，他时刻“准备着在战场上与敌军总司令切磋较量，尽力寻找能够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半岛的政治目标的、让所有国家都无法抗议的一切军事手段，在不造成进一步杀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

这是一种威胁——试图用美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都不准备采取的制裁论处方式来恐吓北京。声明的内容不仅嘲讽了中国士兵，还暗示对方，如果不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政权是不会就自己的生存问题与别人谈判的。没有什么好谈判的。”中国的广播电台的反应不出所料。广播中提到，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份狂热而又无耻的声明，旨在操纵英美侵略者将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麦克阿瑟的无耻伎俩……会遭遇挫败。……中国人民必须增强正义感，为神圣的战斗付出加倍的努力。”安德烈·维辛斯基代表克里姆林宫方面谴责将军是战争中的“疯子、首恶和邪恶的魔鬼”。

通过破坏自己私下里得知的外交主动权后，将军心里显然相信，考虑到自己在中国打开第二战场的能力，他能够取得胜利，扭转大陆近期的历史轨迹。“中国因为害怕他可能是对的，而把他称为战争贩子。”第二个月，伦敦《经济学人》杂志这样评论道：“大部分欧洲人和许多美国人因为担心他可能是错的，而说他是危险且不负责任的。”欧洲人不相信他大获全胜的承诺，对他涉足那些他们认为与他无关的政治事务的行为也充满怀疑。《观察家报》撰文表示，考虑到麦克阿瑟在国会山上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白宫方面就自身是否还能继续抵制扩大战争的要求产生了“某些疑问”。巴黎的《自由射手》杂志评论道：“把一场亚洲战争留在一个因为年迈而易怒的军人手中未免太过严肃。”一群前来造访国务院的北约大使要求就挪威使者提到的将军“公告”是什么做出解释。

国务院迅速做出保证，说联合国军战地指挥官的做法逾越了自己的职权，而外交主动权依旧处于美国政府与其同盟国磋商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总统的停火呼吁被搁置了下来。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将军的声明与我准备发表的内容完全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我发布了自己精心准备的声明，只会让全世界感到困惑。”李奇微说：“麦克阿瑟先发制人地破坏了总统的计划，激怒了我们的同盟国，还把中国人置于十分丢脸的位置上——如果他们也有接受谈判的意愿。”

3月23日星期五（东京时间3月24日），有关麦克阿瑟扬言“不退出就灭亡”的新闻报道首先传到了国会。晚上11点，一群高级政府官员聚集在了

乔治城艾奇逊的宅邸客厅里。大家都同意，必须让麦克阿瑟离开。宅邸主人援引了欧里庇得斯的话："上帝要谁覆灭，必先让他猖狂。"但当一个人建议他们当场给杜鲁门打电话时，艾奇逊却提出了异议，他建议大家先行解散，把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与此同时，总统正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将军最后通牒的内容——这份文件是从白宫的报刊阅览室急匆匆地被人送到他位于二层的书房的。据他事后回忆，他"深表震惊"："（我）从未低估过与麦克阿瑟相处时的困难，但此举完全是在不顾命令，有意避开任何相关外交政策的宣言……是对宪法下的总统权威的挑战。此举同样蔑视了联合国的政策。在这一点上，麦克阿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选择——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忤逆了。"

杜鲁门想起了林肯与麦克莱伦意见不合时发生的一个故事。林肯说："局势让我想起了不听话的马儿害得骑手把一只脚卡在了马镫里的故事。他对马儿说：'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我就下马。'"后来，杜鲁门说他决定在接下来的48小时之内解除将军的职务。这话十分可疑。那个周末他曾多次提到最高统帅，大多数话都是字斟句酌，却从没有提到过解职。晚年的他也许更愿意去想（或者他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他是站在外交的高地上而非眼前这片死气沉沉的政治泥滩中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过，那个星期六，他的确为一次可能的军事审判奠定了基础。正午时分，在与艾奇逊、腊斯克和罗伯特·洛维特商议之后，他吩咐联席参谋长们给第一大楼发去了一封急电：

> 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亲启，1951年3月24日
>
> 总统指示你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于1950年12月6日发送的命令上。基于1951年3月20日发予你的信息，你所做的任何进一步声明都必须与12月6日的命令中所规定的内容相符。
>
> 总统还做出指示，如果中国和朝鲜军队领袖要求在战场上停战，你必须立刻把事实上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说明。
>
> 布莱德雷

后来，和杜鲁门一样决心要改变过去的麦克阿瑟在国会山上做证时，强烈否认他曾做出过不当行为。在与共和党中特立独行的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对话时，他表示："我的警告只不过是每一位战地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会发布的；每一位指挥官会与对方的总司令交换意见，努力为敌对行动画上一个句号。"在被问及他是否知道在美国的同盟国间传阅的总统提议时，他答道："是的，我收到了这样的信息。但这和我的声明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为自己于3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可能存在什么不寻常、不正统或者不妥当的言辞。”多年过后，他写道：“我曾两次呼吁敌军指挥官投降，”——他的确这样做过，却是在迥然相异的环境中，并且是在艾奇逊的暗示之下——“在这两次，我都没有从任何消息来源听到过一丁点儿反对的声音——诚然，恰恰相反。……事实上，不到4个月之后，苏联方面提出通过会议来安排停战的建议就被热情地接纳了。”

如果麦克阿瑟要求的仅仅是一份适当的停战协议，那么此事也没有什么可讲之处，但他的要求还包括让敌军指挥官承认被打败了。威洛比的解释是，将军认为自己的“提议”不仅是“心理战的聪明之举”，还是“支持联合国发动的和平运动的一种尝试”。但这毫不具有说服力。他的支持者们否认他意识到了自己给行动带来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克拉克·李写道：“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麦克阿瑟行为不当的罪名显然是成立的。但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至少还有待争论。”诚然，他明显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举动，不过理由有些可疑。刚一听说杜鲁门正在寻求适当的停火协议，弗雷泽·亨特便写道：“对麦克阿瑟来说，一场大背叛显然就要上演……在他看来，这肯定是他协助制止有可能给美韩双方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行动的最后机会。”麦克阿瑟本人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第二年10月17日，他向美国退伍军人协会透露，自己发现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可耻的阴谋”。

如果总统建议双方军队放下武器、结束战争的希望是一个阴谋，那么将军必然起了破坏性的作用。被他的蔑视所刺激，中国人发誓要奋战到底，却无法把联合国军指挥官从战场上驱逐出去。相反，有能力开除最高统帅的杜鲁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他的停战协议理想遭到了麦克阿瑟的当头棒喝。不管他当时有没有下决心解除将军的职务，乔治·马歇尔似乎心意已决。马歇尔事后向参议院委员会解释了其中的缘由：“这给同盟国们造成了十分严峻的局势，同时也让他们对我们会如何继续推进产生了怀疑；总统想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事情上，估计他们会和自己达成共识，可这位战地指挥官却在此之前自告奋勇地提出了一条建议，终结了总统为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我认为，此举明确导致各方对政府领导力失去了信心。”事后，杜鲁门也附和了这一论调：“麦克阿瑟将军再一次公然藐视了自己的总司令（美国总统）所颁布的政策。”

麦克阿瑟的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月，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一直都在忙着设置小型的“定时炸弹”，让大家知道自己还会继续在舆论的战场上奋斗，在未取得鸭绿江的胜利之前，抢先一步阻止联合国与敌人达成和解。如今看来，他的努力是没有希望的，但那是因为历史的惯性是有规律的：不管发生什么，似乎通常都是不可避免的。朝鲜战争末期，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结果此刻似乎成了半岛战争唯一可能的下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斯帕尼尔写道：“他认为朝鲜半岛被自由世界当成了测试惩罚当前侵略者能否抑制

未来侵略行为的试验品。这一看法不一定是错的。”1962年10月，英国《情报摘要》得出结论：“如果早些对朝鲜战争做出决定，就没有理由怀疑敌人会失败。”将军对此很有把握。他的自信心是如此的坚定，以至于他在接受采访和回复信件时都把自己的事业推向了危险的境地，相当于是在孤军奋战、狂妄自大地向中国方面发起挑战。事后他坚称他“一点儿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解职，不过这无疑并不属实。他的意思可能是，他无法理解一个国家的领袖为什么会因为自己最伟大的将军要发动一场必胜的战争而解雇他。

4月5日星期四（即布莱德雷得出结论，必须解雇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那一天），世界媒体圈里出现了三条有关麦克阿瑟的爆炸性新闻。保守期刊《自由人》写道，许多手无寸铁的韩国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联合国军并肩作战，并询问将军为什么拒绝为他们提供枪支。他在回信中提到在“美国当局的基本政治决定中”可以找到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他本人也曾与1月6日否决了为更多大韩民国士兵提供枪支的提议，反倒是更倾向于向日本武警新兵发放武器。）当天早上，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香港报道，内容提到麦克阿瑟告诉某位近期到访第一大楼的英国人：“联合国军在一场没有确切目标的战争中……受到了一系列人为条件的限制……事情并不是一位军人侵犯了政治领域（而是正好相反）……战场指挥官真正的目的是摧毁敌对势力。可朝鲜战争却反其道而行之。若非是人命关天，这里的情况简直是既滑稽又可笑。”

和乔·马丁在正午前不久发布的“晴天霹雳”相比，这些足以为华盛顿方面采取强有力行动提供正当辩护的失言行为未免有些苍白无力。2月12日，马丁在纽约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指责总统阻止国民党“80万（原文如此）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在亚洲”打开“第二战线”，宣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麦克阿瑟和“五角大楼方面”都赞同此举是能在远东发起的“最省力的作战行动”。他在演讲接近尾声时表示：“如果我们派兵出征朝鲜半岛并不是为了取得胜利，那么杜鲁门政府就该为谋杀上千名美国年轻男子而遭到起诉。”3月8日，这位国会议员把自己这番评论的副本寄给了麦克阿瑟，还附上了一张便条，邀请将军“在保密的基础上或以其他形式”发表评论。

忽略任何有关保密的提示，将军给出了一封回信，其落款日期是3月20日，也就是他知晓杜鲁门准备满足于朝鲜半岛僵局的那一天。事后，在为自己写给马丁的回信进行辩护时，他表示：“（我）总是感觉自己应该义不容辞地为国会就我的正式职责提出的相关问题做出诚实的答复，而该回信只不过是我书写的上千封常规信函中的一封。”信中的内容被泄露出去后，他告诉西博尔德，他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封信——只好通过搜寻文件来重温记忆。此话令人难以置信。议院中只有一个少数党领导人（也就是马丁）。即便是在政治激情高涨的岁月里，共和党最强大的

领袖也不会每天都指控总统是个杀人犯。不可思议的是，将军竟然忘记了自己曾经鼎力支持过马丁的言论。回信的开头，他感谢对方给自己发来了演讲稿的副本："我带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你的演讲稿，发现你丝毫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往日的活力。"紧接着他评论道，这位少数党领导人针对"利用"国民党的观点并不违背一直以来"用最大限度的反击力量对付暴力"的"逻辑和传统"。在下文（被杜鲁门事后称为"真正的'决定性因素'"的一段话）中，他继续写道："某些人很难意识到故人已经处心积虑地选择了亚洲来发动征服全球的战争，而身处战场的我们也被卷入其中；我们在这里手举武器为欧洲战争，而外交官们则在那里唇枪舌剑；如果我们败在了亚洲共产主义的手中，欧洲的陷落就是不可避免的；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就很有可能躲过战事，从而保住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获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马丁在发言中解释道："我感觉有必要将自己从某重大而又可靠的来源得知的消息告知美国人民。"听闻此事，五角大楼方面的乔治·马歇尔称此举属于最后的"暴行累积"，使得麦克阿瑟继续担任远东指挥官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认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姗姗来迟。将军的回信登上了各大洲的头版新闻。伦敦《泰晤士报》称此番言论是"一系列显然无休止的草率行为"中"最危险的"一部分；《观察家报》在报道中指出英国政府已经对将军的回信"尽可能地表示了最强烈的反抗"，形容将军的言行"为战争将蔓延到亚洲大陆埋下了伏笔"。另有一家英国报纸形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立场就是"打算扩大战争"。艾德礼的外交部部长赫伯特·莫里森正式拒绝利用蒋介石的任何一支军队。法国外交部也遵循了白厅方面的意见。一辆辆黑色豪华轿车再次在美国国务院的门前排起了长龙，要求解雇愤慨的联合国特使。去年夏天在成功湖畔成型的大联盟似乎正面临迫在眉睫的解散危险。

国会方面的反应跟随的是党派路线。俄克拉何马州的罗伯特·柯尔在提到麦克阿瑟时表示："我认为他长期以来的'一言堂'行径几乎耗尽了其余队友的耐心。"莫尔斯评论道，美国有两种外交政策，"一种属于麦克阿瑟将军，另一种才属于总统"。另一方面，塔夫脱认为："不放开蒋介石军队的做法是荒谬的……是完全站不住脚、愚蠢至极的。"霍默·弗格森提议派遣国会委员会飞往东京，询问将军该如何指挥战斗。包含弗格森和塔夫脱的评论在内的众多言论让杜鲁门下定了决心。克拉克·李写道，对总统来说，"麦克阿瑟的回信遭共和党领袖利用实在是令他吃不消"。除此之外，杜鲁门毫不怀疑，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总统职位危在旦夕，因而准备好了要去捍卫它。和大部分东京官员一样，华盛顿的大多数官员也认为将军是不受控制的——《华盛顿邮报》某头条写道，"国会听闻总统反对罢免麦克阿瑟，申斥仍有可能"。可当总统通知艾奇逊，自己想在第二天早上的内阁会议之前与他和其他几个人进行商讨时，艾奇逊写道："我对我们即

将讨论的话题没有半点儿怀疑。”考虑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信念，他已经倾其所能，轮到哈里·杜鲁门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了。

星期四下午，布莱德雷也接到通知，受邀参加星期五一早的会议——他不记得是谁通知他的了。他草草召集几位联席参谋长，提醒他们最好开始“从军事方面”权衡一下麦克阿瑟的行动。不料他们所有人都迅速离开了城市，为自己不能承担上述义务寻找借口。然而，那一周，朝鲜政策制定者们谁都无处容身。摊牌的时刻到了。四个人出席了总统于星期五召开的会议：哈里曼、布莱德雷、马歇尔和艾奇逊。前两个人建议立即解雇将军。哈里曼认为，早在麦克阿瑟批准了提交日本国会的一份与美国经济政策相左的法案时就该解雇他。布莱德雷则怀疑，抚今追昔，将军是“故意”持反抗态度的。不过他表示，如果换作他是麦克阿瑟，或者他的提议遭到了类似的拒绝，他一定会主动辞职。不管怎样，他指出，总统有权“在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解雇任何一位军官，即便他只不过是对这个人的判断力失去了信心。马歇尔和艾奇逊对此表示赞许，但态度十分谨慎。马歇尔认为，一旦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被解雇，“通过国会”为军备改良和向北约申请“军事拨款将不再容易”。国务卿则预测将军的解职会引发“政府最大的争斗”。

他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思考对策。用杜鲁门的话来说，他“小心地不向他们透露，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艾奇逊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应该做些什么，而是在于应该怎样去做”。大家心里都清楚，马歇尔和布莱德雷需要时间和参谋长们进行商议，总统必须避免表现出自己对军事意见的漠视。因此，会议延期到了星期六的上午9点。杜鲁门命令马歇尔在此期间复审麦克阿瑟与陆军部之间的军事文件往来。与此同时，除了总统之外，所有人都于同一天下午聚集到艾奇逊的办公室里，商议五角大楼方面提出的可能妥协方案——召将军回国磋商。国务卿认为“让他手握全部指挥权返回华盛顿”是“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他表示，凭借他的“表演能力”，他“不仅能够严重削弱总统的决断自由，还有可能危及他本人的未来”。其他人也表示了赞同，挽救麦克阿瑟颜面的第一次尝试就此被放弃了。

星期六的会议十分简短。马歇尔在汇报中表示自己已经针对文件进行了研究，赞同哈里曼的观点——将军早在两年前就该被召回。他们探讨了第二种妥协方案，让李奇微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留下麦克阿瑟在第一大楼继续担任日本地方总督。这一提议因为“不切实际”而遭到了拒绝，但除了有人暗示此举将使李奇微的人生变得更糟之外，没有人真正解释过其中的原因；可以感觉到，截至当时，这群人已经察觉到了血腥的味道，每个人都暗下决心要将麦克阿瑟置于死地。参谋长们仍旧没有回来。杜鲁门说他可以等待。他要求布莱德雷告诉他们要“寻觅自己的良心”，并表示如果有必

要的话，他可以在星期日那天开上一整天的会议，直到他们拿出一系列行动步骤为止。星期日一早，杜鲁门告诉艾奇逊，自己已经针对此事征求了财政部部长约翰·W. 斯奈德的意见，却没有透露斯奈德说了些什么，再一次忍住没有摊牌。那个安息日，五角大楼内部出现了大规模的冲突。政府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反感与厌恶并没有得到同僚们的认可。据杜鲁门回忆："布莱德雷完全是从军事纪律的角度来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在他看来，将军显然没有服从军令，因此应该被解除指挥权。"事实上，布莱德雷总是小心翼翼地指出，参谋长们从未说过麦克阿瑟不服从军令。总统于1959年说过的一句话其实更加接近真相：只要五角大楼还手握着指挥朝鲜战争的权力，将军就永远不会被召回。和将军一样，参谋长们也相信"紧急越境追击"的战略。其中，谢尔曼曾在漫长的会议过程中反复重申他自从仁川登陆行动以来一直"十分喜欢麦克阿瑟"。相比抑制将军的权力，谢尔曼上将更倾向于派遣同为五星上将的马歇尔飞往东京对他提出警告，若是他不改变自己的作风，就会遭到解职。早先拒绝参加威克岛会议的马歇尔依旧冷漠地拒绝了这个要求，还得到了柯林斯的支持。鉴于将军对政府没有半点儿同情之心，谢尔曼不情愿地赞同了他们的观点。于是，参谋长们一致投票赞同解雇麦克阿瑟，因为"军队必须掌控在国家的政府当局手中"，且远东指挥官应该对华盛顿方面的指令"更加有求必应"。

星期一上午9点，布莱德雷把这一结论呈到了总统面前。得知哈里曼、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也对此表示了赞同，杜鲁门这才坦白自己早在星期四就下定了决心。星期二下午，他们再一次会面，讨论了一下指挥权变更的事宜。李奇微将成为新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而詹姆斯·范弗利特将接管第8军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比麦克阿瑟还憎恶让朝鲜半岛局势陷入僵局。总统将发布公开宣言："我深表歉意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无法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下发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将以外交辞令的形式寄往釜山，然后再辗转递往前线。在那里，穆乔将把命令转交给陆军部部长弗兰克·佩斯。接过这项不值得羡慕的任务，佩斯将飞往日本，把命令交到将军的手中。

杜鲁门决定安排马歇尔在艾奇逊的指点下起草这份总统行政命令，从而铸成了大错。这两人与最高统帅之间互相充满了敌意，而其中更加圆滑老练的国务卿分身乏术。起初，他一直都在与参议员帕特·麦卡伦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紧张地会谈（他们想要告诉他，总统注定要与麦克阿瑟展开一场争执，而且"注定要失败"），紧接着又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喊起床派往东京，安慰吉田茂首相，美国的对日政策不会改变（杜勒斯想要找时间征求塔夫脱的意见，艾奇逊告诉他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被送到麦克阿瑟手中的命令是由马歇尔起草的版本，不仅语气粗鲁，而且措辞生硬。在用简洁的语句通知收信人已被解除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联合国指挥官以及远东总司令的职务之后，马歇尔总结道："你将立即把指挥权移交给马修

·B. 李奇微中将。你被授权发布必要命令，前往自己选择的地方完成你所渴望的旅程。你的职位替换理由将在本消息被送达之际与上述内容一同公布。”就连因《枫丹白露条约》而被放逐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都被指派为该岛的最高统治者，不仅分配到了一支400人的近卫军，还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养老金。何况拿破仑的流放命令还是敌人起草的。

通过采取坚定的行动，政府破釜沉舟，解决了倔强的驻日指挥官给白宫带来的棘手问题。不过，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只不过是国家决定外交事务的几大力量之一。其余力量还包括两大政治党派、美国人民和新闻界。国务卿漠不关心地写道："解职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安之若素地忍受着媒体和国会必然会对我们发起的狂轰滥炸。”这一目标的达成方式使得公众对政府及其亚洲政策的看法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举出其中的一个例子，和中国建立合理关系的提议就此被打入冷柜，将近25年后才被解冻。诚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但将军遭到解雇之后引起的情感爆发却是其中最充满仇恨的缘由。而事情本来无须发展到这一地步。尽管第一大楼方面存在激烈挑衅行为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本可以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谢尔曼的建议就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艾奇逊对局势的形容更显精明："麦克阿瑟将军应该受到惩罚是毋庸置疑的，唯一的问题在于使用最明智的方法来执行它。”结果就是如此。简直没有比这更不明智的解决方法了。

星期二下午6点，签署完必要命令的总统离开办公室前往布莱尔国宾馆用晚餐，留下艾奇逊、哈里曼、马歇尔和布莱德雷商讨各项细节。他们以为自己还有大约20个小时的时间来解决这件事情，佩斯在第二天下午之前是不会致电第一大楼的。然而，正如西博尔德所说的那样，“预示麦克阿瑟与政府‘公开决裂’的报道正铺天盖地地”在东京扩散开来。临近晚上7点前，《芝加哥论坛报》总编威廉·D. 马克斯韦尔致电驻华盛顿记者沃尔特·特罗安，转递了一则日本发来的秘密消息。消息传言一次“重要的辞职”将于第二天发生。特罗安乘车赶往白宫，找到了于12月接替查理·罗斯职务的约瑟夫·肖特，要求对方就此发表评论。这位新任的新闻秘书回答："无可奉告。”尽管如此，特罗安还是动笔书写了一则报道，却在他的总编再次打来电话时把稿子从打字员手里抽了出来。总编告诉他："别管麦克阿瑟那则秘密消息了。我们就该消息的来源和东京方面进行了核实，结果那边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

对马克斯韦尔的第二通电话毫不知情的肖特突然出现在了艾奇逊等人面前（麦克阿瑟事后称他们为“行刑队”），说《芝加哥论坛报》“掌握了整个故事，打算明天一早就把它印刷出来”。布莱德雷带着这个消息急匆匆地赶往布莱尔国宾馆。他预测将军会在接到解雇命令之前提出辞职。杜鲁门在

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此时此刻，“我们顾不得”正式交接指挥权的“诸多礼数”了。不过他当时的措辞则更加苛刻一些：“这个兔崽子是不会向我提出辞职的！我要开除他！”加文·朗冷淡地评论道：“毫无疑问，罗斯福总统处理事情的方式要更好一些。”

与此同时，传输命令的商业电缆临时出了故障。布莱德雷驱车前往五角大楼，草草地为佩斯书写了一则消息，要求他在一个小时之内飞抵东京，告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他已经被解雇。在等待对方回复“电报已收到”的过程中，布莱德雷一直都在通信室里缓慢地踱着步子。然而他所期待的回复永远也到不了了。被电源故障困住了的佩斯正和李奇微在前线的一顶帐篷内开会。晚上11点，此刻已经发狂的布莱德雷拨通了总统的电话，说自己打算亲自给麦克阿瑟发去电报。不料这则消息也莫名其妙地被耽搁了下来。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东京方面没有一个人略知一二。肖特在急匆匆地油印言论箍制令、杜鲁门1月时写给麦克阿瑟的信函以及其他发放给媒体的相关文件的同时，还通知白宫记者们于凌晨1点钟前来召开一次不寻常的新闻发布会。午夜12点56分，他把这则消息公布给了记者。凌晨1点03分，各通讯社便把消息发往了世界各地。

那个时候，杜鲁门应该已经睡熟，但事情显然已经烙上了他的痕迹。在这一点上，正如他大多数争强好胜的治国方针一样，他做出了对的选择，避免了全面战争的危害，但却选错了方式。由于他坚持要解雇麦克阿瑟，而不是允许他优雅地退休，上百万人都对总统的动机产生了质疑。这一举动似乎是惩罚性的，甚至有些不妥，还违背了将军所珍视的一切传统。这次唐突的强制性解职剥夺了他向自己的军队发表道别演讲、为李奇微提出忠告的机会，还导致他无暇向日本人民致辞，或与任何日本官员讨论即将到来的和平协议。克拉克·李写道：“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命令的总结词，也无法改变其言语间的暗示：在征战沙场这么多年之后，麦克阿瑟已经变成了美国安全的可怕威胁，其危险性使得他的指挥权和其他权力必须被一次性剥夺；他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无法被人以合乎礼仪、符合军队传统惯例的方式来对待。”马尔伯勒公爵在登上前往纽约的飞机时问道：“这样做未免太过唐突了，你不觉得吗？”卡洛斯·罗慕洛也提出了质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挥动斧头’吗？”

白宫新闻发布室的时钟走过1点03分时，东京时间正好是4月11日下午3点03分，也就是吉田茂举办当年第一场露天招待会的时候。昨天，这片菊花盛开的土地上还充盈着春天的气息。麦克阿瑟还评论道，樱花在尚未完全开放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然而，今天的天气就变得寒冷起来。美国大使馆院落上空笼罩着低垂的厚厚云层，刺骨的冷风旋转着呼啸而过。上午晚些时候，大雨倾盆而下，如同稳定的鼓点一般落在反光的雨

伞上。心灰意冷的凯拉·赫夫尖叫道："哦，首相的露天招待会当天为什么总是要下雨呢？"

将军并没有淋到雨，因为他从不会出席任何人的派对。他当天的午餐会客人是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和西北航空公司的经理威廉·斯滕斯。尽管自己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要盛装出席露天招待会，赫夫在最后一刻还是决定留在家里。一位新闻记者（他从自己报社的华盛顿办事处听闻肖特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打来电话告诉他："一定要收听3点钟的新闻广播。我们认为杜鲁门总统即将发布一些有关麦克阿瑟的消息。"赫夫试图打电话给琼，但是她和将军已经和客人们坐在了桌旁。赫夫知道麦克阿瑟计划在午饭后直接回去午睡，于是留言说自己会再打电话给他。不久，他打开了自己的收音机。刚开始的几条新闻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可就在他准备关掉收音机时，播音员开口说道："下面将发布重要通告。"几秒钟过后，消息被逐字逐句地宣读了出来。下一秒钟，赫夫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琼打来的："是你打电话给我们吗，悉尼？"他回答："是的。这很重要。我从广播中听到了华盛顿方面发出的一则简讯。将军的职务被解除了。"她说："天哪。再说一遍，悉尼。将军在这儿呢。"悉尼重复了一遍。琼说了一句："好的，悉尼，谢谢你打电话来。"趁他还没有来得及多说什么之前，琼挂断了电话。

赫夫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是陆军通信兵军团打来询问他能否回家接收"给将军的一条重要信息"——布莱德雷亲自发送的电报终于到了。那是一个棕色的陆军信封，上面印着红色的字样："致麦克阿瑟的决定"。赫夫的双眼湿润了，带着它来到了"大房子"。已有6名记者聚集在了院落的下闸门处。其中一个人问道："有什么新闻吗？他已经收到消息了吗？"赫夫举起信封答道："消息可能就在这里面。"他走进宏伟的大门，穿过悬挂着将军曾用过的耀眼军旗的宽敞接待厅，爬上了弯曲的楼梯。一脸紧张的琼在麦克阿瑟的卧室门口和他见了面。赫夫无助地说道："给你。我能做些什么吗？""不用了，谢谢，悉尼。"她说着接过信封，飞快地转过身去，"现在谁都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了。"坐在卧室里，将军打开信封，扫了一遍信中的内容，开口说道："琼妮，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拉里·邦克早早地就赶到了吉田的招待会现场，他得在麦克阿瑟午睡醒来、返回第一大楼之前赶回去。雨停了。在宜人的午后风光逐渐崭露头角之际，威廉·F. 马夸特手下的一名军官把这则新闻告诉了邦克。在场的宾客很快便纷纷议论起来。深表震惊地吉田离开了迎宾队列，要求离开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冷静一下。与此同时，西博尔德也在结束了两周一次的同盟管理议会会议之后赶到了会场。乔治·斯特拉特迈耶的妻子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在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之后（国务院发来的一封信件刚刚被送到他的办公室，指示他在杜勒斯到达之前安抚日本人），西博尔德和吉田首相在

楼上的书房里交换了意见，表达了自己不希望吉田和他的内阁辞职的愿望，因为按照惯例，日本人在面临会对日本产生影响的外交灾祸时都会采取这样负责任的姿态。首相同意了，轻轻地点了点头。西博尔德回忆，他“显然在发抖”。

其他所有高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同样深感震惊。尽管如此，麦克阿瑟的心态却比任何人保持得都好。他最初的几通电话之一便是打给惠特尼的。“考特，你听到消息了吗？”说罢，他紧接着开始吩咐惠特尼该对李奇微负起哪些责任。副官不愿接受他的任命，如果将军要走，他也不愿留下。麦克阿瑟穿着陈旧的睡袍接见了邦克、托尼·斯托里和卡纳达医生。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心声：没有人愿意在他离开之后留在这里。将军也没有试图劝阻他们。紧接着，他表示自己不知道“行刑队”里都有哪些人物，但从命令的行文来看，他相信是“乔治·马歇尔扣动了扳机”。鉴于他们允许他前往自己选择的地方完成他所“渴望的旅程”，他计划去菲律宾、大洋洲和澳大利亚逍遥自在地转一转。在所有人中，他偏偏接到了赫伯特·胡佛从大洋彼岸打来的电话。那时候，胡佛所在的地方已经是半夜时分了。这位77岁高龄的前总统成功地做了一件白宫、国务院和联席参谋长们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果断直接地和将军对话。他听说了将军被解职的消息，并和几位共和党领袖就此交换了意见。他们希望麦克阿瑟能够“赶在杜鲁门、马歇尔和他们的宣传者诽谤他之前尽快直接回国”。他将在几个小时之内把细节信息发送过来。

赫夫密切注意着将军：“（我）试图弄清他紧张却又不动声色的举止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心感受。在我的印象里，他感到愤愤不平，还有些心碎。但他从未吐露过一个字来暗示自己的态度。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在他的面前发出任何一点儿同情的声音都将铸成大错。”赫夫表示，麦克阿瑟“通常都是热情友善的”，但“在面对危机时”，他似乎“更愿意独处，单枪匹马或是在琼的安抚与帮助下与之战斗”。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坐在办公室里按响了邦克的呼唤铃，把发文篮里的最后一叠文件交给了他，然后轻声说道：“你不需要再送任何东西给我了。”

然而他却向西博尔德袒露了心声。这位外交官含着泪赶到了第一大楼，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将军为他点了一支烟，示意他在一张破旧的皮沙发上坐下。他说，这次解职仅仅反映了“某一个体的判断”。他说，伤人的是总统选择的“方式”——“在他为陆军服役了52年之后公开羞辱他”对他来说是残酷的。西博尔德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答道：“日本的现状是你不朽的作品。我希望自己能够尽一切可能保护它。”麦克阿瑟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持悲观态度。北京政府正在蒸蒸日上，而台湾当局和印度尼西亚正在日益衰败。他问道：“中国还能怎么与我们为敌呢？”他预言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将遭受惨重的伤亡，一切都是徒劳。注西博尔德说：“这个骄傲、敏感、

坚毅的男人追求的命运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他深深受到了伤害，可能暂时被击败了。看着他的样子、听着他的话语是我经历过最痛苦的一次会面。”

将军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多么厌烦别人指控自己（按照他的话来说）“通过某些卑劣的手段和共和党领袖密谋”，可他实际上却“并没有参与任何政治局势”。当然，这完全是不正确的。他的书信遭到了马丁不择手段的利用，但它首先是一份政治文件，胡佛的消息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的确认很快便接踵而至。厄尔·布莱克在电报中写道：“与政府的裁员者抗衡，时间是至关重要的。”4月11日星期三清晨，在美国人收到早报、读到麦克阿瑟被召回的消息时，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聚集在了马丁的办公室里。在塔夫脱的主持下，经民主党领袖同意，他们邀请将军到国会山来，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散会时，马丁告诉记者们，“考虑到最近的战略发展”，国会也会对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行充分的调查。他模棱两可地补充道，在会议的过程中，他们针对“弹劾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暗示不仅是杜鲁门和他的整个政府，可能甚至连联席参谋长们都会受到审判。当一党指控另一党犯下了可被弹劾的过失时，问题显然就演变成了爆炸性的新闻。然而吩咐属下迅速打包行李的麦克阿瑟（他告诉邦克，他想在星期二起飞），显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一场波涛汹涌的美国运动的象征，身后还跟着一大批的追随者。和1945年时的温赖特一样，他似乎以为自己会成为被同胞排斥的失败者。他吩咐斯托里起草了飞行计划，好让他能在夜幕降临之后抵达加利福尼亚。他说：“我们要趁着夜色、在所有人都在吃晚饭或看电影时溜进旧金山。”

总统的决定在欧洲得到了认可。“麦克被解职”的消息登上了《伦敦标准晚报》的头条，法国《今晚报》认为杜鲁门是依据全世界人民“和平的愿望”行事。法国《世界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则消息，在刊登《解职令》和《总统行政命令》的同时刊载社论，表示同盟国不会向麦克阿瑟这样的“大话王”屈服。朝鲜半岛上的士兵们没有泄气。英联邦军队在三八线上举办了一场派对。汉城方面，颇受爱戴的李奇微成了麦克阿瑟的劲敌。《纽约时报》的默里·舒马赫在电报中写道：“校级军官们普遍认为东京陆军总司令部和在朝第8军团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融洽。”然而，对那些多多少少有些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来说，未来也存在着不祥的征兆。小E. J. 卡恩在发给《纽约客》的电报中写道：“昨日，就在广播里播放出麦克阿瑟将军遭到解职消息的那一刻，我这几天所在的西部前线分区战地指挥所野营区刮起了一阵狂风，卷起了几顶帐篷。几分钟之后，一场冰雹砸在了乡野的土地上。冰雹过去几小时之后，这里又下了一场强劲的暴风雪。鉴于这一地区过去几周的天气一直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异常的天气状况让某

位士兵开口说道：‘天哪，你觉得他到底会不会真的是上帝？’”

上百万美国人对此也深信不疑。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写道：“和将军被总统解职一事激起的结果相比，这个国家是否曾爆发过如此激烈的自发性政治热情十分值得怀疑……诚然，自内战以来，没有什么能够与之相较。”直到肯尼迪总统身亡，美国才再次出现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经历。罗维尔和施莱辛格评论道：“老百姓都站在麦克阿瑟这一边。大家都对他的个人情感深有体会。”接到临时通知，杜鲁门告诉某全国广播的听众，他别无选择，只能“带着个人最深切的遗憾”采取行动。沃特尔·鲁瑟召集人们为将军辩护，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全国海员工会的约瑟夫·柯伦、哈佛和普林斯顿的特设委员会也不甘示弱。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穿上军装就得接受某些限制”（此话拓宽了他与前任上司之间的沟壑），但这并不是大部分人的观点。白宫的收发室被抗议的信件淹没了。肖特的办公室哀伤地承认，在刚刚收到的27363封信件和电报中，对召回行动持批评意见的和表示赞同的比例是20：1；这一比例一直持续到了信件和电报总数超过78 000封——肖特的属下此时已经停止了计数。乔治·盖洛普发现，69%的投票者都支持麦克阿瑟。杜鲁门出现在格里菲斯体育馆时遭到了一片嘘声——自1932年以来，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被人喝倒彩。肖特宣布，总统取消了计划中的演讲，以免“有损于”将军的回归。紧接着，白宫方面把安德森小姐的威克岛会议笔记泄露给了媒体。

在西雅图，一个愤怒的伐木工因为朋友支持杜鲁门而试图把对方淹死在一桶啤酒中。某南方众议员说：“在我所在的这一地区，大家的情绪狂暴到几乎无法控制。”北方人也是如此。有人在临时制作的保险杠贴纸上写上了“驱逐杜鲁门总统”的字样。从马萨诸塞州的伊斯特姆到加州的奥克兰，有人把旗帜上下颠倒或是降半旗。在加州的圣加布里埃尔，总统的肖像遭人放火焚烧，而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庞卡城，艾奇逊的肖像也未能幸免。请愿书在老百姓的手中传播起来，就连牧师们也在讲道台上严词谴责起了政府。新的反杜鲁门玩笑话广为流传：“这种事情在杜鲁门活着的时候可不会发生”“我们去喝杯杜鲁门啤酒吧——这种啤酒和其他牌子的一样，不过没有头脑（啤酒泡沫）”。亚特兰大的一名退伍军人包好自己的铜质星章，把它寄回了华盛顿。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发了一封电报给将军，要求他在费城的一场荣誉游行中打头阵。好莱坞某制作人以每周3 000美元的薪金邀请他出演一部讲述指挥官遭政客迫害、名为“正直的方尖碑”的电影。巴尔的摩的“小妇人组织”在首都掀起了一场游行示威。已在纽约英国领事馆门前抗议了两年的爱尔兰人放下了“恐英症”的标语，换上了支持麦克阿瑟的三明治式广告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波士顿学院的全体学生也公开表示支持将军。丹佛某男子还成立了名为“痛击哈里鼻梁”的俱乐部。洛杉矶的一对夫妇因为将军被解职一事互相抽打彼此而锒铛入狱。

印第安纳州拉斐特市的工人们手举“弹劾杜鲁门”的标语牌冒着暴风雨游行了两英里，到电报局给白宫发去了措辞愤怒的电报。休斯敦一位牧师也通过西联电报公司口述了一封电报，气急败坏地表达了相同的情感：“你解雇麦克阿瑟将军的举动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巨大胜利……”随即中风，倒地而亡。在马里兰的查尔斯敦，一个女人被告知她不能在发往白宫的电报中称总统是个傻瓜，她和发报员迅速翻阅了罗热同义词词典，直到找到了“自作聪明者”这个可以接受的词。如果收信人不是杜鲁门，西联公司便会宽容许多。选民们通过议会代表带进国会山、夹入《国会记录》的电报标题包括：弹劾低能者、我们希望就白宫猪的暴行问题提出抗议、弹劾把我们出卖给左翼分子和联合国的叛徒、建议你们在布莱尔国宾馆里寻找另一个希斯、前任国家卫队队长解雇五星上将后应该受到弹劾、弹劾那个自认为是总统的浑蛋、弹劾那个来自堪萨斯城的小政客笨蛋、弹劾那个转移注意力的家伙，把他赶下总统的座位。

这场大风暴也席卷了各地政府的门户。洛杉矶市议会以“悲痛沉思麦克阿瑟所遭受的政治暗杀”为由停会。加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的立法机关也对杜鲁门进行了谴责。伊利诺伊州参议院为政府打倒了这位反极权主义的人表示震惊：“我们要表达自己对麦克阿瑟将军的无条件信任，谴责总统草率解除其指挥权的不负责任的任性行为，并对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麾下其他人没有得到机会就朝鲜半岛和远东局势的真实情形向我们国家的人民进行通报表示进一步谴责；如果当局为证明自己的行为无罪而存在任何隐瞒信息的行为，我们也将予以进一步的批评和谴责。”

这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和大部分报纸读者抱持异见了。负责报道这一话题的记者们向《星期六评论》的调查员透露，超过七分之六的记者都认为总统的举动是合乎情理的。不过他们大多数人都说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糟糕，而15%的人认为解职的决定伤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威望——其中一个人说道：“哈里·杜鲁门的午夜狂奔让我们看起来像是一群傻瓜。”《华盛顿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对总统表示支持——阿瑟·克罗克称将军是“一个屡教不改的自大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让麦克阿瑟“从命、辞职或调离”是必需的。相比政府当局对军队的控制，编辑们坚守的原则并不是很多。几家一向对政府充满敌意、在此事上却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拥护的报纸包括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论坛报》、伯明翰的《新闻报》、波士顿的《先驱报》、丹佛的《邮报》和华盛顿的《星报》。《商业周刊》认为“针对总统的弹劾论调是愚蠢而又不负责任的”，何况“时至今日，总统除了解雇将军之外无能为力”。不过，《商业周刊》辩称：“杜鲁门像幻想乐天派一样在朝鲜半岛上掘壕固守、希望某些事情能够发生的做法和我们的国家经历是背道而驰的……也许将军一直都不是个容易应付的人，但一条政策几个月还无法制定出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在总统与将军一团

和气地在威克岛上见面时完成呢？后来又为何不命令将军亲自回国与联席参谋长们进行协商？”

这是保守派出版物采取的最温和的态度了。右翼的报业巨头（麦考密克、赫斯特、卢斯、大卫·劳伦斯、霍华德报系的编辑们）观点更加悲观。后来对越战也展开了批判的《芝加哥论坛报》宣称：“杜鲁门先生因为在未曾宣战的情况下便篡夺国会权力、下令美国军队开赴朝鲜半岛前线的行为应该被弹劾。”考虑到将军公然藐视总统的挑衅行为，巴斯科姆·蒂蒙斯在休斯敦《纪事报》中写道，麦克阿瑟的“约束力是令人敬仰的”。《俄克拉何马日报》称解职行动为“夜深人静后实施的罪行”，忽略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夜深人静时”正是东京“艳阳高照”之时。这样说也许不太准确，不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热心地表示挫败“‘二战’之初一个在美军投降后目睹了巴丹半岛的星条旗落下的男人”的行为让人无法忍受。《纽约新闻报》的一篇社论暗示杜鲁门被人下了药（“也许国务院给了他某种精神或神经止痛剂”），而该报的桂冠诗人哈里·H. 施拉赫特也感动地写道：“我们感谢你，天父，为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尼克·肯尼（施拉赫特在《纽约镜报》的对手），还创造了一首叙事歌谣，反映了将军自己的情感，形容在箭从他的护胸甲上弹开的同时，刀子却插入了他未加掩盖的后背。肯尼恳求他：“伟大的战士、政治家、外交官/高举你闪亮的剑吧！”他用一行显然是为了押韵的句子补充道：“他们为之喝彩的是你的名字啊！”

艾奇逊的反对者们也发动了猛攻。约瑟夫·R. 麦卡锡指责那些挤在总统面前的“极端保守分子和本笃会修士”才是“白宫犯下叛国行为”的始作俑者。威廉·E. 詹纳说：“这个国家如今已经落入了由苏联特工操纵的秘密小团体手中。”密苏里州国会议员奥兰德·K. 阿姆斯特朗称将军遭到解职是“苏联自拉拢中国以来最大的胜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军事顾问朱利叶斯·克莱因准将说克里姆林宫“应该鸣响21响礼炮以示庆祝”。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声明，指责“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三人统治”策划了一起“亚洲超级慕尼黑事件”，并责问他们：“作为放弃将中国拉到西方阵营的决定发起人……难道他们现在认为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地重新拾起被朝鲜半岛冲突打断的事业吗？”

在利用将军的悲剧方面最精明的人便是理查德·M. 尼克松。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加州参议员说道：“这个国家里最快乐的一群人将会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傀儡……总统已经把他们一直想要的东西给了他们——麦克阿瑟的头皮。”他表示，麦克阿瑟之所以“被解职，只是因为他拥有强大的判断力和爱国之心，并要求放开朝鲜半岛上奋战的士兵的双手”。这位参议员随后起草了一份决议，宣称：“参议院认为美国总统解除陆军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权、使其丧失为美国效命的机会一事，没有为美国人民的

最佳利益着想。因此，总统应该恢复麦克阿瑟将军被解除的指挥权。”他用尼克松式的经典措辞告诉自己的参议院同僚们：“我先得说明，我并不像那些人一样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是永远正确的。我也不像某些人那样认为他未曾做出过值得批评的决定。但我要说，就这个案例而言，他给了美国人民都能也都愿意支持的一条替代政策。他提出了要改变险些把我们卷入亚洲灾难边缘的政策。”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这位参议员收到了600封称赞他的电报。他兴高采烈地说道：“这是我见过规模最大的自发反应了。”

杜鲁门经受住了这场暴风雨，却失去了人们对他发动战争的支持。麦克阿瑟提出的更加危险的提议也没有获得胜利，尽管他带着萦绕在耳边的掌声和伟大战斗将军完好无损的声望把世界抛却在了身后。对美国人民来说，为英雄喝彩是一回事；在这一点上，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就颇具启发性。支持封锁中国、轰炸中国东北基地和保卫台湾岛的人勉强超过了半数，但大部分人对蒋介石能否东山再起、夺回大陆充满了怀疑，且只有30%的人认为美国已经做好了和毛泽东作战的准备。此时距离抗日战争胜利过去还不满6年，选民们自然是没有心情加入另一场大战。

然而他们显然对参与半岛战争一事有所醒悟。这个缺乏耐心的民族是没有兴致加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的，过分唯心的他们只有在眼前的问题属于正义的征讨时才会自愿参战。对任何缺乏“强权政治”风格的事情，他们都会（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嗤之以鼻。麦克阿瑟对折中办法和斡旋停火协议的蔑视以及他惩罚妨碍和平的恶人的决心（和平在美国人的眼中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引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他的道德挑战和击溃邪恶的宣言感染了他们心中被视为最好本能的那一部分。而无法予以回应的事实却让他们感到悲伤甚至是苦恼，仿佛是对自己不忠。

东京也陷入了哀痛的情绪之中。在经历了陆军元帅麦克阿瑟5年的统治之后，日本人成了亚洲最欣欣向荣、平安无事的民族。据西博尔德回忆，他们“深深地敬重麦克阿瑟”；“在谨言慎行却又灵巧娴熟的情况下，他凭借自己杰出的天分设法行使着自己的职位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权力”。西博尔德相信：“他的冷淡虽然广受诟病，却从未遭到过日本人的挑剔，因为他们能够理解或尊重他超然离群的需要。批评他的人一般都是些不用对占领行动负责的非日本作者和记者，不大理解麦克阿瑟在应付这群独特、敏感的外国人时采取的方式。”

早在3个月以前，横滨所在的神奈川西岸人民就委托工匠为他打造了一尊铜质半身塑像，还在底座上铭刻上了这样的文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日本的解放者”。如今，吉田在广播中向全国人民宣布：“将军在日

本的成就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他将我们的国家从战后投降的困惑与衰竭中拯救了出来，送我们走上了……重建的道路。是他坚定地让民主扎根于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是他为和平协议铺平了道路。他无疑会受到我们的人民最深刻的崇拜与喜爱。面对他即将离开的事实，我找不到任何言语来表达我们国家的悲叹之情。”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表示感激的决议，日本参议院议长佐藤尚武和最高裁判所长官田中耕太郎致信将军，表达了他们个人的愤怒。裕仁出现在了大使馆的门口——这也是天皇第一次拜访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外国人。他用双手紧握住麦克阿瑟的一只手，向他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

西博尔德注意到，将军即将启程的消息“主导着日本的情感，占据了各大报纸的版面”。《日本时报》评论道，“8 300万日本人民的嘱咐”会跟随他启程，“只言片语是永远不足以形容他对这个国家的意义的”。东京两大日报也加入了称颂将军的队伍。《每日新闻》表示：“麦克阿瑟的解职是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冲击。他在面对日本人民时并没有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伟大的改革者。他是一位高尚的政治传教士。他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物质支援和民主改革，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我们会继续爱戴和信任他，把他看作一位最能理解日本处境的美国人。”《朝日新闻》紧接着也表示：“他的离职让日本人民万分失望，尤其是在和平协议指日可待之时。日本的复兴应该归功于他一个人的指导。我们感觉就像是自己失去了一位慈祥而又仁爱的父亲。”他离开的那天早晨，《每日新闻》直接向他发表了致辞：“我们希望你能进一步帮助我们培育青涩的民主果实。我们希望你至少还能领导我们直到和平协议的签署将日本送入国际社会。”

琼也得到了不少的赞誉。她“作为一位妻子的奉献精神”被日本人视为“女性最崇高的美德”。不过当时的她忙碌得无暇阅读任何赞辞。赫夫说，那些“疯狂而又混乱”的日子里，所有人都在急匆匆地往行李箱和军用储物柜里塞东西。此外，他们还不得不腾出时间向临时搬进帝国饭店的李奇微做简报。当有人向李奇微提问“代替麦克阿瑟职位的感觉如何”时，他准确地答道：“没有人能够代替他这样的人的位置。你只能追随他。”这位比自己的前任年轻15岁的新任最高统帅在旁观者的印象中“充满了无限活力、有些焦躁不安、言行直率坦白、渴望团队行动”。反之，麦克阿瑟在下达干脆利落的命令之前却很少征求他人的意见，因而给人留下的是“放松自信”的印象。老将军爱穿褪色的、时常是修补过的卡其军装，新将军却是一身戎装，肩带上还挂着手榴弹。作为一个精通文学的贵族，麦克阿瑟所有的声明都是他亲手书写的。而曾为陆军技术军士的李奇微却把这些任务下放给了手下的人去完成。此外，麦克阿瑟是美西战争时的西点军校学员，而李奇微却在“一战”时才毕业。两人之间横亘着时代的鸿沟。

麦克阿瑟最后接见的几位客人中有一位名叫乔（约瑟夫）·乔特的加州律师，曾是1948年支持麦克阿瑟竞选总统运动的领袖。乔特向邦克指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号已经不再是最适合将军座驾的名字了，邦克给它重新起名为“巴丹”号。1951年4月16日星期一，一行人离开日本的当天，粉饰一新的“巴丹”号在晨曦中闪烁着光芒。天亮后不久，与他们告别的人就聚集在了铺着柏油碎石的飞机跑道上。“那是一个银灰色的、寒冷却又晴朗的早晨。”一位美军士兵的妻子回忆，“就在我们到达机场时，太阳升起来了。”车队于清晨6点28分离开了大使馆。尽管天色尚早，已有将近25万日本人站在了12英里长、通往机场的道路旁边。共有1万名日本警察10人一组地站在路旁维持秩序。赫夫事后回忆道：“那些普通人——被麦克阿瑟赋予了崭新的自由理念的店主、农民、售货小姐，挥舞着小小的美日两国国旗，或呼喊着‘再见，再见’，或举着写有‘我们爱你，麦克阿瑟’‘深表遗憾’或‘我们感谢将军’字样的标语。”

李奇微和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目前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在羽田机场正式迎接了将军的豪华轿车。麦克阿瑟解散了仪仗队，和琼一起向日本领导人、外交使节团和占领军高级官员——西博尔德、艾伯特·魏德迈、C. 特纳·乔伊以及英国的霍勒斯·罗伯逊爵士一一告别。随着礼炮的鸣响，18架喷气式战斗机和4架“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在人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可除了田中和在场的女子们在闷声啜泣之外，跑道上出奇地安静。第一位迈上飞机舷梯的乘客是身穿庄重的广东风格衣裤的阿秋。所有人都听到了她在转身时挥手喊出的：“再见，大家！再见！”就在她朝着四面八方鞠躬致意时，军乐队奏响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将军、琼、阿瑟和其他人也跟随着阿秋的脚步走上了飞机。7点20分，斯托里呼啸着加速驶上了跑道。静静目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人群望着飞机升上高空，在机场上盘旋了几圈，朝着东北方飞去。他们就这样凝视着空中，直到飞机化作太平洋上的一个黑点，消失在他们的视野当中。当年，安达卢西亚人在看着与罗马贵族派卷入纷争中的恺撒离开西班牙总督岗位返回家乡、与批评者分庭抗礼时的感受想必也一样。和他相似，麦克阿瑟也在阔别14年之后返回了华盛顿，从边境回到了帝国的中心——祖国的权力中心点。但恺撒当时只有50岁，正值壮年。麦克阿瑟比那时的恺撒年长30岁，他的时间和他所代表的价值都已经不可挽回地逝去了。

在前往夏威夷的漫长旅途中，邦克、卡纳达、赫夫一家以及惠特尼一家有的在看书，有的则在小声地交谈。阿瑟为阿秋唱着歌，而将军则在忙着书写自己在国会面前的演讲稿。琼默默地坐在他的身边。他不时地把铅笔放到一旁，两人的眼神交汇在一起，无声地牵起了彼此的手。某一时刻，他担心她会累坏身子，把她领到一处床铺旁，从头顶的架子上取下了一床毯

子，缓慢从容地用父亲般的方式把它盖在了她的身上。紧接着，他拍了拍她的手，回去处理自己的手稿。

当“巴丹”号滑过钻石头山上空，朝着希卡姆机场飞去时，琼回到了将军的身边。据《纽约时报》估计，他们的脚下有大约10万人正在翘首企盼。“他们一定是为你而来的。”琼说。麦克阿瑟的回答并不是很肯定：“我希望他们来这的原因不是同情。”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人是来为他献上“衷心的问候”的。绵延20英里的游行路线一直延伸到了夏威夷大学的校区。在那里，格雷格·辛克莱校长在3 000名欢呼的学生面前授予了他民法学荣誉博士的学位。校长表示：“麦克阿瑟将军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在这里的许多人心中，他更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斯托里按照指令于日落之后驾驶飞机靠近了加州海岸。麦克阿瑟走进驾驶室，眺望阿瑟从未见过的祖国露出的第一抹朦胧的轮廓。随着旧金山的灯光闪烁着出现在视野里，将军用双手抚着儿子的肩膀说道：“好了，儿子，我们到家了。”飞机于晚上8点29分降落在了跑道上。斯托里走进后机舱、打开了舱门。将军像往常一样喊了一句“旅途愉快，机组人员们！”，紧接着迈上了舷梯。顷刻间，他的镶金军帽和引人注目的军用短风衣就被一大片的聚光灯给照亮了。他说：“麦克阿瑟夫人和我想象这一时刻已经有许多年了。”但他脚下的那群人没有一个能够听到他的话。更多的礼炮鸣响了起来。黑暗中的某处，一支军乐队奏响了乐曲。眼下没有人能够听清音乐，超过1万名旧金山人已经冲破警戒线、涌到了“巴丹”号的周围。迷失在一片喧嚣之中的还包括市长以及和他一起等待将军的州长厄尔·沃伦。将军一行人花了20分钟才到达车旁。这还只是问题的开始。50万兴奋的民众正站在街道上，大多数人在高声呼喊，许多人当街晕倒。车队的行进路线似乎被封锁住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在“缓慢爬行”了14英里之后，麦克阿瑟一家到达了圣弗朗西斯酒店。在一群手拉着手的警察的保护下，一行人才免于死在人群的践踏之下。可以理解，阿瑟受到了惊吓，不住地把目光投向母亲，寻求安慰。在他们的套房里，麦克阿瑟一家第一次看到了电视。一家糖果店还给阿瑟送来了三种不同口味的奶昔。遵循美国移民法，阿秋是以“学生”的身份进入美国的。第二天早晨，又有50万加州人在这位回归的英雄于市区巡游时聚集在路边欢呼喝彩。有时，即便是上百万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很难看到他，因为到处都是漫天飞舞的五彩纸屑、自动收报机纸条、报纸碎屑和被圣弗朗西斯酒店里其他情绪激动的住客从枕头里掏出来的羽毛。他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说道：“有人刚刚问我是否打算进入政坛。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打算竞选政治职位。我希望我的名字永远也不要在政治上遭人利用。我的唯一一条政治纲领便是你们所有人都熟知的那句话——‘天佑美国’！”

当然，这恰恰是一位候选人会说的话。华盛顿方面是无法看穿他的意图的，但身处首都的这群领袖们都是与名望打交道的人，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某种政治现象。尽管将军的座驾直到4月19日午夜过后才抵达华盛顿国家机场，尽管许多人仍在悼念几个小时前刚刚去世的阿瑟·范登堡，仍有1.2万人漫无目的地在航站楼附近乱转。联席参谋长们到场送了他一套银质茶具，而国防部部长、国会领袖也前来迎接他——总的来说，似乎所有人都露了面，只有哈里·杜鲁门仅仅派了自己的军事助手、曾在国民警卫队服役的密友哈里·沃恩作为自己的代表。和沃伦州长相比，他们的运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人群压垮了屏障，把这些位高权重的接待者全都挤到了一边。麦克阿瑟花了15分钟的时间才奋力挤到自己的豪华轿车旁边。琼和阿瑟还被短暂地冲散了，就连惠特尼的脚也被撞伤了。在暴风眼中全身而退的唯一一群人便是华盛顿的记者们，因为他们全都谨慎地戴上了橄榄球头盔。

斯塔特勒酒店总统套房里，小山般的成堆花束正等待着将军。安排妻子和儿子上床休息之后，将军在套房的写字台前坐了下来，雕琢起了自己的讲稿。当时，他的草稿已经改过好几遍了。邦克在火奴鲁鲁为他录入了第一个版本，旧金山的某位士兵帮他录入了之后的几个版本。在星期四的曙光到来之前，麦克阿瑟在斯塔特勒酒店里写出了最终的讲稿。在他开口之前，没有人知道讲稿的结尾是怎样的，但杜鲁门可能已经看过了讲稿的其他部分。据总统回忆，他吩咐陆军部部长佩斯："弗兰克，拿一份讲稿的副本给我。"佩斯表示这很令人难为情，因此他"真的宁愿不要这么做"。总统说："弗兰克，我不关心你愿意做什么。我只想让你快点儿把那篇讲稿给我找来。"显然是五角大楼的一位公关官员到旧金山找到了将军，告诉他演讲的文本必须经过审查。惠特尼写道："麦克阿瑟既愤怒又震惊……因此当即对这一指令的合法性发起了质疑。陆军部很快退却了，在道歉时承认该命令的发布是陆军部某管理官员搞错了。"不过杜鲁门却告诉莫尔·米勒："佩斯去取回了讲稿。我读过之后发现，里面除了一堆废话之外什么也没有。"

实际上，总统是有理由提出合理要求审批麦克阿瑟的讲稿的。一位五星上将是无法正式退休的，他和随行军官的薪酬以及他的飞机的开销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正如米利斯所指出的那样，显然他准备发表的是"抨击政府发动对外战争，并因高级将领不服从政府当局就解除其职位的"的言辞。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尽管杜鲁门心怀厌恶，却无法盛气凌人地对将军呼来喝去。因此，总统选择了保持低调，命令部下确保麦克阿瑟能够获得全部荣誉，还准许学生和公务员放假半天去欢迎他。不过，期待内阁参加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却是一种奢望。他们会和总统一起在白宫聆听将军的演讲，商议事件带来的后续影响。

正午时分，众议院的议员们聚集在了一起。12点13分，琼出现在了旁听席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2点18分，将军的军官们拥护着麦克阿瑟走进了议院；12点20分，照明灯亮了起来，参议员们鱼贯而入。室内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直到12点31分门卫喊道："有请，陆军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听众们全都跳了起来，有的一边叫喊一边鼓起掌来，有的拍打着桌子。麦克阿瑟挺直了身子、面无表情地迈着大步走过走廊、登上讲台，回避着众人的注意力。会议室里安静下来之后，他用审慎的语调说道："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尊贵的国会成员，我怀着谦逊而又骄傲的心情站在这个演讲台上。我谦逊，是因为美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建设者都曾站在这里发过言；我骄傲，是因为我认为这种立法辩论会代表了迄今为止人类解放最纯粹的形式……向你们讲述这些话时，身处暮年的我心中既没有敌意也没有怨恨，只有一个目的：为我的祖国效力。"

在场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变得狂热起来。这段34分钟的演讲总共被喝彩声打断了30次。在那些第一次听他演讲的人看来，他显然熟练掌握了艺人们口中所说的"投射"——即与观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建立了一对一的亲密关系。借助广播和电视的传播，这次演讲更是进一步感染了3 000万美国人。据《生活》杂志报道，他们"被他充满磁性的声音、戏剧化的修辞以及他作为我们的时代中最受争议的军事英雄所具备的强有力个性所深深吸引了"。他的双手一直支在讲台上，只有在翻页的时候才会抬起来；他的右手仅仅在伸向玻璃水杯时颤抖过一次。他头脑清楚，颇具说服力，严肃端庄，口齿清晰；尽管他认为自己的报告内容迫切，说起话来却是不疾不徐、有板有眼，仿佛他的一生都是在为这一刻做准备。身处埃内韦塔克环礁的乔治·肯尼记得："我曾看到过他让听众陷入如痴如醉的状态。这一次也不例外。和往常一样，他在自己所讲话题方面的渊博知识、叙述的清晰程度和不容置疑的严肃性牢牢把握住了听众的注意力，直到最后。"

他在演讲开始时提到，他会把自己涉及内容的范围限制在"亚洲的大部分区域内"。紧接着，他短暂地回顾了一下亚洲大陆的历史。他犯了一个错误，说中国军阀张作霖是在"世纪之交"时当权的——实际上，张作霖是大约25年之后才上台的。他对远东事务的深刻理解令东方学者们印象深刻，尤其是他对中国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有力的攻势显然"不仅出现在了朝鲜半岛，还出现在了中南半岛等地，并有可能指向南方"，明显反映了"推动历史上每个想要成为征服者的国家的势力扩张渴望"。他丝毫不曾幻想崇高的梦想能够解决亚洲的问题："人们所争取的无非是能让肚子里多一点儿食物、身上多穿一点儿衣服、头上多一片更加坚固的房顶的机会，以及实现普通人政治自由强烈渴望的机会。"他相信，达成这些目标最好的机会就在于让联合国在朝鲜半岛取得胜利、重建和平。诚然，鉴于中国方面也卷入了冲突之中，除上述方法之外也别无他法："一旦我们被强迫接受战争，除了应用可行的所有方法迅速结束战争，也没有别的选择。战争的

主题目标就是胜利——而不是长久的犹豫不决。”此外需要重申的是：“诚然，在战争里，胜利是无可替代的。”

中国人介入时，他曾经胜算在握。“这创造了一场新的战争和一个全新的局势……需要外交新决策来准许军事战略根据现实进行调整。这样的决定并非唾手可得。”他催促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他从未考虑过要入侵中国东北或其他大陆领土，但“如果我们的政治目标是像打败旧敌人一样打败新敌人的话，新局势的确急需针对战略计划进行大幅度修改”。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推荐了五个步骤：承认“取消敌军在鸭绿江以北所获避难保护”的需求、加强对大陆的经济封锁、强制进行海上封锁、“空中侦察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不再约束蒋介石国民党对大陆发动袭击。上述步骤和他于12月30日力劝联席参谋长们的话存在微妙的差别；那时的话中没有提到利用空袭和海军炮火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工业生产能力”，也没有提到调动国民党军队支援朝鲜半岛，但其主旨是一样的。他带着真挚的情感说道：“为了包容所有为支持我军……结束敌对状况……拯救无数美国和同盟国士兵的生命而构思的专业意见，我在外行人的圈子里（大部分是在国外）遭受了严厉的批评”（这是在挖苦讽刺英国人），“尽管我从军事角度来理解，上述观点过去曾出现在包括联席参谋长们在内的每一位关心朝鲜战争的军队统帅心中。”

此话引来了全场的起立喝彩。尽管这并不属实，联席参谋长们事后也会予以否认，但麦克阿瑟是从不会允许自己人反对他的计划的。将军相信他们遭到了政府的威胁恐吓。他也许是对的，尽管他们会尽力否定。事实上，他们是谨慎的，而将军则是鲁莽的；在将军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既是他成功的关键，也是他失败的要害，同时更是他的名声令他们黯然失色的原因，以及他能够站上平日里只为国家元首保留的讲台，向国会发表演讲的原因。他一生都是一位勇敢的军官，倡导采取积极进取的行动。此刻，他的听众们终于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历史老师们强调的没错，绥靖主义反而会招致新的更加血腥的战争。这表明，没有任何一个例子的结果能够证明这种手段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绥靖主义最多只能带来虚假的和平。和敲诈勒索一样，此举为接下来崭新的更大需求打下了基础，直到暴力成为唯一的其他选项。我的士兵们问我：‘为什么要把战场上的军事优势拱手让给敌人？’”他装腔作势地停顿了一下，声音变成了沙哑的耳语：“我无法回答。”

他赞扬了“你们勇敢的儿子们”（指美国士兵），形容道：“他们从各个方面看来都十分杰出……那些勇敢的男人将留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我也将永远为他们祈祷。”紧接着，他用大多数人都无法忘却的话语说道：“我即将结束自己52年的军旅生涯。在世纪之交到来之前加入陆军满足了我所有孩子气的希望与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大平原’上宣誓以来，世界已

经发生了许多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希望与梦想也早已消失不见。但我仍旧记得那天最流行的军歌副歌里自豪的歌词：‘老兵永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凋零。’正如歌中的老兵一样，此刻的我也将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慢慢凋零——一位在上帝赐予的光辉中看清自己的责任，试图尽到自己本分的老兵。”最后一句话令现场安静了下来：“再见。”注

他把自己的手稿交给了书记员，朝着琼挥了挥手，走进了一片喧嚣之中。国会议员们啜泣着赞颂着他，挣扎着触碰他的衣袖，差点儿伏倒在他的面前。众议员杜威·肖特喊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上帝在说话。那是上帝的肉身，上帝的声音！”另一位参议员说：“不赞同麦克阿瑟将军的话是不忠的表现。”除了极少的几个例外，那些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或全神贯注地听着收音机的选民们也同样被感动了。在纽约，赫伯特·胡佛称麦克阿瑟是“圣保罗在东方转世化身成的陆军将军”。人们的脸颊湿润了，声音沙哑了，胸膛也起伏着。肯尼说：“当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你会感觉所有人都深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不想错过他的一字一句，以至于都忘了要去呼吸。”宾州参议员詹姆斯·达夫说整个国家“都处在情绪爆发之中”。美国人拨通了报社的电话，要求他们对抗“名誉扫地的贩子”和“计划把我们的利益出卖给英国、欧洲和共产党的不忠的国务院”。新泽西的一个女子对肖特和胡佛的话表示了认同，说：“将军拥有上帝的特质，他善良、慈悲、坚定而又公平。他是我心目中的上帝。”

这样的电话也打到了白宫里。在那里，总统正和他的顾问们聚集在西翼的一台电视机旁。除了艾奇逊之外，内阁的所有成员都惊呆了，不知道政府是否遭到了致命一击。国务卿冷笑着安慰了他们。他认为这段演讲“不仅仅是可悲的”，他说，这让他想起了一位热衷于保卫自己女儿贞操的父亲在听说女儿怀孕时甩开双手尖叫的声音：“谢天谢地，结束了！”说话没有这么文雅的杜鲁门认为自己对这段演讲的看法得到了证实。总统说，所有这些“愚蠢的行为”以及“该死的可笑国会议员们哭得像一群女人似的”的画面，“百分之百都是胡说八道”。

国会里人们仍旧忙着擦干眼泪时，麦克阿瑟已经在空军喷气式飞机的保护下乘车驶上了宾州大道。那天下午，共有超过50万名华盛顿民众到场为他喝彩，其中一半人都闹哄哄地聚集在了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在那里，将军接过了官方颁发的城市钥匙，而阿瑟还收到了一个麦克阿瑟家族格子呢花样的领带以及一块能够显示时间、日期、月份、年份和月相的手表。随后，将军走进宪法大厅，面向第16届美国革命女儿会的6 000名成员发表了一番演说。通过表决，女士们决定摘掉自己的帽子，以免遮住别人注视他的视线，而他也没有令她们失望。“我自很久以前就想亲自向你们表达

我内心的敬意。”他说，“在这危急时刻，所有的爱国者们都在指望着你们。”为了表达他在其他保守派团体面前重申过的观点，他开口说道：“主要由国内颠覆因素、贪污腐败以及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致而又严格的控制导致的复杂与混乱给当代美国带来的威胁毫不亚于华盛顿的那个年代。受这些有害因素的影响，我们与祖先们铭刻在心的简单却又永恒的模式……渐行渐远。”第二天，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文档秘书长沃伦·沙特克·柯里尔夫人在阅读自己的会议记录时念到，将军的演讲“可能”是宪法大厅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托马斯·B. 思罗克莫顿夫人立即站起身来，和在场的其他人一致表示，删除“可能”这个词。

那时，麦克阿瑟已经奔赴纽约。他再次于深夜抵达，并再次遭遇了情绪激动的大批人群。但这一次，他莅临的是一座在接待名人方面颇有经验的城市。在艾德怀尔德机场，他见到了曼哈顿的官方接待员格罗弗·惠伦。惠伦堪称是历史上与最多名人握过手的接待员，同时还是市警察局特别服务与调查办公室的十位成员之一。他带领麦克阿瑟坐上了纽约的“达官显贵专车”，即一辆双色的克莱斯勒轿车，上面还挂着一张著名的车牌“4C–2602”号——想当初，艾森豪威尔从欧洲凯旋时也曾乘坐同一辆轿车穿城而过。保镖们已经预料到前来欢迎麦克阿瑟的人群会比艾森豪威尔那时还要可观。据其中一位名叫路易斯·沙利文的保安回忆，尽管官方游行被安排在了第二天进行，已经有人坐在了树杈上、房顶上，还有不少人尖叫着“痛骂他们”和“别接受”的呼号。麦克阿瑟一家在华尔道夫酒店入住时，15万封书信和2万封电报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一位助手回忆，还有大批的信件正“成袋”地涌进来。

早晨，麦克阿瑟和惠特尼、文森特·P. 因佩利特里市长一起坐进了那辆克莱斯勒轿车，保镖们站在后备车辆的踏板上，而琼、阿瑟和市长的妻子则坐在第三辆豪华轿车中。一行人花了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这段19.2英里的路，每一寸路沿上都挤满了怒吼的人群。曼哈顿从没有出现过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场景。“这座城市自发地咆哮、尖叫到几乎筋疲力尽。”第二天的《时代周刊》如是描写，“大都会成了为这位71岁的军事政治家赞许、呐喊的庞大啦啦队。”几百万的围观人数也是这座城市前所未见的——其中有4万名码头工人是在罢工后赶过来的。工厂拉响了警报，海上的班轮也按响了低沉的喇叭声，嘟嘟作响的救火船喷着水柱，头顶上的飞行员则在一英里长的天空拼出了“欢迎回家，干得好”的字样。

将军两次走下敞篷汽车，一次是去和站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门前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主教握手，另一次则是站在市政厅门前向6万纽约人（后来，其中的1.8万人因为神经衰弱而住进了医院）宣布：“我们的确投降了。”据沙利文回忆，第五大道上的人“就像一群异常兴奋的羊”。女人们举着手绢啜泣，男人们则在胸前划着十字，孩子们手举着写有“麦克阿瑟永远不会

悄悄离去”“欢迎回家，麦克阿瑟”以及“上帝把我们从艾奇逊手中拯救出来”字样的标语和海报。一切结束之后，据卫生部汇报，将军途径的路线共产生了2 859吨垃圾，是艾森豪威尔创下的纪录的4倍。

1942年曾利用麦克阿瑟的名望大发横财的商人们的生意再度兴旺起来。长柄玉米烟斗、带有将军照片的小酒杯和形形色色的麦克阿瑟纪念品都被匆匆送上了生产线。许多颇有魄力的小商品商贩还卖起了麦克阿瑟1948年参选总统时所剩的纽扣、三角旗和玉米烟斗。花商们卖起了名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香水月季（“无须娇养或偏爱”）以及麦克阿瑟兰花、仙人掌、剑兰、天竺葵、芍药和鸢尾花。珠宝商出售的胸针用宝石组成了将军的侧面肖像，而叮砰巷流行音乐创作人还出了5张唱片，歌词写道：

老兵永不死，永不死，永不死，

老兵永不死，

他们只是慢慢凋零。

显然这位老兵并没有打算很快消失。华尔道夫酒店里，在麦克阿瑟搬到37A套房之后，接线员每天都会接到3 000通打给将军的电话。送给阿瑟的礼物开始堆积成了小山：从加州寄来的山地自行车还有纽约巨人队的利奥·迪罗谢送来的帽子、棒球手套、巨人队防风夹克和两张签名棒球卡。与此同时，将军也在致电胡佛表达敬意之后舒舒服服地坐在了椅子上，如同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般接见起了自己的封臣。前来拜访他的人包括斯佩尔曼、卢斯、赫斯特、麦考密克上校和由塔夫脱和布里奇斯率领的共和党参议院代表团。尽管将军曾在旧金山发表过拒绝从政的声明，此举还是自然而然地激起了人们对他可能走上仕途的强烈怀疑。记者们就此事找到了惠特尼进行询问。他说将军希望他们去《约翰福音》第20章20节至29节中寻找答案。其中讲述的是多疑的多马的故事。这位持怀疑论的门徒拒绝相信耶稣的复活，除非他“看见他受伤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耶稣在向他展示了自己的伤痕之后说道：“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国会山上的一位“多疑的多马”便是佐治亚州有权有势的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1951年5月3日，他敲响议事锤，开启了针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和参议院办公楼里的陆海空三军委员会的联合调查。根据同僚们的指示，他们将调查麦克阿瑟被解雇一事以及“远东的军情”，不过现实中的听证会（听证

会举办的地点是铺设着大理石镶板、拥有高耸天花板的党团活动室，那里是所有一流参议院会议的举办地）却成了两党之间的论战。25名参议员分成了两派，就会议是否应该对媒体开放产生了分歧；共和党人对此持赞同意见，而据《时代周刊》报道，民主党决心将“麦克阿瑟将军异乎寻常的花言巧语阻挡在麦克风的范围之外，同时不让他引人注目的身影出现在1200万台电视机的屏幕上”。最终，委员们妥协了，媒体将被拒之门外，但记者们会收到被某海军将官删除了公众不该知晓的敏感信息的会议记录。

尽管忠诚的民主党人拉塞尔因为形容将军是“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而赢得了将军的信任，却怀疑将军是个鹰派人物，其“对政治学的全面理解和知识为他提供了重建和稳定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条件，使他和他的国家赢得了曾经与我们的利益为敌的人民的尊重与喜爱”。有些人预言13个证人在42天之内做出的多达245万字的证词就能被当作迅速掩饰过错的托词，他们被主席的话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时代周刊》报道：“西方议会历史上此前从未针对基本纲要进行过如此痛苦、细致而又彻底的审查。”拉塞尔几乎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总统的感激之情。对方称赞他“娴熟处理麦克阿瑟委员会听证会的举动展示了他作为主席的能力、智慧和审慎气质。”杜鲁门尤其赞赏这位参议员对他的同情，相信有时“总统必须拒绝在国会侵占自己特权时为其提供信息……因为国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总统出糗——换句话说，是出于盲目效忠于某一党派的政治理由”。每一次政府以国家安全所需为由拒绝提供材料，拉塞尔都会表示服从。

5月3日星期四，当琼艰难地在成山的信件中穿行、阿瑟抓着乔·迪马吉奥送的外野手手套去参加球赛时，麦克阿瑟飞往首都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场会议。他说，他的证词就是他“最后的官方行为”。他告诉参议员们，他没有事先准备什么声明，“我有幸应邀站在国会面前发言时已经说得相当全面了。我今天并非是以自发证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而是为了响应委员会的要求。我完全处在委员会的掌控之中。”实际上，他不仅十分配合，而且格外健谈。舒服地瘫坐在直背椅上，嘬着一支石楠木烟斗，穿着没有绶带的简单衬衫，他整整做了3天的证人，且每晚都会飞回华尔道夫酒店。在他的倡议下，参议员们放弃了午休，而是由信使为他们送来三明治和咖啡。将军甚至不曾离开去上厕所。一位民主党成员说道：“我不相信麦克阿瑟已经71岁了。哎，他一定有着和大学男孩一样的膀胱！”

每天早上，他都会随性地在党团会议室外向记者们举手致意。他们注意到他没有提公文包，因为他既不需要文件也不需要笔记。一位旁观者写道，他对参议员们所讲的话都是即兴的，“生动展示了他的历史知识、文化修养、热情真诚、洞察力和说服力”。一个问题就能触发他带上自由的联想表演10～15分钟，其间还可能引用恺撒、中世纪风俗、《大宪章》、法国大革命、英国19世纪的《谷物法》、爱尔兰大饥荒和日本农民的日均卡路

里消耗等事例。不管共和党人抱着多大的希望和民主党人心怀多少恐惧，他都拒绝了批评联席参谋长或杜鲁门的机会——尽管他为马歇尔留了一刀。甚至当康涅狄格州的布赖恩·麦克马洪引用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项肯定军事战略需要由总统而非将军来做出决策的声明时，他也不觉得震惊；麦克阿瑟亲切地说他感到“既意外又惊奇，自己竟然曾经如此的明智”。第三天结束时，一位参议员还称赞了他“回答所有问题时的极度耐心、体贴和诚实”。

虽然他彬彬有礼，观点却不曾改变。在与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对话时，他说有限战争理论将“一种新的理念引入了军事行动之中”。他自己的理念是，“当你进入战争时，你就已经耗尽了结束异议的其他所有可能性”。如果他对国务院的立场理解得没错，它提倡的是“在朝鲜半岛展开持续的无限期军事行动，在敌人感到倦怠或你向他的条件屈服之前不设置停战的明确目的”，而此举“向军事领域引入了政治控制之类将军此生从未听说过或研究过的东西”。但他并非真的相信政府的构思是那么的明确。他在发表抗议时声音一度高扬了起来：“惰性是存在的！没有政策——我告诉你们，什么也没有。没有计划，什么也没有！”他询问：“美国是否能够继续按照这种反复的方式战斗下去（来来回回），这意味着你们累积起来的伤亡人数将是惊人的。参议员们，落在朝鲜半岛上的将不只是尘埃。”他说着把自己的手背伸向了艾奇逊：“还有美国人的鲜血。”

他与“政客们”（将军形容自己军外上司时所用的称呼）的分歧存在于几个领域。麦克阿瑟与集体安全的支持者存在分歧、却与民族独立主义的追随者们不谋而合，他不信任欧洲人。他表示，华盛顿方面不仅不愿冒犯欧洲人，还允许软弱的同盟国成员来决定美国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付出了90%的努力，那么让仅仅肩负一小部分努力和责任的国家来过度行使决定权就是十分不合适的。”罗德岛参议员西奥多·F. 格林提出问题，如果其他派兵出征朝鲜半岛的联合国成员的政府坚定反对美国的激进政策，会发生什么情况。

> 麦克阿瑟：我当然希望联合国能够看到这条道路的明智和功用，但假若他们看不清楚，我仍旧相信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是具有主导性的，因而需要我们采取行动。
>
> 格林：单打独斗？
>
> 麦克阿瑟：单打独斗，如果有必要的话。如果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不足以觉察到“二战”之后的欧洲绥靖政策导致了什么结果的话，如果他们看不清他们进入亚洲所追寻的道路的话，我们到那时候为什么不保护好自己，单打独斗呢？

将军并非是孤立主义者——和他的国会支持者们不同，他热情地认可为崛起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但话说回来，他依旧无法接受战争可以被“切分成一块一块，可以发动只打到一半的战争，而不用一战到底”这种理念。他解释说：“当你只是说‘我们要反抗侵略’时，敌人为之斗争的可不只是这些。敌人争取的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摧毁我们在朝鲜半岛上的军队。”他告诉一位参议员：“你是个桥牌玩家。你知道桥牌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以你的优势作为思路。”他说：“我猜我差不多已经看尽了任何活着的人能够看得到的鲜血和灾难，但我最后一次在那里时还是感觉胃里像凝固了似的。当我望向那片残骸，看到上千个女人、儿童以及那里的每一件东西时，我吐了出来。”这也是他为什么无法忍受看着战事犹豫不决地拖延下去的原因。就算是战败也好：“正如我早上所说的那样，现在我只能想到三种出路。要不就去追求胜利，要不就向敌人投降并以接受他的条件作为结局，而最糟糕的选择就是——永无止境地陷入僵持之中，赢不了也输不掉，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牺牲上千人的生命。”

他催促委员会采取四个目标：“消灭整个朝鲜，统一朝鲜半岛；削弱并大举压制中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在亚洲传播民主理想；从而保卫欧洲的安全——由于朝鲜半岛事务是全球性的，欧洲的安全必然会得到加强。”因此，“连锁反应”是那里的风险所在，而欧洲大陆“那些只考虑一个区域的问题而遗忘了其他区域的人是在给整个大陆惹祸；在亚洲通常被认为是通往欧洲的大门的同时，欧洲也同样是通往亚洲的大门，无论哪一方产生广泛影响，都必将波及另一方。”在他看来，朝鲜战争是发生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面对正确的敌人的一场恰到好处的战争。他辩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在半岛停手，中国将被视为“东方的军事巨人”。美国的优势将一落千丈，而世界上新崛起的国家也会朝中立主义靠拢。和将军一样，他们都不明白美国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所有优势，包括运用友善热情的委员长的台湾军队。

> 拉塞尔：我无法确切理解你对国民党军队做了些什么。
>
> 麦克阿瑟：中国军队在大陆上的集结对台湾产生了严重威胁……我建议华盛顿放开对委员长的桎梏……哪怕他的军队只能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也能为我军减轻压力。

正如参议员J. 威廉·富布赖特所形容的那样，如今的将军有时听上去就像是“反共产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十字军”。他说：“我们不能向无神论妥协——在维护自由与宗教的路上不能半途而废，必须破釜沉舟。”他指责政府愿意为欧洲担保，却不愿意在亚洲出头。他们全神贯注于欧洲的行为相当于“北太平洋孤立主义”。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阻止共产主义深入每一

个角落。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做到。我对我们有信心。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看不起任何地方，要接受其中的失败……我不承认我们无法控制共产主义崭露头角的角落。”他注意到：“有人声称我们的实力不足以在两条战线上保护自己。除了失败主义，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思想了。”在这一点上，他似乎与自己的共和党支持者们存在着争执。正如胡佛所说的那样，共和党人认为：“我们不可以让国家过分投入……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是有一个限度的。”将军也觉察到了他所支持的道路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战争，但他告诉麦克马洪：“参议员，与国际关系有关的所有事情都意味着投机和风险。你不得不铤而走险。”

不过，尽管政府与自己抱持着相反的意见，他还是认为苏联介入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莫斯科方面尚未把自己与半岛战争“充分联系到一起，认定中国的失败如果发展到了被迫撤离朝鲜半岛的地步，将必然损害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业”。他也不认为“苏联有能力集结大规模的额外增援力量，并从亚洲大陆发起任何掠夺性的攻击”。西伯利亚的石油贮藏和维护设备不够充足。苏联在朝鲜半岛附近的部署“大部分是防御性的”。苏联知道他们不是美国远东海军和空军的对手。除此之外，他们的核武器储备也不及美国；如果美国不得不与他们为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在随后写给参议员哈里·F. 伯德的信中，将军详述了这一主题，并提及：“苏联是否在考虑征服世界的不确定问题？如果事实真的如此，有关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将处于起始阶段，而且不可能不受到美国在原子弹领域的领导地位正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逝这一事实的影响。同样，美国的巨大工业潜力也一样……简而言之，我一直都相信，我们现如今为了解决远东问题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本身都不会成为世界冲突的形成过程中的控制因素。”

可参议员们知道，即便苏联在军事上没有准备好进行最后的决战（事实上，苏联人直到1954年才开始发展远程轰炸机机队），美国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冒险挑衅世界上的其他超级大国。因此，委员会成员私下里一致认同麦克阿瑟大胆的提议是不现实的，还想起了他曾经犯下的错误。1941年，直到日本人发动攻势的前夕，他仍在坚称日本人于次年春天之前不会进攻菲律宾群岛。除此之外，他们还注意到将军的证词中存在某些不一致的地方。将军说，只有疯子才会让美国步兵在中国登陆。“任何支持这一做法的人都应该去检查一下脑袋”——然而，他力劝他们的政策中就包含了这一建议。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料到中国方面会介入朝鲜战争时，他理所当然地回答那是“政治情报”的工作，却又错误地拒绝接受国务院情报部门告诉他苏联人可能会插手的警示。尽管他提出了一项抵御所谓“共产主义阴谋”的全球战略，却又拒绝加入有关这一战略的讨论：

麦克马洪：将军，这个阴谋的发源地和筹划者在哪里？

麦克阿瑟：我怎么会知道？

麦克马洪：你觉得克里姆林宫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所在地？

麦克阿瑟：我觉得那里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地点。

这位参议员仍在催逼他："如果我们被卷入全面战争，我想要知道你心里是如何计划抵御美国不受战争侵袭的。"将军回答："那恰好不是我的职责，参议员先生。我的职责在太平洋上。"他说，全球军事政策是联席参谋长们的任务。他自问，他是否知道美国有多少颗原子弹？他不知道。那苏联人又有多少颗原子弹？他也不知道。麦克马洪追问："你觉得我们如今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反抗苏联人对西欧发起的进攻？"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先生，我已经好几次试图要求你不要把我扯进任何与我的领域无关的话题了。"他说他"不熟悉"参谋长们对欧洲的研究，"一心扑在世界另一边的问题上"。麦克马洪表示，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联席参谋长和美国总统是站在全球防御的基础上看待这件事情的。按照你自己的说法，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官，你没有进行过此种研究，却又提议推进有可能会把我们卷入全球冲突的做法。"

参议员认为麦克阿瑟不能脚踏两条船。如果他坚持要在国际局势的背景下看待朝鲜问题，并将朝鲜半岛放进一个更大的拼图中，那么他就有义务认清站在奥林匹斯山上观望的后果。他将乔治·马歇尔的中国政策形容为"我们一百年来犯下的最大政治错误"和认为其后果需要我们"用一个世纪来偿还"的说法的确是语出惊人，可除非他准备把自己在亚洲与欧洲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否则就是不能被接受的。马歇尔自身前后矛盾的言辞（他指责麦克阿瑟蓄意破坏美军士气、试图"破坏"政府对亚洲的计划，自己却在麦克阿瑟于华尔道夫酒店安置下来之前不愿飞往东京亲眼看一看朝鲜半岛的局势），在这里也不能证明麦克阿瑟就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当麦克阿瑟提出如下这个问题时，参议员们还是吃惊地保持了沉默："你们打算怎么阻止朝鲜半岛上的杀戮？你们打算任其自生自灭吗？你们保卫美国不受战争侵害的全球计划包不包括任由战火无限期地在太平洋上燃烧？"

深知自己的目标已经受到了损害，杜鲁门私下里称曾于1942年离开科雷希多岛的将军是个"低级的懦夫"。他后来告诉莫尔·米勒："马歇尔口头为我简述裁撤麦克阿瑟的决定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话语。他说他根本就没什么优点，还说他就会虚张声势。这话一点儿也不错。"也许马歇尔的解释是准确的，表达了每一位五星上将心底对另一位五星上将内心深处某些想法的愤怒之情。他们代表了美国人思想中的两大冲突流派。一个放眼大西洋，

另一个专注于太平洋；一个建议审慎行事，另一个则鼓励大胆出击；一个像威灵顿一样相信联合作战，另一个像拿破仑一样认为依靠同盟是危险的（尽管有时必不可少）。“把我的同盟视为敌人。”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我就可以逐一打败他们了。”拉塞尔听证会的一位旁观者将国防部部长比作是“一个忙于试图教育难以驾驭的学生的校长”，而前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则“像极了决心通过吸引人气来说服观众的客座讲师……麦克阿瑟先用炸弹摧毁城墙，而更加狡猾的马歇尔……则用破城槌慢慢戳破城墙”。

政府的证人们花了7个星期的时间反驳麦克阿瑟。这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方面的巨大努力。“遭遇挑战的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艾奇逊说。杜鲁门在第一次公开反击将军的证词时说道：“我们目前正处在针对外交政策的大辩论之中。很多人在看待这场辩论时都以为这是一场政治斗争。然而……在这场辩论中危如累卵的是核战争……此举事关生死。”艾奇逊一度在证词中提到：“如果有什么是重要的，如果有关朝鲜半岛的局势有什么是真实的，那就是避免我们在朝鲜半岛摊牌和不允许对手迫使我们摊牌的压倒性优势的重要性。”这才是“政府全心全意遵循的政策本质”。

对麦克阿瑟来说，有限战争（接受中苏影响力范围边缘旷日持久、犹豫不决的冲突）就像是被限制的怀孕，却也是遏制政策的创造者乔治·凯南的理论基石。凯南将遏制政策定义为“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观点中，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化和作战行动熟练、警觉地运用抵抗力量”。凯南写道：“我们视野的模糊既没有给我们完全乐观的权利，也没有给我们完全悲观的权利……正如灵魂的罪恶本身那样，我们对自己和全人类的希望所肩负的责任在于躲避最后一点急躁，以免在我们用无可争辩的力量压制它们之前就放弃最后的希望”。布莱德雷在做证时附和了凯南的说法，认为朝鲜半岛“只不过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的一次交战、一个阶段”，而不是像麦克阿瑟所见的那样，是东西方竞争的高潮。

还有一次，布莱德雷提到：“我是不会支持一项忽略军事事实和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催促我们一哄而上、一决雌雄的政策的。”参谋长们告诉委员会，这些军事事实遭到了麦克阿瑟的歪曲。他们说，苏联人一直都在西伯利亚发展军需工业，而敌人如今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旅顺港、哈尔滨和库页岛附近拥有了“数千架飞机”。蒋介石的军队被布莱德雷形容为“能力有限，尤其是在进攻行动方面”；布莱德雷还表示，在与中国展开的任何更加广泛的战争中，美军都不得不首当其冲。他认为，在征服整个中国大陆之前，他们是无法做出决定的。与麦克阿瑟的意见相左，他认为这样做会把苏联人也卷入其中。艾奇逊表示：“我不能接受苏联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会行动起来的假设。和我们的政策一样，我不认为苏联人的政策是那样形成的。”他指出，莫斯科和中国方面是通过协议捆绑在一起的：“但即便这一协议并不存在，中国也是苏联最大、最重要的盟

国。苏联人在远东的利己主义及其在共产主义范围内维护自身威望的需要让人很难看出苏联会忽视针对中国大陆发起的直接攻击。”

国务卿指出，美国的联合国盟友们“不愿被卷入远东战争之中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有可能演变成世界大战。尤其是当这场战争是因为美国人失去耐性、无法忍受抵制侵略的努力进程而引发的。”他说，通过同盟合作来封锁大陆是没有机会的。麦克马洪询问马歇尔是否认为这些同盟国对美国的国防来说是必需的。这位国防部部长回答：“我当然是这样认为的，先生。这就是集体安全的原则，也是我们认为唯一能给我们带来和平的原则。”

敬仰麦克阿瑟的官员们一个又一个地坐在了参议员们的面前，令人痛心地抵制着他的求胜计划。谢尔曼说：“当然，就短期来看，时间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他表示，没有同盟合作，封锁将是无效的，并将迎战“大西洋对战太平洋”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西欧……在自我保护的问题上就会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然而如果我们失去了整片亚洲大陆，却仍旧可以幸存下来、实施重建，并有可能把它夺回来。”魏德迈将朝鲜战争视为敌人“用三流的军队和我们一流的军队作战”的过程，而这支一流的军队投入了美国80%的军事力量。霍伊特·范登堡曾经把麦克阿瑟的轰炸计划形容为“轻啄外围”。他解释道，空军可以“摧毁中国的主要城市，但是……在我看来，此举给我国带来的耗损必然导致我们在未来的几年内失去保护”。除此之外，他还说，抛弃同盟国将意味着抛弃美国在欧洲和北非无价的空军基地。麦克阿瑟在五角大楼里最激进的批评者柯林斯认为，将军在感恩节那天调遣军队的行为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而如今再接受他的强硬路线将需要更“可观的”美国军队。想到这一前景，参议员们全都拉长了脸。

面对大量的事实和专家意见，将军的共和党辩护者们除了对党派的忠诚和保守的直觉之外什么也拿不出来。“我早就批准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计划。”塔夫脱4月时表示。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说道：“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按照中国的条件，在其选定的时间与其作战。它将拥有核武器，同时还有整个欧亚大陆的支持。如果华盛顿的那些人能够颇有远见地在亚洲给麦克阿瑟开绿灯……问题的解决本可以永远对我方有利的。”惠里、布里奇斯、诺兰、尼克松、伯克·希肯卢珀、尤金·米利肯、霍默·弗格森、霍默·凯普哈特、埃弗里特·德克森、约翰·马歇尔·巴特勒和亚历山大·威利也都赞同这一看法。（听证会过程中，威利还谦逊地询问麦克阿瑟：“你是否认识哪个美国人在东方问题上能够拥有和你一样的丰富经验？你是否认识其他和你一样在那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或知晓那里人民的不同要素、背景和人生观的人？”将军在回想片刻之后回答，他不认识这样的人。）他们的媒体代理人（赫斯特、麦考密克、卢斯等人）也对他们的看法表示了赞同。比方说，《生活》杂志就对嘲讽了“致命的谬论……与苏联共产党‘共存’的

包庇”。

温斯顿·丘吉尔觉察到国会山上的分歧是出于党派性质的，十分同情美国人对塔夫脱所说的“这场外国纷争”抱有的厌恶之情，劝告欧洲人对“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表示尊敬，放弃对麦克阿瑟引发的骚动发表进一步的评论。不过，他们错过了……那一刻，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的观点仿佛获胜了，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太过高昂。即使在解雇麦克阿瑟以前，政府对所谓“对共产主义手软”的恐惧就在远东问题上束缚住了他。我们现在知道，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跨越三八线、把中国卷入战争是联合国的决定，而不是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杜鲁门和艾奇逊之所以催促成功湖方面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面对“整个共和党右翼的进攻”时是多么脆弱。他们不敢与中国方面妥协，乃至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为了展示他们反共产主义的热诚，他们放饵引诱毛泽东，运送大量军事装备前往台湾，还称赞蒋介石是亚洲的希望，最后甚至鼓励他到大陆东山再起——国务院方面知道，国民党是永远也不会发动进攻的，而且不管怎样都不会获胜。面对谴责，杜鲁门和艾奇逊如此可悲的回应并没有满足共和党的批评，而为麦克阿瑟被解职一事进行辩护的参议员听证会又使政府丧失了手中最有价值的蓝色筹码之一：联席参谋长们公平公正的声誉。艾森豪威尔高高兴兴地告诉C. L. 苏兹贝格，参议员的调查“促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目标：它无疑向苏联人证明了我们并没有侵略意图”。但它也证明了五角大楼方面愿意运用自己的势力来对共和党的批评反唇相讥。在证词被采纳的同时，塔夫脱坦率地表示自己对布莱德雷的军事判断力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李普曼注意到，“在共和国体制下，一件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初现端倪：即武装部队内部民主党和共和党将军的分裂”。他写道，结果“会大大削弱文官统治和总统的外交政策”。

拉塞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极大程度上是胆小懦弱的表现。针对索顿斯托尔的一项提议，委员们（以20票赞同、3票反对）同意将听证会的记录不加评论地“转发”给了参议院全体议员。8位共和党成员提交了一份报告，形容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索顿斯托尔说他不同意麦克阿瑟的观点，但对他遭解雇一事表示失望。亨利·卡伯特·洛奇反对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不过他认为将军应该在美日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留在东京。只有韦恩·莫尔斯对政府处理麦克阿瑟一事的方法表示了赞赏。杜鲁门在华盛顿媒体团的支持者中依旧广受欢迎，因而他们也对莫尔斯的观点表示了赞同。罗维尔和施莱辛格笔下的一段话可能代表了大部分自由记者的心声：“请问麦克阿瑟既没有推翻远东政策，甚至也没有进一步对他已然被玷污的名声落井下石。它毫无疑问展示了局势的多变和混乱，以至于没有离开困境的立足点或明显路径。政府的路径似乎和其他人的一样无助、愚蠢、恶劣，也许还更有意义。”他们推荐“选择性的遏制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似乎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但要求别人为了不确定和困惑的事情去送命是不值得的。意识到这一点，布莱德雷试图针对麦克阿瑟提出的可怕问题想出一个更好的答案。他辩称，美国人在半岛战争中的牺牲并非是无谓的。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在证词中宣称：“朝鲜半岛行动是成功的。”敌人“将联合国军队驱逐出朝鲜半岛”的目标遭到了挫败。美军士兵和他们的盟军“制止了敌人的前行，把它变成了一场撤退……他们的胜利使得敌人遭受了严重挫败”。这些成就也不仅仅是负面的：“他们非但没有削弱世界其他地区，还将他们团结在了一起，赋予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加强大的动力。”五角大楼方面为未来的战争“增加了一倍的备战人员”。最重要的是：“集体安全的理念经受住了考验。相信集体安全的国家表明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他说，如果美国加入另一场类似的战争，他的士兵们将不会孤立无援。

事后，当休战协定在朝鲜半岛上签字生效之后，杜勒斯心满意足地说道：“所有自由的国度，不管是大是小，如今都因集体安全的实施而变得更加安全。”知识分子们也赞同这一观点。罗维尔写道：“在朝鲜半岛上，美国证明了它的诺言和它的盟约是一样的，甚至更好——因为美韩并未订立盟约。历史上，在集体安全到目前为止还是个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情况下，朝鲜半岛将被当作是它的试验场。同时，这里还将令人联想起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转捩点。”不过，把责任推卸给历史是件危险的事情，而大多数观点之中又当属李普曼的异议最为强烈。他不相信美国能在小规模战争中依靠自己的盟国，还怀疑美国人民是否能够忍受只有优先目标的战争。他已经研究过了凯南的遏制政策，并发现了其中的纰漏。凯南在给《外交事务》期刊书写的文章中提到，遏制共产党需要“在他们显示出渗透迹象的每一个点上实施坚定不移的军事打击”。对李普曼来说，这意味着无穷无尽的游击战损失。“欧亚大陆幅员辽阔，”他固执己见地评论道，“而美国的军事力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李普曼推论，在遏制政策下，结果将取决于应征入伍者或卫星部队。两种方法都令人绝望。美国将不得不“和傀儡断绝关系，等同于采取绥靖政策，在失败中丢尽脸面”，或者将不得不通过“在一件非计划中的、意料之外的，并且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事情上”付出不菲的代价来支持他们。他再三回到亚洲及其给怀抱着遏制心态的外交官们布下的圈套这一话题上。李普曼说，允许共产党来选择战场、武器甚至是其军队的国籍，将让我们面临更大的挑战。他无法理解凯南怎么会“推荐这样一个战略暴政”。

1953年7月7日，麦克阿瑟在听说朝鲜停战协定一事时说道：“这是东南亚中南半岛的死亡判决书。”艾尔索普兄弟事后得出结论：“越南危机日益加剧的结果之一就是证明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麦

克阿瑟和他在朝鲜战争中遭遇的人为限制做斗争，自由世界如今就不会在亚洲面临灾难。”不过，亨利·卢斯却不像李普曼、麦克阿瑟和艾尔索普兄弟那样悲观。《生活》杂志在5年后回想起来：“将军遭解职时，朝鲜战争已经不适合美国的大型战略目标或计划了。因此，我们和亚洲共产主义的抗衡是时断时续、投机取巧的，注定要失败。不过，从那时以来，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改进的。”在卢斯看来，东方地图上最明亮的一个点就是西贡。在那里，他说：“我们帮助吴庭艳把南越（越南共和国）带到了实现国家真正独立的门槛上。”

---

1. 麦克阿瑟被召回之后，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丧失了60%的兵力——超过8万人是美军士兵。

2.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原是一首英国军歌，由福音赞美诗《溢美之词永不死》改编而来。

第十一章
葬礼的安息号
1951～1964



麦克阿瑟为参议院提供证词后不久，卡洛斯·罗慕洛在华尔道夫酒店与他共进了一顿早餐。将军询问这位客人对自己被召回所引起的骚动有什么看法。这位小个子的菲律宾人告诉他，他认为将军和杜鲁门各有对错。看到将军挑起了眉毛，罗慕洛解释道："你应该获准跨过鸭绿江。"麦克阿瑟再次点了点头。菲律宾人说："你本可以赢得战争。"又是一次有力的点头。紧接着，罗慕洛说道："但文官执政永远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你藐视总统就是错的。"将军凝视着外面华丽的城市，什么话也没有说。"突然间，"这位菲律宾人回忆道，"我意识到对话已经终结了。他想要的不是事实或逻辑，而是有人来安慰他受伤的自尊心。"

上百万美国人正渴望给予他安慰。整整一年，从他被撤离东京的那个春天，到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在1952年的总统大选中对阵的那个春天，他一个人巡回往返于全国各地，唤醒国人对他看到的美国危机的重视。自从他到达酒店的那一夜起，来自各位市长、州长的邀请函就在他的套房里堆积了起来。起初他同意访问6座城市，之后又变成了11个州；据麦克阿瑟称，在回归欢迎礼结束时，他们总共到访过芝加哥、密尔沃基、波士顿、克利夫兰、底特律、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埃文斯顿、沃思堡市、迈阿密、洛杉矶、小石城、西雅图、诺福克、奥斯汀、那奇兹、兰辛、达拉斯、默夫里斯伯勒、新罕布什尔的曼彻斯特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要是他应下了所有希望见到他的团体的恳求，他永远也停不下来。将军事后说道："美国用不绝于耳的咆哮声认真对待了我。"《时代周刊》评论道，美

国“在充满怀疑和冷嘲热讽的世纪中叶陷入了一种很少被唤起的爱国情感之中”。

那些满心怀疑、愤世嫉俗的人可没有被将军的光芒所迷惑，反倒认为纳税人有权享受他的巡回演出，因为认为为他买账的人是他们自己。这也不完全正确；在将军对拉塞尔的委员会道别的第二天，他把“巴丹”号还给了国防部（“在它飞离我的人生时，我感觉自己失去了某些拥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的东西”），而他大部分的个人开销都是由他的仰慕者们支付的。当他决定自己想要永久居住在华尔道夫塔楼酒店里时（“这里是我们发光发亮的地方，也是我们停留的地方”），酒店以每个月450美元的价格把价值133美元一晚的套房租给了他。石油大亨们包下了一架东部航空公司的专机接他前往得克萨斯。美联航的一位朋友则安排好了他剩下的大部分航班。在他乘车前往马萨诸塞州时，铁路公司方面给了他总统般的待遇——一辆从华尔道夫酒店下的侧线开出的带有豪华私人车厢的特别专列，前面还有一个全速前进的领航火车头，以确保铁轨畅通无阻——波士顿的科普利广场饭店还将自己最精致的531–533–535号套房贡献给了他，以表对他为国家效力的感谢。不过他还在继续从陆军那里领取自己作为五星上将的19 541美元月薪，并占用了一艘海军舰艇将他和副官们重达45吨的家具、43件行李和3辆汽车从东京运到了曼哈顿。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他始终是个以公费为生的人。但和前者不同的是，他会怒骂这个国家，还时常发表爆炸性的政治演讲，同时仍旧穿着自己的军装、佩戴着所有的勋章。没有人能当面告诉他这样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如果有人这么说，他无疑会回答，自己仍旧在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不过许多人都发现这样的景象着实令人困扰。美国人有着尊崇英雄和把他们至于无法想象的高阁上，再把他们打压下来的习惯。麦克阿瑟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他每抨击杜鲁门一次，地位就会下降一点儿。尽管他是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从基座上倾覆下来的，但地位变得东摇西摆的可能性开始初现端倪。

起初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支持他的信众人数简直是史无前例。当100名摩托骑警为其开道，他乘坐一辆红色林肯轿车出现在芝加哥街头时，300万人聚集在了23英里长的游行路线两旁。当晚，在战士体育场，共有5万人在43华氏度（约6摄氏度）的天气里为戏剧性地出现在唯一一束探照灯灯光下的他欢呼喝彩。第二天早上，中西部居民们又聚集在了通往麦克阿瑟位于密尔沃基的维多利亚风格老宅的90英里高速公路旁。在默夫里斯伯勒，前来欢迎他的群众再次达到了5万人。在休斯敦，50万人涌向了警方的警戒线。在酒店大门的对面亮出了一块写有“欢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字样的电子标语的同时，停在酒店网球场上的一门礼炮鸣响了起来。得克萨斯人在棉花碗橄榄球赛、莱斯大学体育馆和沃思堡体育馆中为他欢呼。在波士顿，他的车队在50万人的注视下鱼贯而出，载着他来到聚集了2万人的杜威广场发表演讲。他在西雅图赢得了30万人的掌声，而在迈阿

密为1.4万名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进行的45分钟演讲则被大家的喝彩声打断了49次。他在4个州的立法机构面前做过发言。街道因他而改换了名称。密歇根州的兰辛还将自己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花展献给了他。阿瑟的空军夹克衫和遮檐帽一度在青少年中风行起来，而这个男孩和他那位戴着无檐小便帽、身着简单连衣裙的母亲也给严肃的将军带来了一丝温暖的人性化色调，取悦了支持他的群众，使他们变得更加狂热。

他们想要给予麦克阿瑟一家些什么，赠予他们礼物，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方法来抚慰直率的总统给他带来的伤害。在战士体育场里，当仿造“密苏里”号形状的烟花在夜空中闪烁起来、一支乐队奏响《天佑美国》的乐曲时，琼和阿瑟分别获赠了一枚钻石胸针和一双银冰鞋，而全家人还得到了价值5 000美元的兰花。马奎特大学授予了麦克阿瑟法学博士的学位，而休斯敦则赠送了他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在默夫里斯伯勒，琼在自己生活了34年的东莱特尔街柱式豪宅里收到了一只银盘、一枚胸针、几对耳环以及一枚六角星的金徽章；阿瑟曾受到过曼哈顿斯托克俱乐部名人的招待，还获赠了扬基体育馆和马球球场的包厢座位，这次又得到了一条童子军的饰带、一条颈巾、一座滑梯和一根钓竿。麦克阿瑟曾在默夫里斯伯勒坐过一次汽车后座。（“我是伴随着南部州《迪克西》战歌和耳边反抗的声音长大的。”他说，“爸爸在另一边，但他很理智地向母亲屈服了。”）默夫里斯伯勒宣布星期一为“琼小姐之日”。到处挂满了向她表示敬意的旗布，还有一块巨大的标语这样写道：“欢迎琼、将军和阿瑟·麦克阿瑟。”往昔的回忆让她在那里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而她的丈夫则在圣安东尼奥激动地见到了穿着全套军礼服前来护送他前往阿拉莫的温赖特、克鲁格和考特尼·霍奇斯。

麦克阿瑟总是向众人介绍：“琼是我最出色的士兵。”事实上，这些咫尺天涯的旅程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严酷的考验。想到他们有可能遭蜂拥的人群踩踏，被纽约警察局委派担任外出保镖的卢·沙利文感到忧心忡忡。沙利文认为：“芝加哥比曼哈顿还要糟糕。将军停下来为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时，人群向前涌动起来。麦克阿瑟不得不朝着刚刚启动的汽车跑去。我们真的非常害怕，而后援车又被堵在了人群中，无法追赶上他。”捣乱的人十分罕见，但也并非一个都没有。在洛杉矶，一个男子跟在车边奔跑，手中还举着一个被沙利文微妙地用“有害”这个词来形容的横幅。将军全然不顾第一修正案的规定，开口说道：“沙利，处理掉那个横幅，好吗？”沙利文回忆：“于是，我击倒了那个男子，夺走了他手中的横幅。”琼的体力比丈夫和儿子都要充沛（在他们显然筋疲力尽的时候，她看上去却精神焕发），不过她也有虚脱的时候。问题就在于她曾经的强硬对手：空中旅行。乘坐首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小石城的路上，他们遭遇了一场狂风。尽管飞行员一直在狂风以下的几百英尺高度飞行，机身的震动仍然十分强烈，导致麦克阿瑟一家三口、惠特尼、邦克以及瓦尔布埃诺中士一路上都

在抱着桶呕吐。朝着航站楼滑行时，麦克阿瑟开口吩咐道：“沙利，站在我右边，扶住我的手臂。我会尽力不发抖的。”

“然而刚一落地，”沙利文回忆，“他就变得神采奕奕：接见高官显要、视察仪仗队，告诉女士们：‘战胜西部的不是墨西哥宽边帽，而是太阳帽。’那晚在那奇兹，一匹马拉的双轮单座轻马车把我们带去了舞会。麦克阿瑟一家跳啊，跳啊。”和总统候选人一样，将军会从如同看马戏一样气氛热烈的人群中汲取力量。总有东西能够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比方说芝加哥国家大街上的一场仪式。他在巴丹–科雷希多桥上放下了一个花环，还用菲律宾语向巴丹老兵们道了一句“祝福你们”，或是按照赫伯特·胡佛的话来说，“麦克阿瑟将军可能会说：‘老兵永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凋零’……但他们英勇的作为会在他们死后长存”。麦克阿瑟对待孩子格外精神鼓舞，他下达了一条长期指示，命令他的车队永远都要为他们减速，尽管他也许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一切暴乱会给他文静、敏感的儿子带来什么影响。当人群最终开始散去时，他可能也要权衡一下自己的言论对自己名声的影响。他只听从过一次他妻子的恳求，抵抗住了说教的诱惑。在西雅图奥林匹克酒店的一场晚宴中，他拒绝说话。他说，这是因为琼告诉他，他已经“在西雅图说得够多的了”。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那天下午，他在这座城市里所做的评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话是他对聚集在一起膜拜他在军事和担任总督方面取得的成就而非他的共和党政治主张的观众们所说的。他这样说道：“我们的政治水平已然不幸受到了海外外交谬误和国内草率挥霍目标的损害……随着公共服务的广泛战线上贪污腐败的事实被揭露出来，美国人的心中变得越发焦虑。”他继续说道：“人民有权……拒绝其他政策偷偷摸摸地以不正当的手段强加在我们的身上，消灭在我们过去的公共行政命令中扮演不良角色的影响……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能从最近迷失的政治和经济无能的沼泽中重新站起来。”

胡佛为此而感到欣喜，而塔夫脱也不例外，然而这样的话语出自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却不够得体。这甚至没有准确反映他的政治哲学。他在东京的开明改革以及他经常提到的日本政策应该是“中间偏左”的感觉与这段叙述完全不一致。诚然，和大部分美国保守派人士一样，他总是把政治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被认为等同于美国的过去。但他一生藐视极右分子的种族沙文主义，和他们不同，他鄙弃亚洲殖民政策，且正如他曾在某个场合所说的那样，他坚信这种思想应该被“迄今为止人们未曾感觉到的尊严以及政治自由的自尊”所代替。

他的回归演讲中并没有暗示这一点，以至于让人忘记了这个男人曾经把这么多的自由改革引入了战后的日本。当诺曼·文森特·皮尔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没人能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更加真实地发出美国人的心声”时，他的意

思是，在过去的5届总统选举中，没有哪位和麦克阿瑟一样位高权重的人物能够更有说服力地代表民意调查中被美国选民拒绝的“麦加菲读本主义”说话。不戴帽子地站在阿拉莫民众面前，将军盛赞“一小群宁愿奋战致死也不愿放弃宝贵自由思想的得克萨斯人”。显而易见，他相信这种思想如今也在得到了另一拨由H. L. 亨特和克林特·默奇森带领的得州人赞颂。他敦促取消积极进取的实业家们身上背负的“税务负担”，以免他们变得“愚笨而又迟缓”，而这些负担正是“那些力图把我们转变成社会主义形式和将我们直接引向奴隶制度”的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偶然得知共和党的一条主旨在麦卡锡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最终表达方式，他在密歇根州热情高涨的立法者面前引用了林肯的话：“如果这个国家会被毁灭，那么原因一定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毁灭将是接下来这些“更加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非被捍卫自由的渴望所鼓舞”的美国领导人面临的后果，他们把“资助其他国家的国防作为分享财富的一种方式”。他似乎还差一点儿痛斥了北约：“我们保卫西欧的第一道防线不在易北河，也不在莱茵河——而是在鸭绿江。”任何其他依靠“消极防御”的阵地“在整个历史上都从未赢得过一场战争”。他责备道：“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在抗日胜利之后）失心疯般地解散了对局势至关重要的主要军事力量。我们的军队迅速地彻底被遣散了（他忽略了自己在缩小美国驻日军事力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积攒起来的大量战争物资也被不负责任地匆忙处置和抛弃了。”

他四处发表有益见解，谴责行政部门的极权制度，警示人们，雄心勃勃的五角大楼官员们渴望编造外交政策。可这些观点全都被淹没在了一大堆保守的虔敬话语和粗暴的误述之中。在波士顿，他说自己之所以被解雇有三个原因：他对“台湾与美国安全的战略关系”的警示，他“准备好了随时与敌军指挥官讨论可接受的停火条件”以及他“对某国会议员信息请求”的回复。他告诉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政府曾计划把台湾交给毛泽东，并让中国大陆获得联合国席位，而他于3月24日提出的休战呼吁“无疑因为在朝鲜半岛上追求和平的代价问题而破坏了针对这些问题的秘密计划”。杜鲁门对此已经忍无可忍了。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口口声声称麦克阿瑟是个骗子。将军答复道：“总统可以解雇上百万个爱国人士……如果他不是在含沙射影、试图为过去辩解，那么他本可以宣布美国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允许把台湾交给大陆或让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坚定决心。可他从未给出过如此简单而又可以理解的保证。我猜他也永远不会开口。”

《时代周刊》兴高采烈地写道：“麦克阿瑟的回击背后隐藏着不少的力量。”没错，他发起的回击无疑对选民们后来遗弃政府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否是对将军名望的明智支出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每发表一段类似的演讲，就加强了别人心中对他党徒政客的印象，让人以为他是

在为其他缺乏他这样地位和视野的传教士的右翼信条代言。杜鲁门的反驳是另一回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个男人之间如今已经结下了世仇；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不得不对彼此充满怒火。这是他们共同的战略，两人都无法对自己坚持真我，让对方不受侵犯。然而在大肆抨击总统的同时，将军也攻击了上百万民众信奉的政策，这些民众本是不支持杜鲁门解雇将军的。就在他于西雅图发表演讲时，观众中的几位民间领袖默默地走出了大堂。第二天早上，西雅图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休·米切尔称他是个“煽动政治家”。俄克拉何马的罗伯特·柯尔呼喊道：“麻烦的麦克再次出现！”《纽约邮报》形容他是个“发动肮脏政治战争、不顾一切、蛊惑人心的共和党政客”。在评论麦克阿瑟面向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演讲时，艾森豪威尔告诉C. L. 苏兹贝格，他的这个老上司是个“寻求在风口浪尖上驰骋的机会主义者”。

当然，艾森豪威尔也正准备和他一起投身于这场浪潮，而他之所以可以被原谅是因为他把自己一路送进了白宫。一句机智的法国谚语说道：“成功可以掩盖许多错误。”麦克阿瑟这场激战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实在是失去了太多，得到的却太少。民意调查显示，迈进足以淹没他烟斗和饰带镶缀帽的政治浪潮中，他牺牲掉的是自己大部分的追随者。当巨人队和费城人队在马球球场上的比赛渐近尾声时，乐队演奏起了《老兵永不死》的乐曲，这时，他带着琼与阿瑟穿过内场、走向中外场的出口。就在他们马上要走出出口时，一个带着布朗克斯口音的男子喊叫道：“嘿，麦克！哈里·杜鲁门还好吗？”露天看台上爆发出了一片欢笑和掌声。事后回忆起这件事，杜鲁门说道：“当然了。美国人民总是能够识破一个冒牌货。这有时要花点儿时间，但他们最终总是能够发现一个。还有，关于麦克阿瑟，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世界上存在冒牌货俱乐部这种地方，他应该就是俱乐部的会长。这是他不必参加竞选就能获得的一个职位，他会全票当选。”杜鲁门补充道：“他在我看来是个没有一句实话的家伙。”这对于一个在四大太平洋国度（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都名垂青史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个令人咋舌的评价。但总统并没有愚弄将军，反倒是麦克阿瑟自己欺骗了自己。这是他在自作自受，而忠于自己的杜鲁门只不过是遂了他的心愿而已。

1952年3月22日星期六，麦克阿瑟圆满完成了对抗政府的战役。站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大厦台阶上，他控告说：“政府政策必然会朝着共产主义形态靠近，可怕得仿佛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正在为我们开辟道路似的。”他谴责美国为欧洲提供了大量援助；他说，慈善应该从自己的家门口做起；尽管数十亿美元已经流向了欧洲大陆，他却质疑美国在那里“没有获得一个转而追求自由目标的皈依者或产生新的更加深厚的友

谊”。针对已经进行了8个月的朝鲜战争休战谈话，他说“唯一显著的结果就是为敌人争取了时间”。他预言“我们在朝鲜半岛上的失败……可能意味着最终失去亚洲大陆”。《纽约时报》对此表示了抗议，认为：“他对整个马歇尔计划以及加强西欧防御、拯救希腊和土耳其的做法……的刻薄攻击侵犯了我们本身良好的声望，并且是对公众的伤害。”即便如此，大多数民众（其数量足以左右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却并没有抱持这样的想法。据《纽约时报》驻杰克逊的记者报道，2.5万名在场观众“用掌声和零散的反抗呼号”先后25次打断了他的演讲。麦克阿瑟成了反对这场打不赢的战争的象征。按照艾奇逊尖酸刻薄的措辞来说，人们的热情已经“到达了难以恢复的最低水平”。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杜鲁门宣布自己无法再次出任竞选的候选人。麦克阿瑟在全国范围针对他展开的反抗运动并不是总统做出这一决定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麦克阿瑟感觉他替自己报了仇，完成了选举年的一个目标。

他的第二个目标是抵制共和党对艾森豪威尔的提名。6月10日，不到4个星期之后，麦克阿瑟将在即将召开的共和党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论道：“他作为主旨演说发言人的角色只不过是第一步。他已经准备好了要把军装放到一旁，从陆军退休，尽其所能……打败自己的五星上将同僚。”5月15日时，他曾坦率地告诉密歇根州立法机构，他认为任何一个军人都不应该成为总统。《时代周刊》就此尖刻地评论道：“也许是因为民众想起了他自己曾经参选的意愿，也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麦克阿瑟的攻势并没有因此引起任何大的轰动。伟人当之无愧的桂冠中依偎着一捆微酸的葡萄。”他暗示，将军最喜欢的提名人选是一个在半个世纪以前轻松打败自己父亲的那个人的儿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写道：“公然重击塔夫脱的人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一直在发表演讲、与代表交涉，试图确保参议员的提名……如果塔夫脱得到提名，麦克阿瑟将军将成为最积极的活动家。”

实际情况比这还要复杂。麦克阿瑟的首选仍旧是他自己。就连强烈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时代周刊》都看得出这位前任上司“作为国家最知名的反杜鲁门领袖正站在舞台的中央”。新闻杂志发现：“重返家园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发现麦克阿瑟并没有慢慢凋零。那种感觉与其说是热忱，不如说是不可动摇的尊敬和信心。由于地域上的差异，这种声音大多来自西部和中西部，而东部的势力最弱……发表演讲的共和党人只需要提及将军的名字，或是引用他在朝鲜半岛上的抵抗事迹，观众席上就会爆发一片掌声。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场集会上，一台掌声记录仪记录下的最热烈的掌声爆发于候选人哈罗德·史塔生承诺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召回麦克阿瑟、让他恢复现役时。”希望这位太平洋将军（而非大西洋将军）位列他们候选人名单之首的共和党人以各种名义团结在了一起；得州和加州分别发起了“召唤麦克阿瑟”和“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行动，新罕布什尔州召开了“麦

克阿瑟参选总统”核心会议，宾州组建了“麦克阿瑟战士”委员会。不过，他们的实力都不如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强大。《纽约时报》的一位老练的政治记者认为将军能“打败”新罕布什尔州的“所有14位代表”。结果，该州的大赢家却是艾森豪威尔。8天之后，当艾森豪威尔在明尼苏达州的支持率紧随史塔生屈居第二时，他从巴黎捎来消息，说有人劝他“重新审查”自己的“政治地位”。简而言之，他正在打包行李。他告诉一个记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十分不喜欢麦克阿瑟的政纲和政策”。

在这个时候定义麦克阿瑟与塔夫脱之间的明确关系是不可能的。和大部分大会前的同盟一样，这两个人的结盟是基于利害关系的。一旦其中任何一方遭到大部分代表的疏远，他们对于彼此的感情就会一拍两散。在艾森豪威尔的势力合并之前，塔夫脱和麦克阿瑟曾在将军的华尔道夫宅邸中共进早餐。在场的惠特尼说麦克阿瑟是这样展开对话的：“参议员，我这一生都是共和党人。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不打算积极参加选举，同时，我全力支持你出任共和党候选人。”据惠特尼回忆，塔夫脱答复说，如果他当上总统，就会任命麦克阿瑟出任全军总司令。然而同在现场的沙利文对这一场景的记忆却有所不同。他说：“两人达成的协议是这样的，塔夫脱会在第一次投票表决中试水。如果他感觉自己得到了支持，他就会继续。如果他感觉自己即将失利，便会走上讲台、退出选举，要求他的代表们把票投给麦克阿瑟。”有关这段对话的第三个版本源自塔夫脱死后在他的办公桌上找到的一份用铅笔写就的文件，上面约定：“如果参议员塔夫脱赢得共和党提名，他将在接受提名的过程中宣布自己打算诉诸麦克阿瑟将军的爱国精神、允许他的名字作为他的（塔夫脱的）竞选伙伴出现在提交给大会的文件中。”如果当选，塔夫脱随后还将宣布任命麦克阿瑟为自己的副总司令，与他在“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外交政策”方面共同分担责任。

第一次试水发生在政纲草拟委员会里。杜勒斯提出了一项认可美国对欧承诺的外交政纲。塔夫脱、麦克阿瑟和胡佛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败下阵来。紧接着，7月7日星期一下午3点，前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自回国以来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穿着便装登上了前往芝加哥的美联航航班。4个小时之后，他走上讲台，发表了主旨演说。这也许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场演说——内容陈腐刺耳，措辞拙劣不堪，使他错失了成为一匹黑马的机会。每当他提到上帝（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在了他的演说中），他的声音都会不安地提高八度，然后破音。此外，他还养成了上下跳动的古怪习惯，还会用右手食指指向天花板以示强调。演说进行到一半时，代表们开始大声地喋喋不休起来，以至于大家几乎听不到他讲话的声音。C. L. 苏兹贝格写道：“他的话里除了不折不扣的无稽之谈之外什么也没有。人们能够感觉热情已经逐渐离开了这个房间。我认为他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还没能帮上塔夫脱什么忙。”

在畜牧场客栈与党派领袖们协商之后，将军飞回家等待大会的裁定。因为演说引起糟糕的反响而心灰意冷的他吩咐华尔道夫的接线员不要把电话转到自己的套房里来。显然，塔夫脱在试图和他取得联系。星期二的关键演习对象是中立的宾州代表团。晚上10点，身在纽约的布莱克接到了塔夫脱身边一位重要副官维克多·伊曼努尔打来的电话。伊曼努尔说，鉴于霍华德·皮尤不肯把“拱石心之州”（宾州）的代表丢给塔夫脱，塔夫脱已经对自己放弃了希望。不过，皮尤倒是愿意支持麦克阿瑟，而他也认为让麦克阿瑟参选是阻止艾森豪威尔的唯一方法。在宾州代表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他的支持，麦克阿瑟也许可以成功。布莱克被要求在凌晨2点之前随时待命，准备前往华尔道夫酒店告诉将军立刻给塔夫脱回电话。布莱克回忆：“维克多的电话永远也没有打来，艾森豪威尔的代表们战胜了共和党中最保守的一群人，而我也没有接到命令去通知他局势突然发生了对他有利的转变。”据另一个无法证实的版本描述，参议员通过酒店的私人线路接通了将军的电话。如果这是真的，塔夫脱曾要求麦克阿瑟返回芝加哥，颇具戏剧性地重返讲台，催促代表们通过口头表决的方式选择塔夫脱。也许这个电话真的被打通了，但仍旧健在的大会参与者衰竭而又模糊的记忆通常是不可靠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畜牧场客栈的混乱局势中，麦克阿瑟成为总统的最后机会已经消失了。据沙利文回忆，他“深感失望”。

但他并没有放弃解决朝鲜半岛难题的希望。选举过去4周之后，他在一群实业家面前发表演讲时提到：“众所周知，尽管我自己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被采纳过，但我还是相信朝鲜半岛冲突会有清晰而明确的解决办法。”他说（他不能在此泄露这一办法）：“我认为，目前的解决办法所包括的基本决定不适宜公开透露或讨论，但在我看来，这一方法实施起来既不会给友军带来过度伤亡的惨痛代价，也不会增加刺激国际冲突的危险性。”两天之后，他收到了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乘坐美国军舰“海伦娜”号从朝鲜半岛启程回国途中发来的电报。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位芝加哥的竞选对手很有雅量：“我十分期待和你进行一次正式会晤，让我和我的同僚能够从你的思想和经验中全面获益。”麦克阿瑟在回信中写道：“你知道的，不用说，我的职责永远而且完全是供我们的国家调遣的。”这段对话看似是个好兆头，但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一样是个谨慎的领袖，可麦克阿瑟的计划中就唯有冒险了。

12月17日，公园大道尽头，在杜勒斯家位于曼哈顿第91街东段的狭小4层住宅中，将军、刚刚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吃午饭。麦克阿瑟递给艾森豪威尔一份包含了14点建议的备忘录，要求他在就职仪式之后立即召开首脑会议，给斯大林下达最后通牒，提议统一朝鲜半岛和德国，下令外国军队撤出上述两国和日本，由美苏两国签订协议保证朝鲜、德国和日本的中立性，并引入美苏宪章“规定战争不属于合法的国家政策手段”。如果斯大林推诿，我们将在朝鲜投掷

原子弹，使中国“发动现代战争的能力”在轰炸中化为乌有。将军承认这些步骤有些激烈，但“美国公众舆论显然不会无限期地支持眼下的这种犹豫和怠惰”。

在艾森豪威尔研读备忘录时，麦克阿瑟为未来的国务卿进行了概括总结，并询问他的看法。杜勒斯模棱两可地发表了赞同的意见，却提到：“我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先巩固自己的总统地位，再试图实施如此雄心勃勃、错综复杂的计划。这可能要花上他一年的时间。毕竟共和党上一次执政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麦克阿瑟马上答复说，艾森豪威尔在就职那天将“登上自己权力与地位的巅峰”。他强有力地辩称：“时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从逻辑上来讲，总统也应该在其占据世界知名度高峰的时刻摊牌。然而，延迟这一行动相当于在暗示苏联人加速军备竞赛，最终导致我们优势尽失。”他转向艾森豪威尔，开口说道：“现今苏联人对你的尊重足以让他们在强有力的行动面前投降。如果你等下去，他们就不再会把你当作世界意见领袖那样来遵从。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叫你‘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并以平等的姿态和你交谈了。从今往后，你就会成为‘总统先生’。所以我现在要说，你可能有机会成为世界上自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男人，因为只有你能对世界起决定性的影响。我恳求你采取主动而大胆的行动。”他拿起备忘录，把它折好，塞进了艾森豪威尔的前胸口袋里，然后用手拍了拍那里，温柔地说：“上帝保佑你。”

门外，一小群人和狗正在等待着他们：记者、路人，还有这附近里特有的保姆和贵宾犬。总统用一只手臂挽住了麦克阿瑟的手臂，开口说道：“我们就和平的话题进行了一段很好的对话，不仅事关朝鲜半岛，而且关系到世界大局。”麦克阿瑟则是这样形容艾森豪威尔的：“我已经6年没有见到他了。这是一段35年的老交情和同志友谊的重新开始。”这就是他对此所能说得最多的了。尽管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联系密切，却很难理解彼此。他们一个代表了伟大戏剧的诗意，另一个则代表了更加透彻的理性散文。事情到此结束。杜鲁门吩咐奥马尔·布莱德雷致信华尔道夫酒店方面，要求将军提供和平计划的细节。麦克阿瑟冷漠地答复道，他已经把计划交给了刚刚当选的总统，不过他“当然乐意就此事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讨论”。12月29日，布莱德雷用4句简明扼要的话对他表示了感谢，祝愿他“度过一个快乐而又顺利的新年”。白宫和五角大楼方面都没有就此话题再找过将军。他的建议和往常一样不受新政府的欢迎。和艾奇逊相似，杜勒斯是有限战争的信徒。大家感觉年迈的将军已经成了让两党领袖倍感难堪、心生厌烦的人物，提醒着他们大国之间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不可调和的分歧的勇武历史如今已经永远地逝去了。

即将卸任的这一届政府在其执政的倒数第二年对麦克阿瑟发起了不可原谅

的最后一击。来自51个国家的外交官受邀参加了于旧金山举办的日本和平协议签字仪式，但这位为战后日本地位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男人却被忽略了。将军冷冰冰地说：“也许有些人就是忘了要去记住。”但他并没有被遗忘。伯纳德·巴鲁克就曾催促艾奇逊给将军发请柬。艾奇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解释道：“规则没有规定我这么做，我也不打算这么做。”包含H. V.卡滕伯恩在内，不少时事评论员都对这一过失表示严厉指责。美国代表团的高级顾问西博尔德也不例外。雾谷方面倒是无动于衷。吉田茂给华尔道夫酒店方面发来消息，希望能够飞到东岸向将军致敬，可国务院却劝他此举是“不合时宜的”。

克拉克·李称这一做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小气怠慢”，而且是“定会给整个远东带来影响的愚蠢宣传错误”。然而，它却并没有削减日本人对这位前任最高统帅的忠诚。吉田写信给他：“怀着眷念而又感恩的心情，我珍惜我们之间亲密联系的那些回忆——你作为盟军的最高统帅，我作为你麾下的执行官。你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宽容，让我能够倾尽全力履行我的职责，从而为新日本的崛起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他说，将军将会很高兴“亲眼看到划时代的改革在日本的土地上生根”。协议签署3年之后，吉田曾致电37A套房。又一年过去了，他的外务大臣在投降仪式10周年纪念之际登上“密苏里”号来到了纽约。想起自己作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时曾否决惩处天皇的计划，麦克阿瑟说他反对对所有“所谓的战犯”进行审判，忘记了自己处决山下和本间的所作所为。日本将外国非国家元首所能获得的最高勋章颁给了他——旭日桐花大绶章，并将裕仁亲自签署的一份卷轴送给了他。将军说，在他的记忆中“历史上没有哪个参与过近代战争的大国曾如此厚待昔日的敌军指挥官”。

当将军保持心中的那份傲慢时，他的判断力就不至于那么的昏乱。放松的他似乎一度老练起来，和那个解除他职务的男人有些相似。曼哈顿另一位退休将军举办的男性晚宴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宾客冒失地开口询问他对杜鲁门的看法。据沙利文回忆，麦克阿瑟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个小浑蛋竟然有胆量开除我，我喜欢他。”在另一个场合中，他还曾经称这位前总统是个“拥有无畏勇气的男人”，而在第三个场合中，他咯咯地笑着说：“从他对付我的方式来看，他应该能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后卫。”不过这都是杜鲁门的回忆录问世之前的事情了。听闻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暗示将军应该为1950年6月韩国军队缺乏准备的事情负责，并指责他不服从命令，麦克阿瑟怒发冲冠。他指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前政策“是由华盛顿方面发起的”。但最让他感到怨恨的是杜鲁门“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被提及的军官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的情况下于事后断言他不服从上级命令”，激发了他最糟糕的一面。他指控所有为他的解职提供过推动力的人（马歇尔、哈里曼、艾奇逊、布莱德雷）“私下里都对我有敌意”。就布莱德雷来说，这一说法实在是难以成立，因为两人实际上并不相识。将军解

释说，自己“因为他曾在阿登战役中担任地面指挥官”，对他颇有微词，批评此役“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和从澳大利亚到东京的整个西南太平洋战役中损失的人数不相上下”，而布莱德雷是知道这个指责的。(注)

和马球球场上的群众一样，批评将军的人们都笑了。将军从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他们。准确地说，正如他当时所说的那样，“没有哪个勤杂工、打杂女佣或任何种类的仆人会被人如此无情而又缺乏体面地辞退”。不过，他的表达方法并不正确，且这样的话也应该出自别人之口才对。他并不缺乏志愿者，身后总是站着众多颇具说服力的辩护者。杜鲁门在向卡洛斯·罗慕洛展示自己于独立城建造的总统图书馆时，指着将军的一张照片说道：“好了，你知道那是谁，那是上帝。”罗慕洛心平气和地回答：“总统先生，上百万菲律宾人都是这样看待他的。”被对方的话揶揄住了的杜鲁门说道：“另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对一位美国同胞抱有这样看法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后来，麦克阿瑟也恢复了自己的判断力。一天下午，公园大道上的一个陌生人在街上拦住了他，说道：“杜鲁门先生，你的照片照得不太像你。”将军告诉琼：“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他坚称：“自由自在的私生活让人精神振奋、心情愉悦……我充分享受摆脱了国家高级指挥官艰巨责任后的放松。”有人可能不太相信他的话。麦克阿瑟是个不安的平民，厌恶美国战后的平等主义感情。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认为他有可能挑战商业世界，如今他终于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经历了1952年的政治失利之后，他终于同意成为雷明顿·兰德公司（后来改名为斯佩里·兰德）的董事会主席。他的月薪从45 533美元跃升至68 000美元。穿着定制的文雅套装，他每周都会乘坐豪华轿车前往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办公室两三趟。出于税收原因，那里成了他的法定住所。董事会召开的地点就是他家75英尺长的客厅。他和任何平民百姓一样不会受到粗暴冲突举止的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面对他在陆军中饶恕过的一种害虫：起哄的人。

对质发生在兰德公司于布法罗举办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如今已成为兰德公司3 800股股份持有者的路易斯·D. 吉尔伯特曾是“二战”时期美军驻西南太平洋的一位下士。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表达了自己对于董事会主席手中未持有公司任何一点儿股份这一事实的“严重关切”。麦克阿瑟火冒三丈：“你能不能坐下？”吉尔伯特坐下了，可对他深表同情的观众们却骚动起来。将军的回答值得称赞：“我能够出得起的这笔钱已经被我投入了国防债券中，用于帮助我们深爱的祖国。”骚动还在继续。意识到自己不能在这里发号施令，麦克阿瑟无力地说了一句：“民主实际上就是不能在所有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在第二年的年度会议上，这位曾经的下士满意地发现麦克阿瑟如今持有800股的兰德公司股份。将军接受了“这位太平洋上的老兵战友”的祝贺，却说道：“我之所以买

下这些股份，是因为它们是市面上最划算的，而不是因为你去年的那番言论。”实际上，每股的价格从15点跃升至21点，使得他的1.2万美元投资获得了4 800美元的账面利润。但这件窘困之事让他倍感耻辱。自从1918年的潘兴将军以来，没有人因为如此鸡毛蒜皮的小事斥责过他。

他在兰德公司的主要职责就是宣布股息和在全国制造商协会之类的宴会上讲话，说些协会听众们喜闻乐见的内容——抨击所得税、高涨的联邦预算和“一小部分”试图利用“极权主义等形式的规则、以老大哥的地位来替我们掌握我们的生活”。他不出所料地提到“紧要关头的根本终极问题在于自由本身……在最低的限制下生活的自由！自由企业制度或整合的崇拜者！结果将决定文明的未来，对每个人的生活有所触动，蚀刻在天空中每一道彩虹耀眼的颜色上。”不过他并不总是如此的沉闷。和政治图谱另一端的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他预见到“贫穷第一次面临着被消灭的可能性”。1957年，令罗杰·鲍德温等信奉自由和平主义的人感到高兴的是，他猛烈抨击了五角大楼方面可观的预算。“我们的政府使我们被困在永恒的恐惧状态之中（让我们持续停留在爱国热情的洪流中），伴随着国家陷入紧急状态的呼喊。”他说，“某些可怕的恶魔一直存在……如果我们没能为其提供所需的过度资金盲目地支持他们的话，他们就会狼吞虎咽地把我们吞噬。然而，回顾往事，这些灾难似乎永远都没有发生过，也似乎永远都不太真实。”《国家》杂志评论道：“仅此一次，我们喜欢上了他雄辩的口才——希望他能够回归。”

这些年中，李奇微、加文和马克斯韦尔·泰勒逐渐发展出了小冲突中的灵活反应基本原理，并在麦克阿瑟去世后将这一理论在东南亚进行了测试。这并没有打动将军。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绝对主义者，将军依旧坚持结束战争的唯一一种人道方式便是全力以赴的努力。艾森豪威尔当政的第二年，在接受霍华德报系的吉姆·G. 卢卡斯和赫斯特集团的鲍勃·康西丁的不公开采访时，将军说自己若是能够放开手脚，十天之内就能终结朝鲜战争。“浇灭敌人的气焰首要方式就是”用原子弹轰炸中国东北的空军基地。接下来，他会派遣“蒋介石的50万军队”包围敌军，“辅以两支美国海军陆战队”，从中国的战线后方登陆。这些军队将在“朝鲜半岛北部边境形成一道由人力和火力组成的壁垒……紧接着，遍布三八线沿线的第8军团就可以从南边对敌人施加压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队“可以从北边向下紧逼”。他说，饥肠辘辘的中朝两国人一个多星期之后就会出面求和了。将带有辐射性的钴元素散布在日本海至黄海一带，他“至少可以在60年内”防止敌人再次从北边对朝鲜半岛发起陆地侵略战争。

然而，一年之后，随着将军对战争的厌恶感变得越发强烈，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判断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拒绝他向斯大林发出最后通牒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原子弹永远都不该被使用。在自己75岁生日之际，他

陪同妻子登上了美联航飞往洛杉矶的709次航班，并打算在加州的一系列公开活动中表达这样的心声。一个记者评论道：“他著名的大步幅变成了谨慎的步伐，双手看上去很透明，皮肤看上去像羊皮纸一样，可后背却像在西点军校里时一样挺拔，举手投足间威风凛凛。”有人叮嘱空姐不必告诉他系紧座位上的安全带（他从不系安全带）——即便琼在他们穿过罕见的湍流时总是忧心忡忡。飞机降落在了一片浓厚的大雾中，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位护旗卫兵大踏步地走进了围墙。鉴于他几乎无法透过浓雾看到任何东西，将军为好莱坞献上了他最夸张也是最不合时宜的颂词之一：“除了你们的摄影棚那无与伦比的画面，这里没有消失的地平线。”不过浓雾散去之后，这趟旅程展现出了更加美好的一面。他参加了麦克阿瑟公园的贡献仪式，里面竖立着他的塑像和仿造他于1942～1945年夺取的岛屿制造的一汪倒影池。他在一场午宴上对某圣公会教区表示：“尽管我没有接受过教会思维的培养，也不熟悉神学知识，在日本的成就没有一项能比我高尚的管理者身份更能带给我个人满足感。尽管我崇拜恺撒，但我的确试图把上帝赐予的东西回报给他。”后来，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当晚于大使酒店的宴会上讲话时，他又提出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应该被宣布为不合法的。

他尊崇爱国精神：“上百万用信仰和勇气修筑不朽之路、把我们的祖国塑造成真正伟大的国家的人们，让我更加敬畏我们国旗上的五角星，而不是我自己肩上的星章。”然而，呼吁武器装备的话题都是老生常谈了。“我在世纪之交加入陆军时的目标是拿起步枪、刺刀或利剑，一刀一枪结束一个敌人的生命。后来，机关枪被设计成了一次能消灭十几个敌人的武器。再后来——重型火炮爆发出的弹雨能让几百人毙命。还有能够伤害上千人的空袭炸弹和消灭上万人的原子弹。如今，电子工程和其他科学进程又将破坏潜力提高到了上百万人。在黑暗的试验室中，我们用永不满足的双手疯狂地寻找着能将所有人一举摧毁的途径。”这一“科学歼灭方法的胜利恰好摧毁了战争作为国际差异实用解决媒介的可能性”。对于双方来说，战争都变成了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它不再是获得国际势力和财富（优势地位）的捷径所凭借的冒险武器。如果你输了，就会被歼灭。如果你赢了，也只能失去。决战双方再也没有机会成为赢家——它所拥有的只是双双自杀的根源。”废除战争是“双方都可以赞同的一件事，因为只有在这件事上（唯一一件决定性的事情），双方的利益才是完全平行的。一旦解决了这件事情，其他的问题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回忆道，这样一条规定被写入日本宪法之后，币原喜重郎曾告诉他：“世界会嘲笑我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但一百年之后，我们会被称为先知。”

仅此一次，美国自由派媒体在对待麦克阿瑟时表现出了慷慨的气度。《纽约先驱论坛报》相信他的“形象似乎从未如此伟大过”。《纽约客》认为“这番演讲展现了一位战士杰出的看法、一位诗人的梦想以及一位爱国者的建

议”。《记者报》评论道：“这个男人身上离奇的矛盾性与他的伟大相映生辉，真实可信。”将军从中受到了激励，开始频繁地提及“老资格的政治家”。据一位朋友回忆：“尽管参照并非直接与他有关，却显然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邀请他到白宫享用午餐，林登·约翰逊也来拜访他。他最不喜欢和艾森豪威尔见面，因为这位主人对他的建议并不感兴趣，因而麦克阿瑟离开时看上去既憔悴又阴沉；他能告诉记者的只有：“责任是权威的一部分，而我已经不再处于权威的地位了。”在埃弗里特·德克森的支持下，乔·马丁提出让麦克阿瑟荣升六星上将的议案也许影响了总统对他的看法，因为这将使他比艾森豪威尔多一个星级。虽然这项议案被搁置了下来，却不失为一项好的政治策略；老兵就此重新找回了自己非凡的名声。罗杰·鲍德温视他为“国家丰碑”。在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鼓励下，哥伦比亚大学宣布授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历史学教授职位。伦敦方面，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他正在莱诺克斯山医院接受前列腺问题矫正手术，并评论道：“该手术占据了欧洲（尤其是英国）有关美国方面新闻的主要版面。在写过回忆录的陆军元帅都倾向于大肆批判‘二战’美国指挥官的英国，麦克阿瑟将军却被视为受到高度推崇的、无可争议的人物。”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欧洲的指挥决策遭到战后批评家们抨击时，这里的军人却毫无保留地对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和朝鲜战争中的行动表示了赞许。

约翰·肯尼迪敬仰麦克阿瑟，并且可能比任何一任总统都更能理解他。他是肯尼迪心中的那一类英雄：英勇、爱国、对自己的男子气概颇为自豪、热爱荣誉。和艾森豪威尔不同，他的这位继任者会征求将军的意见。上任后的第4个月，年轻的总统肯尼迪飞往纽约和他进行了商谈。据西奥多·C. 索伦森回忆：“1961年4月的一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会见了总统，告诫总统不要让美国士兵在亚洲大陆献身。总统从没有忘记过这一建议。”小阿瑟·M. 施莱辛格写道：“麦克阿瑟表达了自己的老观点，认为每一个意图将美国地面部队投身于（亚洲）大陆的人都应该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事后，肯尼迪告诉沃尔特·W. 罗斯托，他决定不冒险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前往中南半岛——在冲绳整装待发的1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可以解除战备状态了。

几星期之后，这位老兵和年轻的总统之间又发生了一段令人愉快的际遇。时任菲律宾驻华盛顿全权公使的卡洛斯·罗慕洛在拜访皮埃尔·塞林杰时提到，如今正在庆祝独立5周年纪念的菲律宾政府想要邀请将军和琼作为嘉宾参加国宴。塞林杰将罗慕洛引进了总统办公室。总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答应为麦克阿瑟安排一架总统专机，并表示希望在他返回时和他见上一面。尽管已经81岁高龄，身体虚弱的将军身形却仍旧挺拔，中途还在东

京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短暂停留，然后于克拉克机场降落，开始了被他形容为“多愁善感”的一段旅程。穿着褪色的卡其服、戴着磨损的帽子，他在迈出波音707飞机的那一刻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他颤抖着举起一只手向人群敬礼，告诉他们自己能够“返回这片对他来说了若指掌的土地和身处让他深爱的人群之中”是多么的感动。他说：“我的人生中有将近60年的时间都和你们紧紧交织在一起。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最光辉的时刻，创造了自己最美好的回忆。”

乐队突然奏响了《老兵永不死》的乐曲声。一辆缓慢的凯迪拉克轿车载着麦克阿瑟一家在马尼拉穿过了200万欢呼的人群。那一天是国庆节；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来索要老将军的签名。“真是让人无法抗拒。”他在到达马拉卡南宫时喘着气说道。门外的人群高唱着圣歌，拿督博朗将1900年阿瑟·麦克阿瑟将军赠予他的军刀又赠送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讲话时，麦克阿瑟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到访那里时：“炮火的轰隆声震得窗棂直响，步枪的噼啪声淹没了人语声，我们的鼻孔里充满了烟雾的辛辣味道，到处都飘荡着死亡的恶臭。”不过，《生活》杂志的卡尔·迈登斯怀疑：“还有谁会认为短冲锋枪和火箭炮是‘步枪’呢？”

在林加延，将军轻轻用手抚摸着一块纪念他于16年前在此登陆的饰板，开口告诉琼：“这就是我想让你看到的。”7月4日，在马尼拉市中心拥挤的黎刹公园，麦克阿瑟对人群发表了一番演讲。所有人都知道，这将是将军留给他们的最后一段话：“正如我向你们致敬一样，我不得不向你们道别。因为这就是我此行的本意……我必须怀着感伤的心情承认，不断加深的人生阴影对我再次宣誓‘我会回来’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所以说，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要以一段满怀热情的祷告词作为结语，祈祷仁慈的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人，并且永远为这片土地带来和平和宁静。”在重建后的马尼拉酒店中，在午宴进入尾声时人群中即兴爆发出了《让我叫你甜心》的歌声。歌声平息下来之后，将军转身吻了琼。一个菲律宾人告诉迈登斯：“麦克阿瑟将军只会在家人面前亲吻自己的妻子。我们就是他的家人。”和当年一样，将军被深深感动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脸上满是泪痕），他发现，政府在战后宣誓，永远也不允许菲律宾共和国的士兵忘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名字。每天点名时，都会有一位军士在喊出他的名字之际应声答道：“精神不朽！”

7月20日，肯尼迪在华盛顿接见了将军，询问他此次旅行的经历，并就远东问题征求了他的看法。事后，麦克阿瑟告诉媒体，他和总统“探讨了世界局势，并追忆了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友谊”。将军眨了眨眼睛补充道：“肯尼迪是一位勇敢、机智的年轻海军军官。从他为我准备的午宴判断，他眼下的生活似乎更加奢华。”财政部部长以总统的这位座上客的名义铸造了

一枚金质奖章，上面刻着这样的字样："澳大利亚的保卫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半岛的守护者。"

第二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麦克阿瑟表示了感激。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将军从议长约翰·W. 麦科马克的手中接过这份决议，开口说道："一位将军麾下军队的好坏反映了将军的面貌。我的军队就是伟大的！"他再一次受邀到访白宫，就东南亚局势提供了自己的建议。杜鲁门催促美军逐步扩大越战战事。将军对此表示反对。他说他认为美国应该"坚守外围"，但要避免投身于亚洲大陆。据布莱克回忆，将军向他坦言自己"建议肯尼迪（正如他后来躺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病榻上奄奄一息之际徒劳地劝谏约翰逊总统时那样），没有哪个美军士兵应该被迫留在亚洲的土地上作战。他说他相信，用不了多久，许多美国人可能就不再愿意为他们的国家而战了"。

当年晚些时候，应罗伯特·肯尼迪的要求，麦克阿瑟解决了两个运动协会之间就1964年奥运会参赛问题产生的纠纷，但那是他的最后一项任务了。他知道自己如今正走向人生的尽头，于是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将葬礼和存放身后文书的地点都选在了母亲的家乡诺福克。在西点军校，他做了最后也是最令人难忘的道别。面向一群军校学员发表演讲，他将军校的校训融入了自己的讲稿之中："责任，荣誉，国家。"有趣的是，他提醒他们永远不要就"有争议的问题"质疑自己的政府领导人："这些国家大问题不是你们的专业，也不是用军事途径所能解决的。"紧接着，他来回跨着大步脱稿讲了一段结束语，让当天正午站在"大平原"上的军校人永生难忘："我已步入日落后的黑暗。黄昏已至。我的晚年生活接近尾声，声音与色彩已然暗淡。它们随着往事的梦境渐渐消逝。它们的回忆是倾国倾城的，既有泪水的滋润，也有昨日微笑的抚慰。我用渴望的耳朵无力地倾听着迷人的起床号微弱的旋律和遥远的战鼓急迫的敲击声。我再度听到了枪炮的隆隆声，步枪的轰鸣声和战场上陌生而又悲哀的低语声。可是在梦境的黄昏里，我总是能够回到西点军校。我的耳边一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为你们点名。但我要你们知道，在我死去时，内心残存的最后一丝清醒的念头将会是这支部队——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我向你们道别。"

当然，他这番讲话并非是毫无准备的。没有人能够在即兴演讲中说出如此辞藻华丽的豪言壮语。满怀敬畏之心的军校学员以为他是当着他们的面在讲台上遣词造句，不料目睹的其实是这位总是实现完稿、锤炼、润色和记忆自己台词的完美演员最后的演出。卢·沙利文回忆，他像一只徘徊不去的鹰一样在自己的10居室公寓中踱着步，一边彩排一边嘬着玉米烟斗，脚上的拖鞋拍打着地毯，身后还拖着单薄的长袍。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画面

远比最终的演出更加惊人。一位东方人男管家举着水杯站在一旁，而跨着大步的将军周围全都是能够唤起远东回忆的东西：画作、花瓶、瓮缸和日本人送的其他礼物。阔别39年之后与将军在公寓重聚的威廉·A·加诺回忆道："身处一片流光溢彩之中，我感觉自己仿佛迈进了一座宫殿。"

除了昔日的将官们会在麦克阿瑟生日当天聚集起来向他致敬之外，其他人很少能够见到他。和他在华尔道夫酒店比邻而居的胡佛和詹姆斯·A. 法利总是很受他的欢迎；布莱克会带来一些新戏的一览表；西点军校的校长詹姆斯·B. 兰珀特还会护送大四学生代表团前来拜会他，向将军保证军校并没有改变，并听取他对他们未来军旅生涯的预言。不过，在复杂的安全防范的保护下，陌生人是不得进入宅邸的。除非他们出示证明，否则电梯操作员是不会带他们上升至35层的。沙利文会在楼上接见那些持有证明的人，为期30个月的保镖任期结束后，他被调往了别处，由酒店的保安接管了这一任务。除非接线员知道来电者的姓名，否则谁也无法打通套房的电话。即使在那时，琼也要接听所有的来电，在确定将军想要和对方说话时才把话筒递到他的手中。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沙利文每个星期都会来探望他一两次，还经常和将军与琼一起共度夜晚，看看电视。起初，这位保镖以为麦克阿瑟是个冷漠而又严厉的人，后来才发现这话根本就言不尽意；他认为，能够成为麦克阿瑟朋友的人都会得到他的珍重。和大家一起观看电视棒球比赛时（将军总是会在球员到达本垒板之前背出他的安打率），这个老兵会不时地用手盖住沙利文的手，和蔼地问道："你还好吗，沙利（沙利文）？"他送了几个烟斗和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给这位保镖，还向他展示了自己无论何时离开公寓都会带在身上的大口径短筒手枪；和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的艾森豪威尔一样，麦克阿瑟从不会赤手空拳地冒险进入曼哈顿。一次，沙利文透露自己计划参加兰德尔斯岛的一场田径运动会。麦克阿瑟为他鼓起加油，还在结尾时告诉他："除非你赢了，否则别回来见我。"这位倍受鼓舞的保镖打破了掷链球的纪录，且尽管他是在场年纪最大的参赛选手，他还是被投票选为了运动会上最杰出的运动员。他回忆道："我想将军能说服任何人做任何事。"

麦克阿瑟和他的妻子都没有想过要在纽约的一家酒店里结束自己的一生。在东京期间，她就梦想着要在南方的一座小白房子里安度晚年，而他心中后来设想的那座房子也拥有同样的颜色，只不过要更大一些。（"我本应住在这里。"他依依不舍地告诉肯尼迪。）但华尔道夫酒店位于城市枢纽，距离圣巴多罗买新教圣公会（琼和阿瑟加入了那里的教会）以及教堂街90号的第1集团军总部都很近。后者还为将军腾出了一套4居室的转角套房，供将军每天早上阅读电报。第五大道的精品店距离华尔道夫酒店也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琼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无数服装和珠宝：同色的珍

珠、能够包裹住头部的帽子（她对任何大尺寸的东西都没有抵抗力）还有难得符合她尺寸（5.5码）的黑色舞鞋。黑色已经成了她最喜欢的颜色，可如今，为了跟上20世纪中叶的淡色系潮流，她又为自己添置了灰色、白色和粉紫色的连衣裙。她的丈夫也成了一个对衣着十分讲究的人。戴着儒雅的小礼帽、穿着人字呢的套装，他总是会到访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的男装部。经理欣喜若狂地表示："与我们合作的是怎样一位人物啊！太美妙了！简直是一个裁缝的梦想！"

他在萨克斯购买的服装之一是一件晚礼服，因为百老汇的剧院是麦克阿瑟在这里安顿下来的动机之一。他们看了《俄克拉何马！》《好莱坞冰上滑稽剧》以及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竞技表演；埃塞尔·默尔曼和朱迪·嘉兰曾在后台招待过他们；当他们厌倦了戏剧和音乐喜剧时，还可以去参加音乐会、演讲、纽约市立芭蕾舞团的演出，当然还有无线电城音乐厅里的电影可供他们选择。他们最喜欢的明星是约翰·韦恩和沃德·邦德。无论在任何时候，麦克阿瑟都不曾错过一场比赛，在洋基体育馆、马球球场和埃贝茨球场，他总是坐在场馆所有者的包厢里。不管他的球队落后多少，这位一脸专注、身体虚弱的老人总是不到最后绝不离场，即便是困难重重也要呼唤球员东山再起。很快，他就和许多球员建立了私交。他最崇拜、也最喜欢的球员是杰基·罗宾森。

阿秋在麦克阿瑟一家外出时从不会伴随他们左右。她在套房里拥有一个房间，开始隐居在那里。阿瑟已经不再需要她了；他会去上学、参加钢琴课或是和沙利以及他的儿子鲍比一起去参观自由女神像——在他学着去了解和深爱到底的祖国漫游。和将军一样，琼也想当然地认为他要进西点军校。就在他们于华尔道夫酒店安顿好之后不久，他们就带着儿子沿着哈德孙河北上。他看了一场阅兵，还试了一顶带有羽毛装饰平顶筒状的有檐军帽。那顶帽子当时并不适合他，不料他永远也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军帽，因为他根本就不打算走上军旅生涯。相反，他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61年毕业。老兵告诉邦克，他之所以赞许儿子的选择是因为："我母亲给我施加的压力太大。成为第一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作为麦克阿瑟家族的一员显然已经令人无法承受；父亲死后，阿瑟搬去了曼哈顿的另一边，改了一个假名。从此，他的身份被隐藏了起来，依靠音乐为生，逃离了父亲执拗的爱。

"只有放弃了理想的人才会变老。"麦克阿瑟曾在解释另一位作家（塞缪尔·厄尔曼）的话时这样写道，"岁月也许会为皮肤生出皱纹，但放弃兴趣却会让灵魂平添皱纹……你和你的信仰一样年轻，和你的怀疑一样衰老；你和你的自信一样年轻，和你的恐惧一样衰老；你和你的希望一样年轻，和你的绝望一样衰老。每个人心灵的正中央都有一个记录室，只要收到有关

美丽、希望、愉快和勇气的消息，你就会年轻。当你的心蒙上了消极的雪和愤世嫉俗的冰时，就只会日渐老去——然后，正如歌谣中所唱的那样，你只会慢慢凋零。”

他自信自负、充满希望、不曾绝望、乐观向上、毫不怀疑的性格一直延续到了最后。直到1964年1月26日，他84岁生日那一天，他显然知道自己总算是准备好要离开这段人生了。他刚刚完成了自己21.3万字的回忆录，椅子上的一个污点就是他换了一本又一本的拍纸簿、用自己有棱有角的维多利亚风格草书写作休息时头靠着的地方。书稿上几乎没有擦抹或删除的痕迹，文字如同一股稳定的涓涓清流一般从他的笔尖涌出。军人的回忆录一般是枯燥无味的，可麦克阿瑟这本回忆录（于他去世后问世）笔触却生动活泼、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争议不仅仅是关于其中的内容，还有他行文的风格，因为某些片段似乎是从惠特尼和威洛比的早期作品中摘录出来的。我们很难把将军看作是一个抄袭者，而此事可能还有别的解释。也许这些内容全都来源于共同的原始资料，比如过去的笔记；又或许是将军早在自己被解职后不久就写好了这些段落，以备将来出版，却遭到了自己属下的剽窃。无论如何，回忆录的剩余部分无疑是他的心血，绝无仅有地证明了他的思维直到最后都是入木三分、十分清醒的。然而他的身体却衰弱得很快。埃格伯格医生认为，如果他早些寻求医疗护理，也许还能多活几个年头。不过他非常不喜欢医生。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会让他想起自己更愿意去忽视的弱点。12月初，陆军球队前来与他讨论上周和海军之间的比赛，却惊讶地发现他不仅在身高和体重上都减少了不少，还患上了黄疸病。那些按照他平时的喜好戴着满身绶带前来祝他年年岁岁有今朝的军官也同样感到震惊不已。有些人还感觉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他也是这么想的。

在将军步入客厅时，他们全都绷直了身子立正站好。和往常一样，他响亮地喊了一句：“战友们！”紧接着，他吩咐大家稍息，并用前几年说过的同样的话语开口说道：“你们可能意识不到我是多么地盼望这样的聚会。它让我记起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鲜活回忆。我这一生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我充满希望地期待着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怀着满心的感恩去接受它。”不过，这一次，他说他想要不按规矩行事，给他们讲述一个苏格兰兵坐着拥挤的火车从伦敦前往爱丁堡的故事。“第一站，”他说，“他从其他人的膝盖中间挤出了车厢。他们看着他跑进车站，然后在火车离站前又跑了回来。第二站时，他又做了同样的事情。当他在第三站下车后差点儿没有赶回车厢时，一位乘客问道：‘苏格兰兵，你为什么每一站都要跑到车站里去？火车上有厕所。你就待在火车上吧。’苏格兰兵抬起头，看了看大家之后答道：‘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我是个得了重病的人。昨天我去看医生时从他的嘴里得知我的时日不多了。他告诉我，苏格兰兵，如果你想再看一眼你的老家苏格兰，最好现在就启程北上——还有，我要提醒你的是，即

便你现在就出发，也不一定能赶到那里。所以我每一站都会下车买票。’”所有人都开始大笑，直到看到将军凝重的表情才停下来。

3月1日时，他的体重已经降到了140磅，并且忍受着恶心、断断续续的头痛以及被他形容为“腹部疾病”的腹痛。他的皮肤和眼睛上的黄色色素沉淀加深了，一位医生诊断他的黄疸病“略有加重”。从军医处处长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约翰逊总统当晚致电华尔道夫酒店，告诉将军，一架空军运输机一早将把他从拉瓜迪亚机场送往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兰珀特校长和其他军官乘车前往机场为他和琼送行。颤抖着走上飞机的麦克阿瑟说道：“我多次面对过衰老卑鄙的死神。我想自己这一次已经无力反击了。但我会尽力而为的。”

3月6日，军医们在外科手术中发现他的胆道系统已经堵塞。他们担心他患上了恶性肿瘤，但他侥幸逃过了。不过他们还发现了肝部损伤和几处胆结石，并移除了他的胆囊。他的状况被形容为“令人满意”。尽管如此，他依旧十分虚弱；输血开始后，长时间守护着他的琼和阿瑟被安顿在了医院的一间三居室套房里。尔后，他又接受了两次移除导管和肠梗阻的大手术，以便缓解食道出血的问题。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他不可思议地撑过了4个星期的时间，给医生、护士和勤务兵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4月3日星期五晚，他平静地陷入了昏迷状态，并于星期日下午2点39分因急性肝肾衰竭病逝。

下午5点07分，一列由12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从沃尔特·里德出发，返回纽约——琼和一位护士令人伤感地红着眼睛互相安慰彼此。在警方的护送下，灵车和其余的车队穿过潮湿的夜色，朝着曼哈顿公园大道和第66街交汇处的第7军团军械库飞驰而去。晚上10点47分，当灵柩被抬进军械库的克拉克室时，前来吊唁的人已经开始涌入门口了。约翰逊总统下令美军驻全球各地的基地都鸣枪19响向将军致敬，而降半旗的仪式也一直延续到了星期六于诺福克举办的葬礼当天。

政府发放的朴素灰色钢棺被摆放在了灵柩台上，周围还立着四根忽明忽暗的蜡烛；棺盖半敞着，下半截覆盖着星条旗。将军自己的旗帜（红底上画着五颗白星）也立在旁边。他戴着一对星状饰环，胸前却没有佩戴任何的勋章——他曾经就此做过明确的指示。同样也是按照他的吩咐，他的身上穿着褪色最严重的那套土黄色军服，布料不仅破旧不堪，而且被洗得格外柔软。一次，他一边抚平这套军服，一边对迈登斯说：“我猜，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变成了我灵魂的一部分，是我人生的象征。我做每一件重要的事情时都穿着它。等到大限一到，我将穿着它继续上路。对于一个美国人、一个士兵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荣耀的呢？”

葬礼的布置恰如其分：代表了5个兵种的5位士兵以稍息的姿势站在了灵柩

台的周围。军械库建于1880年，也就是将军出生的那一年。克拉克室里散发着老式的典雅气息。高耸的天花板上贴着抛光橡木做成的镶板；一座巨型的壁炉占据了其中的一面墙壁。星期一下午，整个壁炉都被成片的馨香鲜花遮挡住了。这些鲜花有的是麦克阿瑟的第一任妻子赠送的。她告诉记者，自己和麦克阿瑟生活的那段日子是“其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话似乎也很合时宜，因为他平日里最喜欢夸张的措辞。唯一不合时宜的是霍华德和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报纸，上面刊出的卢卡斯和康西丁10年前对他进行采访的内容并没有反映出他后来的坚定信仰。惠特尼称它们是“虚构的废话”，而卢卡斯则指责惠特尼是个骗子。《生活》杂志写道：“比节日里的幽灵更糟糕的是在葬礼上吼叫着说长道短的人。”《星期六评论》表示：“他们要为他争取最高的荣誉，却又剥夺了他拥有一个体面葬礼的机会。‘他们’是谁？‘他们’只是对独家新闻趋之若鹜的肤浅新闻记者。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是未曾真正理解过他，却又支持他的极端分子。”马克斯·阿斯科利在《记者报》中写道：“纵观他的一生，他成为暴风中心的能力既是他的天赋，也是他的祸根。愿他的灵魂安息，因为他在地球上的记忆将永远无法平静。”

麦克阿瑟过分美化了自己的葬礼。他当然要为这场仪式悉心筹划（凡事都要经过细致的策划），但他的指令，从美军的棺材到没有任何勋章的衬衫，都低调得不像他的风格。故意为之的朴素风格让人不禁心生怀疑。先他4个月去世的肯尼迪总统曾经劝他，他需要“一场与他相配的国葬”，由西点军校的学员们来担任显著角色。听了这一席话，将军笑着答道：“的确，我也想看到那样的场面。”

星期一，迎着刺骨的雨水，2 500名军校学员在平原上列队（麦克阿瑟昔日住过的1123号房间正好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这一景象），面对哈德孙河鸣响了6发礼炮，以示敬意。硝烟混合着雾气在河面上高耸的绝壁上空飘荡。兰珀特告诉他们：“他在最后的时光中发起的英勇战争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恰好象征着他奉献一生的原则。”当天晚些时候，袖子上别着象征职权的V形臂章的学员们出现在了军械库，其中一人站到了五星旗的旁边，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游行中扛起这面旗帜。星期二，3.5万名纽约市民肩并着肩地站在了青铜大门的门外，队伍一直向北延伸到了第72街，等待着将军的灵柩从他们的身边经过。星期三一早8点，随着此起彼伏的步枪信号声和嘹亮的喇叭声，指挥队列的高年级学员此刻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向前进！”

旗帜在逐渐扬起的微风中飘荡，可依旧狂暴的大雨还是浇湿了他们的身体。绵延了4个街区的第1行军方队由西点军校乐团、学员方阵和将军与上将仪仗队组成。紧随其后的是由6匹梅尔堡战马牵引的弹药车，上面摆放

着覆盖着旗帜、完全闭合的棺木。马车的身后跟随着五星旗帜，还有一匹无人驾驭、盛装打扮、马镫上倒挂着皮靴的战马。后者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就是阵亡战士的象征。队伍的后面跟着许多举着军旗的游行者。在上百万电视观众的注视下，他们沿着公园大道、第57街、百老汇和第七大道一路行进至宾州火车站。上午9点15分，送葬的火车驶出了车站，在特伦顿短暂停留后又在马里兰州的奥登顿和阿伯丁减速行驶，以便军队代表团向他致敬。罗伯特和埃塞尔·肯尼迪作为官方的送葬者登上了火车。得知约翰逊正在联合火车站等待他们，罗伯特对布莱克耳语道：“等到他望向我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冷若冰霜的眼神。”

不过，约翰逊总统径直走向了琼和阿瑟，并拥抱了他们。启程前往国会山时，现场发生了令人尴尬而又困惑的一幕：约翰逊和肯尼迪的司机互相排挤着彼此、争夺位置，而约翰逊的特勤人员最终迅速跃进到了肯尼迪的车前（“我希望他们在达拉斯的时候也能这么机警。”罗伯特说道），但总统似乎感动得除了将军的遗孀和儿子之外眼中别无他人。站在圆形大厅里，他强忍着内心的情感，将一个由红、白、蓝三色花朵编织的花环放在了棺材的脚下。接下来的那个下午，棺材一直被摆放在那里供公众瞻仰，直到队伍重组之后将其运送到华盛顿国家机场。一架政府飞机载着遗体飞往了诺福克的海军航空站，而这里是接受公众瞻仰的第三座城市。星期日，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仪式结束之后（吉田在听闻麦克阿瑟去世的消息之后，也第一时间乘机从东京赶来参加了这个仪式），将军的遗体被埋葬在了诺福克具有114年历史、后来被献给将军作为纪念堂的县政府所在地。在一块宁静的墓碑下，他就在那里冰冷的地窖里长眠至今。

纪念堂被人们奉为了圣祠。门外立着一座活灵活现的麦克阿瑟雕塑；室内则摆放着大量值得纪念的收藏品：奖章、烟斗、手杖、旗帜、宝剑、帽子、墨镜，甚至连他5年间往返第一大楼乘坐的黑色豪华轿车也被收入其中。他的共济会会员徽章也在里面，还有他第一大楼办公室书架上立着的缟玛瑙钟表、描绘他生平的漫画、彩虹师臂章、他于1914年前往韦拉科鲁斯执行任务时携带的手枪、麦克阿瑟家族遗留下来的盾形纹章和格子呢。类似的展品还有很多。如果这些墙壁能够说话，身处其中的人一定会感觉它们会说出什么令人惊讶的话来。

然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这些遗物似乎全都不太重要，缺失了这个男人的精神。他不仅仅是一个自吹自擂、矫揉造作的人。他无疑喜欢装腔作势，但他的手法掩盖的却不是他的弱点，而是强大的力量。和同样喜欢高视阔步的林登·约翰逊一样，他永远也不会说服自己去相信别人能够毫不畏惧地注视他赤裸裸的权力。于是，这两位君主都穿上了不得体的衣服，直到全国上下的旁观者得出结论，他们的身上除了华而不实的演出服之外什

么也没有。麦克阿瑟之所以能在亚洲广受好评，是因为东方人知道该如何私下窥视复杂的外表，找出一个人隐藏的本质。他们重视诡计，意识到它既能掩盖荣誉也能掩盖耻辱；他们尊重一个看上去不如自己的人，一个想要把最好的自我保留给自己的人。对此深有体会的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麦克阿瑟的命运是超凡脱俗的，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超凡脱俗的。困难在于为他的本质下定义。他总是令人难以捉摸，而此时就更是令人倍感困惑了。

也许这个男人人生的精华存在于那些无法被诺福克博物馆这样的地方保存和展示的画面中。如果有可能回顾他的一生，那些光芒可能会闪烁不定，每一道都散发着短暂却又赤裸的光芒，通过窥见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来展示他即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尤其是就他的事例而言，每个人都是过去的自己的集合。如果一个人以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为起点回顾麦克阿瑟的一生，像倒转的电影胶卷般层层剥开昔日的时光，让胶卷转回从前，将军会经历不平静的退休，然后深陷公然反抗杜鲁门和被困朝鲜半岛无望的僵局，最后治理战后的日本。这样一来，胜利就会被认为是他在赴日担任接任统治职责的那些年间（也就是他与裕仁的军队展开无畏奋战的日日夜夜），进化而来的。反过来，播撒在他曾奋力抵抗的巴丹半岛上的勇气之种则来源于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份期待、阿戈讷的污泥和恐惧，还有在此之前长时间身陷险境的磨炼。

但最为宝贵的一瞬间是几束过于私密而无法在历史的宽屏上公开的光芒——尽管那些怀疑已经成为过去，就像是等待被军旗召唤的退伍军人。在这里，倒退的影响会唤起太平洋上那些已然被液化的回忆：一组由许多声响组成的声音——遥远的波浪分分合合，锚链猛地坠入水中的声音，希金斯登陆艇上吊柱转换的吱嘎声。被弹壳撕碎的棕榈树叶锯齿状叶片映衬着黎明时分荒凉的热带地平线的画面，士兵们笨拙地沿着货船的网兜下坠的画面，美军士兵的军靴在敌方的海岸上匆忙跑过的画面，还有战场上古怪的灰白，仿佛薄雾已经褪尽了所有的颜色；他一次又一次公然蔑视狙击手时内心回想起的令人作呕的恐惧感；刚刚熨烫过的卡其装散发出来的糨糊味道；他在科雷希多岛遭到轰炸时怀抱住被吓坏了的儿子时的那份温柔；他躺在琼的怀抱中时心中激起的挚爱；还有，在他那令人眼花缭乱、洒满阳光的吉卜林格调的青春顶峰，他穿上第一上尉的军装时如痴如醉地臣服于19世纪军国主义充满吸引力的诱惑之中，快乐地迈着满满30英寸长的大步、伴着苏泽军队乐曲的旋律，带领西点军校的学子们跨过"平原"。

奇妙的静态画面反反复复地旋转着，跳过了他作为新生时惨遭戏弄的时光；他在西点军校自我发现的时光；德高望重的麦克阿瑟法官留着满嘴的胡子、叼着雪茄，在华盛顿N街1201号宅邸中主持王朝般盛宴的时光。每一刻钟报时一次的画室钟表；莱文沃思的交班仪式；父亲给他讲述的谢尔

曼麾下无畏的联邦军（蓝衣男孩）的故事；母亲飞扬跋扈地指挥他奋斗、奋斗，叮嘱他永远也不能在获胜之前放下刀剑；克拉格步枪干脆利落的声响，还有他和哥哥在堡垒栅栏外的沙漠里玩耍时温暖的沙子给裸露的双脚带来的刺痛感；日落时隆隆的枪声，以及平克妮向下歪着头时映照在怀中那个抓着她层叠的衣裙、仰起头来的孩子脸上柔和而又光亮的微笑；他在摇篮里醒来时耳边响起的金色军号的声音，军士们在门外的阅兵场上高唱的歌曲旋律；还有，在他头顶广袤的天空里骄傲地鼓动飘扬的军旗，军旗，军旗。

---

1. 阿登战役中的美军伤亡人数是106 502人。麦克阿瑟在太平洋地区的伤亡人数是90 437人。

致谢

和之前的几本著作一样，本书的作者要深深地感谢卫斯理大学奥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大学图书馆馆员怀曼·W. 帕克，感谢他们慷慨的帮助、体贴和理解。

再次感谢我不可多得的助理玛格丽特·肯尼迪·里德尔。她在长年累月收集信息的过程中证明了她的忠诚、机智和孜孜不倦——以及不可或缺。

我还要感谢我的对外事务代理人唐康登，我的编辑罗杰·唐纳德，还有我的审稿人梅丽莎·克莱曼丝。他们熟练的催产术和无限的耐心帮助我造就了这部作品。为了解读麦克阿瑟，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试图忍受我的怪癖和奇想的。他们做到了，这一事实证明编辑也应该获得荣誉的奖励，而且值得被授予亮得足以掩盖整个宇宙的光芒的24K金奖章。

在这部作品中，我还得到了下列人士的帮助：泰勒·埃布尔、罗伯特·H·亚历山大、杰克·安德逊、诺曼·J. 安德逊、凯西·巴柯拉、D. K. 巴克斯特、厄尔·布莱克、爱德华·J. 布恩、小约翰·H. 布莱德雷、詹姆斯·H. 布雷迪、理查德·L. 布莱恩、哈里·A. 巴克利、劳伦斯·E. 邦克、罗伯特·拜克、玛丽·卡普斯、罗伯特·G. 卡罗恩、霍丁·卡特三世、理查德·库珀、戴维·康韦尔、威廉·克雷格、迈克尔·克劳福德、弗吉尼亚·克雷登、伯克·戴维斯、比尔·M. 戴维斯、贝丝·戴、T. C. 邓纳姆、迈克尔·德坎、小威廉·艾克特、罗杰·O. 埃格伯格、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爱德华·罗布·埃丽斯、唐恩格利、詹姆斯·A. 法利、罗伊·弗林特、托马斯·P. 加里根、詹姆斯·M. 加文、弗雷德·I. 格林斯坦、厄尔D. 汉森、埃夫里尔·哈里曼、尼古拉·L. 哈里森、保罗·T. 赫夫龙、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日比野安、保罗·霍根、黛比·豪厄尔、高英茂、伊莱亚·卡赞、罗比特·F. 肯尼迪、乔治·C. 肯尼、久米川晴、查尔斯·兰迪斯、奥瓦尔·利耶奎斯特、尼克·洛图阿科、克莱尔·布思·卢斯、约翰·B. 伦德斯特罗姆、萨比娜·梅奥–史密斯、汤姆·莫里、查尔斯·S. 墨菲、罗杰·H. 奈、大林莉萨、喀秋莎·帕森斯、约翰·W. 佩顿、小菲利普·E. 帕姆斯、L. H. 雷德福、小约瑟夫·W. 里德、埃德温·O. 赖肖尔、安东尼奥·罗穆亚尔德斯、卡洛斯·罗慕洛·迪安·腊斯科·朱迪斯·A. 希夫、埃德温·H. 西蒙斯、约翰·斯洛内克、路易斯·沙利文、罗斯·特里尔、戴维·汤普森、玛丽·福德·汤普森、诺曼·厄尔·汤普森、斯坦利·P. 陀耶斯基、克洛迪娅·图丹、A. L. 巴伦齐亚、丹尼斯·维托克、D. C. 沃克尔、威拉德·华莱士、约翰·B. 温特沃斯、爱德华·怀特、雅各布·温菲尔德、斯科特·维斯特和沃尔特·泽瓦斯。

本人在研究时从他们的身上获益良多，致以谢意。同样要感谢道格拉斯·麦

克阿瑟夫人的鼓励。但我必须强调的是，她没有读过手稿中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必对文中的任何一句话负责。上文提及的各位也是如此。我愿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

威廉·曼彻斯特